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政治地理学

时空中的政治格局


E-BOOK
中国地理 中国历史

前 言

政治地理学从其本世纪初成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时起，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成为法西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从而受到世人与学术界的批判。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因为对错误的、反动的观点的批判，才能为正确的、科学的论点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是值得惋惜的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批判地缘政治学中的错误观点的同时把地缘政治学也一并打入“冷宫”，很少有人去问津。这不当之处也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武器往往被侵略者作为工具来攻击被侵略者，但是武器绝没有被人所放弃，并被用作反侵略的武器。

但是，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并未完全中断。在二战中，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却提出了“边缘地区”学说。美国政治地理学家柯恩则一直研究世界地缘政治格局，60年代他就提出“分裂的世界”的图式，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改其内容。更重要的是，一些外交家始终关注全球战略问题，以致于与地理关系十分密切的“地缘政治”则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的术语。因此，政治地理学，特别是地缘政治学又成为地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学科和一个热门话题。这说明，政治地理学是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的科学，特别是在当前世界日益多极化的形势下，国际关系与国际形势是十分重要的，是世界所有国家、集团与各种大型组织所关心的。

我是一个《参考消息》报长期的读者，从其发行以来，除“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时间未能阅读外，一直订阅。因此，对国际关系、国际形势及国际问题很感兴趣。1989年，在部分学生要求下，我开始讲授政治地理课。为了教好课，就不得不更自觉地收集、学习有关政治地理方面的资料与理论，同时，对政治地理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次应高等教育出版社之约编写此书。这本书作为高校地理系学生的教材，其目的也是想在高校中进一步推动政治地理学教学。我认为，我国是个大国，其政治地位、经济力量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大。作为一个大国，仅有对世界的政治地理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在地理界内外大力发展政治地理教育来弥补这一不足。

如何写好此书，我思考很久。我一方面将收集到的几本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学教材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总结自己几年来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此书的框架体系如下：

1. 首先确定本书包括国家级的政治地理与国际级的政治地理两部分。并对国际级政治地理部分的份量适当加强。

2. 除注意传统政治地理学中的国家级的国家空间特征内容，并加强了国家起源与民族、综合国力等内容外，同时增加了政治地理学中新发展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与选举地理部分。

3. 为了增强本书的理论性，分设国家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和地缘政治学的各家学说两章。前一章根据拉采尔、哈特向、琼斯和卡尔·德兹四人的原著，介绍其理论主要内容。地缘政治学各家学说一章中，除介绍拉采尔、马汉、契伦、麦金德、斯皮克曼、柯恩、亨廷顿等人的地缘政治学说外，还介绍当代外交家与学者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关于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见解。另外，对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变化的周期与政治经济的因果的学术见解也做了介绍。

4. 考虑到地理系学生历史背景知识的薄弱，本书通过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与国际政治格局、当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与前景各章使读者能从世界政治格局演变中了解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使理论与实际能紧密结合，并从中能基本掌握用地缘政治学理论去认识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些变化。

参与本书编写的有：王正毅（第一章的大部、第三章），沈伟烈（第一章的政治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楼耀亮（第五章），李亦鸣（第八章，与王恩涌合编），王恩涌（第二、四、六、七章），王恩涌与李贵才（第九、十章）。

该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特此感谢。

由于我们能力所限，错误之处恳请给予批评和指正。

王恩涌
1996年春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和教育部理科地理学“九五”规划教材。政治地理学是以地理空间结合有关学科来说明国家间与国家内的空间政治格局及其与有关因素的相互关系。本书从发展的、综合的角度，联系世界形势介绍了政治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其内容包括政治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历史发展，国家的起源与发展、民族和民族主义，国家的空间特征，国家政治体制、区划、政党和选举地理，综合国力，国家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地缘政治学的各家学说，20 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与未来前景。它为认识国家的政治地理特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形势提供理论、知识和方法。本书的内容丰富，观点新颖。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地理、政治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适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政治地理学

第一章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历史及范围

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门介于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政治地理学的对象及性质

(一)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有最基本的范畴以及相应的由这些范畴构成的学科体系，以此与其他学科相区别。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不应例外。然而，综观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以及围绕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出现的种种流派，关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仍未形成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这我们可以从地理学史上出现的如下几个主要流派的观点中看出来：

有机组织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的拉采尔 (F.Ratzel)、德国的豪斯浩弗 (K.Haushofer) 和瑞典的契伦 (Kjellen) 主张，政治地理学就是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研究。如豪斯浩弗就认为“政治地理学系研究政治有机体的空间及其结构的学问。”

政治景观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的惠特莱西 (D.Whittlesey)、哈特向 (R.Hartshorne) 主张，政治地理学主要是对政治景观进行研究，如惠特莱西在其《地球与国家》中曾认为，“地球表面不同地方的政治现象的差异是政治地理学的本质。”

政治生态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的鲍曼 (I.Bowman)、荷兰的范根堡 (V.Valkenburg) 主张，政治地理学主要研究人类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如何从政治地理上适应其所居住的区域自然环境。

统一领域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的琼斯 (S.B.Jones) 则主张，政治地理学应研究政治观念如何转化成政治区域，以及在特定的政治区域内的政治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在琼斯看来，政治观念和政治区域是一个链条的两端，这个链条是这样的：政治观念-决策-运动-区域-政治区域。在这里，“政治观念在这个链条中，并不只是指国家观念，而是指任何政治观念”。政治区域是指任何政治组织活动的地理空间，“不管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独立的区域、国家之下的一个区，还是一个行政区或地区”。

从以上几个流派关于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中可以看出，政治生态学派、有机组织学派、政治景观学派都强调，政治地理学是对国家的空间结构及其内、外活动的研究，国家是研究的对象。用荷兰地理学家范根堡的话来说：“政治地理学就是国家地理学，并且为国际关系提供地理上的解释”。而统一领域学派则将国家这个有形的政治区域扩展到诸如大西洋联盟、共产主义国际体系、英联邦等这样的术语表示的大面积的政治区域上。这样，就

G.E.Peary. 屈彦远译. 世界政治地理. 台湾“教育部”出版, 1960.

D.Whittle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New York: 1944.

Glassner M, deBlij H 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153 ~

Glassner M, deBlij H 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153 ~

Valkenburg V. Element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1939.

将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在我们看来，尽管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但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一直是政治地理学的主题。政治地理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的地理空间的改变。这种研究必然集中在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上。因为，人类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都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而地理区域则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所以，人类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区域。

所谓政治区域，是指地球表面上任何按照政治标准划分的地区，它既包括一个国家或国家之下的行政区，也包括数国结成的区域。政治区域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政治组织；一定数量的人口；地理区域。任何政治区域都是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体。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三个组成要素的具体内涵有所变化，但这三个要素作为政治区域的组成部分是不会变化的，缺少其中一个要素，也就不能成为政治区域。在当代，这三个要素都有其特定的内容。我们所说的政治组织，既指各个有主权的国家，也包括各国国内的地方政治组织，如各级地方政府，还包括数国联合起来的国际组织和地方群体。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对空间的开发，当代的区域除指地球表面上的地域以及分割不同地域的界线外，还指地域之上的空间和大气层。除这些有形的区域外，政治区域中的区域还包括无形的区域，如均势、集团等词语表达的区域。人口除了指人口的数量、密度及其流动以外，还指种族、民族以及人们的政治行为等。可见，政治区域的历史性、时代性，为政治地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内容。

任何政治区域都离不开三个基本组成要素。政治组织，这是政治区域与其他区域，诸如经济区域、社会文化区域、自然区域相区别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构成政治区域的首要条件。狭义地讲，政治系统是指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机构，包括“政府”、“国家”；广义地讲，包括实际和法定形式的政治行为，不仅包括国家的合法组织，也包括现实的政治生活，如地区群体、压力集团、政治势力等。一定数量的人口，这是政治区域和其他以人文特征为标准划分的区域的共同特征。没有人，没有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自然界就不可能留下人类实践活动的烙印，各种区域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正是人类的政治活动才形成政治区域，离开人，一切就无从谈起。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G.A. 阿尔蒙德曾说：“政治系统是由国民或选民同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这些相互作用的角色构成的。当每个人参加政治交流，组织政治利益集团，参加投票或缴纳捐税时，他就从非政治角色转为政治角色，因此，我们不妨说，每个人都是出入于政治系统的。”当然，人口数量可多可少，如有的城市可达几百万人，有的村庄只有几十人。地理区域，这是构成政治区域的必要条件，也是所有区域的共同特征，这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表现形式。地理区域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有主权的国家来说，地理区域是指该国的领土；对国际组织来说，地理区域是指这些组织相应的空间，这些区域都是有形的，有其明确的界线。也有无形的地理区域，这种区域很难考究其界线，如选举活动中选民态度的分布范围，国际政治中的均势等。

政治区域这三个组成要素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就政治系统和人类的关系而言，政治系统并不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而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随着“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和“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政治。”政治系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就政治系统和地理区域而言，政治系统离不开地理区域，地理区域为政治系统提供“政治资源”，具体表现在，任何一个政治系统必然受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诸如国内的经济、自然环境和资源、教育和技术体系、种族和文化体系以及国际之间的贸易、外交、战争、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都影响政治系统的功能。政治区域正是这三个要素的有机统一。

（二）政治地理学的性质

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性质是由其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概括起来，政治地理学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历史性**：和其他许多学科相同，政治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它的历史性或时代性，这种时代性或历史性是由其研究对象本身的特征决定的。政治区域本身之所以具有历史性，是因为其组成要素是随着历史的进步而不断更新其内容的，并改变其形式。如政治系统，作为政治区域的组成要素，它的内容和形式在不断地变化。在二战之前，国家是主要的政治组织形式，而战后出现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群体改变了政治系统旧的存在形式，丰富了政治系统的内容。人口作为政治区域的一个要素，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诸如大量移民、难民以及城市化都丰富了人口的内容。仅就数量而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其人口增长的幅度也不同。当前世界出现了三种人口增长类型：西欧的零增长型、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型以及发达国家的低速增长型。而地理区域的形式则更是变化不断，如有形区、无形区等。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政治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政治区域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就世界政区而言，19世纪的世界政区图和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政区图相比，以国家为尺度的政治区域的数量明显地增加了。就某一国家内部而言，其行政区划也是随着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变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当时建设的需要，曾对旧中国行政区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省和中央之间设立了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1954年又撤销了六大行政区，恢复省作为一级地方政权，同时增设了民族自治区域等。政治区域的这种历史性并不意味着政治地理学不是一门科学，因为，无论组成政治区域的三个要素的具体形式和内容如何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这三个要素作为政治区域的组成部分本身是不改变的，这就决定了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理论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可以说，政治区域的历史性或时代性并没有改变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作为一门科学。相反，正是这种历史性或时代性不断地丰富了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内容。

2. **政治性**：与其他类型区域相比，政治区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阶级性，也叫政治性。任何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国际组织在国内和国际活动中都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代表一定的阶级，公众的政治行为也是代表某

种政治倾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区域的这种政治性是随着政治组织，特别是像国家这样的机构的产生而产生，当然也随着统治阶级的统治机构的消灭而消亡，“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就国际组织而言，许多国际组织都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些也使国际政治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性。如原来的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英等为主的西欧资本主义阵营就有不同的政治性质。因此，在分析政治区域时，除了注意其历史性外，还必须注意其政治性。

3. 综合性：政治区域另一个特征就是综合性。没有纯粹的政治，政治总是和某些集团的利益，特别是和经济利益相联系的，除此之外，政治也和军事、思想意识形态相联系，政治正是这些因素集中体现。区域也不是纯粹的空间，而是自然资源、人口等分布的空间。所谓政治区域的综合性就是指任何一个政治区域都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意识形态、资源、人口等的综合体。政治区域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在研究政治区域时，必须从多方面加以考虑，如当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区域加以研究时，不但要研究政党、政府的空间结构，而且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军事、思想意识形态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同时还要研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以及人口分布的政治意义。

二、政治地理学的历史发展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思想萌芽历史久远，但是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里，分别介绍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简史。

（一）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

一般认为，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 萌芽时期（古代—19世纪中叶）：在西方，最早把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并加以阐述的思想家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曾对城邦国家的地理位置作过论述。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最合理的地理位置是四面邻水的岛国，岛国拥有足够的人口来防御外来的侵略，并在必要时援助邻邦。由于海上影响会产生极坏的结果，所以，柏拉图主张，岛国应尽量减少海上接触。只有奉行自给自足，远离外界的原则，才能达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道德至善。他主张雅典应该效仿这种模型。

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力图找出城邦的理想形式。他在其《政治学》卷七中专门对此进行了探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口和土地是构成理想城邦的基础条件。就城邦的人口规模而言，他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就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王正毅.现代政治地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额”，这就是说，城邦人口不宜过多。倘若城邦人口多到彼此各不相知，就很难实行民主选举，“一个城邦，如果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太多了，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它既难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就城邦土地的性质和位置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土地应该是有生产能力的，使大家各得所需，高度自给自足，同时，城邦的地理环境应该是敌军难以进入而居民容易外出的。与柏拉图相同，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海上敌对势力的危害性，但他主张最理想的城邦应该位于海陆相接之处，既利于防守自卫，更利于贸易往来；最后，亚里士多德就公民的素质和气候的关系作了探讨。他认为，“寒冷地区的人民一般精神充足，富于热忱，欧罗巴各族尤甚，但大都沉缅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他们因此能长久保持其自由而从未培养好治理他人的才德，所以政治方面的功业总是无足称道。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唯独希腊各族处于欧亚两大陆之间，因而智勇双全。

总之，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理想城邦的必要基础条件有二：一是“公民团体人数的多少及其所秉赋的品质”，二是“国境的大小及其土壤所应有的性状”。可见，亚里士多德早已注意到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文艺复兴，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之后，政治事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法国律师琼·博丁（Jean Bodin，1520—1596年）在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和研究中，强调地理环境和政治事务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上帝使人类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其目的就是形成劳动地域分工，进行贸易往来。英国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4—1687年）曾在克伦威尔共和政体中任职。当英国想统治爱尔兰时，他花了近4年时间绘制了《爱尔兰图集》，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爱尔兰的文章，为英国统治爱尔兰提供依据。在有关的论述上，他从地理环境这一角度探讨了国家的最优模型。他主张，国家的规模不宜过大，位置不要距海太远，这有利于贸易发展。国家的版图和资源是供人们使用的，因此，国家的最优规模是使其人民充分地利用和开发土地上的资源。他还认为，人口过于分散是软弱的根源，人口应集中于粮食能得到充分供应的大城市。

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在其1740年出版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也着重讨论了自然特征和政治现象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法律制度并非某一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律的制定不仅与某国的历史、经济、军事、贸易、人口有关系，而且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法律应该和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态与面积有关系；和农民、猎人、牧民的各种生活方式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法的精神，“自然”因素和非自然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特征。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In：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的关系虽然早已引起古代、近代许多思想家的重视并做了许多论述,1750年法国学者图高特(Jurgot,1727—1781年)又把“政治地理”这一概念引入地理环境和政治过程相互关系的分析中,这些思想对政治地理学的形成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直到19世纪,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而只停留在空洞、抽象的思辨中,或停留于某些经验材料的堆积中。

2. 初创时期(1897—1914年):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被系统化、理论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主要有三位思想家,德国的拉采尔、英国的麦金德和美国的马汉。

(1) 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年),1868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学习动物学、地质学和比较解剖学。1870年从军,在普法战争中两度负伤,1872年曾作为流动记者访问意大利,1874—1875年访问墨西哥和美国,1875年返回德国,辞去报纸职务,担任慕尼黑技工专科学校的地理讲师,1880年升为教授,1886年受聘莱比锡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人类地理学》(1882)、《政治地理学》(1897)等。在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拉采尔首次对政治地理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国家有机体”说,被人誉为“政治地理学之父”。他的“国家有机体”说主要包括如下的内容:国家是一个有空间性的有机体,拉采尔把达尔文进化论中的有机体概念引入对国家的研究上,在他看来,这个有机体是人民和土地的统一,具有生长、扩张和衰亡的生命周期,空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家必然要为保卫和扩大生存空间而斗争。斗争是国家生活的根本特征。和生物进化过程中所遵循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国家为了生存和强大必然要扩展其领土,世界性强国必须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尤其是战略要地。世界强权力量的瓦解和替代过程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在政治地图上就是不同尺度的国家相互组合,国家的衰落就是由于对空间观念淡薄所致。国家演变的历史就是为政治领域而斗争的历史。国家生长遵循七个法则:A.国家的空间随人口的膨胀而生长,人口增长是国家扩张领土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B.国家领土应随其他方面,诸如商业和交通的发展而扩张;C.国家通过并入较小的领土单元而生长;D.边界是国家的边缘器官,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器;E.国家在扩张领土过程中往往寻求最富有政治价值的土地;F.一国领土扩张的动力来自其他更发达的国家;G.领土扩张的趋势是在转换过程中发展和增长的。

(2) 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麦金德(Mackinder, Sir Halford, 1861—1947年)1861年2月生于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188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近代史,1899年担任牛津大学地理系主任,1903年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他还是英国国会议员,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26),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度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主席。主要论文及著作有:《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等。

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把地理学思想应用于政治之中,率先从全球角度来考虑世界政治地理的结构,对世界上大陆与水域分布的政治意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首创“心脏地带”说,这种思想在其后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麦金德看来,世界的政治力量可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陆上力量

最强的是欧亚大陆，欧亚大陆北部为冰块所围绕，其他三面为水域包围，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块。在这块大陆中部，北以广阔的亚极地森林和沼泽地带为界，西面从匈牙利的普斯塔斯到中国东北的小戈壁，绵延 6000 多千米，构成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占据这个“心脏地带”的是骑马和骑骆驼的游牧民族。世界海上力量的中心主要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诸国，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具有撒哈拉沙漠的非洲。

麦金德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主要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对比。早在 14 世纪中叶，占据“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为了建立陆上强国，就曾不断地入侵边缘地区，麦金德列举了金帐汗国向西欧、伊勒汗国向西亚以及游牧民族对中国的侵略，他说“当金帐汗国占领从咸海经乌拉尔山脉与里海之间的通道到喀尔巴阡山麓的钦察草原时，另一群游牧部落从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向西南到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甚至侵入叙利亚，建立了伊勒汗国的统治。第三支随后攻入中国北部征服了中国”。而海上力量在发现好望角之前，仅限于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麦金德认为，发现通向印度的好望角航路最主要的政治效果就是加强了海上力量，用麦金德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把欧洲和亚洲的关系颠倒过来”，以前，“欧洲被关在南面不可逾越的沙漠、西面无边莫测的大洋和北面、东北面冰雪或森林覆盖的荒原之间，而东面和东南面又经常受到骑马和骑骆驼民族的优势机动性的威胁。”好望角的发现使得边缘地带诸国摆脱了陆上强国的控制，活动范围增加了 30 倍以上，如英国、加拿大、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就是陆上力量难以达到的地方。

不仅历史上有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的对峙，而且现实世界中仍然如此。尽管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的出现增加了海上强国的机动性，但横贯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铁路更增加了陆上强国的机动性，这条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到东端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达 9000 多千米，把幅员辽阔的心脏地带的人口资源、棉花、小麦等的潜力挖掘出来，又由于铁路运输较之海洋运输便捷，远洋运输必然会被拒之门外。因此，处于心脏地带的陆上强国俄国仍然是一个枢纽区域，“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如果这个枢纽国家再向边缘地区扩张，并利用其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建立世界帝国仍然是可能的。因此，麦金德主张，海上力量必须在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这些桥头堡部署部队，阻止俄国集中全力建立舰队。通过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麦金德对地理环境和政治事件的关系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他认为：“各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相对的自然特征进行的，”而“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4～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4～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Wirbaler 现名 Virbalis（维尔巴利斯），位于立陶宛的考纳斯的西南方

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会改变它和它赖以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

1919年，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仍然坚持海陆力量这种二分法，但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作了修改。在形式上，陆上力量主要出现了由欧洲、亚洲、非洲组成的“世界岛”（world island），海上势力出现了从欧洲环绕非洲到印度洋的海域组成的“世界海角”（world promontory）。在内容上，陆上世界出现了两个“心脏地带”（heartland），一是亚洲的多山地区，另一是东欧。尤其东欧，它是欧亚大陆的唯一通道，是联结黑海和波罗的海、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的中心。通过分割东欧使欧亚大陆的政治力量得到平衡。由此，麦金德提出了格言式的口号：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二战开始后，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大规模入侵，麦金德又重提心脏地区的资源和自然特征的重要性，主张战后应该分割东欧，清除德国力量，重组这一地区政治地图，形成在德国东面有强大的苏联，西面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联盟这样一种政治地理格局。

（3）马汉的“海权”思想。阿尔弗雷德·萨伊尔·马汉（M.T.Mahan，1840—1914年），美国海军上将，曾在新港海军学院任海洋历史学与战略学讲师，1886年出任该校校长。1902年被推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会长，1889年，他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出版了，提出了著名的海权思想。

马汉认为，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就是控制海权。国家强盛与否固然与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但国家的自然特征比这些人文因素更为重要。为了证实这种观点，马汉对1660年到1782年的海洋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欧洲列强之间的海上战争和冲突，最后，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海上势力取决于六个因素：地理位置，包括近海程度、保持海外战略基地、控制重要贸易通道，海岸特征，自然港湾条件，进出的便捷程度，海岸线长度和防御的可能性，人口规模，民族素质，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态度，政府政策。

与萌芽阶段相比，在初创时期，政治地理学主要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第一，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地理学家，在论述政治现象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时已开始注意系统化、理论化，而不只是拘泥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某些资料的堆积，特别是麦金德，他开始从全球的角度来考察海陆分布的政治意义，并企图用人类的历史来证明。第二，从研究倾向来看，这一时期观察问题主要以欧洲为中心，有一种欧洲即世界的倾向，忽略了太平洋、美洲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无论是拉采尔、麦金德还是马汉，都企图通过讨论地理环境和政治现象的关系来为自己国家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这就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缘政治学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

3. 发展时期（1914—1945年）：政治地理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戏剧性的发展，一方面，政治地理学的内容、定义更加明确，理论概括也大有发展，并出版了两本比较系统的政治地理学教科书，使这门学科真正朝着科学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政治学界和地理学界出现了一股逆流，这就

是以豪斯浩弗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产生，致使政治地理学对地缘政治方面的研究在战后长时间处于困惑状态。

(1) 发展状况。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加强了对国家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最深远的影响是德国、沙俄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解体，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国家，如由奥匈帝国瓦解而成为独立国家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由沙俄帝国瓦解而成为独立国家有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后三者在二战后并入苏联版图，1991年又行独立），被德、俄、奥三国三次分割的波兰也复了国。国家成了这一时期政治地理学家们首要关心的对象。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是美国的政治地理学家哈特向，在1935年发表的《政治地理学的近期发展》一文中，哈特向主张，政治地理学应以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国家进行描述性的分析，分析国家的形态、自然和文化景观，地区的地理联系，解释国家的核心区的区位和范围，国家领土变化的趋向和特征，评价国家版图在战争时期和平时提供资源的能力、独立性等。总之，政治地理学就是研究国家的空间和地区。突出了边界问题。战争期间，特别是战后在关于如何重组欧洲政治地图的巴黎和会上，边界和领土问题成了令人关注的问题，巴黎和会还专门为此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就是在某些国家内部，行政区的界线问题也成了中心问题，如一战后的美国，除了与古巴之间有边界之争外，在国内也产生了一系列州和州之间界线之争，如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等。边界问题成了多种地理杂志的主题，如巴恩斯关于阿尔巴尼亚未来界域的研究，罗塞蒂和霍尔迪奇对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新边界的研究。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者霍尔迪奇(T. Holdich)的《政治边疆和边界制定》(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y making. London: 1916.)一书，对边界问题进行了理论上探讨，提出了确定边界的几条原则，并认为调整国家边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些观点促进了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丰富了政治地理学的内容。

对政治地理学的内容和性质有了比较成熟的观点，出现了两本讨论政治地理学全部内容的教科书，一本是美国地理学者惠特莱西的《地球和国家》(The earth and the state. 1939.)，另一本是荷兰地理学者范根堡的《政治地理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1940.)。尽管这两本书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截然不同，但它们都对政治地理学的内容作了深入的研究，这标志着这一学科日趋成熟。

(2) 地缘政治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政治地理学得到全面而系统的发展的同时，在德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兴起了一股地缘政治思潮，冀图利用地理知识为其国家扩张与侵略政策作借口。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必须对这股思潮进行批判，否则就很难使政治地理学得到科学的发展。

地缘政治在德国的发展：一战后，政治地理首先在德国受到重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战是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前，德国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欧洲大陆最强的国家。战后，德国的版图被分割，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绝望笼罩着整个国家，但也激起部分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对政治地理的兴趣，他们借用瑞典学者契伦所创用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一词并灌以新的内容，既为其罪行开脱责任，又为其力图东山再起寻求理论依据，这就使得政治地理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走了弯路。这一时期著名的代表人物有：Wulf Siewert、Ewald Banse、Colin Ross、Johannes

ku-hn、Richard Henning、Kurt Vowinkel，其中的中心人物是卡尔·豪斯浩弗。

豪斯浩弗是一位中学校长的儿子，1908—1911年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到日之后，不仅研究日本社会制度，并且成为太平洋与远东问题专家，开始引起德国地理学界的注意。

豪斯浩弗于1913年以一篇关于太平洋政治地理论文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在一战末时升为陆军少将。然而，当他在德国战败后率领德军经过德国残破的边疆省分时，甚为伤感。他认为，德国在一战中之所以惨遭失败，被割让土地和赔款，丧失了亚、非的殖民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德国政治家和军事人员没有认识到战略、地理和政治的相互关系。此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开设地缘政治学和军事地理学，创办地缘政治研究所，主办《地缘政治杂志》，为德国在一战后制定内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使得拉采尔、马汉、麦金德、契伦这些人的理论在德国广泛流传开来。

豪斯浩弗一生著作甚丰，研究范围极广，但他最感兴趣的区域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特别是远东地区。主要著作有：《日本帝国及其地理演化》（Das japanische Reich in seiner geographischen Entwicklung und Siedelung. Vienna: 1921.），《太平洋的地缘政治》（Die Geopolitik des Pazifischen Ozeans. Berlin: 1924.），《今日世界政治》（Weltpolitik von heute）。

豪斯浩弗最有影响的论点是他当时从地缘政治这一角度对世界政治的展望：

首先他对当时德国欲成为强国必须瞄准三个目标做了详细论述。德国欲征服世界，第一主要目标就是先巩固在“心腹地区”的政治势力，这就必须对付苏俄。形成一个以德国为盟主，其中包括德国、苏俄、日本、中国与印度的联盟，使“心腹地区”得以统一。由于苏俄是欧亚大陆上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占世界有人居住陆地面积的1/6，东西距离与自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而横跨大西洋至英国伦敦的距离相等，因此，有深度防御性。这一特征决定了苏俄与德国“心腹地区”之争系陆权的较量。第二主要目标系对中西欧的控制与非洲殖民地的获得。当时许多地缘政治学者认为，对中欧，应控制从芬兰至希腊的横贯中欧之军事路线，用贸易协定获得对对方政治上的控制；对西欧，应掌握边缘地区。第三主要目标是对付英、美海军。世界不仅有陆权之争，而且还有海权之争，强国必须向海域发展，因此，德国在与苏俄争陆权的同时，必须与英、美在海权上决一雌雄。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征服世界。

其次，对远东太平洋地区开始予以重视。豪斯浩弗1925年1月在地缘政治学刊物上曾写道：“一个具有潜力的广大区域在我们面前展开，而静静地等待太平洋世纪的降临，这一新纪元，将成为过去的地中海与欧洲时代及衰退的大西洋时代的继承者。”

豪斯浩弗这些观点对当时德国的对外侵略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地缘政治在美国的发展：一战后，在美国，无论是地理学界，还是政治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在地理学界，地理学家从战前关心纯自然方面转向关心人文方面，即关心人和自然的相互影响，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哈伦·巴罗斯在1922年美国地理学会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的：“在自然地理学创立——或者说是复兴和重建以后，一种使之‘人生化’的坚决要求跟着就提出来

了。这个要求得到了及时的反应，地理领域的中心从极端自然方面稳步地转移到人文方面。直到越来越多的地理学者把他们的论题规定为完全论述人和天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政治学界，随着战后国际政治势力的重新分布，有些政治学家从美国的利益出发，为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寻找借口。这就促使地缘政治在美国盛行起来，有人甚至称这是一个“理发店地缘政治学”（Barbershop Geopolitics）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地缘政治学者，如威格特（H.Weigert），斯皮克曼（N.J.Spykman），斯蒂范森（V.Stefansson），拉铁摩尔（O.Lattimore），惠特莱西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观点。

斯皮克曼曾任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主任和国际关系教授，在地缘政治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American'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1942.），《和平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Harcourt Brace, New York, 1944）。

斯皮克曼首先对地缘政治学下了定义。他认为，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如何以地理因素为基础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斯皮克曼相信，武力是确保世界和平的手段，而只有强国才具有保障和平的手段，因此，在了解国家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是了解该国在世界所居的地位，而地缘政治学就是在一定的区域与时间里来显示一幅世界列强图。

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的另一著名观点就是他关于世界力量的分析。一战与二战期间，美国许多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北冰洋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在北极世界，美国（阿拉斯加）与苏联、加拿大这些国家共处，因此，美国必须刻不容缓地面对这个地区其他国的挑战。斯皮克曼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北极地区对于那些处于中纬度的国家来说，在很长时间内将是难以开发的地区，世界力量的中心应在中纬度地区，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仍是如此。斯皮克曼主张，世界主要有三个力量中心，即北美洲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区、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远东沿海地区。第四个可能成为中心的便是印度，尽管现在不太重要，但它在将来有发展能力，斯皮克曼分别对世界三个主要力量中心的政治地理特征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作了论述。

就北美洲的沿大西洋海岸地区而言，斯皮克曼认为，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在北美洲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地区是“美洲的地中海”。在这一地区，美国能获得原材料，防卫也有了保障，因为有巴拿马运河，所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上交通也甚为方便，因此只要掌握了这一地区，美国就能真正成为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强国。

斯皮克曼对欧亚大陆的形势也作了分析。此前，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曾提出，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将成为世界力量的中心，并提出“谁统治欧亚大陆心脏，谁就能控制边缘地区，从而便能主宰世界”这一著名论断。斯皮克曼通过对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的气候状况、农业生产情形、矿产与水力的分布，以及在北、东、南、西边疆地理上的障碍进行分析，对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提出质疑。他认为，假如中国和印度达到高度工业化，苏俄在中亚地区的位置的重要性将减少，因此，苏俄的力量仍将存在于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而非中部西伯利亚区域。因此，斯皮克曼提出了与麦金德相反

[美] 普雷斯顿·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Porker G. 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Sydney: 1985.

的学说，即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较所谓的心脏地带更为重要。这些边缘地区居于海洋边缘与心脏地带之间，包括欧洲（苏俄除外）、小亚细亚、伊拉克、阿富汗、印度、西南亚、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西伯利亚地区，这一边缘地区是陆权和海权之间的广大缓冲地区。因此，斯氏得出结论：“欲控制世界的命运，必须控制欧亚大陆，欲控制欧亚大陆，必须控制边缘地区。”

在斯皮克曼看来，在欧亚三个力量中心中（欧洲沿海、欧亚远东沿海和可能成为中心的印度）对美国重要性最大的是欧洲沿海地区，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作为欧洲文明在大西洋彼岸的一个投影而产生的，而且也因为当今的世界政治地理特征决定了欧洲沿海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斯皮克曼对世界地理特征作了分析：由于英、日两国分别位于西欧和东亚海岸以外，系边缘地区以外的政治与军事中心，非洲与澳大利亚则系离开海岸的大陆，前者由欧洲地中海与欧亚大陆的西南海岸联系，后者由亚洲地中海与欧亚大陆东南海岸相通，因此，任何一国只要控制了这些海洋，将大大限制这两个大陆的潜在力量；北美洲也是世界力量中心，虽然由于其地理特征使得它与欧亚其他三个中心相隔离，但美国被欧亚大陆、非洲和澳大利亚大陆所包围，后三者人口10倍于美国，陆地面积也超过美国两倍半，再加上德国和日本联盟，这意味着德日联合想控制欧亚中心。这些世界政治地理特征决定了美国只能与英国联盟，否则美国将处于一种易被挫败的地位，因此，即使美国强大，它仍然不能抵挡住所有其他中心的联合。为了作为一种世界力量生存下去，也为了世界和平，美国别无选择，而只能获得英国的帮助。同时，为了限制德日联盟势力的扩张，为了避免德日在边缘地区建立强国，美、英还必须与苏俄联盟，通过三者联盟，从而建立欧亚大陆力量的均势。

斯皮克曼这些观点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和英国结盟，就是这种思想在外交上的反映。

从德国地缘政治和美国地缘政治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地缘政治的根本特征就是把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上，为各自国家的侵略行为、扩张行为寻找理论根据，这是政治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股逆流，美国学者普雷斯頓·詹姆斯对此曾作过精辟的概括说：“两次大战时期，在德国曾出现了一股地理思想上的逆流，这就是把地理观点应用到政治上，在德国称之为地缘政治学。”

4. 繁荣兴盛时期（1945—）

（1）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之后，特别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摆脱了“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阴影而飞速发展。这与二战之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二战后，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许多国家从殖民体系独立出来，出现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改变了以前宗主国和附属国的政治格局。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出于本国前途和命运的考虑，不愿作为卫星国而卷入别国所创立的体系中，但又苦于本国弱小；于是提出了地区性合作，企图建立更大的组织。

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另一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和日本的崛起，使人们认识到太平洋地区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贸易往来的作用。人们开始热衷于研究亚洲太平洋地区，而不像以前只局限于欧洲，欧洲即世界的格局已成为过去。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西方世界经济危机问题、核问题、生态系统平衡问题、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有限资源竞争性开采问题、航天和宇宙の利用问题、石油危机问题、种族纠纷问题。

(2) 战后政治地理学研究倾向。在上述背景下，曾一度被败坏了声誉的政治地理学又发展并繁荣起来。为了与二战期间盛行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相区别，许多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宁愿把这门学科称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在研究倾向和范围上，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继续把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区域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这方面出现了比较系统的著作，如 R.J. 约翰斯顿的《地理与国家》(R.J. Johnston. Geography and the state. 1982.)，R. 缪尔的《当代政治地理》(R. Muir, 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 1975.) 等。所涉及的问题也不只局限于边界问题，而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诸多政治现象给予关注，如对政治选举的区域特征、资源的分布与重新分配、行政区划、人口的分布与政治决策、首都(行政中心)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提倡对地区政治进行研究，而不只局限于各个国家。这方面的代表及著作有 S.B. 科恩的《分裂世界中的地理和政治》(S.B. Cohen. 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world divided. 1973.)。科恩把世界划分成两种类型区域，即地缘战略区(geo-strategic region)和地缘政治区(geopolitic region)。前者指依靠贸易的海上世界和欧亚大陆。这两种地缘战略区又由若干地缘政治区组成，海上世界包括美洲、加勒比海、欧洲沿海、南非，大陆地区包括中心地带、东欧和东亚。在这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是中东和东南亚。H.J. 德布列杰在他的《系统政治地理学》(H.J. DeBli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1967.) 中，从意识形态-道德出发，把全球划分为五个区：西方、苏联集团、中国、阿拉伯世界及非洲。他尤其强调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作用，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苏联权力中心的转移，太平洋作为政治活动中心的出现。“随着中国在世界权力舞台上的兴起，太平洋承担了历史曾赋予地中海以及后来大西洋的重任：横跨海面相互竞争。”关于地区政治方面另一本名著是 L.J. 康特瑞和 S.L. 斯比格合编的《地区国际政治》(L.J. Cantor and S.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1970.)，他们把世界划分成三个等级森严的体系：统治的(dominant)、从属的(subordinate)和内部的(internal)。统治体系是指那些在海上或地区产生强大影响的体系，其中包括三个强大力量——美、苏、中；从属系统是那些邻近国家相互产生影响的地带，这主要包括拉美、西非、中东、东欧和东南亚；内部系统是指各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完整性。

此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B.M. 鲁斯特的《国际区域和国际体系：政治生态学研究》(B.M. Russett. International reg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 study of political ecology. 1967.)；W.A.D. 杰克逊和 M.S. 塞缪斯合著的《政治学和地理关系》(W.A.D. Jackson, M.S. Samuels. Politics and geographic relationships. 1971.)；G. 帕克所著的《共同体欧洲的政治地理》(G. Parker. A political geography of community europe. 1983.)，阿拉斯代，D. 所著的《中东和北非：政治地理》

(Alasdir D.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 a political geography.1985.) 等。

开始对全球性关注的问题进行研究, 如对国际组织和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关系的研究; 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研究, 对资源, 尤其是海洋资源分布及重新分配的研究; 对世界人口的区域分布特征的研究等等。

总之, 二战以后, 特别是 70 年代以后, 政治地理学无论是在理论发展上, 还是在实践上都得到飞速发展。对政治地理学进行科学的研究已成为历史的潮流。

(二) 政治地理学在我国的发展

政治地理思想或政治地理学除最早渊源于古代的西方, 大约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以外, 在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之, 而且源远流长, 极为丰富, 并有一条明晰可寻的产生与发展的脉络。它是中国政治地理学的思想基础与实践来源。

1. 中国古代政治地理思想: 中国从夏代起, 迄今有 4000 多年历史, 政治经济高度发展, 科学文化灿烂辉煌。春秋战国时代诸多的政治家、思想家、地理家, 对人类社会的政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认识和见解。春秋初期政治家管仲(?—前 645 年) 一书中提出: “地者, 政之本也”。说明地理环境是政治活动的基本因素。公元前 5 世纪前后大军事家孙武所编撰的《孙子兵法》, 是一部研究战争问题的名著。“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孙子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如何研究政治性质的行动之战争胜负, 要通过政治、天时、地理、将领和法制等五个基本要素。这里强调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地理之关系。因此, 《孙子兵法》略有政治(含军事) 地理学之端倪。战国时思想家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年) 认为“诸侯之宝三: 土地、人民、政事”的论断, 强调了诸侯治国必须重视地理环境, 同时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组成的三要素。

战国时代(前 475—前 221 年), 是中国政治地理思想发展, 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的时期。战国初期, 中华辽阔疆域并存有七个诸侯大国, 即秦、魏、韩、赵、楚、齐、燕。群雄争霸、兼并战争为主体的政治、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诸侯国各自的利益, 在围绕如何争霸取胜, 立国治国方面重视地理环境的研究分析, 而提出相同乃至相反的“合纵、连横”, “远交近攻”等著名的政治地理观。

(1) 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政治地理观。合纵、连横是从七国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关系而提出的政治地理思想。“合纵”是指楚、韩、魏、赵、齐、燕等六国南北纵列分布, 以其全部或部分联合抗秦、攻秦, 称之合而为纵。“连横”是指秦、韩、魏、齐等国东西横向分布, 以秦国联合东方各国中某国, 攻其他诸侯国, 称之连而为横。另有一说是: 合众弱而攻一强之意为合纵, 指事一强以攻众弱之意为连横。

谋士苏秦始为秦王提出“连横”政治主张, 说道: “大王的国家, 西面有巴、蜀和汉中的丰富资源, 北面有胡地产的狐貉和代地产的马匹战备品, 南面有巫山峡谷和黔中险要地势, 东有崤山和函谷关这些易守难攻的地形。田地肥美, 百姓富足, 四马拉的战车一万辆, 骁勇善战的将士有百万之众, 肥沃的田野上千里, 积蓄丰饶。这种地势难以进攻, 便于防守。这就是所说的天府之地、天下称雄的国家。以大王的贤明, 人民的众多, 再加上兵车马队的使用, 兵法的教练, 足可以兼并诸侯, 吞食天下, 称帝治国。”(《孟

庆祥.《战国策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68~69)。苏秦从秦国的战略位置价值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优越的分析，指出秦国争霸称雄，立国治国是非常有利的，即具备了客观条件。可惜他的主张——连横地理政治观，未被秦惠王采用。

后来，苏秦转而为赵国合纵之事劝说韩王，指出“韩国北面有巩地、洛地、成皋那样坚固的边城，西面有宜阳、常阪那样险要的关塞，东面有宛地、穰地、洧水，南面有陁山。土地有千里见方，披铠带甲的士兵数十万……靠着韩军的坚强有力和大王的英明贤良，却想到西面去侍奉秦国……被天下人耻笑没有比这更过的了。”（《战国策译注》.602~604）。苏秦的意思很明白，韩国的位置不差，地理环境尚可以，应该与赵国合纵去攻秦。此时另一谋士张仪，为秦连横对韩王说：“韩国处于险恶之地，百姓居住山野，所出产的各种粮食，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人民所食大部分是豆作的饭和豆叶作的菜羹；如果有一年收成不好，人民就连酒糟和糠都吃不饱。土地不到九百里见方，所积蓄的粮食不够两年用的。估计大王的士兵总共不过三十万。”（《战国策译注》.606~607）。张仪从韩国地理环境欠佳，地狭民贫，非秦国之对手，而且全然不顾韩国居于中原地区中心枢纽的战略价值，劝说韩王，先去事奉秦国就可以安定，否则就要危险。使韩王气馁而事秦，愿做秦国一方郡县，自称东方藩臣。

还有，苏秦为赵国合纵之事，游说魏王。他说：“大王的土地，南边有鸿沟、陈、汝南……东有淮水、颍水……西有长城边界……北有河外……土地纵横千里。地方的名声虽然不大，然而都有房屋田舍，只是少有放牧牛马的地方。居民众多，车马不少，日夜川流不休止，和三军那么多士兵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说魏国虽地小人贫，但位置良好，可以立国。因而苏秦对魏王说，六国合纵结亲，专心合力，就一定不会遇到强秦侵扰。（《战国策译注》.540~541）。张仪却偏说魏国的位置极差，根本不能立国。他为秦国连横之事去游说魏王道：“魏国土地纵横不到一千里，士兵不超三十万人。四处土地平旷，四方诸侯都能通过……更没有高山深川的阻挡。……魏国的地势，原来就是适合作战的地方。如果魏国帮助楚国而不帮助齐国，齐国就要攻打你们东面；到东面去帮助齐国而不帮助赵国，赵国就会攻打你们北面；不和韩国联合，那么韩国就会攻打你们西面；不和楚国亲善，那么楚国就会攻打你们南面。这就是所说的四分五裂的道路。”（《战国策译注》.543~544）。怎么办？张仪说魏王，不如去事奉秦国，只要去事奉秦国，那么韩、楚就一定不敢妄动；没有楚、韩的侵扰，大王就可高枕无忧了，国家必定再不会有忧虑了。事实上张仪的话是为秦国服务的，魏未事秦，仍然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独立。

从上所述，连横也好，合纵也好，这些谋士为其统治者出谋献策，对同一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之优劣，竟然可以作出相反的评估，只是因其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之需要。可见地理环境仅是政治行为决策的因素之一，还需考虑政治、经济、军事诸条件，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重视地理环境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影响的关系的观点，是值得研究的。

（2）范雎远交近攻政治地理观。远交近攻，从政治地理角度看，远近乃是所述的距离概念和位置关系。一般是指双方毗连或邻近者为近邻；反之，为远邦。从军事战略角度看，近攻是指对邻近的弱国发动进攻；远交是指对

距离远隔于我又与近攻对象相邻之国，用一切手段（如威胁、利诱）使之不支持被近攻之国，而使近攻易于奏效。远交近攻具有明显地理色彩的政治地理思想。

谋士张仪根据当时七个诸侯国的地理分布（秦国为基点，与其六国之距离关系看：中原的韩、魏是秦之近邻，并在秦东进必经的主要战略方向上，与齐、燕相距甚远，赵、楚与秦之间有山川相隔）与政治军事形势，向秦昭王说：“大王之国，北面有甘泉和谷口，南面横着泾水和渭水，右面有陇山和蜀地，左面有函谷关和崤山，兵车千辆，精兵百万。以秦兵的勇悍，车马的众多，去对抗诸侯……秦国的霸业肯定会成功。如今反要闭关自守竟不敢出兵攻打崤山以东诸侯……大王的计划有失当之处”。范雎继续说：“大王越过韩、魏去攻打强大的齐国，这个计划不当。少量出兵不能损伤齐国；大量出兵反倒害了自己”。应该以武力使韩、魏亲附于秦，进而威服楚、赵以及齐、燕，然后再灭韩、魏，就是要“结交远方诸侯攻打邻近国家，这样得到一寸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寸土地，得到一尺土地就成为大王的一尺土地。如今舍近攻远，不是错了吗？”（战国策译注.149~150），后来，秦国采纳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它为进攻地处诸侯国中间属天下枢纽的韩、魏两国，把齐、赵、燕三国列入远交对象。首先运用远交手段拉住他们，不使积极参与诸侯的合纵抗秦的活动；然后在韩、魏、楚、赵之间采取打拉结合策略，时而和楚以攻韩、魏，时而和韩、魏以攻楚，时而助韩以攻魏、赵，分化瓦解，逐个削弱，最后被各个歼灭，统一中国。这种从政治地理环境的利弊，及其从国家政治军事斗争的关系出发所提出的“远交近攻”地理政治观，在古代战争史上及政治活动中广为运用，显示出其重要价值。

（3）诸葛亮三分天下政治地理观。东汉末年，从公元190年起，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长达90年的鼎立时期。当曹操统一北方，孙策和孙权开拓江东之际，刘备意在恢复汉王朝，“三顾茅庐”，向琅琊阳都人诸葛亮登门求教。这位历史上有名的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的战略家诸葛亮，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他向刘备阐述了东汉末年天下形势和立国大计，即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魏书.912~913）。寥寥数十句，不到400字，精深透辟，高瞻远瞩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地理各方面的情况，纲领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统一全国的政治地理主张。一是先夺荆州。因荆州“北据汉河，利尽南海，东达吴会，西通巴蜀”，跨长江中游，为南北交通的冲要之地。拟作将来出兵宛洛，建国立业的前进基地。二是西取益州。该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较多，据此建立可靠的根据地。既可避免曹孙两面夹击的威胁，又能掌握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主动权。同时，在此对内革新政治、养精蓄锐，经略天府之国，巩固政权。三是与西南的夷越少数民族保持友好，采取安抚政策，解除后顾之忧，达到巩固战略后方之目的。四是东联孙吴。孙权割据江东已历三代，况且地势险要，百姓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命，不可去图谋他，而要与之联盟。五是北拒曹操。因为当时汉王朝的政权已落入曹操掌握之中，他兵多将勇，国力强，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他统一全国。刘备在政治上树起鲜明旗帜，以争取人心，振兴汉室作号召。根据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先后与孙权结盟，联合抗击曹操于赤壁，借得荆州，接着开拓益州，并占据汉中要地，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长达数十年的三国时期，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的争

斗。按当时实力看，曹魏势力最强，拥有东汉 13 个州中的 9 个州，兵力常保持在 30 万左右，最多时近 50 万人。孙吴占 3 州，次弱，兵力约 20 万人。蜀汉仅有益州一席之地，实为最弱，兵力约 10 万人。一般而言，在三角斗争中的策略运用，只有两弱联盟共抗一强，方能形成均势局面；如果两弱各自为计，结果往往是两弱俱伤。诸葛亮在《隆中对》预知天下三分的阐述中，就着重分析区域政治地理因素对国家之间政治行为与军事斗争的影响作用。并指出在三角关系中如何确保自己，分清敌友的决策。始终把魏作为主要对手而势不两立；吴、蜀两国唇齿相依，把东吴视为友邦，因而结盟和好，共抗曹操。但后来，刘备、孙权为了争夺荆州的局部利益，破坏了蜀吴联盟，转而互为仇敌。此时，曹操在三角斗争中，纵横捭阖，略高一筹，观吴蜀相争，待之削弱，坐收渔利，最后由继起的司马家族各个歼灭吴、蜀，建立了统一的晋朝。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依据东汉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地理环境，所提出的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及三国鼎立时的三角斗争中策略运用原则的政治地理观，是颇有见地的，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此外，中国古代可以称为政治地理学的论著，在公元前 5 世纪左右就已出现。如中国公元前 5 世纪前后成书的《禹贡》，虽不到 1200 字，却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它系统地综合记述了各区（九州）的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知识和行政区域、出产及运输路线等人文地理知识。比古代希腊学者的《地理学》一书早约 1—2 个世纪（鞠继武·中国地理学发展史.47）。东汉班固（公元 32—92 年）所撰的《汉书·地理志》可以称得是世界上第一部区域政治地理学著作（张文奎·政治地理学.25）。内容丰富，涉及到自然与人文地理（水利设施、工矿企业、户口人数、建置沿革、政区变化、名胜古迹等）方面的资料。唐代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家李吉甫（公元 758—814 年）在实践中认识到地理在政治上大有作用，他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备载全国疆域政区、建置沿革、山川物产、人口变迁的全国地理志，为唐朝封建政治统治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周介铭·中国政治地理.25）。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地理学家顾炎武（公元 1613—1682 年）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共 120 卷，内容包括山川气候、政区形势、建制沿革、地方利弊、经济发展、关隘边防，以及外国地理。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1873—1929 年）指出，《天下郡国利病书》“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17）。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1624—1680 年）撰写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记述了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着重论述了各地区的地理形势、山川关隘、攻守之宜及历史上之成败得失。梁启超对此书誉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19）。

2. 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思想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政治家与地理家，在坚持古代优秀的政治地理思想基础上，逐渐接受西方科学地理思想，在中国近代反抗外国入侵的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政治地理思想有重大的发展。

（1）林则徐的海防边防地理政治观。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政治家林则徐（1785—1850 年）历任巡抚、总督等清廷军政要职，在两广禁烟与西北戍边等斗争中提出南抗英帝的海防思想与北御沙俄的边防思想。林则徐在禁烟抗英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依据我国东南沿海地理环境特点，当时中英双方政治军事形势，提出了“以守为战”，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他针对抗击英军登陆作战的要求，在广东沿海，重点防守海口、内河和海岸要隘，设置工事，

增强远攻火力，部署水师加强近战兵力，并使用夜袭火攻以战助守等抵御英军海上入侵措施。与此同时，林则徐还主张沿海各省，“各守要隘，认真防范”，“严查海口，协力筹防”。当1840年6月英国侵略军的舰队开抵广东海面发动进攻时，林则徐备战认真，防守严密，避敌之长不与海上交锋，采取游击于近海，决战于海岸和沿海地区的作战方式，赢得了广东抗英战争的初步胜利。后因清政府妥协投降，屈服于英国的侵略，而告失败。

林则徐还从抗英斗争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只有以“船炮水师”与敌海上交战，方能改变被动挨打局面，并概括提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八字要言，把攻进“船炮水师”、“出洋剿办”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他认为拥有一支具有近代化的先进装备，又有独立指挥系统的水军，便可以与入侵的英海军相抗衡。林则徐面对英军从海上入侵并窜入长江内河，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仍提出设想：倘东南半壁江山被敌久据，“则恢复之策，扼要首在荆、襄，须连接秦、蜀以为之”，即以鄂、湘、陕、川等省区作为抗敌根据地，进行持久作战，把敌赶出国门，保卫祖国的海疆。

林则徐在被谪戍伊犁时，不仅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上入侵中国的危险，而且也看到英、俄等国在中亚和南亚的争夺及其对我新疆、西藏等边陲的威胁。他致力于研究外国情况和我国边防史地沿革，以及新疆戍边实地体察，深感中国的东疆（东北）与西陲（西北）处处和沙皇俄国陆地相连。对沙俄侵略中国的隐患，给予极大关注。因而，林则徐谆谆忠告中国人民，对沙俄的威胁决不可掉以轻心。他认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并指出“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陆地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为此，林则徐非常重视边防建设，从北疆到南疆，亲自考察边防，规划屯垦，兴修水利；提出在兄弟民族聚居的新疆广大地区，尤其在边境地区要扩大“民屯”、“回屯”，并“改屯兵为操防”，以增强西陲戍边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实力的正确边防战略，目的是防备英、俄入侵，保卫祖国陆疆的安全。

林则徐熟识中外情况，并能依据中国地理环境特点和当时的军事政治情势，始则提出以守为战，积极防御和改进船炮水师，出洋剿办的南抗英国的海防观；继而提出屯兵、戍边、操防的北御沙俄的边防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地理政治思想，是值得中国人民敬仰和继承发扬光大的。

（2）孙中山的陆海空权并重的地理政治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不但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中国许多有益的东西，在国防建设上也曾制定过自卫的不是侵略的、守势的不是攻势的军事方针。孙中山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孙中山选集.163），中国之“富源”首屈一指，并有众多人口。中国位于亚洲东南，背靠世界上最大的亚欧大陆，面临广阔的太平洋（陆地与海洋的面积大致为五与二之比），因而其地理战略形势分析是，中国是大陆国家，也是海洋国家，当世界陆海汇合之要冲。孙中山为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设想提出：“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国防建设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中华大典编印会合作，1970年10版，第140页），以及“航空救国”（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347）的政治地理思想。

孙中山确立的陆海空三权并重的战略。第一，陆权思想。基于中国以大

陆立国的时代较久长，历代外患大多来自陆疆的北方，以及决胜疆场乃是陆地为主。为此，孙中山在《中国存亡问题》书中指出，中国国防的方针在“陆防”，提出了以保卫国土，击退敌人之侵略为原则，必须把建军的重点放在陆军，设想建设常备军 500 万。第二，海权思想。回顾历史，在中国兴盛时期，汉、唐、元、明各代，都曾在海上建有不朽之业绩。直至明代中叶，实施“海禁”与“锁国”政策，以及清代图以“闭关自守”。这种重陆轻海思想，视海洋为畏途，自毁海防长城，导致海权丧失。当西方海权势力，即英、法等国东来太平洋之际，以往视为自然天堑之海洋，却变为外敌入侵的通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东、西方列强侵略宰割之目标，其中自太平洋海上入侵者居多。孙中山在《太平洋问题序》中说：“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昔日之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即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针太平洋之海权，即针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张其昀·建国方略研究·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1962，转引自《国父的国防学术思想研究集》第 344 页）。为此，孙中山极为重视海疆防卫，认为中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海域辽阔，为了巩固海防必须“兴船政以扩海军”，建立强大海军，建造潜艇（当时世界尚无航空母舰）等海军舰艇设备，于沿岸设防，海口建要塞，不让敌人登陆入侵。第三，空权思想。孙中山对空权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实为第一人。辛亥革命后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就提倡空军，设立航空队，购置飞机，积极培养空军人才，提倡“航空救国”，组建空军机构。甚至在与敌军作战中，使用空军到前线助战，认识到现代战争乃是立体战争。

孙中山在他所著的《建国方略》（1917—1919 年）专著中，为贯彻陆海空权并重战略，提出了一系列计划设想。如他主张在中国沿海开辟三大世界海港：即渤海湾的大沽口与秦皇岛之间的北方大港，杭州湾北岸的东方大港和广州的南方大港。并以三大海港为门户起点，修筑通向内地纵深的三大铁路干线，采取辐射式直达大陆边疆，以 16 万千米的遍布全国的铁路网，使之海陆呼应连成一气，便于互相支援。与此同时，指出发展工矿业和农业等等经济建设项目，以增强国力。还设想逐步移民于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边疆地区。另外，在《十年国防计划》纲目中，提出了建设强大空军之各种计划项目。孙中山的陆海空权并重政治地理思想，以及一系列设想计划，在当时是很振奋人心的，但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现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实现孙中山的设想，而且在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加强国防建设，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以及国家的安宁。

（3）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引进。在中国近代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一些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地理学家是我国近代政治地理学形成与发展的开拓者。他们一方面把西方政治地理学主要是地缘政治学说向国内作了介绍。如邓启东译介了美国亨丁敦的《地理环境与政治问题》，高泳源介绍了麦金德的政治地理学说。另一方面诸多地理学家撰写了一批政治地理（包括边疆地理、军事地理）方面的论著。如张印堂从地理学角度对我国的国家问题作了探讨，竺可桢写了《天时于战争之影响》，翁文灏的《中俄边界史地考》，

沙学浚著有《从政治地理看胡人南下牧马》，胡焕庸的《国防地理》，黄国璋的《西藏边防问题及其解决途径》，贾逸君的《中国国耻地理》，王维屏的《中国政治地理》，林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地理基础及其展望》等。盛叙功曾致力于国家政治地图及演变的研究，张其昀在其著作中对政治地理研究作过一定的归纳和理论论述。还有的学者在国家行政区划的设置，首都区位的选择等方面作过一些研究。

从上粗略的介绍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政治地理思想是我国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地理学家，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中，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事业对地理环境与国家政治活动关系的认识。他们的论著对中国政治地理的研究，起到了先导和促进作用，但还没有形成政治地理学的完整研究体系，不论在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或者是研究对象与领域方面，都是零星的，初步的，并在某些著作中受到西方近代政治地理学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痕迹。

3. 中国政治地理思想发展的新时期：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地理舞台上，施展的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为目标的伟大行动。中国共产党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战略家，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以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践活动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地理、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分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地理思想。（1）毛泽东的政治地理思想。伟大革命家和军事战略家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生涯中，非常重视与熟谙中外地理知识，善于把地理、地理环境作为制定政治战略或重要战略的客观物质基础之一，始终重视地理在安邦治国中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的基本依据”。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告诫军事指挥员，必须“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才能有把握地打胜仗。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政治地理思想：毛泽东潜心研究中国国情，分析地理环境特点。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与“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军事文选.83~86）。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情，是从中日战争的角度，并在同日本作对比中具体分析为：“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而且强调“中国又是一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185~187）。毛泽东在对上述基本国情作出分析，始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继而概括为“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毛泽东军事文选.54）。随着对国情的深化研究，又进一步阐明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把农村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先进而巩固的根据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战略。农村与城市，其本身就是地理学（聚落地理学）中两个地域单元，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具有明显的地理色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政治地理战略。

毛泽东在研究了中国国情后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中国反动阶级政治、军事力量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现象，以及城乡经济上的地域差异状况，从而找出了革命力量在敌人统治薄弱地区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毛泽东是一位从战略上运用地理学中地域分异规律分析政治军事形势的高手。

毛泽东指出中国在大小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由于它们为各自的战略利益，支持各地军阀，瓜分势力范围，各霸一方处于分裂状态，你争我夺，无暇也无力对付革命力量。因而反动统治在中国广大地区极为脆弱，给革命力量在敌人白色政权的包围夹缝之中以可乘之隙，为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工农武装割据应指向哪里？毛泽东指出，是经过 1924—1927 年大革命影响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地区。

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长期占据中国的中心城市，敌人在大中城市统治较强，并以城市为基地，向革命进攻。共产党和红军在大中城市活动比较困难。然而，在中国广大分散的小县城和广阔的农村地区，尤其是那些两省或几个省交界的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之处，以及某些还带有啸聚山村的绿林武装的偏僻地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力量是鞭长莫及的。加之，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仅控制为数较少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的大中城市。没有更多的兵力部署在广大分散的农村。因而广大的农村和远离中心城市的边远地区，是敌人统治最为薄弱的地区。这为革命力量在敌人统治薄弱、兵力空虚的农村地域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外，从中国经济发展明显存在城乡地域差异来看，一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城市虽是带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因为城市太小，农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毛泽东军事文选.149）。农村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仍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存下去。在中国有人民群众居住的广大农村，已经具备了吃饭的条件。因而，共产党和红军暂时离开城市到农村去，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特定的经济地理基础。二是中国农村广大贫苦农民，为了在经济上得到翻身、政治上获得解放，迫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为此，共产党人应该而且必须把战略重点和主要力量转向农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解决贫雇农民的土地问题，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支持革命和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以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农村作为主要阵地，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还有，中国幅员广袤，地理上战场广大，有回旋余地，地形又复杂多样，有利于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与敌人长期周旋。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政治地理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是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的划分三个世界政治地理思想：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展开的。这种进行政治活动的地理区域，称为政治地理区域，简称政治区域。世界上的政治活动、政治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地域差异。如有以行使主权政治行为的国家所构成的国家政治区域。世界上有多少主权国家，就有多少国家政治区域。世界政区地图就是国家政治区域在地图上的反映。另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组建的国际组织，进行一定政治活动所构成的国际政治区域。如东南亚联盟、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共同体等活动

的区域就是。世界上的政治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更，政治区域的形式和内容也不断发生变化；特别是国际政治区域处于经常变化的状态，并且代表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使得国际政治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特性。世界政治区域，实质上代表世界上不同政治力量的空间范围。世界政治区域的变化，既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又是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在空间上的体现。因此，世界政治区域的变化，也就反映了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

毛泽东历来重视国际形势的研究，在确定国家战略时提出要分析“地理上的国际环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2页）。早在二战结束不久，毛泽东对战后国际形势与世界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及其政治地理格局，进行科学分析和战略预测。他提出：“美苏冲突，中国是中间地带，斗争很激烈，把我们放在中间地带的位置上”。毛泽东以非凡的洞察力指明，“战后，同美国作斗争最尖锐的恐怕还是中国”（胡乔木回忆毛泽东.92~90）。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较量，在本世纪50年代形成了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地理格局。60年代以来，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科学地分析了上述情况，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现在世界上存在相互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世界，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政治地理单元。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外交文选.600~601）。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是从全球角度将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归纳为三种类型国家的政治地理思想。从政治地理看，指出了全球三个不同政治区域的新的政治地理格局。从政治战略看，为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制定国际政治斗争的外交方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科学依据。

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军队与核武库，在世界各地，包括对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军事控制，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第二世界的欧洲诸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属于发达的国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军队。他们与第一世界虽然结盟，但矛盾日趋增大。他们在资源上依赖于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又剥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因此，第二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第三世界主要位于北纬30度以南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共有140多个国家，占世界国家的3/4还多，人口32亿多，也占世界人口的70%多。那里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他们在联合国中拥有绝大多数的席位。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国际反霸斗争的主力军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坚持同第三世界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并同第二世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坚决同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作斗争，以维护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战略划分的政治地理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当时其对国际战略形势研究，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邓小平“东西南北”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地理思想：

邓小平从80年代中期起，对世界形势进行深透的分析，指出地球上仍然

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以及超级大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并从全球战略高度对当今时代的主题作出了崭新的判断。1984年5月17日，邓小平会见厄瓜多尔总统时说：“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个是南北问题。”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时谈到：“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1987年，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说，中国话说“天下”无非是指四个方面，就是东西南北，一个是东西方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问题就是发展问题。

邓小平从1984年到1988年先后6次，对纷繁复杂风云多变的现实世界进行深刻分析，提出了带有全球性和平与发展两大战略问题，正是言简意赅，而且用东西南北四个地理方位概括，使人一目了然。东西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即苏联在东半球，美国在西半球，它们两个超级大国为主宰世界，争夺导致冲突，东西问题不解决，危及世界和平。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北方发达国家，经济上剥削掠夺南方发展中国家，造成发达国家越来越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贫困，南北问题不解决，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维护和平与发展经济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没有和平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经济力量增强，又有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

(3) 中国政治地理工作者，为开展现代政治地理研究所做的工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理学界的政治地理工作者，为开展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

从建国初期至70年代末：我国地理学界，在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在自然地理学方面，如地貌学、气候学、水文地理学、冰川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和动物地理学等各学科，撰写了众多的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论文，使得自然地理学在发展理论与为生产建设实践服务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人文地理学方面，经济地理学这一重点学科，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丛书论著；军事地理学在军队中也有所发展。但政治地理学则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仅在若干部分如行政区划研究和大学地理学系开设世界政治经济地理中涉及政治地图的内容，或者为配合时事政治教育介绍零星的政治地理问题。因而，长时间我国政治地理学处于发展缓慢的状态。

8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政治地理学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开展政治地理学研究成为地理学界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我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教授撰写了一篇重要的《政治地理学》论文，提出了政治地理学是“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的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的一门学科”。（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208）。

我国另一著名人文地理学家鲍觉民教授撰写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人文地理学论丛》，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和《再论政治地理学和几个理论问题》（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两文。提出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与地理

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政治行为和决策的影响；二是人类政治行为和决策对于地理格局的反作用”。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会长、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教授，多次在学术研讨会上号召地理工作者，要下大力研究政治地理学。

80年代后期起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发展：张文奎教授于1991年正式编著出版了《政治地理学》专著，可说是国内近些年来第一本《政治地理学》著作。该书对中外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做了阐述，对西方地缘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各学说做了介绍，同时对政治地理的基本内容及世界政治地图形成和演变作了深入论述。它为我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王正毅教授，于1993年撰写出版了《现代政治地理学》一书。论述了政治区域，国家静态分析——空间形态和结构，国家动态分析——空间传统，以及国际组织和世界政治地图等内容。

周介铭、邱道持、蔡书良等，结合中国实际政治特点的研究，于1989年8月编著出版《中国政治地理》：介绍了中国政治地理的历史发展、领土和边界、行政区划、行政中心、国情与社会发展、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与国际关系理论、当代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等。

吴松弟著《无所不在的伟大——地理环境与中国政治》（1989年）。阐述了地理环境和中国民族、民族战争；地理环境和统一、分裂；中央、地方，地理环境和都城、都会等三大问题。

王国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世界政治地理》（1993年）。论述了世界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与演变，以及重大国际问题的政治地理背景：包括国家兴亡、格局演变、种族冲突、边界争端、热点地区、国际关系等内容。

沈伟烈教授等编著了《世界军事地理》（也称世界政治军事地理）。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四章。上篇，世界军事地理总论，侧重阐述世界军事地理研究对象与任务，一般理论原则与方法，以及从全局角度分析地理环境与全球战略和现代战争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下篇，世界各大洲、大洋和重要国家军事政治地理概况。主要从战略角度，介绍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自然、社会人文和经济的地理环境特点，军事力量的空间分布等情况。并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它们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地位，同时探讨了若干“热点”地区的地理背景及其对现代战争的影响等问题。

王恩涌教授与李贵才于90年代初发表了《从地缘政治看中国的战略态势》与《从欧洲共同体看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政治地理方面论文。

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编，由中国社会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行政区划论文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

中国高校开设政治地理学课程：政治地理学已作为高等院校地理学系与国际政治学系的学习课程。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东北师范大学地理学系等亦将政治地理作为研究生和政治学专业学生的一门课程开设。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系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招收并培养了政治地理学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学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也开设了《国际关系中的地理问题》。

近年来，为有选择地借鉴与学习国外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翻译出版了有关论著。如何希泉译苏联《政治和军事地理学》（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潘俊峰等翻译了日本《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战士出版社，1983

年），林尔蔚、陈江译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宋保平、吕寿康等译的M.I. 格拉斯纳与H.J. 德伯里杰的《系统政治地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李亦鸣、朱兰等翻译的P. 奥沙利文的《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和杰弗里·帕克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以及刘晓明等译的Z. 布热津斯基的《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等书籍。

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与我国地理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还不能满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的需要。

三、研究政治地理学的意义与方法

（一）学习政治地理学的意义

把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各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任何国家，在制定内外政策时，虽不以地理因素作主要依据，但各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地理因素的影响：如国内民族的区域分布，资源的不平衡及重新配置，中心区和边远地区政策的不同，对外贸易与投资、外交政策、双边关系等政策。如我们在制定环太平洋政策时，如不了解美国、俄罗斯、日本、拉美等各国在该地区的政策，不了解日本、俄罗斯领土之争，不了解这一些区域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我们就很难有效地在环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

第二，对于维护世界和平，防御侵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些国家以地缘政治理论为借口和根据，在海上或空中争夺霸权和制定自己的战略。世界各国人民须对此应更加关注与防范。

第三，有助于各国、各地区之间人民的相互交流和理解。从世界政治这一角度来说，任何政治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产生的，不熟悉地理区域特征，就很难理解区域内的政治现象，从地理区域这一角度来看，特定的地区和国家有其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中东地区是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我们就很难了解西方各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竞争。同样，如不了解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和战略位置，当然就很难理解英国、阿根廷等国为何对南极洲提出领土要求。学习政治地理学，有助于增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理解，减少政治摩擦。

（二）研究政治地理学的方法

学习和研究政治地理学，除了理解其意义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在西方，政治地理学从初创时期起，就曾出现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方法、形态的方法、功能方法、系统方法，为了提高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方法本身进行分析。

1. 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政治区域或社会区域的进化，注重政治区域进化的过程。如拉采尔、惠特莱西、琼斯都曾用这种方法分析国家的增长。在拉采尔的有机组织理论中，把国家增长的过程看成是其版图扩张的过程，是和邻国斗争的过程。在惠特莱西的“中心区概念”中，把中心区看成是国家的发源地，他认为，任何国家都是从历史上的中心区进

化而成的。中心区在历史上一般有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如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文化和经济也比周围地区发达。这种地理优势使得其统治者能够不断地向周围地区扩展，而每一个国家就是在中心区扩展的基础上形成的。琼斯的“统一领域理论”认为，政治区域的形成经过如下的过程：思想—决策—运动—区域—政治区域，他曾以利比里亚和孟加拉国为例说明国家产生过程：

过程	利比里亚	孟加拉国
思想	废除奴隶制	以西巴基斯坦为中心的政权
决策	人道社会为受种族歧视的奴隶寻找一个家园	拉赫曼提出的平等和自治的六点方案
运动	获释奴隶移入西非	巴基斯坦军事行动，难民移入印度，印度军队干预
区域	取得定居版图	东巴基斯坦
政治区域	利比里亚国家	独立的孟加拉国

这种对政治区域进行历史考察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过分突出历史中的地理因素，就容易走向极端，因为历史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区域的形成不仅与版图大小有关，还有许多政治、经济因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过分强调地理因素就会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

2. 形态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政治景观学派运用的，哈特向曾对这种方法作过概括，认为这种方法是“把国家区域作为一个地理客体，对其内外形态进行描述性和解释性的分析。”外在形态是指国家的大小、形状、区位和边界；国家的内在形态是指中心区、首都、文化区、人种区。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主张从静态的观点对国家进行研究，其优点是研究比较具体、真实全面，但这种方法的一个最大缺点是缺乏联系性和动态性。后来，哈特向提出功能方法来代替这种方法。

3. 功能方法：在哈特向看来，国家区域是这样一个组织，即它有起源、结构和功能。然而，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其功能方面都是最重要的，在国家的起源和其结构以及功能之间没有太紧密的联系。国家只有在版图变化之后才根据其职能而自动产生结构，因此，对国家区域起源的考虑丝毫无助于对其功能和结构的理解。另外，每个国家结构本身是各不相同的，对结构作一般性的概括是无意义的。只有对国家的功能进行研究，才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家的功能包括两种，内在功能包括国家观念、目的的建立，加强向心力，克服离心力，使国家成为一个有效的单位；外在功能包括国家和国家内其他区域以及和外在外在区域的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分为版图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战略的关系。

这种功能方法从国家与其内部和外部区域的关系来研究，把国家放在一个联系网中，并注意到国家内外功能的多样性，不仅有版图上的，而且还有政治、经济上的等，克服了形态方法的片面性。这是值得借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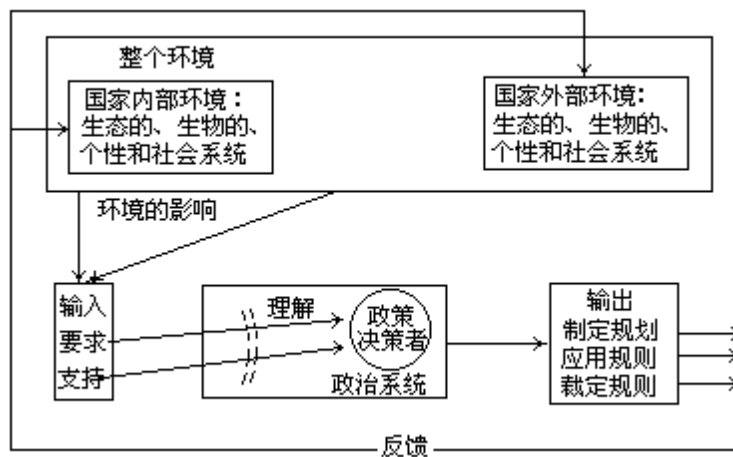
4. 系统方法：这种方法较为著名的代表是美国的政治地理学者科恩、罗

Muir R. 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81.

Glassner M I, DeBlij H 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森塞尔 (Rosenthal)、英国的缪尔等。

缪尔认为，无论是历史方法、形态方法，还是功能方法都只强调政治区域的不同方面，如研究法国发展时，可以用历史的方法；对波兰中心区进行研究时，形态方法是最合适的；而研究孟加拉国分离原因时，功能方法是合适的。这些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对政治地理学这个学科的整体适合的方法。而对政治地理学整体较为适合的方法是系统方法，一个系统包括部分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开放系统中，系统偶尔和外在系统的环境发生作用，而在封闭系统中又包括诸多子系统。任何系统都有自变量和因变量：自变量包括结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过程（相互作用的形式，包括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背景（经济、社会、文化或地理）；因变量包括力量、权力的管理，权力在系统的分配，稳定性、变化、系统转化。



系统模式如图 1-1：

政治地理学就是对政治系统运行的过程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

这种把系统论的方法应用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是政治地理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进步，也标志着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体系上日臻成熟。

第二章 国家与民族

在政治地理学中，作为研究的政治单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等级，即国际级、国家级、国内级。但是，由于国家是一个具有主权与政府的独立政治单位，而其他两个级别，国家级以上的国际级和国家级以下的国内级，则不具备这种功能与机构，所以，国家仍然在政治地理学中成为重要研究对象。

关于国家，我们将在以下五章，分别从国家与民族，国家的空间特征，国家体制、行政区划、政党和选举地理，国家力量（综合国力），以及国家的政治地理理论方面进行阐释。本章对国家与民族的基本特征、时间上的发展、空间上的分布予以介绍。

一、国家的内涵和职能

（一）国家的定义

“国家”这个词在中文中是由“国”和“家”两字所组成。按目前的字义来看，“国”是政治组织的单位，而“家”则是血缘关系而组成的社会单位。家虽然不是政治的最基本的组织单位，但是，自古以来，它却是组成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单位“细胞”。例如，我国古代有“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之说。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古代称天子的领域叫“天下”，诸侯的领地称“国”，大夫、士的领地曰“家”。当然，这里的“家”，不是指家庭，而是个庞大的家族。因此，“国家”这个词从古时字义来看，可以说是表示不同地域范围的政治空间组织。

在英文中，国家是“state”和“nation”。这两字虽然都可译为国家，一般情况下也可以互用，但其内在含义却有不同。前者是代表由一定地域所组成的政治单位，它由一个控制着其内、外事务的政府所管辖。虽然这个字包含着一定的领土和定居的居民，但更重要的是主权，其内、外事务不受其他国家控制。不过，在政治地理学中，state 也作为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地理单元，如在美国则称之为“州”，在印度则称之为“邦”，而整个美国是由州所组成的，所以称 United States（合众国）。一般情况下，如指国家以下的政治单元，这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为小写，即 state，如指国家，则为大写，即 State。

“nation”是指占有有一定空间的居民，他们具有一种建立在共同信仰与态度基础上强烈的统一意识。因此，可以说 State 是强调其政治主权，而 nation 则偏重于有共同意识的人，The United Nations 译为联合国，其组成的国则用 nation，而不是 state。

根据以上所述，从地理学出发，国家可以定义为：一个具有保持内部稳定、不受外来控制和侵入（干涉）能力的独立主权政府领导下，占有一定领土的，有组织的实际政治地区。该地区具有清晰的边界并得到国际公认。也可以简述为：凡人民占有固定领土，结合在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政府组织之下的地域政治实体即为国家。

（二）组成国家的要素

关于组成国家的要素有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三要素说指的是人口（居民）、领土（土地）、政府（组织）。四要素说，除上述三要素以外，还加上主权（权力）。

国家是社会政治概念，其首先的要素是人，没有人，也就没有了一切社

会的、政治的现象，也就没有了国家。但是，作为国家组成要素的人口是以一定数量、定居某地区的居民。这就是说，人口应具有一定的数量。至于这一定数量并没有上下限额。拿目前的已知情况来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仅以大陆而言，就有 12 亿多，占世界人口约 1/4。每年增加的人口在千万以上。世界人口最少的国家，可能就是梵蒂冈城国。当然，这种情况有些特殊，它是个宗教领地。其人口约千人。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如瑙鲁、图瓦卢人口亦只有万人。可见，人口多的国家与人口少的国家，人口规模相距极大。定居某地区的居民，是指定居下来的，而不是流动性的人口，并且与其定居的一定地区面积相联系。

领土是国家组成的第二个要素，它是国家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没有领土，居民就没有居住与进行一切活动的空间。领土就是指为其所居住的居民政治上的组织所控制的地域。如果，居民所居住的土地不能被其政治上的组织所控制，或没有政治组织予以控制，则就不是其居民的领土，而是居住在他国的领土上。各国的领土不仅面积上差异大，而且还具有其他许多特性，这在下一章国家的空间特征中予以介绍。

政府是政权组织，是国家在组织上的体现。它执行国家的职能，对内进行管辖，对外实行外交活动。因此，政府是一定数量的人口与一定面积领土相结合而组织起来的产物。有了政府才能把一定数量的人口组织起来，把其领土管辖起来，对内实行管理，对外进行交往。否则，在一地的居民就是一盘散沙，或缺乏统一组织，难以实现国家的职能。

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是独立国家的根本属性。因此，主权虽然是国家组成的四个要素之一，但它却是国家属性的核心，具有重要地位。这也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最关键标志。尽管上述的前三个要素都已具备，没有主权，则不能作为独立的国家。

虽然上述四个要素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还需要一种潜在的、无形的东西，即思想意识，或文化传统上的共性，以及在固定领土上长期定居所形成的一种共同感情和心理状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强大内聚力。有了它，这个国家才能稳定、团结、强大。特别是在遭到外部敌人入侵或其他各种困难时，就能转化成为无坚不摧的物质力量。这种思想、感情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该环境中的居民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目中，既是国家形成的无形基础，也是国家发展的精神力量。研究政治地理的学者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国家的本质

上面谈到国家组成的四个要素，看起来，具备这些要素，就可以成为国家。但是，其缺陷在于没有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看国家这种社会政治现象，没有以阶级观点来分析国家的本质。因此，马列主义者从社会的发展、阶级的分析来揭示国家的本质。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 1891 年单行本导言中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列宁在《论国家》中，也同样指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从这种论点出发，它表明国家的特点是：

第一，国家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组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第二，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国家既然是社会发展出现了阶级，是在阶级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斗争中产生的，它就必然是代表在斗争中取

胜的统治阶级的组织。

第三，国家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机器。机器是一种工具，是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把国家形容为机器，也就是说国家为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目的的工具。

这表明马列主义对国家的说明是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观以及国家的阶级属性。正是国家是统治阶级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作为工具的国家，其权力必然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国家的权力具有特殊的强制性。其特殊的强制性表现在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上，它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国家机器。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种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强迫其服从。

其次，国家权力具有主权性。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即其主权性的体现。它表现为国家具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这种最高权力，实质上，即是该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最大利益。所以归根到底，国家的权力不是属于全民的，而是属于统治阶级的。

第三，国家的权力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国家权力实际上都是通过国家的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要求全体居民遵守。因此，国家权力具有法律上的普遍约束力。这点是国家内部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政党、团体所无法达到的。

以上的分析都是根据国家阶级属性的本质出发而得出的。关于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的特点，将在下一节关于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中予以论述。

（四）国家的职能

国家职能是指与国家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国家活动的总方向 and 最主要方面。国家的职能一般可以分为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个方面。前者就是国家通过运用其手中各种强制力量去约束、控制被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破坏以维护本身的统治；后者是指管理国家的公共事务，使社会的经济生活能够正常地进行下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具体来说，国家的职能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国家作为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建立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第二，国家是社会秩序的调节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各自利益的差异、矛盾和冲突。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社会的正常发展，国家就需要通过法律的、行政的，甚至军事的等手段来调整、控制和缓和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第三，国家亦是社会经济的领导者。国家将根据其性质与条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经济计划、经济政策、大型工程、地区开发、涉外经济事务等方面，世界各国无不采取各种形式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施加其影响。其目的都在于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其统治。第四，作为科技、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兴办者。由于上述的各项公共事业属基础性、长期性的事业，往往是投资大、效益低，而且多属福利性质，国家从宏观角度出发，必须承担其责任，通过组织、领导、投资、管理等方式来兴办这类公共事业。第五，国家是主权的维护者。国家为保护本国利益，防止外来力量对自身的干涉、入侵和各种破坏，以及保持各种对外活动的正常进行，国家需参与国际事务，进行各种外交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职能亦是国家本质的表现，各种本质不同的国家，其职能和实现职能的方法，也有原则的区别。例如，过去许多资本主义大国，无不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外抢夺殖民地，掠夺资源。由于彼此的利益不均，

结果导致世界大战。战后，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等等，无不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执政的本质的反映。这是当前研究政治地理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

纵观人类的历史，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阶级以后，随着阶级的矛盾与斗争而产生的。在国家出现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国家的类型与形式亦发生变化。另外，国家在人类的历史的早期在少数地区出现，而后在空间上逐渐扩大，而遍及全世界。了解其时、空上的变化，对我们认识和了解当前的政治地理形势十分重要。

（一）国家的起源

人类优越于其他动物除体质方面的特征，如直立行走，脑容量大等以外，还有社会文化方面的特征，在最早时期，这方面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群体的有意识活动。有了群体，可以相互配合，完成个体所无法实现的任务。例如，人类在早期过着采集和狩猎生活，特别是在捕获较大型的动物时，如果是一个小群体内部，彼此相互配合，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捕获或杀伤猎物。正是由于群体的优越性，才使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内部出现分工，加上管理的复杂化，从而最终导致国家的出现。

在国家出现以前的社会组织的发展情况，资料一般都很缺乏，即使有些，也不够完整。文化人类学通过对现有的，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人群的考察和研究，认为人类的社会组织是由游群组织开始，经过部落组织、酋邦而发展成为国家。

1. 游群组织：游群组织亦称队群组织。它是由一些数量规模相当小的群体所组成。它出现在农业起源以前的狩猎采集时代。那时，人类的狩猎对象是动物，由于食物和季节的变化，动物群是不断迁徙的。为此，人类的小群体也不得不随着动物的迁徙而流动。有的动物在食物丰富的季节群体大，而在食物稀缺时群体小。人类群体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便于狩猎，在动物群体变小时，亦把自己的规模予以收缩。对于采集的群体来说，由于所采食的植物不同器官（如根、茎、叶、果实）的生长、发育、成熟的阶段不同，就需要在某个季节到某个地方去寻找某种植物的可食部分。总之，当时的生活条件只能满足数量不大的人类群体过着不断流动的生活。

根据现在的实际调查所获得的情况来看，在南美亚马孙河流域的瓜亚基人，每个游群约 20 人。在马来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的塞芒人，每个游群 50 人左右。在南美的巴塔哥尼亚的平原上，游群的规模比较大，人数可达 400~500 人。因此，当时的游群社会的人口密度是相当低的，估计高的可能每 13 平方千米只有 1 人；低的可能每 130 平方千米才有 1 人。

在这种游群社会中，凡是成年人都必须参加狩猎或采集。其获得的食物，在群体内分配，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份，而不管其在寻找食物中的具体情况如何。因此，游群社会是一种平等的社会，每个同一年龄级序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在人们的头脑中，并不存在财产私有观念。

由于游群的规模小，经常流动，有时甚至需分成更小群体进行活动，所以，游群内虽无常设的管理机构，但是，却有一种非正式的权威存在。当游

群需要对其狩猎、采集活动作出新的安排，决定营地是否需要迁徙与向何处迁徙时，便由游群内部所有成员或部分有影响的成员参与下，集体地、民主地协商决定。即使有时出现个人行使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并非长期不变，也不是绝对的。这种成为非正式的头人或是一人，或是几个人。他们或是有丰富经验的狩猎能手，或是精于各种重要仪式的老人。总之，这些少数人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地位，不是来自权力和职位，而是来自其本身的品质、技术所产生的影响和能力，使人们对他们产生尊敬和信服。

在南非的布须曼人，其头人是世袭的，但其权威却极有限。他与普通成员一样，要制造工具、搭窝棚，携带私人物品旅行，猎取自己的食物。

游群组织是自给自足的自治团体，成员间有血缘关系，彼此之间还靠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团体意识来维系，它是政治组织的萌芽。

2. 部落组织：由于生产的发展，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畜牧和栽培。这样，人类就摆脱直接依靠自然界中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而转向依靠自身放牧和栽培的动、植物。后一方式不但产量高于自然生长状态下的产量，而且使食物的供应较为稳定，同时还使收集食物活动的范围大为减小。于是原来处于游群阶段的社会组织发生变化，逐渐进入部落组织阶段。其变化与所产生的影响，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口的增长、群体的扩大，活动范围缩小与相对稳定。在狩猎采集阶段食物的获取受自然条件等因素所限制，难以稳定，特别是动物的肉与植物的根、茎、叶的可食部分都难以保存，多是随采随食。由于受到这种制约，当地可捕获的动物量与可采食的植物量下降时不得不转移其他地方。食物量不稳定及不断的流动对养育婴儿与携带婴儿不能不带来影响，因而限制了人口的增长与群体的规模。放牧与栽培取代了狩猎与采集使食物供应量大为增加，而且通过需要时的宰杀牲畜与对粮食的加工、储存技术使食物供应稳定。另外，畜牧活动比狩猎活动范围小得多，栽培植物则需转向固定居住。特别是在栽培植物的活动与供应的食物占主导地位时，社会组织就由游群转向半定居与定居。以上的变化必然促进人口增长较快，每个人群所包含的人数增加和定居的村落出现。

第二，社会组织的地缘纽带的出现。在游群组织时期，游群是由于血缘相近而组合在一起的，血缘的纽带成为组织联系与稳定的基础。但是，环境条件，特别是食物获取与供应情况，使其在人口增长，出现“过多”而不利于生存与活动时，必然分离出去成为另一个游群，进行独立地游动。新老游群联系减少。

当进行放牧与栽培活动时，不但活动的范围比以前大为缩小，而且由于需要寻找水草丰满和平原沃土地方以利于生产活动的较大收益，因此，在环境条件好的地方，则集中了较多的游群。这里的游群可能属于以下两类。一是老的游群定居下来后，分出的新的游群，由于情况变化，新的群体就定居在老的群体附近。另一类则是由于居住地区相近，彼此有通婚关系的群体。正是这种居住在同一地域上的有血缘与亲缘关系的群体必然发生较密切的联系。所以，部落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地缘关系的出现。这在游群组织中是不存在的。

第三，群体间与地域间的关系出现。由于各个血缘和亲缘的小群体聚集在生产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必然会出现各种关系。第一种是该地域内各群体间。这时小群体还相对独立，由于经济生活上需要某些共同行动与相互协

作而加强联系。例如，在狩猎季节需要组织人力进行较大规模的狩猎；在土地开发和用水上，有时也需较多劳动力在较大范围内实行协作。另外，在举行共同宗教仪式，解决小群体间的各种矛盾和纠纷都需要有个组织。

由于人口的增加，不论农业与牧业都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但是，环境条件优越的土地并不是无限的。这样，各部落间就出现争夺土地资源或其他资源现象。另外，各部落因地域条件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出现财富的差异，则出现了你争我夺的现象。土地和财富的争夺导致部落间的战争。这种地域之间的部落战争，一方面把部落各群体的利益联为一体，促使其一体化，另一方面导致部落间的兼并和联合，进而使部落在空间上和规模上走上更大规模。

第四，部落组织和部落联盟的产生。由于上述的地域内群体的内、外事务需要，出现部落的议事会与最高的首领。部落多是通过选举办法产生其组织与领导人以解决其内部的生产、生活、社会和宗教等方面事务。这些任务是经常存在，就需要一个与部落相应的组织与一定的领导。不过部落也有权撤换他们。对外的战争，由于情况特殊与临时性，其领导有时是临时任命，或由平时的领导人兼任。这时的组织，由于生产水平低，内部还无较大差异，成员间还未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

以上这些既说明部落形成的原因，亦反映部落的特征。特别是部落对外关系的发展促使部落联盟的出现，也就导致部落向新的组织形式发展。

3. 酋邦：在部落阶段，农牧业的生产发展出现新的情况。一是专业化生产出现，有的群体专门种植，有的从事狩猎或捕捞。在内部，其产品相互调剂。二是生产发展出现手工业，以专门制造工具、武器或有关生活用品等，以满足整体需要。三是生产水平与技术的提高，产品出现剩余。四是多余的产品就产生部落之间的交换。另外，内部就产生分配不匀与贫富现象，结果导致阶级出现。

在组织机构方面，部落的扩大、生产的发展，需要处理生产分工、产品分配、公共工程等事务的组织由非正式的变成正式的，人员亦由不固定转向固定，头人也由普通一员成为居于成员之上的权威人物，甚至是永久的职位，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对外的战争不仅比过去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一方面促使组织机构中的武装力量的经常性，另一方面，战争对财富与奴隶掠夺使领导层获得特权而走上贵族化。

这时的部落头人就成为邦主或酋首，是该酋邦组织的行政与军事首脑，有时还是宗教的领袖，能得到超自然的力量支持以加强其权威，成为一个独裁者。

4. 国家：在酋邦组织时期，由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展，产量提高和经济部门的专业化，大大促进社会的产品交换部门（商业）的发展。加上统治机构中心形成及防守需要，从而出现了有围墙的聚落。商业的“市”与围墙聚落的“城”相结合出现了城市。结果，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酋邦就转成国家。

国家是一个高级的、比较完善的社会组织，它是一个政治性组织，有明确的疆界，统一的政府以及保证政府的权力得以执行的一套强制力量。在国家中，有较为复杂的政治机构、管理制度、固定的官僚系统。

在一个国家里，强制的力量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它为政府所

控制。国家靠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使社会的经济生活得以正常进行。为配合强制的力量，还需要一套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束缚被统治者。

从以上的社会组织从游群、部落、酋邦发展到国家的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生产的发展是个基础，正是生产的发展才推动了社会与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既反映了生产发展的程度与阶段，又表现出其与生产的适应与不适应。正是这种既适应又不适应的变化促进上层建筑不断变化。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地理环境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在下面介绍各地区国家的起源和发展时，我们将更多了解各地的地理环境与国家形成和演变的关系。

（二）早期国家在各地的出现和发展

根据早期国家出现的地区及其后各地国家的发展，分别按西亚与北非、欧洲、南亚、东亚、美洲、非洲等地区进行叙述。

1. 西亚与北非：西亚与北非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国家的地方。根据考古与历史的研究，巴比伦和埃及是世界四大古国中，出现时间最早的两个古国。

（1）巴比伦。巴比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新月地带的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流域。那里东邻伊朗高原，北接安纳托利亚高原（即土耳其高原），西为叙利亚草原，南是阿拉伯半岛的荒漠地带。该地农作物主要是小麦与大麦。小麦与大麦起源于安纳托利亚高原，那里属于地中海气候区，降雨集中于秋末、冬季与春初，有利于麦类生长。早期的农业的耕作集中于高原的南麓的坡地上。当时，由于平原地区，气候干旱，降雨量少，不能满足麦类生长的需要，加上河水泛滥，不利于人们的居住，所以早期村落多分布于坡地上，既可避免洪水灾害，又可获得较多降雨。

但是，高原的南坡属地中海气候与平原干旱气候的过渡带，降雨对作物需要来说稍有不足，对产量影响较大。后来，由于人们认识了洪水的规律，可以选择低地居住，并利用河水灌溉以补充天然降水的不足，大大拓宽了原始居民的生活空间，人们开始从山麓高地走向平原与河谷地区。

灌溉技术的发明与普遍利用，使麦类产量增长了好多倍，大大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犁的出现、畜力的应用、制造青铜工具，轮子用于交通运输加速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外，两河下游的椰枣树提供了木材和新的食物——椰枣，河中的鱼虾、水上的野禽增加了新的食物来源。这一切就使两河流域的下游地区，出现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国家。到公元前 3000 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 12 个独立的城邦国家。其中乌鲁克城的面积有 4km²，人口约达 5 万。

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地区的小城邦国家在公元前 24 世纪时，为其北部巴比伦尼亚（现伊拉克的巴格达以北地带）的阿卡德国所征服，成为两河流域出现的第一个统一全流域的国家。但美索不达米亚的周围多属于干旱地区，这里活动的是游牧民族或农牧结合的民族，他们的机动性强。特别是对马的驯化，先用于战车，后用于骑兵，形成强大的攻击能力。尽管其人数不多，可是却对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国家带来严重威胁。由于这种原因，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朝像走马灯式地不断更换。

阿卡德王国被东北部的库提人消灭后（前 2230 年），南部的乌尔城邦兴起，称为乌尔第三王朝。接着王朝被东南部埃兰人与西部阿摩利人冲垮（公元前 2006 年）。经过混乱，由阿摩利人于巴比伦建立古巴比伦第一王朝（前

1894—1595年)。这个王朝中，最有名的国王就是汉谟拉比，其所制定的法——《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较完备的成文法典。

第一王朝被北方赫梯人冲跨后，接着是南部继起的第二王朝。替代第二王朝的是东面来的加喜特人，建立的是第三王朝（约前1530—1157年）。后来的第四王朝于公元前729年又为北方的亚述所取代。在其后的则是南方来的迦勒底人的新巴伦王国（前626—538年）。最终该王国被东面波斯帝国所并吞。

（2）埃及。埃及是与两河流域几乎同时兴起的古国。这里受尼罗河水的灌溉之利，使农业获得稳定高产。尼罗河每年7月到10月为洪水期，而小麦从11月播种到第二年的五六月收割，正好是枯水期。枯水期，两岸土地的露出，加上洪水期带来的泥土中含有大量有机质，为作物提供丰富的养分。在作物生长季期，虽然气候干旱，缺乏降水，但尼罗河却能提供充足灌溉用水。这种环境条件与麦类生长形成良好配合为埃及国家形成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洪水来时，河水大涨，把两岸田地全部淹没，使灌溉的沟渠，保护村落的堤防受到严重破坏。每次洪水过后，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来修渠筑堤，否则就难以促进生产和保护村落的安全。每年洪水后的这种工程都不是一家一户所能完成的。它不仅需要在统一安排下的全村参与，有时还需与相邻村落相互协作、共同进行。这种在共同利害相联系的关系下出现的小城邦，后又组成上、下埃及两个独立王国。于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下埃及统一，开始了王朝时期。从第一王朝开始至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占领埃及共经历31个王朝。史学上又将其分为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期埃及几个时期。

由于埃及的地理环境有明显特点，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不同，其国家的发展亦有自身的特点。埃及的尼罗河谷地比较窄，是一个狭长的沿河平原。其南面是努比亚（即今苏丹）高原，属沙漠地区。虽有尼罗河相联，但受瀑布制约，无法通航。西面为利比亚沙漠；东面为红海与西奈半岛沙漠，可以说其东、南、西三面为沙漠包围，是难以通行与逾越的地区。北面是尼罗河入海的三角洲，当时河汉纵横，水草丛生，河道、湖泊、沼泽交错，是当时技术条件难以开发利用之地，也是难以通行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埃及是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当时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只有东面的美索不达米亚及地中海东北的希腊，但都受水、陆之阻，与埃及往来较困难。

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埃及从第一王朝开始到第十二王朝（约前3100—前1786年）的1300多年的早王朝、古王国与中王国时期内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上的王朝经常受周围民族影响而不断更替。其朝代的更替只是在埃及人之间，而不是在与周围民族之间。尽管其第七王朝至第十王朝（前2181—前2040年）之间，由于内部矛盾，贫民与奴隶起义不断，导致社会混乱，王朝迅速更替以外，其他时期都是比较稳定的。这对埃及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可是，在发展中，利弊总是不断转化的。埃及的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与对外交流的困难也限制了埃及吸取其他地区的进步技术与经验。约于公元前18世纪后半期，分布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游牧部落希克索斯人，利用战马与战车这种新的军事技术，较容易地克服了西奈沙漠的阻隔进入了埃及的尼罗河谷地，利用埃及的混乱，取得政权，建立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前1720—前1570年）。从此开始打破了埃及陆地上沙漠的天然阻隔而受到周围民族与

遥远的两河流域民族的影响。

从第十七王朝开始，埃及人起来反抗希克索斯人的统治，自第十八王朝开始将其逐出埃及开始，到第二十王朝结束（约前 1567—前 1085 年）是埃及的新王国时期，是埃及的新的兴起与对外扩张时期。正是外来的力量与技术打破埃及封闭，同时也刺激了埃及的新的兴起与走出其被封闭的天地。

在新王国时期，埃及人随着追击希克索斯人而进入巴勒斯坦、叙利亚，甚至达到两河流域与小亚细亚的边缘。在南面与西面也扩大到努比亚与利比亚。由于向外扩张的战争，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发生严重冲突的失败，加上内部与宗教集团的矛盾而使埃及走上衰落。

从第二十一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前 1085—前 332 年）的 700 多年历史中的前期六个王朝中，有三个是利比亚人的王朝，有一个是努比亚人王朝。在后期的五个王朝中的首尾两个王朝是波斯人的王朝。这说明在早期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对外来民族的阻碍已经消失，先是受东面的希克索斯、西面的利比亚、南面的努比亚，继而遥远的波斯人占据两河流域后，受到该地富裕的农业经济的诱惑而进军埃及，建立王朝。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陆上的通道的影响、海上交通的发展，地中海不但不是个联系上的禁区，反而是更方便的通路。埃及此时终于被海上由希腊来的马其顿人所占领。它连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辉煌了 2000 多年的古国文明一起消失了、中断了，被一个新的文明所取代了。这也说明，作为地缘组织的国家，随着其发展，也不断地扩大其地缘规模和影响。同时，其本身也受更广泛地缘范围内的国家间的影响而兴衰。

2. 欧洲：在欧洲，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半岛和亚平宁半岛。它们是希腊和罗马。

（1）希腊。希腊的国家组织最早出现在半岛南面不远处的克里特岛上。大约于公元前 2000 年，岛上就出现城邦国家，为北部的诺萨斯和南部的法埃斯特都留下宏伟的宫室建筑。当时，这里是地中海东部沿海各地商业联系的转运点，经济相当繁荣。到公元前 17 至 16 世纪，岛上诸城邦中，诺萨斯的势力最强大，不仅称霸于岛上，而且依靠武力控制了爱琴海上一些岛屿与半岛上的一些地方。到公元前 1450 年左右，来自半岛上的迈锡尼人占领该岛后，诺萨斯王朝也就消失了。

接着是在半岛上的以迈锡尼文明为代表的众多小王国。今天遗留下来的有山顶上用巨大石块建成的城堡与圆坑墓。公元前 12 世纪时，北方来的多里安人破坏了迈锡尼文明。经过较长时期发展，直到公元前 8 至 6 世纪，形成希腊城邦。整个希腊地区共有 200 多个城邦。

这种情况与希腊的环境特点有密切关系。巴尔干半岛多丘陵山地，由于面积不大，河流短促，没有大的河流与平原。大多是些山岭分割的小平原和低地，农业生产潜力不大。正是这种原因，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若干村落，面积都不太大。如有名城邦斯巴达和雅典，前者较大，有 8500 多平方千米；雅典较小，有 2650km²，全盛时，居民共约 40 万。最小的城邦面积只有 100km²。

开始时，希腊城邦主要依靠农业、放牧和渔业为生。但是，到公元 8 世纪以后，自给自足的经济由于缺乏新的农业资源难以维持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于是沿海地区的居民大量外迁，先是到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沿岸地区，后来又扩大到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但是主要地集中在小亚

细亚与意大利半岛南部及西西里岛的沿海地区。移民在这里建立海外的希腊城邦。

海外城邦的建立促进了本土与海外的贸易。海外运往本土大量粮食，而本土运到海外的则是酒、橄榄油、布、陶器及其他制成品。这样，大大促进了本土农村向商业性农业和城市各种制造业发展，带来的是商品贸易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城市中经营工、商致富的新的阶层形成和农村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瓦解。

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矛盾推动了城邦的制度亦发生变化。原来的君主制度难以维持，于是就出现了贵族的寡头政治、僭主政治以及奴隶民主政治。不过，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城邦则很少变化。例如，在斯巴达则仍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其国家机构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

上述情况，对希腊的城邦制度的发展带来两个重要的不利因素。一个是对外的，一个是对内的。对外是希腊的城邦在境外殖民，建立新的城邦，特别是小亚细亚西岸的城邦与波斯向西扩充领土相冲突，这导致了波斯与希腊城邦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虽然以波斯失败告终，战争期间也曾促进希腊各城邦的联合与同盟，但是，并未能促进其整合与统一，还引起了内部的争霸。对内由于对波斯战争胜利，雅典称霸，导致了与斯巴达集团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27年的战争，造成双方大伤元气以及各同盟间战争不停。加上雅典与斯巴达两种城邦政治制度的斗争与各自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制度解体，最终，于公元前337年，被其北面邻国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所征服。世界历史上，最光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制度——独立的城邦——终于基本结束。

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4年东征，到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病死于巴比伦时的9年间击败波斯，进军中亚、印度河、埃及，占领了大片领土。在其去世后，内部分裂，各部将割据一方建立独立王国。其中三个最大的是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巴尔干半岛），托勒密王国（埃及与巴勒斯坦）和塞琉古王国（西从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岸直到现伊朗东部及阿富汗和中亚若干地区）。这三个王国后来分别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公元前30年和64年为罗马所吞并。

（2）罗马。罗马是继希腊后出现于欧洲的国家。它与希腊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地跨欧、亚、非，环绕地中海的大国，比希腊各城邦总体还大得多；其次，它持续的时间约有千年，比希腊也长得多；第三，希腊始终是城邦，而罗马则经历了相当多的变化。

在罗马城邦独立之前，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为外来的埃特鲁斯坎人所控制；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则是希腊人殖民城邦；在西西里岛上，先是希腊人，后为以北非为基地的迦太基人所控制。约于公元前500年，位于意大利半岛中部台伯河拉丁姆平原上土著罗马人起来反抗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建立罗马人的城邦。罗马人为巩固自己独立，遂与当地其他拉丁民族结成联盟，与埃特鲁斯坎人展开进一步斗争，经过百年的战斗，终于占领整个平原。在此以后，罗马人就向南发展，扩大到坎巴尼亚平原。经过与萨莫奈山地居民斗争，罗马进入意大利南部希腊人的殖民城邦，在打败当地的希腊人与希腊来的援军后，于公元前275年统一意大利半岛的中、南部，建立同盟体系。

当罗马人占领南部意大利后，遂与西西里岛上的迦太基人发生冲突，终

于导致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三次布匿战争。第一次战争(前 264—前 241 年), 罗马人建立强大的海军, 取得海上霸权, 占领整个西西里岛取得胜利。罗马人从此开始把所征服的半岛以外的地区作为行省进行管理, 而不同于半岛上的同盟体系。

第二次战争(前 218—前 201 年)中迦太基的统帅汉尼拔率军队由西班牙出发, 经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 虽然在多次战役中击败罗马人, 但是由于罗马同盟的团结一致, 采取迂回战术, 迫使汉尼拔退出意大利。由于迦太基军队在本土上决战失败, 而向罗马人投降。战争结果, 罗马人除索取大量赔款外, 还把西地中海周围的大片领土变为行省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第三次战争(前 149—前 146 年)中, 罗马人经过围城 3 年才破城而入。结果, 该城被夷为平地, 残存的 5 万居民全部成为奴隶。

由于罗马人在西地中海的胜利, 又将其扩大领土欲望转向东方。在公元前 215 年至公元前 168 年, 罗马人借口马其顿国王曾与迦太基订立同盟反对罗马, 出兵希腊, 接着进军小亚细亚, 打败了马其顿王国和塞琉古王国。开始时, 罗马人只是勒索赔款, 而未建立行省。直到公元前 146 年和公元前 133 年, 才把希腊和小亚细亚变为行省, 置于直接管辖之下。后来, 又于公元前 64 年、63 年和 30 年, 分别灭掉地中海东岸的塞琉古王国、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至此, 罗马人就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地区, 成为一个以地中海为内海的大国。

在西北方, 罗马人于公元前 121 年和公元前 49 年分别在高卢(今法国)南、北部建立行省。公元 43 年开始在不列颠建行省。至此, 罗马人在欧洲的边界是莱茵河和多瑙河。在其以西、以南属罗马帝国, 其以东、以北为日耳曼人的部落。在非洲, 则占有北非, 南与撒哈拉沙漠相连, 成为天然的边界。在亚洲, 则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山地与西部草原为界。

在东部边界上, 与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帝国对峙。尽管于从公元前 65 年至公元 116 年间, 双方发生多次较大战争, 罗马人始终未能控制两河平原。其北部边界, 在公元 1 世纪和 2 世纪初, 罗马人曾越过莱茵河进入易北河以西地区与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今罗马尼亚)地区, 但不久仍被迫退回, 固守原来边界。在英国的北部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处依山筑有边城。

这个庞大的罗马人所建的国家, 最后在内、外交困, 矛盾重重中, 于公元 395 年正式分裂为东、西罗马两个帝国, 西罗马帝国首都在罗马, 东罗马帝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到公元 476 年, 西罗马皇帝被蛮族进攻所废黜而灭亡。

罗马人所以能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多种原因促成的。

首先是地理因素: 在地中海北面三个半岛, 希腊所在巴尔干半岛位于最东, 在马其顿控制下已趋向衰落。西亚、北非的巴比伦、埃及、波斯亦为亚历山大征服, 成为希腊化国家, 失去早期兴旺气势。意大利半岛是三半岛之居中者, 接近欧、亚、非早期文明所在地, 受其文化影响, 处于上升阶段。

意大利是个山地与平原相间的国家。其半岛上的亚平宁山脉呈弓形, 其弓背在半岛中部靠东海岸; 而弓的两端, 在南、北都靠西海岸。因此, 在半岛上, 形成三个平原。北面是波河平原, 最大; 中部的平原较小, 由阿尔诺河、台伯河与沃尔图诺河下游形成彼此相连的平原。南部的平原是半岛东南端沿海狭窄的带状平原, 面积最小。

罗马人兴起在台伯河下游的拉丁姆平原上。这个平原为罗马人统一该地

的城邦提供了条件，这是罗马发展的核心。由于其面积大，从而避免了希腊城邦受地形分割，彼此隔离，难以形成统一的更大政治单位，影响其发展之弊端。当罗马人统一拉丁姆平原后，就能顺利地扩大其联盟到其中部沿海的其他平原上。意大利中部平原虽然为贯穿全岛的亚平宁山脉与南、北平原相分开，但有谷地相连，并不难通过。这就便于罗马人以中部平原为基础，把整个半岛统一起来，形成整体。

正因为意大利半岛平原总面积超过其他两半岛，这就为罗马人向外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与军源。另外，意大利半岛居于地中海中心地位，为利用水、陆交通加强罗马与地中海周围地区的军事与经济等联系提供方便。

其次是军事因素：军事因素有作战技术和兵源制度两方面。在作战技术上，罗马人原来采用希腊式军队的方阵，后来，根据其统一半岛作战经验使用支队式军团。他们将军队组成120人为一支的“支队”，30个支队，即3600人，组成1个军团。军团还配有骑兵保护其侧翼，除传统的头盔、盾、长矛和剑以外，罗马人还使用有效的进攻武器，即铁尖标枪。作战时，军团士兵先用标枪从远处掷向敌人，然后巧妙地利用敌人队形出现的缺口进攻。这种战术比希腊方阵灵活机动，特别适用地形崎岖地带，便于击破敌军方阵的正面防线。由于地中海周围地区大都为山地、丘陵，这种战术具有较大优势。在海军作战方式上，罗马人在和迦太基争夺西西里中建立起海军，不用传统的撞击战术，而是采用强行登上敌船进行战斗的战术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些为罗马人的海、陆军优势打下基础。

罗马人的兵源是由按财产所划分的等级来提供不同数量的骑兵、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组成的。军队在战时组成，由每年改选一次的执政官来指挥。罗马在统一意大利半岛过程中，通过战争而组成联盟，各联盟成员在战时应与罗马人共同对敌，要提供部队参加战斗。这样，罗马人有全半岛居民支援，具有充足兵源。在战斗中，具有战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成为“新贵”，由平民变为统治阶层。其余的广大平民也可获得利益，如可以从新获得的“公地”中分得一定份地，可以减轻债务负担和获得其他政治和社会利益。后来，在意大利半岛以外的扩张战争中，军队又可以在缴获的战利品、奴隶和土地中得到更多利益。

另外，罗马军纪十分严格，军令高于一切，不服从者处死刑。临阵脱逃的队伍执行“十一抽杀律”。

更重要的是罗马军队具有荣誉感与战斗意识，对罗马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是政治因素：包括三部分，即罗马人内部、同盟之间和行省方面。

罗马原为实行“军事民主制”的“王政”。“王”与高级公职人员由全体氏族男子参加选举。氏族长老组成的元老院，是“王”的顾问，并握有收税、征兵、媾和等权利。由于经济和军事活动的发展，税收主要来自平民。起初不服役的平民，后来反而需自备武装，大量被征入伍，遂使“王政”转向共和国。主要表现是：罗马居民，不论贵族、平民，按财产提供不同数目与装备（有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的百人队。由百人队大会，每队一票，选出两名，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平时是国家统治者与法官，战时是军队统帅。元老院由贵族和退任执政官组成，它有权决定内、外政策、审查和批准法案等大权，有权监督执政官行动。后来，在平民与贵族斗争中，获得由平民中每年选举保民官的权利。其职责在于保护平民不受贵族官员的

横暴侵犯，还可以通过使用否决权以制止和否决国家官员的决定与元老院的法案。

在罗马人通过战争统一意大利半岛中，如何处好与其他意大利人的政治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没有采取一般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办法，而是相对平等与宽容的。其类型有五。一、有与罗马人同等权利与义务的拉丁自治市。二、无罗马政治权利的非拉丁城市，在监督下内部自治。三、拉丁殖民地，是罗马和拉丁同盟在占领地区建立的殖民地，实行内部自治，移居罗马有公民权。四、同盟者，在承认罗马宗主权下实行自治。“臣属”由罗马派人管理。以上作法，对加强半岛内部团结与对外政策一致性上起重要作用。

对从迦太基人手中获得的半岛以外领土上（如西西里等），建成行省。总督是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的执政官，由罗马任命。除了掠夺其大量财物作为战利品和大量人口作为奴隶外，罗马人还通过税收等方式榨取行省大量钱财、物资、粮食等供其享用。

这样就使罗马从半岛上获得安定的基地、充足的兵员和从行省来的大量财物，以支持其不断向外发动战争和扩大领土，罗马终于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尽管罗马由于上述因素而强大起来，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因素亦发生转化，终于导致罗马这个强大国家走向衰落与垮台。其因素如下：

地理因素：罗马从一个小城邦变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国。从一个大国来看，其地理因素则出现些弱点。第一，作为一个大国，其首都及附近地区的核心区不是一个强大的农业经济区，很难支持其基本需求。罗马所在的平原面积不大，也不是当时农业比较发达地区。其粮食供应一直依靠埃及和西北非供应，特别是到后期，意大利农业衰落，首都粮食供应一直是沉重负担。第二，领土的扩张是其财富与奴隶的来源，可是领土扩大给保卫、管理带来困难。为了加强管理，要维持海、陆交通，要清除海盗、修筑道路，要在各地驻防大量军队，反而加重负担。第三，边疆地区冲突不断发生。向东遇到两河与伊朗高原草原帝国（帕提亚）阻挡，向北遇到森林与沼泽的日耳曼部落的反击。最后，加上亚洲西迁的匈奴人的侵扰，日耳曼人入侵而使西罗马帝国垮台。

军事因素：罗马人的兵员原靠罗马人及意大利半岛上诸同盟国提供。战争结束后，士兵回原地继续务农。在罗马向半岛以外的地区扩大时，长年战争使士兵脱离农业，加以半岛上奴隶大庄园发展，小农破产，既破坏了兵源，又增加了大量无业流民，加重罗马城的负担。为此，改用招募制代替征兵制。长期征战的士兵希望服役期与退役时有很好待遇与条件，遂导致将军以金钱与许诺利用士兵为其争权夺利，士兵以自身利益作为决定是否支持其领导的依据。结果，军队又成为通过内战夺权与政变更换国家首脑的工具。到罗马帝国后期，首脑的生死、任期长短和更替大多取决于军队的态度。加上军队逐渐在行省招募，吸收大量边境蛮族，失去对罗马的忠诚，无力抵抗日耳曼人的入侵。正是军队的变化成为罗马衰落与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治因素：罗马原是个氏族共和国，在意大利半岛与行省实行不同的政策，其居民都与罗马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随着领土扩大，增加了大量奴隶及受压榨与剥削的地区。半岛上同盟者感到为罗马的征战出力，但获利甚少，要求与罗马人享有同等权利。奴隶为自身的自由，行省为自身利益，这些与罗马人的矛盾就随着罗马向外的扩展、社会的变化而日益严重。奴隶起

义，地区内乱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尽管罗马人作些让步，但是问题难以根本解决，从而使罗马国家的内部团结与稳定大受影响。

经济因素：“通过战争与领土的扩大，罗马贵族获得大片土地与奴隶，遂使罗马利用奴隶的大庄园得以发展。由于埃及与北非大量便宜粮食进入罗马与意大利半岛，使半岛上大庄园减少粮食生产，转向葡萄业和油橄榄等经济作物。后来，行省的经济作物的发展抢去半岛上的经济作物销售市场。由于领土停止扩大，奴隶来源减少，奴隶价格大涨。在这双重压力下，半岛上奴隶制庄园破产而转向隶农制，导致了农业危机。

对行省加重税收，竭泽而渔使城市经济衰败与手工业完全破产；滥发货币导致物价飞涨，实物交换盛行；小农为逃税不得不向大庄园主寻求“庇护”。整个经济走向倒退，使罗马的经济基础全部崩溃。结果，大庄园转向隶农制，与手工业相结合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为后来的中世纪封建经济提供了条件。

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罗马遂由共和制转向元首独裁制，最后成为君主帝国。在矛盾重重打击下，西罗马走向垮台，而东罗马演变成拜占庭帝国，又延续了千年，到 1453 年而让位于奥斯曼帝国。

3. 南亚：南亚的印度是东半球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形成年代约为公元前 2500 年，仅次于巴比伦和埃及，居第三位。印度文明始于印度河畔，现今属巴基斯坦。

根据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的苏库尔西南与旁遮普省的萨希瓦尔以西发现摩亨佐达罗和哈巴拉两座古城。其面积都在两平方千米以上，城内街道呈棋盘式，房屋一般由烧制红砖建造，有的房屋是二三层的楼房。从建筑用途，发现有官署、庙宇、仓库、民居……。从规模估计两城人口各约 35 000 人。此外，在印度河流域还发现有 200 多处聚落遗址。一般认为，该地原始居民是达罗毗荼人，到公元前 2500 年时，其文明成熟，延续到公元前 1750 年而中断。大约于公元前 2000 年时，雅利安人从北方进入该地区。因此，该文明中断有人认为是由于雅利安人入侵的结果。也有人认为是由于自然灾害（如河流改道、洪水、地震等）引起的，与雅利安人入侵无关，因雅利安人入侵次大陆约发生于公元前 1750 年左右。

雅利安人自西北进入印度，遇到当地人顽强抵抗。当占据印度河上游以后，初期以牧畜为主，后逐渐从事农业，并开始向恒河流域扩展。在此过程中，雅利安人与当地土著及雅利安人各部落之间不断的战争促其社会发展，内部出现不同等级。雅利安人中间有三个不同社会地位的等级，第一是婆罗门，为僧侣；第二是刹帝利，为贵族和武士；第三是吠舍，为一般公社成员。被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土著组成第四等级，为首陀罗。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为独立匠人或奴隶。这四个等级亦称为“种姓”，等级森严。

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时，少数发达部落以某一中心城市组成国家，规模小，称为城市国家。到公元前 6 世纪，在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已有 20 个左右国家。其中 16 个大国，为印度的列国时代。当时，恒河下游的摩竭陀王国势力强大，其王阿闍世（约公元前 493—前 462 年）曾统一恒河流域。

公元前 325 年，亚历山大从占领的印度河流域返回巴比伦后，一个叫旃陀罗笈多的人于公元前 324 年趁当地人起义反对希腊统治而崛起自立为王（月护王），并东下攻占摩竭陀，统一了整个印度。其国土包括印度河与恒

河流域及德干高原北部，成为第一个统一的、面积辽阔的王朝。由于其出身于孔雀家族，故称孔雀王朝（前 234—前 187 年）。在印度，原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但阿育王（前 273—前 236 年）信奉佛教，不仅在国家内支持佛教，而且派教徒往斯里兰卡和下缅甸等地传教。孔雀王朝以后为巽加王朝（前 187—前 75 年）、甘婆王朝（前 75—前 30 年）。以后的 300 多年历史没有统一王朝，而西北部则为外族侵占。

印度的西北部属干旱地区，而且地近两河流域，所以农业上利用灌溉技术生产麦类，促其文明发展，其时间仅晚于两河流域 500 年，而早于中国。但是，其西及北，为伊朗与阿富汗高原，为游牧民族所在地，距离较近，又无天然阻隔，招致雅利安人入侵。结果，首先是原地居民达毗荼人的农业文明的中断，雅利安人取而代之。其次是雅利安人东下，进入恒河流域，迫使达毗荼人退至德干高原。第三是雅利安人的统治地位通过宗教与种姓制度而获得巩固。上述的地理条件、民族组成、社会结构和宗教关系一直是印度国家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4. 东亚：在东亚，中国是出现最早的国家。它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按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解释，确实历史记载出现于殷商。但是，在其以前的则属于传说。传说里面的神话部分与实际相符部分究竟有多少，尚待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去深入研究、证实。不过，尧和舜以及禹的夏，则反映了我国早期国家起源中部落联盟末期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基本趋势与规律。

在我国古籍中，从道德标准的角度推崇的尧与舜的“荐贤”与“禅让”，只是处在部落联盟时，酋首继承制度中，尚未进入父传子的阶段。到禹开始，由其子启继承，是一重大改变，即由部落联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即王朝的出现，也是作为国家的中国的开始。以此计，大约出现于公元前 22 世纪末至公元前 21 世纪初，即距今约 4000 年。因此，作为古国，按年代，位于巴比伦、埃及与印度之后。

虽然，尧、舜、禹和夏无文字记载，但是根据后人记下的传说及考古等情况综合分析，大多认为，其时的政治中心大约位于山西西南部与河南西部的汾河与洛河流域。尽管当时，在长江及内蒙古等地区文化有相当发展，但王朝出现仍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夏大约从公元前 22 世纪末或 21 世纪初至公元前 18 世纪，经历了 400 多年。其间有 14 世、17 王。当时，夏可以说是个部落联盟的稳定的共主，其包括政治单位是相当多的。按《左传》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至帛者万国”，这表示诸侯数目很多。其中既包括与夏近亲的部落，也包括远亲部落以及大量无亲缘关系的部落。从有关材料看，其共主的地位既靠本身的势力与威望，也依靠地方诸侯的承认。由于其依靠亲缘诸侯的支持，通过征服等手段，来扩大其控制的范围，夏的家天下制开始并不太稳定，而多次受不同氏族、部落以及本氏族部落的挑战，经过征战才走上稳定。

夏王朝的政治制度是由血缘关系开始，然后走向地缘。夏本身是个大的氏族，在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能取得共主地位，并由共主转为“家天下”。当时，由于夏人本是姒姓氏族，随着人口繁衍、氏族迁移，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分支。这些氏族分支就以所在地为其名。《夏本纪》中称，从姒姓中分出的有夏后氏、有扈氏、斟寻氏、彤城氏等十三氏。这些是夏的氏族各分支，当然是夏王朝的基础。

另外，夏又把其所统治的地区分为九州，派遣“九牧”去治理，“九牧”

已不同于过去的氏族部落酋首，而是夏王朝派出的地方行政长官。

到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由于暴政而灭于商。商族是位于夏地东面的部落，大约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商从成汤建国开始（约公元前 17 世纪初）到纣王亡国（约公元前 11 世纪），共传 17 世 31 王，约 600 年。其都城共迁五次，最后一次在殷（今河南安阳）为最长，有 273 年。甲骨文就发现在这里。

王权世袭制度在夏代已经确立。在商代有个法则，一是兄终弟及，二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制，大概是氏族社会中推举制的一种残余，在那种继承制下，商王朝的前期经常发生王位的纷争。在后期，嫡长子制确立以后，王位纷争遂显著减少，王室内部逐渐稳定下来，使王权得到了加强。

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与宗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这是父权制家庭出现一夫多妻生子的嫡庶差别。嫡长子制是强调正妻所生的长子的特殊地位。这种宗法制又与分封制相联系。在确定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同时，其余的庶子便予以分封。结果是加强了王权，巩固了奴隶主的统治。由此，商王不仅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血缘上又是嫡长子，成为宗法关系中的“大宗”。而分封到各地的庶子、庶族，对商王来说是旁支，是“小宗”。他们对下的庶子分封，又同样出现“大宗”和“小宗”。

在国家政权来说，分为两类。商王把他直接统治的地区称为“内服”，即王畿。其官分三类：政务官，辅佐商王的重要人物；宗教官，掌管宗教与祭祀活动，当时这被视为国家大事；事务官，管理王家具体事务。在王畿之外，除商王分封的许多同姓或异姓诸侯所建的方国外，还散布许多发展程度不同的少数民族的方国或部落，这些统称为“外服”。服是服事王室的意思，即需定期向商王纳贡，负担劳役，奉命征伐。

商的奴隶制非常残酷，在农、牧、手工业及家庭内使用大量奴隶外，还实行人殉制度，从贵族的墓葬中发现被杀殉的奴隶骨骼是很多的。由于商纣王的暴虐，商亡于其西边的方国周。

周位于陕西的渭河之滨。经过充分准备，周武王于其九年亲率大军，联合 800 多个诸侯和部落向殷都进军。于十一年正月，大军在殷都朝歌南 70 里的牧野与纣王大战。殷军 17 万人，但军士反而助周攻纣王。纣王败而自焚。从此开始周王朝（从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256 年），共 37 王，约 800 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根据其历史情况，分西周和东周，东周又分春秋战国，共三个阶段。

在灭纣王后，为了巩固其胜利，就采用分封办法以解决自身一个小邦来统治原来疆土庞大的商朝国土。受分封的有四类人：功臣谋士，如姜尚封于营邱，国号齐；武王兄弟，周公旦封于曲阜，国号鲁；殷商之后，纣王子武庚封于殷；古代圣王之后，大禹之后封于祝。周初分封了 71 国，其中姬姓（即周王之姓）53 国。实际不止此数。有的古书说，周代封国有 400 余国，服国 800 余国。

在宗法制度上，西周与商相同，但进一步有所发展。周天子是由嫡长子世袭继承，成为姬姓宗族的“大宗”，其余诸子分封为诸侯，是姬姓宗族的“小宗”。在封国内的诸侯、采邑中的卿大夫……亦都如此。大宗掌握着宗庙祭祀的特权。宗庙建于大宗所在地。天子的宗庙是最高一级的祭祀祖先的场所，因此叫做“太庙”。在古代社会里，掌握祭祀权实际就掌握了国家权力。这明显反映了政权、族权与神权的结合。这些宗法等级制度不仅体现在封地大小、权力多少，也反映在衣服装饰、礼仪、住房、墓葬规模等方面。

周的农业实行井田制。土地属奴隶主所有，分配给单个家庭。奴隶在监督下劳动于公田的收获全部为奴隶主所得，在“私田”上劳动收获以维持生存。土地块状，形似“井”字，故称井田制。此时，农具已有铜器，生产水平有所提高。加之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其经济较夏、商有很大发展。

到第 12 王——幽王时，由于昏暴，诸侯离心离德，加之继承问题，招致西部边境少数民族犬戎入境。结果，幽王被杀，镐京被毁，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经历了 257 年（前 1027—前 771 年）的西周因此结束。由于雒邑在东，故称东周。

平王东迁以后，周朝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周王权威下降，王室衰微。原来周王在政权、族权与神权上，地位居于全国之首，有绝对权威。但东迁后，自身力量下降，诸侯们已不大听命于周，形成令不行，禁不止。由此，各诸侯国为自身利益，你争我夺，征战不已，形成相互兼并，失去原来共尊周天子下相互间的共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与少数民族相邻的诸侯，受到很大压力。由于失去中央政权周的支持，有的诸侯国就岌岌可危。为了维持周的分封制的稳定及华夏文化的影响力，齐与晋两个大国出来打出“尊王攘夷”旗号，争夺霸业。

其次，井田制的崩溃，封建经济的出现。原来在井田制下劳动的奴隶，由于受到的残酷剥削与人身不自由，在诸侯各自独立情况下不得不逃亡。另一方面，一些诸侯国或士大夫，为了增强国力，开垦荒地，需要招徕劳动力，就收容外逃奴隶。为了有吸引力，采取把土地分给生产者，实行个体经营，用提实物与劳役办法向土地所有者交租。实际上，在土地剥削上出现了租佃制。其结果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在手工业和商业上，原来手工业者和商人是官府奴隶，为官府做工或经商，既不能改变职业，又不能自由迁移。在其反抗斗争下，他们成为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国家通过税收来管理。由于获利甚丰，一部分贵族也参与而成为富商大贾。铁制农具的普及、耕牛的使用、灌溉的出现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使当时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十分活跃，带动了城市、货币的发展。

第三，新兴势力崛起，权力再分配。原来在宗法制与分封制下，诸侯、卿、士的地位、权力、财富都是与等级相互联系的。特别是财富是与其所得的土地与奴隶数量有关。当土地可以开垦、奴隶可以被招收、手工业和商业可以由私家经营时，就必然出现一些新的财富所有者。有了土地、人力和财富，这些新兴势力集团就会组织军队，进行割据，窃取权力，甚至取代与分解原来的诸侯。齐国的田氏取代姜氏，韩、赵、魏三家分晋就是这种权力再分配的结果。

第四，群雄争霸，重新统一。在周天子权威失去，各诸侯相互征战，大国吞并小国情况下，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各国竞相改革。通过改革来发展生产和增殖人口，进而可以增加兵源，提高国力以击败竞争对手。经过激烈的征战，到东周后期战国时，就剩下齐、楚、燕、秦、韩、赵、魏所谓的七雄。此时，周王已毫无权威，于公元前 256 年灭于秦。其他六国也先后被秦所灭。分裂的王朝，在公元前 221 年为秦所统一。中国从此就进入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的王朝时代。

从作为中国文明古国的夏、商、周三朝来看，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亦是明显的。这三朝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其支流，如汾河、伊-洛河、渭河以及三门峡以东的今天冀、鲁、豫的交界地区。这里属于温带半湿润与

半干旱的气候交错区，很适宜我国当时旱作农业中的粟与黍种植。由于产量既高于其北面的同种作物，又高于其南面的水稻。所以，农业的经济的效益起着关键作用。其次是河流与土地状况对其具体地区起着决定作用。黄河干流在三门峡以上属峡谷，无法进行农业活动。在支流上，有河谷平原，土壤为冲积黄土，质地松软易耕作。黄土含矿物质多，加上原始植被属旱生禾草类杂草与树丛，使土壤无机与有机养分高，利于作物生长。在三门峡以东，黄河过郑州进入平原，低地河道纵横、沼泽遍布，不利农业。只有北岸沿太行山麓与豫东、鲁西地势高处适于耕作。正是这种原因，夏、商、周分别起始于汾河与伊-洛河谷、豫东及渭河谷地。

夏以伊-洛河为中心，商以郑州以东黄河两岸为基地，周以渭河平原为起点建立王朝，占据中原，再以此控制全国。这三个起始地区是相邻的，联结起来，就成为当时以及以后朝代的核心地区。这个核心区相当大，而且内部条件较均一。向外，特别是向西北干旱地区是逐渐过渡，与游牧地区有相当距离。其条件有利我国早期国家发展与巩固。例如，夏与商两朝因其位置居于中及东，不会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而这种情况在巴比伦相当明显。周位于西，相对来说，接近干旱地区，虽然受到犬戎袭击，但其东迁洛阳仍然能继续存在 500 多年而不致中断。这其中自然有地理条件的作用。

在这广大的平原上，由于环境条件均一，交通的方便，有利于经济活动的一致性与文化上交流而接近。正是这种原因，商代夏、周继商只是氏族部落间的取代，而不是民族间替换。不论那一王朝，对该地域上的其他氏族部落的统治没有出现民族与文化上的对立。正是属于相同文化，才有可能使分封制、宗法制两者结合，使地缘的政治统治与血缘的嫡庶相联形成有机的对应等级系统，有利于王朝的稳定。这正是地域特点与人的文化特点结合的产物。但是，这种等级的血缘与地缘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相适应时，经过分裂、组合，最终统一，向新的人地关系整合发展。

5. 美洲：在美洲，文明古国出现于墨西哥高原、墨西哥南部与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一部分，以及秘鲁及其附近地区。它们分别被称为墨西哥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

(1) 墨西哥。墨西哥文明古国出现于现墨西哥的首都附近。这里最早出现的文明是在墨西哥湾沿岸的韦拉克鲁斯附近。留下的是用石头雕刻的巨大人头像，每个重约 18t。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1150—前 950 年。在其后是位于墨西哥中央谷地特奥蒂华坎遗址。其年代约为公元 300—600 年。遗址面积约 18km²，估计人口有 12 万。留下的笔直大道，两边及其尽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阶梯式的美洲金字塔。最大的太阳金字塔，高 60m，基宽约 210m，内部为土块，外部覆盖的是当地的红色火山岩。这里当时居民称之为托尔特克人。

到 1325 年，阿兹特克人在今墨西哥城所在地的特斯科科湖中两个岛上建立铁诺奇蒂特兰城。该城十分繁华，约有 10 万人，是当时美洲最大城市。岛与湖岸间之堤道，与岸相接处有吊桥。城内有广场、宫殿、金字塔、庙宇，十分壮丽。当时，西班牙入侵者见到此城，十分惊讶。

到 15 世纪初，阿兹特克人强大起来，形成奴隶制国家，东到墨西哥湾，西到太平洋岸，南到今危地马拉。其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作物以玉米为主，依靠灌溉。阿兹特克人相信灵魂、崇拜多神。最高首领也被当作神的化身。祭神时，往往以生人献祭，有时数量很大，多来自战俘。金属只能炼铜，无铁。缺乏大型食草动物，无牲畜供役使。由于无畜力及未使用轮子，故未有

车辆供运输与乘坐。阿兹特克人的国家后来由于西班牙人于 1519—1520 年入侵而被灭亡。

(2) 玛雅。玛雅文明留下的遗址，按年代划分有三个阶段：一是前古典时期（前 2500—250 年），属国家萌芽时期，只有原始的村落，主要分布于危地马拉西部的山地。二是独立城邦时期（250—900 年），较大规模的居民点与城市散布各地，数以百计。主要分布于山地与墨西哥湾之间的乌苏马辛塔河流域及附近地区。主要的城邦是蒂卡尔（在危地马拉），科潘（在洪都拉斯），帕伦克（在墨西哥）。例如，蒂卡尔地区面积达 50km²，约有 4 万居民。城中心是祭祀和行政管理中心，就地筑有高台，上有宫殿、官署，还有众多金字塔及其上的台庙，加上广场、球场、王城等，十分壮观。这些城邦小国皆有王朝统治，尚未形成统一王国。这是玛雅的兴盛时期，不知什么原因，城邦于公元 800 年后急剧衰落，人口则转向东北，留下的遗址被湮没在热带的丛林中。三是复兴时期，玛雅人转移到尤卡坦半岛北端，建立新的城邦，主要有奇琴伊察、马雅潘和乌斯马尔，有时彼此结成联盟，有时互相征战，遂逐渐衰落下来。到 1520 年，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并对玛雅地区进行残酷统治，玛雅文明遭受彻底破坏。

(3) 印加。印加帝国出现于南美洲安第斯地区，它北起南哥伦比亚，南至智利中部，南北长约 4 000 km。印加文化产生于公元前 1500 年至 1000 年。至公元 1000 年时，在秘鲁东南库斯科成为一个中心，后逐渐向外扩展。在公元 15 世纪时建立起中央集权式的大帝国，人口超过 600 万，是美洲当时的大帝国。农业靠河谷中修建梯田，引水灌溉，高处气温低，种土豆；下部温度高种玉米。由于帝国位于山区，南北狭长，为便于统治，沿山脉走向修建两条大道纵贯全国，沿路建有驿站，靠接力长跑传递信息。首都库斯科城的宫殿、庙宇、城墙都用大石块磨边接缝建成，十分紧密，堪称一绝。印加人崇拜太阳，自称是太阳的子孙。“印加”意即为“太阳之子”。印加王被认为是太阳神在人间化身，至高无上，掌握军政全权。印加人手工工业及天文历法都相当发达，却没有墨西哥与玛雅所创造的象形文字，靠结绳记事。以毛线或棉线上系的细绳多少，其上绳结间距离、形状、数目以及绳的不同颜色来表示不同事物与数量。在 1523 年，由于内部王位之争出现内讧，为西班牙入侵者利用而导致王国的结束。

美洲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看来有明显特色。在墨西哥与玛雅一直处于城邦与不稳定的联盟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其次，文明和国家都出现在山地与高原，并不像东半球的亚、非的四大文明古国那样出现于大河之畔，平原之上。再有，墨西哥、玛雅、印加三文明的发展相对缓慢，程度相对不高。例如，三处只发展到青铜器时期，而未进入铁器；都未利用机械力来耕种与运输；在文字上，墨西哥与玛雅是较原始的象形文字，而印加还是结绳记事。最后，玛雅文明已发展到城邦，前后相联有千年，可是，其突然的转移与消失究其原因何在，还未能得出满意的解释。

上述问题可能与其所处的环境条件有一定关系。首先是美洲大陆与欧、亚、非大陆不相联接，大洋的阻隔，使其文化的发展缺乏相应交流。这种地理上的隔离不能不影响到文化发展及国家进程。另外，从美洲内部来说，中美洲是狭长地带，加上地势崎岖，热带雨林，使南、北文化交流发生困难。例如，墨西哥与玛雅相距较近，在文化、国家起源与发展上有明显的相互影响，两地的金字塔存在明显的一致性，在印加却没有。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对

其发展不能不说是有一定影响。

在文明与国家起源地方面可以说是与农业情况有一定联系。在美洲农作物主要是玉米与土豆。墨西哥与玛雅居民的主食是玉米。玉米只是在高温与灌溉条件下才能取得高产，因而墨西哥高原出现了特奥蒂华坎与铁诺奇蒂特兰城。玛雅文明先在危地马拉西部山地，到蒂卡尔等地也是利用灌溉使玉米获得高产而利于国家出现。但是，从蒂卡尔等地转向尤卡坦半岛北端，显而易见这与其灌溉系统遭到破坏，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不得不向其他地方转移有关。马文·哈里斯在其所著的《文化的起源》一书中也提到是由于强化农业生产，破坏了当地石灰岩上生长的具有干、湿季的准雨林。当其破坏程度超过一定限度，使森林短期难以恢复时，也就使依赖当地环境生存与发展的玛雅城邦消失了。

印加帝国出现于安第斯山区，是利用河谷地区通过梯田与灌溉使其利于玉米的生产结果。而这种条件并不能在亚马孙河的热带雨林与智利的干旱沙漠地区出现，所以印加帝国也只能在山区而无法进入以外地区。

6. 非洲：在非洲，除北非的埃及与迦太基以外，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有起源较早的国家。它们主要分布于西非的尼日尔河中游，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的北部与苏丹的东北部。西部为加纳古国，东部为阿克苏姆王国。

(1) 加纳古国。加纳古国在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中游(今塞内加尔东部、毛里塔尼亚东南部与马里中、西部)。这里南部是热带雨林，北面是撒哈拉沙漠，其间是高草与低草的稀树草原。气候条件适宜于农业的发展，主要作物有高粱与粟，还有棉花。在公元3世纪引入铁器应用于农具，大大促进农业发展。粮食的生产不但为自身发展提供基础，而且也为其与北面游牧民族、南面森林中的狩猎民族进行物资交换提供了可能，促进其商业的发展，活跃其经济。其实，更重要的是北非的柏柏尔人公元纪年初引入骆驼，3世纪时又带来马，使得该地与外部世界联系有了交通工具，可以克服大沙漠的阻碍。

当时，吸引柏柏尔人来此经商的原因是该地南部，特别是现加纳一带盛产黄金，而在古加纳王国北部及撒哈拉沙漠盛产盐，柏柏尔人运盐以交换黄金的商队不绝于途。尤其在阿拉伯人在北非组成大帝国以后，对黄金的需求更促进了这种盐与黄金的贸易。从三四世纪开始出现的加纳古国在此影响下强大起来。在九世纪成为西起大西洋，东到尼日尔河中游的湖泊区的西非大国。它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

到1240年，加纳的藩属马里强大起来并灭了加纳。在14世纪时国力最强，领土比加纳更大，东面达到今尼日尔边界。到15世纪末，马里东面的属国桑海兴起，取代马里的地位，成为尼日尔河流域的唯一大国。马里与桑海虽然已出现封建制剥削关系，但奴隶仍在社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在8世纪以后，伊斯兰教传入，遂使加纳、马里和桑海成为伊斯兰国家。到17世纪初，桑海为摩洛哥侵略军所灭。

(2) 阿克苏姆王国。在东非，最早的古国是努比亚。它位于埃及以南，很早以出产黄金、象牙、宝石、香料而出名。其发展较晚，但受埃及影响较大，历代法老多次入侵那里。公元前8世纪时，努比亚国王曾在埃及建立第二十五王朝，但都城并不在埃及境内，而在今苏丹。在公元4世纪中叶被其东面的阿克苏姆王国所灭。

阿克苏姆王国于公元前第1千纪的中期出现于埃塞俄比亚的北部。3至6

世纪占领整个埃塞俄比亚高原及其附近地区。六七世纪时，基督教在埃及兴起，在其西部尼罗河两岸建立北面的穆库拉和南面的阿勒瓦两个王国。在阿拉伯帝国出现以后，从7世纪到13世纪，阿拉伯人分别从东西两面蚕食阿克苏姆。西面沿尼罗河南下，灭了穆库拉，16世纪时，又灭了阿勒瓦王国，建立丰吉苏丹国。东面阿拉伯由于贸易关系于8世纪时占据红海沿岸地区。因此，阿克苏姆从7世纪开始衰落。到13世纪时，又开始复兴，把衰落时分裂的埃塞俄比亚统一起来，并改称埃塞俄比亚王国。其在7世纪前是个奴隶制国家，而后转为封建王国。17世纪起一直受欧洲殖民主义者侵略，但一直保持独立，成为非洲唯一未被殖民主义者统治的国家。

阿克苏姆古国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亦十分明显。撒哈拉沙漠是由副热带高压造成的，而埃塞俄比亚高原处于此副热带高压的东南边缘，低地为干旱低草稀树草原植被带。但是埃塞俄比亚是个海拔为1000 m以上的高原，使得降雨增加，可以满足旱作农业的要求。有水源，可以灌溉。干旱处可以放牧。因此，这里宜于发展农牧业。另外，其西边有尼罗河，东面有红海，它们是东、西方贸易和西亚、北非贸易的重要通道，对当地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正是这两个条件促进国家的发展。

(3) 其他地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两侧，北面的埃及、迦太基，南面的加纳、阿克苏姆是早期国家出现的地方。非洲的南部，有南北向的三条线。一是从今索马里、肯尼亚到坦桑尼亚海岸，由于贸易促进当地的发展，特别是7世纪以后，阿拉伯的穆斯林大批进入该地区经商。在此影响下，从9世纪到14世纪成立些地区性的国家与商业性城市国家。在15世纪后，由于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逐渐以武力征服这些地方。

二是沿非洲的西海岸，大体从今加蓬的奥戈韦河口到安哥拉的中部沿海地带。由于地势高，避开低地的多雨及潮湿，在远处建立了许多小王国与部落。14世纪曾统一为刚果王国。15世纪末，葡萄牙人来此，16世纪时是贩卖奴隶的重要地区。而后，该地逐渐沦为殖民地。

三是沿尼罗河往南，并沿雨林东部的山地东侧继续南下，直到津巴布韦。这里虽属东非干旱气候，但在山地则多雨宜于农业而成为一些王国的核心。其中如维多利亚湖西岸的比戈(14—16世纪)，扎伊尔东南加丹加地区的桑加(9世纪)，津巴布韦的莫塔帕(6—16世纪)。

三、民族

在国家四要素中，居首的是居民。但是，居民不仅需一定数量，而且是由某种文化所组成的群体，这就是所说的民族。研究一国家的居民的群体只能从民族开始。

(一) 民族的定义与起源

1. 民族的定义：在汉语中，“民族”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在古籍中，对于不同文化特征的人经常使用“族”。本世纪初，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学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然后才被广泛接受。

根据布伦奇利的概念，民族包括有8种特质：其始也同居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目前，我国民族学者吸取各方面学者的见解，接受并公认的民族的定义为下：“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

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根据以上的解说，其定义有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指出民族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即民族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有个过程，达到或符合这几个“共同”才能称之为民族。

第二，把民族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在四个“共同”中，尽管语言列为第一个共同条件，但是，共同的地域应是首要条件。因为只有共同地域条件下，才有可能逐步形成其他三个“共同”，否则，是不可能的。当然，这里“地域”指的是民族的分布是连续的，没有被分割的分布区，而不是指具有某种特征的区域。例如，我国的汉族，在大陆上，从东北到广东，跨过好几个气候带，包含好多个各具特色自然区、经济区、文化区。不过，也有的民族，由于人数少，所分布的地区比较小，只限于某种特征的区域。南非的布须曼人就属于这类。其人数约十多万，分布限于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相邻的北部，是一片干旱的沙漠灌丛地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的分布区大都属于共同地域，但由历史或移民原因而出现破碎的分布区，甚至离开其起源地区。例如世界有名的经常四处漂泊的吉卜赛人，1975年统计有900万，约2/3分布在东欧，其余散居世界各地。据研究，其祖先于公元前2至公元前3世纪生活于印度中部，为多姆族。后来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在印度动乱情况下，就流亡他乡，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形成目前极端分散情况。尽管分散，但仍保留着原来习俗。

共同语言，这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由于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共同生活必然相互交往，语言是交换思想意识最基本的工具。而且共同语言一旦形成，就会通过家庭和社会，从孩童阶段呀呀习语时就传递下去。但是，一个民族在特殊情况下，亦会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例如犹太人，原操希伯来语。其原居住地位于巴勒斯坦。由于公元2世纪时，反对罗马人统治举行起义失败被驱赶出巴勒斯坦，流散于欧洲及世界各地。当其居住于世界各地时，尽管宗教仪式中仍使用希伯来语，但日常生活逐渐使用当地语言。在二战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时，从世界各地返回的犹太人，分别操不同语言。

一个民族也有因语言的分化及其他原因而分为两个民族。例如，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原来都属于7世纪时从德国东部易北河地区南迁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南支。后来，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逐渐分化，西部居民用的语言形成克罗地亚语，东部居民用的语言成为塞尔维亚语。由于语言的分化，加上一些其他原因，遂使原属一个民族分成两个民族。

共同经济生活是指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在民族的共同地域内，各地区的经济的发展水平、生产特点不尽相同。为了互通有无，满足整体的需求，必然形成各地区间的相互依存，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联系。在这里往往有一个经济的核心地区，它大多也是该民族的起源地或中心。有了这个经济核心区，才便于各方的经济联系，促使经济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上，这个经济核心区由于经济发达，人口集中，就会逐渐发展成为该民族的领导机构所在地。该地的经济力量对领导机构提供支持，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强其经济的核心作用。今天，每个民族在其共同地域之内的核心区总有一个政治地位相称的城市，有的是首都，有的是自治机构，有的是某一级政府……。总之，

它必然是某种能满足该民族经济生活联系中心作用的城市。

共同的心理素质是指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并表现在民族文化特征上的心理状态。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通过该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来，例如建筑的艺术和风格，住宅的安排和使用，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戏曲、饮食、服饰的特点，以及社会风尚、节日和民族传统等既是民族的心理状态，也是民族的性格、情操和风尚。总之，这些不能脱离民族文化而存在。民族内的任何一个人，受其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与生活方式，并关切本民族存在与发展。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特别是当受到其他民族的压迫、歧视与各种不平等对待，以及关系到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它会爆发一种伟大的力量。上述的犹太民族与吉卜赛民族，他们失去了共同地域，在分散活动也无法保持其共同语言与经济生活时，却依靠共同心理素质中的宗教与风俗习惯，继续顽强的存在下去。犹太人还终于返回家园，建立以色列。

第三，强调民族的稳定性。民族虽然是历史形成的，但它是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在共同地域中，共同的经济联系下，语言和心理素质是很难改变的。即使采取强迫措施，在逆反心理作用下往往毫无作用。例如日本人在统治朝鲜的几十年中，强迫朝鲜人学日语、说日语，但并未奏效。二战中，日本战败，后退出朝鲜，日语也退出朝鲜。由此可见，民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心理素质属于上层建筑，更富于持续性和稳定性。

2. 民族的起源：民族与国家的起源有些相似，但也有些不同。前者着重强调群体内的人的关系，后者则偏重于其组织形式。当然，这两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毫无关系，而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发展而发展，彼此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的产生和形成的一般规律是由氏族、部落，经过部落联盟发展而成为民族。在人类的初期，人们赤手空拳，过着狩猎与采集的生活。特别是人类与很多动物相比，无论就力量来说，还是就奔跑与攻击来说，都不如动物。为了获取动物与防止动物的攻击，人类只有借助于群体与工具。而使人们能联成一个不大的适合原始生活状态的群体，主要是该群体的血缘关系。这个群体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大虽然集体力量大，但其所需生活空间也要大，太大反而不利于活动与效益；小虽然活动灵活，但太小，集体协作功能发挥不起来，在获得食物中，反而招致动物攻击。

当人类的不断繁衍，人口增加，群体内人口的数量超过其集体规模而产生负效应时，就会分化为另外一个群体。如此分下去就出现血缘相近的许多群体，它们大体在一个地域中生活，就形成了血缘关系为联系的民族。另一方面，群体内的婚姻关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原来是群体或氏族内部的族内婚，后来，发展成为族外婚。由于当时人口密度低，群体少，为了稳定这种族外婚，就使不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即姻缘关系。

另外，随着农牧业发展，物质财富有了剩余，私有观念与私有制开始出现。各部落间为着扩大牧场、农田和掠夺劳动力作奴隶，以及为保护本部落的牧场、农田与人员安全必然发生争斗。为了各部落的自身利益，往往联合血缘与姻缘关系的部落形成部落联盟与其敌手进行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通过胜负，把对手驱走、征服或吞并、消灭。为了生产上的方便及防守的需

要，部落与部落联盟总是以其所在的地理单元为所控制的空间范围。这样，血缘关系作为原始社会与组织的纽带而逐渐让位于地缘关系。但是在地缘范围内，总是以某个或几个血缘氏族部落，由于其人数众多、经济优越、战斗力强等原因，成为该部落联盟的核心，并居于领导地位。

在这个比较完整的地域内，经济上生产的产品相互交换、相互补充，自然会形成一个经济生活共同体。经济生活及其活动的相互交往，使其语言上相互沟通、互相交流，彼此相互吸收其方言与词汇，逐渐融合，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新的共同语言。在经济的影响下，思想意识通过彼此交流，特别是部落联盟的组织及主体的部落宗教信仰、礼仪形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影响，经过较长时期，遂出现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心理素质方面的共同体。由于这几方面的发展，一个在地域、语言、经济和心理素质方面稳定的共同体就出现了。民族也就因此而形成。可见，民族的形成也是血缘向地缘转化，在此过程中，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既是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反映，也是其发展阶段的巩固，并促使其向更高阶段发展。

民族在原始社会经过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原始社会末期而形成。但是，民族也和任何社会历史现象一样，亦随着时间的历程而变化。由于战争、迁移、自然灾害、民族间的通婚、杂居及文化融合等原因，一些旧的民族逐渐或突然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和发展起来。这种由于民族之间各种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民族，其过程与由部落而发展起来的民族过程不同。它是在社会发展的更高水平上，由原来的古老民族经过同化、分化与重新融合而形成的。这是民族形成的另一过程。

该过程形成和发展新的形式大体有两种：

第一种，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同化过程。同化过程大多是由于一个民族因其人口数量多、或因其文化相对比较发达、或因利用政治与军事力量使人数少，或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民族，通过自然的或强制手段而同化于其中。例如，我国的汉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同化了很多少数民族。它在南北朝时，北方就有很多民族混居在一起，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战争等手段而同化到汉族中去。汉族也由于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而获得新的血液，取得新的发展。因此，汉族绝不是一个“纯”的民族，现代的汉族与过去的汉族必然存在着差异。不仅中国汉族如此，世界上大多数人数众多的民族莫不多如此。

第二种，是由几个民族中分化出来的一些成员，在新的历史与环境下，经过融合而形成新的民族。这一形式与前一形式的不同在于前一形式是一个民族消失了，而另一民族则壮大起来。而此一形式，则是几个民族都发生变化，部分或大部改变其民族特点的同时形成新的民族。例如在拉丁美洲，原来的西班牙的殖民地，它一方面吸收当地文化，又与以后大量来自欧洲的各民族的移民混合，相互融合，从而形成新的民族。

3. 民族类型：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民族后，经历过较长时期，民族除去接受新的成员与重新融合外，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具有彼此某些共同的阶段特点。由此可以分出不同类型民族：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

原始民族，是指国家形成以前的民族。因此，原始民族是处于萌芽状态或者形成过程中的民族，通常还保留着部落基础，经济生活残留着原始痕迹，其内部存在着阶级分化，但阶级尚未完全形成。

古代民族，是在原始民族基础上，借国家权力作用而形成的一种较发育的民族。古代民族以其经济社会制度不同，又可分为奴隶制民族和封建制民族。在奴隶制民族中已不存在原始民族那种族内平等或比较平等的关系。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和统治，以及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和暴动是主要矛盾。民族的经济、语言和心理素质都在发展，民族的自我意识还比较弱。在封建制民族中，封建制度已取代奴隶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在缩小，经济的联系与水平都有所发展，从而推动共同语言、共同心理素质的加强，特别是民族整体的自我意识有很大提高。

现代民族，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的。由于民族意识的加强，使得原来由于自然、历史、经济等原因而分割开的民族要求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一些由于封建制度而造成的内部比较松散的民族，也在民族意识的推动下建立集中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被压迫而受别的民族所统治的民族往往通过各种形式取得自治或建立独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资本家和工人，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工人虽然争取一些政治和经济权利，但是，是有限度的。在一些受到国内外的资产阶级严重压制和剥削的国家，改变资本主义或其他剥削制度，实行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在于所有人民不分民族都具有平等权利，并通过发展经济逐步解决其内部各阶层、各地区间的经济收入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新型的民族内部与民族间的关系。

总之，从民族起源和类型来看，民族依时代发展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中，由于制度的不同，各自包括两种。即古代民族包括奴隶制民族和封建制民族；现代民族中，有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原始民族由于在原始社会受血缘、地缘影响而形成，是在国家出现以前，故称为“自然民族”。而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则是在国家出现以后形成的。国家在其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和影响，所以称这两类的民族为“国家民族”。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分类虽然按时间发展阶段与内部制度为依据来进行划分。但是，各民族由于其发展进程和种种原因而存在差异，所以，在目前，有些地区内并存着不同时代、不同制度的民族。例如，在巴西热带雨林的亚马孙河深处，不仅存在着原始民族，甚至还存在着部落社会。以我国解放前为例，在我国后来所确定的各少数民族中，基本上仍然是原始民族的有：佤族、傈僳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布朗族、崩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属于古代民族而实行奴隶制的有彝族，实行封建制的有蒙族、藏族、傣族、苗族和瑶族。

（二）民族与国家

从上述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定义和特点来看，两者是不相同的。国家是一种政治组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具有绝对权威。民族则是一种人的群体，它在居住地域、经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生理素质方面具有共性，并具有内在的团聚力。可以说一是指其政治，另一是指其文化。这是彼此的差异。但是，彼此也有重要的联系。民族形成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国家，国家的出现更加促进了民族，特别是居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发展与巩固。

在世界上的民族，据估计大致为两三千或三四千，有的估计还要多，甚至到五六千、六七千。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一方面是缺乏科学的调查和鉴

定，往往把许多属于民族分支也算作独立的民族，所以就估计偏高了。当然，也有些地方还缺乏了解，有的国家不承认某些民族，使估计也会偏低。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世界上的大小民族有 2000 多个。

虽然每个民族都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但是其数量的差别大得惊人。例如，我国的汉族人口超过 10 亿，而印度安达曼群岛上的安达曼人则只有 24 人（1971 年）。据统计，人口超过 1 亿的民族有 7 个（汉人、印度斯坦人、美利坚人、孟加拉人、俄罗斯人、日本人和巴西人），5 000 万至 1 亿的民族有 10 个；1000 万至 5 000 万人的民族有 52 个，100 万至 1000 万人的民族有 209 个。可是世界上的国家并没有这么多。到 1994 年年底，菲律宾东南面的贝劳加入联合国算起，联合国会员国只有 185 个。这与世界上的民族数相比也是相差太大。

G. 尼尔森（Gunnar Nielesson）1985 年的研究表明了今天国家与种族集团（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当时，他确定全世界有 164 个国家，589 个种族集团。也就是说，种族集团的数目为国家数目的三倍。因此，在其中找到理想的民族国家（即纯粹由一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则是件困难的事。M.M. 米克塞尔（Mikesell，1983 年）研究发现，作为民族国家，实质上只找到一个真正的例子——北大西洋上的岛国——冰岛。至于其他的民族国家，在人口中都有一定程度的混杂，其可靠性值得怀疑。因此，在现实世界政治中，很难按照米克塞尔所定的“文化纯”来确定民族国家。

按尼尔森的定义，我们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指那些国家人口中的百分六十以上来自一个种族集团的国家。这样，在 164 国中，有 107 国是符合这个不太严格的标准。在这 107 个国家中，大体上可以分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那些同一种族集团分处于好几个国家，并居于支配地位。例如，阿拉伯国家就是个很好的实例，由其组成的民族国家就有 17 个。我们可以称此类国家为共民族国家（partnation states）。在阿拉伯国家中，埃及和叙利亚两国是个典型。此外，还有朝鲜和韩国原属一个国家，由于二战后，其北、南两部分分别发展为两个国家。两国都属于同一民族——朝鲜族。共民族国家共有 52 个。

第二种类型，可以称之为单一民族国家（single nation states）。即某个民族只在一个国家内的人口居于支配地位。其中，只有很少数是该种族集团所占比例超过该国人口总数的 95% 以上。这类国家最接近理想的民族国家。日本、孟加拉、德国、波兰、丹麦、希腊是典型实例。但是，更普遍的是某一种族集团在其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未达到单一民族国家的理想程度。这种国家有 32 个。英国、美国、斯里兰卡、津巴布韦和尼加拉瓜都属此类国家。

尼尔森还确定 57 个国家为非民族国家（nonnation states），即在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种族集团的人口数超过该国人口的 60%。这类国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中等非民族国家（intermediate nonnation states）。它指某一种族集团在一国人口中居支配地位，但其所占比例大约为 50%（按尼尔森定义为 40%~60%），属于该类型的有菲律宾、苏丹等国家。根据尼尔森所确定的双民族国家（bination states）是指两个种族集团的总人口占 65% 以上。此类型国家总共有 21 个，其中包括比利时、秘鲁、斐济等。最后剩下的 19 个国家属于尼尔森所指的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s）。这类国家具有多种种族集团，缺乏占优势地位的民族。例如，印

度、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就属多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和非民族国家的地理分布

民族国家				非民族国家		
共民族国家		单一民族国家		中等非民族国家	双民族国家	多民族国家
一种族集团 超过 95 %		一种族集团 在 60 % ~ 94 %				
非洲	7	4	3	9	9	14
美洲	7	6	11	1	5	3
亚洲	22	2	6	6	3	2
欧洲	12	9	9	1	2	0
大洋洲	4	2	3	0	2	0
总计	52	23	32	17	21	19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类型国家在世界各洲的分布情况。在欧洲和美洲这两个古与新的大陆上，单一民族国家最多。在亚洲，共民族国家却最多。它反映了那里的大民族的分裂现象。多民族国家和双民族国家在非洲较普遍，这反映这个大陆在殖民地时期边界划分的随意性。同时，还可以看出，多数洲都包括了几乎所有类型。两个例外是欧洲和大洋洲。大洋洲国家多为岛国。在欧洲，这种例外原因是欧洲在一战后，这类多民族国家解体所造成的。总之，某种形式的民族国家是多数，但是以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理想仍然强烈，尽管在此思想起源地的欧洲也并不占优势。由于这种情况，在非民族国家中，对于民族主义的问题总是比较敏感的。处理不好就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影响，严重的甚至出现动乱、内战和国家的分裂。

国家与民族产生的矛盾大体上有以下一些类型：

第一是多民族国家。一战后，欧洲的奥匈帝国和地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垮台分裂为许多民族国家。在近来，突出的例子则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这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国家。四国虽然都是多民族国家，但前两个的分裂是由于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造成的，后两个则是由于历史的渊源及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所引起的。

第二是跨国民族问题引起的。这方面问题情况亦有些差异。例如塞浦路斯，该国有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两个民族。两个民族历史上矛盾较多，积怨较深。人数居于较少的土耳其族有独立倾向。由于两个民族分别把希腊和土耳其看作是自己的“母国”。其政治活动各自得到希腊与土耳其的支持。当两族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希腊与土耳其两国都不袖手旁观，岛上长期存在希、土两族分裂局面。

库尔德人问题与上述两例亦有不同。库尔德人约有 2500 万，主要居住于土耳其（约 1200 万人）、伊朗（约 550 万人）和伊拉克（约 500 万人）三国接壤处。原属奥斯曼帝国，在帝国垮台后被分别划归三国，并未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库尔德人虽向往建立自己的国家，但遭到三国的反对，不得不为争取自治而展开各种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成为三国国内的严重问题。经过斗争，虽取得不同形式自治，但局势仍不稳定，有时亦暴发严重冲突。

第三是主体民族间的矛盾。在双民族国家中，如果两个民族关系处理不

好，很容易产生分裂与动荡。例如原巴基斯坦和捷克斯洛伐克终于分别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另外，加拿大和斯里兰卡两个国家也存在类似矛盾。加拿大是英、法两国移民后裔建立的国家。全国人口 2650 万，英裔占 40%，法裔占 27%。法裔绝大部分集中居住于魁北克省，占该省居民 80%。在该省，除文化上、语言上与英裔形成明显差异，加上其他问题，魁北克的独立要求时起时伏。斯里兰卡的 1700 多万人口中，僧伽罗和泰米尔两族分别为 74% 和 18%。两族由于语言、宗教不同和历史积怨，彼此对立。在僧伽罗人掌握国家权力情况下，泰米尔人组织武装反对政府，流血冲突已近 20 年，对国家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四是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由于少数民族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小，大多居住在经济、交通、文化不太发达的地区，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缺乏应有地位，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他们缺少发展机会，没有受到公平待遇，甚至遇到歧视。因此，少数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中是较普遍的。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例如，美国有黑人问题，法国有科西嘉问题，英国有威尔士和苏格兰问题。尽管少数民族人口不多，但是处理不好，也会带来严重影响。例如非洲的卢旺达，胡图族占人口 90%，图西族不到 10%，但在 1994 年两个民族的冲突中，死亡人数多达几十万，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第五是土著人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大量向美洲和大洋洲移居。它们以其军事、政治和经济、文化上优势，对当地土著采取屠杀、驱赶、压榨、欺骗等手段，把他们赶到环境恶劣的地方，使其处于几乎绝灭的地步。今天，这些土著居民已认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他们利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其他论坛发出自己的呼声。他们要求保存他们的文化及对其土地和资源的权利，而且要求白人对其目前所处的境遇负责。

（三）民族主义

当民族的发展进入国家出现以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开始日益密切。当国家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为其利益，发动与依靠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的、外族的和不平等的统治，从本民族的、本地区的利益出发，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所以，这时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以所谓的民族利益建立国家来谋求自身利益。

1. 民族主义类型：根据 A. 欧瑞杰 (A. Orridge) 对民族主义的研究 (1981 年)，他把民族主义分成以下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原民族主义 (proto nationalism)。它指原核心国家内的民族。原核心国家就是西欧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其典型是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于 1462 年，开始在法庭上使用英语，不使用法语，接着宫廷中也使用英语。在 1419 年，法国的贞德起来号召人民驱逐入侵法国的英军。这些都标志民族主义的开始兴起。不过当时的爱国主义是忠于国王而不是国家。而后通过人民群众参与的革命，英、法都由封建专制君主进入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和人民共和国。由于是在原来边界比较稳定、文化同质情况下进行的国家变革，所以欧瑞杰称其为原民族国家。当时，虽然“人民”参加政治，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充分发展还是 19 世纪后期的事。所以，国家先于民族，民族先于民族主义。这种情况的国家，除英、法外，还有葡萄牙、瑞典和荷兰，某种程度还包括西班牙。

第二种是统一民族主义 (unification nationalism)。在中欧，当时，由于许多小国及多民族帝国的各种矛盾压力，无法出现像英、法样的大国。

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所在地，则是些独立的小国与大的帝国所属的各省交错在一起。在 1800 年以后，法国拿破仑所发动的战争则打破了 1618 年维斯特法利亚条约以来所形成格局。拿破仑失败后，尽管维也纳会议（1815 年）想恢复旧的欧洲，但新的力量已经起来。民族主义已成为在普鲁士领导下把大部分日耳曼文化区统一成一个新的德国民族国家，意大利从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一个意大利民族国家。这两个国家是统一民族主义的最重要实例。

第三是分离民族主义（separation nationalism）。分离民族主义的成功也就是已存在的主权国家的解体。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初，这种民族主义带来的是由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垮台后独立出来的。这一批新的国家是从希腊（1821 年）开始，而后，从巴尔干半岛到波罗的海出现的国家，它们有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芬兰等国家。这类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从东欧国家独立后停息了很长时期，但是自治的民族主义却在不少国家出现，例如，英国的威尔士、苏格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比利时的瓦隆。这些民族主义可能的发展是在现有国家框架内获得某种政治权利。

近些年来，分离的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后，独立民族主义就突然之间在一些地区蔓延起来。独立民族主义在 1988 年末首先出现于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境内。这是由一个亚美尼亚族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要求合并到与其相近、但地域不相连的同一民族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去引发的。这问题，不仅发展成它与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后来甚至把亚美尼亚也卷了进去。接着 1990 年，沿波罗的海三国中，立陶宛首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到 1991 年，由于苏联的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结果，在原苏联版图内，出现 15 个独立的民族国家。

在东欧，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和平地一分为二，成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南斯拉夫联邦则在战火中，分出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四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中的波-黑内部又引发了穆族、塞族、克族之间要求分离与统一之间错综的武装冲突，成为二战以来，欧洲出现的一场最严重的、规模最大的战争。原来的南斯拉夫成为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组成的新联邦。

第四是解放民族主义（liberation nationalism）。欧洲在向海外进行殖民活动中，大量向国外移民，这在英、西、葡等国最为明显。大量本国居民移居海外的殖民地，母国则在殖民地建立行政机构进行管理。母国对殖民地的经济上的掠夺与控制，政治上的歧视和不平等，激起移民的不满与反抗，最后导致冲突与独立。最早的解放民族主义是北美英国殖民地于 1776 年爆发的独立战争。战争持续了 8 年，于 1783 年获得英国承认。接着是拉丁美洲出现的大革命，也是由移民到当地的欧洲白人反对宗主国的统治的斗争。革命从 1791 年的海地开始，直到 1889 年巴西联邦共和国的建立，经过百年。拉丁美洲除某些岛屿外全部独立，成立民族国家。由于这场革命是受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 1789 年的大革命影响，所以它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性质。这种解放民族主义继续发展，出现两种类型。一种是继美国和拉丁美洲独立以后，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建立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建立过程与前不同，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逐步的、协商过程。另一种则是当地有色人种受白人殖民统治的殖民地起来反对殖民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民

族国家。这种类型主要是在亚、非两洲，其出现的时间较晚，是二战后开始的，到60年代处于高峰，直到1994年南非经过选举，白人政权垮台，以黑人为主体的政权建立，可以说标志着解放民族主义的终结。

第五种为复兴民族主义(renewal nationalism)。在欧洲核心区以外的边缘地区，一些古老文化的地区，它们抵抗欧洲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侵略与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又看到欧洲民族主义在推动发展和统一方面作用。因此，利用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历史和国家遗产以培育自己的民族主义，复兴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这种复兴民族主义既在伊朗、土耳其、印度出现，也在东亚的日本和中国出现。由于日本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加上其本身的特点，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走在前列，在上世纪末已走上复兴道路。而其他则在二战后才开始走上实现其民族复兴之路。

上面列举了这几种民族主义类型，它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它在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实现其民族国家，反对外国势力及复兴自身民族对其民族自身来说是有利的。但是，也应看到，完全从自身民族利益出发，以侵略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来达到其目的，就会走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它不仅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也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招致大祸。二战的历史已说明此点。时代的发展需要新的民族主义，应当是以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为主旨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民族主义。

2.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作用。同时，对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变化、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地理格局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西欧封建社会时期，城市经济经过长期的缓慢的发展形成重要的社会基础。城市经济的发展、海外新航路开拓，为欧洲国内、外贸易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欧洲封建的贵族割据，君主无权，国家处于分散、缺乏统一的状态不利于商业的往来，阻碍经济发展。资产阶级以城市为依托，支持王权，限制和削弱贵族特权，使国家形成统一政权下的国内统一市场。这样，就使国家从封建制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当贵族特权削弱、国王权力大增时，国家又出现资产阶级与国王专制之间斗争。其结果不是取消君主制，实行共和制，就是采用君主立宪制。权力就全部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就是利用民族主义实现其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意图，在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后，就利用国家这个权力来发展民族主义以巩固其政权，甚至对外实行侵略和压迫。

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对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的农民转到城市进入工厂，并过着他们从前未经历过的生活。工业的生产需要有一定文化的劳动力，这就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加速了语言的一致，提高了文化素质。在基础教育中，历史与地理的知识对民族意识的普及起了关键作用。识了字、提高了文化，在印刷技术的发展下，报纸、书籍等印刷品大量出现，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族意识培育有所促进。另外，知识阶层的出现对民族意识的提高与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以上这些方面的作用，民族主义的世俗文化开始出现，并取代了过去在社会中起重要作用的宗教文化。在欧洲，中世纪以来宗教是人们精神世界的主宰，是文化的中心，宗教活动及其学校担负着教育作用，宗教活动的语言(拉丁语)是欧洲的共同语。人们为宗教而进行战争，十字军东征就是

其中一场重要的战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兴起，已取代了过去宗教的地位，使宗教向世俗化发展。这时，欧洲激烈的冲突，不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民族，例如，德国的天主教徒为了民族进攻法国的天主教徒，德国新教徒也是为了民族与英国的新教徒开战。

民族主义在西欧兴起，而后逐渐向外扩散。其原因与经济有重要联系。在中欧，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欧出现不平衡现象，在西欧相邻的地区，资产阶级为避免处于落后地位，失去工业发展的机遇，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群众保护民族利益。例如 1834 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就是民族利益的反映。这需要说服工人由于关税而使食品和日用品价格提高，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为此，要强调民族间的差异，为了民族自身利益形成更广泛的民族联盟向工业发达地区挑战。这种经济上的原因推动德国民族主义意识加强，结果是德国工业化的进程与德国的统一过程是平行发展。

这种民族主义兴起与发展除经济的推动力以外，其空间上的扩散浪潮则同核心和边缘的格局的文化条件有关，其具体形式则与当地的历史条件有关。当时，工业化的发达地区是西欧，民族主义也首先在那里起始。因此，这里是核心地区，是原民族主义的诞生地。

与西欧相邻的是德、意两国，而两国当时都处于分离状态。因此，民族主义是实现国家统一与经济发展的巨大精神武器。它是核心向边缘波及的第一个浪潮，其形式由于其处于分裂状态，而成为“统一民族主义”。其向外扩散的第二个浪潮，则是与德、意相邻的东欧。当时东欧是几个大的君主国，特别是俄、奥，又是多民族的国家，对外实行侵略，对内实行压迫。由于君主势力强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族，只有当这些帝国在战争中，力量大为削弱之机，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因此，其形式为分离民族主义。在空间上，与核心区对照，是欧洲最远的边缘，所以，其民族国家的建立亦晚于德、意。

对于远离欧洲以外的、更远的边缘地区而言，解放民族主义在美洲的出现，不仅要大大早于亚、非的民族主义，也早于欧洲的统一民族主义和分离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洲在地理上与欧洲相隔有大西洋，当时水路交通并不太方便，而且当时的土生白人在文化上接受核心区的原民族主义影响较为直接。因此，在土生白人由于受到不平等对待时，对殖民帝国的母族易产生对立情绪，迫切要求实行独立。大洋隔离，地域辽阔，使殖民帝国军事行动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欧洲的事务牵制，就给当地创造了有利条件。结果，美洲虽处于边缘地区，而其解放民族主义则先行一步。这一点与处于同样是边缘地位的亚、非两洲大不相同。这两地民族主义兴起与民族国家建立只能推迟。与非洲相比，亚洲的文化条件与封建制国家基础都比较好，所以民族主义推动的民族运动亦比非洲早，其形式为复兴民族主义。它在一战时即已出现。而非洲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在二战后才兴起。虽然它出现得晚，但发展迅猛。到 1994 年南非以黑人为主的政权建立，标志着不到半个世纪就完成了解放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立的总过程。

第三章 国家的空间特征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区域，它有许多特征，但从空间角度来看，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拥有固定的领土，位于地图上（或地球表面）某一特定的位置。因此，研究国家的空间特征，必须从领土开始。

一、领土

（一）领土的范围

任何国家必须有一定的领土，离开领土，国家就不复存在。国家的领土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组成，它包括疆界以内的陆地、水域和水域的底土以及陆地和水域的上空，即领陆、领水和领空。

领陆，国家领土首先是由其疆界以内的陆地组成，这就是领陆。领陆是国家领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领水和领空都附着于领陆。

领水，是指位于陆地疆界以内（内水）或与陆地疆界邻接的一定宽度的水域（领海）。内水包括国家境内的河流、湖泊、运河、内海和历史性海湾的水域。领海是指沿着国家的海岸、受国家主权支配和管辖下的一定宽度的海域。虽然关于海域的宽度目前尚有争论，但大多数国家都同意领海宽度为12n mile。

领空，领空包括国家的陆地和领水之上的全部上空。关于领空的高度迄今为止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国际法既规定各国对其大气空间拥有主权，又宣布宇宙空间对于各国研究和利用都是开放的。因此，领空的高度由大气空间和宇宙空间的分界线来决定。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国家的领空愈来愈显得重要。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领土的范围也就是国家主权实施的范围。关于领土范围的争论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实施的范围。

（二）领土的大小

国家领土除了范围不同以外，还存在着不同的空间形态。国家领土最重要的空间形态是领土面积的大小和形状。综观世界政区图，各个国家的领土面积大小和领土形状是很不相同的。先就领土面积的大小而言，世界上有领土面积非常大的国家，如

俄罗斯	17075400km ²
加拿大	9956709km ²
中国	9600000km ²
美国	9363123km ²
巴西	8511965km ²
澳大利亚	7682300km ²

也有领土面积非常小的国家，如

列支敦士登	160km ²
圣马力诺	60.57km ²
托克劳群岛	10km ²
摩纳哥	1.89km ²
梵蒂冈	0.44km ²

有的地理学家甚至按照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对国家进行分类，如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德布列杰根据领土的大小对当今世界上的国家作了如下分类：

极大国	如加拿大
大国	如法国、墨西哥
中等国	如英国、波兰
小国	如爱尔兰、利比亚
极小国	如布隆迪、黎巴嫩

还有的地理学家依据领土的大小，把国家分成：大尺度国家(面积约 $9 \times 10^6 \text{km}^2$)

	如中国、巴西、美国、加拿大
中尺度国家(面积约 $3 \times 10^6 \text{km}^2$)	如哈萨克斯坦、阿根廷
小尺度国家如	英国(约 $2.5 \times 10^5 \text{km}^2$)、 荷兰(约 $4.1 \times 10^4 \text{km}^2$)

这种分类标准是很模糊的，分类本身也不能说明什么实质性问题，它只告诉人们世界上的国家领土的大小差别是非常大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国家的领土越大越好。大国可能比小国有更广阔的空间去开发和利用，但如管理不善，也会引起许多麻烦。一些小国，如瑞士、瑞典等由于组织得当，现在和美国等国一样，是世界著名的工业化国家。

(三) 领土的形状

和领土的大小一样，世界各国的形状也是非常不同的，地理学家们曾对国家的形状作过多种分类，归纳起来，共有如下几种(图3—1)：

图 3-1 国家的形状示意

(资料来源：Glassner MI, de Blij H 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78)

1. 狭长型或细长型的国家：如挪威、瑞典、意大利、冈比亚、马拉维、多哥、智利、巴拿马、越南等。

狭长型国家由于地区之间差异比较大，给地区之间的联系与政府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容易导致地方主义。如在智利，至少有三个明显的环境区，北部是阿塔卡马沙漠，中部是地中海气候，南部则是海洋性气候。大部分居民居住在中部，南北环境相差非常大，这使得智利政府在制定工农业政策时必须兼顾这三个环境大不相同的地区。

2. 密集型或紧凑型：如乌拉圭、比利时、波兰、苏丹、柬埔寨、肯尼亚等。

这些国家往往介于周围其他国家之间，形状似圆形或矩形。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国土中心到边界的距离相差不大，没有岛屿、半岛和海湾，管理和控制比较容易。

3. 蝌蚪型国家：如泰国、扎伊尔、南非、缅甸等。

这类国家虽然也很紧凑，但在国土的一端有一突出的部分或走廊远离国土中心。如扎伊尔，有两个突出部分：一是西部，是首都金沙萨所在地，也

Glassner MI, De Blij, H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HJ 德伯里. 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是通向大西洋的走廊；二是东南部沙巴区，是国民生产重要的省份所在地。中部刚果盆地把二者分割开来。这给管理上造成许多困难。

4. 松散型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

这类国家的特点是，国家领土包括两个或多个单独的部分，这些部分被陆地或被国际水域间隔，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水路或航空。这类国家又有三种情况：第一是国家领土全部位于岛上，如日本、菲律宾。在日本，首都位于最大岛本州，在菲律宾，首都位于最大岛吕宋岛。第二是领土部分在大陆，部分在岛屿上，如意大利（主要在亚平宁半岛，也包括地中海中部的西西里岛和撒丁岛），马来西亚（主要在马来半岛上，也包括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捞越和沙巴）。第三是领土陆地被其他国家领土分割，如美国阿拉斯加和美国本土被加拿大所分隔。

松散型国家由于空间距离大而带来诸如交通联系、政府控制等的不便，例如，在菲律宾，政府对付西南和乐岛（苏禄省）的骚乱有诸多不便。

5. 穿孔型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比较特殊，是指一个国家领土完全包围着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如莱索托完全被南非包围，圣马力诺被意大利包围。

6. 飞地（exclave）：飞地是指某国领土的某一部分四周全被邻国领土所包围，但主权仍为其国所有。这种情况在中欧尤为突出，如西班牙在法国境内的利维亚（Livia），瑞士在意大利境内的堪培尼（Campione），德国在瑞士境内的比辛根（Busingen），比利时在荷兰境内的巴勒 赫尔托霍村（Barle Her-tog），比利时在德国境内以及德国在比利时境内的铁路区。

尽管飞地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大，但由于管理上的不方便以及特殊性，如生活在这类地区的人们通常独立于附近的市場，供应和就业就成了问题，这就给无论是飞地所属的国家还是东道主国家造成了诸多不便，容易影响两国正常的国际关系。

（四）领土的位置（内陆国）

国家的空间形态不仅指国家的形状和面积大小，而且也指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区域在地球表面上的位置。位置在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亚于形状和大小。例如，新加坡处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为其发展旅游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波兰曾位于苏联和德国之间，所以长时充当缓冲国的角色。在当代，由位置而导致的两国之间摩擦主要发生在内陆国和沿海国之间。

1. 内陆国的分布状况：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有许多国家的海岸线很长，如中国、美国、阿根廷等，这为这些国家与外界交往提供了便利的水上通道。还有一些国家，如扎伊尔、约旦、伊拉克等，虽然海岸线较短，但毕竟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港口，出海条件虽然比不上那些海岸线长的国家，但出海口是在自己领土范围之内。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没有海岸线，地处内陆，它们的海上贸易需要经过其他国家的领土，这就容易导致这些国家和过境国家的政治纠纷。

现在，世界上共有 40 多个内陆国家，这些国家的分布状况如表 3—1。

表 3—1 内陆国及其周围邻国

洲别	国家	周围邻国	邻国数目
亚	老挝	缅甸、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	5
	阿富汗	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巴基斯坦	6
	锡金	尼泊尔、中国、不丹、印度	4
	不丹	中国、印度、锡金	3
	尼泊尔	印度、中国、锡金	3
	蒙古	俄罗斯、中国	2
	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5
	塔吉克斯坦	阿富汗、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4
	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4
	乌兹别克斯坦	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5
洲	土库曼斯坦	伊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	4
	亚美尼亚	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伊朗	4
	阿塞拜疆	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伊朗	5
	奥地利	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瑞士、列支敦士登	8
	捷克	波兰、斯洛伐克、奥地利、德国	4
	斯洛伐克	捷克、波兰、乌克兰、匈牙利、奥地利	5
	瑞士	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列支敦士登	5
	匈牙利	斯洛伐克、乌克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奥地利	7
	马其顿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阿尔巴尼亚	4
	卢森堡	比利时、法国、德国	3
洲	安道尔	西班牙、法国	2
	列支敦士登	瑞士、奥地利	2
	圣马力诺	意大利	1
	梵蒂冈	意大利	1
	白俄罗斯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	5
	玻利维亚	秘鲁、巴西、巴拉圭、阿根廷、智利	5
南美洲	巴拉圭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	3
	马里	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纳米比亚	7
	尼日尔	马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乍得、尼日利亚、贝宁、布基纳法索	7
非	赞比亚	安哥拉、扎伊尔、坦桑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	8
	布基纳法索	马里、尼日尔、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	6
	中非	喀麦隆、乍得、苏丹、扎伊尔、刚果	5
	乍得	尼日尔、利比亚、苏丹、中非、喀麦隆、尼日利亚	6

洲别	国家	周围邻国	邻国数日
非 洲	乌干达	肯尼亚、苏丹、扎伊尔、卢旺达、坦桑尼亚	5
	卢旺达	扎伊尔、乌干达、坦桑尼亚、布隆迪	4
	津巴布韦	博茨瓦纳、赞比亚、莫桑比克、南非	4
	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南非、赞比亚	4
	布隆迪	扎伊尔、卢旺达、坦桑尼亚	3
	马拉维	赞比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	3
	斯威士兰	南非、莫桑比克	2
	莱索托	南非	1
	埃塞俄比亚	苏丹、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	5

在这些内陆国家中，除了欧洲的国家较富裕一些外，其余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其中 15 个国家包括在联合国公布的 29 个发展最慢的贫困国家之中。

2. 内陆国的基本特征：与沿海国相比，内陆国主要有两个共同特征：

(1) 内陆国由于地处内陆，经济和贸易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经济发展对邻国的依赖性比较强，特别是邻国的关税政策对这些内陆国有直接影响。因此，争取出海权和过境自由是所有内陆国关心的问题。

(2) 在政治和军事上，大部分内陆国都比较弱，有一些国家还起缓冲作用。

3. 内陆国的出海权和过境权：出海权和过境自由一直是内陆国关心的问题，也是国际法中不断争论的问题。

在 19 世纪以前，无论是对海洋，还是对陆地，都没有关于“无害通过的权利”，一国只要通过另一国领土运输或运送货物，就必须交过境费。过境自由和出海权问题一直到 19 世纪才首先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其“四十四点方案”中提出，该方案指出，为了欧洲的和平，战后在塞尔维亚（南斯拉夫一地区）和波兰有“出海自由和安全”。同时国际联盟也把“过境自由”作为世界性目标。在 1921 年召开的巴塞罗那会议上，这一问题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被提出来。

二战后，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过境自由与出海权的呼声越来越高，1956 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在讨论内陆成员国（阿富汗、尼泊尔、老挝）的问题时曾建议，对于这些内陆国，有过境自由的必要，以便促进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1958 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五次会议正式讨论了内陆国出海问题，1964 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讨论并通过了内陆国出海的八条原则，并讨论了一系列非洲、亚洲以及南美洲一些内陆国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对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和过境自由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第一百二十五条）：

(1) 内陆国有权出入海洋，并为此享有利用一切运输工具通过过境国的过境自由。“为行使本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包括行使与公海自由和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有关的权利的目的，内陆国应有权出入海洋。为此目的，内陆国应享有利用一切运输工具通过过境国领土的过境自由。”

(2)“行使过境自由的条件和方式,应由内陆国和有关过境国通过双边、分区域或区域协定予以议定。”

(3)“过境国有对其领土行使完全主权时,应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本部分为内陆国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便利绝不侵害其合法利益。”

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内陆国和过境国已逐渐达成协议,为内陆国的出海和过境自由提供方便。内陆国或者通过过境国允许的河流或者通过过境国提供的走廊出海。例如,通过可航行的河流为内陆国提供出海便利的:在欧洲,多瑙河为奥地利、匈牙利两个内陆国出海提供了方便;在南美洲,巴拉那河为内陆国巴拉圭出海提供了方便;在非洲,希雷河为内陆国马拉维出海提供了方便。

当然,这些事例并不能证明内陆国和过境国之间不存在任何争端。由于特殊的双边关系,某些国家对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和过境自由持保留态度,如巴基斯坦坚持只能规定内陆国有过境“自由”,而不同意有过境“权利”,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秘鲁主张内陆国过境应在对等互惠基础上达成协议。对此,尼泊尔和乌干达表示强烈反对。直到最近,贸易和过境问题还是局部地区发生政治摩擦的直接原因。

尼泊尔是一个内陆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印度提供过境运输,并希望从印度进口商品。为此,两国于1950年7月31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和《贸易和商务条约》。尼泊尔长期要求印度向其提供过境运输的自由,但一直遭到印度的拒绝。1976年,尼方根据国际法,提出将过境和贸易分开,1978年,印度政府同意了尼方的要求,并于3月17日分别签署了贸易条约和过境条约。过境条约规定印度在印尼边界线上向尼提供15个过境点。

4. 内陆国的发展战略:尽管大部分内陆国是经济上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内陆国比起沿海国来在经济发展中有许多不便,但大部分内陆国依然提出许多发展战略,并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初步成效。根据著名政治地理学家M.I.格拉斯奈尔和H.J.德布列杰的研究,内陆国家主要实施了如下发展战略:

第一,注重国内发展。许多内陆国家特别注重国内经济和交通运输,以此来减小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

第二,加强双边谈判。注重国内发展并不意味着内陆国家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相邻国家来往。恰恰相反,许多内陆国家在注重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通过谈判来增进其和过境国的关系,借以提高过境贸易。当然双边谈判也会由于种种政治或其他原因而存在障碍,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曾在1950年、1956年以及1961—1963年三度关闭。

第三,寻找新的过境线。部分内陆国家在发展国内交通运输的同时,为了摆脱某一过境国对其经济和政治的控制,不惜耗资寻找新的过境路线。如赞比亚,在其南津巴布韦1965年独立后,便耗巨资修了一条通过坦桑尼亚的过境线。阿富汗把其大部分过境贸易通过线从巴基斯坦转向北部。卢旺达现在通常使用其通过乌干达和肯尼亚的过境线而不像以前使用通过扎伊尔的过

法学教材编辑部.国际法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法学教材编辑部.国际法资料选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

(Glassner M.I.deBlij H.J.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394~

境线。过境线的选择和改变既反映了内陆国独立发展的决心，也反映了它和过境国的关系。

第四，倡导地区经济联合。这是内陆国家又一发展战略。随着地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发展，许多内陆国家都认识到，不加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快速发展本国经济也是不可能的。相反，加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行列，实行共同的关税、免除进口特许证和限额这些地区经济联合体所采取的措施，既可使内陆国免除其由于地理位置带来的不便，也可以减少或避免由于过境贸易和过境国发生的政治摩擦。例如，世界上首次重大的地区合作就是欧洲内陆国卢森堡和荷兰、比利时之间的合作。人称“荷比卢联盟”。这三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荷兰的农产品销往比利时，而比利时的工业品也运销荷兰和卢森堡。“荷比卢联盟”的成立使卢森堡这个内陆国受益匪浅，既发展了经济，又减少了和荷兰、比利时的政治边界摩擦；乌干达是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和东非共同事务组织（East African Common Services Organization）的成员国；布隆迪、中非、乍得、卢旺达则是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

第五，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除了注重地区合作以外，内陆国家还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扩大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国际社会也尽力帮助内陆国家。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亚洲发展银行等都在很多方面给予内陆国以很大的帮助。1976年12月，联合国大会还建立了联合国内陆发展国家专门基金会（United Nations Special Fund for Land - locked Developing Countries），联合国第三次海洋会议对内陆国的出海权和过境自由也给予了法律规定。这些都为内陆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领土的变更

国家必须拥有领土，国家的领土可以变化，但国家的领土只有在严格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才能变更，否则就是侵犯国家的主权。根据国际法，国家领土的变更大致有如下几种方式：

1. 占领（occupation）：按照国际法，占领是一个国家的占取行为，通过这种行为，该国有意识地取得当时不在其他国家主权之下的土地的主权。占领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占领的客体只限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即无主土地，这种土地或者是完全无人居住，或者虽有土著居住，但该土著社会不被认为是一个国家。但公海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成为占领的客体。第二，占领必须是一种国家行为，即为国家实行的，或在实行后由国家予以承认。也就是说，国家在占领该土地后，必须在该土地上具有某种行政权，这种占领通常被称作是有效占领。如当英国等国宣布南极的部分地区为自己领土时，美国曾声明，任何对南极“无主地”的发现，如没有名符其实的定居人口，就不能有主权要求。

2. 时效（prescription）：时效是指在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对于某一块土地连续地和不受干扰地行使主权，以致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造成一种一般信念，认为事物现状是符合国际秩序的，因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1928年美国与荷兰关于帕尔玛斯岛案常被当作时效的一个例子）。

时效与占领不同之处在于，占领是占有无主之地，而时效则是非法占有他国的领土。实际上，时效这种方式是较为模糊的。“足够长的一个时期内”是一个无确定时限的年限。如国际法院在 1959 年关于荷兰和比利时边境土地案中认为，虽然荷兰对应属于比利时的边境土地不受干扰地进行了 50 多年的占领，但仍然不能取得对该土地的主权。又如，如果一个错划的疆界线将一块土地错误地划给了一国，并且长时间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当受损的国家后来提出抗议并要求重新划界时，那种认为符合国际秩序的现状的信念也是会产生的。

3. 添附 (accretion) : 添附是指由于新土地形成而使土地增加的情形。添附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自然作用而形成的新土地，如涨滩和三角洲，新生岛屿和废河床，这些均使一国领土基线外移，从而扩大一国领土；一是由于人为作用而造成土地增加，即沿着河流或沿着海岸线而建筑的堤堰、防波堤、围堤等。这里应注意，如果在界河一方筑堤而影响界河原来的分界线，则是不合法的。1805 年发生的安娜号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英国与西班牙战争中，英国在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抓获了西班牙船安娜号，当该案提到英国法庭时，美国认为该船系在美国的领海内抓到的，要求释放该船，其理由是：捉拿虽然发生在距密西西比河口海岸 3 海里以外，但处于距一些由漂流入海的泥土和木材所造成的小泥岛的 3 海里以内，而这些岛是美国海岸的添附，因而属于美国领海。英国最后同意美国提出的理由，释放了西班牙船只。

4. 割让 (cession) : 割让是由领土所有国根据条约将其领土转移给另一个国家。实行割让的唯一形式是让与国和取得国以条约形式达成协议。这种协议可以是和平谈判非强制性的结果，也可以是战争的、强制性的结果。非强制性的形式多种多样。有赠予或自愿合并的，如奥地利在 1866 年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战争中，将威尼斯作为赠品割让给法国，几个星期之后，法国又将威尼斯割让给意大利。牟罗兹自由城在 1798 年合并于法国，刚果自由邦在 1908 年合并于比利时。有出卖的，如 1803 年法国拿破仑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67 年俄国把美洲的阿拉斯加领土以 720 万美元卖给美国，1899 年，西班牙将加罗林群岛以 25 万比塞卖给德国，1916 年，丹麦将它在西印度群岛中的圣汤姆斯、圣约翰和圣克罗亚等岛以 2500 万美元卖给美国；有抵押和租借的，如 1768 年，热那亚共和国将科西嘉抵押给法国，1803 年，瑞典将维斯玛城抵押给梅克伦堡。1898 年，中国被迫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广州湾租借给法国，旅顺租借给俄国。

强制性割让一般是战争的结果，而且是无代价的领土转移，如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中国将辽东半岛及所属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5. 征服 (conquest) : 征服是指在战时以军事力量占有敌国的领土。征服作为一种取得领土的方式有如下两个条件：第一，征服本身并不一定获得被征服者的领土，只有征服之后继而使敌国灭亡，征服才是取得领土的一种方式；第二，征服虽和割让一样也以强力兼并他国领土，所不同的是，征服并不缔结条约，一旦战争之后缔结条约，征服就变成割让。

自从反对武力征服以来，征服已不再是取得领土的合法方式，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得使用武力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如 1967 年，以色列曾以武力侵占了大片阿拉伯领土，联合国曾召开大会，明确宣布以色列改变东耶路撒冷的地位是无效的。国际社会也强烈谴责以色列以武力占领阿拉伯

领土。1990年，伊拉克企图以武力吞并科威特，把科威特变成其一个省，遭到联合国安理会和许多国家的谴责，在伊拉克拒不执行安理会令其从科威特撤军的决议后，终于爆发了著名的海湾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最终以武力将伊拉克从科威特领土上赶走，恢复了科威特的主权。这些事例说明，以武力征服其他国家的领土已不再是合法的形式。

6. 公民投票：以上五种方式是传统的国际法规定的领土变更的方式。近几十年来，由于民族自决原则被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于是，国际法中出现了一种新的领土变更的方式，这就是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是指由居民以投票方式决定土地的归属，即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民族分离与否和民族国家独立与否，或决定一国的某一部分领土转让给另一国与否等的问题。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1918年德国战败后，萨尔煤矿的拥有权归法国，一直到1935年，根据当地居民的自愿表决才又回归德国；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占领了原属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在两地举行公民投票后，两地分别并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1945年6月29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了关于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的条约，该地在举行公民投票后并入乌克兰；1961年，前英属喀麦隆举行公民投票，北部地区居民主张并入尼日利亚，南部地区居民则主张并入喀麦隆共和国；1961年，西萨摩亚的居民进行公民投票，宣布独立；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居民进行公民投票，宣布独立。

公民投票的本质在于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决定本民族的归属以及国家领土的命运。因此，公民投票应保证该领土上居民投票的方式是充分自由的，在任何以武力或压力威胁之下进行投票，都是无效的。

以上只是列举了国际法中关于领土变更的方式的一般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领土可以根据这几种方式随意变动。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其根本前提就是保证领土完整。国家领土不可侵犯原则是国家领土完整的保证。《联合国宪章》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和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时又指出：“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

当然，国家的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并不排除和平的领土变更的可能性，它只是强调不容许强制性兼并。如领土的变更完全是按照民族自决原则进行的，那是无可非议的。

（六）特殊领土

从理论上讲，每一国家的领土都应该在其主权管辖之下，在同一领土上只能存在一个完全主权国家，而两个或两个以上完全主权国家是不能存在于同一领土上的。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现实的国际政治地图中，也出现了种种主权和主权管辖的领土不相一致的特例。这主要有如下几种：

1. 中间性领土：虽然从理论上讲主权和版图是统一的，但在现实政治地图中，却存在着种种例外，如有些有版图的国家不能独立地行使其主权，而有些国家的主权在本国版图上不能顺利地行使。这类主权和领土不能完全统一的特例，主要有如下四类：被分裂的国家，这主要有二战后的德国、朝鲜。在这些被分裂的国家中，有的分裂之后又统一了，如德国曾被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被分裂成的两国不但在经济上悬殊很大，而且在意识形态、政

治制度上迥然不同，但两国在 1990 年又统一成一个主权国家；有的国家正在寻求统一，如韩国和朝鲜。某些国家虽然有领土和主权，但没有能力独立地行使主权。如安道尔就是由法国和西班牙联合实行外交、国防和司法权。这与殖民地不同，因为安道尔被国际上承认为一个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一个国家实际上行使了在法律上属于别的国家的主权。如土耳其的塞浦路斯岛从 1878—1919 年由英国管理。一国将一块领土永远让与另一个国家使用、占领和控制，而让与国对该领土不能行使任何主权。如巴拿马于 1903 年以这种方式将 10 英里宽的长条形领土转移给美国，以之作为建筑、管理和保卫巴拿马运河之用。

2. 共管领土和中立地区：这类地区的特征是，它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同管理，主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关的国家共同行使。如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就是如此，按照英法 1906、1919、1922 年订的协约，该地区由英国和法国派出的一些高级官员共同管理，直到 1975 年选出国会，1977 年选出总统代替高级长官，1980 年作出独立计划为止。苏丹在 1898 年以后是在英国和埃及共管之下，坎顿岛和恩德贝里岛 1939 年以后是在英国和美国“共同控制”之下。

除了共管领土以外，在世界政治地图上曾存在着中立区，其主权也是由两国行使，如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之间过去有一条中立地带，在这个地区不驻军队，实行联合主权，而石油开采权让给各自的石油公司。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的迪拜酋长国和阿布扎比酋长国之间就有一条 1km 宽、18km 长的中立区。

3. 国际区域：在当代世界政治地图上，还有一些领土是处于国际监督和控制之下。一种是国际联盟委任制和联合国托管制体系中的那部分领土。如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原来是德国殖民地，一战后由国际联盟委任给南非管理，二战以后，南非借口国际联盟已不复存在而拒绝继续承认国际联盟曾委任其帮助西南非洲独立的任务，试图吞并西南非洲，并在这一地区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和其他法律，联合国在劝阻无效后，于 1966 年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控制这一地区，并决定将其名称改为纳米比亚，但南非仍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后来西南非洲的绝大部分领土处于联合国控制之下。1990 年 3 月 21 日始正式独立。另一种是联合国在太平洋的托管地。二战之后，日本被迫终止其对太平洋的部分岛屿、前德国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它们被当作战略区由联合国托管给美国进行管理，这些岛屿有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其中北马里亚纳于 1976 年通过公民投票加入美国的联邦，其余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一样，正逐渐获得自治权。

再一类国际区域是自由港、自由城市。自由港（free port）指不属于任何一国海关管辖的海港地区。自由港又分完全自由港和有限自由港。完全自由港不属于海关管制区的范围，一切外国货物可以免征关税进出港口，在港内进行储存、重新包装或其他作业，不受海关监督。有限自由港对少数指定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或实施不同程度的贸易管制，其他商品则享受免税待遇。如但泽、丹吉尔、香港等。但泽是第一个自由港，从 1919 年到 1939 年一直是一个国际区域。丹吉尔市从 1923 年到 1956 年并入摩洛哥前，一直是由国际管辖的，当然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管理的。

4. 争议区域：在世界政治地图上，争议区域是没有定论的或法律上没有归属的领土。争议地区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由于两国都在争夺并经常发生

战争的地区，如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就是如此。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归属是阿拉伯国和以色列冲突的关键。1947年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成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即巴勒斯坦），并对两国的领土作了具体规定，但以色列分别于1948年、1949年超过了联合国所规定的界线占领了加沙地带，1967年6月又占领了约旦河西岸的许多土地，鉴于以色列的行径，1982年以前，阿拉伯国家对以实行不承认、不谈判、不接触政策。1982年以后，阿拉伯国家改变了态度，阿拉伯国家可以和以色列和平共存，但以色列必须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阿拉伯国领土（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地带）全部撤出，而以色列国内对阿拉伯国家方面的建议有分歧。关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归属，现由巴以通过谈判逐步解决。

另一个被争夺的地区是南极地区。关于南极地区的归属问题，不是涉及一两国的利益，而是涉及到世界多国的利益，这一地区也是地球表面上唯一没有被分割的国际区域。

二、首都和核心区

在国家的空间结构中，首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政府和权力的所在地，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人们通常用首都来代表国家，如人们常说北京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

（一）首都的功能

首都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它的首要功能是行政管理职能。一般来说，首都是一国政治管辖权集中的地方，是中央政府或中央行政机构的所在地，是国家行政系统的中心。首都通常是国会（在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在地）所在地、国家首脑人物居住地、政府各部门以及外国使馆所在地。首都通常是国家行政决策的中心，对整个国家的版图进行行政上的管理。国家的首都通常是一个，但也有例外，如荷兰皇家首都在阿姆斯特丹，而中央政府在海牙；在南非，比勒陀利亚是行政首都，而立法机关设在开普敦，司法机关在布隆方丹。

首都的经济职能虽然不像其行政职能那样明显，但在某些国家仍然显得特别重要。如西非沿海12国，其首都首先是国际贸易中心，而不是行政管理和文化中心。这些国家首都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位于大西洋沿岸，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这些首都成为国际贸易（主要是海上贸易）中心。首都的经济职能在古代乃至近代都比较明显，如伦敦就是由于其经济繁荣才成为首都的。但在当代，许多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往往把经济中心和首都分开。现在世界上已有19个国家的首都不是首位城市，如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上海是首位城市；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而纽约是首位城市；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堪培拉，而悉尼是首位城市等。

（二）影响首都定位的因素

综观世界各国首都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首都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如伦敦在公元1世纪罗马统治时期只是一个贸易中心，而不是首都，只是到了1066年诺曼底人入侵以后才成为行政中心；日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首都一直是京都，只是后来才迁都于江户（即东京）；巴西于1960年决定将首都从里约热内卢迁往巴西利亚；而

巴基斯坦则用伊斯兰堡这个内陆城市代替地处优越地理位置的卡拉奇。尽管各国的历史发展状况不同，但在首都定位时，一般都考虑如下几个共同的因素：

1. 自然地理条件：在科学技术、通讯设备不发达的古代，首都的选择受自然地理条件限制比较突出。古代的首都或者选在版图的中心，或选在地表条件较好的平原或港口。如《吕氏春秋·慎势》中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即古代帝国，都把首都置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心。《管子·乘马》也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田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即建立首都都要建在广阔的平原之上，建在地势高处必须考虑用水是否充足，建在地势低处要考虑排水是否便利。到了近代，虽然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在选择首都地址的问题上，许多国家仍然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如交通是否便利，供水是否充足，资源是否丰富。如日本原来的首都京都，是日本著名的文化、游览和工业城市，但由于京都地处内陆，虽然铁路运输比较发达，但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海上贸易国家就不太合适，所以，19世纪中叶，日本将首都从京都迁至东京。东京背靠关东平原，又濒临东京湾，这种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东京一跃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英国地理学家 V. Cornish 在其 1923 年出版的《大国都》中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之后认为，大凡建都，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的需要；二是叉道（crossways），即首都应处在交通要道，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即首都所在的位置应便于防守。他认为，“第一个是原始的、基本的特征，第二个和第三个特征都依赖于第一个特征。”

自然地理条件是选择首都不可忽视的因素，有些国家的首都就曾因自然灾害而被迫迁移，如伯利兹（英属洪都拉斯），1961 年 10 月遭飓风，洪水摧毁全城 85% 的建筑物，于是将政治中心迁到内陆的贝尔莫潘，1981 年独立时宣布为首都，全市居民约只有 6000 人。

2. 政治因素：首都作为国家的行政中心，首先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首都的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当然，政治因素对首都的影响的具体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国家有几个实力相当的城市，为了避免偏见产生，政府于是选择另外的城市作为首都，可以说，这样的首都是政治平衡的结果。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例。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悉尼是两个实力相当的城市，墨尔本人口 283 万，1951 年近郊发现金矿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贸易、交通的中心，1901—1927 年曾成为澳大利亚首都。悉尼人口 331 万，是全国最大的海港和最大的经济、交通、贸易中心。澳大利亚国会在选择首都时要求至少距悉尼 100km，于是在 1911 年把堪培拉作为首都的计划提出来，但这个计划被 1914—1918 年的战争延缓，一直到 1927 年，这个城市才成为澳大利亚的首都。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堪培拉并不是港口城市，交通地理位置远比不上悉尼和墨尔本，人口只有 25 万，它作为首都只是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妥协的结果。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加拿大，魁北克市作为内河和海运的交点，地理位置优越，曾经是加拿大的首都。但魁北克省居民主要讲法语，而加拿大大部分居民操英语，1867 年，加拿大成为英国自治

领后，在首都的定位上一直在魁北克和多伦多之间选择。两个城市实力相当，多伦多人口为 59 万，魁北克人口为 17 万，都是主要港口城市。所不同的是，多伦多居民讲英语，魁北克居民操法语，由于难于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最后国会选择渥太华为首都，当时渥太华不过是一个小城。

有些国家由于政治分裂而分设首都，如二战后的德国便是如此，在它分裂为东、西两个德国后，东德选择东柏林为首都，西德选择波恩为首都，这些虽然在 1990 年东、西德统一后成为历史，但仍不失为政治因素影响首都定位的例子。朝鲜旧都原为汉城。朝鲜分裂之后，1948 年 8 月，南朝鲜称韩国，以汉城为行政中心，同年 9 月，北部称朝鲜，它以平壤为首都。

有些国家通过迁都使全社会对某些地区关注。如巴基斯坦 1961 年把首都从海港城市卡拉奇迁往内地伊斯兰堡，使首都靠近北部，接近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阿富汗。巴西 1960 年决定把首都从沿海的里约热内卢迁往距海 1000 多千米的巴西利亚，其目的在于引导全社会注意面积广阔、人烟稀少的内地。

在当代，许多国家开始注意把首都和首位城市分开，把首都作为真正的政治中心。一些国家甚至通过建立新的首都来显示新时代的开始，如坦桑尼亚、马拉维、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一独立就重新建立了首都。

3. 经济因素：经济因素在首都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如伦敦、巴黎、罗马等都曾经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在近代和当代，虽然这种因素的作用减弱了，许多国家主张把首都作为行政中心，把首位城市作为经济中心，但在某些国家设都时，经济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如西非沿海各国（包括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的首都之所以设在海港城市，而不是设在国土的中心或内陆城市，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城市是国际性贸易的中心。

4. 历史、文化、民族等因素：首都除了是行政中心以外，还往往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等的象征。历史、文化、民族等因素对首都的定位也有一定的影响。如某些国家的首都在其国家政治历史演进中一直保持着首都的功能，并且作为该国的名胜象征深深地印在人们脑海中，而且它还是某些文明的发祥地。这样的首都有罗马、雅典（希腊文明）、巴黎（艺术之乡）、伦敦（科学技术的摇篮）、北京（东方文化）。在一些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因素在首都定位中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首都往往是占重要地位民族的人口集中地，与此同时，其他民族也可以有自己中心，只是不作为首都罢了。这在前苏联和中国尤为明显。如莫斯科是斯拉夫民族的中心，基辅是乌克兰人的中心，明斯克是白俄罗斯人的中心。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以汉族为主，所以，我国历代王朝建都时，除了北魏、辽、金、元朝外，大多把首都设在汉族居住集中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

当然，在选择首都的位置时，很少只考虑一种因素，首都的选择往往是以上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因素，都会给国家行政管理上造成不便。

（三）核心区

在国家的空间结构中，除了设置首都便于行政管理以外，根据不同的功能，许多国家还有核心区域。

1. 起源核心区：这类核心区是国家最初的发展源地，国家后来的版图都是在这个核心区的基础上进化而成的。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家拉采尔、惠特莱西、庞兹（Pounds）、潘塞（Pearcy）等都对这类核心区做过研究。如潘塞

曾说：“国家的核心区通常是中心或发源地，在这个区域中，这个民族产生并且成长”。他又说：“国家正是从这个中心区扩展出来。核心区通常是这个国家原来的位置而且包括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比起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的民族来在文化上也许更为相近”。这类核心区的明显特征是：人口较为稠密、资源较其他地区富饶、经济和文化水平也较高。后来的首都一般都在这个核心区内产生。许多国家都包含这种核心区，如法国，巴黎盆地是其核心区，巴黎是这个核心区的枢纽；俄罗斯的核心区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中国的核心区则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美国和加拿大，核心区位于其各自国家的东部即五大湖地区。这两个国家的核心区都包括了各自国家人口的近乎一半，工业部门的近乎 3/4。这两个核心区也是这两个国家版图向西推移的发源地。

2. 民族核心区：这类核心区虽然不是国家的发源地，但其包含某一个民族的绝大部分。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核心区一般不只一个，但居优势地位民族的核心区通常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前苏联也包含着许多民族核心区，而俄罗斯民族核心区通常被看成是这个国家的象征。

3. 经济核心区：这类核心区是指在国家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和主导性的那些区域。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美国的五大湖地区、德国的鲁尔区、法国的巴黎盆地、日本的“三湾一海”（东京湾、伊势湾，大阪湾和濑户内海）地区，等等。一般说来，经济核心区的特征是生产能力强、市场潜力大、交通运输便利。

以上只是根据在国家生活中职能对核心区作了理论上的区分。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因素总是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因而有的核心区既是经济核心区，又是起源核心区，同时还是民族文化核心区。欧洲许多国家诸如英国、法国、德国、希腊等以及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等都是如此。有的国家不只包括一个核心区，如非洲的许多国家。有的国家的核心区还经常移动，如拉美一些国家，当欧洲殖民者到达美洲后，一般都在矿产富饶的地区以及交通便利的海港地区定居，并进行经济活动，而当矿产枯竭、贸易发生变化后，其核心区就转移了。还有的国家没有核心区而只有首都，如西非沿海 12 国就是如此。尽管核心区的类型不同，各国情况相差很大，但研究核心区的类型及其在各国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了解各国的国情及国策。

三、边疆与边界

边疆地区和边界在国家的空间结构组成中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首都和核心区。

（一）边疆地区

1. 边疆的特征：边疆是相对于国家的首都和核心区而言的，是距首都和核心区较远的地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具有如下特征：国家的政令在边疆地区远不如在内地或中心区那样有效；经济发展速度也不如内地那样快；边疆

Pearcy G E , Russel H F. World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 Crowell. 1948.

Pearcy G E , Russel H F. World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 Crowell. 1948.

地区一般比较偏远，与内地相比，交通运输不很发达；边疆地区可能有居民，也可能荒无人烟，如有居民，他们可能有特定的语言和文化习俗。

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所以给边疆下一个统一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可以对边疆的功能和类型作些研究，以便于更好地了解各国政治决策的特征。

2. 边疆的类型和功能：由于边疆具有的功能不同，所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边疆。综合各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一般可以划分出如下几种类型的边疆。

(1) 政治边疆。政治边疆一般是指被当作边界来使用的边疆。这种边疆把两个国家或政治区域分隔开来，通常它是一个地带或地区，由这种边疆分开的两个国家或政治区域彼此接触的不多，虽边疆地区是两个国家或政治区域实行主权或管辖权最远的地区，但两国无明确的界线。随着两国版图的扩张，当其相互接触时，两国或者为争夺这些边疆地区而发生争执，或者通过签定边界条约结束冲突，后一情况就使真正明确的国界就产生了。在当代，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等向南极地区的扩展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由于海图界线不像陆地那样明确，所以，靠近南极地区的各国就利用边疆而扩展其版图，但随着海图界线的明确，这种边疆将不复存在。

(2) 拓居边疆。这类边疆是在一国边界线之内，远离首都和核心区，人口稀少，但资源相对较为丰富，能满足许多人口的需要。如俄罗斯、埃及、巴西、中国等都有这种边疆。对于这种边疆，许多国家在内地缺乏资源的情况下，鼓励开拓这些边疆，并鼓励人们去定居，如美国的西部开发运动、巴西的发展亚马孙平原政策、中国的支援边疆举措、前苏联对西伯利亚的开发等，都是对这种边疆的开拓。政治地理学家缪尔通过对拓居边疆的研究，把拓居边疆又分为三类：一类是初级形式，是开拓殖民地的保障，它随着国家合法的界线的产生而消失；一类是二级形式，是指那些以前开拓初级边疆时被忽视的地区；一类是“空边疆”，这主要发生在拉丁美洲地区，是指对边疆地区资源进行盲目的开发，从而导致土壤和矿物资源的浪费，导致从已开拓的边疆向新的边疆挺进。

(3) 文化边疆。边疆一般来说是从一国向另一国或从一个政治区域向另一个政治区域过渡的地带，这种过渡可以是政治性的（如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性的（如不同的经济形态），也可以是自然性的（如不同的自然风貌）。但如果在两国边界两侧居住着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边疆。文化边疆与政治边疆、拓居边疆的区别在于，它的过渡性不太明显，居住在边界两侧的居民更多地关心的是本地区、本民族的事务。

(二) 边界

与边疆不同，边界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际法规定：国家的边界是指划分一个国家领土和另一个国家的领土、或一个国家的领土和未被占领的土地、一个国家的领土和公海以及国家领空和外层空间的想象的界线，边界是有主权的国家行使其主权的界线。

1. 边界的特征：作为划分不同国家领土的界线，边界有以下两个最根本的特征：

(1) 地理特征。人类既然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空间上，因而，把不同的

社会或组织存在其中的空间划分开的界线首先具有自然地理特征，无论是以山脉、河流、湖泊作为分界线，还是以经线、纬线作为分界线，都是边界地理特征的表现。边界的这种地理特征说明边界具有某种客观性，尽管国家之间的边界在酝酿和划分时，具有某种主观随意性，它依据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对比而划分，也根据人口、民族、文化习惯而划分，但边界不能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它必须反映在客观世界上，即必须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上标出来。而边界一旦标出来，它就具有客观性、自然性。不在地球表面上或地图上标出来的界线也就不成其为边界。当然，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给边界的精确划分带来某种困难，从而导致部分国家之间在边界走向或划分上发生争执，但要真正避免国家之间在边界上的冲突，边界划分必须尽可能准确和客观。

(2)政治特征。地球表面本无边界，只是在有了人类并建立了国家之后，才用想象性的界线把地球表面人为地划分成不同的区域，用以标示每一国家在地球表面的范围。所以，边界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这种政治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边界是国家实行其主权的界线：一个国家的边界一旦确定，该国就有权对其领土及生活其上的人们实行管辖，而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的干涉。如我们经常说：“不要干涉他国的内政”，其政治地理意义就是不要干涉他国边界范围内的事情。否则，就是侵犯他国主权。我们还经常看到，在边界线的两侧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如在朝鲜半岛，北纬 38° 附近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边界是国家主权的极限线。

边界是保证国家领土继而保证国家稳定及存在与否的自然基础：一国的边界不稳定，必然会影响它与邻国的关系，如美国和墨西哥就常因格兰德河改道而发生争执，印度和孟加拉国经常就恒河水的分配而发生矛盾。因此，我们可以说，边界的政治特征是其首要的特征。

2. 边界的类型：由于边界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划分边界的标准也各不相同，这就使得边界的形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世界上大致有如下几种边界类型：

(1)自然边界。所谓自然边界是指以自然要素作为划分边界的依据。这是最早的边界形式。一般以独特的地貌特征为根据，如高山、海洋、河流、湖泊、沙漠、森林等。具体包括：

界山：界山是自平地天然突起的、分配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领土的高地。如阿尔卑斯山脉——瑞士、意大利、法国；喜马拉雅山脉——印度、尼泊尔、不丹、中国；安第斯山脉——智利、阿根廷。

一般来说，边界线是在山脊上沿着分水岭走的。

但是边界的划分不仅涉及自然因素，同时还涉及到历史、民族、经济、文化等因素，因此，不能只用这个原则进行划界，更不能借口分水岭原则来侵吞他国的领土。

界河：界河是分隔两个不同国家的河流。如果河流是不通航的，边界线原则上是在河流的中间，循着河流两岸曲折而行；如果河流是可通航的，边界线原则上在主航道的中间。但边界也可以是河的一岸，例如长期以来就有条约或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占有河流那一岸的土地以前就已占有河流那一岸。这里应注意，如果在界河上架桥梁，在没有特别条约的规定下，边界线

一般在桥梁的中间。另外，河流若是由于自然作用而改道，边界也会发生变更。以下是一些界河：

格兰德河——美国、墨西哥；奥德-尼斯河——德国、波兰；多瑙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拉普拉塔河——阿根廷、乌拉圭；黑龙江——中国、俄罗斯。

界河争端是经常发生的，导致两国在边界河流的争执最常见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由于河流改道或自然添附作用而导致边界的重新划定。如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格兰德河，就是因为河床经常移位而引起近百年的关于两国边界的争议。格兰德河发源于落基山脉，全长 3034km，其中美国和墨西哥界河约 2000km。该河由于经常泛滥，河床不断北移，淤积了大片土地，成为两国相争之地。1963 年，两国签订条约，将河流改道的部分领土平分，各得 0.78km²，并决定修一条新运河，把这条新运河当作两国的新边界（图 3—2）。

图 3—2 美国-墨西哥格兰德河争议解决示意图（1963）

（据 Glassner M I deBlij H J. 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73 译出）

二是由于国际河流的利用而导致争端。所谓国际河流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共有的河流。两国之间的边界可能是沿着河流走向，也可能是横穿的国际河流，诸如莱茵河、尼日尔河、多瑙河、刚果河、亚马孙河、尼罗河等。由国际河流导致的政治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河流航行的问题，一个是国际河流河水利用问题。关于在国际河流上航行的问题，早在 19 世纪初就已经开始讨论了，于 1815 年维也纳公约才宣布不仅沿河国家而且一切国家的商船，都可以在欧洲国际河流上自由航行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当时只适用于欧洲，直到 1921 年巴塞罗那公约诞生，这个原则才得到全世界认可。河流自由航行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在平等条件下，并在缴纳因维持和改善航行情况而必须征收的公平捐税的限制下，准许一切国家的船舶在河流上航行。”由于国际河流是某些国家的领水组成部分，所以，这些国家不希望其他国家在自己领水范围内活动，这样，有些国家故意提高关税，这就容易导致和其他国家的冲突。

关于国际河流河水利用问题，尽管国际法中曾规定：“一个国家不仅不得阻断或变更从其本国流往邻国的河的水流，而且同样地，该国对于河水的使用既不得引起对邻国的危害，也不得妨碍邻国在它的部分对河的水流作正当的使用”。但国际河流河水的利用在当代仍然是地区政治冲突的直接原因。我们仅以印度河为例，印度河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是该流域 6000 万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印巴分治后，划给巴基斯坦的水系比较发达，划给印度的则是干旱区，这样，印度河水成了两国争夺的对象。尽管 1960 年两国签署了河水使用协议，但由于近几年河水改道，两国纠纷又起。

三是界河中边界的位置，尽管原则上规定在主航道中心线上，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有些河流上关于这一点仍有争议，如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发生的界河争执就是这样。塞内加尔认为，根据法国 1933 年的法令，边界就从塞

[英] 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17 贾械榭钩傻

[英] 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17 贾械榭钩傻

内加尔河的主流右岸通过，毛里塔尼亚认为，这是违背国际法的，拒绝这种要求，两国由此发生争执而关闭边界。

界湖：界湖是分隔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领土的湖泊，边界线一般通过湖泊的中间。以下是一些界湖：五大湖——美国、加拿大；的喀喀湖——秘鲁、玻利维亚；维多利亚湖——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坦噶尼喀湖——坦桑尼亚、赞比亚、扎伊尔、布隆迪；日内瓦湖——法国、瑞士。

海峡：根据国际法规定，分隔两个不同国家的陆地的海峡，除了特殊条约规定以外，其边界线一般通过海峡的中间或通过中航道。

朝鲜海峡——日本和朝鲜；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英国和摩洛哥。

这里应注意，边界通过海峡的中间只是一个一般原则，如何划出这条中间线，则需根据各海峡具体的地理情况来定。我们以著名的英、法大陆架划界中海峡群岛区的划界为例加以说明。在英、法两国关于英吉利海峡的划界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海峡中的群岛。英国主张，中间线应划在群岛（为英国领土，但远离英国而靠近法国）和法国海岸之间（如图中点构成的

图 3-3 英法海域之争示意图

（本图主要参考中国国际法年刊.1982.242 地图绘制）

虚线）；而法国则主张，中间线应划在两国本土海岸之间，即海峡中央，而让海峡群岛有由 3n mile 领海区和 3n mile 大陆架区构成的 6n mile 区域（如图中由短画构成的虚线）。两国为此争论不休，最后经国际法院裁决。国际仲裁法庭认为，由于两国本土海岸线大致相当，首要的边界就是英吉利海峡的中间线（DE），另一段划在距海峡群岛已确定的基线 12n mile 处（XY 段）。结果把海峡群岛划在一个被包围的区域里。这样，既避免了因海峡群岛而导致法国失去海峡中央部分，又考虑了这一海峡的特殊情况。

（2）人为边界。与自然边界相对应，人为边界是指以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意识形态、心理习惯等因素作为依据划分的边界。与自然边界不同的是，人为边界可以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当代世界政治地图上，人为边界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以政治力量作为划界标准；一种是以居民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心理习惯等文化因素作为划界标准。

以政治力量作为划界标准：这种边界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于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既可以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国与国之间的人为边界最典型的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边界。这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形态完全相同，二战后，德国成了东西方政治力量较量的地方，其结果便形成了两个尽管民族相同，但政治体制、经济形态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两国的边界尽管是有形的自然物，但这已经是政治意义的自然物。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界线最典型的是“东欧”和“西欧”的划分。东西欧的划分并不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西欧”包括自然地理上的西欧、中欧和南欧部分国家；“东欧”包括自然地理上的东欧、中欧和南欧部分国家。

“东欧”和“西欧”的划分的标准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力量，这种界线与国家之间边界不同，它是无形的。类似这样的无形的国际界线还有“三个世界”的划分、“南北关系”中的南与北的分界、“东西方关系”中的“东”与“西”的划界。

以文化因素作为划界标准：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许多

新独立的国家，许多国家在决定领土的范围时，根据民族自决原则进行公民投票。许多欧洲国家的界线就是沿着民族的界线而划分的，只要看一下欧洲的语言分布图，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图 3—4）。在一战前，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都是奥匈帝国的组成部分，一战后，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的领土范围和语言分布大致是相当的。如果我们深信语言在确定国家领土范围时确实起过作用，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战后，希腊和土耳其曾交换过 200 万名少数民族。当然，我们谈民族的语言在部分欧洲国家划界时起过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是划界的唯一标准，在有些地区，是很难区分出语言的界线的，这就要求划界必须同时兼顾当地的村落、河流、山脉、行政区划等因素。事实上，真正使用单一语言的国家只有少数。如果不算印第安语，巴西是使用一种语言的国家，澳大利亚也属于此类。使用单一的阿拉伯语的国家也只有埃及、利比亚，其他国家都是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

除了民族、语言对划界有影响外，还有根据宗教信仰来划分边界的。宗教信仰与语言不同，因为不同的民族可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而说同一语言的人却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某些地区，宗教信仰导致了大规模的国内摩擦，从而成为新独立国家划分边界的一个基础。如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边界便是如此。印巴分治之前同属印度版图，并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印度版图内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矛盾加剧，英国于 1947 年 6 月根据英驻印总督蒙巴顿的建议，提出了蒙巴顿方案，主张根据宗教对印度分而治之，分为主要是印度教徒居住的印度联邦和主要是伊斯兰教徒居住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同年 8 月，两个自治领宣布独立。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就是当时根据宗教分布而划分的两个自治领的界线。

（3）几何边界。几何国界是指以经度或纬度等数理位置作为划分国界的根据而划分的国界，不考虑地表上的人文和自然状况，又称数理国界。如以纬度作为两国边界的：美国和加拿大基本以北纬 49° 作为边界；埃及和苏丹基本以北纬 22° 作为边界。以经度作为两国边界的：阿拉斯加（美）和加拿大基本以西经 141° 作为边界；埃及和利比亚基本以东经 25° 作为边界。

以上我们只是根据边界的形式对当今世界政治地图上的边界作了分类，这并不意味着囊括了划分边界的所有标准。划分边界的标准是多种多

图 3-4 欧洲的语言分布示意图

印—欧语系 日耳曼语族 罗曼语族 塞尔特语族 斯拉夫语族
波罗的海语族 希腊语族 阿尔巴尼亚语族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
芬兰语族 乌拉尔语族 突厥语族 萨莫耶德语族 巴斯克语族
a. 加泰降语 b. 加利西亚语 c. 雷托—罗曼语 d. 俄语
e. 爱沙尼亚语 f. 弗拉芒语 g. 斯洛伐克语 h. 白俄罗斯语

（引自 H. J. 德伯里杰. 人文地理. 130）

样的。如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德布列杰等人主张：除了对边界作地貌上的划分和人为的划分外，还应对边界作功能上的划分和发生学上的划分。根据所起的功能，边界可分为 防御性的，文化分裂性的，行政管理性的，意识形态性的等；根据发生学来划分，边界可分为：先行的（antecedent），

后来的 (subsequent) , 叠加的 (superimpose) , 遗留的 (relict) 。英国政治地理学家缪尔对以往政治地理学者关于边界的划分进行了总结, 并列说明划界标准和类型的多样性 (表 3 - 2) 。

表 3 - 2 边界划分表

划分标准	类型 1	类型 2	类型 3	类型 4
1. 与地文特征相关	山脉	河流	海洋	
2. 与文化景观的历史相关	先行的： 开创性 遗留的	后来的	叠加的： 殖民的 停战线 其他	
3. 与阻止边界间接触相关	接触	分离		
4. 持续时间长短	各种时间			
5. 假定对边界的压力	活动的	固定的		
6. 假定和景观相关	自然的	人为的		
7. 一般性的 (博格斯的划分)	自然的	人文地理的	几何的	复杂的

当然, 对边界的这些不同分类只是为理论上的研究方便, 事实上, 任何一国的边界都不是单一的, 边界的划分也不是只考虑一种因素, 而是自然状况、文化、民族愿望、政治力量、交通运输等因素的综合统一。

3. 边界的职能: 边界的功能并不是不变的, 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综观边界在国家演变过程中的作用, 边界大致有如下几种主要职能:

(1) 防御职能。边界是一国领土范围的界线, 也是一国实行其主权的界线, 边界是保证一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的最基本的条件。保护边界就是防止他国入侵, 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 边界最明显的功能就是防御, 特别是那些自然边界, 如界山、界水等都有防御他国入侵的作用。如在 17、18 世纪欧洲大陆处于狼烟四起、彼此争夺领土的年代, 英国却由于英吉利海峡的隔绝多次免于卷入战争, 而又能够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庞大的海军越过英吉利海峡参与欧洲事务。因此, 在欧洲大陆各国相互争战时, 英国却能从这些战争中脱身, 坐收渔利。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对这一时期英吉利海峡在英国和荷兰的海战中的作用作过如下描述: “不论特隆普和德·吕泰尔那样的指挥官战术指挥才能多么杰出, 在对英国的海战中, 荷兰商人或者不得不闯过两翼受敌的英吉利海峡, 或者不得不兜个大圈子, 绕过波涛汹涌的苏格兰, 而这类路线 (像他们捕捞鲱鱼一样), 在北海仍然受到的攻击。”英吉利海峡的这种防御职能一直受到英国的重视, 以至后来英法之间的海峡隧道几次被延期, 其根本原因就是英国担心欧洲大陆强国利用隧道入侵英国。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特别是航海、航空技术的发展, 边界的这种军事防御职能已逐渐减小。所以, 许多国家已不依靠这些自然边界来防御敌国的入侵。

Muir R. 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 127.

[美]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103 褪沟酶鞣 蚰鞣库 邢嗽ㄅ*

(2) 政治、法律职能。边界的政治职能是指，边界是一国主权管辖范围的界线，在边界内，国家或政府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独特的政治体制，接受特定的意识形态，而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边界的法律职能有二：一是两国边界一旦确定就产生法律效应，边界首先受国际法的保护，边界的任何变动都须在严格遵守国际法的程序下进行，任何一国未经他国同意对边界的随意改动，都是违法行为；二是边界是一国政府法律达到的最后适应线，超过界线，国家的法律就失效，但在边界内，国家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法律。

如果说，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边界的防御职能是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那么，近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和航空技术的发展，尊重边界的政治职能和法律职能便是保证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政治秩序的首要条件。当代许多边界纠纷，究其最终原因，其实都是关于边界的政治职能和法律职能的纠纷，许多人为边界的设立正是边界的法律和政治职能的体现。例如，统一前的西德和东德之间的边界，其政治职能和法律职能都是首要的，其他许多国家之间的几何边界，发挥的也主要是政治职能和法律职能。

(3) 经济职能。边界的经济职能突出地表现在：它在一定程度上封闭了国家的经济体系，国家通过关税和贸易政策人为地控制生产和交换，以此来保护民族经济。例如，国家利用贸易限制来保护新兴工业，提高经济增长幅度，限制进口，增加出口，创造有利于发展本国经济的环境，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这里应该注意，边界的经济职能与边界的政治职能以及军事防御职能有显著的不同，边界的政治职能以及军事防御职能表明，边界是一个国家主权范围的界线，不允许邻国对其进行政治上的干预和军事上的侵略，就这种意义来说，一个国家对于邻国没有任何依赖性。但近代任何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由于各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资源条件各异，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要求种类和数量也有差别，同时，无论哪一个国家（不论地处沿海还是内陆、经济发展水平高还是低、发展速度是快还是慢），它所能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都有一定局限性，这就使得各国或各地区有相互交流的必要性，而这种交流最突出地反映在经济交流上。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制成品及技术设备的需要，这些都必须经过国家的边界。这就必然影响国家关税政策的制定，而国家又可以通过关税政策来限制这种交换。与政治边界和军事防御边界不同的是，这种通过边界的经济交换不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而是社会化大生产分工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交换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一国经济完全为外国所主宰，那么，这个国家就容易丧失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其政治独立也是徒劳的。

以上我们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角度探讨了边界所具有的以及应该具有的职能，当然这并不是边界的全部职能，边界还有其他职能，但无论哪一种职能，都是以边界是国家主权的界线为基础。离开国家的主权，边界就失去了全部职能。

(三) 边界的纠纷与解决

边界纠纷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大难题。二战以后，随着许多新独立国家的出现，这一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复杂了。据统计，仅从 1919

年到 1939 年两次大战的间隙时间内，在欧洲发生的边界摩擦不下 56 起。萨迪亚·图瓦尔在其所著《独立非洲的边界政治》一书中曾列举了 27 项边界和领土争端，并声称这还没有包括所有边界问题，中东和南亚（印巴）的边界纠纷，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国际冲突，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热点，而海洋及大陆架边界的争端更是世界关注的问题。

边界纠纷直接涉及到国家的领土及主权，因而是国际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边界纠纷解决得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解决边界纠纷和解决其他国际纠纷一样，一般主张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采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和平解决边界纠纷的方法分为政治解决方法和法律解决方法两种：

1. 政治解决方法：边界纠纷的政治解决方法大体有三：

（1）谈判与协商。谈判与协商，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有关问题获得谅解或解决争端而实行的国际交涉的一种方式，也是解决国际争端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方法。

谈判与协商的区别在于：谈判只有当事国直接参加，这是很早以前就采用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如 1907 年的《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三十八条、1928 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日内瓦总议定书》第一章都有规定，1948 年《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二十一条、《非洲统一组织》第三条和《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更加明确地把谈判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

协商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则是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53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声明中建议：“为了使政治会议能够和谐进行，以便在国际事务中给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建立典范，政治会议应采取圆桌会议的形式，即朝鲜停战双方，在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之下，以共同协商的形式，而不采取朝鲜停战双方单独谈判的形式”。协商的特点就是，协商的成员不局限于当事国，中立国可以参加，而不受谈判双方限制。

谈判与协商的目的可以是仅对某个政治问题交换意见，也可以是解决纠纷，缔结条约。谈判与协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参加，也可以由外交部长、驻外使节全权代表。

采取谈判和协商解决边界争端取得成功的事例很多，如 1960 年《中缅边界条约》、1961 年《中国尼泊尔间边界条约》、1963 年《中国巴基斯坦间边界协定》等。

这里应注意，谈判与协商的主体是完全主权国家，因此，在谈判和协商中必须尊重国家的主权，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进行。

（2）斡旋与调停。所谓斡旋与调停是指当事国不愿意直接谈判或者虽经谈判而未能解决争端时，第三国可以协助当事国解决。

二者的区别，斡旋是各种有助于促使冲突各国进行谈判的行动，是第三国以各种行动促成当事国开始谈判，或者虽经谈判而未能达成协议时重新谈判，第三国本身不参与双方的谈判；调停则是在当事国以调停人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直接进行谈判，第三国以调停者的资格直接参与当事国的谈判。

[美] 乔治·W. 霍夫曼. 欧洲地理.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593*

中国国际法年刊. 19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第 2 卷，北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在边界争端问题的解决中，使用斡旋和调停这种方法最典型的事例是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心议题。巴勒斯坦问题来源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

相传在公元前 2000 年，从阿拉伯半岛迁来的半游牧部落迦南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迦南国，其领土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及约旦。后来，爱琴海沿岸的腓尼基人、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希伯来人相继来到这个地区，与当地相结合于公元前 1020 年在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和约旦东部建立了第一个希伯来人的王国，定都于耶路撒冷。公元前 923 年，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国和南部的犹太国。犹太王国的人称为犹太人。后来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叫犹太人。公元前 64 年，罗马帝国入侵巴勒斯坦，先后三次镇压犹太人的反抗，屠杀犹太人 100 多万。公元 132 年，犹太人除被杀者外，其余大部分被赶出巴勒斯坦。犹太人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浪。

由于巴勒斯坦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19 世纪末，英国为了与法、俄等国争夺中东霸权，控制苏伊士运河，以保证通往印度等东方殖民地的航道，于是英国利用犹太人的复国情绪，在 1879 年在瑞士的巴塞尔举行了首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后的 1917 年 11 月 2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写信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罗思柴尔德，宣布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1922 年国际联盟决定把巴勒斯坦作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二三十年代，犹太复国运动积极组织大批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人发生了争夺领土的激烈冲突。由于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愈演愈烈。英国一方面不公开得罪美国，一方面又控制不住巴勒斯坦地区的形势，只得宣布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给联合国。联合国于 1947 年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把巴勒斯坦地区分成三个部分：阿拉伯国、犹太国和耶路撒冷市，并对其边界做了详尽的划分。

分治以后，阿以冲突并未间断。阿拉伯各国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均反对分治，为了维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益，1948 年 5 月 15 日，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五国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 年 5 月，联合国大会规定任命联合国调停人，来促进“巴勒斯坦未来局势的和平调整”，调停的最终效果不大，以色列相继于 1949 年、1956 年、1967 年越过分界线进入阿拉伯领土。目前，阿以双方在进行谈判，问题在逐步解决中。

（3）调解（和解）。调解是一种解决争端的程序，其方法是将争端提交给一个由若干人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澄清事实，并提出包括解决争端的建议在内的报告，以促使争端当事国各方达成协议。

和解和调停不同，调停是专指由第三国在各当事国之间进行谈判，促成双方接触或达成协议；调解则专指各当事国将争端提交一个团体，以便公正查明事实并建议适当的解决办法。

和解与仲裁及司法不同，依和解程序，各当事国对向它提出的解决方法的建议没有法律义务，而对仲裁和司法的结果则承担法律义务。

和解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每一当事国家选派两人，一人为本国人，一人为第三国人，又由该委员从第三国人中选出主席一人。和解委员会的任务是

搜集一切必要的资料，设法使当事国各方达成协议。在审查争端的过程中，应将其认为适合解决争端的条件通知当事国各方，并规定各方作出决定的期限。在工作结束时，委员会起草一项记录，说明当事国各方已达成协议，或说明无法达成和解等等。

一战后，曾缔结了许多和解条约，并设立了许多和解委员会，其中一部分是用来解决边界争端的。但由于组成和解委员会的当事国双方都不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所以，和解委员会成功地解决两国间的边界争端的事例是很少的。当然，由于和解委员会不对任何一方进行强制性仲裁或司法，因而仍然有许多国家愿意通过和解解决边界争端。

2. 法律解决方法：边界争端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法有仲裁与国际法院裁判二种。

(1) 仲裁。仲裁是指由各当事国所选出的一个或几个公断人或国际法院以外的法庭作出法律判决来断定国家间的纠纷。

仲裁与谈判、斡旋、调停、和解等政治方法的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仲裁程序是以法律为根据的，任何为了获得妥协而不顾现行法律的裁决，都是不符合仲裁职能的；另外，尽管仲裁与司法都以法律为依据，但与法院判决不同的是，仲裁纯粹是自愿商定的、临时性的。当然，如果仲裁条约没有特别的规定，当一方拒绝服从执行仲裁裁决时，另一方就有权以国际法所许可的强制手段强制执行仲裁裁决。

仲裁的主要程序：争端双方订立仲裁条约或协定；由各当事国选任一个或几个仲裁人组成仲裁法庭成员进行秘密投票，其决定取决于多数；裁决一经正式宣布，并通知各当事国代理人之后，即对争端作了最后的决定，不得上诉。

仲裁作为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法律方法，确实成功地解决了一些边界争端。近代的仲裁是由 1794 年解决英美两国边界纠纷的贾埃条约开始的，两国将重要的边界纠纷交由混合委员会裁判。之后，便出现了许多用这种方法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的案例。如：1909 年 10 月 23 日挪威诉瑞典，关于两国海上边界案；1914 年 6 月 25 日荷兰诉葡萄牙，关于帝汶岛疆界案；1922 年瑞士联邦委员会裁决的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的争端；1925 年美国总统裁决的智利与秘鲁之间关于塔克纳-阿里卡公民投票地区的争端；1928 年 4 月 4 日美国与荷兰之间关于巴尔马斯岛的主权案；1933 年以美国最高法院院长休斯为首的法庭所裁决的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之间的争端。

在当代，最著名的英法大陆架划界纠纷也是通过仲裁解决的。英法两国政府曾就英吉利海峡及其以西一带的大陆架划界进行过谈判，由于分歧严重，两国于 1975 年 7 月 10 日签订仲裁协定，成立仲裁法庭，就这两个地区的大陆架划界问题进行裁决，最后确定了两国在争端地区的边界，成功地解决了这场边界纠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边界纠纷都能通过仲裁圆满解决，由于仲裁是由仲裁人或仲裁法庭进行的，如果仲裁人受了贿赂，或裁决受某种势力的影响等，那么，仲裁就是无效的，这方面的案例也不乏其例。如 1831 年荷兰国王关于英美两国间的东北边界（在美洲）争端案所作的裁决，各当事国以仲裁人越权为由而拒绝承认其约束力。再如 1909 年阿根廷总统关于玻利维亚与秘鲁边界争端所作的裁决，由于同样的理由也遭到玻利维亚的拒绝。

(2) 国际法院裁判。另一种解决边界争端的法律方法是国际法院的裁

判。

尽管在国际法院成立以前，曾有常设仲裁法院，但人们都感到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其一，它本身不是一个裁判法院，而只是一个名单，每一案件的各当事国只能从这个名单中选出人来组成法庭；其二，由于每次冲突的裁决人都是由各当事国选的，因此，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裁决人，缺乏连续性。人们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法院。

一战后，在国际联盟成立以后，1922年2月15日，国际常设法院在海牙正式宣布成立，并在解决一系列国际争端中起了作用。据统计，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常设法院共处理争端案件65件，作出判决的33件，提出咨询意见的共28件。后来，随着国际联盟的解体，1940年2月，国际常设法院停止活动，1946年1月宣告解散。

二战结束前后筹建联合国时，决定取消国际常设法院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法院来代替，1945年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把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关之一。国际法院便一直延续下来。

国际法院的组成：法官，由15人组成，其中不得有两人同为同一国家公民，任期9年；专案法官，审理特定案件时，法院派一个或数个专案法官参与；院长，主持法院一切会议；分庭，有两种，一种是为了采用简易程序处理案件所设，另一种是为处理特种案件所设；书记处，处理法院一切日常行政事务。

国际法院的职权：管辖权和咨询权。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是指：自愿管辖，对于依特别临时协定而提交的一切案件，协定管辖，对《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定中所特定的一切事件的管辖，任意强制管辖，对当事国声明的具有下列性质的一切法律争端的管辖，这些争端主要是指对条约的解释、国际法的任何问题、违反国际义务的事实、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的性质及范围这四种。国际法院咨询权是指：国际法院可以就一切问题提出意见，以帮助联合国机构更好地按照《联合国宪章》进行活动。

无论是国际常设法院，还是国际法院，在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避免了两国或数国间可能发生的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从1923年到1951年国际常设法院和国际法院判决和咨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是关于领土和边界纠纷的。判决案例，例如：1929年9月10日德国诉捷克，英国、法国、丹麦和瑞典诉波兰，关于奥得河国际委员会属地管辖权案；1932年6月7日法国诉瑞士，关于上萨瓦自由区及节克斯区案；1933年4月5日丹麦诉挪威，关于东格陵兰案；1937年6月28日比利时与荷兰之间关于马斯河水流改道案。咨询意见案例：1923年9月10日，关于德国割与波兰的领土上的德裔移民的某些问题；1923年12月6日，关于划定波捷边界的问题（左霍齐那问题）；1924年9月4日，关于划定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在圣瑙吴姆修道院边界的问题；1924年12月8日，关于欧洲多瑙河委员会的管辖权问题；1925年11月21日，关于洛桑条约第三条第二款（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边界）的解释；1950年7月11日，关于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问题。

当代最著名的北海大陆架疆界的纠纷就是通过国际法院的裁判得到解决的。北海大陆架边界纠纷是这样的：丹麦和荷兰两国政府主张，应该按照等距离线原则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并敦促西德政府也依据这个原则来决定它对大陆架的主张。而西德方面主张，等距离线仅在海岸线平直的情况下才能

使用，而在非平直海岸线的情况下，不能使用这个原则，在大陆架划界时，每个国家应该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一部分，由此西德要求在北海大陆架上取得比等距离线所能提供的要大些的地区，并且提出一个扇形区理论。国际法院于 1969 年对此纠纷作出如下判决，认为等距离线不是一个必须执行的划界方法，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进行，让每个国家尽可能多地取得构成它的陆地领土在海洋中和在海洋下的自然延伸的大陆架，如产生重叠部分，应在各国之间按议定的比例划分，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平均划分。根据这个裁判，西德政府与荷兰、丹麦两国政府进行谈判，得到一块延伸到北海中心的大陆架（图 3—5）。

国际法院在解决边界争端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1982 年 1 月 20 日，国际法院第一次成立一个受理特定案件的特别分庭，受理美国和加拿大关于缅因湾海上划界的争端（美国诉加拿大案）。这在国际法院的裁判史上又谱写了一个新篇章。

边界纠纷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纠纷和冲突，另一类是法律性的纠纷和冲突。关于法律性的纠纷，使用仲裁和司法解决是比较适宜的，但对于那些政治性（主要是利益）的边界争端，一般使用和解的方法，如和解失败，经一方请求，可使用司法解决。当然边界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民族统一的要求，如东北非的索马里问题。索马里民族的领土曾被分为五个部分，即英属索马里、意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和肯尼亚的东北省。1966 年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宣布合并成立索马里共和国，并提出五部分统一的要求，但遭到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拒绝，为此发生了边界冲突。有的则属边界本身不清楚，如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突尼斯关于撒哈拉地区的争端。有的则属于历史边界的恢复，如西撒哈拉之争。有的出于占有资源，如伊朗和伊拉克、伊拉克和科威特的边界争端。因此，边界争端的解决并不是一经使用某种方法就能立即奏效的。这就需要在运用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时，必须考虑到边界冲突的具体原因，而不能一概而论。

图 3-5 北海大陆架争端示意图

（引自 J.R.V. 普雷斯斯科特. 海洋政治地理. 112 和 R. Muir. political geography. 134）

第四章 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与选举地理

政治地理学研究虽然主要重点放在国家级，但是，国家内部的地方级也应当予以适当注意，因为，它也是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之一，而且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很多与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关。在政治制度方面，可以说各国是大同小异，特别是其差异性方面，不少与地理条件有关。例如，国家的行政区划，虽受多种因素制约，可是地理条件始终是个重要的因素，并且一直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另外，近代国家的发展，政党出现了。几年一次的大选是决定和影响其后若干年国家政治活动的大事，因而，西方一些国家地理学家开始研究政党的有关活动，特别与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的选举地理。目前，选举地理已成为政治地理学中，研究国内政治地理的一个重要的新领域。

本章的内容分以下四个方面，即国家的政治制度（国体、政体、国家结构）、行政区、政党和选举地理。

一、国家的政治制度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了要实现其统治，统治阶级总是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权，在政权形式中，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国家的结构。

（一）国体

国体是指国家的本质，它表明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各阶级社会中，有不同的阶级，其地位亦各有不同，因而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国体。

在奴隶制社会中，有奴隶主与奴隶阶级。奴隶主剥削、压迫奴隶，甚至对奴隶进行人身残害，实行的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专政。其国家的国体就是奴隶制国家。我国的夏、商、周三代就是奴隶制国家。夏、商实行的是奴隶主神权政治制度，而周实行的是奴隶主宗法贵族政治制度。

在西方的古希腊城邦国家中，雅典实行的是奴隶主民主政治制度，而斯巴达则是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制度。而古罗马，前期实行的是奴隶主贵族共和制度，可是，后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共和国变为帝国，实行的是奴隶主军事独裁政治制度，开始是元首制，后为君主制。

在封建社会，国家是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在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政治制度。我国从秦直到清末，两千多年间，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欧洲，封建时期亦是君主制。不过，早期封建领主势力强大，在其领地内，享有至高的权力。君主形式上是一国之主，但其统治权还仅限于其自己的领地；后来，君主权力增加，但僧俗各界参与等级会议，对君权起了一定制约作用，形成等级君主制；最终则形成专制君主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实行专政，就主权归属而言，有君主制与共和制。

从上所述，国体有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些统属于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现在还有一种由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专政的国家，它不属于上面任何一类，而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二）政体

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但是，政体既然是形式，它必须与国体相适应，这是政体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其某些形式又反映了不同的国体。例如君主制，在奴隶制度下，体现的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即是奴隶社会的君

主制，可是，就君主制形式而言，亦有封建社会的君主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君主制。由此可见，国体与政体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下面就所存在过的各种政体形式分别进行介绍。

1. 君主制：君主制是以君主作为国家元首的政体形式。在君主制下，君主一般是世袭的、终身任职的。

君主制，在人类历史上是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政体形式。大体上，有君主专制制、等级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三种。前两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体形式；第三种属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形式之一。君主立宪制在当前又可分为两类，即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与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总之，君主制国家在今天日趋减少的政体，到本世纪 80 年代，世界上保留君主制形式的国家还有 20 多个。

(1) 君主专制制。该政体是以君主独裁形式出现的。它是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主要政体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君主拥有无限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居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的活动不受限制，也不受国家的其他机关监督。王位是终身的，世袭的。君主制虽在不同的社会中出现，但由于情况不同，其形式亦略有差异。

在奴隶制社会中，有的专制君主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一种神权君主制。例如，古代的埃及就是实行的君神一体的法老集权统治。在中国，帝王称之为天子，即其为天之子，其统治权是“受命于天”。他们往往编造各种神话与传说与天联系起来，以证明其为非凡之人。中国的专制君主制特别长，一直延续到清王朝。

(2) 等级君主制。该政体是西欧中世纪封建国家的一种君主制。在中世纪开始时，西欧是封建割据状态。在此制度下，国王以下是大领主，大领主以下是小领主。大领主往往与小领主在契约基础上结成宗主与附庸的关系，势力日益增大，与国王对抗，各据一方。结果，国王名为一国之王，但控制不了大领主，也无法统治小领主，统治仅限于其领地。从 12 世纪起，城市的复兴，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反封建势力加强，国王强化了王权，领主势力有所削弱。这时，在市民阶级支持下，建立由封建贵族、僧侣和市民组成的等级代表机关，负责监督政府，审定国家大事。实际上，这种等级机构对王权有所限制。这种君主制称为等级君主制。可是，15 世纪以后，西欧的国王权力扩大，向中央集权发展，就转向了君主专制制。

(3) 议会君主立宪制。议会君主立宪制是以议会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君主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的政体形式。这种政体形式又称议会君主制。国家的行政管理由内阁负责。内阁的首脑为首相，他由通过选举而在议员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首相再从政见基本相同的议员中挑选阁员，然后提交君主任命，组成内阁。君主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并无实际行政权力。内阁向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向议会报告工作。内阁如失去议会信任，则必须辞职或提请君主解散议会。这时，君主亦只能照例表示同意，所以，君主是按内阁的意见行使形式上的权力，并代表国家进行礼仪活动。君主尽管是“虚位元首”，但仍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象征国家的尊严。这种类型的政体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某些国家情况特殊，当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时，革命不彻底，而保留下君主制的形式特点所致。它首先于 1686 年出现于英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然后，一些国家亦仿效英国建立此种政体。

目前，除英国外，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有西班牙、荷兰、卢森堡、比利时、瑞典、挪威、日本、泰国等国。

(4)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比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要保留更多的原君主制的内容。这种政体形式，虽然也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但是君主仍然保持封建制时代的权威，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和最高的实际统治者。在这些国家中，宪法是承君主意志而制定的，议会不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是君主的咨询机构。对议会的立法，君主不仅可以否决，而且可以通过任命或指定议员来控制议会。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阁首相由君主任命，所以内阁是君主行使行政权的机构。

这种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的典型有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日本，以及目前少数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和摩洛哥等国。产生这种制度的原因是一些实行君主专制制的国家，国内封建势力仍然比较强，而资本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因而君主在世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有相当发展情况下，自愿地或被动地接受某些局部改革，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实质上，这种制度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在 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宪法规定，国家元首皇帝有任命宰相和高级官吏、召集和解散议会、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同时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宰相只对皇帝负责。这个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在 1918 年 11 月，由于战败，人民起义，成为共和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天皇并无实权，权力集中幕府手中。后来，经过革命，废除幕府制度，建立天皇制专制主义。宪法规定天皇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大权于一身。由于天皇对军队的统率权由军部辅佐行使，不受内阁干涉，成为军国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二战后，改革了天皇制，天皇只成为国家和国民整体的象征。国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内阁行使行政权，向国会负责。天皇关于国家的一切行动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对其负责。国家遂由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转向议会君主立宪制。

2. 共和制：共和制是指国家的元首和国家的权力机关是通过选举而产生的一种政体形式。共和制也如同君主制一样，不仅出现于现代社会，而且也出现于古代。

在欧洲古代的奴隶制国家时期，就有共和制的政权形式。例如，在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雅典城邦就是采用民主共和制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公民代表大会，它有权解决国家重大事务，其他国家机关都隶属于它。那时，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制，公民大会可以直接行使立法权。在罗马，公元前 5 世纪的共和国实行的是贵族共和制。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有权决定国内、外政策，审查和批准法案。对于负责国家行政、司法和军事工作的执政官，虽然由居民按财产组成的百人团大会选举产生，但却受元老院监督。后来，由于平民向贵族的斗争，使平民选出保民官以保护平民利益，可以制止或否决国家决定和元老院法案。

另外，在欧洲中世纪，一些通商口岸和商业中心建立的城市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诺夫哥罗德曾实行过封建共和制。其最高权力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市议会或其他形式的集体机构掌握。

目前世界上采取共和制政体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其形式大体有：总统制，内阁制，委员会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四种。

(1) 总统制。总统制是指总统既担任国家的元首又担任政府的首脑的一

种政体形式。它不在于国家是否有总统。例如，意大利设有总统，但是在意大利，总统只担任国家元首，而作为政府的首脑则是总理。因此，尽管在意大利有总统这一职位，但是意大利实行的并不是总统制，而是内阁制。

总统通常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议会的议员也是定期由公民选举产生。但是，总统与议会是相互独立的，总统只向人民负责，不对议会负责。总统直接组织和领导政府，政府只向总统负责，不向议会负责。总统不能解散议会，议会也不能用不信任票迫使总统辞职。总统虽然可以对重大问题个人决策，但是议会最后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执行。

总统制始于美国。在 1787 年，美国在制定国家宪法时，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又相互制约的原则。通过选举来确定总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还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具有极大的权力，同时又受到相当程度的制约。

总统可以指定人员担任政府公职和组成内阁，有权接受部长的辞职或解除其职务。总统领导内阁，但内阁只是总统的集体顾问，重大事务由总统个人决定。总统与国会的关系是国会有立法权，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可以否决，但国会可以再以 2/3 多数通过后，不经总统批准即可成为法律。总统有权任命高级官员，但要得到国会的认可，同时国会还有权根据法律对总统与政府高级官员的违宪犯罪行为进行弹劾。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并经国会认可方能担任，而最高法院可以对国会通过的法律以违反宪法为由宣布无效。

总统制是当前各国较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政体。除美国外，实行总统制的国家还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印尼、埃及等国。

(2) 内阁制。内阁 (cabinet) 一词来源于法语，有“内室”、“密室”之意。内阁作为政府机构始于英国，它是由英国国王的最高咨询机关 (枢密院外交委员会) 演变而来。该词后来被其他国家采用，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名称和组织形式。

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内阁的成员由内阁的首脑从与其政见相近的议员中挑选，或由参加内阁的各党派协调分配名额产生，然后提请国家元首任命。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执行些礼仪上的活动，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国家元首颁布法律、法令和发布文告都必须由内阁首脑或有关阁员签署。内阁向议会负责，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如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就只有向国家元首提出总辞职，由国家元首任命新的首脑重组内阁，或者是由内阁提议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进行议会大选，然后，根据大选结果组织内阁。内阁总揽国家政务，其首脑有权任命所有政府高级官员，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方针与政策。

由于内阁制政府是以向议会负责为特征，故亦称之为责任内阁制或议会内阁制。属于这类政体的国家有意大利、德国、希腊、印度、新加坡等国家。

不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不尽相同，其宪法所规定的政体形式也不尽相同，可以说大同小异，依其主要特点可分属于二者中的某一类。但是，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例如法国就是这样。法国有总统，也有总理。总统权力很大，是国家的权力核心。总统除拥有任命高级文武官员，签署法令，军事权和外交权等一般权力外，还拥有任免总

理和组织政府、解散国民议会、举行公民投票、宣布紧急状态等非常权力。总理领导政府的活动，虽向议会负责，但却听命于总统，起辅佐总统的作用，其政府成员亦由总理提请总统任免。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虽拥有立法权、预算表决权和监督权，但却受到总统与政府的限制。由于上述职权的划分，故称法国的政体为半总统制或总统制内阁制。

(3) 委员会制。委员会制是一种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合二为一的政体形式，以议会行政合一的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执行机关。这种政体形式如古希腊的“十将军会”、古罗马的“三头政治”及法国1793年大革命中的公安委员会等。目前继续实行这种政体的唯一国家是瑞士。

瑞士的委员会制是由1848年《瑞士联邦宪法》制定并经1874年修改而确定的。根据宪法规定，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和联邦法院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权不像总统制与内阁制相互制约，而是采取合一的制度。

联邦议会分国民院和联邦院，分别由200名和46名议员组成，议员经选举产生。联邦议会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两院联合会议选举7名议员组成联邦委员会，是联邦的最高行政机关。议员当选后，必须辞去原职，然后进行补缺选举。7人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议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议会议员和委员会委员任期4年），不得连任，通常各委员轮流担任。主席除主持委员会会议外，还代表委员会行使国家元首的礼仪职责。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各主管一个部。议会通过的法律和政策委员会必须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是议会委托执行国家行政事务的机关。联邦法院由委员会提名、议会通过的26名法官组成，独立行使联邦最高司法的机关。

(4) 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根据我国革命时期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它保证我国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经过选举而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决定国家重大问题。大会每年开会一次。在大会闭会期间，由大会选出的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若干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行使大会职权。

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职权有：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其他重要官员，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和发布动员令……

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再由主席任命。国务院其他人选由总理提名，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亦由主席任命。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其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负责军事统辖权、审判权和检察权。

(三) 国家结构

国家的结构是指国家的整体与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从全世界来看，国家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单一制和联邦制。

1. 单一制：这类国家是以地域来划分的普通区域或自治区域为组成单位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单一制的国家中，中央政府具有最高权力，而地方政府只能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依据宪法所赋予的权限，行使其职权。在法律上，单一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央，而地方政府的权力则具有中央授权性；在外部特征上，单一制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一部宪法、一种法律体系；在

国际交往中，单一制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其公民只有一个国籍。

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职权由于情况不同而有差异，遂出现两种类型。一种是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国家。其地方官员由中央委派，或由地方选举，代表中央来管理地方的行政事务。地方居民无自治权，只有经中央批准才能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地方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都在中央政权的严格控制下，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职权。另一种是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在这种类型国家中，地方居民可以依法自主组织地方的公共机关，并在中央监督下依法自主处理本地区事务，而中央不得干涉地方具体事务。如发现地方议会有越权行为，则中央政府可诉请司法机关予以纠正。

前一种的中央集权型单一制国家的例子有法国，后一种地方分权型单一制国家的例子为英国。在法国，起主要作用的地方国家机关是地方行政机关，其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代表中央，按照中央的命令来办事，对国家的内务部负责；另一方面，他们又作为地方官员，管理一切地方行政事务。不过，中央有权撤换地方官员。在英国，由于其历史的传统，地方政府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地方设有与其相应的议会和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是地方议会任命的执行机关。议会通过的决议必须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方能生效，法律草案在议会通过前须事先征求中央有关部门意见。管理委员会要执行全国性的政策，负责各项事务的具体管理。随着中央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和经济职能管理的加强，也增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控制。

单一制的国家目前在世界上占较大比例，其优点在于：在集中的中央政权领导下，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有利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由于上下联系方便，各项政策、法令从上到下，畅行无阻，有利于国家的行政效率的提高；中央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解决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统一的文化、教育与集中向心的交通网络与通讯，有利于全国人民的思想观念的趋同与凝聚力的增强，这对于国家克服困难，抵御外侮将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单一制国家有很多优点，可是世界上并不都是单一制国家，即使是单一制的国家也未能将上述优点充分发挥出来，有的还导致国家的分裂。这说明单一制国家本身还需要些基本条件，只有当具备这些条件时，单一制国家才能存在与发展。

在理想情况下，单一制国家的条件，从政治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大体如下：在地理方面，首先应是一个形状紧实，内部条件较均匀，有一个核心地区，境内的往来联系比较方便；在人文方面，其在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较为一致，即使存在差异，其主群体能发挥核心作用，居民分布并未出现由于环境原因而产生的地域上的孤立与封闭现象；在经济上，存在着紧密联系与互补；在历史上，曾在一个政权之下，有着共同的命运与良好关系。当然，这些条件是种理想情况，在客观实际中，只能是相对而言，不能绝对化。

从目前的单一制的国家产生的情况来看，结合上述条件，大体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在封建社会时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经过某种形式的革命与改良，转变成现代国家，实行单一制。这类国家多在欧、亚两洲，因为这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历史悠久，在封建社会时就存在不少国家。例如欧洲的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亚洲的中国、日本、泰国都属于这种类型，其中法国较为典型。法国在15世纪末，法兰西最后剩下的一些贵族领地也都并入法兰西王国。在革命中，不仅彻底取消封建制度，而且在拿破仑当政时，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全国行政单位进行了重新划分，使各省的规模大体相等，各单位与中央都实行同样关系，同时，又建立一个集中于巴黎的交通体系，这些对加强法国这个单一制国家的向心力起了关键作用。这类国家都属于一个民族，或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主体民族所组成，即使有些少数民族存在，但多在封建社会时期就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故单一制能为国家所采用。

第二类是由欧、亚两洲多民族的大国分裂而独立的国家。这些多民族的大国为奥匈帝国、沙俄和奥斯曼帝国，在一次大战结束后，这类国家有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它们都是根据巴黎和约而建立的，其国界是以民族的分布情况来划分的。除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两个主体民族组成外，其余多是一个主体民族所组成。

第三类是西属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后来独立新建立的国家。在拉丁美洲，除巴西曾属于葡萄牙外，其余都曾是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为便于统治，西班牙把它们划分成四个总督区，即墨西哥、秘鲁、格林纳达（首府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和拉普拉塔（首府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战争（1806—1826年）后，独立出一大批国家。这些国家基本上以土生白人、原土著印地安人及混血种人为主。所以在居民的成分及文化背景上（如都用西班牙语）比较一致。在独立国的划分上，地理因素及原总督区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原格林纳达总督区，其首府在波哥大，在南美的辖区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独立后成立的共和国命名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国土范围与前总督区一致，后来内部发生分歧，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分别于1829年和1830年退出哥伦比亚。再如，原来属于墨西哥总督区的中美洲，于1923年从独立的墨西哥分出，成立中美洲联合省，后改为联邦，但由于各种分歧与矛盾，最后终于分裂为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五国。这五国范围原属墨西哥总督区下的危地马拉督辖区。可见，其先脱离及联合与督辖区有关，后又分为五则亦与其地域条件的分割有关。这类国家大多采用单一制。

第四类是第二次大战后由于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产生的国家。这类国家主要在非洲与亚洲。这类国家基本上是在帝国主义所分割的殖民地各管辖范围的界限内实行独立。由于各帝国主义者不论是武装的掠夺，还是彼此间瓜分，他们既未注意人文特点，也未考虑到自然因素。因此，使大部分国家内部差异性较大，成为这类国家的重要特点。虽然存在这种情况，但是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采用单一制的政体。

2. 联邦制：联邦制是一种复合型的政体形式。它是由一些具有相对主权的政治实体为单元组成的国家结构形式。

在联邦制国家中，既有联邦的中央机构，又有各组成单元政治实体的中央机构。这两种中央机构在权限上是根据宪法规定各自独立行使，彼此互不干涉，但是，它们的权限不是互相重叠，而是一种分权，这种分权是基于管理的方便而划分的。如有些必须由联邦政府执行较为有利的，则由联邦政府管辖，如外交、国防等，只能由联邦统一管理，而不能分散；而教育，当地行政事务等，则多由各地中央政府管理。行政部门虽有分工，但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宪法与法律上，联邦有联邦的宪法与法律，有自己的立法与司法机构；而各组成单元也有自己的宪法与法律，有自己的立法与司法机构。

在联邦制国家中，美国是个典型。美国在开始并不是个联邦，而是个邦

联。原属英国殖民地的 13 个州为反对英国的剥削和高压政策，于 1776 年 7 月集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 13 个州脱离英国独立。双方遂进行战争，到 1781 年，以英方失败而告终。1783 年，英、美签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在战争期间，13 州的大陆会议制定邦联条例，并于 1781 年成立邦联国会，宣布成立美利坚共和国。当时，美国人相信共和制的国家不适合于具有广阔领土的国家，因为在这种共和国中，中央的立法机构必然易于脱离其大多数选民，发展下去，就会脱离选民的监督，共和制也就不存在了；但是，一个共和国如果太小的话，就很难在一个充满侵略性大国的世界上顺利地生存下去。为此，人们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一些小共和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邦联，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发挥其联合起来的力量。在反对英国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与英国的战争过程中，需要一种比较稳定的组织形式表达其共同意志，即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问题。结果，邦联条例就于 1777 年提了出来。它规定成立个国会。条例提出每州只有一票表决权，代表由各州议会任命；各州按土地价值分担邦联的公共开支；国会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任命军官，派遣和接受大使，签订条约，发行货币等。

在邦联条例中，各州得到它们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虽然让邦联国会负责对共同关注的大量事务作出决定，可是却未将执行其决定的权力授予国会。因此，国会无法对各州执行其决定。它甚至由于不能征税以支付自身开销，不得不仰赖州来供应经费。各州多关注自身利益，无视国会决议，只派二三流人物出席国会。国会开会类似清谈，有时都凑不齐法定人数，国会因而毫无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其西部与英国和西班牙发生领土争端时，软弱无力的国会在对方军事压力下，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在英国对其贸易进行限制时，各州不但不能齐心协力对外，反而因各州为保护自身的利益伤害了其他州。在这种情况下，新产生的邦联所遇到的各种内、外矛盾使经济出现萧条，社会不稳定，特别是在马萨诸塞州出现的武装叛乱，使各州认识到邦联的软弱无能已危及自身的利益与生存。

为了解决邦联存在的问题，1787 年 5 月至 9 月于费城开了 5 个月的会，终于把邦联转变为联邦。在解决这一问题中，代表们认为要给予联邦中央政府比过去邦联国会更多权力。它应能征税维持自身所需费用，有力量组建军事力量维持国家独立，要管理好商业，保护好私有财产，有权执行其政令。但是在联邦机构上有两个问题存在分歧：一是如何反映小州的权力；二是如何防止政府权力落入反映少数人利益的人的手中。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两院制。众议院的代表名额按人口比例分配，以反映大州利益，在参议院的代表名额不论大小州都有同等的代表名额以满足小州的要求，通过这种办法平衡大州与小州的权力及其利益。对第二个问题则为了防止政府获取更多分外权利，采取把政府分成可以互相制约又互相平衡的不同部门，除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外，还有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和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每个机构都有特定的职能，并使其不超越各自的权限范围，这样，就可确保政府不致使权力转向独裁。按上述原则制定的宪法于 1789 年批准生效，联邦政府因而成立。这是近代国家中第一个新建的资产阶级的联邦制国家，它对联邦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世界上采用联邦制的国家并不多，根据其特点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西方国家向殖民地移民，而后由在当地出生的土生白人起来反对宗主国的战争，或通过自治而建立起联邦制国家；第二类为当地居民在国家发

展过程中或因其他原因而采用联邦制；第三类为西方的殖民地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而采取联邦制。

第一类的联邦制国家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种类型，即以英裔土生白人或英裔为主的土生白人建立的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是英裔土生白人建立的联邦制国家。加拿大则是以英裔土生白人为主与法裔土生白人建立的联邦制国家。美国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由邦联发展而成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则是在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下，采用代议制的制度，然后由各地方联合成为经英国批准的自治领。

在澳大利亚，英国于 1786 年开始殖民，原为罪犯流放地。1820 年，改变政策，自由民得以大批移民澳大利亚。19 世纪中，在新南威尔士南部等地发现金矿，吸引大批移民。在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机构，原各成立了责任自治政府。为了解决共同面临问题，各自治政府于 1883 年，成立联邦委员会。直到 1900 年才经英国批准，澳大利亚联邦于 1901 年 1 月 1 日成立。1931 年，由自治领成为独立国家。

加拿大原为法国的殖民地，法裔居民居住在加拿大东部。经过英、法长达 7 年之久的争夺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加拿大遂于 1763 年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来，英国居民增加，殖民地范围扩大，由于土生白人的斗争，甚至起义，迫使英国政府在全省建立起责任政府，给予土生白人一部分自治权。在全省代表要求下，于 1867 年，经英国批准，成立由魁北克省，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和安大略省组成的统一的联邦国家，成为英国的自治领。1931 年获得独立。现包括有 10 个省和两个地区。

目前看，美国与澳大利亚是英裔土生白人组成的联邦制国家，虽然美国后来大量吸收外来移民，但在文化上基本能实现整合。其联邦制不仅能容纳原来地方的自治，而且还能促进其联合，使其中央集权的功能也有所加强。但是，加拿大由于其法裔居民集中于魁北克省，与后来移入而居于其他省的英裔居民在文化上形成鲜明的反差，使魁北克省的独立倾向有所增强，其联邦制则与美国的情况相反，是向着分权方向发展。

第一类的第二类型是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地。它们是经过武装斗争，以当地土生白人为主建立的联邦制国家。目前拉丁美洲的联邦制国家有墨西哥、委内瑞拉与巴西。在脱离西、葡独立时，原来组成的中美洲联邦（1823—1838 年）只维持 5 年就分裂成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5 国。阿根廷在独立时，成立拉普拉塔联合省。但是，反映自由派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集权派主张成立中央集权政体，发展资本主义；而代表封建地主和各省军阀利益的联邦派则主张建立联邦制。结果阿根廷政局动荡，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和内战状态。直到 1868 年，才改建为中央集权，但也尊重各省自治，成为阿根廷共和国。

墨西哥于独立后的 1824 年成为联邦共和国。但是，其经历与阿根廷相似，经历了保守与自由两派的斗争，到 1917 年新宪法以后，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势力才受到严重打击，资本主义民主势力取得胜利，其联邦制也才维护下来，继续存在。在巴西，由于葡萄牙王室建立的帝国于 1889 年才被推翻，到 1891 年，通过宪法，确定为联邦制的巴西合众国。其成立后，因资本主义因素已有相当发展，没有经历墨西哥与阿根廷那种动荡，联邦制较为顺利地巩固下来。委内瑞拉情况与墨西哥相同，虽经历了曲折过程，但联邦制仍保留下来。

第二类的国家都在欧洲。它们是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与苏联。不过，后三国现已解体。捷克与斯洛伐克已分为捷克与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南斯拉夫现只留下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组成的新联邦；苏联已解体。为 15 个独立国家。

瑞士最早由其中部三个森林州施维茨、乌里、翁特瓦尔登于哈布斯堡家族衰落时结成“永久同盟”（1291 年），1370 年，卢塞恩、苏黎世、楚格、格拉鲁斯、伯尔尼五州加入，结成联邦。1501 年，发展到 13 个州参加。1798—1803 年，由于法军入侵而中断。1848 年，通过新宪法，成为由 22 个州组成的联邦，首都在伯尔尼。可以说瑞士联邦是经历时间最长的联邦制国家，它是在面临周围威胁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共同利益而结合在一起的。

德国，如前所述，它原是诸侯邦国林立，到 30 年战争（1618—1648 年）结束时，有 300 多个小邦。1815 年组成德意志联邦时只留下 41 个邦。1871 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有 26 个邦。一战后德国成为共和国。二战后，于 1949 年，西德恢复联邦制国家，东德则成中央集权的共和国。1990 年两个德国统一成为联邦制国家。

奥地利原与匈牙利组成二元制奥匈帝国。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成为共和国，后又被德国吞并。二战后，又成为共和国。1955 年通过的宪法定为联邦制共和国。德、奥两国恢复与确定为联邦制国家是与保障和平和防止好战势力再起有关。

第三类联邦制国家是二战后，由原殖民地独立的一些国家，如亚洲的缅甸、印度、马来西亚，非洲的尼日利亚。

印度是亚洲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历史上，分裂和统一交错，居民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当地原有印度教、佛教、锡克教等宗教，又加上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宗教矛盾亦较多，同时，在语言和民族方面也很复杂，以上这些因素给印度在独立时选择国家政体方面带来严重困难。

首先是实行印、巴分治，即在原英国统治的印度，把印度教信徒和伊斯兰教信徒相对集中的地区分开，划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其次，在印度采取联邦制以照顾国内各语言、民族等方面的利益。

1947 年独立时，由于强调统一，基本上沿袭英国统治时期划分的行政区，没有考虑各地区在政治、经济和语言上的差别。独立后，大部分地区，要求按语言为基础成立单独语言的邦。位于东南马德拉斯的泰卢固人要求成立讲泰卢固语的安得拉邦比较强烈，中央政府同意于 1953 年成立安得拉邦。由此引发建立语言邦问题。于是印度政府在 1953 年底成立改组省邦委员会，研究语言邦问题。后来委员会提出报告，不同意“一种语言成立一个邦”，但认为应当考虑在语言基础上改组省邦。这是因为印度的语言和方言上百种，语言界线亦难以确定，无论怎么划分都必然包括些讲其他语言的人，而漏掉一部分说本语言的人，且容易引发语言、种族、宗教方面各种矛盾和冲突。1956 年议会通过省邦委员会改组方案，全印划分为 14 个邦。后来，不断增加，到 1975 年，已有 22 个邦。

另一个重要例子是非洲的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唯一超过一亿的大国，原是英国殖民地。全国部族和语言（包括方言）各有 200 多个，语言较为复杂。在国内，有明显的语言和民族核心区，即约鲁巴人集居于西南部，伊博人在东南，而豪萨人则在北面。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时，实行联邦制，由上述的三个大区和一个首都拉各斯所在的联邦区组成。在联邦共和国

刚建立时，一些政治家曾预言，除非建立更多的区以满足人数不多的民族与部族的要求，否则国家很难存在下去。在 1963 年，决定建立一个由西部行政区分出的中西部行政区，这里是埃多人聚居地。但是，北部的行政区人口最多，在国内占主导地位。在地理位置上，北部属内陆，其与海外贸易则需依靠南部港口。北部的居民伊斯兰传统较深，住在北部地区的南部人在高级职务与就业方面则占有优势，这就加深了南北两地区人的对立。所以，在独立后不久就出现北部的豪萨人反对住在那里的伊博人。结果，伊博人大量返回南方。在 1967 年，政府为安抚许多种族与避免内战，把国内的行政区重划为 12 个邦。可是，伊博人所控制东区政府拒绝执行此计划，并依靠其石油资源退出联邦，成立比夫拉共和国。由此引起的内战，于 1970 年以伊博人失败而告终。到 1976 年，尼日利亚重划行政区为 19 个邦与一个首都区，拟把首都从拉各斯迁往首都区。

缅甸联邦和马来西亚联邦分别于 1948 年和 1963 年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原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新加坡于 1965 年退出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联邦制在政治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与地理的区域特点有密切联系，所以，它吸引了许多政治地理学家的注意。可以说联邦制的特点首先是在地域性上，各地区彼此相联，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但是每个地区也具有自身特点，彼此存在着差异性，其次其政治组织方面是二元结构，即各地区的政治组织实行自治，但是各地区间的关系又存在政治组织以处理彼此间的共同事物。由于地理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研究区域的地域特征的科学，故对联邦制研究往往给予特别注意。

作为区域来说，总是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彼此之间总是存在着差异性，值得注意的是其差异如果过大，缺少彼此间的共性，也就无法联合在一起，也就不可能成为联邦制国家；如果过小，则其各地区特征并不太明显，也就无须组成联邦，可能成为单一制国家更为有利。例如，在法国，虽然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差异并没有大到需要考虑采取联邦制，所以仍然实行中央集权的单一制。

区域的差异及地区的特点，不单是自然方面的因素，而且还有人文方面的因素。因此，联邦制是否可行还要考虑居民的愿望，只有在该地区的居民希望政治上的联合，而不愿政治上的统一时方可实行。所以，只有当一地区的各政治单元因其强烈的个性，使其产生一种真正愿望愿意维持彼此间的分离，但同时又由于某种利害关系使其需要共同生存时，联邦制国家才能形成。这样，联邦制的政体形式既不会使其分离而失去可以由于联合而得到的好处，又不会由于合并而丧失其先前存在并值得珍惜的特性。所以，它既不是完全的统一，又不是完全的联合，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形式。

联邦制因而也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达到平衡的一种状态。如果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则联邦制国家就会垮台，如果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各地区的政治力量看到合并的好处大于分离，联邦制可能向单一制转化。正如布瑞斯（Bryce）所说：“保持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平衡，既不让国家行星飞到太空中去，也不让中央政府的太阳把其拉回到太阳火焰中被烧掉。”力量的平衡是一种动态现象，不是一种静态的现象，因此，联邦制的情况往往也在变化。有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力量在加强，向着统一方向发展，也有的地方力量在扩大，趋向分离，也有的甚至出现冲突而分裂。所以，对待联邦制要注意

对情况和趋势的分析，注意其动态过程。

动态过程也是一种历史过程。在联邦制的发展中，过去较多放在政权的分割上，而目前，又多倾向于功能方面的经济合作。在政权上，在联邦制国家中，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虽然并存于相同的地区范围里，是重叠的，但是其实施的权力则是分工的，依据宪法各在其所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尽其职责，这是上下的关系。其横向的关系，各地方政府的地区是相关联的，但不重叠，所以，其权力和职责是相同的，但是在执行上，则在其规定范围内各司其职。只是在流动方面，如交通往来和经济交流则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随着联邦制的发展，联邦政府的统一、协调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加强与扩大，特别是整体经济的发展，其统一倾向随之加强，而过去存在的那种在自然、心理与经济等方面的阻碍也就逐步减弱。因此，联邦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向统一与整合发展，但是还不是单一制国家。由于这种趋势，有的地理学家称其为“合作的联邦制”，“有机的联邦制”。

关于联邦制政权形式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斯帕特（Spate）表述为：“从地域角度看，几乎所有地域辽阔的大国都是联邦制国家。在人口方面，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我们注意密度时，形势则完全倒过来……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常的联邦国家的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边缘性或偏心圆现象……往往这种联邦国家在其领土内包括着那些在气候上多样，经济上互补的地区……当然，这也是辽阔地区的一种功能。”他的结论是：“现代的联邦制形式主要是适合于地域辽阔和人口稀少的新区。”对于“历史传统根深蒂固和存在冲突的地区”是否适宜则持怀疑态度。

显然，斯帕特的结论是适合于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而对瑞士与印度则不相符。瑞士国小，人口少，历史传统较少，矛盾较少，则形成非常稳定的国家，内部关系亦十分协调。对印度来说，其人口多，国土大，历史传统、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极其多样而又复杂，而且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可是，联邦制实行以来，在国家建设与避免分裂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可以说是个突出的例子。

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联邦制是适合于自然与人文条件多样，而且要在地域上呈现镶嵌现象的地区。如果其多样性是混合的，形不成地域上的镶嵌，则只能产生多元的社会，而难于成为联邦制国家。反之，如果社会多元性诸要素在地域分布上的界线是重叠而一致的，同时，又缺乏其他条件来平衡这种潜在的离心力，就会给联邦制的维持带来困难。

从美国 1789 年联邦政府建立以来，现代国家采用联邦制已有 200 多年历史。如果从人文和社会因素来看，可以说有三类。第一类是殖民地独立而形成的联邦制。这类里，英国的殖民地占重要地位。美国的联邦制是美国人经过独立战争后，从实践中选择的道路，取得的成功。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在当地居民与英国统治者斗争中争取到的。可是，在拉丁美洲西班牙的殖民地独立中，受美国启示，联邦制并不太成功，中美洲联邦及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则很快解体，阿根廷开始的联邦制也灾难重重，最终以单一制而告终，只有墨西哥与委内瑞拉几经周折才维持下来。其原因除地理因素外，主要由于西班牙的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不同，前者大地主与天主教上层集团势力太强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较弱所致。当时，独立后的主要矛盾不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与大地主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故政体形式的选择与美国情况是不同的。在美国，过分分权的邦联不

如实行联邦制有利国家的发展；在拉丁美洲，主张联邦制有的却与保守势力相结合。巴西实行的联邦制，是符合斯帕特所说的地理条件的，同时由于巴西当时社会中资产阶级力量有较大发展，也为联邦制的实行创造了条件。

很有趣的是，在二战后，在英国殖民地不断取得独立的过程中，除印度联邦制取得了成功，尼日利亚和缅甸联邦制继续存在，马来西亚由于新加坡退出而部分成功外，其他都未能实现或继续存在。东非的肯尼亚、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合并后改称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原拟成立东非联邦，但未实现。乌干达于 1962 年独立，将其几个小王国改为联邦成员而成立的联邦，在 1967 年随着诸王国的垮台而改为单一制。在拉丁美洲，英国于 1958 年拼凑的西印度联邦（包括巴巴多斯、牙买加、向风群岛和背风群岛中英属诸岛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由于牙买加于 1961 年退出，而于 1962 年解体。巴基斯坦于 1956 年改为联邦制，由于东、西巴基斯坦地理上的分离及内部矛盾终于在 1971 年分裂，东巴基斯坦成为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法属殖民地也出现过联邦制。马里和塞内加尔于 1959 年 4 月组成马里联邦，但于 1960 年 8 月即宣告破裂，各自成为单一制国家。法属喀麦隆于 1960 年独立，成为单一制共和国。1961 年 10 月，原英托管的喀麦隆南部与喀麦隆共和国合并，成为联邦共和国。1972 年又取消联邦制，改名为联合共和国。

第二类是欧洲中部以日耳曼人为主组成的联邦。其中包括瑞士、德国和奥地利三国。瑞士是以日耳曼人为主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德国和奥地利在此前则为单一制政体，所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德国在一战前是联邦制的帝国，大战失败后取消帝制，改为共和，实行单一制。二战后，在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内，于 1949 年成立联邦制，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也是由一战失败后从帝国变为单一制共和国的。二战失败后于 1955 年成为联邦制国家。可以说两国历史大体相同，差异在于帝国时，德国曾是联邦制，奥地利不是。两国从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看都比较单一，内部并未存在地域上的差异与矛盾需要实行联邦制。所以成为联邦制的原因在于外部，目的在于借此阻止其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和保障欧洲的安全。从这种情况看，在适合单一制的条件下，采用联邦制，在适应方面并不会产生严重困难与问题；反过来，如果在适合联邦制的条件下，采用单一制，则可能会遇到不相适应的问题，有时会出现严重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对于德、奥两国的联邦制，一些政治地理学家对于将其划入联邦制国家感到犹豫，也有称其为“有机的”联邦制。

第三类是东欧地区斯拉夫人的联邦制国家。其中有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和前南斯拉夫。这三个联邦制国家现在都已解体，除前南斯拉夫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仍组成新的南斯拉夫联邦外，都分离成独立的单一制共和国。其解体的原因，既有民族的、历史的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在联邦制中，没有充分地、完善地发挥联邦制那种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关系有关。在解体中也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原行政界线并未反映其民族地域上差异，结果导致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共和国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共和国内部不同民族间的激烈冲突；二是前苏联是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近 70 年的时间内形成的经济方面相互联系，当其突然解体后，给各国经济上带来严重困难，在现实利益面前，除波罗的海三国以外，其余 12 国则要求加强其间的经济联系。

以上虽把政体形式划分为两种类型，但是，实际情况还存在些介于二者

之间的混合类型。例如，英国对苏格兰和威尔士就有一定的自治权；在我国，地方行政单位就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特别是自治区是适应少数民族聚居这一特殊情况而设立的；在比利时，建立的四个语言区（佛拉芒语，法语，德语，布鲁塞尔的法语、佛拉芒语），实际上等于“没有联邦制的联邦化”政体形式，它们在许多文化事务上有自治权。对于这种类型政体形式，亦有称其为“区域性国家”（regional state）。比利时终于在 1995 年 5 月 21 日由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制变为联邦制。国家权力机构为众院、参院、国王联邦政府。众院为立法及对政府的政治实行监督；参院为协商咨询机构。下有四个语言区政府（法语区、佛拉芒语区、布鲁塞尔双语区、德语区）和三个地区政府（瓦隆区、佛拉芒区、布鲁塞尔首都区）。语言区政府主要负责本区文化、教育等；地区政府主要负责本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环保等。联邦政府只负责外交、国防、货币政策和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决策权，而地区政府和语言区政府则拥有经贸、社会、国土整治、环保、能源、住房、交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自治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有权签署主管权限内的国际条约，发放许可证，对外派遣商务专员。从而解决了比利时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

二、行政区划

行政区划是国家对其所管辖的地区进行有效的和方便的管理而作出的多级行政区的划分。任何国家除了全国性的中央级的管理部门外，还需要对其各级地方进行分区管理。如何确定其各级地方的管辖范围就是行政区划所研究的内容。由于这种划分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达到有效的和方便的管理，能否巩固其政权和实现统治阶级的意愿，所以，行政区划历来都是各级政府十分关心的，也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问题。在我国，起于两汉的沿革地理，即是研究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的形成和演变的。

这一节分三部分：行政区划的划分原则；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与现状；其他国家的行政区划。

（一）行政区划的划分原则

行政区划是以行政管理为目的而对国家政区进行更细的划分。为达到行政上的有效和方便管理，必须考虑各有关因素。一般说来，其划分所依据的原则有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和军事的。

1. 政治原则：行政区划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政治的，其内容主要是地和人。行政管理是管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和人。地是指地域的大小、数量，人是人口的数量、空间的分布等。

关于地域的大小和数量，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在“中心地学说”中，对行政管理中的优化地域情况作了理论分析。为了执行行政管理职能，要把国家或各行政区进行更细致地划分。每个不同等级的行政区都有实行其管理职能的行政中心，即在那里设立管理机构以实现其管理职能。克氏认为最便于行政管理的中心地体系应当是由各基层单位距上级行政单位中心距离相等及各基层单位的面积又相等的一级级行政区组成。这样，各级行政区都由位于等边六边形中心点的行政管理中心，基层行政中心接近六边形的各角，最小行政管理单位为 7 的基层单位组成。其层次自上而下以 7 的倍数递增，如只有一级，则其基层单位为 7，如为两级，则其基层单位为 49，以此往下类

推。

上述行政区划单位数是理想情况，客观实际则要复杂得多。因为按地来说，划分的单位面积越大，对本单位来说，则越难于管理；如划的过小，则划分出的单位的数量就较多，这对上级来说，要管的下级单位过多，则效益不高。另外，划分的单位面积大小，数量多少，又与上一级的单位总面积有关。但是，在考虑行政单位的划分时，不但多把地与人结合起来，有时往往把人的重要性看得重于地。

在一级行政区的划分上，大多把人与地两要素综合起来考虑。就我国情况来说，省、自治区、直辖市（除台湾资料缺外），共有 31 个，其中省与自治区为 28 个。按其平均来说，每个省与自治区是 $3.55 \times 10^5 \text{km}^2$ ，人口 4 315 万人。可是实际情况差异很大，全国人口最少的一级行政单位是西藏自治区，仅有 240 万人（1996 年），面积最大的是新疆，为 160 多万平方千米；而面积最小为海南省，有 34000 多平方千米，人口最多的省是四川，有 8 323 万人。可是，在一级行政单位中，面积上，新疆是海南的 47 倍；在人口上，四川是西藏的 34.7 倍多。从这里亦可以看出，面积大的人口少，而面积小的人口多。另外，人口多、面积小的是在沿海地区，而面积大、人口少的多在边疆地区。海南省的情况特殊，其面积不大，人口亦不多，因其是由作为经济特区提到省级单位的。

我国省、市、自治区的人口（1996 年）与面积

地区	人口/万人	面积/ 104km ²
北京	1251	1.68
天津	942	1.1
河北	6437	19
山西	3077	15
内蒙古	2284	110
辽宁	4092	15
吉林	2592	18
黑龙江	3701	46
上海	1415	0.58
江苏	7066	10
浙江	4319	10
安徽	6013	13
福建	3237	12
江西	4063	16
山东	8705	15
河南	9100	16
湖北	5772	18
湖南	6392	21
广东	6868	18
广西	4543	23
海南	724	3.4
四川	8323	48
重庆	3002	8.23
贵州	3508	17
云南	3990	38
西藏	240	120
陕西	3514	19
甘肃	2438	39
青海	481	72
宁夏	513	6.6
新疆	1661	160
全国	120363	960

美国的一级行政区共 50 个州，按面积来说，最大的是阿拉斯加州，为 $1.52 \times 10^6 \text{km}^2$ ，最小的是罗德岛，为 3144km^2 。两者的相差是 483 倍。以人口计，人口最多的为加州，为 2 500 万（1983 年）；人口最小的州是阿拉斯加，有 40 万（1980 年）。两相比较，相差为 62.5 倍。由此看来，在行政管理上，尽管面积大会给工作带来困难；但是如果考虑到大多数面积大的行政单位，则人口密度低，交通比较困难，给管理工作带来的难度就会更为加重。可是，为什么仍然将其面积划的过大而不予以缩小呢？看来，原因是人口少管理工作比人口多的行政区也少些；同时，人口过少，多设立一套管理机构，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与面积大小相比，人口数量在同一行政区内之比要小，说明在行政管理上，对人口数量的因素的考虑比面积要重要。

这种情况在美国早期对西部开发时的规定中也得到证实。1787年，美国的西北法令就规定，一旦成年的男性居民人数满5000人时，就将建立一个代议制的立法机关。目前，很多国家对建立行政上或法律上的城市都有其人口的界限。这也说明在行政区划管理上，人口数量多少是个关键。因此，为了管理，注意点是人；但是，考虑人是作为划分区域的重要依据，划分出的区域要相对稳定，可是人口数量又是不断改变的，于是有时因人口增加，为便于管理起见，把一个行政地区分为二个。反之，因人口减少会使二个行政地区合而为一。

关于行政区划的层次、等级，这要视一个国家的总面积与总人口数量而定。面积大、人口多，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就多，这样，为减少同一行政区包括的下属行政区单位过多，不利于管理，就要多设层次或等级。然而层次过多，又使一个国家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增加困难。所以管理的层次与管理下一级单位数量是相互矛盾的。这点在人口多、面积大的国家遇到的困难比较多。对于人口少、国土面积不大的国家来说，其管理层次少，管理的基层单位少，则会使国家的管理工作方便、有效。

2. 经济原则：行政区划尽管是把政治原则放在第一位，但是，经济仍然不失其重要地位，有时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政治。因为政治的上层建筑要依靠其经济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也很难存在。政治区划确定以后，总要设立一套行政机构去管理该地区；维持该机构就从税收中获得经费，税收的多少，则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与实力。

在行政区划上，经济原则的体现，首先是经济中心，其次是经济核心区，第三是其辐射范围。关于经济中心，一个行政区，特别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行政区，如我国的省，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省会所在地基本上是省内的最大城市。它在省内，人口最多、最集中，往往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由于它人口最集中，经济力量最强，所以省的行政首脑驻于该地，省的行政机构设于该地。

在省会的周围地区，往往在全省的经济上居于特殊地位，即在农业、工业、交通、商业等居于重要地位。例如，广东省的广州市，位全省的中心，在三角洲的顶部，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附近，很自然成为多中心的重合。珠江三角洲，由于水、热条件好，土地肥沃，是粮食与经济作物的高产地区，农业的核心区；其水运有三江，陆路有铁路辐聚，空运是国内繁忙航空中心之一，自然是个交通的枢纽；工业上，广州及其周围城镇，形成工业上的相当集中的地区；商业上，地近香港、澳门，又在我国南部，物资的南北交流，内外联系，自然也是个商业中心。在全省来说，可以说广州居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就全国来看，亦居于特殊地位。

由于广州在广东的特殊地位，其周围地区亦成为全省的核心区，通过交通上的枢纽地位，其辐射作用自然影响全省范围。只有其东边的韩江下游地区，以汕头为中心，那里由于地处边远，交通联系不甚方便，依据自然条件，形成一定隔离的自然-经济区，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其经济势力与广州相比，差距甚大，作用有限，不能改变广州的地位与作用。

因此，经济原则在各国的一级区划上是个重要原则。例如，我国的江苏和安徽两省，在明朝时是合在一起的行政单位，称南直隶。到清朝时，则将其一分为二，成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其划分是未考虑淮河南北与长江以南的差异采取东西方向划界，反而按南北方向划界，使两省都包括淮北、淮南、

江南三部分。其原因在于淮北地区经济落后，淮南地区经济稍好，而江南地区较为发达，南北划界则两个省都发达与落后搭配，利于经济发展与管理。

除上述行政区划考虑经济原则外，有时，还完全从经济出发而划出特殊的行政区。由于其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从而促进该城市、该地区，甚至该国的经济发展。例如，我国从 70 年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先后设立有经济特区、开发区、保税区。经济特区是对一个城市或较大范围地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是海南省，以全岛作为经济特区，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则以城市所辖地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开发区是以国家批准的城市范围内的一块地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保税区则是在口岸地区划出一定范围，对进入的物资或商品，经储存或加工后再出口，而不征收进出口关税。在国际上，一些国家设立出口加工区、自由港等特殊的经济区目的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香港就是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非常成功的自由港。

3. 民族原则：从第二章中民族一节已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并不多。在多民族的国家中，为了照顾各民族的利益，便于管理，多根据民族人口的数量、分布的范围而划出不同等级的行政区。

在我国，解放后，根据民族聚居情况，划分出区、州、县三级。由于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规定实行自治，故成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相当于行政区划中的省、地、县。在省一级的区划中，自治区有五个，即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在州一级的，到 1983 年，共有 31 个，分别属于吉林省（1 个），甘肃省（2 个），青海省（6 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 个），四川省（3 个），云南省（8 个），贵州省（3 个），湖北省（1 个），湖南省（1 个），黑龙江省（1 个），海南省（1 个）。县一级的民族自治县（旗），到 1984 年底共有 83 个。

前苏联是个多民族国家，原来在联邦内的一级行政区划是以民族组成的加盟共和国，共有 15 个。联邦解体后，15 个加盟共和国都已成为独立国家。其中最大的为俄罗斯联邦。该国是以俄罗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其少数民族超过 100 个，其组成的一级国家行政区划为共和国，其数量达 20 个，其下为民族自治州、民族自治区。

在美国，印第安人是原土著居民，由于欧洲的移民侵占其土地，并遭到驱赶、屠杀，人口数量大减，多转移到一些面积狭小、环境条件较差地区。后来，美国政府划定一些地区供其居住，称为印第安人保留地。目前保留地有 259 个，其中 26 个属于州的保留地，主要分布于东部，其余属联邦政府的保留地，大多位于西部。其面积大小不一，加州境内 76 个联邦政府的保留地中，有 17 个面积不超过 0.4km^2 ，最小的一个仅 3700m^2 。最大的保留地是位于亚利桑那州东北及新墨西哥州西北的纳瓦佐印第安人保留地，面积为 56672km^2 。保留地不仅出现于美国，在加拿大、智利、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也为本国内的土著居民划定保留地，并依据法律，保留地的土著人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

4. 历史原则：行政区划在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往往有其继承性。例如，我国现行的一级行政区的省，基本上是在明朝就已定型，到现在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

在明朝的汉族聚居的长城以内地区分为两京 13 布政使司（俗称 15 省）。

两京是指京师和南京。因明朝的首都原在南京，后迁北京。首都迁北京后，南京仍作为陪都，故称两京。前者称京师，辖今河北，亦称北直隶。南京，辖今江苏、安徽两省，亦称南直隶。13布政使司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到清朝，对原15省中的南直隶，陕西和湖广均一分为二，成为6省。南直隶，划南北线，分东西两部分，为江苏、安徽两省。陕西，亦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以西安为中心，仍称陕西；西部以兰州为中心，称甘肃。湖广以洞庭湖分南北两片，北片以武昌为中心，位于湖之北，称湖北；南片以长沙为中心，位于湖之南，称湖南。于是原15省变成了18省。

另外，清朝亦根据情况建立不同行政区划。新增的省有台湾省（1885年），新疆省（1884年），奉天省（1907年，即今辽宁省），吉林省（1907年），黑龙江省（1907年）。对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由于情况特殊，由理藩院直接管辖，或设办事大臣管理。

清朝被推翻后，国民党执政时期，对行政区划作了变动。1928年，对内蒙古、青海等地改为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西康省和青海省，共6省。由于台湾省被日本侵占，连同原18省，清末设的5省，全国共有28省。西藏、外蒙古则为特殊行政区，称“地方”，由蒙藏委员会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原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撤销，连同附近地区建立内蒙古自治区。另外，撤销西康省，将其东部划入四川，西部划入西藏。同时，先后将新疆省、广西省、宁夏省、西藏改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首都北京，连同上海、天津设3个直辖市。结果，全国的省由28个，减去7个（热河、察哈尔、绥远、新疆、广西、宁夏、西康），加上台湾省共有22个；自治区5个，直辖市3个。原外蒙古与西藏两个地方，一个独立，一个为自治区。现在全国一级行政区共33个。

由上可以看出，行政区划大都有个演变过程，其目前的划分，可以说是其历史发展的结果。尽管随着新情况的出现，行政区划需不断作出调整，但是，历史因素是其调整时必须认真予以考虑的。例如，英国的行政区划受过去的封建社会的影响甚大，由于各封建领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其对现在行政管理工作来说，既难以有合理的统一的编制，又难以提高效率，甚至在交通、环境等方面的发展和保护也遇到困难。因此，调整其面积，重新划界，进行改组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这项在行政区划上的改革，在70年代却碰到传统方面阻力，难以顺利进行。

5. 自然原则：自然条件对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以及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因此，自然条件亦是行政区划上应注意因素之一。

在自然条件上，最突出的影响是地形，如山脉、高原、盆地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例如，我国的南岭、祁连山就是个明证。南岭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使广东与江西、湖南分隔开来。由于南岭大体是东西走向，基本与纬度平行，所以不论在气候上、植被上南岭以南和以北有明显差异。在古代，由于南岭在交通上的阻隔作用，使得南岭以南在一些时期分离于中原，而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正是地形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语言上（为粤语方言），民风、风俗都有差异，一直作为行政区划上的界线。如秦时的南海郡；西汉时的交趾；唐时的岭南道；宋时的广南东路；明、清时的广东省都以南岭作为其北界。祁连山位于青海与甘肃之间，山势高耸，成为

南北之间难以越过的严重障碍。因此，很自然被选为两省区划的界线。

在美国，尽管其考虑自然条件比较少，但是阿巴拉契亚山则一直是沿大西洋各州向西发展的障碍，也是当时各州的西界。虽然后来有的州突破其界线向西扩展，但现仍为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三州的西界。

高原地貌，特别是其边缘高差大，变化急剧，轮廓完整的高原往往是行政区划的天然界线。这种情况特别突出的是山西省的山西高原。该高原，东以太行山，南以王屋山、中条山与华北平原相接；西边虽与陕西高原联成一体，但黄河深切，形成峡谷，反而成为东西往来的天堑；北面与内蒙古高原相毗邻，中有管涔山相隔。因此，山西高原是界线分明的自然单元。特别是从华北平原西望，突然隆起的高差达千米以上的太行山，对比十分鲜明。在高原内部汾河流贯南北形成谷地，加上东南上党盆地与北部的桑干河谷地，形成外有山岭屏障利于军事防守，内有河谷盆地利于发展经济。所以，山西高原由于特殊的高原地貌，一直是个独立的行政单元。

盆地成为一个行政单元的突出例子，在我国就是四川盆地。四川盆地是个四面有山岭包围，中间有长江、嘉陵江、岷江、沱江形成一个完整的盆地。特别是其西部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水利设施使其成为经济繁荣之地，从而获“天府之国”的美誉。其对外交通过去主要靠北面的栈道，东面的三峡，故有“蜀道难于上青天”之说。由于其天然形成的盆地，从元朝以来就成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单元——四川省。四川盆地因此也是我国历史上成为地方独立政权次数最多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汉以后，魏、蜀、吴三分天下的蜀国。

河流的作用与山岭不同，山岭是地形上的高处，河流是地形上的低点；山岭往往成为交通上的障碍，而河流两岸往往由于交通便利而经济发达。但是，河流有时也以其明显标志而成为行政区划上的界限。例如我国的黄河是山西、陕西之间的分界，同时部分河段亦是山西与河南、河南与山东之间的界河。在美国，密西西比河是条大河，纵贯南北，成为水运的大动脉。该河也构成两岸 10 个州之间的分界线。

6. 军事原则：在国家内部，上述五条行政区划的原则，都是从自然、经济、人文、历史出发，有利于行政的管理，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是主要的。但是，行政区划有些地方则是从军事出发，目的是有利于国家的安全与防卫。

我国是个大国，地域广阔，情况复杂，交通不便。在古代时，中央与各地的联系较为困难，如何使地方政权难于裂土称王，拥兵犯上则成为行政区划上需要考虑的重要原则。例如，上述的四川盆地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经济与人文单元，而且内部的成都平原又是经济条件十分优越的核心区。这些条件便于地方政权闹独立性。如何防止这一点是中央政权不能不注意并需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采取的措施有二条。一是分而治之，即是将此完整的单元分成几个行政单位，不使之统一。其目的在于分散其力量，相互制约。秦时将其分为巴郡与蜀郡；晋时，将东、西分为梁州与益州；唐时，东、西分属于山南西道和剑南道；北宋时，则分属于成都府路、利川路、梓州路与夔州路四个单元。这些虽然有因其面积大不利于管理而划小，但主要还是通过行政区划以削弱其潜在的独立性。二是堵塞其出路。四川的对外联系有水路与陆路两条。水路是东经三峡进入湖北。湖北一直是另一行政单元，可以堵塞其水路。陆路是北面通过栈道进入汉中盆地，再越秦岭即可进入渭河流域的

关中地区。从地形等自然条件来说，汉中盆地虽然介于四川盆地与渭河流域中间，具有过渡地带性质，但是从地形联系上，则接近四川。对关中来说，越过秦岭则是平原沃野，所以如欲堵截其北上的陆路的最好办法是控制汉中盆地。因此，从元朝开始，汉中盆地被划归与其经济等联系较少的陕西，其目的就是在于对四川起着制约作用。

另一例子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的变动。内蒙古自治区于 1947 年成立，其管辖范围逐步扩大，到 1955 年，始成为东起呼伦贝尔盟，经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格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直到其极西部的巴彦淖尔盟，形成一个长度 3 000 km 的新月形，其宽度大多为 500 余千米。将其组成为一个行政区是出于民族组成。但是，在 70 年代前后，中苏关系不和，苏联在蒙古驻有重兵，对我国形成严重威胁。特别是从边界线到首都的京畿地区的直线距离不到 600 km。面对这种形势，原来的行政区划不利于战备，一旦战争发生，内蒙古就会被分割，首尾难以兼顾。从战备出发，1969 年将原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将东部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分别划入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西部的巴彦淖尔盟的三个旗阿拉善左旗与阿拉善右旗和额济纳旗分别划入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甘肃省。到 1979 年，由于中苏关系有所缓和，遂将划出的东三盟与西三旗重新划入内蒙古自治区，恢复其原来的区划范围。

以上所述的行政区划的划分原则虽然是分别进行说明，但实际中，都是综合性的。国家的最高决策集团总是全面考虑，权衡利弊，依据时空条件与情况作出决定。

（二）中国行政区划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从夏、商至今已有 4 000 多年的历史。发祥地是黄河中、下游。商、周时已进入长江流域。到秦统一中国时（前 221 年），其疆域已北至内蒙古，东至大海与辽东，南至海滨，西至兰州，纵横长度各约 2 000 km。

在行政管理上，秦以前实行的是分封制。即国王将其首都以外的国土分给其亲属与有功之臣。而获得封地的诸侯再依次将封地除其驻地以外又分封给其亲属。以此类推，全国分成大小大小的小王国。各诸侯除提供贡品，按时朝见，提供劳役和参与征战等义务外，则各自管辖自己的封地内事务。各封地虽有等级大小之别，但当时地广人稀，有很多空旷之地，各封地只有其位置，彼此并无确切界线。因此，当时并没有正式具体的行政区划。《禹贡》中所说的九州，不过是战国时的伪托之作，其九州的划分亦不是行政区划，只能说是反映其国土范围内自然和人文现象的综合分区。

到周的后半期，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强大，各自为争土地财富相互征战、兼并。因此，原来分封制度遭到破坏，形成孔子所说：“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兼并的结果，留下的有秦、楚、燕、齐、韩、赵、魏 7 个诸侯国，就是所谓的“七雄”。各诸侯国在征战中，胜者则掠得领土、财富与人口，败者则失地亡国。频繁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支持，为此，获得胜利的诸侯将其掠夺来的领土、财富、人口不再分封给自己的亲属和他人，而是由自己委派官吏直接管理以增强自身的力量。对新增的土地所划的行政管理单位称为“县”。在边境地区，新增的领土，位于军事要地，需要长驻军队以资防卫，因而设置“郡”。当初郡属于军事性质，兼理民政。在空间分布上，郡多在外，而县多在内，彼此并无统

属关系。这样，在诸侯国中就出现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局面。

当初，郡与县的关系尚无定制。在春秋时，各诸侯国下设县、郡，或县下设郡。这就形成县大郡小，县主郡次，或以县领郡的局面。到战国时，用于军事战守建制的郡的地位上升超过了县，可统辖数县，形成郡下设县。这种制度普遍实行于各国。值得提到的是秦国经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并在国内推行郡县制。它实行并小乡为大县，废封邑立郡县，使郡县与分封制并存现象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推行郡县制，虽然当时亦受到主张实行分封制势力的反对，但秦始皇在李斯等坚持下仍然推行郡县制。秦仅传二世就被楚、汉所取代。西汉刘邦战胜项羽建立西汉，吸取秦速亡的教训，采取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制度。但是，分封制并未带来王权的巩固与国家的安定，反而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后遂不得不缩小其封地，削减其权限，因而在行政区划上并不十分重要。由于分封制是我国秦汉前的重要政治制度，也是行政区划的重要方式，影响仍然深远。尽管西汉实验的失败，但是西晋，是由司马氏代魏而取得政权，为了巩固其政权，遂对宗室亲属实行分封，而且还用分国各王担任地方官员，掌握军政大权，结果，事与其愿违，在晋武帝去世后，第二世就在所封诸王中出现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于是西晋与诸王集团同归于尽。中原大乱，陷入五胡十六国动乱，而东晋则偏安江南。这两次的分封制引发的动乱，使以后王朝转向郡县。有的王朝虽还有封王之举，但实质上，与过去那种封土独立的国中之国的情况相去甚远，成为既无兵权，又不管民事，只是在财政上享受优厚俸禄以终天年。

关于郡县制在我国各朝代多有变化，并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这就在行政区划上决定了基本单位的数量比较多。管辖的面积大与人口多，势必影响行政效率。所以，在秦汉时，对基层的行政区划就定了个基本原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这是说其面积方百里为宜。让我们机械地理解这一原则，即其行政区划长百里，宽百里，其行政中心位于其几何中心。中心与边缘的距离 25 km。可是秦汉时百里约为今 35 km，减半，则由边缘到中心仅 17.5 km。这样，居民进城买卖，官员下乡办公，可以当日往返，所以，定这个面积的原则是合理的。除了面积外，还有人口的数量，人多当然事繁，面积就要缩小；反之，如人口稀少面积就扩大。这是合情合理的。

我国行政区划的基层是县。县在秦时约有 1000 个，西汉时为 1587 个。目前，我国县级单位 2204 个（截止 1988 年底）。如果考虑到目前的国土面积比秦汉大 1 倍，人口多 20 倍的话，则可以说，县的面积变化不大，而其人口则大增。这也就是说，县作为行政区的基本单元的面积无大变化，是比较稳定的。

既然行政区划中基本单元多，则其以上的行政区划牵涉到层次的多少与每一层次所管辖的下一级行政单位数。从秦汉到现在，在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变动最大的是二级还是三级。从管理角度看，国土大、人口多、基层单元的县基数大，如只有两级的话，则县上一级如数量少，则管理的县必然多，难以管理；如数量多，所管理的县少，有利于管理工作的深入。可是，县以上行政区划数量多，则国家对县以上行政单元的管理同样面临着单位多，难以深入的困境。所以，从管理出发，三级管理比较优越、合理。

但是，从国家的权力集中，不致因分散而尾大不调导致独立与分裂角度

来看，则二级管理比三级管理较为有利。因为二级管理的县以上行政区，即国家一级行政区数量多，其管辖的面积不大，人口不多，财力、人力有限，面对强大的中央无法闹独立性，因而，对中央政权来说是稳定的。从另外角度看，国家一级行政区力量小，对外无力制止异族侵犯，对内无法防止动乱，事事只能向上请示，往往贻误时机，坐看事端扩大，一乱而不可收拾。因此，从平时的管理工作与防止动乱出发往往迫使其向三级管理发展。当然，层次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亦有其不利之处。以上就是2000多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变动的关键。

秦、汉时，行政区划是两级制，县以上设郡。秦始皇在全国推行郡县时，全国只有36郡。到秦亡时，全国郡已增至约50个。西汉末年，一级行政区划郡国为103个，县级政区1587个。平均每郡国管辖15县比较合理，但对中央政府来说，面对103个郡国则是太多。为此，除首都附近各郡外，建立13个监察区，设立刺史，监察官吏，使其克尽厥职，奉公守法。后监察区称为州，刺史亦改为州牧。当时，作为监察区的州，并不是设于郡之上的行政单位，只是为中央向地方官员执行监察而已。这种制度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席卷了北方，小小郡守束手无策，朝廷不能不派大臣出任州牧，授予兵、财、政三权，管辖其下的郡、县。二级制变为三级制。结果，黄巾起义未平，州牧割据形成。于是，自秦始皇开始的统一，经东、西汉共441年而结束，继之而起的是魏、蜀、吴三分天下的第一次分裂。

西晋与南北朝时，行政区划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由于国小，官多，加上相互招降，封官许愿，州、郡数量大增，区划分割越来越小。在北周统一北方后（580年），有州211个，郡508个，县1124个。三者的数目比约为1:2:6。显然，一、二级的比例不合理。在隋大业三年（601年）大举合并，取消州，保留郡190个，县1255个。唐时，虽仍为两级制，但取消郡恢复州。贞观时，有州358，县1551。由于州数多，不得不于州上设道作为监察区。当时分全国为15道。唐中期，为边防需要，于边境设10个节度使辖区（即方镇）。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在全国普遍设方镇，并与道相结合，形成既握兵权又管民事的节度使。结果，节度使变为世袭，财赋不交国库，户口不上版籍，成为占据一方的藩镇。这不仅促使唐的垮台，而且造成了中国的第二次分裂的五代十国的局面。

宋朝取消方镇，恢复两级制（州与县）。但是面对州数（351个）太多，不得不在州之上设行政区。宋为避免唐的藩镇之弊及收管理之效，遂将唐的道改为路。对路这一级则设官员分管财赋度转，监督司法、边防治安、粮食物价，因而在州以上无统一的高级地方行政机构和单一的行政首长。同时各官员所管辖的路的地域范围并不一致，官员治所亦不设在一处。目的在于既收一级行政区划加强管理之效，又使其权力分散，相互制约，不会形成尾大不调之势。宋朝虽未出现三国那种地方割据终致分裂的局面，但是，在对外防守上却表现了软弱无力，则不能说与其区划的建制无关系。

元、明、清三代在行政区划上的特点是设立行省，作为国家的一级行政区划。省以下的区划各代有不同，如元是二级（州—县，府—县）、三级（路—州—县、府—州—县）、四级（路—府—州—县）并存。明是二级（府—县、直隶州—县）、三级（府—州—县）并存；清是单一的二级（府—县）。这说明，这三代的一级区划行省制确定下来，而其下是由多种的级制向单一的二级制发展，最终形成全国性的三级体制，解决了从秦开始一直处于二、

三级循环，不能正式设立三级制之顾虑。

由于元代原是北方干旱地区的牧业民族入主中原，加上其征服北方的金、灭亡南方的宋，前后花去了七八十年时间。在征战的过程中，地方行政机构当然要把支援战争列为首要任务。为此，在管理上就需把军、政、财等集中，并有决策权，否则就难以集中力量应付迅速变化的形势；在地区上就需有相当大的规模，并与自然、经济因素相符合，以便可以动员人力、物力，及时满足前方战争之需，又可以维持地方治安，特别是新征服地区的秩序稳定。这就需要一种面积较大、职能集中，有相当决策权的行政区划组织。行省即行中书省的简称（有时是行尚书省），表明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处理地方事务，是中央的行动机构，也就是暂时性机构。因元的征战时间长，这类机构也延续较久，加上其效率明显，遂成为正式的一级行政区划组织。元时的中期只有 11 个省，这样对中央政权的管理较为方便。当时省的面积比较大，如江浙行省包括现在的浙江省、福建省及江苏的长江以南的苏南地区；湖广省包括现在的湖南、广西、贵州和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地区。

明时，将元的行省缩小，划分为 15 省并改称为布政使司作为一级行政区划。该行政单位设官员分管行政和财务、刑事、军事的三权分立，无统一的官员。但是，在一定时期为了形势需要由中央派出官员，称为巡抚、总督集中节制一省部分地区或全省或数省的权力。结果，明后期地方多事，巡抚、总督成为常设官员，成为凌驾于省之上的督抚辖区。

清时，省由 15 个增 18 个，后又增至 23 个，内、外蒙古与青海、西藏则属藩理院。总督、巡抚变为固定官制，并将辖区调整到与省范围相一致，成为握有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的高级地方官员。由于清代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行政区划三级制仍嫌管理幅度过大，所以在省以下，府以上设立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不作一级行政单位。

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分三级，即省（自治区、直辖市），县（自治县、市），乡（民族乡、镇）。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区（或省）下设自治州、盟（盟以下有旗），故为四级。由于各省所辖的县比较多，为加强管理，在县与省之间设立地区行署，作为省的代表机构管理有关县级市、县、自治县。

（三）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行政区划

1. 美国的行政区划：美国在 18 世纪前是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的 13 个殖民地。1775 年，在殖民地居住的英裔移民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进行独立战争。经过 8 年的战争，英国失败，承认美国独立，组成联邦共和国。13 个殖民地成为美国最初的 13 个州。

在独立时（1783 年），英国除确认当时 13 州的领土作为美国的国土外，还把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大片土地亦划入美国的版图。当时其面积总共约 230 多万平方千米。在 1803 年，美国趁法国与欧洲各国战争之际用 1500 万美元从法国手中购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落基山脉以东面积约为 $2.1 \times 10^6 \text{km}^2$ 土地。其面积扩大了近一倍。1819 年，趁西班牙困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之际，用 649 万元，从西班牙人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半岛。然后，又借墨西哥独立不久，国家不稳，于 1845 年，通过战争兼并了得克萨斯。1848 年，又通过战争，从墨西哥获得现美国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两州及其西北的一块领土，总共从墨西哥获得 $2.46 \times 10^6 \text{km}^2$ 土地。1846 年，美国又从英国手中分得西部俄勒冈州及其附近的 $7.4 \times 10^5 \text{km}^2$ 土地。以后，于 1867 年，从沙俄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 年，通过与西班牙战争获取了夏威夷。这样，

从独立开始经过 115 年，美国的领土增加了三倍，州数由原来的 13 个增加到现在的 50 个。另外，美国还有一个哥伦比亚特区，即首都华盛顿的所在地。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按 1789 年的联邦宪法，每州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但不能违反联邦的宪法和法律。联邦设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是国际交往的主体，其享有征税、举债、铸币，维持陆海空军，主持外交，管理州际和国际贸易等权力。在此情况下，州仍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它可以处理本州范围内的事务，例如，以地方名义征税，管理州内工、商业和劳工，组织警卫力量和维持地方治安等。各州宪法都规定州政府机构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组成。

各州一般是二院制，设参、众两院。其职责是制定本州宪法和法律、核准预算、规定州政府组织机构和职能、监督行政部门工作。州长由选民直接选举，一般任期四年。州内各级法院法官有的是直接选举产生，有的是州长任命或议会选举产生。

在美国，州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体制不一，名称亦不一。主要分县政府、市政府、镇或乡村政府三类。地方政府从属于州政府，只行使州政府所授予的管理当地治安、消防、公共福利、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等事务。县以下包括镇和乡村。有的州，如罗德岛、阿拉斯加，州下未设县。县是立法与行政合一。美国现有县 3 000 多个，各州数量不一，面积大小差异甚大。如特拉华州只有三个县，而得克萨斯州则有 254 个县。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县只有 62km²，而加利福尼亚的圣贝纳迪诺县却大到 51800km²，是美国最小的州罗德岛的 16.5 倍。在人口上，相差亦较大，既有人口超百万的县（20 多个），亦有人口不足 2 000 的县（近 20 个）。由于城市化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有的县人口少，税收少，配备的工作人员、预算、机构亦在缩减，这不能不影响到其职能的收缩。结果，一些县的许多职能不是向上集中到州里，就是下放给新涌现的城市。因此，这些县就变成徒有虚名的空架子。加上战后地方选举有的不以县作为单位，而是按人口数，这就进一步削弱县的地位。有的州就由于遇到上述问题而撤销了县。

另一方面，有的县，特别是在城市附近的郊区县，或包括较小城市市区的县，则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化的发展，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州又不得不把有关职能下放给县。结果，这类县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则迅速膨胀。这种情况的发展与只有三四个管理人员的日益衰落的县相比，形成强烈的反差。

在新英格兰，最初的殖民单元是镇而不是县，镇实际上履行了其他地区县的许多职能。后来，随着新英格兰各州居民向西部迁移，该传统又向西传到华盛顿州。在西部，名称上改为镇区（township）。这样，镇或镇区出现在北部各州，其总数达到 18 000 个。目前，由于人口增长，城市化，镇与镇区的很多职能转给了市，结果使镇与镇区处于萎缩状态。

市是州属的政区，是由州特许而建立的自治体。由于美国工业和经济发达，城市化比较突出，城市也多。目前，美国建制为市的行政单位已超过 19000 个。但是，城市的规模差异很大，人口从几百人到超过 700 万人，面积从只有几公顷到两万多平方千米。关于城市的法律规定，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社区至少有 500 人才能编入城市，一个“特许”的城市，其人口不得少于 3 500 人。由于城市的人口和面积差异大，其管理体制亦各有不同。一般市的管理体制有市长-市政会议制、委员会制和市政议会-经理制三种。由于城

市的发展，其面积不断扩大，可是，各级行政区划事先已确定下来，各级行政单位又具有一定自治权，因此，城市的建成区往往跨好几个不同的行政区，有的通过合并来解决，有的则难以解决，这对城市的管理与发展带来不少困难。

在美国，有些问题不只涉及一个州，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不得不在州际之间成立双边的、区域的或全国性的组织，以处理彼此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协作。例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为综合性开发由纳西河流域而建立的机构，负责该流域地区的防洪、航运改善、控制水土流失、造林、水电以及其他有关开发项目。其包括范围涉及 7 个州。这种管理形式是个典型，并广为其他国家所采用。另外，如特拉华河流域委员会，是为规划、保护、利用、发展、管理、控制该流域水资源而建立的，涉及周围 4 个州，联邦政府亦作为成员之一参与。该委员会对特拉华河的水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干旱年份协调好沿河地区的用水分配。在城市方面，如纽约州的纽约市与新泽西州的泽西城、伊丽莎白、纽瓦克等城市隔河相望，为协调好两州的城市港口问题，成立了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在港口内，它有权购买、建造、出租、使用码头和设备。现在它除管理港口外，还发展到管理四个商用机场、四座桥梁、两座隧道、两个货场、两个直升机场以及车站、码头、通勤铁路、世界贸易中心等设施，成为经营管理上效益显著的部门。

2. 英国的行政区划：英国的全名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于公元 827 年建立统一的英格兰王国。在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三世于 1171 年和 1172 年入侵爱尔兰和威尔士，并将其列入英国版图。1707 年，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合并，称为“大不列颠王国”（联合王国）。1921 年，爱尔兰南部获得自治权，1936 年成为共和国。北部爱尔兰的 6 郡仍留在英国，因此，英国遂改名如上。

由于上述的历史过程，英国的领土是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 4 个古王国，所以其第一级行政区划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 4 个地区。另有一个首都所在地大伦敦地区。在这 4 个地区以下的行政单位是郡（county）和市郡（county borough，即人口在五万以上享有特权的自治市）。这些市郡，主要是在 1888 年后由其所在的郡分出，并与郡居于同等地位。这种郡与市郡的区划制度因为数量多，面积大小、人口多少差异大，不仅很多方面反映过去的历史遗迹，也不利于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管理。为此，议会于 1972 年与 1973 年分别通过对 4 个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改革的《地方政府法令》。

按照议会通过的该法令，到 1974 年，英格兰将原有的 48 个郡和 78 个享有自治特权的市合并为 40 个郡和 6 个都市郡（metropolitan county）。在威尔士则将原有 13 个郡和 4 个自治市郡合并为 8 个郡。同时，将其以下的行政区划统一为区（district），区以下设教区（parish）。在苏格兰，由于考虑其特殊情况，于 1975 年，将原有 33 个郡和 4 个市郡调整为 9 个地区（region）和 3 个岛区（island area）。因为北爱尔兰新教与旧教的矛盾和双方对立情绪，不是将原行政单位合并、数量减少、面积扩大；反而划小、数量增多，即将原来 6 个郡和两个自治市郡分成 26 个区。这次改革受到很大的阻力，各方面的意见较多，褒贬不一。

关于北爱尔兰，目前由于原爱尔兰居民信奉旧教，而英格兰的移民信奉新教。信奉旧教的爱尔兰居民愿合并于爱尔兰，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后裔愿留

在英国，双方矛盾严重，于 1995 年 2 月，英国与爱尔兰商定，建立新的北爱尔兰地区议会。其与英、爱关系定为“伦敦对北爱尔兰的管辖权只有在大多数北爱尔兰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有效”，爱尔兰“对北爱尔兰地区的地位作出任何改变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另外，对农业、运输、旅游和能源，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将由两议会组织管理委员会进行合作。

3. 法国的行政区划：在法国大革命时，由于推翻君主，扫除封建，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所以在行政区划上完全打破旧的混乱体系与封建主的割据，强化中央集权，把全国划分为 83 省（département）。后来增至 96 省。省长都由国家直接任命。省以下的行政区划是地区（arrondissement），地区以下是区（canton），区以下是社区（commune）。

在法国，目前由于经济发展，中央在对地方的管理上，感到现有的省的划分所辖的面积过小，不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资源保护与利用。另一方面在中央管理上由于省的数目过多，难以细致深入。因此，70 年代早期，在省以上建立 22 个新的大区（region），把数省集合一起，目的在加强经济与行政管理。一般，这些大区都沿用过去旧的省名，如布列塔尼、皮卡迪、洛林、阿尔萨斯等，其边界有不少与前同。

4. 日本的行政区划：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是个封建制国家。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的代表，是精神的象征。实际权力在幕府手中。那时，以将军为首的江户幕府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一切政令均出自幕府。天皇在京都，江户幕府所在地为现在东京。全国划分的大小封建领地约有 260 个，称为藩。幕府占领的土地为全国 1/4，并直辖江户、大阪、京都三大都市。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废除幕藩封建体制，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幕府被取消，权力被没收。政府宣布“版籍奉还”，命令藩主交出土地和人民的封建领有权，采取“废藩设县”，把全国划分为 3 府 72 县。首都与天皇都由京都迁往江户，并将其改名为东京。

二战后，日本由君主立宪制改为议会内阁制，天皇只是国民统一象征，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并实行地方自治。目前日本的行政区划是：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二府（大阪府、京都府），43 县。每个都、道、府、县以下设立若干市、町、村。都、道、府、县的行政首长称为知事；市、町、村的行政首长称为市长、町长与村长。地方行政组织统称地方自治体。

三、政党与选举地理

政治地理学研究中，国家这一级是重点，但是，现代国家的政治行为及政策都是由执政的政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的。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和政策的了解是离不开对政党的了解。政党的情况与特点，虽然各国家、各政党都各有特点，但是，一般说来都是反映该国家社会及有关方面的情况与特点。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都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历史学家……，可以说都属于社会科学，地理学家很少问津。可是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把政治行为和现象摆在空间上来分析和研究，发现各种问题彼此联系与相关，政党情况也不例外。政党的当政者大都是通过一个国家按宪法进行全国性选举而产生的。尽管选举程序和方式等在一个国家是一致的，但在各地方的选举结果并不一样。这点不仅与各地的自然、经济、人文现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系，而且还与其划定的选举区有某种联系。因此，

在政治地理学中出现一个新的分支——选举地理学，是一个颇吸引人的分支，而且正在蓬勃发展。所以，本节对政党与选举地理分别进行介绍，并分析其空间现象及与地理条件的关系。

（一）政党

1. 政党的起源、特点与分类：

（1）政党的起源。政党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某一集团的政治利益与政治主张，并通过参与，或掌握国家，或其下属的地方的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组织。

政党概念在中、外都出现的比较早。在我国周朝时，“党”是指乡里的基层组织，故有五族为党或五百家为党；另外，“党”又指其为亲族姻戚或意气相同的朋辈。春秋战国时，又出现“朋党”，“党人”之词，指其为上层社会中利害观点一致的人形成的集团。在唐朝后期，朝臣之间分别以牛僧孺、李德裕为代表的两派由于政见的不同，形成两派对立，相互攻击、排挤，史称“牛李党争”，开我国党争之始。其后，北宋神宗时，围绕王安石改革实行新政而出现支持与反对两派，形成所谓的新党和旧党。在明朝晚期，以东林书院的学者为中心对腐败的朝政进行讽议，提出些改良建议，影响甚大，时人称之为东林党。另外，过去历史上，下层社会为反对统治阶级及上层社会组成些秘密团体，称为“会党”。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君主政治，把这类政见集团与秘密团体视为影响其统治，削弱其权威的团体，所以将其视为大逆不道之事，故在“党羽”，“党”，“党锢”等词中，“党”都是贬意字。我国近代政党组织起于清末。由于历史原因，政党名称开始则不用“党”，而用“会”。如孙中山早期政治组织就名为“兴中会”，“同盟会”。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于公元前5世纪时，元老院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可是，关于元老院存留问题出现贵族派与平民派之争。贵族派支持元老院，民主派抨击元老院，斗争结果，民主派胜，元老院权力转到陪审团、五百人会和公民大会手中。可见政治派别组织也是早有存在。现代的政党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中议会出现以后，在议会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发展而形成的。在1679年，英国议会内部关于詹姆斯公爵王位继承权的争论，出现支持与反对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支持的议员被称为托利，反对的叫作辉格。而后，两派就成为托利党和辉格党，开现代政党产生先声。接着是美国独立后，关于联邦问题出现意见分歧。1787年，支持联邦的称为联邦党人，反对者称为反联邦党人。而后，它们由国会内部派别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

在西方，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多出现于19世纪中期以后。拉美国国家由于独立于19世纪前半期后，当初政党建立较少，只是在一战后才较普遍地出现。非洲国家的现代政党，于本世纪初在少数殖民地中出现，由于50年代以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大发展才大量出现。

（2）政党的特点。政党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第一，政党的政治性与阶级性：政党是从事政治活动的派别，它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或政见，并将这些政治目标或政见写在自己的政纲中，作为其行动纲领与目标。它与一般的学术团体不同，政党的政纲、政见虽然也是以其信仰的学说为依据来制定的，但是其追求的目标不是该学说的理论性探讨与追求，而是其社会的实践性，用其理论来改造社会。政党的政纲与政见亦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例如，英国的辉格党与托利党最初分歧在于对君主特权是限制还是维护，虽然后来“光荣革命”中，托利党接受辉格党的限制

意见，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但是两党继续存在，其分歧则转向其他方面。因此，政党的政见，可以是局部的、暂时的、政策性的，也可以是广泛的、长远的、路线性的；其形式，有系统的、成文的，也可以是因事制宜、随时发布的。

政党的政治性，其本质是其阶级性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治集团无不是代表某种或某类阶级的利益。不过，在实际上，有的政党，公开承认这点，有的并不承认这一点。由于斗争形势复杂，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政党的阶级属性，也如上述政纲、政见一样，也会发生变化。由于政纲、政见发生变化，有时，其对政党的阶级属性，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发生变化。例如，英国的托利党原是维护君主特权，代表地主贵族利益，后来入党成员逐步发生变化，到19世纪，垄断资本成分占了上风，托利党遂改变为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保守党。

第二，政党的组织系统：政党既然是政治团体，它必然有自己的组织机构，而其机构的目的在于组织与管理党员，进行政治活动，以实现政治意图和目标。没有这个组织，其政治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所谓的政治组织有时也不过成为一个清谈的机构。

由于国家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选举活动亦是按行政区划，并逐级往上进行，也有全国统一进行的。政党追逐的政治目标，也是通过各级选举，争取选民支持，以便把自己党所推荐的党员选进各级立法与行政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的党员以实现其政治目标。所以，政党亦多是按该国的行政系统的单位与等级建立自己的党的组织系统。也有的党是代表某国内的地域性民族、宗教或其他集团利益的政党，则其组织系统大多是地方性的。

政党的组织的严密程度与稳定性对政党力量与影响关系很大。严密程度与社会和政党性质以及党所处地位有关。稳定性往往与党的成熟程度有关，有时与社会的变动、该党的活动的成败有关。在社会稳定、政党的政治活动顺利时，党的领导及党的机构就比较稳定。反之，就会出现不稳定现象。

第三，党员的纪律要求：参加政党的人，是信仰该党所遵奉的学说与理论、支持其政治纲领与目标、愿意接受其领导、遵守其纪律、参加其活动，以集团的或个人的行动实现党的目标。为了党的事业各政党大多对党员有一定纪律约束。

政党的纪律是保证党的行动与其政治目标实现的基础，但是使党员自觉遵守纪律，除对党遵奉的学说与理论的坚定信仰外，主要是在于入党的自愿、退党自由以及民主集中制的实施。对党来说，亦与对党员入党及党员管理制度有关。

以上三方面，可以说它是一个政党的基本特点，亦是与其他团体的区别所在。但是，社会情况千变万化，各政党在上述三方面特点的体现上亦有很大差异。

(3) 政党的分类。政党虽属政治集团，但因其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阶级基础、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地位、活动范围等方面的不同而有不同类型。

第一，按阶级划分，主要是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有共产党，有的国家亦有称工人党或其他名称的党。资产阶级政党，名称多种多样，如英国的保守党、日本的自由民主党。此外，按阶级划分还有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第二，按意识形态划分，大体有五类。一是资本主义政党。二是民主社

会主义政党，如有的国家中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或工党。三是共产主义政党。四是民族主义政党，如爱尔兰的芬尼亚党、智利的激进党。五是与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的党。如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伊斯兰教国家，宗教与政党关系更为密切。另外，近来还出现以注意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目标的绿党为名的生态主义党。不过，目前还比较弱小。

第三，按政治地位划分，有执政党、在野党之分。此外，还有以所在国的法律为依据而分，有合法党、非法党或地下党。

第四，按活动范围划分，有国家党、民族党、地方党。国家党以全国范围的全国人民作为其争取对象。地方党是以其所在国内某个地方活动的政党，如法国在科西嘉岛上的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同盟。民族党是在其所在国的某个民族地区活动的党，如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地区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这些地方党、民族党都是代表该地方、该民族的某种利益争取所在国的宪法认可而具有特殊地位为目的。有的是自治，有的是以分离为目的。

另外，还有以党员数量来分大党、小党。不过，这只能相对来说，无绝对的数量界限。

2. 政党制度：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党制度是该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产物。它首先取决该国的各阶层，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与相互关系，其次是各政党的历史发展与相互关系，再次是国家制度和选举制度。各国的政党制度虽各有差异与特点，但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是一党制。一党制是由一个党长期执政的政党制度。出现这种政党制度的情况亦各有不同。一是一些民族独立运动中出现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在非洲。有的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过程中就是单一政党领导（如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有的是在独立以后，将所有政党合为一个政党（如坦桑尼亚的革命党），有的在法律上不允许其他党存在等原因而形成一党制。二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当其处于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时，采取一种极端专政形式的一党制。二战前及战争中的德、意、日法西斯独裁制度就属于这一类。

第二是两党制，即在一国内，存在着势均力敌的两个政党。它们控制着这个国家的议会，并在政府里交替执政。有时，亦有其他政党存在，但由于力量太弱，影响太小，与两大党相比，居于次要地位。

在世界上，两党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在一般情况下，都是交替执政的，一党在台上，一党在台下。有时，在特殊情况下，亦出现两党联合执政情况。

第三是多党制，即一个国家内，存在着多个政党并存，彼此竞相执政。多党制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等。虽然这些国家都是多党制，但情况亦有不同。如法国、意大利，政党比较多，没有一个政党能通过选举而在议会取得多数，所以在政府中，只能实行几个政党联合执政。由于各政党的利害关系不同，彼此间时而妥协，时而矛盾。今天这种不同政党联合上台执政，明天联合执政的政府垮台。这种不稳定的组合，不稳定的政府也就成了这类国家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德国是大党与小党并存。大党虽然在选举中获得议会的较多议席，但是往往不能超过半数，达不到法定组织政府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大党往往必须与小党联合才能组成政府，小党在制约和平衡中，往往起着关键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组成的政府比法国、意大

利稳定得多。另一种情况是日本，日本虽然也是多党制，但是自由民主党是1955年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大政党合并而成，在议会中占绝对优势。因此，在日本，从1955年开始直到1993年，一直是自由民主党执政，只是由于自身的分裂及自由民主党以外的大部分政党组成联合阵线时，才改变这种实际上的一党制的一统天下。

第四是多党合作制，即多党长期稳定合作的制度。在我国，于革命与建设过程中，长期与民主党派共同合作，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而形成的政治制度。其特点是在共同合作中，各民主党派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国家的总任务作为党的共同政治纲领；各党派共同参加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协商、决定；各党派均以宪法为准则进行活动与相互监督。这是根据我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与要求而采取的政治制度，它有利于国家建设、政治稳定。

3. 各主要国家政党情况：美国。在美国，政党出现于独立后不久的1787年关于联邦问题的分歧，形成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后，联邦党人支持中央集权，反联邦党人主张扩大州的权限。前者于1795年组织联邦党，后者于1791年组织共和党。联邦党后来由于内部分裂，及美英战争（1812—1814年）中亲英立场失去公众支持而消失。共和党内部得势的一派（民主共和党）于1840年改称民主党。1854年，由1834年成立的辉格党中退出的大部分党员组成共和党，由于支持废除奴隶制而获得国内各阶层拥护。从此，两党制开始形成，并交替执政。从1933年以来，民主党总统有罗斯福（1933—1945年）、杜鲁门（1945—1953年）、肯尼迪（1960—1963年）、约翰逊（1963—1969年）、卡特（1977—1980年）、克林顿（1993—）；共和党总统有艾森豪威尔（1953—1960年）、尼克松（1969—1974年）、福特（1974—1977年）、里根（1980—1989年）、布什（1989—1993年）。美国除民主党、共和党外，其他党人数都较少，大多不稳定，影响甚小。

英国。英国于1676年，议会中围绕詹姆斯公爵王位继承问题出现分歧。支持的称作托利党，反对的称辉格党。后来，两党分歧在于前者是维护君权，后者是限制君权，提高议会权力。19世纪30年代，托利党演变为代表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及大商人利益的政党，改名为保守党；辉格党演变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改名为自由党。到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保守党由于代表垄断资本主义而继续存在，自由党则由于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失势而衰落。此时，工人阶级的壮大，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出现了工党。因而，保守党与自由党的对立转到保守党与工党的对立。从1924年以来，保守党与工党交替执政。从1979年以来，几次大选中，都是保守党占优势，撒切尔夫人长期执政，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现任保守党首相是梅杰。英国亦与美国一样，除保守党与工党外，还有几个小党，人数不多、力量弱、影响小。

法国。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在此以后，一直是共和和帝制交替，一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1870—1940年）才开始稳定下来。在此之前，由于各阶层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分歧，出现各种政治派别，为以后现代政党建立打下基础。第三共和国时期，主要执政党是属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法国激进社会党。此时，出现许多工人阶级政党，经不断变化形成法兰西社会党、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二战后，出现大量政党，1944—1958

年间换了 25 届政府。1958 年后，政局较为稳定，但政党到 80 年代仍有 40 多个，主要是法国共产党、法国社会党和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联盟，分左、右两翼，成为影响法国政局的主体。

德国。在德国，政党组织出现于 19 世纪 50 年代。有保守党、人民党、中央党，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工党（后改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人数较多、力量强、影响大，成为德国的主要政党。1937 年，希特勒的纳粹党（即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当政，实行法西斯一党专政。二战后，实行多党制，大大小小政党有 100 多个。但是，在西德议会中却是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 3 个政党组成。前两个政党席位多、自由党席位较少。从 1949 年进行选举以来，都是社会民主党和联盟党所代表的左、右两翼交替占优势。从 1949 年以来的执政时间来看，联盟党执政时间为 27 年（其中与自由党联合执政占一半），社会民主党执政为 14 年，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为 4 年。现担任政府总理的为联盟党的科尔。

在 1949 年至 1990 年德国统一前的民主德国，执政的一直是德国统一社会党。1990 年，该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会的建立促进了日本政党形成。最早于 18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有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后经不断分化、改组演变成二战前的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即保守党-立宪政友会和立宪民政党。19 世纪 20 年代，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出现一些社会主义政党与共产党。在二战中，实行军阀法西斯独裁，解散一切政党。战后，原两大党分别成立自由党与进步党。这两党又于 1955 年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是日本第一大党，从 1955 年到 1993 年一直是执政党。此外，日本还有社会党（1945 年成立），共产党（1922 年），公明党（1964 年）和民社党（1960 年由社会党分出）。

由于自由民主党内派系林立，矛盾加剧，于 1993 年，该党出现公开分裂，先后出现新党、新生党和先驱新党。因此，自由民主党失去议会多数，成为在野党。而分出的小党与社会党、公明党等联合组阁成为执政党。1994 年，因社会党退出，联合体制垮台，社会党反而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在这种情况下，新生党、新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联合建成新的新进党。这表明日本有可能随着其形式的变化，向两党抗衡的“德国式”构架方向发展。

印度。在民族运动的基础上，于 1885 年成立印度国民大会党。在本世纪 20 年代后，还出现其他政党。1947 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国民大会党在 10 次大选中，除 1977 年的第六次大选，1989 年第九次大选失利，未获得多数席位成为在野党外，一直是印度的执政党，在印度具有很大势力与影响。印度除国民大会党以外，还有国大党（社会主义派）、人民党、印度人民党、民众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等党。其中人民党于 1977 年和 1989 年两次大选获胜。由于印度是联邦国家。除上述全国政党外，还有 20 余个邦一级政党。

4. 政党的时、空变化：关于政党时、空的变化，在政治地理教科书与多种著作中阐释的不多，可是泰勒的政治地理著作却给予很多注意。下面基本根据其论述作些介绍。

先谈关于政党的时间变化。上面我们已提到，政党的出现，就以最早的英国来说，是在 17 世纪末叶，至今只有约 300 年的历史。对亚、非、拉大部

分国家来说，则晚得多，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少数时间较长。所以，就此情况，在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情况有明显的不同。它与经济上的核心与边缘现象有紧密联系。

（1）核心地区政党的发展。政党的发展，大体上受国内、外两方面条件的影响。国内条件，主要是社会经济条件。我们知道，从西方国家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社会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资产阶级的力量与影响日益增强，财富进一步集中在他们手里。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后者要维护自己的特权，要限制资产阶级的权力与影响；而前者则要竭力扩大自己权力与影响。经过斗争，封建君主与贵族的特权削弱，甚至被取消，或者经过改良，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立法权归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或者帝制被推翻，建立共和。

在国家权力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以后，资产阶级在积累财富上，对内实行对工人进行剥削，对外要占领市场。另外，在实行普选权上，资产阶级希望借此来削弱封建残余力量在议会与群众中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势力与地位，所以有积极推动普选愿望。但是，又怕下层社会借此获得权力，削弱自身力量。因此，在资产阶级内部存在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不同政见。前者，在经济上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在政治上，限制下层社会的政治民主。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的发展，工人数量的增加并聚居于城市。他们在经济上受到的剥削使生活处于困境，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兴起。随着普选权的推行，工人参加选举，为了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政党于是出现，他们积极领导工人运动。结果，使工人运动与政党的发展结合起来。这样，政党得到壮大，提高了地位，经过选举进入议会；工人群众参加运动，提高了政治意识与组织性。政党的议会斗争与群众运动的结合使政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原来，在议会中，议员们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不同，对一些问题产生分歧，遂逐渐形成派别，由派别组成政党。英国议会的不同派别而形成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就是这样产生的。而后，虽然辉格党被自由党所取代，但英国此时的政党仍是代表上层阶级的利益，其分歧、矛盾、斗争仍只限于议会，群众的参与性比较少。因此，这种政党可以说是代表上层阶级，由少数人把持的议会式的政党。在利益矛盾上，大体上存在于：君主与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城市的工业资产阶级与农村的土地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对外的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之间。这可以说是政党发展的第一阶段。

当工人群众数量增加、政治觉悟提高、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的出现，使政党的发展进入到群众性运动阶段。由于普选制的出现，劳动阶级为了反映自身的利益与愿望，需要有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通过广泛宣传，开展群众运动，组织竞选也就应运而生。这种群众性的政党出现，把数量多、政治意识薄弱的劳动群众组织起来，提高其觉悟，动员其参与政治活动，反映其要求，扩大其影响，推选其代表进入议会参加权力斗争，打破了原来上层阶级在议会中的一统天下。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原来议会式的政党也被迫转向群众性的政党，通过宣传、组织活动来争取群众的支持。这在英国就是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工人运动兴起，工党出现作为标志的。原来的自由党由于其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失败而失去其影响和地位，其与保守党形成的两大党制度遂被工党与保守党的两大党制度所取代。从普选制实行以来，就已出现的为争夺选民、获取议会多数而组织的竞选机构，逐步发展成按行政区划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机关，在群众性政党的发展中而

更加严密与广泛。

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有组织的政党活动，动员各阶层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群众性政治活动中，劳动群众的政党所采用的手段是动员群众获得对自己的支持，目的是维护本身的利益，通过政治活动来获得生活的改善，注意财富的分配问题。而上层阶级的政党，则其手段是利用组织获得选票，通过在政治上的权力，保护和增加其财富。这两种对立目的政党在竞选与争夺权力中，不仅把群众动员起来，而且也把社会各种矛盾暴露出来。虽然矛盾的暴露、群众的参加，造成社会集团之间的对立与裂痕，但是，普选与议会也为政党之间的竞争，各种矛盾的解决与妥协提供了出路。对选民来说，尽管矛盾和问题很多，意见和看法差异很大，但是，解决问题则最后总归是在不同的政党中进行选择。而于各政党则亦通过竞选、掌权、对国家的管理来检验其效果。可是，两类政党在竞争过程中向群众化方向发展，其所代表的阶级和利益不同，群众基础不同，既得利益不同，一类是通过动员，获得支持，目的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另一类是通过组织，获得权力，目的在于维护和增加其财富。

在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社会上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传播媒介的普及，政党的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即代议政党阶段。它首先反映在各政党的政见上，纲领虽仍各有不同，但是其矛盾并不像第二阶段那样分歧、差异和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大的方面趋向和谐，仅在策略性的措施等方面存在不同。在竞选活动方面，尽量利用新的传播媒介，党的领导与其所推荐的候选人直接与选民接触，以争取选票。这也就是所说的，各政党在竞争宣传活动中的“政策包装”、“形象策划”和“候选人的推销”则以“民意测验”为依据，以广告为手段。这些方式和方法与第二阶段的竞选中的那种动员和组织的群众运动大不相同。这种情况，使发达国家原来政党依赖党员数量、组织严密、群众运动声势的竞选活动发生变化。尽管，各级党的机关仍然存在，但组织与活动力多不如前。

在这阶段，各政党对社会问题的焦点，是通过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提高其生活水平，来争取群众的支持、增加选票和获得权力。因此，原来在第二阶段中，各政党所代表的那种阶级利益上的冲突削弱，思想意识形态的争论趋缓，社会福利成为竞选纲领的主题。不论左、右那派政党执政，群众都获得了实际的生活改善与各种福利。因而，出现“福利社会”，“福利国家”。这反映了各政党的政策的协调，也反映国家决策中对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平衡。这就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发展中第三阶段的特点。它说明，群众只在竞选时选择政党，而选举后，群众就无大的群众性活动，靠所选择的政党参与代议制的政治，故称为代议政党。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即核心区的国家政党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分析其特点的差异性。

首先，在第二阶段，由于政党的对立，政党开展群众运动，社会多种矛盾公开化，这些矛盾往往是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思想的……相互交错，给社会带来较大震荡。特别在一战以后，各国经济发生困难，而且接着发生资本主义出现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30年代的大萧条），使社会变得更加动荡。在这种情况下，英、法都出现两大对立的左与右政党交替执政，或联合执政，以摆脱社会的困境。而在德、意，特别是德国，由于作为战败国的赔款问题使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结果出现极端反动的法西斯政党执政，把世界

拖入战争中。可是，在美国，由于议会党，并未转入群众性党，而是在罗斯福总统执政时，则转入新政时期的第三阶段的代议政党阶段，即超越群众性政党这个阶段，直接进入第三阶段，为西欧国家在二战后进入代议政党阶段创造经验，树立典型。

其次，在一、二阶段的英、美就是两党交替执政，所以第三阶段仍然是两党制，而且是更加巩固与稳定的两党制。而多党制的法国与德国，则以左、右两翼政党（如法国），或政党的稳定联盟（如德国）的类似两党制形式在发展。也就是政党从多元化，向两极化与谐调方向发展。

第三，核心地区各国政党的发展，往往亦与其外在条件或环境有关。特别是本世纪的上半期，虽然经济危机加重社会矛盾，使政党在群众性政党阶段的发展产生波动；但是，两次大战使国内矛盾服从于国际矛盾，也限制了这波动的进一步发展。在二战后，美、苏对立，以冷战相互威胁，核心地区，各国右翼政党亦不得不采取左翼所代表的群众的利益，关注生活福利提高的政策。因而，促进国家成为“福利社会”，政党向着协调方向发展。

第四，政党的发展，实际也是政治的发展，它与经济的发展是有某种联系。政党的发展推动因素之一就是财富的分配。特别是第二阶段，这个矛盾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较为突出。第三阶段，核心区国家战后经济有了巨大发展，进入了后工业化的消费社会，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为缩小分配矛盾、进入相对协调的社会创造条件。协调的政党也是其经济形势与政形势发展的反映。虽然后工业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但毕竟情况与第二阶段有所不同。

（2）边缘与半边缘地区政党的发展。既然政党是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反映，位于边缘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变化必然与核心区发达国家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这充分反映了政党在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在边缘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情况差异，政党的发展亦有所不同。

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出现在 19 世纪的前半期，但是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才有较大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增大，到二战结束时，新成立的政党较多。过去拉美社会动荡，产生大量的军人政权。这可以说是拉美较为普遍的特征。通过军事政变形成军人统治在有的国家非常突出。如自 1825 年独立以来的玻利维亚，就发生 179 起政变。有的国家则长期为家族军人统治，如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父子三人统治时间长达 43 年。在 70 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上升，城市中产阶级势力壮大，劳动群众的觉悟与组织性提高，联合反军人统治运动的斗争，迫使军人政权还政于文官政府，这对拉丁美洲的民主进程与政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非洲。由于长期殖民统治，国家独立多在二战以后，所以非洲政党的出现多集中在独立前后。由于争取国家独立目标一致，因而形成强大的单一政党。独立后，不少国家为一党制。但是，非洲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滞后，民族、部族众多。因此，独立后内部矛盾开始突出，加上经济问题较多，结果，有的继续实行一党制、有的成为军人政权、有的转向多党制。后来，由于内部矛盾，外部压力，一党制的国家也向多党制转变，而军人政权亦多出现更替，使其政坛多变，成为非洲的重要特点。其原因之一是政党的基础不稳定，各政党所得到的支持多与其本身所代表的民族、部族有关，很难获得全国较广泛的支持。例如，非洲加纳的恩克鲁玛总统所领导的党在 1954 年至

1960年的四次选举中，支持总统的选区多集中在该国西南部与首都地区。而1969年至1979年的四次选举，由于恩克鲁玛的离去，总统易人，其支持的选区则因人而异。

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在50年代以来，较为稳定的一党执政的情况下，经济能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在经济有了显著进展之后，在80年代以来，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革，出现了新的政党，多党政治形势开始形成。这种在经济发展和政党活跃两方面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已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注意。

东欧。许多国家由于1989年的变化，原来工人阶级政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转向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但是，各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所以其变化与发展亦不尽相同。泰勒对此亦根据其对世界系统的分析来说这个半边缘地区政党变化与经济形势的关系。

在1989年，先是在波兰的8月选举中，团结工会取得了胜利，接着组成一个非共产党政府，随之在1989年的下半年，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执政的局面都发生了剧变。继而新政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多党选举。因此，在1990年，东欧各国进行了大选。结果，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共产党仍获得优势，在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仍然是执政党。可是，在东欧其他国家，则由非共产党执政。看来，在东欧亦出现分化。

如果与核心区相比，在边缘地区政党的发展，可以说其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协调。其开始是，反对外来的统治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而形成政党。这时，本国的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以及中产阶级都未形成，经济仍然是封建的殖民地性经济占重要地位。独立较早的拉丁美洲，开始政党形同虚设，长期是封建地主或军人执政，或二者结合进行统治，而且长期遭受军事政变之苦。亚、非两洲独立后多为一党制，长期一党执政。但是，如果在其执政过程中，不能使经济、社会得到相应发展，必然为其他政党所取代。如果，社会、经济得到相应的发展，社会的改革得以进行，政党亦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选举地理

1. 选举制度：选举制度是指选举国家各级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和制度。

（1）选举原则。现代各国的选举都是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或间接）、秘密等原则。

按各国法律规定，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外，凡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这种普遍选举原则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等条件限制。

平等原则是指每个选民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选举。即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每张选票的效力相等。即“一人一票”，“一票一价”，它已为各国普遍采用。

直接选举是指国家机关的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由选民直接投票选出。间接选举是由选民选出代表选举人，再由他们选出一级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

秘密投票是指选举人填写选票不向他人公开，不署名，并由自己投入票箱。这种办法有利于选民自由表达其意愿。

（2）选举程序。选举程序大体有设立选举机构，划分选区，确定选民资格，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以及竞选、投票、计票等。

设立选举机构是为了选举需要，它主持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选举工作。

选举区划分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以各国的行政区为依据作为选区进行选举；另一种是以人口数量作依据而划分的选区。每个选区能选出的代表名额，各国按选举法规定有所不同。选出 2 名代表以上的选区为大选区制（或多名选区制）；只选 1 名的为小选区制。

选民登记是按选举法规定确定选民资格，然后登记，并发给符合资格的选民以选举证。

候选人的提出在大多数国家都由参加竞选的各政党提出。除去这种推荐方式外，还有个人申请的自荐方式。不过，推荐的或自荐的都要符合各国的选举法的规定。

竞选是获得选票与当选的重要手段，所以不论政党或个人竞选机构都是全力以赴，通过各种手段开展活动。目前由于大众媒介比较发达，特别是电台、电视台等成为有效的竞选手段。因此，竞选活动往往花费大量金钱。

投票，现多采用秘密投票方式。计票方法有两种。一是多数当选制，即在选区内获得多数选票（有的是绝对多数，有的是相对多数）的代表候选人或者政党，可当选或独占该选区议员（或其他国家公职人员）席位的制度。二是比例代表制。即竞选的各政党以所获的选票在总票数中所占比例分配议员席位的制度。在这两种计票方法中，目前多采用第一种方法。

2. 选举地理

（1）选区。选举在一个国家内，大多是按所划定的选区进行选举。由于选区的划分对选举的公平、成败关系甚大，而且与地理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成为选举地理学中研究的重点，吸引很多政治地理学家和政治学、社会学家的注意和兴趣。

就拿美国的众议员来说，按宪法规定，全国为 435 名。每个州应选出的众议员人数是按每十年一次的人口调查统计数字来调整的。如果州的人口统计数增加，其在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也增加，则其众议员人数比例也随之增加。反之就相应减少。这样，该州内选举众议员的选区数就要调整，选区就要重划。有时，即使一州的众议员应选人数未变，选区数未变，但是，原划的选区由于人口迁出、迁入、自然增长，使各地区的居民人数发生变化，造成各选区内的选民人数出现较大差异，于是在不同选区中的选民的票就不符合“一票一价”的公平原则。为了使每个众议员的选区选民人数大体相等，符合“一票一价”的公平原则，就需要对选区进行重新划分。

重划的选区如果只考虑到每个选区的选民人数十分接近，则每个选区的议员所代表的选区的选民人数也是十分接近的，就符合公平原则。可是，单纯地考虑选区内选民人数，而在划分选区时未考虑选区内竞选政党的情况，则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时对某一党有利，对其他党不利。

我们可以假定一个行政单位有 40 000 选民，要选出 4 名议员（或代表）。为此，划分出 4 个选区。每个选区有选民 10 000 人，选出一名议员（或代表）。选区中都有 A 党和 B 党两个党竞选。按多数选票当选，则得票超过 5 000 张的党即可获得该选区的胜利。

假定划的各选区支持 A 党、B 党的选民是均匀分布的，则出现以下结果：

- 第一选区，支持 A 党 6 000 人，支持 B 党 4 000 人；
- 第二选区，支持 A 党 6 000 人，支持 B 党 4 000 人；
- 第三选区，支持 A 党 6 000 人，支持 B 党 4 000 人；
- 第四选区，支持 A 党 6 000 人，支持 B 党 4 000 人。

这样，A党在四个选区中均获超过半数选票而获得4个议席。B党则以四个选区中获得票数均不超过半数而落选，没有一个议席。

假定划分的各选区支持A党、B党的选民不是均匀分布，而呈相对集中，则可能出现以下结果：

第一选区，支持A党8000人，支持B党2000人；

第二选区，支持A党8000人，支持B党2000人；

第三选区，支持A党4000人，支持B党6000人；

第四选区，支持A党4000人，支持B党6000人。

这样，A党和B党各在两个选区中，获得过半数选票而当选。两个党各得两个议席。

假定划分的各选区支持A党、B党的选民既均匀，又不均匀，介于上述两情况之间，则可能出现以下结果：

第一选区，支持A党7000人，支持B党3000人；

第二选区，支持A党7000人，支持B党3000人；

第三选区，支持A党7000人，支持B党3000人；

第四选区，支持A党3000人，支持B党7000人。

这样，A党在三个选区中获胜，得3个议席，B党在一个选区中获胜，得一个议席。

我们可以看到，在该地区，四个选区的40000名选民中，支持A党、B党的人数占总选民数的60%与40%。在三种情况下，尽管其选民支持者比例未变，但其获得议席比例变化相当大。

第一种选举结果，A党议席4为100%，B党议席0为0%；

第二种选举结果，A党议席2为50%，B党议席2为50%；

第三种选举结果，A党议席3为75%，B党议席1为25%。

以上三种结果中，第一和第三种，A党分别获得4个与3个议席，是胜利的，而B党则是一席未得，或仅得一席，可以说是失败。第二种情况，双方各得两个议席，对B党来说是胜利，对A党来说有些不利。这三种情况都是一个行政单位中划分为不同的四个选区而产生的。这里我们看到可以通过选区的划分，使选区内选民的空间分布发生变化，这就有利于竞选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的情况，在选举地理学中称之为滥用选举（electoral abuse）。对于滥用选举使该地区内，竞选一方获得的议席百分数与获得的选票百分数出现不相对应现象，在选举地理学中称之为分配不均（malapportionment）。上面列举的三种情况中，支持A党、B党的选民都是60%和40%；而A党、B党所得议席百分比则不同。拿A党说，第一、三种选举的议席结果分别100%与75%，比支持该党的选民占总选民的60%分别高40%和15%。这种相差，如获得的议席的百分比高于获得的选票百分比为正，则称之正偏差（positive bias），如为负，则为负偏差（negative bias）。A党在三种情况下，两次正偏差，分别为40%，15%，一次负偏差10%。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选区划分，一是要按规定使区内选民人数相接近，二是对各竞选政党或集团是公平的。解决第一个问题，由于人口是流通的，其密度的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而集聚的空间面积大小不一，故有事实上的难度。但是，真正困难的还是第二个问题，因为选举偏差只有在选举后才得知，选举前只是推测，大体说来影响偏差的因素有种族、民族、阶级、阶层、职业、信仰、教育、文化，对各政治、经济、社会等事物的态度等等，研究

起来十分复杂。不论是官员、学者、政党、名流，还是其他方面代表人物总是在不同问题上持有偏见，对划分选区意见殊难统一。所以，选举区既是政治地理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其参与实践的重要领域。

(2) 选举地理研究。除选举区以外，政治地理学家对选举地理的研究还包括其他 3 个方面，即投票的地理分布，投票中的地理影响和选区的划分。

投票的地理分布研究，即在一次选举以后，分析投票结果的空间格局。因为，一次选举，特别是一个国家几年一次更换国家领导与选择某政党执政的大选是一件大事，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国家大事，吸引了全民的关注。获胜的政党与人物为了更好地执政，需要从投票情况中来考虑如何制定政策。落选的政党和人物需吸取教训改进工作，要反思选举投票结果。

政治地理学家传统的方式是将某次选举的结果的各种资料填在地图上，然后进行分析，找出空间分布的原因，说明其与某种因素的关系。但是，在计量革命以后，多利用各种统计数据，并作出模型以表达研究成果。

如果通过较长时间的多次选举的投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就可以发现，支持某政党的选民在某些地区是比较稳定的，在某些地区是变动的，有的地区则是反对党获得稳定支持的地区。例如，在英国，威尔士地区的 8 郡，苏格兰最北部的 6 郡，长期以来是反对保守党的选区。其原因是这里原来是凯尔特人居住区，虽然合并到英国，但其地方主义情绪十分强烈，所以反对保守党的思想长期存在。可是，在北爱尔兰 6 郡中的东部 3 郡，则是信仰新教的英裔居民为主，特别是与西部 3 郡中有较多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相比，该地支持保守党，与英国维持统一的思想占上风。上述的凯尔特人居住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的地方主义思想近来重新活跃起来。

投票中的地理影响是要多注意行为地理方面在投票决策中的影响。这里有以下四点。首先是，投候选人票中的“朋友和家乡效应”，即指一个候选人往往在其家乡能得较多的票。这种现象在美国、日本、爱尔兰、新西兰等国的选举研究中得到证实。其次是，投票所涉及的问题在某些地区显得比其他地区更重要。当然，该问题会影响参加投票的人的决策。第三是，竞选效应，即其活动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中，要注意目标，应在关键的州多搞些竞选活动。这也就是说竞选活动要看情况，注意差异，不要一律对待。第四是，邻里效应，它是研究投票中的地理影响最突出的方面。这是要说明，为什么一个党在其支持区做得比预期的好，因为参加投票的选民得到的有关信息除公共媒介外，还通过对人的接触，这方面的信息虽然会有些偏向，但在决策中起重要作用。人的活动多受其工作单位与生活地区的影响，而这里的人与他接触得多。

选区的划分是个重要问题，在上面选举区中已提到，即使选民的空间分布不变，可是划出的不同边界的选区则会影响某个政党获得议席的多少，这也是决定某个政党是否执政的关键，不能不引起各方面关注。这种情况对那些采取多数当选制度的国家特别重要。

选区划分先是解决选区的人口数不等的现象。因为过去的选区划定后，人口随着经济发展出现大的迁移。开始是乡村向城市迁移，而后又是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如果选区不变，则乡村地区按人口来说，会在较少人口中选出较多议员，而城市选区会产生相反结果。在美国，这种情况，于 60 年代，法院坚持各级选区都应采取等量人口原则后有所解决。

关于选区边界的划分，如果某些政治家划出边界对其自身政党或集团有

利，而使其他政党或集团浪费了选票，对议席不是当选甚少，就是一无所获。政府批准这种边界就无异巩固该党或集团在此选区中的垄断地位，成为该党稳定当选的安全区。

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采取中立团体来执行划分边界任务较为合适。但是，中立团体保持中立立场只能说在划分边界上不存在偏心，但是无法保证其在效果上不出现偏差。这也就如某些政治地理学家所说的一条格言，即“一切组织都是偏心的”。

边界难以公平划分在于支持各政党或集团的选民空间分布格局并不一样，其集散情况各有不同，所以划出的选区必然是不同程度的混合，各种方式的格局。即使是任意划区也无法避免对各党或集团的偏差。在英国，由于工党在城市和工业区支持者占优势，保守党在农村、郊区占优势，其划界在不同地区产生的偏差会相互抵消的情况。

如果由党人或非党人划的边界都不令人满意，是否可以由两党人员共同商议来划分选区边界呢？这种情况在美国较为流行，两党成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委员会进行划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协商而违背着选民的利益。两党划界趋向于形成各党稳定当选的安全区，只有在边缘选区中，议席落于哪个党手里成为未知数。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减轻了两党竞选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在美国的 1974 年的国会选举中可以看到其影响。那时共和党因水门事件而名声受损，可是选举中，由于存在稳定当选的安全区，其损失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大。

由上述情况看，选区边界划分的复杂性及其重要性，特别是其地理的空间性十分强，所以吸引了许多政治地理学家去研究、参与，并成为政治地理学中的一个热门课题。

第五章 综合国力

一、综合国力的概念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即国家的总体力量。它即包括物质因素（硬国力），如资源、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又包括精神因素（软国力），如政府质量、政治体制、外交关系等。

国力研究的历史十分悠久，但作为一种理论的国力学的系统研究，则是到19世纪末才在西方得以发展。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国力研究又进入了综合和量化分析的阶段。综合国力理论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及专家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

今天，综合国力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在冷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尽管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打不起来，因此一个国家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强弱，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大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不仅仅来自于军事，同时也来自于经济、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有时经济、科技安全比军事安全更为紧迫，更为重要。为适应形势需要，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战略，提出了旨在提高本国以经济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新的蓝图。可以想见，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将是争夺下个世纪战略优势的主战场。综合国力研究将成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军事战略家们分析形势，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综合国力研究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对综合国力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和研究，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寻求一种科学的对策，以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

由于国力是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而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国力问题也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下面我们将对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及综合国力的分析测算方法作一介绍。

二、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

（一）领土

国家领土的幅员、位置、地形等不仅在国防上有着重大价值，而且在经济上也有重大意义，因此它们是构成综合国力的最基本的要素。下面我们从领土的地理位置，面积大小以及地形地貌几个方面来分析国家领土在综合国力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1.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又可以细分为自然地理位置、交通地理位置、国防地理位置等。

（1）自然地理位置。自然地理位置是指某一国家与地球上的陆、海、山、河等自然物的空间位置关系，尤其是海陆关系。自然地理位置对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均有一定影响。

在国防建设上，自然地理位置不同的国家往往会有不同的对策。那些深居内陆的国家（如尼泊尔、奥地利、阿富汗等）往往侧重发展陆军与空军，它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建立自己的海军。海洋国家（岛国，如英国）则注重发展海、空军，因为这些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和海洋息息相关，国家的安

全依赖于战时对周边海洋的有效控制。而沿海国家（如中国、法国等）则需建立陆、海、空军，因为他们既要保护领空和陆上领土，还必须有海上力量来保护海洋权益。

在国家安全方面，也与自然地理位置有关，在武器装备上，技术还不高度发达时，则更为明显。例如，美国东西濒临两大洋的地理位置特点，使其本土长期免遭战火的洗劫和破坏。这也是美国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英国也因为其与欧洲大陆之间有一道海峡相隔，使它成为 800 多年来欧洲唯一没有被敌国攻占的国家。即使是二战中，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最终也未能越过这道天堑，占领英国本土。

（2）交通地理位置。交通地理位置也有极大的战略价值。位于世界海陆交通枢纽和咽喉地位的国家，如新加坡、巴拿马、埃及等，因拥有或接近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这些国际通道，平时可以借其地缘优势发展经济，战时则是制约别国的重要砝码，使本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身价倍增。同时交通地理位置重要的国家和地区也往往因此成为列强激烈的角逐之地。可见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安全与交通地理位置也有直接联系。

（3）国防地理位置。国防地理位置又可称政治、军事地理位置，是指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空间关系，它与国家安全有更直接的关系。一般说来，周边邻国较多，边界问题复杂的国家，爆发战争或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与世界及地区霸权主义为邻的国家受战争的威胁则更大。而处于战略力量交汇地的国家，因对各方均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其国际事务中地位也就更为突出。如朝鲜半岛，在冷战时期，是东西两大阵营的前哨，现在则是亚太四大力量（中、俄、美、日）的交汇地，因而其政策向背对各方均有较大影响。

应当指出，地理位置的价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随着国际关系，交通条件，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如埃及和巴拿马两国原先的地理位置并不十分重要，但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使这两个国家在世界交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德国在整个冷战时期是美、苏对阵的最前沿，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曾十分显著，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瓦解，这种价值也就随之降低。北极地区长期以来是个寒冷而不引人注目的地区，但随着世界各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北极地区的地理位置的价值开始显示出来，因经由北极圈内的航线是欧、亚、北美三洲间最近的航空线。可以想见，随着航空时代的发展，北极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可见，地理位置与一个国家的战略价值与安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也应认识到这种价值是发展的、变化的。

2. 国土面积：国土面积作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为中外学者所公认。因此，我们评价一国实力时，往往首先关注其幅员大小。

一般说来，国土面积越大，国力也就越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土面积大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有利条件。通常“地大”总是与“物博”相关联的。国土辽阔，资源也就越丰富，国家实力也就越雄厚。目前世界上的领土大国，如俄罗斯、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均是资源大国。广大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是一国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正因为领土面积对一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所以当美国于 19 世纪初从法国手中买到 213km² 的领土时，美国驻巴黎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说：“从这一天起美国

取得了第一等强国的地位”。波拿巴也说：“领土的增加永远确定了美国的强国地位”。

其次，辽阔的领土在国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平时，国家的空间大，便于合理地分散配置其工业、军事基地、军事力量及各种国防设施。这就有利于提高国家和军队在战时，尤其是遭受到打击时的生存能力。相反，国土狭小的国家，工业、军事基地等在布局上选择的余地较小，对国防建设不利。战时，辽阔的领土则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巨大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初期，可以用部分领土换取宝贵的时间实施军队的部署和战争力量的动员。力量相对弱小时，部队可以利用国土大的优势进行较大规模的机动，与敌周旋寻机作战。而且辽阔的领土就是削弱敌人的重要的天然武器，因为对侵略者来说，越深入对方领土，他的力量也就越分散，暴露的弱点也就越多。正如美国学者摩根索在论述辽阔的俄国领土在国防上的重大作用时所说的，“一旦征服者的目标变得邪恶和贪得无厌时，领土广阔已经对俄国领土的征服者成为一种负债而不是资产。征服者并不是侵吞了领土，并从中有所获益，而是领土吞噬了征服者，渐渐地削弱他们的力量。”

国土辽阔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中外战争史中有很多例子。俄国历史上抵抗拿破仑的战争和二战中苏联抗击德国侵略者的战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1812年，拿破仑征战俄国，开始的力量对比是法强俄弱。但俄国利用自己国土辽阔的优势，实行战略退却。而拿破仑却在前进过程中供给线拉长，兵力也越来越分散并不断被消耗，又不能歼灭敌方主力以迫使俄方求和，最后在俄军强有力的反击下遭到失败。二战中，德国的突然袭击曾使苏联一度陷于被动。但苏联在转入防御后，利用广大后方动员和组织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投入前线作战，最终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并取得最后胜利。我国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国土辽阔是使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余地”。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时说，“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此作为中国最终能战胜日本侵略的重要依据。战争实践也说明，日本虽然表面上占领了半个中国，但它只是占领了一些“点”（城市）和“线”（交通线），对广大的乡村却无力占领，而我军却在这些地方广泛开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并最终打赢了这场战争。

可见，广阔的领土在经济和国防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土幅员大小是评价一国实力的重要参数。当然，我们并不能说国土对国力的贡献与面积成正比，因为领土本身的价值也不一样，处于十分寒冷或沙漠地位的国土如没有地下资源的话，其经济价值就会相对小一些。因此我们在评价国土对综合国力的影响时，还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评估。

3. 地形地貌：地形地貌是指一国的自然形态。它对国家力量，尤其是国防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它往往决定一国是否便于防御或易于遭受攻击。例如，山地丛林地形为主的国家，易守难攻。而平原为主无险可守的国家则较易受到攻击。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之所以能席卷伊拉克，重要原因之一是，伊拉克的地形以平坦的沙漠和平原为主，利于美国充分发挥其高技术武器的威力。但在波黑这一当今世界最大的热点地区，美国却不愿投入地面部队，甚至连

维和人员也不愿派遣，北约也不敢轻言出面干涉。究其原因当然多种多样，但波黑的复杂地形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们担心武力干涉波黑会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对于沿海或海洋国家来说，周围岛屿较多或有许多良港的地形特点，往往对海防比较有利，因它们可以被用来迟滞和消耗敌人力量，还可利用港湾发展海军，并在战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相反，如果海岸平直，沿岸平坦，则利于敌人空降和登陆，等等。

我们分析地形地貌对国防力量的影响时，同样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因为尽管地形地貌本身是相对不变的，但它在国防上的价值却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武器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生产力尚不发达，武器装备比较落后的时代，地形地貌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比较大，甚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效果。但随着武器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飞机、导弹等武器的出现，地形在国防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不如昔。然而，正如物体运动的摩擦力永远不会降为零一样，在国力分析，以及在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地形地貌永远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即使在军事高技术十分发达的今天，复杂的地形不仅能抑制高技术武器的效能，从而起到较好地保护自己的目的，而且必将使侵略者付出大得多的代价，甚至使其得不偿失以至最终望而却步。

地形地貌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有一定影响。因地形地貌往往决定了交通上的通达能力，而通达能力越大则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对内陆国家来说，地形崎岖复杂的国家，在发展经济上往往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对沿海或岛国来说缺少良港也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因此，地形地貌不仅有国防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的经济意义，是国力构成中的基本要素之一。

（二）资源

资源是综合国力中影响重大而又相对稳定的因素，并且是可以计量的。因此人们往往将其排列在综合国力诸要素的前列。资源，通常指天然存在的，并有利用价值的自然物。包括土地、矿藏、能源、森林、海洋等等。它是国家力量的自然源泉。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丰富的资源，那么它就具备强盛的自然基础；相反，如果自然资源缺乏，那么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些年来，随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对资源种类和数量的需求激增，而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却在日益减少，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资源在各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一个国家能够掌握和控制的资源数量，也就成为衡量其国力强弱的重要的指标。一个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即使工业很发达，其综合国力也必将受到影响。日本就是个典型实例。目前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由于其缺乏资源，许多与国家安全和息息相关的战略资源严重依赖进口，因此日本经济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在经济竞争或战争中，日本的资源供给如果被控制，那么这个国家的庞大的政治、经济机器就会陷于瘫痪。从这方面看，日本虽说是超级经济大国之一，但其综合国力的排名则要靠后得多。相反，俄罗斯虽然经济不如日本，但凭其辽阔的领土和极其丰富的资源，再加上具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和经济基础，其综合国力还是不亚于日本。

资源的种类很多，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能源资源和金属矿藏对一国经济和国防的影响。

1. 能源资源：能源资源包括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对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军队进行现代化战争的重要保证。在石油

被发现并得以广泛应用之前。煤是工业发展和进行战争的主要动力。一战以来，石油的重要性突出起来，以至被称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因此，石油作为当今世界能源的主体，已成为增加拥有油矿国家实力的重要砝码。许多国家（如中东地区国家）因为有丰富的石油而成为人均收入位居世界前列的富国。正如美国学者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所说，“许多石油生产国……从自然资源来看，这些国家除了砂和石油之外别无它物。然而石油使得我们称作国家的这些地图上的小块土地，似乎一夜之间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甚至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强有力的因素。”

由于石油对工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此，石油已经成为工业发达国家的命脉。而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石油不能自给，如美国石油自给率刚过半数，西欧国家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而日本所需石油则完全依赖于从国外进口。这样，石油不仅是国家实力的构成要素，而且也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曾利用它们手中的石油武器，对美国等顽固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这次石油斗争，通过减产和禁运等手段，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导致了西方世界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并最终迫使西方发达国家作出某些重要让步。这充分体现石油在国际斗争中的巨大力量。

掠夺并控制石油资源还是战争和冲突的重要起因。在冷战时期，美、苏对中东的争夺，主要是为了控制这一地区的石油，这种争夺是整个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战乱和动荡的重要原因。冷战以后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战争——海湾战争，重要原因之一还是为了石油，伊拉克为了夺得科威特的领土和石油资源，对其进行了武力吞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命脉——石油来源，不被敌对国家伊拉克所控制，不惜动用数十万兵力和巨大耗费在这里打了一场海湾战争。

总之，能源尤其是石油资源对一国的经济和国防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能源就没有现代化的经济和现代化的战争。

2. 金属矿藏：与能源一样，金属矿藏也是国家工业化和军事潜力的雄厚物质基础。对经济建设来说，金属矿藏是工业生产的主要“粮食”。而且从工业发展史看，正是许多金属元素及其矿藏发现和开掘才造就了许多现代工业。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更进一步增加了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对国防来说，许多金属矿产资源，是支撑各国军事工业的战略物资。而且随着战争的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一国的国防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平时和战时对原料的控制程度。总之，金属矿藏不仅是工业的主要原料，也是进行现代战争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由于资源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至关重要，所以历史上的列强长期以来为争夺资源而角逐，甚至不惜以战争相拼，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史是对殖民地的资源掠夺史。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了增强自己的国力，削弱对方的实力或控制对方的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的命脉，也对资源展开激烈的争夺。今天，在和平与发展的大潮下，各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了新一轮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因而资源需求与供应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资源对国力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大。

（三）人口

与资源和国土一样，人口对国力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仅仅是人口众多这一点就足以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印度的“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多而引伸出来的。当然人口作为国力的构成要素，并不仅仅指人口数量，还有人口质量、人口构成等等，有的可以计量，有的只能作定性的评述。

1. 人口数量：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曾把世界比作一棵有大树、小树、匍匐植物的巨大森林。他说俄国、中国、西欧、美国、日本是大树。其他都是小树和匍匐植物，其中一些小树可能长成大树，而匍匐植物则由于缺乏人口及资源，永远不能长成大树。这里李光耀将人口的数量看成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条件。美国学者克莱因也认为，要保证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作基础，而人口数量对一国的国防力量的影响更为直接。它是军队数量、动员潜力以及持久作战能力的重要保证。一般说来，人口多则兵员充足、预备力量雄厚，经得起大规模战争的考验。如能开展游击战争，更能陷敌于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人口众多本身就是一支不可轻侮的力量。但人口数量与国力并不是正比关系。相反，如果人口过多，超出国家资源及经济发展的承受力，就会成为影响国家力量的一个不利因素。正是基于此，我国才把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2. 人口质量：如果有一定的人口数量为基础，那么人口质量对国力的影响则更为重要。所谓人口质量即国民素质，是指国民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道德面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等等。

国民的文化程度（即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质量的重要的标志之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推进生产力，时至今日，无论从国力还是从国防建设角度看，科学技术均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而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与其国民的文化教育程度直接关联的。因此国民的文化教育程度是国力的标志，也是国家发展的推动力。

健康状况、道德面貌等，就个人来说是指其体力的强壮程度和心理承受能力，对国家来说是劳动力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对国防来说，则是兵员质量的及战斗力的组成部分。

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等等是构成国力的精神因素，中西方的国力理论家们无不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尚武的风俗、悠久的历史、勤劳勇敢的传统、坚强不屈的精神等等，均是国家力量的源泉。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将精神因素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大战略要素之首看待，并以大量篇幅记述其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史及中外战争史看，精神因素确是国家力量的巨大源泉，尽管它是无法计量的，但又是战略家和国力理论家们所必须重视的。尤其在现代战争中，战争的残酷性和巨大的破坏力，更是对国家精神和意志的巨大考验。

3. 人口结构：人口结构是指人的性别、年龄、民族、种族等要素的构成情况，它是具体计算劳动力资源和兵源潜力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直接因素。

人口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是人力资源的主要参数。劳动适龄人口，尤其是役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国防提供更为雄厚的人力基础。相反，如果未成年人、女性或老人所占的比例过大，就可能会出现社会生产劳动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况，从而对经济建设和战争进程

产生不利影响。

4. 人口的地区分布：人口的地区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的国防。如果一国之内人口分布比较均匀，就利于战时兵员和物资的就地动员和补给，并能充分发挥人熟地熟的优势。而如果人口的地区分布不均，就会使人口稠密地区战时疏散困难，尤其在遭受大规模空袭或核打击时，损失较大。而如果主要战略方向向着人口稀少地区，就会增加补给的困难，并加重军事交通的负担。我国的人口分布很不平衡，西部人口稀少、东部人口稠密，这种布局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防安全均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5. 人口的民族构成：人口的民族构成对一国的稳定和安全有着较大影响。一般说来，民族构成比较单一的国家，如日本、德国、以色列、法国等更有条件提高民族凝聚力。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方面有所不同，而这种差别在一定条件下不仅可能发展成民族间的矛盾或摩擦，甚至引起冲突和战争。因此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问题是个直接关系国家安全进而对国家力量产生影响的大问题。冷战结束以后，被两极对抗所掩盖的民族矛盾突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从东方到西方，掀起民族分裂主义、大民族主义、民族对立和民族冲突，对多民族国家的稳定甚至统一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6. 人口的宗教信仰：放眼当今世界，许多热点或动荡地区都有着宗教背景，如南亚、中亚以及战火不熄的巴尔干等地区，宗教都是影响这些地区稳定，甚至是引发冲突和战火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分析人口对国力的影响还必须研究人口的宗教信仰对国家稳定与国家凝聚力的影响问题。一般说来，多种宗教的国家，往往容易引发宗教矛盾和冲突。宗教在流行和传播过程中，如果各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不同的宗教势力就会发生碰撞和冲突，从而影响一国稳定并对国力产生影响。尤其是许多宗教信徒“争教不争国”，把宗教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很容易被民族分裂主义者利用。当然由于宗教有着特殊的感染力，宗教问题如能妥善处理 and 引导，也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如对于伊斯兰国家来说，宗教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来源，因此很好研究并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对多宗教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四）经济

经济实力是综合国力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各国在未来综合国力竞争中的胜败和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未来的经济实力。财富在平时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战时则可以迅速转化为军事力量，因此，世界各国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以取得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现代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大，可以说，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保证，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和进行现代化的战争。

首先，强大的国防必须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国防力量的强弱取决于武装人员的数量、质量和武器装备的水平，而要保持一定规模的军队，并具有良好的质量和优良的装备，都需要以经济能力作基础，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的造价越来越高，更加重了军事对经济的依赖程度。如战后 40 多年中，美国一支步枪的造价由 50 美元增加到 160 美元，一辆坦克由 10 万美元增加到 240 万美元，一架战斗机从 20 万美元增加到 3 000 万—4 000 万美元，而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潜艇等的造价更高达上亿或几亿美元。因此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要装备并维持一支高度现代化的军队，必然要花

费较大的军费开支。美国 1986 年的军费高达 3050 亿美元，苏联 1985 年的军费也达 1600 亿美元，即使在世界形势全面缓和的情况下，美国的军费（1994 年）也达 2000 多亿美元，日本达 470 亿美元。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改进武器装备，也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军费，以采购先进的武器装备。可见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只能是纸上谈兵。

其次，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战争的破坏力及消耗量都有极大的增加，这也提高了国民经济对战争进程的决定作用。如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历时才 18 天，双方损失坦克高达 3390 辆，比当时美国在欧洲驻军的坦克总数还多 1000 辆。以色列平均每日消耗弹药 8000t，战前储备的 10 万吨弹药，仅十几天就消耗殆尽。据估计以色列作战每小时要花费 1000 万美元。而 1990 年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消耗更是高得惊人。空战期间每天耗资 2.95 亿美元，地面战争期间则每天平均耗资 5.2 亿美元。40 多天的海湾战争，多国部队耗资共 600 多亿美元，科威特损失 600 多亿美元，重建尚需 700 亿—1000 亿美元；伊拉克的损失则大于 2 000 亿美元。这还仅仅是局部战争的代价，假如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那么其消耗和损失则远不止此。因此，现代战争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实力，谁的经济力量强，谁的经济潜力雄厚，谁就能支持战争，赢得战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总体战。对此，恩格斯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无论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获得胜利，没有经济条件和资源，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经济“帮助暴力”取得胜利的例子在中外战争史上是很多的。二战中，美国等盟国的胜利就是很好的说明。可以说，二战中美国的参战是战争双方综合力量对比的重大转折点，虽然美国战前的军事力量并不强，陆军只有几十万，海军也在珍珠港事件中受到重创。但美国拥有当时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实力。美国参战以后，这种经济优势迅速转化为现实的军事力量，使战场力量对此发生了有利于盟国的变化，并最终战胜了德、日等法西斯国家。因此经济实力是一种潜在的战争力量。正是基于这个观点，今天作为资源和国土面积小的日本才在综合国力排名中能居于世界前列。也正是基于上述观点世界各国目前都在全力发展本国的经济。

经济实力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能力、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等基本要素。其中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是经济实力最为重要的标志。

美国学者摩根索在《国际间政治》一书中指出：“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国家实质上就是大国，并且工业化等级上的变化，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变化，都必然伴随着或导致权力等级上的相应变化”（第 164 页）。英国曾在世界上建立起比自身国土大近 100 倍的殖民体系，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从 18 世纪下半叶起称霸世界 100 多年。这是因为英国的工业实力在当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据统计，到 1860 年，英国的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 53%，煤和褐煤产量占 50%，现代工业能力占世界的近 40%，其商船吨位超过荷、法、美、德、俄等国的总和，因此，美国的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第 180 页）说：“英国之所以强盛，乃是由于它拥有现代化的，产生财富的工业，以及这种工业所带来的好处”。后来随着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在世界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大英帝国也就日渐衰落。而后起的工业国家如美国、

日本、德国等凭借自己的工业实力，超越英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工业生产能力也是将潜在国力转变为现实国力的重要条件。以印度为例，印度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而且还拥有大量的生产钢材所必不可少的锰矿。但印度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缺少与其丰富原料相适应的工业设施。被看作潜在强国的前苏联，也只有在 30 年代进入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以后，才成为实际的强国。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能力比较落后。因此，发展并振兴工业，是强国的必由之路。

先进的国防工业是国防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对战争胜负有着重要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武器装备越先进越容易在战争中占据主动。然而所有的武器装备，从自动步枪、车辆到飞机、导弹等武器的制造均依赖于国防工业，因此一旦战争爆发，国家之间的国力竞争就主要转化为生产更大、更好、更多军事装备的竞争。而“工厂的质量和生产能力，工人的技术知识，工程师的技巧……所有这些都是国家权力所依赖的因素”（摩根索，国家间政治.164）。

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往往决定了，该国的粮食能否自给。一个农业生产能力强，粮食能够自给的国家，比一个不能自给，并且必需进口食物或处于饥饿状态的国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只要它进口食物的能力受到挑战，就可能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生存，对人口众多的大国更是如此。粮食不能自给的英国在二战期间受德国潜艇和空袭的威胁时就曾面临这样的挑战。而像美国这样粮食能够自给有余的国家则可以在战争中使人民免遭饥饿的威胁，以使政府能更专心地推行其国内外政策。因此，农业生产能力也是国力较量中的一个重要砝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农业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稳定和四化大业的成败。因此我国领导人始终把我国的农业放在基础的重要地位。

此外，在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的今天，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的强弱，也是该国经济实力的重要表现和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竞争能力是指一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主要表现为对外贸易额（尤其是出口额）。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很强，就可通过对外贸易增强该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也说明该国现在已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相反，如果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弱，则说明该国的经济实力较弱，而且其经济和国力还将继续受到损害。

总之，经济实力在综合国力构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冷战结束，世界形势日趋缓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战”将成为世界各国较量的主战场，它将涉及到战略资源争夺战、贸易保护战、货币汇率价格战等诸多领域，并将对各国的综合国力乃至世界未来战略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五）流通

这里所说的流通主要指交通运输和通讯。在社会生活和战争中，交通和通讯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交通和通讯就意味着速度和财富，也是现代战争的重要致胜因素。下面着重阐述交通与通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1. 交通：交通指用来运输物资和军队的空中、陆地和水上的交通网络，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及其设施等。它是军队机动作战的重要

条件，也是后勤保障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战争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对战争的胜败有着重大影响。正如军事家刘伯承所说，在战争中“交通有无保障，是胜败的枢纽”（刘伯承指挥艺术·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245）。

在战争中，对兵员、兵器实行迅速及时的移动，是部队扬长避短，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通运输的高效率。美军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数十万军队运到海湾，并在那里打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主要依靠其强大的海上和空中投送能力，以及能确保安全的海上交通线。而前苏联侵阿战争的失败，交通条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阿富汗战场上没有一条铁路，公路也很少（仅有两条主要公路），整个地形以崇山峻岭为主，既不利于苏军运送军队和物资，也不便于苏军机械化部队展开和作战。加之阿富汗游击队对交通线的袭扰，使苏军不得不抽出80%的兵力来扼守交通要道和维护运输秩序。交通运输对兵力移动和作战的影响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将越来越大。因为没有道路和交通保障，坦克、自行火炮、摩托化部队等现代化武器装备就难以施展威力。因而在现代战争中交通是机动和作战的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

交通运输还是部队后勤保障的重要基础。前面说过，现代战争的消耗越来越大，因此有人提出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战或经济战，而为了确保人员和物资的后勤保障则有赖于交通运输条件，各种渠道的后勤保障线，实际上就是发挥着各自职能的各种形式的交通线。它们是作战中确保胜利的生命线。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司令部在作战总结中曾指出：“千条万条，搞好交通运输是第一条”。

由于交通运输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战争中保障我方交通畅通，切断敌方交通，就成为敌对双方争夺战场主动权的重要环节。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首先出动大批飞机，重点轰炸波兰的铁路，使波兰的铁路干线全部瘫痪，致使70%的波兰部队不能到达预定战位，这也是波兰很快陷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间，美军曾出动大量的飞机，对朝鲜北部连接我军前后方的铁路线实施狂轰滥炸，即美军所谓的“绞杀战”，企图切断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交通运输线。我铁道兵和朝鲜人民与敌人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斗争，才保证了交通线的畅通。抗日战争期间，我军发动的著名“百团大战”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以交通线为网络对我实现“囚笼”政策而发起的，即通过袭击并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打破敌人对我的封锁，进而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随着远程袭击兵器的发展，战争双方的远距离打击能力已空前提高。中、远程导弹可达数千千米甚至数万千米，远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也达数千千米。一旦战争爆发，任何国家纵深的重要交通目标都有遭受攻击的可能，因此可以想见，在未来战争中，对交通线的争夺与反争夺，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将更趋激烈。

交通运输的各种方式之间互有长短。铁路运输运量大，受气候影响小；公路运输机动灵活，便于抢修且周转速度较快；水路运输运量大，航线不易被破坏；航空运输快速便捷，管道运输隐蔽安全等等。战时，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运输方式，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相互补充，相互配合，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2. 通讯：战争活动可以说是由三种“流”组成的。这三种“流”分别由士兵组成的人流，由武器及保障系统组成的物流，以及由人流和物流所产生

的报告、命令、指示计划、报表、图像等等军事情报（信号）所组成的信息流。而完成信息流传输职能的主要载体是通讯系统。在高技术条件下，战场信息的流量、流速显著增加，瞬息万变，异常复杂。指挥员要及时准确地了解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必须确保通讯系统的畅通。通信系统是现代军事高技术 C³I 系统（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人体的“脉络”把武装力量各个部分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发挥最高效能一样。美国之所以能打赢海湾战争，稳定畅通的通讯保障是重要前提。海湾战争中美国不仅使用了国防通信系统、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单信道地面和机载无线电通信系统等通信手段，还利用了国防通信卫星系统和舰队通信卫星系统。这些先进通信手段的综合运用，保证了美国本土和海湾、海上与地面、空中和地面，以及各级司令部之间的通信稳定畅通，情报传送及时。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电子战，干扰、压制、削弱甚至摧毁伊拉克的 C³I 系统。致使伊通信屡屡中断，其最高统帅部不了解各战区的情况，难以统筹全局，组织抗击，结果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毫无疑问，随着 C³I 在部队中的广泛应用，通信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必将日益增大，针对通信系统的干扰与抗干扰，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也将愈演愈烈。

（六）政府

政府是对整个国家进行组织管理的机构，也是使用国家权力的核心。综合国力的诸要素能否形成合力并发挥最大效能，在相当程度上要靠政府的质量。如果政府质量高就不仅能充分发挥现有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正确的国内政策扬长避短，迅速发展，以致国富兵强，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相反，如果政府无能，不仅不能使国力各要素形成合力还可能相互制约、自耗国力，经济或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在战争中则会招致失败。这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历史上都屡见不鲜，因此政府质量的好坏，也是国力比较中的“软”要素之一。

评价一国政府的质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标准。这里我们分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 政治性质：政府的政治性质是指，政府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对内政策是否符合民意、顺应民心，对外政策是否合乎人类的正义，是否有利于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等。政府的政治性质对战争的胜败影响极大，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这点说，战争就是政治，它是“流血的政治”。虽然战争有其特殊性，遵循特殊的战争规律。但战争的政治性质决定着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态度和军队的士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而政治对战争往往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并夺取政权，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战争是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二战中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如此。苏联能够打败强大的希特勒却打不败弱小的阿富汗游击队，也是因为前者是正义战争，后者是非正义战争。历史已经雄辩地说明，正义战争最终将取得胜利。因此作为政府，如果执行的内外政策是正确的，就能增强国力或赢得战争，否则就会受到挫折或失败。

2. 政府的法制化、民主化程度：政府的法制化程度可用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否比较完善，政府是否完全依据法律办事，在法律面前是否一律平等，以及执法机构是否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标准来衡量。政府的民主化程度则可用公民的政治权力能否得到保障，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是不是通过民主选

举产生，政府官员是否有法定的任期，以及他们的任命是否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等标准来衡量。事实上，政府的法制化、民主化程度反映了政府是否公正，是否代表国内人民的意愿。因此一般来说，政府的法制化、民主化程度越高，就越能赢得国民的支持和合作，越容易推行自己的政策，也就越能利用并发挥一国的国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的法制化、民主化程度也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页）一书中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与其公民的密切联系之所以必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国家首先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直接相关，如果没有公民的普遍理解并接受它的统治，国家便不可能在税收、对外政策、教育、社会治安以及无数其他事物中顺利行使自己的职能。”

3. 政府的机构和效能：政府机构是国家政治体制和组成部分，政府机构设置是否科学和合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质量和施政效率。一个机构精干、合理的政府，其运转必然有很高的效率。相反，一个机构臃肿、复杂的政府，不仅人浮于事，而且会滋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各种腐败现象，削弱执政党的地位和威望。我国目前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减少机构，消除臃肿，并推行公务员制度。虽然一个政府有一个合理的机构，仅仅是为提高政府的效能提供了基础，要真正发挥政府的效能，还需要政府的科学决策，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这就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具有良好的教育素养和工作能力。

4. 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控制能力：众所周知，一国人民的社会凝聚力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标志，即所谓众志成城。而要让举国上下有很强的凝聚力，国民团结如一，就要求政府有很强的组织、协调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在遇到动乱、战争和民族问题等等的挑战时则更为需要。否则，形如散沙，难以形成合力。或陷于内乱甚至内战。自身将国力消耗殆尽，也就不可能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更不可能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和国力。

（七）军事力量

军事力量在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或状态下也有所不同。在战争时期，军事力量在国家力量诸因素中是最重要的，因为战争的胜败最终要靠经过战场上军事力量的较量。从本质上说，战争即是双方如何将现有的和潜在的国力，尽快地转化为更强大军事力量的竞争。而在平时时期，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时，军事力量在国家力量诸要素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往往把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首位，但即使如此，军事力量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量，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军事力量的这种重要地位是由国际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国际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没有统一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处于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与国之间除了最终惧怕彼此的武力之外，别的约束都显得软弱无力。另外，军事力量的主要职能是对外的，因此一旦这种力量被较大规模地使用，就将极具破坏性地作用于对方。因而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有着重要意义。俄罗斯，如果仅从经济角度看，已经大大减弱，但从军事角度看，则仍不失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才能有目前的政治大国地位，美国等西方国家才不致漠视它。

军事力量同样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其中主要有：武装力量的人数和质量、武器装备、领导能力，以及军事理论等等。

1. 武装力量的人数和质量：在评价一国武装力量强弱时，首先关注其

数量规模。毫无疑问，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数量越多军力越强，而在其他方面如装备等较弱时，则较多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自己的劣势。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 E. 鲁登道夫所著《总体战》一书中，曾把兵力数量上的劣势作为德国一战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写道：“世界大战最终向人们揭示，还是我们的数量居优势的敌人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数量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忘记这一点就难免犯错误，在处于劣势时要善于化弊为利。对数量的意义必须有深刻而坚定的认识，不允许有丝毫的“含糊”（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 11 月，第 58 页）。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被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界奉为经典之作的《战争论》一书中，也用一章的篇幅强调数量上优势的重要性。他说：“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还是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解放军出版社，1964 年 2 月，第一卷第 270 页）。毛泽东也十分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里的优势兵力首先也是兵力数量上的优势。我军倡导的人民战争则更是为了通过改变战争力量的数量对比，使自己由弱变强并最终战胜敌人。当然数量与力量之间并不是单纯的正比例关系，因为战争力量同时受其他诸多条件，如武器装备、兵员素质及组织指挥等等的制约和影响。另外，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的数量还受其总人口和经济力量的制约，如果长期维持一支与国力不相称的军队，甚至穷兵黩武，不仅不能增强国力，反而会把经济拖垮。

2. 武装力量的质量：评价一国军事人员的质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对部队战斗力有着较大影响。一是军人的年龄结构及体力素质，二是良好的军事素养和有素的训练，三是具有良好的武德并具有必胜的信念。第一点和第二点比较容易改善，而且也比较直观，第三点是战争中的精神因素，它是军队质量的一个重要参数，历来为中外军事家们所重视。

3. 武器装备：武器装备是武装力量的物质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曾经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当然，人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但人只有与武器装备结合起来才能克敌致胜。纵观中外战争史可以发现，军事技术方面的重大改革，对于使用一方来说，至少在其敌国使用之前，或敌国能使用一些技术来反对它以保护本国之前，都能获取暂时的利益。今天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使武器装备的破坏性、准确性以及远距离打击能力都有极大地提高，这进一步增加了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之所以能出尽风头，其中先进的武器装备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军队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另外，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以一国的科技水平和工业水平为基础的，因此武器装备的水平，也同样反映了一国的综合国力的水平。

4. 领导能力：战争是由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实践性极强的活动，人的因素尤其是指挥官在战争中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由于战争是充满危险和劳累的领域，因此指挥官首先应具有一定的体力和强悍的精神力量。战争还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战争中的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员往往需要在情况若明若暗的条件下，迅速作出关系战争胜负和民族存亡的重大决断。这要求指挥员具有高人一筹的洞察力及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总之，军队指挥官的领导能力在许多情况下会成为战争胜败的关键。在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而王明、博古等人所领导的第五

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这说明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领导能力的较量。即是说，指挥员只要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制定和运用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就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由弱变强最终战胜敌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领导下取得的。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日趋广泛地应用于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指挥员的领导决策能力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更为重要。

军事理论是军事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也是军事活动及武装力量建设的指南。军事理论研究将为制定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规划战斗力量建设、发展武器装备、指导当前的现实军事斗争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先进的军事理论是战斗力的组成部分，它能给战争活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相反，落后的军事理论却可能招致战争失败。最为典型的是二战中法国的惨败。二战爆发以前，法国的军事家及军事理论家们的军事理论还停留在一战的阵地战的思想，修建了漫长的马其诺防线，试图利用该防线的坚固防御来挫败德国的进攻。这种作战思想没有看到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尤其是运输和通信的发展给作战方式带来的变革（运动战）的可能性，因而显然已落后于时代。而德国却注意到了机械化战争的战略可能性，并以“闪电战”思想以空前的流动性来计划各次战斗，从而使德国在对法国的入侵中能迅速取胜。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是对落后军事理论的惩罚。今天随着高技术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军事理论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一种更新的军事理论——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理论——正在形成。

上面我们侧重阐述军事力量及各个组成部分对战争的重要影响。但同时也应当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形势日益和缓的今天，军事力量在国力中的作用已大大降低，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具有了新的内容，即国家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已由军事（对领土完整的威胁）转向经济和生态等领域。同时，使用武力的代价也日益提高，运用其他手段解决国际问题更为有效。总之，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约瑟夫·奈伊在《软力量》一文中所说：“武力有时也许会起某种作用，但在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新难题方面，传统的力量手段已经远远不够。”

（八）对外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通讯传播技术以及迅速便捷的交通手段，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距离和空间概念，地球越来越“小”了。而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的空前发展更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相互依存的信息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依靠别国和他人。因而对外关系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

美国学者摩根索在其所著的《国际间政治》一书（第191页）中指出：“通过最有效地运用国家权力的潜能，精干的外交能够出人意料地增长国家的权力。……高质量的外交能够把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与现有的国家权力

的资源和谐地配合起来。它能够挖掘国家力量的潜在资源，并将它们完全地转化为政治现实。”这是摩根索对外交活动影响国力的概略描述。下面侧重对与国家安全与战争联系较紧密的国防外交（也称军事外交）的作用加以叙述。

国防外交，范围广泛，领域众多，活动内容与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军事政治方面**：在军事政治方面，国防外交需要确立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关系和交往原则，制定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由此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主要有以下措施：

首先，也是最高层次的军事政治关系，是建立国家间的军事政治联盟，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如北约、美日军事联盟，以及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等就是这类组织。由于参加军事联盟就意味着相互承担一定的军事义务，对外则进行集体对抗。这就等于借用了外力，使自力的生存力和影响力迅速加强。几十年来日本得益于美日军事联盟的庇护，在军费方面节约了大量财力，有力地支持了经济建设；在北约成员国英国与阿根廷进行马岛战争期间，北约各国对阿根廷实行集体性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以支持英国。因此建立军事联盟可以弥补国力军力的不足。联盟政策已成为某些国家国防战略的一根重要支柱。

其次，在友好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较为稳定，较为密切的关系，以争取他们较为有力的支持，增强抵抗威胁的能力。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谋求同任何一个国家结盟。因此加强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和交流，并通过必要的经济、军事援助来扩大影响，是我国对外军事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

再次，要开展与一般国家的军事政治交往。这些国家不像友邦那样与自己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和某一方面的共同敌人；对自己不构成任何威胁，然而为了扩大本国影响急需更广泛的支持，哪怕是道义上的支持，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受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影响，往往也同这些国家保持接触和交流，以增加了解，增进友谊。

另外，与敌对国家的关系，往往因政治、经济、领土、民族、宗教等冲突而处于对立状态。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斗争，甚至是武力上的对峙或对抗。但对抗中有对话，紧张中有缓和，斗争中有妥协。因此相互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政治军事接触。美、苏两国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关系就是如此。

2. **军事经济方面**：发展军事经济关系通常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开展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二是建立直接的军事经济联系，加强军事经济合作。

由于敌友关系的存在，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活动，就渗进了国家安全的因素。一般说来，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往来更多地是在友好国家之间进行，而敌对国家或集团之间更多的是竞争，甚至是压制和封锁。如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内部的贸易及经济交往要比与其他经济实体的交往份量大得多。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常常利用对外投资、贷款、经济援助等手段来影响他国政策，甚至通过经济合作来维持对自己有利的政权，干涉他国内政。一旦关系走向对立，便会以经济制裁、经济封锁等手段来迫使对方就范。因此国际经济活动也是国际斗争的重要手段，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意义。

直接的军事经济联系与国防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无偿或有偿的军事援助，共同修建或使用某些军事设施，转让某些军事高技术，或多国联合进行对敌对国家的经济制裁等等。这种直接的军事联系往往在联盟内部比较普遍，战时尤为明显。由于军火贸易和军事援助等合作交流形成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的意义，因而在国际军事经济关系中运用得越来越多。今后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这种交流形式无论在内容和层次上都会往更广更高的方向发展。

3. 军事科技方面：军事科技是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因而积极开展与他国的军事技术交往，是发展军力的重要途径，另外军事科技往往也是新技术革命的先导。因而军事技术的交往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军事科技交往的任务，首先要注意观察与注视外界的科技的发展，搜集各种科技情报，掌握国外武器装备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由此引起的军力的变化。同时还应广开渠道，通过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和交流，引进先进的技术，以推进本国国防科技事业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另外，还应积极为本国的军事技术开拓国际市场。

军事技术分已有的军事技术和预测中的军事技术。作为国防外交组成部分的军事技术交往，不仅要留意引进现有先进武器装备，而且还要积极跟踪研究发展中的新知识、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同时还应注意加强本国军事高技术的机密安全工作。

总之，国防外交的使命是通过正确而积极地处理我与“敌”、“友”之间的关系以壮大发展自己，孤立削弱敌人，换言之，即是通过外交活动来改变敌我之间的相对国力。

（九）科学技术

马克思曾经指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邓小平也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他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这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二战以后各国的发展现实也雄辩地说明，科学技术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科学技术实力则是决定国家综合国力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低的重要因素。

这里从以下几个侧面进一步说明，科学技术对一国的综合国力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1. 科技突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飞跃和人类生活的深刻变革。从1700年至1980年，整个世界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革新（或革命），而这些大的产业革新或革命都是由新的生产工具、新的能源、新的材料的发明或发现所引起的。科学家们认为，在1700—1980年的280年中，有50项最重大的发明大大地影响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其中有蒸汽机、制钢制铁法、发电、无线电、汽车、人造卫星、飞机、计算机等。蒸汽机的出现引起了工业革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电力的运用使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计算机及航空等技术的发展使得整个人类迅速进入了信息时代等等。因此可以

说，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及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2. 科技实力：科技实力的强弱，往往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17 世纪末，英国开始成为欧洲科学技术的中心，此后英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其贸易额曾是世界其他国家贸易额的总和。建立了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19 世纪初叶到 19 世纪中叶，科学技术的中心地位逐渐由英国移向德国。德国通过大力运用科学技术，只用 40 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英国一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成为世界强国。从 19 世纪末叶到本世纪中叶，科学技术的中心又从欧洲逐步转移到美国，它由电力科学技术及其他工业起家，成为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今天，日本在许多高技术领域赶上并超过了美国，也迅速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可见科学技术的实力与一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及地位和作用密切关系，失去了科技优势，必然将失去其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3. 科技成果转化：二战以后，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迅速缩短，其对各国国力发展的影响也更深远。据科学家的调查分析，18 世纪科技成果的转化周期是 100 年，19 世纪为 50 年，二战前为十几年。二战以后，转化过程加速了，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只需 3 年左右时间即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科技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已更为直接更为迅速。据统计，目前，科学技术在促进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所占的比例已达到 60%~80%，而一些新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就像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在 1991 年 8 月为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技术战略》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所说：当前“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在这场增强综合国力的‘战争’中，谁能抢占到科技‘制高点’和‘前沿阵地’，谁就能在政治上更加独立，在经济上更加繁荣，在军事上更加强盛，在战略上更加主动，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 科技与武器装备：在军事领域，高技术武器装备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对各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科学技术不仅使战后传统的武器装备得以改进，而且还促使一系列新型武器系统的出现。核武器、精确制导武器、C³I 系统、二元化学武器、定向能武器、激光武器等等。这些武器有的被作为战略威慑力量，有的已在近些年来的高技术战争中投入应用，有的还处于研制阶段，但已取得重大进展，估计不久即可进入实用阶段。这些经过改进或新研制的武器装备，无论在毁伤力、远程打击力以及精确度上均有很大的提高，因而也大大提高了由高技术武器装备的部队的战斗力。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之所以能以很小的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其先进的武器装备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说，现代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表现为高技术的较量。谁拥有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谁就能占有一定的优势。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发展，还引起了作战方式作战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同时也使军队内部组织和相互关系发生变化，因而对各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看不见或不能适应这种变革和变化，同样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总之，科技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军事力量的强弱。

5. 科技与综合国力：科学技术已成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自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技战线硕果累累，对提高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都作出

巨大贡献。据统计，我国科技成果的实际利用率已从改革前的不足 30% 提高到目前的 70% 以上。每年的新成果为国家增收节支近 300 亿元。“六五”和“七五”计划获得国家奖励的科技成果累计取得经济效益为 2800 亿元，科技进步因素在经济增值中的比重，已由“六五”期间的 10% 左右提高到 30% 以上。1995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并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内涵即是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而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这可以说是科技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因此，科学技术也已经成为我国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

可见，科学技术是综合国力中极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兴衰强弱。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各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各自的科技战略，以争夺高新科技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发展教育和科技，希望以此为助推器，增强自身实力。可以预见，科学技术将成为当今及未来国际社会竞争的及综合国力较量的焦点和前沿。我国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距离，更应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进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

三、综合国力分析

综合国力的分析和评估由来已久，然而在本世纪 70 年代以前，国力理论家们对国力的分析大都是定性的，而且往往只就国力要素进行单项对比，因而难免失之偏颇。进入 90 年代以后，以美国学者 R.S. 克莱因为代表的一批国力理论家将国力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国力分析由单项比较转入综合研究，国力理论研究也由定性分析开始转向定量化，从而使综合国力分析进一步趋于接近各国的国力现实。下面试对 70 年代以后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综合国力分析方法加以介绍。

（一）克莱因的国力方程介绍

克莱因是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司司长，是美国决策集团的智囊人物。他在 70 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发表了《世界权力的评估》、《1977 年世界权力的评估》以及《80 年代世界权力趋势及美国外交政策》等著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国力理论，并在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定量估计分析国力的公式，即“国力方程”，其表达式为：

$$P_p = (C + E + M) \times (S + W)$$

式中： P_p ——表示被确认的国力；

C——表示基本实体，包括人口和领土；

E——表示经济能力，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中的各部门；

M——表示军事能力，等于战略力量加常规军事力量；

S——表示战略意图；

W——表示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

克莱因认为，由 5 个主要要素构成了一国的国力，并通过对各要素评分

的方式使其定量化。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 基本实体的评估：克莱因将人口和国土面积视为国家的基本实体，并分别对它们加以量化分析。他设定人口的标准满分是 50 分，并将人口数分为三个等级，即 1500 万、5000 万和 2 亿以上。他认为，人口在 1500 万以下的国家是不大可能挤进大国强国行列的，因此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不予评分。他把 5 000 万人口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他看来，拥有 5000 万以上人口的国家，绝大部分都是世界强国，正是因为人口的重要性，中国、印度、苏联、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必然受到全球的关注。他认为 2 亿人口是满分的临界标准，但如果人口过多以致超过国家的经济的负担能力则适当减分。

领土面积的标准满分也设定为 50 分。 $8 \times 10^6 \text{km}^2$ 以上的国家得最高分 50 分， $1.3 \times 10^6 \text{km}^2$ 以上的国家得分在 30 分 ~ 50 分之间，对面积在 $2 \times 10^5 \text{km}^2$ 以下的国家则不评分。但对面积较小而战略位置特别重要的国家（如日本等）则适当加分，对面积虽大而可耕地所占比例较小的国家，适当减分。

2. 经济能力的评估：克莱因把经济能力分为两部分，即国民生产总值和产业各部门，其设定满分各为 100 分，总计 200 分。国民生产总值（GNP）以美国为满分 100 分，其他国家参照美国来评分。产值在 100 亿美元以下的国家不评分。克莱因将产业结构划分为能源、矿产、工业、农业和外贸 5 部分，每个部门满分得 20 分，5 项满分合计 100 分。克莱因认为，能源是构成经济力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能源丰富的国家（如中国）应加 5 分。而对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应减 1 分 ~ 5 分，如日本被减去 5 分。对农业，他根据以下 3 个参数来衡量，（1）可耕土地的公顷数；（2）生产能力；（3）进出口农作物数量（出口加分，进口减分）。他认为，一国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战时的自给能力，而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自给程度高的国家则更为强大。

3. 军事能力的评估：军事能力是一国拥有的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总和。满分为 200 分，其中，战略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各为 100 分。核力量是根据攻击力量的结构、运输工具与核弹头的数量，以及核防御能力的综合指标加以计量；常规力量则从武器效能、军队素质、军事设施与后勤保障、组织品质、战略机动能力、军备准备程度去综合评价。

以上三项是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总和最高分是 500 分。

4. 战略意图的评估：战略意图（又称战略目标）是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克莱因规定战略意图的最高值为 1。他认为大多数国家的目标是自卫性、保护性的，评分居中，约为 0.5 分；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历史久远，则高于 0.5 分。战略目标模糊，或摇摆不定，评分则低于 0.5 分。

5. 贯彻国家战略意志的评估：克莱因把国家战略意志定义为“国家可以动员其内部力量有效地实现战略目标的素质”。它反映了国内可动员的民众对国防政策和政府外交的信心和支持程度。克莱因规定国家意志的最高值也是 1，并且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意志的得分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该民族凝聚力的强弱（约占 33%）。（2）政府首脑的领导水平和效率的高低（约占 34%）。（3）人民大众对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的关心程度（约占 33%）。

以上第 4、5 两项之和最高分为 2 分。它决定物质基础国力的有效发挥程度。如果两者之和接近 1，那么国家的总体国力就与前三项物质基础国力之

和相等。如果两者之和大于 1，那么物质力量就可以更大地发挥作用，甚至达到两倍（两项之和为 2 时）。而如果两者之和小于 1，其综合国力就将低于基础国力的积分。克莱因总体国力的计分方法如下表（表 5 - 1、表 5 - 2）。根据以上理论克莱因对 1975 年和 1978 年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国力评估如下：

表 5—1 克莱因对 1975 年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国力的评估

国别	C	E	M	S	w	Pp
苏联	100	160	190	0.8	0.7	675
美国	100	200	200	0.3	0.4	350
联邦德国	50	100	30	0.7	0.8	270
法国	50	100	50	0.4	0.5	240
中国	100	70	60	0.7	0.3	230
巴西	90	50	20	0.5	0.8	208
英国	50	80	60	0.6	0.4	190
日本	60	100	10	0.5	0.5	170
越南	60	0	40	0.8	0.6	140
澳大利亚	50	70	0	0.4	0.7	132

资料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 版，第 27 页。

表 5 - 2 克莱因对 1978 年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国力的评估

国别	C	E	M	S	W	Pp
苏联	100	80	197	0.7	0.5	458
美国	100	146	188	0.3	0.4	304
巴西	80	15	3	0.6	0.8	137
联邦德国	30	34	13	0.7	0.8	116
日本	44	78	5	0.6	0.8	108
澳大利亚	50	22	1	0.5	0.7	88
中国	75	23	41	0.4	0.2	83
法国	28	33	21	0.4	0.5	74
英国	29	21	18	0.5	0.5	68
加拿大	56	30	1	0.3	0.4	61
印度尼西亚	56	4	1	0.5	0.4	55
越南	28	0	11	0.8	0.2	39
印度	52	11	8	0.3	0.2	36
阿根廷	31	7	2	0.5	0.3	32
菲律宾	27	3	0	0.5	0.3	24
巴基斯坦	25	2	2	0.5	0.3	22
古巴	0	0	2	0.7	0.5	2
伊朗	18	12	2	0.2	0.3	16
墨西哥	27	5	0	0.3	0.4	22
阿尔巴尼亚	0	1	0	0.5	0.5	1

资料来源同上，第 29 页。

(二) 其他学派介绍

1. 福岛康仁“国力方程修正”学派：日本学者福岛康仁对克莱因的国力方程作了如下的修改：

$$P = (C + E + M) \times (G + D)$$

式中：P——表示被确认的国力；

C——包括人口、领土和自然资源；

E——(GNP + 人均 GNP + 实际增长率) + (工业实力 + 农业实力 + 商业实力)；

M——军事实力；

G——国内政治能力；

D——国家外交能力。

与克莱因的国力方程相比，除了军事实力这一项未作变动外，其他几项在内容上均作了一些变动，因而其国力计算结果也与克莱因的有较大不同。

表 5-3 福岛康仁公式计算国力结果 (1982 年)

预测结果			预测结果		
排序	国名	分数	排序	国名	分数
1	美国	651.8	1	美国	666.1
2	苏联	603.5	2	苏联	586.8
3	联邦德国	387.5	3	中国	366.1
4	法国	366.3	4	联邦德国	352.8
5	日本	348.1	5	法国	340.6
6	中国	339.3	6	日本	233.8
7	巴西	219.2	7	巴西	196.1
8	沙特阿拉伯	184.7	8	沙特阿拉伯	97.7

资料出处同表 5-1、表 5-2。

2. “综合三元要素”国力学派：日本综合研究所在总结前人综合国力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际，提出了测定各国综合国力的三元要素，即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各大要素又由多项分要素组成。

第一，国际贡献能力的构成要素如下：

A. 基础实力：(1) 经济实力，(2) 金融实力，(3) 科学技术实力；

B. 政策能力：(4) 财政实力，(5) 对外活动的积极性，(6) 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

第二，生存能力的构成要素如下：

(1) 地理，(2) 人口，(3) 资源，(4) 经济实力，(5) 防卫实力，(6) 国民意志，(7) 友好同盟关系。

第三，强制能力的构成要素如下：

(1) 军事实力，(2) 战略物质和技术，(3) 经济实力，(4) 外交能力。

日本综合研究所根据这种三元要素的分析方法，对几个国家的国力作了比较评分(三种能力均以美国为 100 分为标准)。

表 5-4 日本测算 1985 年几个国家综合国力积分

项目	日本	美国	英国	联邦德国	法国	苏联
国际贡献能力	61	100	43	54	45	50
生存能力	56	100	52	49	47	119
强制能力	24	100	36	24	42	70
综合国力	141	300	131	127	134	239
评价	47	100	43	42	45	80

资料来源同表 5 - 1、表 5 - 2。

从表中可以看出，日本综合研究所认为，就国际贡献能力而言，美国最高，日本第二，约为美国的 60%，大于苏联及西欧国家；作为生存能力，则前苏联最高，美国次之，日本略高于西欧国家；作为强制能力，美国最高，前苏联次之，日本最低。综合国力评价以美国为 100 分计算，前苏联为 80 分，日本 47 分，法国 45 分，英国 43 分，联邦德国 42 分。

3. 我国学者的国力理论举要：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学者也对国力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分析和评估综合国力的理论和方法，这里我们仅对黄硕风和丁峰峻两位学者的观点加以介绍。（1）黄氏综合国力动态方程。黄硕风在《综合国力论》一书中，对综合国力的基本概念、基本要素及各构成要素间的关系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以下 7 个方面：即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和资源力七要素，每个构成要素又包括许多分要素。如资源力包括人口、国土、地形、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能力等。在该书中，他把综合国力当作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这个系统内的诸构成要素是通过一定的方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并且处于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因而综合国力系统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开放性、层次性、动态性等特征。对综合国力的测算也应将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运用系统分析、模型模拟等原理和方法，以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加以科学的分析和评估。据此，他建立了一组旨在测定综合国力值的动态方程，即综合国力动态方程：

$$\frac{dY_t}{dt} = \rho Y_t \left(1 - \frac{Y_t}{M} \right) \quad (1)$$

式中： Y_t ——表示 t 时刻的国力函数；

——表示国力年增长的速率；

M——表示环境(国际的、国内的和自然的)所能容许系统变量的最大值。

这里我们对国力函数 Y_t 作进一步的介绍，所谓国力函数，是指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反映其构成要素投入量的组合与实际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系的数学表达式，如果假设综合国力的几个构成要素为 X_1, X_2, \dots, X_n 。则国力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_t = F (X_1, X_2, \dots, X_n ; t) \quad (2)$$

这里 t 是时间变量， X_1, X_2, \dots, X_n 均是 t 的函数。为简化程序，可以将系统中的诸多构成要素归纳为三个宏观变量，即：1) “硬”变量(用 H_t 表示)。它代表构成综合国力有关物质形态要素的集合，如资源力、科技力、国防力的有关物质形态的所有要素。2) “软”变量(用 S_t 表示)。它代表构成综合国力有关精神和智能形态的要素的集合，如教育力、文化力、政治

力、外交力等。3) 协同变量 (用 K_t 表示)。它代表有关领导组织协调统一的构成要素的集合, 如政治体制、政府质量等。这样, 上述国力函数可以简化为:

$$Y_t = F(H_t, S_t, K_t) \quad (3)$$

为了能对综合国力进行测算, 把式(3)加以具体化, 即可写: $Y_t = K_t \cdot (H_t) \cdot (S_t)$

、 分别称为“硬”弹性指数和“软”弹性指数。表示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 则表示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

至于式(1)中的 (国力年增长的速率), 反映了综合国力系统变化的快慢。 >0 表示综合国力增长, <0 表示综合国力减小。

式(1)中的 M 值的大小决定了系统稳定状态的性质:

M 值越大, 国力函数 Y_t 的稳定值也越大。 M 值所反映的是国际、国内、自然等“环境”的作用。

在评测方法上, 黄硕风认为, 对于综合国力动态方程的“硬”变量的计算采用指数法; “软”变量采用专家评分法; “协同”变量采用加权系数。对于一些不确定要素的量化也采用模糊数学或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处理。

下面是黄硕风根据其国力函数和动态方程对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的评估, 以及 2000 年时综合国力的预测。

表 5-5 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对比 (1989 年)

序号	国别	硬变量					软变量			协同变量 量协同力	综合国力	
		资源力	科技力	经济力	国防力		文教力	外交力	国民凝聚力			
1	美国	92	234	269	269	0.83	0.54	0.61	0.43	0.72	1.59	593.33
2	苏联	98	156	192	248	0.78	0.51	0.60	0.55	0.71	1.64	386.72
3	日本	35	239	251	80	0.82	0.55	0.51	0.52	0.63	1.54	368.04
4	联邦德国	64	238	246	96	0.81	0.54	0.45	0.42	0.80	1.52	308.10
5	法国	62	231	212	110	0.80	0.51	0.46	0.48	0.66	1.54	276.35
6	中国	98	102	101	194	0.75	0.46	0.48	0.47	0.71	1.66	222.33
7	英国	62	163	146	101	0.80	0.48	0.40	0.41	0.50	1.41	214.08
8	巴西	87	94	102	90	0.78	0.45	0.37	0.38	0.52	1.40	156.05
9	印度	81	95	102	96	0.78	0.48	0.39	0.43	0.49	1.41	144.16
10	加拿大	72	85	127	75	0.76	0.40	0.39	0.35	0.50	1.46	136.64
11	澳大利亚	51	65	117	62	0.75	0.45	0.39	0.35	0.50	1.45	112.59

表 5-6 2000 年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预测

序	国别	1989 年综合国力	年增长率	2000 年综合国力
1	美国	593.33	2.7	816.85
2	前苏联	386.72	4.4	648.34
3	德国(统一后)	378.10	3.3	558.23
4	日本	368.04	3.2	537.39
5	中国	222.33	5.8	437.35
6	法国	276.35	2.8	384.93
7	英国	214.08	2.3	281.24
8	巴西	156.05	4.6	267.20
9	印度	144.16	5.5	274.08
10	加拿大	136.64	2.2	177.41
11	澳大利亚	112.59	2.3	147.91

(2) 丁氏综合国力质量公式。丁峰峻在 1987 年的《学术界动态》上发表了《综合国力论——2000 年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刍议》一文，文中提出了他的综合国力质量公式，即

$$\begin{aligned} \text{综合国力} &= \text{软国力} \times \text{硬国力} \\ &= (\text{政治力} + \text{科技力} + \text{精神力}) \times [R(\text{自然力} + \text{人力} + \\ &\quad \text{经济力} + \text{国防力})] \end{aligned}$$

文中，丁峰峻对软国力和硬国力的几大要素的内含和外延均作了一定的说明，如自然力，是指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状况，可以用国土面积(总面积、可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矿藏资源(总量、种类、开采难度、自给能力等)衡量。而政治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与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党同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决策能力等。

其国力公式中的 R 则代表硬国力的结构系数，表示硬国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关系，反映硬国力系统的结构。如果硬国力各组成部分结构合理，则 R 大于 1，其硬国力总量即大于各部分之间的代数和；如果结果不合理，则 R 小于 1，那么硬国力对国力的贡献则小于各部分之间的代数和。

(三) 对国力方程的评估

运用国力方程来测算评估综合国力，标志着国力研究实现了由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变，是国力学研究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然而，迄今，中外研究国力问题的学者们在许多问题(包括基本构成要素)上均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往往是在指出他人理论不足的同时试图提出自己国力方程。这些国力方程有的差别很大，有的虽然形式类似，但内容又各不相同，因而对各国国力的测算结果也大相径庭。应该说，这些各不相同的国力方程均有它们的可取之处，也有它们各自的不足。这反映了不同学者在时代背景、政治背景以及认识方法上的较大差异。其主要分歧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国力要素的不同认识：综合国力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这是国力研究中的最基本的问题。然而自开始研究国力至今，却从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克莱因认为仅包括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国家意志 5 要素。而日本综合研究所则认为是三元要素，即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我国学者黄硕风又提出 7 大要素：即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其他学者又有他们不同的分类法，仔细分析他们所列举各要素的具体内容。无论是具体构成部分，还是其组合方法均

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的国力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对国力的计算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如克莱因的国力要素过于简化，完全忽略了科学技术等对国力的影响和作用。这就使其国力的计算公式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因为在当代，科学技术不仅是构成各国国力的重要要素，而且也是各国迅速提高本国国力的重要手段。从理论上讲，国力的要素不管采取什么分类法，在具体计算时应包含全部国力的要素。但实际上，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必须有所取舍。正是在取和舍的问题上，各国的国力研究者在观点上出现了分歧。

2.对“软”、“硬”要素的不同认识：当前，国力理论界普遍都认为，国力要素有“软”、“硬”之分。所谓“软”国力是指那些无形的国力要素，以精神和智力形态存在，一般都是无法计量的。所谓“硬”国力指有形的国力要素，以物质形态存在，一般是可以计算的。就对国力的贡献讲，“硬”国力是基础，而“软”国力则决定“硬”国力的有效发挥程度，是一种倍数关系。因此“软国力”和“硬国力”对国力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对“软”、“硬”国力要素的划分是比较明确的，但对科学技术的归类问题却有不同认识，如丁峰峻在其国力方程中将科学技术归入“软国力”的范围，而日本的“三元要素”学派，以及我国的黄硕风都将科技列入“硬国力”的范围。笔者认为，科技力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既有可以计量的“硬件”，如科技人员数量，科研经费多少等，也有无法计量的“软件”，如科技人员的质量以及社会科学或基础理论科学的发达程度等等。因此，科学技术作为国力要素，在两个方面均应有所体现。但主要应将其作为“软国力”，因为就其对国力的影响而言，其作用与其他“软”要素一样，是国力的“倍增器”，科技水平高，就能更大程度发挥、发展现有的硬国力。

3.对各要素对国力影响大小的不同认识：古今中外的国力研究者在论及各要素对国力的影响的时候，往往都有所侧重，如古代的重农国力学派将农业置于优先地位，而重军国力学派则偏重军事实力。近代又有了重商贸财政国力学派（以英国亚当·斯密为代表）和重海权国力学派（以马汉为代表）、重陆权国力学派（以麦金德为代表）。在当代，不同的国力学家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克莱因特别注重经济能力与军事能力在国力诸构成要素中的地位，其设定满分均为200分，而对作为基本实体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则总共只有100分。可见其偏向是很明显的。像这种对各要素对国力影响大小的不同认识，会使在相同的国力方程式下估算的结果差值很大。

4.对“软”要素的不同评价：所谓“软”要素即是无法计量的国力要素，如国家意志、国家凝聚力、政府质量等等，由于它们无法计量，也就没有一定的评价标准，这样不同的国力学家在给不同国家的“软”要素打分时，往往是主观的，因而计算结果也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克莱因就曾多次说明，对无形东西的评分是“高度主观的”，因而是可以争辩的。由于对国力中的无形要素评分的高度主观性，其评价结果不同也就可以想见，同时也就出现一个问题，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国力评估，是否符合实际，出入到底有多大，这需要人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5.对经济发展指标的不同认识：多数学者均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但随着环境、资源和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正在提出异议，认为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为主的传统的经济指标，既没有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成本，也没有反映一国的全部产值。

就生产成本来说，目前的统计数字均未把砍伐森林水土流失、资源枯竭等的长期负效应计算在内。就产值来说，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并未包括无工资收入的劳动，如家务劳动、自己生产的蔬菜和粮食等等，据统计，在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没有被官方统计的劳动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5%。因此仅仅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国经济实力是不全面的。在看数量指标的同时还应看质量指标，目前，联合国统计处及有关机构已经提出“环境因素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人类发展指标”、“可持续发展的国民收入”等新指标，以比较客观地评价一国的经济实力及发展水平。

由于国力学家们对上述这些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因而国力理论，包括国力方程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国力的计算结果也就必然有所差别。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由于影响国力的诸要素中包含着许多无形的、不可计量的“软”要素，因此国力本身也是不可计算的，至少是不可能准确估算的。对国力方程的认识也应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们为我们估算国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又要看到，这仅仅是作者或某一研究团体对各国国力的“高度主观的”评价，是一家之言。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力研究没有科学价值，而是说目前的国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就我国而言，也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国力理论研究，为我国的综合国力能稳定、持续而迅速的发展作出一定的理论贡献。

第六章 国家的政治地理理论

国家是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对象。虽然近些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国际问题引起了更多学者关注。同时，区域化、集团化现象也日益突出，几乎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国家仍然是政治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例如，前苏联解体后，新国家大量的出现，而有的国家虽然新成立，不仅面临着很多问题，甚至又面临着新的分裂。这些仍然证明，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地理学家不能予以忽视。

在政治地理学中，关于国家的理论研究出现得比较早。在李戴尔—洪堡以前的时代，政治地理主要是研究自然环境在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国家研究中，地理的方法可以广义地称之为政治学的环境决定论。研究者从研究自然环境开始，到分析各种政治活动和组织如何受自然环境的制约止。

虽然在政治地理学中，这种环境决定论思想观长期影响继续存在，但是，卡尔·李戴尔却对国家的成长和文化的演变的地理学理论注入了新的看法。李氏通过与自然界的有机体的类比认为，人类的文化像自然界有机实体一样通过出生、成熟和衰老而完成循环。李戴尔从而发展了一种循环理论。根据李戴尔意见，文化和国家的成长过程的循环特点为学者提供机会来预测其兴衰。

在李戴尔以后，关于国家的政治地理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现将各种观点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如下：

一、拉采尔的贡献

在探索政治地理的国家理论方面，拉采尔根据对生物学的类比，对重复出现的国家成长模式进行研究，目的在于确定所称之为的“国家空间增长规律”的特点。拉采尔关于此规律的著作发表于1896年，恰好是他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出版的前一年。他把“国家空间增长规律”看作是对“科学政治地理学的一个贡献”。拉采尔的国家空间增长“理论”的内容如下：

拉采尔认为，政治地理学主要是研究人口运动的固定基地，国家的大小、形状都随其居民而定。换句话说，国家按其人口的增长和下降现象来表现它的人口运动。聚居于国家范围内的人，靠土地为生，从这里获得生存的物质条件。否则，人口对国家的依附则就要靠文化上的关系。从政治地理来说，生活于一片固定地区的人群，是代表这群人已扩展其群体于地球表面的一部分，同时该群体以边界或空旷的空间与其他也在扩展的群体分开。一国的人口在其国内是不断的运动，只有当领土发生变动时，才有可能转成外部运动。通常，在无人占领的地区，会导致人口的进入，或者这块土地连同其人口一起并入一个大的政治单位。同样，那些大的国家可以出现解体。这种联合与解体过程、增长与收缩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国家的兴衰，在地理上就是领土面积的胀缩。每一次空间上的变化都必然会对周围邻国带来很大影响，而国家的领土变化则是历史发展最吸引人的主题。在空间主题中、扩大和重建是两个刺激运动的重要因素。另一主题则是确立该国与其环境关系的性质，它既影响国家的成长速度，也影响其效果的持续时间。拉采尔把国家空间增长规律归纳为以下七条。

第一条，国家的面积大小随其文化而增长。

地理空间的扩展是无数世代的人对自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不断地为人的扩展提供新的土地。可是，要在政治上管理这片土地并将其合并起来就需要花费很大力气。这种力气只有借助于文化和通过文化的缓慢发展而形成。一方面，文化日益为人群的各成员的凝聚提供基础和手段，另一方面，又使人群认为，其属同族而结合在一起而不断扩大其领域。

思想和物质财富在寻找新的路径从其起源地向外分散，从而扩大其地域。以此方式向外扩散的人就成为该国家增长的先驱者。而后，国家就利用其路线，填补其空间。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政治和宗教扩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可是，很多商业的影响又超过上述关系，即使在今天，商业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推动着人们向外扩展。支持这些驱动力的是人口压力，其压力一方面随文化而增加，另一方面又推动文化，促其扩展。

虽然最强大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最大国家的建造者，但文化却是形成国家许多力量中的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有大国都属于文明的人民。拉采尔列举当时的大国的分布来证明其论点。例如，大国都在欧洲和欧洲人的殖民的地区。中国则是唯一的属于欧洲文化圈以外的一个大陆级国家（指面积大如欧洲）。同时，在所有非欧文化区中、东亚是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地方。

在文化的起始时期，比较大的国家都在地中海四周。但是由于陆地形态和其位于草原地带，故难以形成大陆级的大国。由几个国家合并而成的波斯帝国是第一个面积大到 $5 \times 10^6 \text{km}^2$ 的国家。那时的埃及王朝加上其沙漠地区，面积也不超过 $4 \times 10^5 \text{km}^2$ ；亚述和巴比伦的居民所在地区亦不到 $1.3 \times 10^5 \text{km}^2$ 。不论是亚历山大帝国（面积为 $4.5 \times 10^6 \text{km}^2$ ），还是古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去世时为 $3.3 \times 10^6 \text{km}^2$ ）都未达到亚洲的帝国的面积。封建时期，法兰克王国查理时与罗马帝国的霍亨斯陶芬王朝时国土仅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转入现代时期，西欧、中欧国家都不太大。在欧洲以外地区，在美洲和亚洲，政权随着贸易、信仰和欧洲的文化而扩大。那里的大片地区为形成比以前存在的国家的面积大二三倍的国家提供了条件。地理的发现和人们的知识迅速增长使得新的世界帝国在北美、亚洲的北部和南部及澳洲崛起，其所花时间则不到 300 年。在此时以前的近 200 年内，欧洲人口不停地增长，新的交通工具的出现，人口的迁移，于是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国、巴西等大国出现了。

拉采尔由此认为，国家所占的地域是随其文化而增长，在文明的低级阶段，人们所组成的国家也较小。这种情况已为中南半岛的原始的村邦（villagestate）和埃及早期主权村（sovereignvillage）的情况所证明。前者只有上百人，后者仅为 $3 \sim 12 \text{km}^2$ 。

国家的大小与其历史长短有关。在目前，大陆级的国家只有中国历史最久，其不少领土是元以后获得的。而帝俄、巴西、美国和英属北美则只是近两百多年来形成的，其所占的土地先前都是原始居民的小邦。可是，也有的尽管历史久远，并未形成大国的，例如，介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比利牛斯山中的安道尔虽然历史超千年，但并未扩大。

第二条，国家的增长也是人口增长的另一明证，但其必须出现在国家增长之前。

这里指的是人口扩散早于国家的扩大，它为国家的扩大提前准备了土地。所有古代国家和所有文化发展处于初期的国家都是神权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精神世界不仅控制着个人，而且也制约着国家。没有酋长不起传教士作用的，没有部族没有其图腾柱，没有王朝不夸耀其神圣起源。这种国王和地区主教的神权论不过是反映了国家文化发展的曙光。在现代的非洲，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和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在逼近，其间夹着的是异教徒国家。而这里的国家都是小国，而前者的则是大的和比较大的国家。在欧洲，当教会衰

落时，人们之间的差异则为新的更大的国家的出现作了准备。可是，在西亚和北非，伊斯兰教承担了这项任务。随着科学和贸易的发展，基督教会却为欧洲人在非洲组成新的国家铺平道路。

原始国家从狭义来说是民族的，而其发展则消除了民族的限制，而后，又回到空间更广阔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原始人的国家都是氏族国家。其初期的成长则受其与外族人相互作用的刺激。在氏族扩大其分布范围时，亲属关系就可能成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但是，即使语言相同，却不一定成为一个国家，非政治的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共同生活方式却使政治统一容易些。在智力高度发展时，这种共性会将意识变成对国家的感情，并促进国家的整合和统一。因此，这就需要文化的发展大大快于宗教和商业的扩展。

商业和交往远远超前于政治，政治则沿商业和交往形成的道路前进。和平的往来是国家增长的初步条件。原始的道路网络必然是过去形成的。统一相邻区的思想必定是在非政治信息发生之前。如果国家已进入增长期，它就会与商业一起分享道路网络所带来的利益。这就会导致政治系统的形成。每一个商路都为政治影响铺平道路，每个河网都是国家发展的天然“组织者”，每一个封建国家都把商业政策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在非洲，每一个黑人酋长，如有可能，就成为其地域的商人。殖民活动总打着“商业旗帜”前进。北美发展中，商站的作用十分明显。政治边界的前移是由前沿收税站的前进而开始的。德国的关税同盟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前驱。

在开始时，非政治活动范围的扩展必然先于国家范围的增长，而后才是制定政策和实行政策。地理的发现和国家的增长已久为大家所公认。而亚历山大、恺撒、奥斯戈·达·伽马、哥伦布和库克就是实现这两项任务的重要人物。

第三条，较小单位合并成的集合体发生在国家增长之前，与此同时，人与土地的关系日益紧密。

由于在面积大小、人口多少、文化高低上差异较大的地区机械地合并在一起，通过居民间的接触、交往、混居，从而产生一种整合作用。国家的成长不能单停留在合并上，只有某些伟大统治者由于他认识巨大空间的含意才会使松散的、易于分离的地区暂时凝聚在一起。罗马帝国只到公元前一世纪，才形成把各地集合在一起所必要的军事组织，利用半岛在地中海的优势区位为意大利创造了经济优势。罗马的殖民者是沿着商人的道路前进的，而士兵又沿着殖民者的道路前进。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把其相邻地区联合起来，以形成一个强大的帝国。

地区的合并过程加强了人与地的紧密关系。生活于一个地区的人，在开荒、耕种过程中，越来越依附于土地。但是这种情况不是不变的。今天，有些国家的人对土地并不是这种关系。所以，国家与其土地的关系也有其历史发展阶段。根据许多理论家的看法，摆脱对土地依附是比较古老时期的特点。回顾初期的情况越久远，人们与土地的联系越松散。人们居住得很分散，耕作很原始，很容易从一块土地转向另一块土地。他们的社会关系，尤其社会的精神组织系统，把他们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反而与土地的关系比较微弱。因为在此阶段小的国家彼此间有大片荒原作为边界使之孤立。这不仅使大片土地成为政治上无人管辖之地，而且有些在政治上很有价值的土地也将丢失掉。这样，甚至一些最大的河流，对印第安人和黑人来说，既不用作边界，也不用作商路。当欧洲人进入利用它作为通路时，河流立即变成价值巨大的

财富。

当我们把目光从较新的国家转向较老的国家时，就看到土地的政治价值也同样在收缩。这也与政治区的收缩有紧密联系。在非洲早期，许许多多小的战斗，其目的不在土地，而在获得战俘和奴隶。这对非洲带来严重的后果；虏获奴隶即毁灭了人口，又阻碍了发展。人口的不断外流就要为征服者建立人口外运的据点，而其周围是无人居住的荒原，这里的边界极不稳定。而在非洲北部，较先进的苏丹国，其区位和大小都比较稳定，仅仅在与未征服的异教徒相处地区出现波动。这些土地的政治价值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在亚洲古代，权力、奴隶和珍宝是战争的目的，因此就使战争获得国土的要求很快消失了。在罗马时代，只是在庇洛士（Pyrrhus）战争（前 275 年）开始才看到获得土地的必要性。

第四条，边界是国家的边缘器官、国家增长和防御的承担者，并参与国家有机体的所有转换作用。

空间增长本身表现为一种把边境外推的边缘现象，边界必然由增长的承担者所穿过。这些承担者居住得离边境越近，则其在增长过程中所分享的利益越多，边缘的向外增长也就越突出。在向有利地区伸展的同时，该国会形成一些向外伸出的增长极，它比边缘的其他地区表现出更大的活跃性。这种现象可以从国家形态、居民分布和力量表现等方面辨认出来。英属印度和帝俄在中亚势力的增长在阿富汗迎头相撞，使位于它们之间的区域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情况正如同罗马人为阻挡条顿人前进而征服高卢的情况十分相似。法国在其与德、意边境上一一直予特别注意，它集中力量努力使受到压抑的边境恢复增长。德国向东扩展，其进程是通过一块一块的征服、设防和殖民，重复美国在其西部，阿根廷在其南部不断外伸边缘的过程。不过几年，城镇在那里就从边疆的小木屋的设防聚落中形成。由于欧洲国家人口较为稠密，这种独特的边缘地段很快就处于非常危险状态，成为重兵防守地区。这种现象令他人特别担忧。

边疆也如同国家的其他地区一样经历同样的统一和连续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地球上早先的国家，就会发现模糊不清的边界。那里的国家的地区是不确定的。它的边界也不可能是清楚的。在原始民族头人的头脑中，各头人对其所有的土地范围是重叠。对今天的殖民当局来说，要解决这种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极其困难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那种经大地测量固定的、不可变动的，并且要塞林立、严密防守的边界至今在欧洲以外还很少看到。

第五条，国家的增长中设法把政治上有价值的地方包括进来。

所有国家在其增长和发展过程中，都是选择那些地理上有利方向，而避开不利方向。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与另一个国家的衰退有关，则该国家就会顺利地占有好的地区，而另一个国家则被驱挤到较差的地区。因此，在我们所熟知的整个殖民历史中，新的地域政治实体都明显地出现在沿海、沿河、沿湖地带的肥沃的平原上，而老的地域政治实体则被驱挤到原先交通不便、条件较差的内陆、草原、荒漠、山地、沼泽地区。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北美、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南非。由于好的区位给新来的殖民者提供了好处，因而也早就确定了这大片土地以后的好运。即使政治占有者发生变化，但早来的居民仍然占有文化上的优势。这就可以说明许多政治上入侵取得成功，而文化上却失策的原因。具有相同文化的人才有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土地价值

观，为此，欧洲人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所有殖民活动，都采取了相应的空间发展形式。在其他时期，则另一种评价占优势。古代的秘鲁人并不进入亚马孙河流域，而是沿着高原上近 4 000 km 的道路来扩大其统治区。古代希腊人并不向内地寻找大片肥沃土地，却追随腓尼基人转向岛屿和海湾之间的半岛。土耳其人与此不同，他们占据了希腊人不感兴趣的小亚细亚的高原。马扎尔人则追逐第聂伯河沿岸低地。其习惯和文化在这里得到反映。正是这种原因，在相似的生活与生产条件下，只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才有可能持续增长。

政治上有价值的区位的发展也可以在国家的形态上表现出来。德国的发展是沿着北海和波罗的海，法国则围绕着色当北面的默兹河，英国是趋向海峡群岛。智利的北部边界原在南纬 24°，这里是用途不大的阿塔卡马沙漠。当在其北发现鸟粪层就把边界向北推。1867 年在南非法尔河发现金刚石以后，英国人接着就穿过奥兰治河进入奥兰治自由邦境内。在低级阶段时，国家位置偏向于商路，这在苏丹和非洲内地很容易看到。这也是瓦代（在乍得东南）很少向北扩展的原因。

由于政治上有利区位的封闭和难以进入，国家的重要部分的增长倾向就会受到抑制。因为政治的增长在于活动，国家看到那些有利于活动的自然区的合并的好处，就会尽力取得海岸和河边，伸向平原。同时，国家也克服障碍，以通向交通方便地区。在这里，人们不仅想到限制，还要设法充实这个自然上受阻的地区。罗马人过去就是沿着北非和西亚的沙漠发展。在公元前 222 年就达阿尔卑斯山南麓，直到 200 年后，已在阿尔卑斯山东面和西面向北延伸很远时，才第一次翻越该山。中欧大国的增长，在波兰第一次被瓜分后，被引向东方，是由于政治力量向西长期受挫的结果。苏丹国家的增长方向却是始终一致的，在北非，从大西洋岸到印度洋岸，其方向都是向着南方较弱的黑人国家。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过程也是一样，其采取形式是从比较容易征服和力量较弱地区开始，然后再包围当地强大的政治力量。这类增长都是向着抵抗力量较弱的方向。

第六条，国家空间增长的刺激首先来自外界。

虽然自然增长可以更新一个政治实体，不断地再现它，但是并不能自行产生任何其他形式。家庭是在后代身上来更新自身，产生一个新的家庭。在实行族外婚的地方，两个家庭严格奉行相同的模式。部族或家庭可以分离出一些成员形成另一个部族或家庭。所有这些群体经过其对土地的依附而成为一个国家。随着群体的增加，大国并不是由较小的国家而产生的，而是由一群大小相近的国家聚合而成的。人口的多少受许多可能条件所限制，其中也包括一些非常残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国家的增长受到限制，因而超常的大国也是不易出现的。国家增长还可能受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的包围所阻碍。就我们所知，原始国家的扩展在没有外界影响下是难以前进的。在广义上说，殖民作用则成为增长的起因。从具有大空间概念地区来的人带着大国观念进入较小空间概念的地区与只了解其自身国家的本地人相比，那些至少知道大小两种国家空间概念的人就比当地人处于有利地位。地理区位突出地表明，在小国观念地区中的较大国为何从交通最方便的外边，也就是沿海或沙漠边缘向内发展。如果我们看一看欧洲人建立殖民地前的非洲情况，就会发现，大国是出现于尼格罗人、哈米特人、闪米特人接触地带，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是在尼格罗人相互接触的地方，或尼罗人所居住地的海滨。非洲在殖

民地时期为入侵者所征服，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历史多次表明，开始时，当地人对外来人进入和扩展表示沉默，接着是容忍，最后突然摆在面前的则是政权的掌握问题。几乎每个欧洲人的殖民地的过程都是如此。

在罗马帝国开始时，我们发现罗马移民在各地居于优越地位，他们在海上贸易方面的地位比其他拉丁人要好。在美洲，由欧洲人打下基础的国家都是从沿海向内地扩展，进入印第安人分散建立的小国地区。美洲、澳洲和赤道以南的非洲，在欧洲人进入前是地球上受外来影响最少的地区，国家的发展程度也是较缓慢的。

那些带到小国地区的大国观念来自何处？在那些不是由欧洲人、海上人带入的地方，则是靠哈米特人、闪米特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来承担了此项任务。如果我们进一步问，除去欧洲人外，到什么地方去研究这一观念的起源，我们来到地中海东岸，那里肥沃的土地位于辽阔的草原中间。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波斯都有大的绿洲，狭小地区具有大量人口，迫使居民流向周围地区。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生活的富裕区。就像下埃及一样，其发展是指向上埃及。中国是由黄土地区向四面发展的。这些地区养育的大量人口可以用于军事征战和缓慢的殖民征服。这些人群的政治组织和对大片领土的控制术来自草原。从这些土地上培育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中国以及非洲的苏丹那些伟大国家的奠基人。因为在哥伦布以前，美洲没有草原民族（该民族曾控制旧世界的广大地区）。正是没有这种连续不断的政治影响才使其成为美洲国家发展程度低的部分原因。

到处漫游的草原人对定居的农业居民和商人的影响表明这只是重大差异的一个方面。正是这种差异奠定了海上生活的民族建立国家的基础。这里包括有腓尼基人、诺曼人、马来亚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定居趋向的民族中也碰到这种现象，他们不是政治上的退让，就是妥协。所有纯农业的殖民地区，如爱琴人在大希腊地区，日耳曼人在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布尔人在南非都对政治的反应较为迟缓。罗马的伟大成功在于使粗犷的农民性与比较好动的、追逐名利的成分相结合。

整个人类的历史运动存在着差异。有的保持稳定，有的向前推进，这两种情况都与人们所居住的地理环境有关。为此，国家的形成是从海洋和草原（运动区）推向森林和适于耕作地区（滞留区）。长期定居的居民易使意志衰退，而流动区则相反，它能推动人群走向组织化。在鞑靼的牧民，维金和马来亚的渔民中可以看到，把少量力量联合起来就可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

第七条，在领土合并的总趋向中，随着国家转换，其强度亦随之增加。

随着对土地的政治估价提高，土地作为衡量政治力量的指标及作为国家斗争中的战利品的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大。只要有政治斗争，较弱的国家就会设法加强自己力量使其能与较强的国家相抗衡。在土地上，这就会引起空间合并的竞争。奥-匈、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土面积比为 100 : 86 : 84 : 80；荷兰和比利时之比为 100 : 90；美洲的美国和英属北美之比为 100 : 96，而安大略和魁北克之比为 100 : 97。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其大小和等级都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它是由于多次竞争所带来的合并和缓慢发展的结果。在 16 世纪，由于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为控制欧洲而展开的竞争形成了欧洲平衡这一概念。可是其胚胎却出现在 16 世纪的勃艮第、瑞士和意大利的相互关系中。这种推动力已成为国家空间发展中的一条规律。在发展较低级阶段，空间控制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却是积极的，这种现象曾出现在非洲的乌干达、

卢旺达等地区间的关系上。在更低级阶段，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小的部族在强大邻邦的打击下联合在一起，就像在铁锤打击下锻造出政治的凝聚力那样。

从小国到目前的特大国家的成长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国集合小国与最强国竞争中存在着与此相同的趋势。在这场竞赛中，最强国家往往受到已成为大国并希望把自己提高到最强国地位的大国的挑战。这种趋势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个平衡轮一样，它能消除各国增长中的差距使其在规模与等级上相互接近。在整个历史中，这种推动力是向着不断推动更大国家的建立方向的。我们看到，目前这种推动力正积极活跃于欧洲大陆，那里联合在一起的意愿，至少在经济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各式各样的。较小的国家通过从其邻国获得足够的土地的方式，以提高自己地位，使其达到或接近周围较大国家的水平。介于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其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在共同的地区中，国家的发展是相互接近和相互超越的，后来的国家则可达到早先国家所取得的规模。西属美洲、法属北美、英属北美和美国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一分为二，两个在面积上不应相差太大，荷兰和比利时王国就是个例子。一个国家的面积缩小时，则想从另一处找回来，为的是仍然保其与邻国相应的水平。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岛失去了 44 310km² 土地，而在巴尔干半岛则拿回 51 110km² 土地。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很自然的，其竞争并不只限于空间的大小。就位置和天然资源而论，相邻国家并不一样，它对国家的利益和功能起着深远影响。加拿大以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与美国的太平洋-大西洋铁路相对抗。在大湖区的水运方面，它们在大湖两边分别开凿运河。

二、哈特向的“国家职能说”

哈特向是美国的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在政治地理学方面，他在 1950 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一种关于国家的新见解，其标题为“政治地理学的职能方法论”。该见解影响甚大，现介绍如下

（一）国家的内部职能

哈特向提出，政治地理学的中心问题应在国家地域的功能研究。首先应考虑的是，作为一块土地和一群人所组织成的国家的基本目的。正如拉采尔开始提出的，国家的基本目的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地域，即国家地域中的各种区域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单位。

在国家地域的各区域中，国家企图去组织的是什么？不论情况如何，国家的企图是对其内部的政治区建立完全的和排他性的控制。简言之，就是建立法律、维持秩序。地方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中央的总体政治组织原则和制度。

在许多社会条件方面，如阶级结构、家庭组织、宗教和教育，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其各地区间有很大差异。但是，由于这些因素对政治生活的重要作用，在某些国家，有一种明显的力量要对这些社会条件施以统一的控制。

在经济领域中，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设法形成某种统一的经济组织。最低限度，他要建立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经济制度，对对外经贸活动加以某种程度的控制。此外，国家还要在很大程度上把生产和贸易的各个方面（例如价格、工资水平等等）置于自己的统一控制之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国家，他们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每个国家要尽力获得境内各地区的居民的最高忠诚，在任何地方的或省的忠诚中，要明确反对对任何境外国家的忠诚。

对一个国家的地域，地理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区域差异。国家十分注意的是，对所有地区的各阶级的居民建立统一的控制。在政治地理学中，主要的兴趣是把各个地区统一成一个整体；在任何空间地域的垂直系统中，我们注意只是那些促进与影响区域一体化的因素。

附带提及的是，我们也可能注意到，国家主要职能对地理的总的领域的影响方式。土地利用、工业发展、贸易及任何区域中人文地理学中社会方面的各要素，由于政府的作用，将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我们分析任何国家主要职能时，都涉及到政治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因为国家地域不是只根据其土地和居民而组成的一个天然单位。在这里，人们要求有个政府对它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管理。每个国家的主要的和长期的任务是，如何把多多少少分离的和多样化的地区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效的整体。

对于政治地理学家来说，就需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在每个国家地域中，地理学家发现：（1）各区域由于受到自然或人文因素的影响而或多或少呈现彼此分离现象；（2）各区域在与外界国家关系上呈现不同程度的分歧；（3）各区域本身在人口特点、经济利益和政治态度上呈现出某种差异。

1. 离心力：地理学家很熟悉各类自然特点影响各区域之间交往。辛普尔和其他学者曾对森林密布的阿巴拉契亚山和美国西部高山、荒漠造成的政治后果作过阐述。可是，在现代国家中，这类问题大多为电讯和铁路的发展所克服。然而，目前在巴尔干的某些地方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山地国家，这类问题仍然存在。

因为国家机构要求的联系不仅是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而且还要求从中心点到边缘地区，距离本身就是个离心因素。显然，在一个国家内，距离受制于该国的大小和形状。

在人文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没有人。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的地区，直到最近，要穿过它，不但有困难，还有危险。在这种地区的两边、人的感情有隔阂。海洋虽然早已为人类所穿越；但仍然是最重要的分离因素。

法国首先把跨海洋的地区合并于他的国家。它曾把部分西印度群岛和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作为法国的省。也许最难以克服的障碍是来自不同人群居住的地带所产生的分割，尤其是被怀有敌意的人群所分割。一战后，东普鲁士与德国主体被波兰分割就是一例。

如果一个国家中，某一地区与外部国家的地区关系的紧密程度超过与本国的地区间的关系，就可能给该国带来严重麻烦，这普遍出现在边界发生变化的国家。当一个国家的新边界穿过一个先前国家的地区，使原来是属于一国内部的地区被分属于两国。1922年，上西里西亚被分割就出现此情况。但是，有的地方出现此情况并非边界发生变化的结果。例如，加拿大与美国相邻的各省，有的省与其南面美国的州的联系（特别是经济联系），其紧密程度就超过它与本国相邻省之间的联系。有的国家的个别地区反而与遥远的海外国家关系较密切。如澳大利亚，其各州是分别与大英帝国进行贸易，西澳大利亚就属这种情况。加上其自然和人文条件使它与东部则存在着隔离的影响，甚至一度发生它提出退出澳大利亚联邦的要求。巴西的东北部也存在某种类似的问题。

可是，地理学家必须防止仅从自然地图上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对我们所熟悉的一种经济情况被看作是与其政治框架无关的“正常”现象时亦应小心谨慎。美国加州南部被广大的山岭、荒漠所隔离，通过交通与几千千米以外的东部人口密集区相联，其经济仍是全国政治体系下整体经济的一部分。

上述所有例子都属比较极端的事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可能性有很大的灵活性。阿尔萨斯平原的西面由孚日山脉与法国其他地区分开，面对的是越过带状的狭窄莱茵河泛滥平原的南部德国，通过可航行的河流与德国北部相联。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阿尔萨斯与哪一边相适应呢？根据现代技术，答案必然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不重要的，按照这个地区的经济潜力，其经济与法国相联系还是与德国建立联系，条件几乎完全相等。

造成地区分离的原因，比较起来天然障碍，或者外部联系造成的脱离不如居民的多样性引起的离心力来得重要。要确保自愿接受一个共同的组织，就需要某种程度的相互了解；显然，这在居民处于相同的情况下是容易的。在社会方面出现区域差异的地方，国家则需采取措施使社会生活形成某种程度的一致以消除阻力。有时，企图获得统一可能反而加重了不统一。1918年的匈牙利就是个典型例子。

什么样的社会特点重要则要看具体的国家。通常可能会想到语言与宗教。此外，还应加上教育和生活标准，经济状况，对待阶级和种族差异的态度和政治哲学。仍以阿尔萨斯来看，那里是天主教占优势，这点像法国而不像德国。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这里居民对待教会和国家关系的态度，这种情况与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情况相近，而与法兰西共和国情况相距较远。

根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种族差异可能与上述问题关系不大。在美国，居民对待区域集团的种族成分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域差别，肤色上的不同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甚大。

地理学者比较熟悉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因为这些情况与地理有比较密切联系。几乎每个现代国家都经历了高度工业化地区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利益之间明显的政治紧张阶段。但是，这种利益差异会导致连锁现象。不过，经济方面的差异比社会和政治态度方面差异容易调和。

再说，国家只是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单位。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单位，国家必须在政治生活上实施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政治态度是坚决的。如果一个区已习惯于一套政治概念、思想和制度，如果它的人民已感到将过去经过奋斗而建立的那些政治价值观，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系统下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即使先前处于不同国家中的区域已自愿结合形成一个按民族特性为基础的国家。例如，在1918年，原被德、奥-匈和俄三国瓜分的波兰，由于过去政治教育差异给新的国家带来不少麻烦。

当今，在一些政治发展尚处在初期的地区，这类因素不太重要。在长期定居地区，政治发展比较成熟的地方，这种问题可能属于头等大事。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还是阿尔萨斯。多亏法国大革命，那时那里的人民强烈支持新的革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这不可能与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半封建的制度和谐相处。

与此相反，在这一基础上，人们可以理解，在1919年，瑞士对当时建议把与其相邻的福拉尔贝格（奥地利的一个省）合并进来持否定态度的原因。

2. 向心力：在前面讨论政治态度时指出，在讨论到这种程度时缺少一个

重要的部分。我们已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区域地理中各种各样的离心力，它难以使这些区域组合成一个有效的单位。在考虑这种困难如何能予以克服时，我们没有自问是不是有什么力量能克服这种困难，有什么东西把这些地区拉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

缺少这一点思考，在政治地理学方面是个很大的不足。如果我们在自然地理图上和民族分布图上看到一块地方显然适合于一个国家，但是，许多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并未组合成一个国家。例如，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及德国地区就是这样。我们千方百计寻找内在的地理原因去加以说明。

意大利半岛，加上其北部的平原，是一个由海洋与阿尔卑斯山所环绕的地理单元，而其居民都使用共同的语言。从中世纪以来，它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明显的地理单元。正如一位奥地利大臣所嘲笑的，意大利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形象，没有什么迹象可以看出一个意大利国家在开始出现。重要的是还没有出现建立一个意大利国家的想法，也没有人去试过，它的目的在两种对立思想面前被粉碎了。一个是教皇国思想，这个由教皇对意大利中部进行世俗控制区为的是，将他获得对罗马的完全统治当作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精神资本；另一个是欧洲中部一个大帝国思想，它的范围是从德国北部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只是这些持续好几个世纪的思想上的强国最后被法国大革命的骚动搞垮后，才有可能使某位意大利的领袖去严肃思考意大利的统一。

阻止意大利的成立的思想之一，也是中世纪德国未能统一的关键，可是这时英、法两王国却已有效地建立起来。好几个世纪以来，获得德国国王头衔的人则深受更高头衔皇帝的诱惑。受复苏罗马帝国的思想所刺激，他们则力图设法建立一个跨阿尔卑斯山，包括很多民族的国家。在实现这种思想中所做的无效牺牲破坏了成功的可能性，使后来的皇帝最终把其企望放在德国的统一上。

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名称，一个政府，要国际条约承认其存在，并明确其领土范围。但只有这些条件还不能建立一个国家，要建立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向心力，才能把国家内部各地联合在一起。

3. 国家意识：向心力是某种思想，它证明把一些区域联合在一起组成该国家是合理的。所以，国家必须有其存在的理由。

虽然大多数的政治地理文献中忽略这点，但向心力并不是一个新思想。拉采尔曾说，由于一种独特的思想，才能将作为一块地段、一群人的国家组成一个单位。拉采尔提到，在初期阶段，这种思想只不过是某统治者的愿望。不论什么理由，所有地区都通过其当地领导者而授予他们的忠诚。在查理帝国和成吉思汗帝国中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国家持续的时间可能不超过这个统治者的寿命。在试图保全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中，世袭王朝思想也就出现了。可是，在成功的国家，我们发现，总有些来自王国各部门的人具有高度政治意识，为了摆脱王朝支配，开始把国家看成是代表某种价值的事物。今天，王朝制度只有在其将国家传统人格化身的消极作用转变成实行积极统治的国家才是安全的。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失去其原始思想还不会立即分裂。力的惯性、既得利益、害怕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使其继续存在些时间。但是，一个结构已失去原来存在的理由，又未形成一种新的思想，当然不能期望它能经受住外来冲突或内部反抗对它的进攻。当这一天到来时，这个国家要生存，只能依

靠其所有地区的居民对它的忠诚。

拉采尔还提到，最强的国家在于该国的政治意识充满整个国家，扩展到所有地区。对于研究一个国家的政治地理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开始研究由离心力引起的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找出正在启动的向心力。这些地区在什么政治思想下，为了什么目的，与其他政治地域分开、而彼此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政治单位？

这似乎离地理学太遥远了，也太像是政治学，而不是政治地理学。研究气候的地理学家必须按气象学家的分析去理解气团的性质。我们只有掌握土壤学家对土壤类型的分析，才能科学地研究土壤地理学。在农业地理学中不单研究作物与家畜，我们注意的是农田中的作物和畜棚内及牧场上的牲畜组成的农业单位。只有了解农民的目的，他对这片土地是以什么想法组织生产以后，才能去研究农田的地理分布。

地理学家往往对农作物了解得不多，所以，他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农民在想什么，也许他们可以从观察农田，筒形仓库等现象去进行推论。但是，要确切了解，还需向农民请教。

关于某一国家的思想意识情况我们问谁呢？很显然，应当找实际处理这些事务的人。这不像对农场和工厂调查那么容易。一个现代国家是一个运行的组织，或多或少地由其组织内（在理想情况下，是全体成年人）有政治思想意识的人共同参与。

按理说，人们可以设想，研究政治的地理学家应当能找到这问题的答案。遗憾的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政治学家本身只关心各国普遍的思想和目的，也就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的。这忽略了正是这类事务与地理学家有直接关系，就是说各国情况并不一致，而且差异较大。按理这意味着这是地理学家研究的问题。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能从其他学者（如果不是政治学家，也许是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这类基本问题的答案的话，显然，只有被迫自己去解决此问题。我们必须发现和确定一块地区和一群人组成一个国家单位的特殊思想。

这点离地理学家的训练与知识相距甚远。多年的辛勤努力还不能说稳操胜券。只有我们能确定组成一个国家的思想，才有分析其政治地理的基础。地理学家还未在国家研究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要精确了解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思想肯定是困难的，但是，对其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可以较顺利地得出大致的并且有用的解说。

在比较古老的国家，我们可以期望找到原来固有的存在理由已有所变化，它与原来的情况关系甚少或已无关系。因此，要确定这类国家特殊思想必须研究的是当前形势，而不是遥远的过去。在比较发达的现代国家，在其国家内的各区里，具有政治思想意识的人自觉地忠诚于国家，即使没有明确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可是对国家却有某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一个民族出现了，它与国家本身有某种不同。

4. 民族概念：在比较原始情况下，民族（nation）只代表共同属于某亲缘关系的一种感情，家族概念的一种扩展。更准确地说，是与外部相对应的群体内概念的扩大。虽然在术语上是由家族语言来的，像“血统”（blood）、“种类”（breed）、“种族”（race）等术语一样，但实际上，它不是“亲属”（kin），而是“类属”（kind），类似于文化上的特点，而不是生物学

的特点。

民族性这个基本概念对国家的直接意义，首先在于，所有人宁愿选择由其自身所支配的政府，即使这个政府与外国人所组成的政府相比显得效率不高、不太公平。其次是个人对国家有认同感。有人说，民族性就是“汇集起来的自尊心”。每个公民会感到，国家是“他的”国家，领导是“他的”领导。要使这情况成为可能，他必须感到，那些负责管理国家的人是些与他们一样的人。

可是，一个国家的主要目的不是某种语言和文化促进的，其目的是政治，完全控制各种价值的是政治价值。因为一个国家的人是在消极政治经验中成熟，其归属在一起的感情并不太依赖于像共同语言方面的明显一致性，而更多依赖于对某种政治思想、观念和制度的依托。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们宁愿向他们的国家贡献其最后忠诚。

正是由于这些思想，更加适应于其具体情况，所以才能说明瑞士的民族由许多小区集合发展的情况。那里有四种不同的语言、自然障碍所产生的分割、明显分散向外的联系，可是在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影响下，它们组合一个国家。

与瑞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欧长期历史发展中的小国，这些国家的存在主要不是由于建立在文化亲缘基础上的各个民族和外族统治，而是这些民族在地理分布上不能组成只限于一个民族的国家现实。他们作为国家独立存在的时间还不长，没有一个国家能使其政治价值和制度所培育的国民对国家的忠诚程度超过文化亲缘关系。正因如此，他们未能把几乎存在于每个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变成本国民族的一员。

根据上述分析，哈特向认为，“民族”可以定义为，分布于一定地区的一群居民，由于共同接受某种价值观而认为自身应组合在一起。正是这种重要的价值观使该地区与居民组成一个国家，依靠这个政治机构才能保存和发展这种价值观。

一旦一个民族的思想在一个地区内充分建立起来，它的传播绝不会受该国家的地域限制。因此，当法国国民军在1792年进入说法语的萨瓦区时，这个还不是法国领土的地区却早已接受法国的国民革命思想。萨瓦人从不属于一个民族，但一直为一个缺乏政治思想的封建国家所统属，所以她把自身看作是法国民族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将他们的态度与说法语的瑞士和比利时相比，后者在那个时候虽被法国军队所征服，但并未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5. “核心区”概念：在核心区概念上，通常多以法国、英国或瑞典作为典型事例。核心区在这些国家十分重要，不论是国家地域的发展，还是民族统一的发展，都与此有关。但是，与西班牙的情况相比，则西班牙的中心区在国家中的作用则相对比较弱。然而，匈牙利王国情况是，马扎尔人的核心区位于多瑙河中游的富饶平原。那里为周围面积不大的低地和山地提供了天然的中心。虽然这种情况无疑有利于对国内广大地区的征服与管理，却难以在民族上实现统一。

挪威有许多分散的核心，只有通过海洋联系组成国家，所以海洋却为民族团结和组成现代国家提供了基础。在美国，没有一个地区起着核心作用，它是许多区域的组合体。各地区在不断移动的平衡中加强其相互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为形成有效的统一体提供基础。

关于核心区的情况，看来，它既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不是基本条件。其主要作用在于一种共同思想使该地区内的所有的人相信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从历史上看，在某些国家，核心区可能对传播这种思想到其他地方起了重要作用。今天，像在法国、阿根廷或墨西哥一样，核心区可能继续成为一个职能单位的中心来集中各地区的自身利益，但是，一个国家的共同思想也可以在没有核心区的地区发展起来。

6. 国家意识在政治地理学中的应用：地理学家正是以“存在理由”这一形成国家的基本思想去分析国家地域。那么，地理学家怎样利用这一“国家地域”思想呢？地理学家首先要确定这种思想的应用范围，而后，确定其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最后确定这些区域与该国领土相符程度。

在此基础上，地理学家可以探索政治地理学中最主要问题，即在其领土的法律范围内的特殊“地域思想”，有的地区由于该基本思想而成为国家地域的组成部分，而有的地方必须在面对部分区域居民的冷淡或对立情况下保持控制。

在围绕北极的副北极地区内，不论是阿拉斯加、加拿大、瑞典，还是俄罗斯，其居民除分散居住的原始部族外，还有少量分散居住的文明人。在政治组上，这里虽是境外国家的殖民所在地，却没有因旗帜的不同使此地域发生分化。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中，热带低地地区也有这种情况。大部分拉美国家，其未被实行有效政治管理的领土占官方所划定领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在中美洲与安第斯山山地，划出热带高原上的印第安人长期居住区界限却遇到很大困难。这些土著语言和文化区是作为这些国家组成部分呢？还是看作是一直没有受到外部殖民控制的地区？

此类问题亦出现在比较高度发达的国家。好多世纪里，整个爱尔兰按国际法被看作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其大部分地区实际上确实是一个附属地区，与受控制的国家不同。如果这个国家的思想是建立在承认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上，那么，要考虑的主要地理问题是这个民族区与这个国家的领土是否相符。在这个国家内，有没有一些地区其居民并不感到自身是其民族的一部分？这个民族有没有些地区并不包括在该国内——即民族统一问题？

要划出某个民族集团内的民族区并不容易。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须采取间接方式。如果能确定影响该民族的主要因素，我们就能划出每个因素所存在的地域。在此基础上，可以确定某些地区显然属于某个民族。

虽然某民族扩大到整个地区，但与该国内的现有地区相比，则可能有不同的强度。因此，我们不仅要确定民族和国家在地区上的相符程度，还要确定在某区域中所反映的民族特点是部分的，还是全部的。由此，我们将提出（部分以地图形式）政治地理学中的主要问题所涉及的基本因素和关系——分析该国各个地区组成一个统一体的程度。

7. 内部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们碰到另一个必须分析的问题——国家地域内部地区组织与我们所分析的区域多样性的关系。虽然一个国家内的所有地区对该国的总的观念表现出完全的忠诚，但是区域间的差异必然引起对该观念的理解与应用上的差异。

如果这些差异比较小，像法国或乌拉圭那样，各区域可以接受从一个中央权威来的中央集权政府。如果差异很大，试图加上一种统一的制度有可能招致对立，危及国家的团结。在多数国家，这种区域差异是很大的，但是，大多数国家还是试图采用统一的中央政府。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现时，

西班牙则是个明显例子。

某些国家公开承认，允许对国家的总的观念有不同解释，因此，制度和法律的重大差异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是瑞士提供的最古老的，美国提供的最大的联邦制国家制度。在这两个例子中，区域异质性的明显程度由权力制度的划分来保证。

组织国家地域的可能方式并不限于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例如，联合王国，在其长期历史过程中，演变成一个复杂的制度，在此制度下的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马恩岛和海峡群岛，它们每个都有适合于其语言、宗教、经济和政治地理的不同程度的自治。在确定一个国家的组织方法时，研究者必须研究的，不仅是写在宪法中的文字，还要研究政府的实际组织。

（二）国家的外部职能

在分析一个国家政治地理的职能方法中，前半一半放在国家地域的内部问题。后半一半是国家地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外部关系，这些国家地域也组成一个国家，但是受域外国家的控制，有的并未组成一个国家。为了方便，将这些关系归纳为地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战略的。

1. 地域关系：在地域关系方面，我们的叙述首先注意的是相邻国家在领土范围方面一致程度。所涉及的国家一致程度的大小，最终需要由严格的边界来确定。

在所有国际关系中，那些涉及领土的定位和边界确定的问题是最具明显的地理性。因此，无疑这是地理学家普遍研究的问题。可是，这类研究大多在开始时有了偏向。在起初边界分类中，地理学家首先注意的是边界划线所在地带的自然特点。这不是国际边界分类，而是与边界相联系的特点的分类。

如果我们开始于研究国家地域的话，我们可以从边界名称上认清边界的主要功能：正是那条线，它被所有有关人所接受，因为所划出的这个区的一切事务都是在一个政府管辖之下，而相对的另外的区，则为不同的政府所管辖。在世界高度发达的地区，边界线的精度可达到 30cm。

因此，要了解一个国际边界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为有关各方（即其邻国）接受的程度，以及由边界位置所确定其国籍的人口。

就拿下列的国际边界来说，英国和法国的边界（包括属于英国的海峡群岛）；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包括特朗诺边界，它从阿尔卑斯山坡一直往下几乎达到波河平原）；最后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埃尔帕索东、西的边界；这些边界穿过的是完全不同的自然地带。某些边界与民族分界十分吻合，某些则不是。但是从国际边界的主要功能来看，它们全都属于同一类，即它们全都被各自国家和边界地区的人民所接受。

法、德边界（1930 年的情况）是另一种情况。虽然该边界被法国和德国官方所接受的罗迦诺条约所规定，但人们并不认为德国领导人会接受其为最后边界，法国政府根据在阿尔萨斯所关押的当地领导人情况，对属于法国的阿尔萨斯人完全接受与否缺乏信心。德、波边界又是一种情况，在两次大战期间的边界，根据双方的声称，两国不过都把其当作暂时的领土划分而已。

有的边界线穿过一些原始地区，那里目前还很少有生产价值，但将来可能会变得重要。为此，我们可能需要确定其类型。有的国家有时对此很关心，虽然未确定其最后边界，亦未由于消失于荒原中而引起问题，但是，随时可能对明显接受的线提出异议，甚至动用武力。

如果我们根据边界的初步功能建立其分类系统，只是为以后再根据边界

不同特点来确定该类边界的范围。例如，可以根据人口的天然隔离情况，民族的区分，以及国家边界发展的历史。总之，我们希望避免普遍流行的那种地理决定论的方式。

关于国际边界的第二个问题是其分界功能被边界两边国家所坚持的程度，也就是商品和人员穿过边界线的所有活动被边界官方有效控制的程度。在研究时，地理学家当然要观察划线所通过地带的特点对控制方法的难易。

在一个国家的边界达到海洋的地方则出现特殊的边界问题。虽然海洋向所有使用者开放，但实际上，很少被任何人所使用。因此，正像大多数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在沿海岸简单地划出边界即可。但是，为某种目的，如捕鱼、边界控制、海战，在水域精确确定这条线可能是有争议的。在国际法中，不论是领水的宽度，还是沿曲折的海岸划出这块水体的离岸线的方式，都未取得一致意见。

一艘外国商船，为了进入某国港口而使用其领水这是一个国家使用另一个国家领土的最普遍方式。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为了进入别的国家，或在某种情况下，为了进入自己国家的另一地区，一个国家的人要利用外国的领土的愿望和需要而引起的问题。加拿大和美国两国已许诺穿过两国领土建设铁路。例如，密歇根中央铁路从底特律穿过安大略到布法罗，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从蒙特利尔穿过缅因州到不伦瑞克的圣约翰。欧洲国家通常不会容忍外国铁路穿过他们的领土，但是在波兰，两次大战之间，铁路则为德国用于联系东普鲁士和德国的主体之间往来。

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诺为其两边国家提供过境商业服务，虽然这会引来多种控制的小问题。最重要问题是内陆国家通过过境而进入海上的通路。加拿大的一条铁路不仅穿过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和缅因两州以达海洋，而且当冬季圣劳伦斯河封冻时，还要利用缅因州的波兰特港口作为加拿大外贸货物的进出港，其货运量占该港的大半。在欧洲，某些港口为此做了专门安排。如德国的汉堡和德累斯登为外国过境贸易做了专门安排。

2. 经济关系：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是经济地理领域中的主要部分，通常，只简单地当作区域间贸易一种形式来处理。其他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如服务、投资等，在经济地理学中可能很少进行研究，但是，现在却有少数地理学家企图做这方面工作。显然，一个国家的个人或公司与另一国家的个人或公司之间的经济关系，对某些国家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但是确定是什么意义则并不容易。结果，在政治地理学中的许多研究工作者看来别无选择，只好把该国国际贸易按标准经济地理方式处理。

在分析一个国家地域时，需考虑其与外界地区经济关系应从这样的事实出发，即在许多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是按其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与世界其他经济单位的关系来运行的，可以说，必须按此来运行。其困难是，因为它必须按照一个政治单位来运行，可是，一个国家地域又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单位。

第一个问题是，要确定一个国家地域的经济对其他国家地域依赖到什么程度，而对自给自足的分析只是个开始。如果人们说，美国生产的煤和铁有剩余，但是它的锡、镍和锰的供应却大多来自国外，糖和橡胶亦如此。这种说法甚至精确到百分数，可以说意义不大。如果一个国家有很多煤和铁，它又能从世界任何生产上述金属的地方正常地获得供应。在战争条件或战争威胁下，重要的是知道锰正常来自外高加索，锡来自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也可从玻利维亚获得），而镍来自于邻近的加拿大。天然橡胶的充足供应只来

自马来西亚和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遥远地区，但邻近的古巴则能供应我们大部分糖的需要。

总之，地理学家应根据某些国家的特殊性，它的区位，政治组合与所研究的国家的关系来分析该国家地域对其他国家地域的经济依赖情况。

因为所有巩固的贸易都是双方互利的，所说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任何其他国家，则其含意必然是反之亦然。但是，任何商品贸易、船舶服务，或投资对一国的重要程度，则视有关两国中每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情况而定。所以“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是否能生存下去”的问题，只有在上述意义下才有实际意义，因为在最原始水平以上的任何国家，在某些方面总是依赖其他国家。

虽然，这问题很不简单，但我们也许可以作出两项概括。第一项概括是，如果两个在国民经济总规模上差异很大的国家，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对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更为重要（虽然这种情况可能并不适用于战争情况）。这是因为这些经济关系虽然通过国际支付平衡可以看作是平等的，但是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却占很大份额。例如，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古巴与美国的经济关系都是个明显的例子。

第二项概括是，根据这样的事实，贸易的重要意义在于选择的可能性，即为必要的供给而找到其他来源和为必须出售的产品以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转而找到其他市场。大多都只想到前者，可是在资本家获利制度下，大多数国际贸易中，后一条件是比较重要的。其原因是，因为世界生产的大多数商品只要适当增加花费就会为其供应找到供选择的来源；但是，也有即使在大大降低售价情况下，也不可能找到可供选择的来源。

最后，我们可以注意到，目前世界生产需要技术高度发达的制成品的过剩地区比较少，而生产农、林、矿初级产品的过剩的地区相当广泛，因而初级产品的市场相对有限。结果，即使初级产品对人们生活是必需品，但是，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发现，为其产品找到可供选择的市场的难度，要大于生产与生活关系不大的工业品生产国。随着工业化在世界的传播，这种情况当然会发生可以想象到的逆转变。

可是，不应当认为，这些粗略概括会给某种情况提供答案。考虑到奥地利在哈布斯堡帝国解体后取得独立所产生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要作为一个有经济活力的单位生存下来，奥地利经改组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与相邻地区需要维持一种高度的经济联系。奥地利面临与一些工业优越的欧洲地区相竞争的形势，使它更加依赖东部的近邻市场。对于东部这些邻国来说，这种关系对促使它们经济的最大增长也是必要的，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情况却并非如此。如果从政治上考虑，它们宁愿花较大代价发展自己的工业，并不情愿与奥地利进行自由贸易。结果，它们做出了不太有利可图的选择，但对奥地利来说，选择的则是其经济破产。

在 19 世纪，国际经济关系既受国家行动的支持，又受国家行动的阻碍，但一般仍是作为个人的或公司的企业而运行。由于 30 年代的不景气，极权国家的兴起，以及上次的战争，越来越倾向于由国家本身直接干预国际贸易和投资。在这些方面，国家的职能是越来越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所以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在国家的政治地理分析中越来越重要。

3. 政治关系：一个国家与任何境外领土的最明显的政治关系形式是有效的政治控制，例如，殖民地、属地、属国，或“保护国”。通常，只把少数的国家看作殖民国家、帝国或强国：在西欧只有八九个，另外还有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后两个的作用主要在太平洋西南部诸岛）。德国和日本则由于一战和二战从名单上消失。可是，如果我们承认一些国家是通过殖民活动把与其相邻的地区划归其领土范围内，尽管在法律上这地区属于该国，但实际上，它并不是该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该名单会更长，有加拿大、挪威、瑞典、南非等。

殖民关系的法律形式，甚至像大英帝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法律形式并不一定反映这种关系的现实，也不一定反映境外国家对其政治组织控制和影响程度。政治地理学所关心的则是后者。

殖民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从现在观点看）宗主国的政府系统扩大到殖民地区的程度。许多帝国主义大国就从宗主国来的国民而论，他们总是把他们的法律制度扩大到殖民地区，所以，在任何殖民地区可能有两种权威重叠，一种是管辖宗主国的公民，另一种是管辖当地人。

许多国家，根据条约可以认为是独立国，而在职能上也应是个独立国，但是，它们不是那样，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境外一个强国的政治控制。一个国家利用其他国家一部分领土为其军事服务就是很好例子，例如，大英帝国对埃及苏伊士运河区的控制、美国对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控制。相对来说，最重要的是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运河穿过巴拿马共和国的人口最密地区，而时间则是无定期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境外国家可能并未直接管辖这部分领土，但是通过顾问对该国的主要方面，如外交、海关或国家预算实行有限控制。美国在过去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在有限期内实施这种控制。境外大国集团曾多年对中国海关关税实施控制。

一般说来，由世界其他国家承认一个国家的独立主权，假定这个国家与所有友好国家维持同样政治关系，并且不受与任何国家组成的特殊的政治组织所限制。可是，有许多例外，例如，英联邦的自治领已从殖民状态转成独立状态，可是它们继续保持与联合王国的自愿邦联关系，它们彼此间的许多政治和经济特权并不扩大到其他国家。

最后，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当然都已接受某些义务而加入联合国；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些义务是普遍的，没有地理分布上的差异。

4. 战略关系：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与其他国家处于一种战略势态。虽然战略势态可能部分由其自身的行动和政策所形成，但其主要部分则由其他国家的行动和政策所决定。

瑞士目前是一个防御力量相对小的单元地区，虽然其防御力量并不太小，但处于一群比较大的邻国中间，对大国的力量扩大都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在这种形势下，瑞士发现为自身安全最好是采取武装中立政策，因为这个中立国对相邻的各强国在防御上是互利的。在很早时期，在16和17世纪时，奥地利是与瑞士相邻的唯一大国，它的许多邻国都是小国，瑞士邦联执行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战略关系的政策，它经常是与一个邻国结盟，而与其他邻国发生冲突。

换句话说，一国的战略关系随时调整，使其必须适合当时的具体的战略形势。随着德国1871年的统一，欧洲的战略地图发生的变化不亚于政治地图的变化。因为这个新单位在经济、人口和力量的增长都快于其他任何相邻国家，并且能与奥-匈形成一个横跨中欧强大集团，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其他国家都被迫改变它们之间的相互战略关系。

三、琼斯的“统一场论”

琼斯 (Stephen B. Jones) 于 1954 年发表其关于国家形成的“统一场论” (unified field theory)。该理论是从动态的发展过程来看待国家形成过程的, 从中可以分出明显的阶段, 表达了完整的过程。在政治地理学中, 有较大影响。现介绍如下。

琼斯认为, 当时的理论研究并未给地理学带来革命性变化, 也未能使其科学性有所提高, 但是一项有用的理论, 不论其用途如何, 至少可作到三点: 简洁的叙述、启示性解说和为更好研究提供工具。

对目前“统一场论”最重要的是其命名。你可能对其内容并不满意。我深信, 这个理论在这个批判性的世界上, 是不可能依靠自身而竖立起来的。可是, 它有自身的用途, 就是要通过这条路把它推到公众面前。

虽然统一场论的命名有点自高自大, 在模仿理论物理, 但它的理论基础则与物理学风马牛不相及。它的学术依据来自于三位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家: D. 惠特莱西、R. 哈特向和 J. 戈特曼 (Jean Gottmann)。实际上, 在标题上, “统一”这个形容词是来自于这种信念, 即“场”的概念把这三位的思想统一起来了, 也把他们的政治学联系起来。

在哈特向和戈特曼的思想之间既有相似之处, 又有不同之点。哈特向承认流动 (circulation) 是克服自然障碍把国家整合起来的一种措施, 但是, 他并未把它归入向心力之列, 也未讨论它在国家思想发展中的可能作用。他似乎把流动当作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一种表现来考虑, 而不是作为一种第一性的力来考虑。一个已建立起来的国家肯定会对流动格局产生惊人程度的影响, 即使流通在原先对国家地域的形成有所帮助。在哈特向的理论中, 也可能承认传统形象 (iconography) 的作用。它既是一种向心力, 有时亦是一种离心力。根据哈特向的看法, 流动并不必然带来不稳定和变化。它可能有助于稳定, 例如, 加拿大的铁路的情况就是这样。传统形象并不总是造成稳定。大的传统形象和小的传统形象有可能导致冲突, 例如, 地方主义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它们在传统形象上的作用就有这种可能。哈特向另一思想——国家成熟性——表示一个国家地域与国家传统形象的共存。

(一) 思想-区域链 (the idea-area chain)

在琼斯的政治地理学的统一场论中, “思想”和“国家”位于该链的两端。哈特向将其间的连字符号看作该链中的三个其他的环。其中一个环就是戈特曼的流动 (circulation), 而琼斯则将其称之为运动 (movement)。

该链的情况如下: 政治思想 (political idea) — 决策 (decision) — 运动 (movement) — 场 (field) (场) — 政治区 (political area)。这条链应当形象地看作是些湖或盆地。这些盆地是在相同水平高度上, 并相互串联起来, 所以, 只要进入一个盆地, 就可以传到所有其他盆地。

在这个系列中, 政治思想的含义不单是国家思想, 指所有的政治思想。它可能是国家的思想, 或者也可能是国家形成道路上某过程的思想。它可能只是一种本能的聚合, 是种无意识的表现。“战争首先是在人们的思想中开始”, 一切其他政治亦莫不如此。但是也有许多政治思想从未进入行动阶段就胎死腹中, 仍留在纯思想的领域内, 或者为当权者所拒绝。一项美好决策必然是行动的前奏。一项正式的议会决策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当前政治学中大量研究的是集中该链的思想—决策这一端的非正式的或无意识方面, 即通

过政治行为进行研究。虽然在思想和决策两盆地的“渔夫”绝大多数是政治学家，但戈特曼和哈特向则是以地理学家身份以研究传统形象和国家思想而进入这两个盆地。

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都研究该链的另一端——政治区——这一现象。这个词是专门用于任何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区域，不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个独立区，一个国家的下属区，还是一个行政区域（行政区）。大体上，可以包括一般的行政区、特殊目的行政区和战地勤务区三类。所有政治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有公认的界线，虽然界线不一定是条线，也不一定就是永远不变的。一个行政区里，一般都有个中心，但并不是所有的都如此。

琼斯曾提到，运动基本上就是戈特曼的流通。由于把它放在该链中与决策相联处使其产生新的转换。每个政治决策都与这种或那种运动方式有关，虽然也有例外，但是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到。某些决策带来运动，某些决策改变了运动，某些决策则是限制了运动，某些决策甚至是引起一种新的运动去代替或控制旧的运动。运动不一定要卷进大群人和大量的事务（它可能就只是无线电波），但是，通常情况下，人和物的运动是政治决策的结果。这些由于政治引发的运动可以看作是“流通场”。国家公路上巡逻人员运动形成一个场，军援物资的装运形成一个场，农场补贴支票发送和投递也形成一个场。

有一个具体例子可以阐明各项目组成的该链背后的思想。国家禁酒法令作为一种思想已有长期历史。第十八条修正案和禁酒法令都是最后决策，它使禁酒法令经历了从思想领域进入到行动领域。毫无疑问，在此之前已有许多小的决策，而后，必然也实施过这些决策。禁酒法令的即期效果是造成运动中的彻底变化。酒类的合法装运停止了，原料也不再供给蒸馏造酒，有组织的非法运动沿新线路进行，执法官员则实行巡逻和稽查。这种运动的场内密度不是均匀的，所以该场边界也并不与美国的边界完全对应。城市的贫民窟和阿巴拉契亚谷地成为这种活动的中心。邻近国际边界地带是警察巡逻的重点区。巡逻范围在海上达到 12 英里。运动的效果海外都可感到。虽然国家领土未变，但是新的管理区却建立起来。如果法律未变，而且要严格执行，可以想象到关于领海的概念可能会变化。后来，由于石油勘探活动场的扩大而使领海概念发生变化。早期比较成功的强制性改革尝试——制止奴隶贸易——形成一个公海上的实施场，同时还导致在西非建立一个殖民区。同样，利比里亚的建立是从思想到区域链的突出例证。

在禁酒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区的存在给由禁酒法案所形成的场以某种形状。由于相联的盆地在一个水平上，在一个盆地加入某些东西，它就会传到另一个盆地。可是，在从思想流向区和由区流向思想之间有一共同特点。前者基本上是一种控制或形成过程。禁酒法令控制某些运动和形成另一些运动。让解放的黑人进行殖民的思想就形成了向利比里亚的移民。这种逆向传播可以叫作制约作用。政治区、场、运动或决策则制约着思想方向盆地中可以发生的情况。

一个场的基本特点，在物理学上不是运动，而是力的空间变化。重力场，即使在苹果未落时，它也存在。因为我们不应该将它与物理上的场类比，所以这特点不应该使我们过于注意。可是，重要的是，运动和场并不一定是同一现象。民主党人在该党与共和党势均力敌的地方去参加投票的百分数，比该党占压倒优势的地方要高。走向投票的运动虽然产生一个场，但是这个场

与党的力量场并不等同。

卡尔·德茨(Karl W. Deutsch)曾建议用一种“场”的方法去研究政治社区。“根据这种观点,可以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场中的一个点,而这个场是由他的信息传递或与其他所有个人的其他相互作用而形成。”德茨建议可以把这个概念应用于包括家庭、村庄、镇、国家、区域、国民、民族和邦联在内的大的和小的“群体”。某些群体是政治区,某些是地理区,但不是政治区,其他,像家庭和国民,不一定会在有些区内发现。

场的存在既有时间上的亦有空间上的。应用惠特莱西的思想,可以说,它既有时间尺度又有空间尺度,时间尺度有三个导数:速度、节奏、定时。公路上的巡逻队,正如上面提到的,形成一个场,但是对法律破坏者和法律执行者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巡逻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执勤。他们巡逻的有效时间表是定时问题。整个交通和整个交通规则可以看作是时-空场。

(二) 在政治区中的应用

该理论在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中的应用是非常简便的:犹太人的复国运动是其思想,贝尔福宣言是其决策,允许迁移就是其运动,聚落场、政府活动场和战争场导致了以色列国家的出现。这种电报式的简略虽然把历史过份地予以简化,但是似乎是符合该理论的。对一个具有较长历史而又较复杂过程的国家来说,其历史不大可能如此压缩。该理论为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研究开辟一条道路,而这条路并不一定是捷径。它不是把政治地理减缩到五个容易的步骤。它不会把世界政治用五个柱状体表现在图上,在柱状体上冠以“思想”、“决策”等说明。可是,它可以提供些思路,并为历史、政治和地理的思维与资料交流的可能性铺平道路。

卡尔·德茨已在民族增长的其他政治组织形式中发现八点一致性,其中五点显然属于“场”现象:从生计经济到交换经济,核心区、镇和通讯网的增长,资金的集中及其对其他地区的影响。第七点和第八点是“传统形象”(但却有“场”的含义)上的民族意识的增长及其与民族象征和政治义务的关系。第六点(个人自我意识的提高)虽然在个人主义哲学日益增加的一个框架中所作的决策,会导致原有的场发生变化,也很难与场有直接联系。总之,民族的整合过程,不论是由像哈特向或戈特曼这些地理学家所看到的,还是由德茨政治学家所看到的,都可以作为场的变化过程来加以阐明。可以想象到,政治区的轮廓可能没有变化。前缅甸殖民地也许正在向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前进而不改变其边界或首都,但是对政治场的研究则会显示出某些变化。

场论的一个优点是,它不限于政治组织的区。它可以毫无困难地应用于非组织的区,例如,地中海,毫无疑问,它是一个政治场。当然,决策可能影响整个地中海,并可能形成控制整个海域的运动。可能其思想是各式各样的:墨索里尼梦想一个新罗马帝国,英国关心海洋控制,美国封锁共产主义的战略等。雷特西尔(Reitzel)说明美国在地中海的政策,是由于采取小的决策而取得某些军事战役胜利的累积效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这些决策与所取得的成功的军事运动,把美国卷进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去。苏联取代了轴心国而成为地中海强权的对手,英国的大国地位有所衰落,而美国则发现自己已深深陷入地中海政治活动中。支持希、土的杜鲁门主义是其结果,它说明地中海的海洋权力场的统一性。决策的累积形成一个场,而地中海则限制了这个场。

在行政区的例子中，政治区可能由决策而引起，很少或不可能有运动介入其间。新的政府机关在其实际进行工作以前，可能要确定其场的服务区。许多例子的分析表明，这些场的服务区反映了先前存在的场，例如，被其他政府部门所采用的区或著名的经济活动场，在许多情况下，其现存的边界会延续下去。可是有可能行政区直接来自决策，并不反映已有的场。田纳西工程管理局可能是个例子，除非我们说河流的船民、山麓农民、水文调查人员等都可以形成一个场。这似乎有些牵强附会；更正确地说，田纳西流域似乎已宣布是一个政治区，由活动而产生的一个场。可是应当注意到的是，一旦电流开始，该场的传播就会超出该流域范围。

关于思想-区域链并没有决定论的色彩。某种思想可能导致各种区域，某种区域可能制约各种思想。在四方统治者统治下的密克罗尼西亚就证明了这点。在所有四个区中，虽然所统治的区并不一致，但基本上是相同的。对这样的小岛来说，其可能的用途大多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四方统治者——西班牙、德国、日本和美国——则作出不同的选择。它们的场在特性上和强度上是不同的。如果人们坚持一种理论必须能预测某种行为，那么场论就名不符实。即使没有理论，一个掌握各种信息并有某种空间意识的人，可能对美国在密克罗尼西亚的决策进行预测。作为指导研究，场论对此是有用的。

（三）国家的权力研究

国家的权力研究可能也符合于场论。有人把权力看作是“参与决策”。如果权力是参与决策，那么权力就必然是在思想形成运动之前，这就比较容易地把国家的权力符合于场论。哈特向把政治地理和国家的权力研究作了区分。他认为，一个地理学家有时可能去解决“一个国家如何强大”问题。如果没有别人去研究，他在其研究中就“进入一个其核心与目的都不是地理学的领域，而是军事和政治战略问题。”权力与决策相联系就是支持了哈特向的看法，即地理学与该链的另一端有了紧密联系。可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政治学与地理学拉在一起，而不是将他们分开。如果权力更多集中在决策盆地，则它决不会在其他盆地中缺失。

（四）边界、首都、城市

统一场论也使边界研究符合于政治地理学的总的模型。边界当然是两个政治区之间的一条线，但是它也是一个区域中的一条线，正如哈特向在对上西里西亚的研究时认为，边界地区却是一个场，其中位于政治区之间的线严重影响了流通。一个边界场甚至可能变成一个政治区，如同缓冲国和边疆省那样。

首都城市的研究也可以表现在场论的各项中。作为首都城市的特点可列举如下：十字路口、堡垒、仓库和前沿司令部、文化联系中心，还可能是平衡场所、几何中心。所有这些词汇都具有运动和场的含义，不过有的是显性的（如十字路口、前沿司令部、文化联系中心），有的是隐性的（如仓库）。中央行政机关的思想和需要则导致对首都的位置作出决策。其选择则受场的制约，同时它又可能歪曲或改造场。一旦首都被选定，则首都的场就建立起来，许多新的决策和运动就会由此而产生。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导致首都城市的形成，它比该国内的其他城市的规模要大得多。

不仅是首都，而且其他城市也可以引入该理论范围。在一个日益增长的城市中，有许多问题是来自其流动扩展的速度快于其传统形象扩散的速度。市区范围超出政治范围，则受制于地方的利益和忠诚，使政治扩展遇到困难。

一种“大市域思想”可能出现，通常这会引引起职能上的权威，但并不会产生政治上的整合。简言之，城市问题就是要使其政治范围与其场相适应。对此有许多供选择的可能，例如，把郊区合并进来，城-乡一体化，大都市，职能上的权威，国家承认地方的职能。

（五）动力学场和动态场

因为政治是各种矛盾和矛盾的解所组成（虽然矛盾和解并不需要伴随以暴力），但这种基本活动必须通过场表现出来。尽管有许多是思想上的矛盾，可是在其能促成或阻止运动的决策以前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各个场可能相互接触，而不相矛盾，也可能相互重叠，并不产生矛盾，如果其运动只是动力学的。但是，如果是动态的话，往往会产生矛盾。例如，纽约城日益增长的对水的需求，迫使其在这方面的活动成为动态的，则就会引起它与其他城市对特拉华河供水需求上的矛盾。国际石油工业，由于必须发现新的油源，所以其本身就是动态的。其结果是潜在的矛盾，有时矛盾提前，至少暂时获得解决。政治动态关系就像资源需求和人口压力那样重要，当然需要不断进行研究，统一场论只是将其研究纳入场的概念中。

美国人对待世界政治的总的态度是，如果可能的话，是将动态问题通过协定降为动力学的状态，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把动态场转化为动力学场。

关于思想的量值是没有上限与下限的。人们很容易想到世界政府，可能梦想到宇宙飞船和星球帝国。对于决策、运动、场和政治区是有其上限的，然而这些事务的范围则随事件而变化。例如，就宗教、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来说，都能产生决策和运动，都能形成场。人的空间思想也是从最初的区域转变成世界的，并进而转变成三维的、四维的。哥伦布的思想、西班牙女王伊萨贝拉的决策、新大陆的发现航行、终于出现了一个新的场、一个新的帝国。这种过程也可以形象地比拟于一个化学家的思想、一个企业家的决策、一项试验、一个新的产品销售场，最终，一个经济势力圈的形成。

许多最有影响的思想都是综合的，即“文化思想”。例如，西方文化不只是资本主义、民主和基督教。它是由这些或其他因素所组成。汤因比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趋向成为它的“世界国家”（universal state），即一个与文化大体共存的势力范围。如果这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另一例证说明，一个链从思想开始，通过许多决策和运动，形成场并导致政治区，即该文化的世界国家的出现。

（六）统一场论的用途

一个可靠的理论，无论多么小，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为简明的叙述、为解释提供的提示和为更好研究的工具。如果该理论只是提供专门用语，则它只满足了第一个要求。也许它只超出提供术语。它可能将一些人对政治地理学的目的和方法的明显多样性有所减缩。它可能不仅有助于政治地理学理论上的统一，而且也助于理论上的概括。它可以将形态与功能、区域与过程之间建立充分的联系。它也可能表示“伟大思想”（grand ideas）与地球表层之间的一种关系。

统一场论不只为解释提供的提示，如果其即使达到这方面成就，它也不可能为任何问题提供最终答案。但是，与有关学科相联系，表示出其间的关联，就可能显示出线索。该理论的使用者至少可以使其避免单因素的解说，并促使其从相关学科中寻求贡献。

关于作为更好研究的工具，这是琼斯对其统一场论贡献的最大愿望。该理论在其词汇链中所表示的是一套清单——check-list（也许用控制系——check-system 更好些），通过它，人们可以确定自身方位，并指出其应当进一步探索的方向。在考虑到一连串的盆地类比时，人们可以知道通过哪一个盆地进入和知道通过什么地方可以退出。如果人们是从政治区开始研究，则思想位于另一端。如果研究从运动开始，则学者会知道应向两个方向进行探索。如果在某些盆地，人们可能需要从其他学科获取信息，但是至少人们有了这链图作指导。该理论告诉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他们彼此需要学习些什么，每一方应增补些什么，而不是每一方将自己封闭起来。

该理论对地理研究另一可能的效果是，可能激发出新型研究和编辑新型的地图。许多地图不是表示就是暗示一个场，但是思想上如考虑到思想-区域链，则可能向他们提出新的资料来源：民意测验、出版物的内容分析、重要物资的输送、政府官员的操作、金融业务交易等等。该理论的地理性在于它通过场的概念，那些本身不能以地图表现思想和决策，其结果都可以制作成地图。

可以想象，该理论的总体计划可以扩大到政治研究以外的领域。实际上，近期在经济地理方面的研究为我们学科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思想-区域链可以在一个概念中把地理学理论两个主要部分（可能论和区域论观点）统一起来。可能论集中在人对环境中的各种可能性作出选择。选择就是决策。选择和决策就意味着思想，必然导致运动。区域的和分布的方法以研究区域开始，通过运动导致决策和思想。

最后，统一场论可以用于其他学术领域。有助于评价外交和战略方面的思想与计划。这是一种热望，可能是种幻想。可是，外交和战略也是从思想开始，导致决策，终成运动，因而产生场。反过来，外交和战略受政治区和陆地场所限制，它制约着可能的决策和实际思想，毫无疑问，这种思想向高层次发展并不求助于我们的理论，但是也许这点思维上的指导会有助于说明某些事例。

四、K. 德茨的国族成长的论述

K. 德茨是哈佛大学教授，于 1953 年发表的《国族的成长》一文中谈论政治和社会的整合，把它视为国家成长的必要条件。他谈到，在许多地方和时期，部落的合并形成民族（peoples）；而民族的成长则成为国家（nations）。在某些方面，这种程序似乎表现出许多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过程。这种过程表现出许多不同的政治形态，这些形态不仅重复出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比较。

这种重复出现的整合形态，像历史上其他相对一致现象一样，引起历史事件的可比性或独特性问题。可是，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中，对此类相对一致现象的研究在这些学科中，基本上是属于学术方面的探索。要写出历史的和政治的分析，必然要使用那些其中包含某些一致性观点的概念。诚然，此类重复出现的形态提供了一个相似的背景，针对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不同的见解，研究人员也可以对国家的或超国家的整合的各个事例评价其特点和独特之处。

同时，在研究国家增长中可能反映出累积性变化。有人可能提出，在国

家主义范围及超国家组织的可能性两方面，目前是个独特时期。对研究当前政治情况的学者来说，进而可以提出对国家级或国际级的社会和政治整合过程中的特殊问题和政策作些研究。

在讨论国家问题的重复出现情况以前，最好须注意所使用的若干术语的含义及彼此的差异。社会是指已习惯于一起生活的人的群体。社区是指彼此能对广泛问题进行有效交流的人的群体。地区（country）是表示一个经济上有较大的相互依赖，在商品和服务上有多重市场的地理区。民族（people）是指具有互补性交往习俗的人的群体。国族（nation）是指一个民族已控制某些社会高层组织，并最终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民族国家。国家主义（nationalism）是指在社会活动和经济竞争的世界中，该国族及其成员受财富、权力和声誉等价值观影响，将竞争利益置于外部人之上，以致将个人安全和集团认同的目的与该集团所获得这些价值观联系起来。

虽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以存在民族，但是，国家主义和国族则只出现于近几个世纪。一个国族就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成分在社会动员过程中转化的结果。

部分社会动员和国族的建立过程已是历史上重复出现的现象，至少具有某种普遍性特点。在过去这种国族成长中，我们能发现有哪些一致之处？在当前的国族成长中，与过去的任何时代的国族成长方面，在方式上有何差异？

在国族成长方面，可以发现的共同之处有八点。

（一）向交换经济转变

在我们所发现的广泛的国家整合中，由自给农业向交换经济转变似乎是所有事例的特点。在交换经济开始时，卷进大量居民，并使其中许多人处在各种商品和服务方面相互交换之中，我们就在那里看到出现了民族语言（至少是区域语言）和文化觉醒，仅此就为足够数量居民进入交换经济，它们的频繁交往，使其无法同化于其他“外来的”语言和文化。

在这些转变发生的地方，种族形势和局部语言情况似乎变得松散和软弱，有可能落入新的和完全不同的性状。

（二）社会的深入动员和核心区的整合

由于广泛的交换而出现的向一种经济和文化的转变，在不同地区不仅发生的时间不同，而进行的速度也不同。其结果往往是，在比较“先进”的地区的旁边存在着不太“发达”的地区。而比较“先进”的地区则往往成为一个中心，在文化和经济上吸引不太“发达”地区的人，因而前者成为进一步整合作用的核。该作用的“时间”是重要的，有时比该作用出现的“地点”更重要，社会动员和部分整合过程则是纯历史的，因为每一步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前一步的情况。

政治地理学家已对历史过程中大国顺利组成的核心区进行过很多研究。这类核心区的特点有特别肥沃的土壤、密集的农业人口、大量的余粮供养大量的非农业人口；地区地理特点是有利于军事防御、重要交通路线交叉的节点。这种核心区的典型例子有巴黎盆地，或伦敦地区。

应当注意的是，构成核心区的密度不仅是密集在土地上保守的村民，还有交通和通讯方面原因。因此，人口密集的尼罗河谷地作为广大地域整合中心的作用并不太有效，而人口稀疏的阿拉伯地区的麦加和麦地那，虽然人口占该地人口比例不大，但却因其流动性大，活动性强，加上交通方面原因，反而起着更重要的整合作用。

可是，核心区理论并不能解释某些国家有长期存在的持续性，而另一些国家则衰败的原因。重要的是应考虑每个核心区产生的情况，特别是其城镇所起的作用。

（三）城镇的成长、流动性及城乡之间的联系

不论现在或过去，城镇有相当大的发展，在城镇间有巨大的流动性，在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性，交往和多种经济交换上的联系日益加强。因此，没有城镇，可以说，就没有发达的国家。

有了城镇，但在城镇中，这些条件并不完全存在，则国家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不完整，受阻、延缓或停滞。反之，在城镇内、城乡间、流动性、交往日益加强，则国家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加速。

（四）基本联系格局的形成

大多数国家似乎并不是从一个中心区发展起来的。许多国家有几个首都，在其历史进程中，多次转移其中心区。即使像法国这样围绕一个中心区而成长的典型例子，长时期内，却有两个首都城市：巴黎和奥尔良。法语统一的重要阶段发生了查理曼时代的集市，而商路正通过该地区，法国南北商路及南北的联系，对巩固北方对南方于13世纪宗教战争的分离分子和阿尔比异端分子的胜利起了作用。

拿德国来说，并没有一个核心，这点很容易看出。可是其交通、交往等通路格局却是明显的，这点在考虑德国时应当注意。这种情况，在研究中国、俄罗斯、瑞士、加拿大、美国的统一时是很有用的。另外，这种情况在研究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地区其联系格局与不完全统一和近期的分裂的关系时是十分有趣的。

没有人提出，联系格局本身就能形成一个国家。照例，在这里，文化上的最低和谐是十分需要的。在许多情况下，口语之间存在足够的相似性，就有可能在大量的人口中出现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和语言本身的特点当然是历史发展过程各阶段所赋予的。可是，我们知道，在瑞士语言和文化差异十分明显，但在国家的形成中成功地跨越这方面的困难，带来了一些充分有形的和无形的好处和机会，从更大的财富、安全、自由、声望到新的形象、向往、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神秘的吸引力。

（五）资金、技术和社会机构集中现象上的分异

今天，在国家的差异和国家自尊心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生活水平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各阶级间的差异；有的考虑的是一个社区的社会、道德，或传统方面的“最基本”的组分，有的则注意其“享受”的组分；在相对富裕社区被认为是贫穷的人，可能对生活必需品和服务的感受明显地好于贫穷或经济落后地区相对富裕的人的感受。

在生活水平差异的背后，有生产力水平和生产供给因素上的差异。生产力上的差异可能涉及一些地理因素，如土壤、供水、森林、矿藏和交通的方便。可是，所有这些地理因素只有依赖于特殊技术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人们知道如何利用各种自然资源的话，那么每种自然资源的集中就需要生产技术和知识的集中，如果需要使用资金的话，则资源和技术就需要资本投入的集中。

应当清楚，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中人为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增加。正是这种原因使我们相信，今天生活水准的差异很少是由天然生产因素造成的，更多是由于有技术的劳工、教育、住房等条件方面差异造成的。民族和

国家可能会围绕着资金、技术和社会机构的集中而具体化。这些因素的集中也为个人追求其所企求的商品提供了机会。因此，我们可以从世界各不相同的地方看到，民族是围绕某些社会机构或某些经济机遇的集中而成长的现象。

在工业革命前，不同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的效果早已存在，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其效果在增加。在经济或工业大发展的地方，这种发展对该地区的人的生活提高起着“扬水泵”的效果。这就吸引人口移入该地区就业和定居，并使新来者与当地的主体居民间产生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接触。这种居民间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接触会带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某种后果：要么导致民族的同化，如果民族的同化作用不能与新来者的某些集团对其需求增长同步而行，则“扬水泵”效果就难以实现，最终还会导致新动员起来群众中出现新的民族主义。这也可能最后将先前的独立集团同化掉，不是继续成为具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而是成为“觉醒的”群体。

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所形成的造反的民族主义拒绝统治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可是，却分享了统治民族的价值和企望或获得统治民族的财富和机遇。这种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同情况下，导致民族同化的动因。民族主义和同化作用在经济和心理意义上是相互矛盾的。追求相同的财富和声望的方法并不相同：民族同化是通过分享来达到的，而民族对抗则是由权力来获得的。

在一个收入和生活水平急剧分化的世界里，民族主义的强度和要求也许与区域和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成反比，与阻止文化同化和经济与声望在阶级、文化和地区间的差异程度成正比。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国家的成长都有某种半自动特点。因为稀有回报由于经济和历史的过程其分布是不等的；人们已知道企求同等的回报；由于他们未能被主体集团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由于他们成功地被其他具有更适应于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习俗的人所同化；由于这些过程的进行，适宜于民族主义成长的环境也就出现了。

（六）自利思想和自觉经验

一个国家的思想是和一个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的。城邦和君主国的非国家的或原始国家的机构包含着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所有这些国家的，或城市的利益也包含着个人的利益。个人利益本身只有在历史的某种发展过程中才能逐渐获得其现实意义。即使今天，不同的地区和文明给予个人利益以不同的意义，在未来也许会失去其目前的意义。

实际上，利益也许是反映一种情况，人在竞争的情况下，使彼此相互对立，其中某些人能够改善或维持其地位，而另些人则必有所失。“利益”这个词表示改善或维持其个人地位的总机遇超过其对手。这种竞争就如比赛是难以预测的。

市场和权力的竞争类似竞赛，它对部分参与者的某种行为有利，并教给他们某类习俗和价值。例如，像西方现代文明那样，高度竞争的文化常常赋予某些具有进取和竞争行为的人以高的权力和声望，而其他文化有时却对此持怀疑态度。

但是也有另一种现象。例如，自由市场和不受干涉的工业主义的竞争，虽然在西方社会进行得十分顺利，但是在工业革命以来，经过若干世代，这种竞争性的经济制度已使人们产生一种对竞争和不安全的心理反感。竞争性

的机构不知不觉地给人们带来一种非竞争的，甚至反竞争愿望与行为。结果，这种机构的运行在这种思想状态下难以继续，因而自由的私人企业又为各种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机构所取代。

这种似乎是矛盾的现象，也许表明的是同一现实的两面。当人们离开村子和民间文化的安全，转向流动，进入不确定的城镇和市场，参与为改善生活、政治、福利等条件而竞争，他们发现进取和自强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机遇与回报；可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可能开始感到孤独，失去了生活中的和谐和意义，并把他们带入新的生活方式。

国家主义是一种对机遇和不安全、孤独和权力这种双重挑战的特殊反应。人们迟早会发现，在政治和经济竞争中通过联合可以获得更大利益。为了使联合更牢固，就要向个人或集团在竞争中提供最大的资产和最小的债务。为了使大多数有前途的竞争集团形成最巩固的联合，似乎需要实行正确的长期战略。依靠这种战略形成牢固联合的集团绝不能随心所欲，在政治和经济上，这种牢固联合很大程度上取决社会交往、文化形态、参与者的性格特点、交往习俗。他们成功的机会则依赖于民族、民族性方面的联系。

民族或国家方面的组织绝不是竞赛中唯一的结盟形式。在一切可能的组织形式中，民族或国家的结盟往往是把最大的力量与对竞争性社会的最大的适应能力结合起来。只要竞争性机构继续流行，国家主义就能比许多竞争型组织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上更有效。国家主义的潜在回报的增长与其民族成员可能获得潜在财富和权力成正比。要发展一个地域和一群民众的经济、意识和军事力量，就只有在更广泛、更彻底的基础上，把广大群众组织成一个更紧密交往和互补的网络。

在传统社会背景下，迅速变化的社会动员时代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它也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日益增加自我怀疑和自觉。出现的问题有：我是谁？我像谁？我能信赖谁？在人们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他需要自问，盘问其记忆、偏爱、习俗、特殊印象。由于旧的文化、宗教、信仰和礼仪都已成了问题，自我探索必然导致回到儿童时代的回忆，因此，可以获得许多经验。在某种意义上，由此就形成个人的特点和个性。在人们寻求自身时，就可能发现其民族性。

自我怀疑和自我探索阶段，可能以转向新的宗教、思想意识而结束，也许形成一种新的语言和传统。例如，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的出现就是个例子。其自觉地同化到一个新的民族性中的现象，也可以在向海外移民中看到此类例子。还有，在其原来的土地上却选择与接受另一种语言与传统，例如，印第安人转说西班牙语，接受对秘鲁或墨西哥国家的忠诚。总之，自我怀疑阶段和自我评价阶段之后紧接着的是决心阶段，有意识地与一集团联系在一起。随着与原来的宗教或地位上的联系减弱，可能按照语言和交往习俗而重新划分其原来集团。

（七）从集团意识到民族国家

个人对其语言和民族的意识，即使社会环境使这种意识更为增强，但仍属于个人的心理方面。而集团的意识却属于社会机构方面。某些第二象征从属于集团生活的某些方面，并且由一个组织或机构一再进行宣传 and 传播，其目的往往与民族性无关，甚至与其相反。过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机构可能发生变化或消失，这种象征的有组织宣传可能停止。这时，该象征已经形象化，其传播已证明是不可逆转的。记忆的作用已开始发挥作用，使其重现，只要

该民族的基础继续存在，社会动员和交往就会继续将其成员联合在一起，国家意识就会在那里存在。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在个人日常的生活经历中，如人们的个人事业、语言、交往、思想、经验等已为更广泛的象征和国民意识提供基础时，一个更广泛的超民族的忠诚才可能取代民族意识。

如果有了这些条件，集团意识的象征和机构就会十分自然的产生。社会动员过程，不管其原来的目的，它会将现有的象征和机构改变成促进集团意识的组织。因而，有时一个超国家的教会也会推动国家主义的发展。

由于战争、继承和婚姻而使领土合并，产生的王朝统治的偶发事件，可能带来类似的国家主义效果，但是，这些国家主义效果本身绝不是偶然的。在欧洲，几乎每片领土都在某个时期与其相邻的国家有过合并，但是，只有某些合并带来或激起其对民族的忠诚和印象。那些在事实上或感情上得到支持的合并，也正是那些在社会动员和整合过程中由于其他要素作用而增强的合并。于是，这种合并本身由于增添了政治记忆、象征、苦难和历史合法性反而加强这一过程。

在过去的某些帝国或王国中，早先的行政区同样具有长期效应，后来的行政领导人大多对过去与行政区相适应的人口聚集、交通路线等都给予特别注意。可是，也有许多老行政区的消失并未引起与其相关居民间与民族方面的问题。

如果为国家的觉醒而赋予了其他条件，则即使受到损害的象征也可能起着组织的功能作用。这些象征影响可以增强的地方就会出现现代经济生活机构和现代国家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需要与大量的农民、工匠、纳税者有比过去更多的交往。

一旦集团意识过程开始，也就出现了慎重的先驱者和国家觉醒的领导人。在象征方面、国歌、国旗和向国旗敬礼的出现，通过非正式集团压力和由大众媒介及国家的强制权力、公民义务教育系统进行的教育而给民众及儿童以深刻印象。

（八）政治的强制

政治强制过程怎么完成？其目的是什么？当一个国家建立时，当国家由于强制权力充分实施而得以加强时，它必须完成四件事。

第一，一个比较大的人类社区出现时，社区就能使彼此进行有效的交往，控制着足够的经济资源来维持这个大的社区，并把互相交往的能力传给其后代。换句话说，就是有了一个大的、综合性的、非常稳定的人的交往网络，并使其渠道能够维持和发展。

第二，对经济资源有了较多的积累，对人力有了足够的社会动员，为了使其过程能存在和继续下去，对社会劳动应采取必要的分工。

第三，对记忆与符号和对个人与社会的设施有一种社会积累和整合，目的是使以上事物和现象的保存、传送、重组能符合其人力与物力资源的动员和整合的水平。

第四，至少，对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定向，重新分配或形成新的组合力有某些发展，对知识、习俗或思想的符号和项目，即学习能力有某些发展。学习能力的某些发展储存在人的头脑中，是不可见的；那些流行于人群中的文化习俗和形象却是可见的；还有些是体现在有形的设施和特殊的制度中。总之，所有这些就构成该社区能够生产和接受新知识或新目的的能力与采取相应措施的能力。

根据这四点，十分明显，国家代表一个比过去封建的部族的地方主义要有效得多的组织。就这点，在不同国家之间可能有很大差别。在各个国家，为模仿已建立的制度，经济实践和强制方法上的社会模式，在本质上全都与那里当前流行的文化传统与主体社会阶级有紧密联系。不论是企业阶级，还是农民或工薪阶层，对资源的积累，对那些使用效率高和有生气的新事物，更易接受的不仅依赖于各阶层所流行的观点，而且（有时在紧要关头）还依赖于某国内某阶级所接受的某种文化目标和传统。可是印象仍然是，即使最差的领导的国家都比先前任何民族的或社会的组织形态具有较多的人口，较大量的社会交往设施，经济资源和社会学习能力。

这过程的目的何在？国家的价值在于它是社会前进的工具。在一个生活水平存在极大差异的世界上，人们多利用国家作为提高自己与其相邻国家相比的生活水平的一个工具。这一过程的内在倾向在现在最成功的国家形成类似蘑菇云的社会结构。蘑菇杆是由该国最贫穷的和中下层之间的“国民团结”所形成。不论在城镇还是乡间，最贫穷的人数相对来说是不多的，社会对其成员提供“垂直提升”的机会，比其他不太成功的国家要多。而对中上层来说，则成为蘑菇的顶盘，他们比其他国家相应的阶层来说，则更多地向着水平方向分散，进入更优越的地位，控制新的领土、新的人口或重要资源。这种过程使中上层建立起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的统治地位，而不是建立与其他人“分享”的关系。至今，一个永恒的过程是，使一个国家暂时获得位于邻国顶盘上的相同过程，随后这个过程就会提高其他国家的地位，以削弱或破坏以前居于邻国顶盘上的国家。

综上所述，初看起来，似乎国家的兴衰全部过程是循环的，仔细观察，情况并不如此。根据所调查的事件和过程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暂时的推论。

K.德茨最后认为，许多国家主义者关于国家是人类社会组织的天然的和普遍的形式观点是不正确的。另外许多富有思想和著名的观察家另一种相对立的观点——认为国家只是现代时期与西方文明的产物——也值得怀疑。他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国家道路上比其他文明走的道路要远一点。西方文明不仅把其国家文明带给其他国家，并且也从其他国家吸取许多重要的文明成果。也许西方的特点不仅在于它能够创新，而且也在于它能革新，即积极向其他国家学习。在现实意义上，西方文明包含有其他文明的一些传统，在世界上，它的危机也是所有文明的危机。

目前普遍的现象是，近 50 年来，各国在人口、总的经济生产、国家意识方面都有很大增长，这种持续增长是得力于近 50 年来科学和技术的扩散所提供的新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一过程在进一步发展，在每个民族中，各个阶层都已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被动员起来。凡是在社会动员取得进展的地方，从先前继承下来的权威和特权就会被削弱。今天，已出现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家发展时期。

第七章 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在新航路发现之前，全世界除较近的地区外，不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居民，彼此往来与交流是很少的，甚至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更谈不上往来与交流。因此，从政治地理学来说，那时国家间的空间关系只能是有限的、地域性的。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欧、亚之间，由于相距遥远、水陆交通又很不发达，不是越过千山万岭，就是远隔重洋，彼此的交流也只限于供统治阶级与上层社会人物所享受的贵重奢侈品与奇珍异宝，谈不上政治联系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了解是很少的，即使有也是带有“天方夜谭”式的神秘色彩的。

对美洲、澳大利亚，那时还根本不知道其存在。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也只是从商人、游客中了解到的只字片言，往往夹有荒诞无稽之说。甚至怀疑，人是否能经受致命的日光和翻腾的海水。可是，西欧当时对黄金与香料等的需求，驱使其突破阿拉伯人对东西商路与贸易的垄断，开辟新航路。哥伦布远航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达到印度的卡利卡特，麦哲伦航行世界一周，使人类开始真正认识地球与世界，并使人类在世界各地可以相互交往，接着把世界纳入全球的政治地理范围，开始形成全球的政治地理联系与全球的政治空间体系。这也是政治地理学的划时代的开始。

一、西方扩展的背景与条件

在欧洲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到达新大陆之前，阿拉伯人已牢牢地控制着欧、亚、非之间的水、陆运输与贸易。那时，中国明朝的郑和却早已率领庞大的船队，奉命七次出洋，遍访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的亚、非一些国家。但是，阿拉伯人与中国人并没有以其优越条件与有利地位进入世界，继续前进，反而被欧洲取代，最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位，这一点值得分析。

西欧，在15世纪时，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原来，欧洲的农业耕作制度采用二圃制，即耕地一半耕种，一半休闲，以保养地力，并且每年相互轮换。从8世纪开始改为三圃制，即每年1/3耕地实行休闲。这样，由于耕种的面积增加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其次，从12世纪开始，对低地，特别是沿河两岸及河流下游的沼泽进行排水，垦为农田。同时，又清除低矮森林，焚烧灌丛，使耕地面积有较大增长。另外，改进马的挽具，使用马掌，带有锋利铁尖的重轮铧犁的发明大大改进了耕作效率，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从16世纪开始，西欧的生产力由于科学上的许多发明和发现而获得空前发展。在15世纪末，纺线和卷线合二为一的自动纺车代替了手摇纺车；卧式织布机代替了立式织布机；漂洗呢绒用水轮带动的重木槌代替了人工搓洗。这些使纺织业在西欧兴起。采矿业中使用畜力或水力推动抽水机，提运矿石绞车。冶金业中使用水轮或风力的风箱，提高了炉温，改进了熔炼质量。结果，使金属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农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带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生产的发展就推动了商品交换，加上人口的增加，大批城市随之兴起，于是整个经济就活跃起来。城市的兴起，居住于城市中的市民阶层也随之强大起来，以封建庄园为基础的领主与贵族地位下降。市民阶层与国王联合向封建割据的贵族进攻，开始建立权力集中、国家统一的民族君主国。

正是这种由技术推动生产，由生产推动商品交换，由商品交换带动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发展，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兴起导致国家与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环环的连锁反应最终引起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反过来不仅进一步促进和巩

固新的发展，而且还促进商业经济活动向外扩散。这也就是西欧国家发现新航路、发展贸易、实行殖民主义的背景与条件。

位于亚、非两洲接壤及东、西贸易转折点的西亚地区，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尽管当时曾控制住东、西方的交通，垄断亚、欧两洲间的贸易，但是，在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社会经济状况停滞不前，结果，他们逐渐失去其在东、西方之间交通与贸易上的优越地位，反而由于其政治上的腐败，终于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地位。

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虽然郑和的船队已达到非洲的东岸，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欧，可是，这时的船队航行并不是为经济和贸易，只是作政治上表现中华威望的手段，结果，这种庞大船队远洋的航行，带回的只是些奇珍异宝，不但未能增加财富，反而耗费巨额的财富。由于中国社会本身缺乏发展对外联系、对外贸易的机制与动力，所以，最后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其结局也像西亚情况一样，在西方打开其大门之后，也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

二、西欧国家的早期殖民统治

（一）新航路的发现

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于公元 8 世纪在其控制整个北非以后，就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建立其在该地的统治。于是，从 9 世纪开始，居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就与阿拉伯人展开斗争。这里也是阿拉伯人与欧洲人、伊斯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欧洲展开的斗争的地方。这种斗争一直进行到 15 世纪末，经历了 7 个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把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赶出半岛，并建立自己的国家。这种长期的斗争形成了信奉天主教的伊比利亚人与伊斯兰教思想上的对立，使其成为推动伊比利亚人向外扩张的思想根源。

另一方面，欧洲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对东方的贵重商品的需求，特别是热带的香料、中国的丝绸成为上层社会的生活必需品。由于运输困难、中间商的垄断，价格昂贵，遂形成西欧与东方的贸易的大量入超。这种贸易逆差只有以黄金来支付。而此时，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对货币的需求。因此，黄金既是制造货币的原料，又是平衡贸易的手段。这样，当时欧洲流行东方“遍地黄金，香料盈野”之说就成为西欧开辟航路的重要推动力。

在科学技术方面，这时，中国的罗盘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地圆学说在欧洲日益流行，已有地图把中国和印度画在大西洋对岸，表明向西航行即可达到东方。

1. 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在探寻通向东方航路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的。葡萄牙在驱逐摩尔人于其国土（1249 年）早于西班牙（1492 年）。由于葡萄牙位于大西洋岸、地中海与西北欧往来海运的中间，加上其先后占领休达（位于直布罗陀对岸，1415 年）、马德拉群岛（1419 年）、亚速尔群岛（1432 年）、布朗角（位于西撒哈拉西南部，1434 年达到）、佛得角（1445 年）。葡萄牙人于 1444 年成立“皇家非洲公司”，垄断了对西非的贸易，特别是掳掠黑人作奴隶的贸易，大获其利。这就大大刺激其设法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发展与东方贸易的欲望。

在国王的支持与组织下，葡萄牙的远征队于 1471 年越过赤道，1483 年

越过刚果河口，1487年由巴托罗缪·迪亚士所率领的远征队终于达到好望角。在西班牙支持的哥伦布船队于1493年返回欧洲，并把发现新大陆消息传来，就更加促进葡萄牙人加速进入印度洋的行动计划。

由于葡萄牙国王已派人（1487年）冒充穆斯林，随阿拉伯商船经红海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又由印度到东非的索法拉（在莫桑比克），于1491年回开罗后，便把印度洋上的航线情况以及非洲南端有条联系印度洋和大西洋航路的信息转报回去。这就给达·伽马后来实现其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达到印度的航路的开辟打下基础。

达·伽马的远征队在国王支持下，有4只船和170人组成，于1497年7月8日离里斯本。船队11月12日绕过好望角，经莫桑比克及肯尼亚的蒙巴萨，在肯尼亚的马林迪由阿拉伯领航员指导渡过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港口卡利卡特。该船队于8月返航，到1499年7月至8月回到葡萄牙，尽管此时只剩下两只船和44个人，但是，其运回的香料获利竟达其航行成本的60倍。

2.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哥伦布受当时的一些地理书籍的影响，他坚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最终会达到东方。关键是向西航行多远才能到达东方。他根据当时的一种说法，从里斯本往东到中国杭州约10000km，向西经大西洋到东方的日本只有约4800km，日本到亚洲大陆为2400km，即到亚洲不过7200km（其实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到上海相距228个经度，约为22400km，少估了约15200km）。他原先求助于葡萄牙，希望获得支持其向西航行。但葡萄牙人掌握的知识正确估计出其计算的错误，认为向西航行路更远，往东的路还是绕道非洲最近，而不是横渡大西洋，未予支持。哥伦布只好转而求助于西班牙。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鉴于葡萄牙在海上贸易上的成就，急于直追，就支持了哥伦布的设想。

1492年8月3日，有3只船和90个水手组成的远征队就出发了。经过70天的航行，于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接着又发现了古巴和海地。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的第一次远征队返回到西班牙。

在1493年、1496年和1502年，哥伦布又三次组队去寻找他所追求的东方各国，虽然发现了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诸岛和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巴拿马，以及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的沿海地区，他认为这里就是其所发现的印度。可是，直到他于1506年死去还不知道其所到达的地方是人所不知的新大陆。

后来，意大利人亚美利哥·韦斯普奇于1501—1502年为葡萄牙人远航到巴西。经过调查，肯定这一地区不是印度而是一个新的大陆。从1507年起，人们遂称这个新的大陆为“亚美利加”洲。

3.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经亚美利哥·韦斯普奇证实不是亚洲，虽然没有实现西班牙人在与葡萄牙人竞争中发现东方的香料产地的愿望，但却引起西方一股探险热。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曾提出绕过南美洲南端可以达到“香料群岛”的想法。1513年，巴尔沃亚探险队翻过巴拿马地峡发现了太平洋。正是这种情况，西班牙人为了防止自己在与葡萄牙人争夺香料战中彻底失败，就支持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探险活动。

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率领5只船、265名船员，由塞维利亚的圣卢卡尔港出发，船队越过大西洋，沿南美洲海岸南下，在南美洲南端穿过风急浪高的麦哲伦海峡。在太平洋上航行了3个多月始到关

岛，于 1521 年 3 月 16 日到菲律宾。麦哲伦由于参与岛上内讧，在 4 月 27 日战斗中死亡。后来，船在摩鹿加群岛（现称马鲁古群岛）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剩下的两只船中，仅一只船装满香料返航。通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剩下的“维多利亚”号船与幸存的 18 个船员于 1522 年 9 月 6 日返回其出发港——圣卢卡尔港。三年的艰难航行西班牙人终于从向西航行寻找到东方的香料产地，更重要的是证实了地球真正是个圆球，向东、向西航行均可以殊途同归，使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地方从此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的时代。

在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其以后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葡萄牙是找到绕过好望角的新航路，因而垄断了西欧与东方的贸易。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尽管未找到到东方香料产地的航路，却获得大片新的领土。结果，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自发展。早在葡萄牙沿西非海岸南下寻找去东方通道时，教皇于 1494 年就下过训令，授权葡萄牙人占有他们在沿非洲海岸向印度进行时所发现的一些地区。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未弄清其情况时，西班牙国王就担心葡萄牙人插手其间，分享其利益，遂请求教皇承认西班牙对该地的专有权。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 1493 年 5 月 4 日（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于 3 月 15 日回到西班牙后的不到一个半月）经调解确定在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 100 里格（按罗马制，相当 5.5km）地方，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线东、西分别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该线称“教皇子午线”。后来，葡萄牙对此表示不满，经谈判，于 1494 年 6 月 7 日西、葡两国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该线向西移（约在西经 46°）。正是根据此条约，巴西后来曾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该条约只划了西半球，但西班牙声称该条约的分界线是环绕全球的，希望麦哲伦去开辟向西通往亚洲航道时，找到位于分界线西班牙一边的香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以分享葡萄牙人的利益。当麦哲伦抵达摩鹿加群岛以后，西、葡又发生争执，遂于 1529 年签订《萨拉戈萨条约》，以该群岛以东 17° 为分界线。虽然菲律宾在该线以西，但西班牙于 1571 年征服其地。这样划分势力范围原是西、葡两国的事务，但是，其对世界各地以后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二）葡萄牙的殖民活动

在达·伽马发现新航路后，为了垄断东西方贸易，独享其利，葡萄牙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葡萄牙人在其航行路线上，建立了一系列据点。葡萄牙人在沿非洲西岸南下时，就在其沿岸地方建立一些商站作为据点。在好望角以东的印度洋的沿岸也根据其在非洲西海岸的经验，建立许多据点。这些据点多是港口与岛屿。其中包括非洲东岸的索法拉、莫桑比克、桑给巴尔、蒙巴萨、摩加迪沙；西亚的索科特拉岛、马斯喀特、霍尔木兹海峡，在南亚，有印度的第乌、达曼、果阿、卡利卡特（现称科泽科德）、柯钦，另外还有锡兰（现称斯里兰卡）；在东南亚，有马六甲及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群岛的局部地区和中国的澳门。为了管理这些据点，在果阿设立总督府，并下设莫桑比克、马斯喀特、霍尔木兹、科伦坡与马六甲 5 个省督。

其次，利用其船只与武器打击阿拉伯等船只的海上贸易。此时，欧洲在造船、航海设备、海军装备方面有明显改进。欧洲原来载重量为 150~200t 的狭长体帆船让位于 600~800t 的圆体帆船。葡萄牙人还改进了阿拉伯人的

三角帆索具，使船能在逆风中航行。这样，船的规模大、速度快、操作灵活。船的航行靠帆，而不用众多的划手，不仅节约人力，而且可以减少口粮等储备，增加了载货量。

中国罗盘的引进，星盘与象限仪的使用，精确航海图的出现都有利于远洋的航行。原来海上战斗依靠攻入敌船在甲板上的肉搏及小型炮火。由于炮小，不能击毁船体，只能起配合作用。这时，炮大、弹重、爆炸力强，能击毁 270m 射程内的船体，造成船毁人亡。因此，炮战遂取代甲板上的战斗。正是利用这种优势，葡萄牙人烧杀抢掠印度洋上的非葡萄牙人的船只，攻占战略要地，击败土耳其、阿拉伯和印度联合舰队的进攻，成为印度洋上的霸主。

第三，葡萄牙人利用印度洋沿岸各地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与软弱，采取武力、欺骗以及笼络等手段，取得一些地方的统治权与贸易特权。他们利用这些权力对其所管辖地区通过征收捐税来收集当地土特产，强迫当地居民种植其贸易所需的香料等物品，建立垄断性的市场，低价收购其所需的商品。同时，又采取各种办法及高额税收等来阻挠、排挤非葡萄牙的商人。

葡萄牙人在东方航线上的贸易可以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是非洲沿岸，特别是西非沿岸、用简单的商品换取非洲人的黄金和奴隶。第二类是印度洋及东南亚，特别是印度与马六甲以东诸岛，主要是获取香料。由于葡萄牙人的垄断地位，使威尼斯商人在亚历山大港的收购香料量陡减 2/3，而在里斯本的市场出售量则占整个香料贸易量的 2/3。由于葡萄牙的商品在印度与东南亚市场上相比之下，是质次价高，香料贸易不得不用黄金等贵金属与之交换。恰好这时，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活动中掠夺了这些贵金属，补充了香料贸易中的赤字。第三类是马六甲以东地区的贸易。这里贸易特点不是以东、西方的贸易为主，而是中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区之间的相互贸易。葡萄牙人在这里起着贸易中间人的角色。为此，葡萄牙人不仅占有中国的澳门，还在日本的九州设立了商站。

除了在西非的殖民活动，葡萄牙还根据《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在南美洲的巴西开展殖民活动。巴西的情况与亚、非的条件有很大不同。亚、非人口比较密集，文化发展程度相对比较高，政治组织发展比较完善，葡萄牙只能采取武力与欺诈等手段，建立其不同的统治与管理制，利用收税、垄断、交换等方式来榨取财富，收集东西方贸易所需要的物资。为了其统治、管理与贸易的需要，只在少数据点进行少量的移民。但巴西当时尚处于原始公社阶段，在热带雨林及稀树干草原地区开发程度甚低，人口稀少。葡萄牙殖民者不得不靠移民及建立直接统治。从 1530 年，葡萄牙人建立居留地，将土地分给从葡萄牙来的人们作为世袭领地，实行封建统治。为了掠夺当地财富，殖民者强迫捕捉来的印第安人从事采矿等繁重的奴隶劳役。由于奴隶大批死亡与逃入丛林，劳力不足，又运入非洲黑人作为奴隶进行采矿与种植劳动，遂使该地黑人成分大增。

（三）西班牙的殖民活动

哥伦布抵达了西印度洋群岛后，西班牙就开始了在那里的殖民活动。开始来的都是些形形色色的掠夺财富之徒，很快他们就占据了加勒比海上的大小岛屿。在这些岛上并没有发现他们原先设想的大批香料，便转而向印第安人进攻，掠夺他们的财富，榨取他们的黄金，猎取他们作奴隶。在遭到印第安人的反抗后，就进行疯狂的屠杀。这是 16 世纪 20 年代以前对西印度洋群岛进行的殖民活动，属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殖民活动以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为主。这里是美洲的古文明的地区之一，即当时是阿兹特克人的住地。

当西班牙了解到墨西哥高原上有个印第安人集中地区，在那里可以掠夺到大量黄金的信息时，埃尔南·科尔特斯就组织了 500 多人的队伍、几门炮与 16 匹马，于 1519 年 2 月由古巴出发，4 月在韦拉克鲁斯登陆。他利用印第安人一些部落与阿兹特克人的不和，采取威胁、利诱、贿赂等手段组成一支反阿兹特克人的联合大军，向其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出发。阿兹特克人首领蒙特苏马由于迷信，未予抵抗，反而把西班牙人迎入城中。科尔特斯囚禁了蒙特苏马要挟阿兹特克人，但遭到当地人进攻与包围。科尔特斯突围后于 1521 年再次进攻特诺奇蒂特兰，并屠杀大批居民。西班牙遂在该地建立殖民统治。

第三阶段是西班牙对南美洲古印加帝国的侵占。为了掠夺南美的财富，皮萨罗于 1531 年率领 180 名士兵和 50 匹马从巴拿马出发到秘鲁登陆。皮萨罗利用两王子争夺王位之机，突然扣留新国王，勒索巨额的金银后将其处死。然后，皮萨罗趁其全国混乱之机控制其全国。后来，西班牙人经过多年的镇压活动，直到 1549 年才在南美建立除巴西以外的全部地区的殖民统治。

西班牙人为巩固其殖民统治，于 1535 年在墨西哥城建立包括从墨西哥到巴拿马以北，及加勒比海诸岛在内的新西班牙总督区。在巴拿马以南的南美洲，于 1542 年在利马建立管辖南美洲的西班牙人殖民地的秘鲁总督区。于是，西班牙就成为当时最大的殖民帝国。

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掠夺印第安人的财富，西班牙当局遂把其侵占的土地分给贵族与殖民者使用，并给予他们以征税、开矿及奴役印第安人的特权。西班牙贵族和殖民者获得大片土地后，建立大庄园，使印第安人沦为农奴与奴隶在自己的庄园中劳动。

最使殖民者感兴趣的是对矿山的开采和冶炼金银。因为贵金属体积小、价值高、便于运输，这对当时尚未进入工业社会，对原料缺乏需求而对财富则十分贪婪的封建贵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可以用其在市场上换得所需求的各种消费品。同时，也是为了平衡与东方贸易的入超。可是，为了掠夺这种贵重的黄金、白银、大批印第安人被驱赶到矿山、深井。加上在庄园的残酷劳动以及欧洲人带来的痢疾、疟疾、钩虫病和天花（当地人对此类疾病缺乏抵抗力），使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有人估计，在 16 世纪，印第安人留下的不到 1/4。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的诸岛上，所剩无几。相反的是，拉丁美洲从 1503 年至 1660 年，运往西班牙的仅注册黄金就有 200t，注册白银有 18600t。正是这种人口的下降遂导致从非洲运进大批黑人作为奴隶。特别是后来种植园经济发展，种植甘蔗、棉花、烟草、蓝靛等经济作物，以满足欧洲市场需求而形成奴隶贸易的高涨。

从上可以看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亚、非、拉的殖民活动情况并不相同。在拉丁美洲，由于那里处于原始社会后期，分为许多部落和部落集团。其中比较先进的印加与阿兹特克人亦刚进入奴隶社会不久。对金属的使用仅限于铜，而铁器的制作尚未开始。人口密度低、组织程度不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活动遂采取全面的直接统治的形式。大量移民成为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统治者，而当地的印第安人则成为被统治者，沦为农奴或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由于殖民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屠杀和疾病，人口大量减少。由于劳动力不足又引入了黑人作为奴隶。因此，在拉丁美洲人口中，原来的

土著人，并不占绝对优势，形成白人、黑人与印第安人三种人组成的社会。

在亚洲，当地人口多，文化水平较高，社会组织程度高，殖民者只能采取间接统治。当地人仍然是其社会的主体。在非洲，海岸地区不是热带雨林，就是干旱沙漠，除沿河流外很难进入，加上白人难以适应其气候及传染病，白人只在其沿海地区建立据点，而广大地区仍然维持非洲人原来的社会与文化传统。

（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衰落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 16 世纪两个殖民大国。一个掠夺了拉丁美洲的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另一个则垄断了东方的贸易，大发横财。但是，好景不长，它们在 16 世纪后半期开始走向衰落，最后被荷兰和法、英所取代。

当时西班牙王国是由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联姻，于 1479 年合并统一了西班牙。斐迪南与伊莎贝拉死后无子，王位由其嫁给哈布斯堡王室腓力为妻的女儿胡安娜所生的查理继承西班牙联合王国的王位。查理于 1516 年除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世袭领地——奥地利、施蒂里西、卡林西亚、卡尼奥卡四个公国（后三个公国位于奥地利东南，现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一带）和蒂罗尔州（意大利的东北），西班牙联合王国的领地（包括西班牙、撒丁、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半岛南部的那不勒斯）与拉丁美洲西班牙的殖民地外，还继承了其祖母勃艮第玛丽的勃艮第领地（包括位于法国东部的弗朗什孔泰、卢森堡、尼德兰）。查理还于 1519 年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样，查理就成了欧洲自查理曼帝国以来拥有领土最大的国王，特别是这些领土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法国。当然，这就会招致欧洲其他王朝的反对，特别是法国的反对。

法国为反对查理不顾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立而与奥斯曼帝国结盟。因此，查理与法国争夺欧洲霸权，在意大利发动四次战争，与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及维也纳东南多次发生战争。最后，查理在镇压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运动中失败，不得不于 1556 年将西班牙王位让于其子腓力二世，将神圣罗马帝国让位于其弟斐迪南一世。

腓力二世的即位后继承其与法国、与新教进行斗争。在与法国的关系上，腓力继续与其争夺意大利。在新教问题上，由于尼德兰接受了新教，腓力试图强迫那里的居民放弃新教接受旧教而发生冲突。加上，当时西班牙在欧洲进行战争急需财源，就不得不向尼德兰加重税收。尼德兰在税收上和宗教上受到了西班牙的双重压迫，遂于 1566 年爆发了起义。到 1581 年，尼德兰北部各省正式成立联省共和国，与西班牙展开新的斗争。经过艰苦斗争，于 1609 年迫使西班牙在休战协定上签字，事实上承认了联省共和国即荷兰共和国的独立。

在西班牙镇压尼德兰的起义活动中，尼德兰特别得到英国的支持。这不仅是由于英国也信奉新教而出于宗教上的考虑。更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英国很清楚，只有利用尼德兰的起义才可以牵制西班牙与葡萄牙（葡萄牙于 1580 年被西班牙征服，1668 年始重新独立）和削弱它们，也才能为英国找到发展的机会。而西班牙当时对英国在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走私贸易，抢劫其运送金银的船队，袭击其据点，支持尼德兰起义十分不满。为此，西班牙于 1588 年 5 月以大批船只组成的无敌舰队远征英国，企图击败英国，维持其海上霸权。结果，则事与愿违，西班牙大败，反而加速其衰落。

除去上述西班牙在欧洲争霸中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失败促使其衰落以

外，还有内部的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原因。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兴起时，欧洲的经济中心已从地中海北部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向西北欧转移。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中心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长期与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斗争，并在政治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经济并不发达，产品除原料外，在欧洲市场上并不占重要地位。这点在与其殖民地贸易中拿不出质量高、价格便宜、能吸引人的商品与其交换得到证明。

这种处于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不利地位，恰好由于发现了美洲，在有了金、银矿，可以驱使印第安人进行开采，用其所掠夺的贵金属平衡其与东方的贸易。另一方面，由于美洲运来大量的金、银，使贵族大发横财，必然刺激其消费热。这样就造成当地的消费品的价格飞涨，结果使原来质次价高的手工产品价格更高，更缺乏在欧洲市场的竞争力，反而导致其商品生产的衰落。

发了横财的贵族、富裕了的市民提高了的购买力，在市场上反而有利于当时经济发达、商品生产十分繁荣的西北欧的中心地区。它们的商品便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市场上流行以满足其需求。这说明西班牙与葡萄牙由于地理优势，掌握航海技术和宗教动力发展起来的海外殖民活动，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乏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

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的社会情况，在其变化中也有一定影响。在驱逐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之后产生的宗教狂热，把信仰犹太教的大批犹太商人也赶出了伊比利亚，这就更加不利于该地的商业发展。另外，封建思想浓厚的贵族既看不起商业，又不愿从事工业，他们轻视劳动，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绅士身份。他们追求的是土地与荣誉，认为土地比商业和工业更重要，获得高贵的爵位可以提高身价。甚至富裕起来的商人为获得空头的爵位而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这种内在的社会风气、经济上的弱点加上长期的争霸战争，很快使其掠夺来的财富消耗殆尽，庞大的殖民帝国大厦最后在 16 世纪末的镇压尼德兰独立失败中垮了下去，不得不让位于与其斗争中兴起的荷兰。

（五）荷兰的兴衰

荷兰在地理上属于“尼德兰”。“尼德兰”意为“低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莱茵河、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下游，特别是在中世纪，由意大利北部翻越阿尔卑斯顺莱茵河而下，及由法国的罗讷河北上，经香槟大道往北是尼德兰，所以它长期以来就是南北贸易大道的北端。中世纪开始，这里的沼泽地得到开发，风车的应用，筑堤工程的开展，使该地成为欧洲农业最发达地区，也成为农业经济作物最集中地区。另外，其海岸位于欧洲从葡萄牙大西洋沿岸往东北，转向波罗的海，往北经北海到挪威沿海，又与英国隔狭窄的海峡相望的，面向大西洋的海洋交通的十字路口。因此，该地是背靠南北商道，面对海上十字路口，农业、手工业发达，人口密集，很自然成为商业贸易交通枢纽，经济发达地区。

中世纪时，该地是许多独立封建领主的领地。在 13、14 世纪时为勃艮第大公占领。1477 年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统治，1516 年又为哈布斯堡西班牙的西属尼德兰。在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内，相比之下，尼德兰面积很小，但当地工商业十分繁荣，多数居民都居住在大大小小城市里，那里是欧洲当时城市数量最多又最集中的地方。在税收上，占西班牙包括拉丁美洲殖民地及欧洲所占之地在内全国的一半，所以查理五世称尼德兰是其“王冠上的一粒珍珠”。

尼德兰问题及荷兰的独立原因有二。一是查理五世在多年频繁的外战

争中，不仅耗竭了从拉丁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而且弄得国库空虚，为筹措费用，就在尼德兰地区实行重税，结果使商业衰落、经济萧条，引起当地人民不满。其次，在欧洲中部，宗教革命发生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以卫道者身份进行镇压活动，但是其在与信仰新教的诸侯战争中失败，于 1555 年，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承认圣罗马帝国内新、旧两教信仰自由，同权平等原则，按“教随国定”，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决定本人及其居民宗教信仰的权力。可是，并不按此原则处理尼德兰地区内信仰新教问题，反而采取严厉镇压措施，甚至用杀头，活埋酷刑对待新教徒。在经济与宗教高压政策下，忍无可忍的群众遂于 1566 年爆发反对旧教、反对西班牙的群众起义。

虽然西班牙实行血腥镇压，但不能扭转局势，尼德兰的北方七省遂于 1573 年宣布独立。在经过 20 多年曲折斗争，特别是西班牙在无敌舰队于 1588 年彻底败于英国后，海上力量元气大伤，在内无财力支持、外无海军支持下，战场上屡被挫败，不得不于 1609 年缔结 12 年休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

西班牙的失败给荷兰在世界争夺殖民地、垄断东西方贸易提供了机遇。荷兰的优势首先表现在贸易上。那时荷兰已成欧洲的贸易中心。比斯开湾来的鲱鱼和盐，英国和弗兰德斯（即比利时北部）来的布匹，地中海地区来的酒，瑞典来的铜和铁，波罗的海地区来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以及荷兰提供的烟熏鱼和腌制鱼、纺织品和各种手工业工场提供的多种商品。这些商品都在这里进行交易，既有现货又有期货。即使东方与美洲的商品也是通过葡萄牙与西班牙转运到这里来销售，所以，某种程度上，这里成了国际性的贸易中心。

其次，该地也是欧洲的金融中心。由于大批商人在这里进行交易，当然集中了大量的资金。为了便利资金的流动，有利于商业活动，荷兰于 1609 年创办了阿姆斯特丹国家银行，它是欧洲第一个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银行，经营存、贷、汇及各种票据交易。到 18 世纪，荷兰的金融地位仍十分强大，它仍是英国的债权国，曾一度掌握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股票 1/3，英国国债的 40%。一度掌握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属东印度公司股票

第三，荷兰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船队。那时，它也是世界最大的造船基地。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条船。早在 1600 年，荷兰就拥有 1 万只船。按吨位占当时欧洲总吨位数的 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承担，有“海上马车夫”之称。

正是这三点优势使荷兰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在 16 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殖民帝国的地位。由于葡萄牙于 1580 年被西班牙所吞并，使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大为削弱。为了抢夺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地与贸易，荷兰于 1602 年成立荷属东印度公司。该公司除从荷兰政府那里获得在东方贸易垄断权外，还享有开战、讲和、建立殖民地和铸币等特权。虽然英国组织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比它早二年，但前者资本为后者的十几倍，使后者无法与前者争雄。

荷兰人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马六甲、锡兰等地赶走，在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建立大本营。另外，还占领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台湾，并在印度等地建立据点。其印度洋上航线是从好望角开始，经毛里求斯到印度转马六甲，再延伸就进入南中国海达到中国与日本。另一条则是由好望角直航巴达维亚。从好望角装好食物与必需品，沿南纬 40 度以北借顺风东驶而达巴

达维亚。这是一条捷径，而且从垄断香料群岛贸易及兼顾印度洋与太平洋西岸贸易来说，该区位要比印度优越。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的贸易垄断地位，还在东印度群岛一些地方开辟种植园，种植咖啡等作物，后来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

在非洲的西海岸，荷兰于 1595 年冲破葡海军封锁进入黄金海岸。后来，又利用军事力量打败葡军，强占其由塞内加尔到安哥拉一带的葡萄牙贩奴商站。在美洲，荷兰占有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在纽约的曼哈顿岛，1664 年被英国人占据改名纽约），西印度洋上的库拉索岛和巴西东北部的圭亚那及伯南布哥（伯南布哥后被葡收回）。由于葡失去西非贩奴商站影响巴西的种植园。荷兰组织的西印度公司的作用虽不如东印度公司，但在左右向美洲的贩奴活动、发展种植园和向欧洲运送蔗糖等方面却起着重要作用。

荷兰的这种在经济、贸易和商船方面的发展，受到英、法的挑战。英、法两国为了与荷兰竞争，都在国家支持下发展自己的船队。另外，在航运上通过歧视性法律，来照顾自己船队。如英国与其殖民地间商品运送规定要用英国船只，以降低荷兰船只在航运上的份额。

由于这种竞争及其他原因，荷兰于 17 世纪后半期先后与英、法之间进行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战争。在战争中，英、法利用荷兰船队回国必须经过英吉利海峡的机会掠夺其船上财物，并把船只作为战利品没收，使荷兰遭受巨大损失。上述原因导致荷兰的经济地位、军事势力的下降，失去其取代西班牙的而在贸易与殖民方面所获得的垄断地位。

荷兰的衰落与西班牙情况有所不同。西班牙的垄断地位建立在政治上，国内缺乏经济基础，一旦政治上的地位垮了，就一落千丈。荷兰在经济方面有较深厚基础，虽然失去其贸易与殖民上垄断地位，但仍有相当经济实力，而并不是“一蹶不振”。其以后的继续衰落则只是过于注意商业而忽视工业，加上其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遂逐渐落后。

（六）英、法的竞争与英国的胜利

导致荷兰在海外殖民及商业活动优势地位的衰落的外部原因就是与英、法的竞争及战争。在荷兰衰落以后，英、法就接着由共同对付荷兰转成相互间的竞争。其在殖民地上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东、西方，西方以北美洲为主，东方以印度为主。

在北美洲，在墨西哥及其以南已为西、葡两国占据，而且已有一定基础，英、法只有从墨西哥以北的北美大西洋沿岸开始。西班牙在墨西哥殖民时，那里是地广人稀有广大的沙漠与干旱地区相隔，又无金银矿藏，因而弃之不顾。英国于 1607 年在詹姆士城建立第一殖民据点，1620 年“五月花”号带来的清教徒在普利茅茨建立殖民地，然后将荷兰人从新阿姆斯特丹挤走，逐步在美国的东海岸从缅因到佐治亚建立 13 州殖民地。

而法国，则于 1604 年，从新斯科舍开始进行殖民，然后沿圣劳伦斯河谷建立魁北克、蒙特利尔据点，进入五大湖。从 1680 年开始进入密西西比河。实际上，以圣劳伦斯河、五大湖、密西西比河从北与西把美国的 13 州包围了起来。而 1668 年开始，英国又在五大湖的北面哈得孙湾建立毛皮贸易站，出现在法国人的背后。

当英国 13 州殖民活动开始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进入大湖南岸与密西西比河流域时，与法国进入俄亥俄以及东北新斯科舍接触时就发生直接冲突。从 1689—1763 年间，两国在北美发生四次战争。在 1713 年，法国的新斯科舍、

纽芬兰和哈得孙湾沿岸地区才转入英国手中。在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与英国在北美战场上，由于法国多年经营的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城被英军攻破，使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帝国彻底结束。法国不仅在北美大陆上的殖民地全部转到英国手中，在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如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多巴哥）亦转为英国殖民地。这些岛屿尽管很小，但在海运及蔗糖生产与贸易上却占有重要地位。

在亚洲，原来英国受荷兰排挤，退出东印度群岛，集中经营印度。那时印度是莫卧儿王朝时期，在沿海建立据点经营商业活动要经强大的莫卧儿王朝的同意。但从 17 世纪中期开始，莫卧儿王朝走向衰落终于瓦解，地方性政权纷纷出现。英国当时占有的据点有苏拉特、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法国占有的据点为加尔各答附近的昌德格尔、马德拉斯以南的本地治里、加里加尔等地。当印度衰落时，英、法各在其据点不仅修筑堡垒，招募军队铸造货币，而且拉拢、收买、培植地区政治集团，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控制。英、法遂在印度为争夺控制而展开斗争。虽然英、法间的斗争在印度互有胜负，但是，在 1761 年经围攻及切断与法国本地联系的本地治里投降，使法国在印度遭到彻底失败。1763 年在巴黎签订的条约只允许法国保留本地治里等据点作商业往来之用，禁止修建工事。印度从此即成为英国独占的殖民地。

在非洲，英国殖民活动是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今加纳），法国则在马达加斯加岛和塞内加尔河沿岸。这些殖民地多是从事经营黄金、象牙、蜂蜡和奴隶交易。相对而言，英、法在这里殖民活动的争夺不如北美与印度那样强烈，基本是在地域上维持原状。

在这场英、法竞争中，法国以失败告终。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情况相比，西班牙继续维持了在拉美的大片殖民地，葡萄牙和荷兰也分别占据了南美的巴西和东南亚的东印度群岛。可是，法国，除保留了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这个较大的岛外，只保留加勒比海上几个小岛与印度的几个据点。另一方面，英国在北美与印度获得大片殖民地与控制，为其以后成为殖民帝国，领土遍及全球打下基础。

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在经济上，英国在 17 世纪中期，工业有较快发展。如传统工业中的呢绒纺织业在输出品中占重要地位。作为工业发展动力的采煤业，其产量从 1550 年 $2 \times 10^5 \text{t}$ ，到 1700 年已达 $3 \times 10^6 \text{t}$ 。蒸汽机已在 18 世纪初期开始应用。在法国来说，在工业产品的数量方面虽和英国不相上下，但人口数量则为英国三倍多。按人口平均计，则英国的经济水平与实力超过法国。另外，在法国工业生产中还受到行会的很大约束，这点与英国不同。

由于经济实力差异，殖民地的发展也受到影 响。在北美，英、法殖民地既不产金银，又缺劳动力，要发展就要移民，要提供运输、工具、种子和装备。在这方面英国提供的支持多。法国则要投资庞大陆军与宫廷建设，对海外支持就相对小。在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上，也受经济因素影响，法国也落后于英国。

其次，在殖民地方面，如北美，英国国内农民受圈地影响，农民缺少出路；新教徒受歧视，自愿向国外转移。所以向北美 13 州移民数量急剧上升。例如，在 1688 年，大西洋沿岸英国移民已有 30 万，而法国人占的地区内移民仅有 2 万。这是因为法国是小农国家，土地肥沃，又未发生圈地，农民很少外迁。法国当时也不许新教徒外迁。这就造成北美英、法两国殖民人口数

量的差距。

第三是政治形势的影响。英国是个海洋国家，法国是个大陆国家。当时法国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要发展，不但在海上要与英国竞争，而且在陆地上还要与西欧国家竞争。法国北面有荷兰，南面是西班牙，东面是新崛起的普鲁士。荷兰属新教国家，而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荷兰奥兰治亲王到英国担任国王，使英荷政治接近，当然使原来支持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法国路易十四与英国的对立。另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中英、法为争夺西班牙发生冲突。因此，在政治上就形成荷、西与英国联合法国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英国还利用普鲁士力量制约法国。从1689—1763年，英、法参与的四次欧洲战争都波及到北美和印度等英、法殖民地之间的斗争，使殖民地的争夺与欧洲的战场联成一体。法国往往在欧洲战场上已被陆上国家所牵制，海上又受英国封锁，法国在殖民地的力量处于孤立无援境地。结果，就导致法国在与英国殖民地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还有，如1741—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英、法处于战争双方，尽管法国在印度与英国战争中占领了马德拉斯，但因法国在欧洲战场上失败，最后在印度的法军不得不将该城还给英国。

（七）美洲殖民统治的崩溃与独立国的出现

从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开始殖民活动以来，到1763年的七年战争结束为止，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历史有200多年。其参与殖民活动的国家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各国的殖民地的范围虽有变化，但是根据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属于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除原为英国殖民地13州以外，还包括原属法国殖民地的加拿大及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

第二类是墨西哥及其以南的地区，这里是分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第三类是加勒比海上的岛屿，它们分属于英、法、荷、西。

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由于原来印第安人很少，居民属于欧洲宗主国来的白人，以英、法两国移民为主。他们对待当地印第安人的政策是驱逐。只是后来在13州南部的种植园由于缺乏劳动力而引进黑人，所以这里的居民是白人与黑人，白人占绝对优势。

在白人移民中，以13州为例，除英国的地主贵族和特权商人外，也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小商贩、各阶层中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失去土地的农民、破产的手工业者。在农村除种植园使用黑人奴隶外，基本上是小农。城市中是自由的雇佣劳动。社会上以新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政治组织上，除英王任命的总督外，还有州的议会。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拉美殖民地中，由于印第安人数量较多，西、葡来的移民与印第安人通婚，居民形成白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三类。在社会地位上，白人是统治者，是中、上层官员；印第安人是被统治者，在庄园、矿山和种植园充当农奴；混血人则充当下级官员与管理人员。在种植园中的黑人则属于奴隶。官员多由宗主国任命，实行封建农奴制和奴隶制相结合的剥削制度，社会具有明显的封建性。

加勒比海诸岛上，这里是最初西班牙的殖民地。由于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甚至采取屠杀手段，所以人口大量减少。后来，因种植的热带作物如甘蔗等大获其利，为解决劳动力短缺，不得不引进大量黑人奴隶。这样，在人口的

结构中以黑人及黑人混血人占多数，而白人与印第安人则占少数。在经济上则是单一的种植园经济。

由于这三类地区，人口特征、经济、社会性质各不相同，对其以后的发展则产生明显差异。

1. 美国的独立：当时的 13 州是英国在海外的一个最大殖民地，其人口到 1775 年已达 275 万，等于英国人口的 1/3，是英国的人口最多的海外殖民地。13 州北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相当发达，造船业、冶铁业、捕鱼、酿酒都可与宗主国比美。当时，海上英国船的 1/3 是北美建造，13 州的熔铁炉已多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并向英国供应生铁。南部的小麦、棉花、烟草大量运往英国。这种情况，一方面由于英国对北美依赖加深，促使其加强经济控制；另一方面由于 13 州产品输出大增，迫切要求减轻限制以扩大出口。

在经济上，英国对殖民地有诸多限制，如货物必须由英国船运输，只准运往英国。欧洲国家运往北美 13 州货物要先运到英国，交纳税款后再转运到北美。这些限制当然引起 13 州人民不满。特别是七年战争中，军费花费过多，英国为减轻负担，在 13 州采取增税和重税办法，这就激起当地人民的对立情绪。加上欧洲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的影响更加促使 13 州人民走上独立道路。

1773 年，为反对茶叶税，波士顿人把从英国运来的茶叶倒入海中的“倾茶事件”，招致英国的武装镇压与麻省民兵反抗。独立战争遂于 1775 年爆发。经过 8 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在 1783 年迫使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美国的独立在政治地理上，不仅是殖民地中第一个摆脱宗主国的控制，走上独立道路，从而引发了拉丁美洲大批殖民地走上独立道路，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的联邦制，使一些国家予以效尤；更重要是由于后来的发展，成为欧洲以外的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上取代了英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在政治上影响欧洲政治形势发展，成为制衡世界一个超级大国。

2. 拉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兴起：18 世纪后半期，美国人民通过战争走上独立。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专制帝王给予拉丁美洲以很大启示，对独立愿望以很大推动。特别是 1805 年，西班牙与法国联合向英国宣战，两国联合舰队与英国舰队在西班牙西南部特拉法尔加角进行激战，受到毁灭性打击。遂后，西班牙受到英国海上封锁，切断其与殖民地的交通运输。接着于 1808—1814 年，西班牙发生外国入侵，人民起义，情况相当复杂，使其无暇顾及殖民地。这样，就为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拉美的殖民地独立战争是从海地的革命开始的。海地当时是法国殖民地，由于种植园大量使用黑人奴隶，岛上 54.5 万人口中，48 万人为黑人。其蔗糖、咖啡、棉花、蓝靛作物全部为了出口，出口贸易额占法国殖民地贸易额一半以上。种植园主穷奢极欲，奴隶则仅六七年就被折磨而死。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岛上混血种人和自由黑人于 1790 年 10 月起义不久遭镇压而失败。1791 年夏，黑人再次起义，大批奴隶卷入其中，控制岛上大部分领土。拿破仑在法国实行独裁统治后，为维持殖民统治，于 1801 年派兵前往镇压，但以失败告终，海地终于 1804 年独立。

在西班牙殖民地，当拿破仑一世于 1807 年进攻西班牙，1808 年囚禁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另立其兄为西班牙国王，5 月 2 日马德里人民反对法

国占领起义等消息传到时，就引爆了强大的独立运动。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墨西哥分别于1808年4月19日，1810年5月25日和1810年9月16日举行起义，经过曲折的斗争，直到1830年才告结束。

委内瑞拉土生白人于1808年4月19日驱逐殖民官吏，各省响应，第二年成立共和国，1812年7月遭镇压失败。玻利瓦尔1813年8月7日解放加拉加斯，重建委内瑞拉共和国。次年又遭扼杀。1816年11月，玻利瓦尔再次进军委内瑞拉，于1818年2月，委内瑞拉共和国再度成立。接着玻利瓦尔于1819年8月、1822年5月进军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并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1831年解体）。

在南美洲南部，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群众起来推翻总督，组成土生白人的临时政府。次年5月巴拉圭土生白人亦通过起义组成临时政府。1816年，阿根廷通过《独立宣言》，正式宣布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后来，阿根廷派圣马丁于1817年翻越安第斯山，在当地人民配合下，解放了智利。接着于1821年北上，于7月解放秘鲁的利马。1823年玻利瓦尔从北部进入秘鲁，经过激战摧毁西班牙殖民军主力，秘鲁与玻利维亚分别于1825年和1826年成为独立国。不过，乌拉圭因葡萄牙与英国插手，直到1830年才宣布独立成为共和国。

墨西哥虽于1810年9月16日起义，但革命队伍几经挫折，其原来代表贫苦农民和下层教士领导亦被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所取代，于1824年才建立稳定的联邦共和国。墨西哥以南的中美洲，原于1821年加入墨西哥共和国，1823年分离出来成立联邦共和国，1838年又分为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5国。

拉丁美洲的葡属巴西，由于葡萄牙王室逃避拿破仑一世的入侵来到巴西。为缓和巴西人民反抗情绪，宣布巴西与葡平等，组成联合王国。1822年王子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成立巴西帝国。1889年帝国被推翻成立巴西合众国。

在加勒比海地区，除海地独立外，其余各岛屿有的独立比较晚（如古巴为1902年，牙买加为1962年，多米尼加为1978年，圣基茨和尼维斯为1983年...），有的至今仍为有关国家属地（如瓜德罗普岛属法，安圭拉岛属英、阿鲁巴岛属荷，维尔京群岛分属美、英...）。另外，在南美洲东北的圭亚那仍分别为英、荷、法的殖民地。英属与荷属分别于1970年和1975年独立为圭亚那和苏里南，法属则一直保留至今，作为法国的一个“海外省”。

在拉美，由于其居民是白人、混血人和印第安人、黑人，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亦各不相同。这点与美国不同。当时，西属殖民地人口中，有土生白人350万（亦称克里奥尔人）、混血人550万、印第安人750万、黑人75万。前两者占多数，加上当时其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化作用，其影响与力量都大于后两者，这不但影响其独立过程、结果，也影响其独立后的发展。

在法国进攻西班牙，费迪南被监禁，拿破仑兄长僭居帝位的背景下，代表殖民地中、上层的自由派则起来反对西班牙王权代表的总督及殖民政府，组织起义要求独立。在南美，不论是玻利瓦尔，还是圣马丁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及需要动员奴隶及农奴等有色人种参加军队时，才照顾与反映其利益。墨西哥的起义则是以农村印第安人、矿工、城市失业者为主体，由革命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反映中、下层阶级利益，要求废除奴隶制，印第安人和混血人享有平等权利，归还印第安村

社原有土地。这些要求是中、上层所难以接受的，遂使其革命后期发生变化。当西班牙革命于 1820 年建立一个短命的共和国时，墨西哥的保守势力反而一度表示“革命”与母国分离。最后，革命的成果仍然落于土生白人的手中。

经过曲折的革命，西班牙的殖民地获得解放，但是，其留下的两个问题则影响着其后的发展与道路。一是，中、上层社会，即白人及混血人获得利益，而下层社会仍维持原状，没有获得解放，社会矛盾仍然存在。二是强大的大庄园主与新兴的工业企业主，虽然在革命中都获得利益，但其各自力量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经济发展上，前者属于贸易自由主义，可以通过输出农产品，换回便宜工业品以获利，后者要求发展本国工业，主张贸易保护主义，通过控制国内市场以获利。但是，前者社会基础深、势力大，自由贸易占优势，这种情况与美国相反，其结果影响拉美工业化及整个社会进展。

在拉丁美洲的独立革命中，亦受到美国的明显影响。美国在独立后，为了防止分裂，加强其对内、对外的力量与作用，采取了联邦制，这对美国后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拉美革命中，在南美组成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拉普拉塔联合省以及中美洲联邦等国家中，都存在着设想走美国的联邦制的思想。但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因联邦制与集权制两派矛盾，最后于 1831 年解体分别成立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原称新格林纳达共和国，1863 年改为哥伦比亚合众国）、厄瓜多尔。阿根廷的拉普拉塔联合省也是集权派与联邦派争论，直到 1861 才以集权派胜利告终。中美洲联邦也只维持了 15 年，于 1838 年分为五个国家。这也说明，拉美当时地方的封建势力仍很强大，经济统一势力较为薄弱。相反，巴西在 1891 年成立联邦制的合众国却取得成功。这也反映了，巴西在西属拉丁美洲革命独立以后大半世纪期间国内经济发展与相互联系有了增长。

原来同属欧洲宗主国殖民地的美洲，在半个世纪内都获得了独立，但其所走道路不同，使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出现的边缘与核心现象十分明显。它使这种现象成为以后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中一种特殊现象的起始。同时，它标志着商业时代的殖民主义的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工业时代的帝国主义的开始。

三、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分割与控制

帝国主义一词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泛指，即指一个国家对别的国家进行侵略、掠夺、控制或统治的扩张政策；二是指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即通常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果是第一个含义，可以说，在新航路与新大陆的发现以后，西方一些国家即实行殖民主义，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进行侵略、掠夺、控制或统治的扩张政策，所以这也就是在实行帝国主义。因此，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是一事物的两面。有人把 15 世纪至 18 世纪中期的殖民主义，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主义，在此以后为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主义。在后一时期，又分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两个时期。与商业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就工业资本主义对世界殖民地的控制的广度与深度而言，都大大超过前一时期，而且是多个帝国主义在角逐，一个全球体系的政治地理或政治空间格局开始出现。可以说，世界已把所有地区与居民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联系起来。为此，我们把这一节称之为“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分割与控制”。虽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称为帝国主义，但垄断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是相联系的，所以在时间上包括这两个阶段。

（一）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的控制

1. 独立后的拉美政治形势：西属拉丁美洲独立后，将西班牙的统治与其所依赖的势力消除了。这主要是西班牙的贵族及支持西班牙统治的大庄园主等。而代表反西班牙统治与势力的主力，即土生白人不仅掌握了政权，而且大量的土地、矿山、种植园也转移到他们手中。虽然在拉美大都取消奴隶制（在种植园中仍保留黑人奴隶），但是原来农奴多转变为债役农民、佃农和短工，社会结构没有多大变化。大地主庄园制度是一种封建性的经济制度，加上天主教会的支持，两者的结合就为代表其利益的军事独裁统治提供了温床。这种特殊的政权在拉美称之为“考迪略”。

“考迪略”一词西班牙语为“首领”之意，是指拉美地区仰仗军队支持而取得政权的独裁者。由于其代表的大庄园主的利益集团的不同，这种军事独裁不稳定。这种独裁制度对拉美社会、经济发展极其不利。对内不利其工业化实现，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对外则为寻求支持，易受帝国主义势力所左右，长期处于依附地位。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在工业的发展，出现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壮大民族资产阶级才能形成新的社会力量。

2. 在自由贸易下的依附：在拉美国家独立前后，正是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开始进入工业化的时期。同时，英国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对世界贸易及殖民地垄断地位，战胜了法国的竞争，已在世界贸易上牢居于垄断地位。

正是英国的经济在工业革命推动下，生产迅速发展，英国成了“世界工场”。它的产品不论成本上，还是质量、数量上在竞争中都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因此，为了本国的利益，英国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即英国允许外国货进入自己的市场，同时，要求其他国家，甚至强迫弱国开放其市场，允许英国货进入。因为，英国货具有竞争优势，其他国家的货物缺乏这种优势，所以自由贸易是有利于英国而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其实，这种政策还有一种巨大的好处，正如一个辉格党人在 1846 年下院中宣称，自由贸易是“有利的原则，通过这一原则，外国将成为我们的有价值的殖民地，而我们无需承担治理他们的责任。”这也就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实质，即以这种方式既可获得更大的利润，又可避免因其对殖民地直接统治所承担的风险。其实也不完全如此，英国当时既保有加勒比海上的殖民地，又在印度扩大其殖民地。

那个时期，拉美国家独立后，国内除大地主的庄园经济外，也存在一些资产阶级，不过其力量，特别是在初期阶段较薄弱，远不如前者力量强大。在资产阶级中有两部分。一部分为金融资产阶级、进出口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种植园主；另一部分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大庄园主与第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希望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换回其所需要的工业品及奢侈品并从中获利，因而主张实行开放的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而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为发展国内的工商业，在强大的国外产品与势力影响下，需要国家的保护与扶持，因而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后者的政治与经济实力都处于不利地位，加上帝国主义借自由贸易实行对殖民地的控制的政策影响下，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就受新殖民主义之害，经济上长期处于依附地位。

在这种形势下，拉美地区在 19 世纪已成为满足世界市场的原料供应地。到 1913 年，拉美的咖啡、可可和茶叶出口量占世界总量的 62.1%，糖占 37.6

%，橡胶、生皮、毛皮占 25.1%，谷类占 17.9%，水果，蔬菜占 14.2%，畜产品占 11.5%。但是，从经济生活来看，就拿对资金、技术吸收较好的阿根廷来看，其国民财富从 1866 年的 10 亿美元提高 1914 年的 150 亿美元，而其同期人口仅增加 2 倍。实际上广大人民生活仍处于贫困中。其原因，正如当时一位政治家 B. 胡斯托所说：“英国的资本做到了英国的军队未能做到的事情。如今，我国成了英国的纳贡国……”。

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就是在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扩张，通过贸易、贷款、投资，控制了落后国家的财政经济命脉，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品、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在 1870 年，英国在拉美的投资总额已达 8 500 万英镑，一战前已上升到 10 亿英镑，成为拉美的主要投资国与债权国。通过资本输出，英国垄断资本家已控制了拉美 118 条铁路、45 家港口服务公司、23 家石油公司，使许多国家的经济上依附于自己。

3. 美国的兴起及参与拉美的角逐：美国独立后，发展是十分迅速的。首先是国土扩大。原来，美国独立时，只是大西洋沿岸的 13 州，其西则止于阿巴拉契亚山。但在独立后，则越过该山，通过战争兼并，购买及条约的掠夺，到 19 世纪中期就达到太平洋岸边，使美国真正成为一个从大洋到大洋的国家。其次是人口大增。美国的人口增长主要靠移民，在 1871 年到 1907 年，大约有 2 000 万移民涌向美国。第三，通过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屠杀，逼迫其进入环境恶劣的一些保留地，以掠夺其大片土地，依靠铁路建设把广大国土联系起来，经过南、北战争解放黑奴，避免分裂，加强统一，这些给经济带来的是飞速发展。第四是贸易保护主义，在 1824 年和 1828 年，把平均税率提高了 40% 和 45%，促进国内工业发展，避免落入依附地位。

到 1840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 11%，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 9%，两者均仅次于英、法，居世界第三位。到 1890 年，美国工业在世界工业中占 31%，已超过英国的 22%，居世界第一位，成为第一工业强国。到 1913 年，又上升到占世界工业的 36%，相当于英、法、德三强国工业的总和。

美国在拉美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首先表现为对英国的抵制。在 19 世纪初，英国害怕法国利用《神圣同盟》干涉拉美以损害自身利益，遂寻求与美国的联合。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国会咨文中称，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和任何欧洲国家在美洲已有的殖民地，但也反对任何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和在美洲进行新的殖民扩张。这就是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所在，也是美国染指拉美的开始。

美国控制拉美是从加勒比海地区入手的。在 1895 年的英国属地圭亚那与委内瑞拉的边境纠纷中，美国乘机干涉，阻止了英国的扩张。1898 年，以援助古巴革命为名，发动对西班牙战争。西班牙战败，不仅使古巴成了美国的保护国，还获得西属殖民地波多黎各，而且取得了亚洲原属西班牙的菲律宾的宗主权和西太平洋上的关岛。另外，还获得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威克岛，向俄国购买了阿拉斯加。1903 年策动巴拿马独立，攫取运河开采权与运河区永久租让权。1914 年运河修通，不仅缩短了大西洋与太平洋间的航路，使美国东西两海岸经济获利，两洋海军得以加强联系，有利于其海上势力的发展。在经济上，在拉美的输出、入总额中，美国分别占 30.8% 和 25%，都超过了英国的份额，居第一位。

（二）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

1. 奴隶贸易的兴衰：非洲大陆可以按地理条件分为南北两部分。在撒哈拉沙漠以北，濒临地中海，居住着阿拉伯人，很早就与居住于地中海北岸的欧洲人有密切的联系。南部，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对欧洲人长期以来是陌生的。欧洲人为了打开通向东方的贸易的海上航路，沿西非海岸南下，终于发现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航路。在这条漫长的航线上，沿非洲海岸建立了许多据点，它们既为垄断其与东方贸易，保护往来船只安全，供给必需品，又是开展贸易活动的商站。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西海岸基本上（除安哥拉以南）是茂密的丛林与陡峭的海岸，除一些河口及沿岸小平原外很少居民。而且这里气候炎热，又有许多对欧洲人来说很不适应的疾病，所以不适于欧洲人的殖民活动。在贸易上除黄金、象牙等外，潜力不大。关于奴隶贸易葡萄牙虽然早已是个蓄奴国家，但仅限于贵族家庭使用，需要数量不大。由于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岛屿与热带陆地沿岸地区，印第安人遭残酷压榨与屠杀人口大减，而以后发展种植园经济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增，奴隶成为非洲贸易中的主要“商品”。

由于欧洲对美洲种植园的产品——糖、棉花、烟草等产品需求大增，因而“奴隶”的数量与价格亦随之增加，奴隶贩子的收入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先后控制与垄断非洲奴隶贸易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发了横财，为其原始资本积累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英国不但较早就参加奴隶贸易，当其最后取代荷兰、法国而称霸海上时，从非洲运走的“奴隶”就比其他诸国运走的总数还多4倍。在18世纪80年代，每年运出平均近10万人。在贸易上，出现了黑奴作为重要一环的三角贸易。第一航程是由欧洲港口出发到非洲，以廉价商品如酒、棉织品、装饰品和火枪等物品换取奴隶；第二航程到美洲，把奴隶售给种植园、矿山，换取农产品和矿产品，运往欧洲市场。英国从1709—1787年，外贸船只吨位增加14倍，大多与三角贸易有关。

到18世纪末奴隶贸易开始衰落，其原因尽管有道义与理性方面的反对，但是，重要的还在于经济与奴隶劳动的本身。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品在商品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农产品的地位已有所下降。在美洲的种植园中的奴隶开始觉醒，不断起来造反，破坏生产，因而使得维持强制性的奴隶生产，不论从管理费用，还是从生产效率来说，都不如采取自由劳工制更为有利。结果，采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除非在得到补助和津贴情况下，才能维持竞争，否则就只能被挤出市场。

正是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促使英国于1807年通过法案禁止英国船只参与奴隶贸易，不许任何奴隶在英国殖民地登陆。其后，一些国家先后废除奴隶制，使长达4个世纪的奴隶贸易才基本上停下来。在奴隶贸易中，使非洲的人口、经济、社会发展都遭受重大损失。

2. 合法贸易：废除奴隶贸易之时，也正值英国工业生产独霸世界、实行自由贸易之时。所以，在非洲这种形势就为合法贸易扫清了道路。这种新贸易在条件较好的西非十分兴旺，因为那里按传统来说，农业比较发达，人口密度较大。那里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棕榈油的油棕的种植。棕榈油用于制肥皂、蜡烛、润滑剂，种仁油用于制人造黄油、巧克力糖等食品，种仁油渣都是良好的饲料。另一作物花生，可以制作食用油和肥皂。黄金海岸的黄金，森林地区的木材，其他产品有棉花，当地用这些产品交换欧洲运去的棉、毛织品

与酒、盐、烟草、小五金、枪支和火药。

由于在合法贸易交换的产品中，欧洲出口的是广大民众生产的产品，进口的是群众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进、出口发展的都比较快，远远超过奴隶贸易时的水平。如西非于 18 世纪末外贸额为 400 万英镑，而 1850 年却为前者的 3 倍。出口到英国的棕榈油 1810 年只 1000 吨，到 1855 年就增到 4 万吨。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 1820 年到 1850 年则增加了 30 倍。在此期间，由于工业发展，工业品价格下降，而农业原料价格上升，这就有利于非洲的出口。

非洲的当时贸易都是通过中间商进行的。不仅价格受其控制，而且也影响到贸易的扩大与发展。但是，到 19 世纪的下半叶，非洲贸易形势发生变化。欧洲工业国家中，英国在长期较快增长速度下开始下降，法国因普法战争失败及失去工业条件较好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后生产有些衰落，而新起的德国则增长较快。这样，就引起各工业国家间的竞争，当然会影响到非洲的市场。另外，1869 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印度的花生、棉花，澳大利亚的牛脂在欧洲市场有竞争力。加上 1860 年美国油田开发，向欧洲出口灯油。这些又都影响到非洲产品在欧洲市场地位。例如，棕榈油的销售量及价格大受影响。非洲的进、出口贸易上的竞争就必然牵涉到欧洲公司与当地政府，中间商之间相互都想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对方。要使工业国获得便宜的原料和稳定的市场，就需要降低政府的过重捐税，减轻中间商的剥削，还需要方便的交通以及法律和秩序……实际上，原来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已在工业革命的发展中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它需要殖民地以保证其原料来源、投资市场与产品销售市场。正如一位英国爵士所说：“如果把剩下的大片尚未开发的地区放弃给竞争对手，这无异于自杀”。这就道出各列强瓜分非洲的形势与缘由。

3. 瓜分非洲：现就列强对非洲的瓜分简述于下。

(1) 对北非的瓜分。北非位于地中海南岸，自西而东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地组成的马格里布及其东面的利比亚和埃及。在西方列强瓜分北非前，从阿尔及利亚到埃及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具有相当程度独立的军事封建国家。从距离来说，离其最近的国家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从经济利益来看，重要的为英国。

西班牙与葡萄牙在其将伊斯兰教驱赶出去以后，乘其强盛之时，曾分别占有地中海南岸的摩洛哥的梅利利亚和休达、丹吉尔、艾西拉。后来，由于摩洛哥人势力加强，又收回部分领土。随着西班牙与葡萄牙势力衰落，摩洛哥相对稳定下来。可是，法国势力崛起，对其南面隔海的阿尔及利亚意欲占领。在 1830，法国借机称其驻阿尔及利亚领事受辱，派军 3 万入侵，虽然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但是，在 1832 年至 1871 年间，那里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法国鼓励大量法国人移居那里。

在突尼斯，法国先是利用提供贷款办法控制其内政。当其在阿尔及利亚站稳脚跟后，就于 1881 年派兵占领突尼斯。1883 年通过条约将突尼斯变为法国的保护国。在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法国准备进一步扩大其殖民地时，却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一是东面的意大利于 1870 年完成了统一，参与地中海的竞争，意欲吞并利比亚。二是西面的西班牙仍不忘怀对岸的摩洛哥。为此，法国只好与意大利密约，允许意大利在利比亚自由行动换取其支持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另一方面，法又同意与西班牙在摩洛哥划分势力范围。但

是，法国 1905 年和 1911 年两次在摩洛哥的行动却招到德国干预。当时，协约国想在那里建立战略据点以打破英国的海上包围。由于法国受到英国的支持才使摩洛哥归入法国保护区。而西班牙亦乘机获得摩洛哥北部与其西南两块地方。意大利则利用大国注意摩洛哥问题时于 1911 年派军队登陆利比亚，将利比亚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在埃及，由于它地处地中海与红海之间，扼东西方之间通商的要道。英国与法国在印度发生殖民地的竞争时，除两国船只绕道好望角到印度以外，而埃及则是经地中海转道去印度的近路，所以两国亦在埃及展开竞争。为了争夺通道控制权，英国人获得筑路权，法国获得开凿运河权。运河虽于 1870 年竣工，但由于财政困难，股票则全部卖给英国。运河开通东西航路大为缩短，对英国极为有利。由于德国崛起，法国为联英对付德国，退出埃及。英国于 1882 年出兵埃及，占领开罗。虽然埃及在名义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但实际上已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占领埃及后，即出兵镇压由埃及贵族统治的苏丹领土上的马赫迪起义。英国侵略者在遭受重大损失后于 1900 年才打败起义、控制苏丹，对其实行所谓的“英埃共管”。

(2) 对非洲西海岸的瓜分。从非洲西海岸北部的塞内加尔到南部的安哥拉，过去是从葡萄牙开始，各殖民帝国争相设据点和商站的岸段，是奴隶贸易的集中地区。到西方瓜分非洲时，除葡萄牙人占据的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西班牙人占据的赤道几内亚外，多是英、法等国的小块据点。特别是在几内亚湾沿岸一带，彼此交错分布。例如，法国占有塞内加尔、几内亚、象牙海岸（利特迪瓦）、达荷美（贝宁）；而英国则占有冈比亚、塞拉利昂、黄金海岸（加纳）、尼日利亚。

在法国方面，法国利用其在塞内加尔河口的据点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向东发展。在尼日尔河上游遇到北面奥马尔帝国和南面的萨莫里帝国的阻挡。在 90 年代消灭奥马尔帝国后就进入尼日尔河东岸，并与从阿尔及利亚南下、加蓬北上的法军联合进军乍得，消灭了那里的拉巴赫国。1898 年与萨莫里帝国作战的法军联合由科特迪瓦北上的法军征服了萨莫里帝国。

在几内亚、科特迪瓦，法国分别于 19 世纪 90 年代把其划为自己殖民地比较顺利外，在达荷美则遇到当地达荷美王国的坚决抵抗，到 1897 年始占领其全部领土，1913 年达荷美沦为法国殖民地。

英国在该地区的殖民地主要是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它们分别位于沃尔特河与尼日尔河下游。当英国向北发展征服该地时，却遇到当地人民的激烈抵抗。在加纳，距海岸不远处就有一个较强的阿散蒂联邦的存在。从英国 1873 年与阿散蒂发生较大规模战争，到 1891 年俘虏阿散蒂国王，1900 年镇压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起义，1902 年将阿散蒂并入黄金海岸为止花去了 30 年。在尼日利亚也是一样。从 1851 年英国攻占拉各斯开始，到其攻占北部最后一个王国（索科多王国）时已是 1902 年。到 1914 年，英国征服尼日利亚全境，才把南、北尼日利亚两个保护地合并为尼日利亚殖民地。相对来说，英国将冈比亚和塞拉利昂变为殖民地花的时间不多。

从上述情况看，法国从塞内加尔进入尼日尔河上游，一直发展到乍得，只花 20 年，而英国从南部沿海扩展到北部则花了 30~50 年，远远超过法国的时间。其原因在于法国自西向东是热带草原和稀树草原，便于行军，有利于欧洲先进武器装备优势的发挥；而从南往北则为常绿雨林，欧洲武器装备

难以发挥作用，易受攻击，因而行动缓慢。正是由西向东的法国行动快，使由南向北的英国来到北部时，该地已早被法国所占。加上马格里布也已被法国占有，使法属殖民地在非洲西北部围绕撒哈拉沙漠联成一片。

在西非，从几内亚湾往南，从喀麦隆到安哥拉，除安哥拉早已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外，其他都是通过欺骗、利诱等方式让当地小国或部落头目签定“保护”条约的，欧洲列强既以此作为“合法”依据将其劫为自己的殖民地。

刚果位于刚果河流域，比利时国王雇用英国探险家斯坦利进行活动，建立大量殖民据点，与当地小王国或部落签订大量“保护”条约。通过比利时的外交活动，在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各列强批准其为比利时国王的采邑的刚果自由邦（1908年改为比属刚果，现扎伊尔）。在比属刚果北面的法属刚果与喀麦隆，亦是采取欺骗手法，威胁、利诱当地首领签订保护条约，分别于1882和1884年被宣布为法属与德属殖民地。法属刚果于1886年分为加蓬与刚果两个殖民地。几内亚湾的多哥亦是德国利用英、法受制于加纳和达荷美之机，与当地酋长签约，于1884年成为其殖民地的。葡萄牙人不仅保持了安哥拉殖民地，还利用英国与比利时在刚果问题上的矛盾，占据刚果河口北岸的卡奔达，成为其飞地。

（3）对非洲南部的瓜分。对非洲南部的争夺主要是白人之间对殖民地的争夺。南非的好望角是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的转折点，在航行上是重要的据点。于1652年，荷兰人占了该地并开始移民，其荷裔白人后被称为布尔人或阿非利坎人。荷兰衰落后，英国于1795与1806年两次占领该地，并于1820年开始移民。

英国人利用其政治统治地位，迫使布尔人向北迁移，在奥兰治河与法尔河以北分别建立奥兰治共和国与德兰士瓦共和国。英国于1852年和1854年分别承认这两个共和国。在19世纪的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在奥兰治和德兰士瓦发现大钻石矿与大金矿。英国为垄断其利益与布尔人发生冲突，矛盾逐渐激化，终于1899—1902年发生大规模的英布战争，结果布尔人失败。英国于是将其南部殖民地、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及其已占领的祖鲁人的纳塔尔地区四部分在1910年组成南非联邦。当地土人的土地被白人掠夺，黑人受到严重的歧视，被驱赶到分散的小块的保留地，实行种族隔离。

南非的北面津巴布韦（原南罗得西亚），赞比亚（原北罗得西亚）、马拉维（原尼亚萨兰）三地，于1890年前后被英国通过欺骗签订的“保护地”及军事占领等手段攫取为自己的殖民地。西南非（现纳米比亚）则于1884年为德国人抢去。介于西南非与南非之间的贝专纳兰（现博茨瓦纳），英国为防止落入德国手里，于1885年列为自己的殖民地与保护国。

（4）非洲东海岸的瓜分。在进行瓜分前，在非洲东岸只有葡萄牙人早已占领的莫桑比克。其北的沿海及桑给巴尔等沿岸岛屿则为桑给巴尔苏丹所控制。在这里竞争的主要是英、德两国。英国来得早，1876年英国就与桑给巴尔建立联系，并获得一些商业和航运特权。德国于1880年和1881年派远征队进入东非内陆开辟贸易基地。1884年远征队溯瓦米河而上，与该地各酋长签定条约，将其领土专供德国殖民使用。1885年，德国公布此条约，并由德皇签署，表示有权将此领土接受过来，置于其保护之下。桑给巴尔苏丹称这些领土为其所有，当地酋长无权处理。德国不顾一切于1885年8月派战舰前去威胁。桑给巴尔苏丹求助于英国，但英国则由于英法关系、英俄关系紧张而无力顾及。1806年英德伦敦会谈，德国则分到坦噶尼喀（现坦桑尼亚大陆

部分)、卢旺达和布隆迪，英国除获得桑给巴尔为其保护国以外，还获得肯尼亚与乌干达。

在非洲大陆东岸的北部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古国之一。在遭受瓜分中，埃塞俄比亚于 1867 年、1875—1876 年两次打败英军及英埃军的进犯，1887 年、1895 年又两次打败意大利军队的进犯，是非洲唯一没有在一战前被列强所瓜分的国家。不过其红海沿岸的厄利特里亚却于 1885 年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索马里于 1887—1891 年，1888 年和 1889 年，分别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分割，成为英属索马里（位于亚丁湾南岸），法属索马里（现吉布提，位于红海出口南岸），意属索马里（位于印度洋沿岸）。另外，法国于 1895 年在东非海岸外获得一块很大的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

（5）列强对非洲的争夺。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都是从自身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出发，在瓜分过程中必然发生各种矛盾与冲突引起激烈的争夺，其背后亦反映着其相互间争霸的野心。

帝国主义诸列强的争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 1876—1884 年，其争夺的焦点是西非的刚果河流域。1874—1877 年，美籍英国人斯坦利在刚果探险活动引起殖民者兴趣。结果，比利时和法国在此后通过探险活动与当地部落酋长签订大量“保护条约”而成为属于比利时的“刚果自由邦”和法国殖民地。这件事不仅由于界线划分引起法、比的尖锐矛盾，也招致英、德、葡等国插手。英国为阻止比、法的势力扩大，鼓励葡控制刚果河口。德国认为小国比利时占有刚果及河口有利于自己势力渗入，遂反对英、葡。

由此，于 1884—1885 年在柏林召开十五国参加的会议。会议确认比利时国王领有“刚果自由邦”，在该地实行贸易自由与航行自由，并决定任何国家以后在非洲取得领土必须是“实际有效的占领”，而且要通知各缔约国。实际上，该会议对列强瓜分非洲起着促进作用，导致了更激烈的争夺。

第二阶段是，从 1884 年到 19 世纪末。柏林会议后，英、法、德、葡等国分别制订了瓜分非洲的计划。英国当时已控制了埃及，正在征服苏丹。在南非，由于金矿与钻石矿的发现，英国计划占领整个南非。这样，南北并进，相联成一南北条带状地域，形成北起开罗南至开普敦纵贯非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帝国。由于开罗与开普敦两地英文地名都以字母 C 开头，所以有“2C”计划之称。

法国由于正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从塞内加尔沿尼日尔河中、上游向东发展，其意图是想建立一条往东经乍得湖，直到非洲东岸索马里的法国殖民地。这即所谓的“2S”计划，因塞内加尔与索马里皆以 S 作字头。

德国在非洲殖民活动虽然较晚，但在柏林会议前后发展较快。那时，它控制了西非的喀麦隆，西南非的纳米比亚，东非的坦噶呢喀、布隆迪、卢旺达。它想建立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德属赤道非洲殖民帝国。

葡萄牙在非洲南部占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它亦企图将两岸相互联接起来。

这些意图是相互矛盾的，当然引起争夺，结果谁也没有实现。法国乘英国在苏丹被当地起义活动牵制而南下受阻之时，想加速在撒哈拉沙漠之南东进，抢在英国之前，选择阻力小的路线，派一支部队由加蓬出发，向东北沿乌班吉河，于 1898 年 7 月 10 日到达苏丹南部的法绍达。而英国亦于 9 月 18

日到达该地。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最后，法国考虑到其主要敌手德国存在，不宜与英国决裂，法国做出妥协，同意以尼罗河、刚果河分水岭为两国殖民地界线。法国最后放弃了“2S”计划。

英、德矛盾主要集中在东非。德国于1884年进入桑给巴尔岛对面的坦噶尼喀，并于当年占有喀麦隆和西南非。坦噶尼喀与喀麦隆和西南非之间尚存在空白。英国对坦噶尼喀北面的肯尼亚与乌干达还介入不多，对南面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还未进入，其在埃及与开普敦殖民地的南下、北上还阻于苏丹与布尔人的共和国。所以，这种形势相当严重。在1890年的英德协定中，德国放弃了乌干达，获得了向内陆扩展到刚果之权，遂占据了卢旺达和布隆迪。这样，德国失去了通过乌干达向西与喀麦隆相联的条件，英国也失去南北相联于中非的关键地区——坦噶尼喀。但是，在英国人与布尔人矛盾尖锐化情况下，德国则插手其事，在武器装备、军事人员训练、财政金融上支持德兰士瓦，企图阻挡英国人的北上，也想借布尔人及葡属莫桑比克来实现其东西相联计划。英国首先占据了贝专纳兰，堵住德国人从西边与德兰士瓦的联系。为此，德国人一方面借葡萄牙之名修了一条由德兰士瓦到莫桑比克港口马普托的铁路以方便德兰士瓦对外联系；另一方面从纳米比亚东北尽量向东延伸，越过贝专纳兰，进入坦噶尼喀或莫桑比克。后一计划，终于因英国抢先进入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不仅挡住纳米比亚向东延伸，而且也切断葡萄牙想要东西相联的计划。

英国控制津巴布韦与赞比亚之后，于1894年与比利时签约，把爱德华湖至坦噶尼喀湖一线的以西25km宽的地带租借过来，以便实现其“2C”计划。但是，遭到德国、法国等坚决反对未果。第一次大战德国失败，德属东非的坦噶尼喀落入英国手中，总算圆了英国人的“2C”梦。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短短几十年内，非洲的政治地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的瓜分，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国外，都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它使整个非洲卷入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系统，其带来的影响与变化超过前一阶段奴隶贸易与合法贸易阶段。按领土面积来说，获得最多的是法国（ $6.58 \times 10^6 \text{km}^2$ ），其他依次是英国（ $5.96 \times 10^6 \text{km}^2$ ）、德国（ $1.46 \times 10^6 \text{km}^2$ ）、比利时（ $1.45 \times 10^6 \text{km}^2$ ）、葡萄牙（ $1.27 \times 10^6 \text{km}^2$ ）、意大利（ $9.7 \times 10^5 \text{km}^2$ ）、西班牙（ $1.28 \times 10^5 \text{km}^2$ ）。

（三）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争夺

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列强对非洲的瓜分的同时，各列强也开始了对亚洲的争夺。当时，在亚洲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只有英国、荷兰、西班牙，它们分别占有印度、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老殖民主义者葡萄牙只保留有东帝汶与印度的果阿等地。其争夺的地区，有中国、朝鲜、中南半岛以及西亚地区，参加的国家主要有英、俄、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

1. 英国对印度的加强控制：英国在亚洲的殖民起始地区是印度。开始是与荷、法等国的竞争，当其战胜对手以后便开始巩固其地位，接着就以那里作基地参与对亚洲其他地区的争夺，所以，印度在英国的亚洲殖民地中具有重要地位。

1761年法国与英国在印度进行的战争以法国失败告终，1763年在巴黎签约，法国除保留本地治里等原据点作商业用外，全部撤离印度。印度从此开始成为英国的独占殖民地。

英国1763年赶走法国，消除了外来的竞争对手；在1764年的勃哈尔战

役中，打败了莫卧儿末代帝王沙阿兰姆，迫使其投降，印度失去了中央统治者，英国从此开始自由地进行控制整个印度的行动。印度是个实行封建领主制度的国家，在莫卧儿王朝垮台以后，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即土邦各自独立。在 18 世纪后半期，印度境内有两个较强的独立国，一个是位于德干高原中心的迈索尔，另一个是北部的马拉特联盟。由于当时英国已占据南部的东、西海岸，为使所占领土连成一片，英国先从南方着手。通过阴谋、离间、收买、拉拢，从 1767 年到 1799 年，四次侵略战争，终于灭亡了迈索尔。对马拉特联盟则利用其各邦间的不和、内讧，采取各个击破办法，终于在 19 世纪 20 年代战胜该联盟，占领德里，控制了印度的北部。于 1843 年和 1849 年又向西北进军，占领了信德和旁遮普。至此，英国花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控制了印度全境。

英国征服印度后，采取“分而治之”办法，分印度为直接统治区和间接统治区。直接统治区，占 2/3 领土，3/4 居民，间接统治区有大小土邦 700 多个，由当地王公管理。这种统治区互相交错，以便殖民者对其控制和监督。

由于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下的剥削压迫，破坏农村的公社与手工业，造成大批生活无着落、失业、失去土地的饥民，社会发生动荡。另外，在加强控制过程中，损害原来封建贵族利益。结果，发生了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反对英国统治者。起义最后被镇压。1858 年，英国为巩固其在印度的统治，取消东印度公司，改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

英国在经济上的影响就是把印度变成其所需要的原料供应地。黄麻是印度的特产，出口数量增长很快，1830 年仅 500 t，1857 年和 1909 年则增至 3.5×10^4 t 和 7.65×10^4 t。印度原来并不生产茶叶，英国所需茶叶多经中国进口，但英国鼓励种茶，1854 年只产 226.8t，1885 年就达到 3.18×10^3 t，1900 年又增至 8.71×10^4 t。原来小麦与油菜籽在 1870 年与 1840 年出口数量都微不足道，到 1914 年、1913 年却分别达 1.3×10^6 t 和 1.5×10^6 t。

另外，比较突出的是工业品方面，印度手工业，特别是棉纺业相当发达，在 1815 年，印度出口到英国的棉织品的价值等于英国出口到印度的 50 倍。尽管英国是个工业国家，棉纺业已由机器代替手工，而且英国又是以纺织品出口数量之大而闻名。印度当时出口到英国的棉织品数量反而大大超过英国，说明其手工业发达，成本低有很强竞争力。但是，英国为保护自己工业，实行保护税制。按此税，印度进口英国棉织品收 3.5% 的税，而印度棉织品到英国，则要交高达 70%~80% 的税。到 1844 年，印度进口英国的棉织品为 4.82×10^7 m，为 30 年前的 53 倍，而出口的数量则降到 6.3 万匹，为 30 年前的 1/20。另外，又对印度棉花运进英国采取非常低的关税。在美国内战时期，英国感到原棉供应不足，又在印度大力发展棉花生产。这结果导致印度棉纺手工业彻底衰落，百万手工业者破产，生活陷入绝境。原棉纺工业中心达卡有 15 万人，到 1837 年减至 3 万人。总督本丁克供认：“悲惨的境况在商业史上是无与伦比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白成了一片”。这说明，印度在政治上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经济上接着也沦为殖民地。

正是，英国对印度完成了全部占领，而且政治控制巩固以后，加上其经济掠夺的加强，财政收入的增加，镇压起义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就大大增强了其在印度的力量。这也就成为英国在亚洲的基地，于 19 世纪中叶向亚洲其他地方展开殖民进军。

2. 沙俄在亚洲的扩展：公元 4~9 世纪，东斯拉夫人东迁进入俄罗斯境

内，12世纪中叶分为许多小公国。13世纪蒙古在此地建立金帐汗国。14世纪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盛起来。15世纪摆脱金帐汗国。1547年伊凡雷帝称为沙皇。彼得大帝于1689年当政，开始国家近代化，从而使俄国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

1574年沙俄派兵越过乌拉尔山，入侵西伯利亚汗国。到1594年占领鄂毕河流域，消灭西伯利亚汗国。该地所产毛皮成为俄国对外贸易的最大项目。在鄂毕河流域以东的东西伯利亚，当时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彼此很少联系，人口密度又低，沙俄遂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前进。

为了方便、灵活，加上该地区没有阻挡沙俄政治扩展的力量存在，所以沙俄政府组织了所谓“探险队”和“航海者”向东进行“考察”、“旅行”。他们先后，进入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流域，并顺河航行进入北冰洋。1644年，队伍到达科累马河口过冬。1648年发现白令海峡，1649年到达鄂霍次克海。1643年越过外兴安岭（斯塔诺夫山脉）进入中国国境。后来不断侵入我国境内，开始与清王朝在我国东北发生冲突。

沙俄在亚洲扩展的重点地区是中亚。中亚在西西伯利亚的南边，自然条件上，其间并没有障碍，可是，在时间上却晚了两个多世纪。从1824年开始，由西西伯利亚越过草原，花了30年时间，于1854年进入锡尔河畔。然后，又向南发展，于1865年攻下塔什干，1868年占领布哈拉，1873年占领希瓦（在阿姆河下游），最后，在1881年占盖奥克泰（在阿什哈巴德附近），1884年占谋夫。结果，当时中亚的三个穆斯林国家——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以及土库曼地区在30年内全部落入沙俄手中。

另外，沙俄还在里海和黑海之间越过大高加索山进入高加索。在19世纪初（1804—1813年，1826—1828年）两次与伊朗进行战争，获得了现属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大片领土，沙俄与伊朗两国基本上以阿拉斯河为界。

由于沙俄在中亚与高加索的扩展，与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向阿富汗及伊朗的扩展发生冲突，那里遂成为两国相互争夺的热点地区之一。从中亚与高加索的英、俄相争来看，亦反映了沙俄对出海口的追求。如果沙俄在这两个地区取得成功，有可能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实际上也就进入印度洋。这样，就会给英国的印度与本土海上联系带来威胁。沙俄在北面，英国在南面，从中国的东北到印度，再到西亚、土耳其都存在着两国的竞争。这种竞争成为列强在亚洲的竞争的主轴，并把其他国家卷了进去。

3. 东北亚的争夺：东北亚是指中国的东北及朝鲜半岛，涉及到俄、日、英、中、朝。沙俄在1643年侵犯中国领土后，不断派兵入侵，经中国反击，于1689年9月7日签订《中俄厄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该条约不单是使边境得以安定，更重要是阻挡了沙俄向东方寻求出海口的愿望。

但是，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沙俄看出清庭的腐败，国力衰弱，感到有可乘之机。到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沙俄看准时机，一方面支持、参与英、法侵略中国的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中间人“调停”此事。先是利用英、法联军于1858年威胁北京时，武装进入璦琿（现爱辉），强迫与驻军首领签订《璦琿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除爱辉对岸江东六十四屯外） $6 \times 10^5 \text{km}^2$ 土地与俄，乌苏里江以东则为中俄“共管”。到1860年，又称“调停”有功，逼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 $4 \times 10^5 \text{km}^2$ 土地割于沙俄。这样，沙俄不但获得

了大片领土，而进入了太平洋、日本海。在陆地上，形成了三面对我东北的包围，并且与朝鲜接壤。

在东北亚的边缘海上，有日本。日本原是德川幕府实行封建统治的国家，对外实行锁国政策。1853年，美国舰队迫使其对外开放。1868年德川幕府垮台，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实行“富国强兵”，“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避免了半殖民地危机，国势日强，对外实行军事扩张，并且与西方列强一道参与对亚洲的争夺。

日本向外扩张，其对象首先是相邻的朝鲜与我国的东北。1894年，朝鲜内部发生动乱，朝鲜政府要求中国派兵镇压。日本亦借故出兵，接着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挑起事端，与中国军队开始交战（发生于甲午年，称为甲午战争）。除双方陆军在朝鲜半岛及辽东发生大规模战争外，还在黄海进行海军决战。清庭全面失败，于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给日本。此外，日本还获得大批赔款及通商等权利。

日本突然间强大起来，并且在东北亚获得了大片领土，这与沙俄的利益发生矛盾。沙俄当时在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想以此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交通联络线。但是，日本却捷足先登抢在了前面，特别是获得了辽东半岛，当然引起沙俄不满。沙俄得知后，立即联合德、法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三国联合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实现了“辽东半岛”的归还给中国，利用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对日本的复杂心态，借口“共同防御”日本，沙俄与清庭签订密约，除获得在东北修筑铁路等特权，在以后还强租旅顺、大连。在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乘机出兵占领江东六十四屯及东北全境。日本虽然为争夺中国东北与沙俄决战，但为取得国际支持，遂求助于英国。英国一方面在亚洲其他地区与沙俄有利益冲突，当然亦不愿沙俄独霸东北亚，故支持日本与沙俄开战。

日本在1904年在中国东北向沙俄开战，沙俄陆军与海军均遭到失败。因此，沙俄租借的旅大、东北南部的铁路等利益都转入日本人手里。从此，中国的东北的南、北就分别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

4. 列强对中国沿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英国在对华的贸易上一直是处于逆差。因为中国的生丝、丝绸、茶叶等大量进入英国，可是英国的产品却在中国的市场打不开销路。这种贸易上的不平衡，只能用贵金属来补偿，所以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市场。为了平衡贸易英国大伤脑筋。自从英国开始从印度运送鸦片到中国，不仅运量逐步增加，使得双方贸易的赤字亦逐渐平衡。到道光时期，鸦片成了英国输往中国的重要产品，双方贸易发生变化，中国出现逆差，白银大量外流，每年平均为500万元。结果，中国市场上银价急剧上涨，鸦片却到处泛滥，每年进口4万多箱。

清庭派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打击了英国的在华利益。英国于1840年派舰队来华，向中国开战。由于林则徐在广东作了准备，英舰失利后转向浙江、江苏沿海等地。最后，清庭失败，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在与西方战败后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结果，英国获得了香港、赔款以及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自由贸易权。这样，英国就开始掌握中国东南沿海贸易的优势地位。

在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相形之下，老帝国主义不再满足于已取得的利益，加上清朝政府正与太平天国作战无力对外，遂联合法国

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 1856 年，英、法分别以广东水师对行船的搜查和广西的传教事件作借口，组织联军于 1857 年攻占广州，1860 年占舟山、烟台、天津，并进入北京，焚烧圆明园。清庭被迫批准《天津条约》及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条约中，英、法除获得赔款与其他权利外，还在营口、天津、烟台、汕头、琼州沿海城市及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城市自由经商。大大扩大了英国的势力范围。

在非洲的瓜分中，新兴的德国总是与英国相对抗，并以此在非洲抢得不少殖民地。原来在亚洲毫无基础的德国，此时看到英、法、俄、日等均在中国获得很大利益情况下，亦积极插手。

当时，英国势力已占有东南沿海与长江流域，俄、日分割了中国东北与朝鲜，德国遂转向中国的黄河下游的山东。在这种选择上，德国是怀有图谋的。在 1860 年，普鲁士政府就派李希霍芬到中国进行考察。根据考察，德国看到这块地方还未引人注意，遂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因为黄河是中国第二大河，仅次于长江，但河流不能通航，河口处亦无法建港，可是黄河沿岸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接近京畿。所以德国设想以胶州湾作为黄河流域的出海港，另一方面修一条铁路到位于黄河下游岸边最大城市济南。他企图以此控制黄河沿岸的经济发展。因为当时，济南往上一段黄河可以通航，往下有小清河可以通行小汽船，也许经过治理使黄河通航能力扩大与延伸。

根据这种意图，德国逼迫清政府于 1898 年 2 月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德国获得胶州湾、修建胶济铁路、开采沿线矿藏等权利，从此，山东就纳入德国势力范围，成为其在远东的基地。

这种情况，等于在英、俄分割中国南北之间打进一个楔子，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当然招致了英、俄的不满。1898 年 3 月沙俄则借此理由强迫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租借期 25 年，此外并获得由中东铁路修一条直到大连的支线的权利。英国接着于 1898 年 4 月与 5 月分别获得香港对面九龙与山东半岛东北角威海卫为租借地，威海卫的租期与沙俄租借旅顺的时期相同。英国从而不但经济势力扩展到华北，而且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既可阻止德、俄、日的势力的发展，又可与俄共同控制渤海，威胁清政府的京畿之地。

由于法国在 1885 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法新约》获得越南，亦于此时乘机向清政府提出新的要求，于 1899 年强租广东省西南雷州半岛东北方的广州湾（现雷州湾）。同时，声称粤西、滇、桂为其势力范围。

日本由于甲午战后，已获得了中国的台湾与澎湖列岛，遂将其对岸的福建省划入其势力范围。

英、俄、德、法、日等国各自抢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形势已明显露出，这不仅加剧了各获得一定利益的列强之间的利益分配上的激烈争夺，也使其他未获得明确势力范围的国家，担心失去其商业等方面利益而表现出极端不满，意欲参加竞争。此时，美国担心列强夺取势力范围的斗争将损害美国在华利益，遂于 1899 年宣布对华的所谓“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原则。这也就是反对一切国家在中国一切地方享有排他权，以及对任何地方的支配权。由于这一原则有利于各国在华贸易自由、平等竞争、避免争夺与冲突，而为各国所接受。

另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丧权辱国所引起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加深，人民不满，愤怒情绪日益增加，义和团运动反映出的这种力量也使帝

国主义不敢贸然采取瓜分中国的行动，它们认为保持其半殖民地地位会更有利于其利益。

5. 对东南亚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东南亚，过去殖民活动留下来的是荷兰占据的东印度群岛，西班牙人占据的菲律宾，英国占据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现在进行殖民争夺的地区是中国南面的中南半岛，参加的列强是英、法。

在前一地区，当时产生的问题是苏门答腊和菲律宾。苏门答腊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的对面，并与新加坡和马来半岛共扼马六甲海峡。在苏伊士运河建成后，东西方的航路大为缩短，对贸易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加上印度成为英国独占的殖民地，而且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贸易及各方面活动大为加强时，苏门答腊的战略地位重要性大大提高。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则引起法国、美国及意大利注意，他们想占领该地以控制重要水道。把马六甲海峡看作是其生命线的英国当然不能容忍，如果亚齐一旦为另一强国所控制就会对英属印度和新加坡造成直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宁愿让当时已占有该岛相当部分的荷兰控制该地。由于荷兰力量已衰弱，由它控制反而对英国有利。为此，1870年英荷签订了《苏门答腊条约》，荷兰把非洲黄金海岸的殖民地让给英国，而英国则退出对亚齐的竞争，反而支持荷兰对亚齐的行动。后来，荷兰于1873年出兵，1874年占领亚齐成为其荷属殖民地的一部分。

菲律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其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殖民统治。宗教在这里有很大的权威和势力，在政治上可以左右行政长官和地方事物，在经济上修道会本身往往就是最大的庄园主，在军事上很多修道士就是军事头目。可是，在西班牙国势衰落，控制力量下降时，被迫开放市场，其他列强入侵。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化，遂与旧的制度产生尖锐冲突。从1896年开始，菲掀起民族民主的革命。

1898年4月美西战争爆发，美国“支持”革命，目的在于打败西班牙在菲的统治。1898年12月西将菲转给美国。美国此时却不承认通过武装斗争几乎解放全岛，并于1898年6月与1899年1月先后成立的革命政府与菲律宾共和国，反而对革命人民实行镇压。

美国不仅占据了菲律宾，还占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中途岛、威克岛、关岛，成为太平洋上的重要国家。美国对这些岛屿的侵占，特别是占有菲律宾，使其在东亚参与竞争有了一个强大的基地。

对中南半岛的争夺是英、法。英国在印度站稳脚跟后就开始向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就是缅甸。1826年，英国从印度出发进攻缅甸，并占领仰光，缅甸割西部领土与英并赔款。1852年英再度攻缅，获得缅甸南部的富饶地区。到1884年，法国利用缅甸国王对英国控制的不满，支持缅王，并乘机获得上缅甸的交通、邮电、贸易等特权，企图把上缅甸与其所占的越南相联。这样，既可以割断英属缅甸与中国西南相联以垄断其攫取的中国西南的权利，又可以从三方面包围泰国以便增强其中南半岛地位。当英获悉法国与缅甸订有密约，将于1885年春予以公布，于是以先发制人之势进攻缅甸，占领其全境。

法国对在印度的失败，失去在东方实行殖民的基地一直耿耿于怀。在其积极于西非开展扩张的同时，亦在亚洲寻找对象。鸦片战争后，法国看到中国的衰弱，英国获得诸多利益，遂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伙同英国取得胜利后，于1862年开始向越南进攻。接着又于1867年、1872年和1882年发动三次侵越战争。由于越南在战争中失败，阮氏王朝被迫于1884年与法签

约，承认法国的“保护权”。

早在 70 年代，越南为抵抗法国入侵邀请中国军队赴越。法国在占领整个越南后，遂于 1883—1884 年与中国发生冲突，在中越边境发生战斗。镇南关-谅山之战，法军大败，致使法国内阁倒台。可是，清政府反而退出越南，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法国在侵占越南的同时，又积极入侵柬埔寨和老挝，分别于 1863 年和 1893 年强迫这两个王国接受其“保护”。由于泰国（当时暹罗）是柬与老的宗主国，当然泰国与法国在柬、老问题上发生矛盾。法国利用其军事优势，不断扩大柬、老西部边界，向泰国进行蚕食，多次与泰国发生武装冲突。特别是 1893 年，法国在老挝打败泰军，把边界推至湄公河岸边，并向泰国发出最后通牒。泰国在武力威胁下承认法国所指定的以河为界的条件。这时，英、法各以缅甸和越南、老挝、柬埔寨为基地争夺泰国。最后，双方采取妥协，于 1904 年缔约同意把泰国作为一个缓冲国而告终。

6. 英俄在亚洲西部的争夺：英国占领印度后，以印度为基地，不仅向缅甸扩张，而且还向北与西北扩张。在印度北面，喜马拉雅山的南坡，有尼泊尔、锡金、不丹三个王国。尼泊尔于 1814 年就受到英国的军事进攻，由于军事失利，英国遂获得种种特权。后来，英国则利用尼泊尔内部矛盾，于 1846 年支持拉纳家族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获得世袭首相地位。英国从此获得对尼的外交上的“指导”，使尼变为其附庸。1887 年，英军强占了锡金，1890 年，锡金就正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国入侵不丹比较早，1774 年就与东印度公司签约。1864 年，英印政府向不丹宣战，不丹失败，被迫割地。1910 年正式在对外关系上接受英国“指导”，为英国所控制。由于锡金为英所占，与我国西藏接壤，又为交通要道，英国借故于 1898 和 1903 年两次进军西藏，强迫地方当局签约，承认英在西藏的特权。1906 年中英正式签约，英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清政府承认英所取得的特权，并不允许其他外国干涉西藏事务。实际上，西藏已进入英国势力范围。

阿富汗位居伊朗和印度与中亚地区交通的联结点上，由于地势较高，耸立在印度河平原之上，形势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国控制印度后，就北上进军阿富汗，目的是既阻挡俄国南下印度洋，又为印度确立一个安全屏障。

1873 年，伊朗在俄国支持下围攻赫拉特。英国派人联络阿富汗统治者共同对付俄国，但在白沙瓦问题上（阿富汗要求收复白沙瓦）产生分歧，反而使其转向俄国。因此，1838 年英国出兵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但遭阿反击，1841 年败退。当沙俄于 70 年末，灭中亚三国，进兵阿姆河。英国又一次企图与阿富汗结盟遭拒绝，遂于 1878 年第二次出兵阿富汗，占据喀布尔。阿富汗被迫签订冈达马克条约，规定阿外交由英国人控制。1919 年由于阿新国王宣布独立，不承认英特权，英第三次出兵阿富汗，但未能在战场上取胜，加上印度发生动乱，英不得不退兵，签约承认阿的独立地位。不过，1893 年，英国人亨利·杜兰迫使阿接受其划定的阿印之间边界线，称为“杜兰线”。该线不但向阿境内推进而且在地形上亦有利于印度。同时，使普什图人分居在该线的两边。

在伊朗，由于俄国与伊朗两次战争击败了伊朗，占领高加索地区，扩大其在伊朗的影响。英国则设法阻止俄国南下，维持其在伊朗南部的影响。当伊朗在俄国支持下出兵包围阿富汗的赫拉特时，英国于 1837 年 10 月即派兵

舰进入波斯湾，攻占了哈尔克岛、布什尔港与阿瓦士城，迫使伊朗签约撤军并永远放弃对该地领土要求。俄国与英国在伊朗与阿富汗两地的争夺到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由于欧洲的形势变化，英德的矛盾较为突出，为对付德国的挑战，英俄两国开始接近，并于 1907 年签订英俄协约，伊朗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其东南部毗阿富汗，西南与印度西部地区为英国势力范围。后者面积比前者小。但在阿富汗，则处于英俄两势力之间，成为一缓冲国。

关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岸，对英国来说关键有二。一是保持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使英本土与印度及远东地区航运通畅。这是英国的生命线。二是防止俄国进入地中海。为此，就需要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使其领土稳定。但是，后来，德国企图从柏林修铁路经君士坦丁到伊拉克的巴格达，以此建立一条进入亚洲的捷径，并超越苏伊士运河与英国竞争。随着一战德国的失败，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该计划未能实现。

四、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地缘政治条件

新大陆与新航路的发现，使分离的世界开始发生政治、经济等各种联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联系亦逐渐加深。在这种联系中，出现了实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的产生与发展变化当然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地理条件。这点是政治地理学家特别感兴趣的，不仅注意分析其变化与发展受地理条件的制约，同时，也注意其结果的地理格局。

（一）殖民帝国的兴衰

1. 西方殖民帝国兴起的世界背景：第一个实行殖民主义的帝国就是首抵新大陆与开辟新航路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和葡萄牙在过去并不是依靠海上贸易的重要国家，但为什么会转向海洋去探索新航路呢？这就要我们从当时的形势去考察。

在 15 世纪末，在欧亚大陆的国家中，大而具有影响的有中国、印度、波斯、奥斯曼。中国当时正是明朝，它在 15 世纪初，就派郑和七次率领庞大舰队到东南亚，进印度洋，踏上非洲大陆的东岸，但是其目的在于“宣扬威德”，收集“奇珍异宝”，满足心理需求与生活享受，尽管舰队之大，人数之多，技术之精都是历来罕见，但劳民伤财无法持续。令人惊奇的是曾有过如此海上力量的大国，在百年之后，即 16 世纪初，嘉靖年间却受倭寇之侵扰，只好实行“海禁”关门过日子。

在印度，15 世纪末与 16 世纪初，正是德里苏丹垮台，莫卧儿王朝开始之时。莫卧儿王朝是来自中亚的蒙古-突厥族后裔，属草原民族，只控制印度北部，与印度原有的村社制度相结合，是农业经济，无意于海上贸易。波斯萨非王朝虽 16 世纪初刚建立，则夹在东面中亚诸国与西面新兴的奥斯曼帝国之间，难以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帝国，它崛起于 15 世纪中叶，继承了拜占庭的遗产，正在向巴尔干与西亚、北非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又控制着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虽然它具有这种优势的条件与地理区位，但是，也正是这种海陆条件使它受到牵制，特别是陆上的欧、亚、非的对立力量的存在与发展消耗了它的力量，阻碍其发展。在海上，它更无法冲出地中海或红海进入大西洋与印度。

2. 西班牙起落的地缘政治条件：西班牙与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介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正把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逐出半岛，而东、西方贸易由于奥斯曼人控制和垄断，急需开辟新航路以谋求新出路。原来在地中海掌握贸易的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奥斯曼兴起与其矛盾甚大，双方发生冲突。这既影响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收入，又大大消耗其国力，从此一蹶不振。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奥斯曼向西发展，也使威尼斯和热那亚无力去开辟新航路，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天赐良机，而且接受了大批来自这两地的航海人员。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领导人的重视，积极参与和组织，结果发现了新的航路与新大陆。

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分割了东、西方的世界，一个从拉美掠夺了大量的黄金、白银，一个运来整船整船的东方香料，大发横财，其时，发生的另一重要政治事件，促使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殖民大国，影响了整个欧洲与世界。这就是继任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一世，他不但占有西班牙、奥地利、尼德兰、那不勒斯、拉美，而且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其领土之大在欧洲少有。这种政治形势，加上在贸易及对殖民地掠夺带来的经济实力，使其成为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从经济条件看，西班牙手工业相当落后，还是农业为主，掠夺的财富并未给其手工业的发展带来机遇，反而使其衰落。在欧洲领土虽大，但未联成一片，特别是继承了这些领土的同时，也将其领土当时的地缘政治矛盾继承了过来，使其长期陷入矛盾之中。

首先，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查理一世在巴尔干与东欧地区与奥斯曼的冲突，在北非与奥斯曼向西扩展中的陆、海势力的对抗。其次，是在意大利与法国发生的争夺，而这两种势力，尽管存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固有的矛盾，可是在反对西班牙上却结成了联盟，使西班牙深感头疼。第三，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它驱赶伊斯兰教出伊比利亚，并把宗教带向拉丁美洲，自认为是天主教的“卫道者”。在查理皇帝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恰恰又出现了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皇帝出兵镇压以失败告终，承认了宗教改革中出现的新教，容让其存在。但是尼德兰北部出现的新教却得不到西班牙国王查理的容忍，镇压带来了战争，激起了独立运动。第四，尼德兰与西班牙并不相联，中间隔着法国和英国，英、法遂利用其矛盾来削弱西班牙。英、法一方面支持荷兰的独立，另一方面阻挠西班牙的镇压活动。这就迫使西班牙与英国决战，结果西班牙“无敌舰队”于1588年彻底失败。为此，西班牙失去了荷兰，也失去了第一代殖民大国的垄断地位。

3. 地理条件对荷兰发展的制约：荷兰在反对西班牙的统治与宗教迫害中崛起，并成为独立国家。荷兰与西班牙相比，荷兰的国土面积比西班牙的本土还小，更不用说与它的殖民地相比，荷兰虽然面积小，其在地理上的优势在于内部河网交错有利于交通，也有利于防守。在外，其濒临北海，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特别是大群的鲱鱼是其出口重要物产资源。海上捕捞作业训练出了大批优秀的水手、航海人才，为远洋航运、商贸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

另外，荷兰手工业发达，造船技术水平高，加上位于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整个欧洲沿海航运的中心及商业发达的莱茵河口，所以很自然地成为欧洲的航运、商贸、金融、制造等业的枢纽。荷兰位于欧洲的先进地区，海外的发展刺激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国内制造业发展又为海外贸易提供了货物与

刺激，其相互间成正反馈。

在海外，其船队不仅数量在欧洲占绝对优越，而且造船技术好、船体大、速度快，并且装备的火炮性能优良。在国家管理上，成立的是联邦国家，实行半共和半专制的体制，生气勃勃，对海外殖民地由赋予特权的公司处理。强大的船队、优良的火炮、高质量的商品、效率高的组织，不仅取代了西班牙与葡萄牙海上贸易的垄断，而且取代了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中的垄断地位。

但是，形势的发展会使某些地理条件的作用发生变化。荷兰的情况正是如此。西班牙、葡萄牙虽趋衰落，无法与荷兰竞争，可是与荷兰邻近的英、法却随着其国内经济发展，海外船队数量增加，地位逐渐提高，而荷兰的地位不断下降。彼此地位的升降与转换，地理条件起着重要作用。面积上，荷兰比英、法都小，其经济虽发达，人口密度高，但总人口则比英、法少得多。在区位上，法国在其南，相互邻近，与英国隔着不宽的海峡。这种旁有英、法，三者各种关系的发展，对荷兰均产生不利影响，终于导致荷兰的海外事业的衰落。

首先，法国的发展，在陆上对荷兰的威胁越来越大。在荷法战争中，荷兰被迫扩充自己的陆军。法国面积大，人口在 18 世纪中叶有 2 150 万，是荷兰的 11 倍。与法国的战争，对荷兰不仅是财力上的，也是人力上的沉重负担，过多人力投入军队，也就影响国家的制造业的生产与经济收入。而经济实力下降、国家收入减少反过来又影响军力的扩充与增强。

其次，面临这种种困难，荷兰则设法与英国结盟。因为英国在宗教上属新教，与荷兰一致。英国“光荣革命”时，英皇威廉来自荷兰，与荷兰有姻亲关系。加上，法国亦是英国竞争对手，英国有意利用荷兰来削弱法国，故愿与荷兰结盟。在英荷结盟中，英国是具有海上优势的，利用海军压制法国，封锁其沿海，断绝海上贸易与联系。陆上仍然靠荷兰自身对抗。海上封锁法国实际也将法荷之间大量贸易排除。荷兰大力增强陆军，海上力量也就削弱。结果，荷兰仍然感到力不从心，负担太重。

第三，英荷之间亦有海上贸易与对殖民地控制的竞争，并发生冲突与战争。当英荷战争时，荷兰要避免英国对其海上贸易的干扰，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在英吉利海峡碰上英舰，或者从北海绕过苏格兰。即使如此，亦难保证其安全。加上西风影响，英国居上风，舰只行驶方便。荷兰海岸浅，不利于大的船舰活动。总之，在英荷战争上，不论海上贸易还是舰只活动荷兰都处于不利地位。荷兰这种海上区位优势，即使与法国结盟亦难有根本变化。

夹在英法两国之间的荷兰，尽管具有其他方面优势，但在长期与英、法矛盾、战争状态下，一步步衰落下去。就拿英、荷两国主力舰的比看，1689 年分别为 100 与 66，1739 年为 124 与 49，1779 年为 90 与 20。结果，荷兰则在国土小、人口少及区位条件不利等因素影响下退出霸主宝座。不过，其发达的经济在欧洲仍有重要地位。

4. 英、法的地缘政治条件的比较：法国不像荷兰，它是个国土面积大，而且人口众多，在 18 世纪的前半期，是英国两倍，是西欧的第一人口大国；在 18 世纪的后期，其人口是英国的 1.75 倍，居欧洲第二位，仅次于俄国。但是，其地理区位上，南面有西班牙，东面是哈布斯堡帝国和勃兰登堡——普鲁士，北面有西班牙的尼德兰。当西班牙衰落，哈布斯堡帝国受奥斯曼帝国牵制时，法国则不受近邻威胁，可以加强内部建树，加速海上发展，但哈

布斯堡帝国所受的奥斯曼的压力减弱时，又可西顾，于是法国要想在欧洲扩展，就遇到强大的阻力。

法国与荷兰有点类似，既是陆地国家又是海洋国家。在军事战略上，发展海军总受陆军形势牵制，始终是左右摇摆。另外，在地理条件上，法国的沿海地区一部分面向地中海，一部分面向大西洋。海军不得不一分为二。虽然两地舰队可以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相互调动，但终归不便，难以集中对敌。可是，在海军上面对的最强大的敌手是英国。与法国相比，英国情况却不一样，它是个岛国，在军事上始终以海军为主，没有陆军海军孰轻孰重的局面。另外，英国海军力量，只是一面与大陆国家的海军争雄，而且可以方便灵活地集中其力量对敌手进行决战。

在海外殖民地情况上更显得法国海上力量的薄弱。法国殖民地分散在加勒比海、北美、印度沿海，它们无论是与宗主国的联系，还是保卫自身都需要海军。每当与英国作战时，英国就以优势海军封锁法国海岸，使法国与其殖民地的联系中断。在得不到本土的支持下只能各自靠自己力量作战。英国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调动海军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正是以上情况，受地缘政治条件的限制，法国与英国海上争霸则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输给英国。其海外的殖民地，如北美的加拿大的丧失，当法国在印度与英国的争雄时也完全失败。不过，法国仍然是个欧洲大国，其潜力是相当大的，在拿破仑得势之时，横行欧洲，不可一世。所以，尽管法国海上争霸失败和欧洲大陆霸主衰败，它仍是有实力的海陆大国，不像西班牙一蹶不振，荷兰失败后也再难居大国之列，而法国仍然是英国的对手，大陆各列强逐鹿的一员。

从英国来说，利用自己的岛国地理条件，与欧洲大陆相，距较近的区位，以海军为主，既可以阻止欧洲大陆任何国家对其进攻，又可以巩固自己的海上的优势，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地。对欧洲大陆则采取不过多陷入，利用其相互间矛盾，通过参与、支持等方式来牵制、削弱对手维持自己地位。正是上述的地缘条件使英国能在荷兰取代西班牙之后，取代了荷兰，通过与法国竞争，最后战胜法国，并一度登上海上霸主地位。特别是由于工业革命，使英国工业生产大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工业上具有垄断地位，才使其海上霸主地位维持时间比西班牙和荷兰都长。

但是，工业技术的扩散，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出现，改变了过去一个海上霸主取代另一个海上霸主的格局。在欧洲出现了群雄并起，互争雄长的新局面。在非洲的瓜分与亚洲殖民地的争夺上充分反映了这点。

（二）地缘政治条件的差异对殖民地的影响

随着新大陆与新航路的发现，世界开始联成一体，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接触，其对亚、非、拉的最大影响就是沦为殖民地地位。但是，由于亚、非、拉的条件不同，所以形成的殖民地的情况亦有很大差异，这对目前世界的政治地理格局有相当大的影响。

1. 美洲殖民地情况：美洲大陆分南、北美洲。形状上，中间相联部分是中美洲的狭长地带及加勒比海上的西印度群岛。由此往北的北美洲则越北越宽，而向南，亚马孙河所在一带则是南美洲最宽处，然后越向南则越狭窄。由于美洲的农业作物是玉米，主要适宜地区是南、北回归线之间的高原，所以人口集中于墨西哥高原与南美的秘鲁及厄瓜多尔的山地，其次是加勒比海诸岛，其他地区则人烟稀少。

当时，居住于美洲的印第安人文化发展相对比较落后，金属的使用还处在铜器阶段，未有铁器。既无车辆又无牲畜，全部劳动只依靠人力。中美洲的玛雅文字图形十分复杂，只为祭司们掌握，由于失传已久，至今尚未解读出来，南美的印加帝国还处于结绳记事阶段。国家政治组织不是小而分散，就是组织程度不高。

新航路发现后，殖民者大量涌入，原以为是东方的亚洲，可以从那里掠夺到欧洲急需的香料。结果，失望之余转而掠夺其长期积存下来的贵金属。因为这些东西量轻价高，便于运输。殖民者将现存的金银一掠而光以后，就迫使印第安人到矿山劳动。由于奴隶式的奴役、强盗般的掠夺、屠杀，加上欧洲带入的传染病，印第安人缺乏免役力而大量死亡，人口大量减少。除了大量的欧洲移民及与当地印第安人通婚生出的混血人以外，为解决生产上缺乏劳动力问题而输入大量的非洲黑人。这样就造成了美洲的人种的复杂情况，原有的土著印第安人只在原来其文明起源地（墨西哥高原、中美诸国、南美秘鲁、厄瓜多尔等）与混血人占优势。在南、北美洲的中高纬度地区，如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阿根廷、乌拉圭，由于当地原有印第安人本来就不多，而殖民者又采取驱赶屠杀政策，至使留存下来人数甚少，那里白人移民者占绝对优势。黑人的移入是与热带副热带地区的种植园经济发展缺乏劳动力有关，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加勒比海岛屿上黑人占不同程度的优势，而在美国南部及委内瑞拉、巴西亦有相当数量的黑人。

正是由于人口组成发生严重的变化，对美洲殖民地的政治格局产生严重影响。首先，在美洲，印第安人在殖民统治时，在政治上处于最低层。在殖民地革命中，又是白人与土生白人起主导作用，所以，在美洲各国，当权者的上层至今仍然变化不大，基本上是白人占主导地位。其次，由于殖民主义者的情况不同，加上白人数量情况产生的政治情况亦不同。如北美的美国与加拿大，原是英、法的殖民地，后来全部成为英国殖民地，而移民又是清一色的白人。当地殖民制度受英国代议制的影响，革命或独立后，实行议会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结果进入第一世界。特别是美国，其本身原属殖民地，取得独立后，国土只限于大西洋沿岸的 13 州。接着向西部地区殖民开发，得到此优越条件，发展迅速，独立后仅花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即在 19 世纪中期其生产能力已超过英国。在 19 世纪的向外扩张中，也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的拉美，由于受宗主国社会制度影响，庄园经济占主导地位。殖民地独立后，长期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经济上对内是保护庄园制，对外是自由贸易，结果长期依附于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发展道路曲折而进程缓慢，仍属于第三世界。

再有，加勒比海诸岛，种植园发展由大量黑人充当劳动力。在 18 世纪中叶，种植园经济在贸易上的作用，不仅超过殖民者对拉美的金银的掠夺，而且也大大超过欧洲对亚洲的贸易。当时，加勒比海诸岛与欧洲的贸易额约 1400 万英镑，约占欧洲与亚洲、美洲贸易总额的一半。正是其经济地位对欧洲如此重要，在独立过程中只有海地最早取得成功，而其余岛屿的独立则来得最晚。岛上的居民多以黑人占优势。

2. 非洲殖民地情况：非洲大陆与欧洲只是隔地中海相望，所以北非很早就与欧洲的地中海北岸有着紧密联系。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则与欧洲联系甚少，欧洲人对那里亦是一无所知。

非洲大陆海岸比较平直缺乏港湾。从撒哈拉沙漠直到好望角，那里赤道正好横穿，其两边不是热带雨林，就是副热带干旱地区与沙漠。这样的海岸与景观不利于交通与殖民。从内陆流入海洋的大河，往往在河口地区受地形条件制约成急流与瀑布，不利于从沿海通向内陆的交通。更重要的是那里经济不发达，可供贸易的物资不多，当然影响外来的殖民活动。

在地中海南岸地区，原来大多属奥斯曼帝国，为伊斯兰国家，实行军事封建制度，组织水平高。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将阿拉伯势力驱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后，亦只在非洲的西北端占有小块的殖民地，并无力量再向前推进。只是在法国强大了，意大利统一并建立民族国家，以及英国势力进入地中海时，才向奥斯曼的势力范围进攻。这时，一方面英、法、意等国已进入工业化时期，经济发达，军事武器先进，另一方面是北非诸军事封建国家力量衰退，军事武器落后抵挡不住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于是西起摩洛哥东到埃及，先后均成为法、意、英的殖民地。沿地中海的北非，除埃及可溯尼罗河而上进入苏丹外，其余地方都受撒哈拉沙漠所阻无法向南发展。

撒哈拉沙漠以南，在尼日尔河的中、上游地区，原是非洲古文明所在地之一，但在西方列强入侵前已处于衰落。其他地区则多处于部落酋长的发展阶段。在 15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西方列强只是在非洲沿海少数适合地点建立据点，除满足其对亚洲航线的中间商站作用外，大多是作为转运奴隶的据点。对奴隶捕拿是靠沿海的部落酋长与中间人，用武器和小商品作为收购奴隶的交换品。奴隶贸易衰落后，这些据点转变为农产品集运点。这些产品收购与集运亦靠当地的中间人。

在 19 世纪中叶，随着工业垄断资本的发展，列强需要原料基地与产品和投资市场，遂向非洲抢夺殖民地。殖民地抢夺多通过沿海据点，利用欺骗手段获取所谓的“保护权”，宣布占有。大多在对其内地情况并不很熟悉情况下，便划入其殖民范围。除少数地区的王国利用地理条件进行抵抗外，多在其先进武器进攻下成为列强的殖民地。

除北非在降为殖民地时，一些军事封建国家对列强进行有组织抵抗外，南非对英国入侵的抵抗是非常激烈的。不过那里抵抗英国的是荷兰移民的后裔布尔人。这是非洲的唯一一块欧洲人移民所聚居的地点。

与美洲情况相比，非洲落入殖民地地位，除南非布尔人外，仍然保持当地原有居民的优势，即北非的阿拉伯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人。另外，由于列强对非洲的入侵都是从沿海向内地沿交通线行进，特别是在交通困难地区，原来的部族特点与文化仍深深保留着。非洲各殖民地的划分多是根据殖民主义的势力而分割的，所以，其以后的独立则因这份“遗产”而产生很多问题，例如，南非的白人与黑人，尼日利亚内的各部族的分歧。在殖民统治时，推行殖民统治者的宗教、语言和管理制度，这也给非洲留下深刻影响。

总之，由于非洲文化发展程度较美洲印第安人高，加上自然条件，被瓜分的时间晚，不像美洲在殖民统治时完全西化，非洲保留原有社会文化特征比较多。加上殖民统治时边界划分的任意性较大，对非洲的今天政治格局也带来深刻的烙印。

3. 亚洲殖民地情况：亚洲大陆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的主要所在地，各古国都分别位居亚洲大陆的东、南两部的边缘，它们面临的是太平洋与印度洋。在历史文明古国中，中国和印度是主要的，一个分布在太平洋西岸，一个分布在印度洋北岸。东北亚的日本、朝鲜；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緬

甸，马来群岛上的印尼、菲律宾；西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及阿拉伯诸国则在中、印两国的中间及两边。在这文明古国的弧形地带的北面是干旱的草原与沙漠，是游牧民族生息驰骋之地，也是古时的“丝绸之路”所在地。再往北，则是冷而潮湿的泰加地带，加上沼泽大河的阻挡，交通不便，既不适于农业，又不利于牧业是个人烟稀少的封闭地区。亚洲大陆面向的海洋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所在。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中国商人……则航行其间，进行贸易。

西方帝国主义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路的重要动机就是要与东方进行贸易，需要东方的香料与特产。新航路开辟后，虽然欧洲可以通过海上直接与亚洲进行贸易，不再受中东的垄断与限制，但是，从欧洲到亚洲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海上往来需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是相当漫长的航线。加上在印度洋上航行受信风影响，有季节限制。过去船体又小，凭靠风力，尽管船上的火力装置比亚洲的先进，但是路途遥远，军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葡萄牙、荷兰以及早期的英、法都只能在必要地点建立商站和军事据点，无法与政治组织强大的当地政权相对抗，更说不上征服其全境实行殖民统治了。当时的贸易是以掠夺东方的香料为主，其活动的地区集中在印度、马六甲海峡和马来群岛。当时我国明、清政府实行海禁，禁止与外界的贸易往来。

在亚洲大陆的北部，俄罗斯除向欧洲扩张外，也向东方发展，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受到的阻力较小，很快就达到远东的黑龙江畔。由于清王朝的势力当时处于兴盛时期，采取坚决抵抗政策，将其阻止于黑龙江上游，无法到达太平洋岸。

在 18 世纪末，英、法在印度的争夺中，法国失败，英国获得对印度的垄断权。当英国于 19 世纪初控制了整个印度以后，就开始向外扩张，特别是向中国扩张。而于此同时，在亚洲北部的俄罗斯也开始在亚洲进行扩张。这样，英、俄两国分别从亚洲南、北两个方面进行扩张，争夺殖民地。其形成的焦点地区有中国、中亚和西亚。

在中国，英国在鸦片战争打败清王朝以后，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长江流域。而俄国则从北面蚕食中国领土，获得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伊犁河下游大片领土，并企图攫取中国东北、蒙古、新疆。为了阻挡沙俄的扩张，英国利用日本与之对抗，遂使日本利用机会，打败中、俄占据朝鲜和中国的台湾，进入我国东北南部。另一方面，德、法势力增强，乘英国无暇顾及之时，分别进入中国山东与西南。虽然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但是，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民众反侵略力量的强大，避免了被瓜分及被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地位。

在中亚、西亚，英俄的争夺随着欧洲形势的变化，彼此以划分势力范围而予以妥协。在中南半岛，英、法也以泰国作为缓冲国以结束其对立状态。荷兰保持了对印尼的统治，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以上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形成的殖民地的格局。

总之，亚洲由于距帝国主义的西欧比较遥远，沦为殖民地的时间也最晚。亚洲固有的文化基础比较深厚，所受殖民统治时间，从总的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在独立以后，走上发展道路也最快。在亚洲，日本由于处于欧洲侵入亚洲路线的末端，位于印度、中国之后，当列强在分割衰落的清王朝时，却乘机改革，走向富强，避免了像亚洲其他国家那样落入殖民地的厄运，但它却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加入西方阵营侵略邻邦，攻占东南亚，给亚洲人民带来

严重损害。这种侵略战争所形成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损失，仍然是今天日本与亚洲有关国家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创伤。

第八章 地缘政治学各家学说

政治地理学所研究的空间政治现象分三个尺度，即国家的内部的区域或地方的政治格局与关系，国家的政治地理特点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格局与相互关系。在第二章至第六章，我们分别从国家的起源、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空间特征和综合国力与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政党、选举地理来阐述国家级与国家以下的区域级的基本特征与空间结构。第六章是介绍各家的关于国家的政治地理理论。以下四章则是阐述国家级以上的国家间的政治地理。地缘政治学是其特征的规律性阐述与理论概括。由于国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随着政治、经济、社会 and 军事等实力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其空间的格局亦有所不同，故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有时，由于角度与侧重点的不同，同一时期，有不同的地缘政治论说。另外，地缘政治学虽然是根据客观实际进行理论概括，但是由于人的思想观点、哲学思维、阶级立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不同，地缘政治学的论说亦受其影响。因此，各家论说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甚至，有的走上邪路，滑到为本国的侵略扩张服务的道路上去。为了先掌握些有关国际关系的背景知识，故本章放在第七章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之后。对第九、十两章来说，则是先学些规律性概述，为深入了解这两章打下基础。

一、地缘政治学概念及其复兴

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k) 一词是在德国哥德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基伦 (Rudolf Kjellen, 瑞典) 在其所著的《生存形态的国家》(1916年) 一书中提出的。他吸收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并进一步发挥，建立了用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当时，这一术语并未引起学术界与社会的注意。

后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于 1924 年在《地缘政治学杂志》发表大量的地缘政治文章，并为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扩张制造理论依据和提供宣传工具。这不仅使地缘政治学突然之间为世人所知，同时也使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的地缘政治学受到玷污，不仅其本身受到学术界的非议、社会的指责，几致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地步，而且亦使政治地理学受到牵连，较长时期遭受冷遇。直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势的变化，地缘政治学又重新在学术界出现，而且在一些政治、外交的头面人物的言论中不断出现，特别是 80 年代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外交家言论与文章中经常使用，已成为流行的政治词汇，这对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上述这种曲折的历史与过程，对地缘政治学一词理解亦有不同。例如，对 Geopolitik 与 Geopolitics 两词的说明。在 1994 年英国出版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对两词的说明就有差异。对 Geopolitik 的解释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政治地理学中的派别。该词源于瑞典学者基伦，他使用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和麦金德“心脏地带”概念形成其地缘政治思想，为德国的扩张主义的合理性提供荒谬的理论基础。对于 Geopolitics 一词，词典中称这是地理研究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领域，它在说明国际关系结构中强调空间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它与 Geopolitik 不应混淆。在我国翻译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著的《二十世纪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为区别这二字不同含义，将 Geopolitik 译为地缘政治学，把 Geopolitics 译为地理政治学。

其实，这两个字从渊源上讲，前者是来自德语，后者是前者英语译词，是同义的。只是其历史原因，产生上述情况，为避过去之嫌，而采用两词含

不同之意。在我国采用两种汉语译词值得商榷。一来增加名词混乱；二来地缘政治学一词已有较早历史，而目前国内、外报章杂志已普遍使用，另用新词反而造成不便，误以为不同学科；三来同一学科的不同流派很少使用不同学科名称。近来，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地理学》是英国学者泰勒（Peter J. Taylor）所著，该书对前者加上“德国”称为德国地缘政治学（German geopolitics），以此表示其一定时间内德国的一种地缘政治学派。看来，其处理办法较为合理，比分为两个术语要好。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认为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从全球的空间背景上来观察其政治的格局及各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这种从全球的地理空间尺度上，从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的总体上，来研究各主要国家间或各集团之间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与格局的地缘政治学，简言之，即是全球的地缘战略学。在研究中，虽然对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分别加以考察，但这是为保证达到对整体的清晰认识；对单个国家看作是一块块的砖石，但对其探讨的问题却正是这些砖石所形成的格局和结构。虽然其研究的主题和资料大量取自社会科学，但其使用的方法论与最终成果却是空间性的，地理的。

英国的著名政治地理学家 P. J. 泰勒指出，地缘政治学在西方的复兴有三种显著的表现。首先，地缘政治学已成为表达全球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这种现象的形成，在西方得力于像美国的总统尼克松、布什和担任过国务卿的基辛格及作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等政界头面人物，他们不仅在语言中、著作中使用该词汇，而且通过当前国际上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战略关系表达其地缘政治的思维和见解。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地缘政治这个术语已摆脱过去那种贬义地位，成为表述世界战略形势与关系的简明概念之词和流行术语。

其次，在学术界，地缘政治学已不再是荒凉、寂寞和无人问津的领域，而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这种现象特别是在东欧剧变、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波黑战争等一连串国际重大事件与变动形势下，向政治地理学提出的诸多课题与研究领域。大学里，政治地理课也不是一门可有可无的课程，而是颇吸引人的学科，而物色合格的政治地理教员却成了难题。同时，从 80 年代以来政治地理方面著作有明显增加，特别是英国学者泰勒所写的《政治地理学》，从 1985 年到 1993 年已出了三版。由于其突破传统政治地理学的框架与结构，颇多创新，成为流行的地理著作与教材。另外，对 30 年代的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也能给予客观的分析与评价。

关于地缘政治学复兴第三个标志是，欧美大国的政党、议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与集团对影响自己国家利益的各种国际事件、变革和关系、格局十分敏感。其间并夹杂着彼此的政治利害关系，外交政策已成为竞选纲领的重要内容和非难对方的问题，甚至报刊辩论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当前，政治、经济、环境、资源、和平等问题已息息相关，并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地缘政治当然引起各国领导阶层、政治集团、学术界、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心。

地缘政治学的出现，如果从这一名词的出现起到现在还不足 100 年，如果从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出现起，也只刚刚超过百年，时间并不太长。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地缘政治的学说与理论亦有所发展，根据时间的发展与理论特点，大体可以分成以下三类：“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

心脏地带（即大陆腹地）与边缘地区学说，分裂的世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

二、“国家有机体”论与海权论

（一）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

拉采尔关于国家空间增长的七条规律已作为国家的政治地理的理论加以介绍。其关于“国家有机体”论，实际是该论的总的概括，严格来说它是属于国家级的理论，而不是国际级的理论。但是，考虑到它后来成为德国扩展主义地缘政治学一个理论依据，所以，有必要进一步加以介绍与评述。

在地理学中，研究国家的政治地理现象时，一些学者早就注意一些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例如，14世纪时，阿拉伯的地理学家伊本-卡尔敦（Ibn—Khalidun，1332—1406年）就提出这方面的见解。

当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年）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对科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对生物的进化论的解说，对统治了人们思想上千年的上帝造物的宗教神说以彻底地冲击，对环境与生物的关系给予科学地解说，其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已成为生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思想对社会科学亦产生很大影响。当时，社会科学界多接受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并把它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生物的进化。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H.斯宾塞等人。他们认为，社会机体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人类社会的变化过程也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法则支配。因此，生物进化的规律也就是社会历史永恒的自然规律。由此出发，他们认为，在社会中、个体之间、群体、种族或民族之间当然存在着合乎自然的，必然的适应和淘汰过程。人类社会内的不平等、不同阶级的存在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这种思想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这种思潮流行于一时，但是，进入20世纪后，则开始走向衰落。由于拉采尔本人受到生物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他在其著作中，特别是1896年完成的《政治地理学》著作中，采用生物进化的理论，应用与生物的类比方法来研究政治地理问题，把国家比作有生命的有机体，从而形成其“国家有机体”论。

除去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外，拉采尔还受德国先前一些地理大师们的思想影响。自康德以后，地理学总是与哲学有着密切关系。在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对人类作用方面，康德一直特别感兴趣。另外，康德虽然把地理学当成与时间科学的历史学相对而存在的空间科学，但是他又把历史看成是一种延续的地理过程。这种整体论的思想与见解在德国地理界深有影响。19世纪，洪堡和李特尔两位地理大师亦坚持地理的整体论。洪堡从变化无穷的自然景观来认识其中各要素的总体相互关系。李特尔认为，有机体的统一就像一个整体一样，由它自己的规律来支配。

正是在上述两种思想的影响下，拉采尔也主张地球是一个整体，而人类只是它的主要部分。人类所以能成功，在其中生长和存在，正是因为人类也像生物的分布产生的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一样，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因此，拉采尔在其1897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中认为，国家像生物一样，是一种生物有机组织形式，其社会行为遵循生物规律。国家也像生物一样，有一种

相当于头脑的组织在操纵着自身活动。它与人的个体并不一样，是通过国家的某种组织的命令规则而运转以保证其功能的实现。拉采尔还认为，国家是有机体演变的产物，它像一棵大树一样，深深地扎根于土壤。所以，一个国家的特征必然深受其所提供生存环境的国家领土性质和所在区位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成就的重要条件就是对其所在环境条件的适应程度。同时，他认为国家有机体的生存和运行依赖于它所在环境，则如生物一样，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因此，“国家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理论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因此，拉采尔认为，健全的空间有机体——国家——通过其领土扩张而增强力量是必然的。

在国家存在的过程中，拉采尔也借用生物的生长、斗争、演变和衰亡概念于国家，藉以表述其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他把政治地理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国家既然是依赖于土地来承载的有机体，同时也产生对土地的精神寄托，故区位赋予国家所占据的空间似独有的特性，因此，空间既影响着，又依赖着占有它的人群的政治特征。

从世界情况来看，拉采尔认为，民族需要“大空间”以及有效利用大空间的能力。从美国的发展看，拉采尔感到，欧洲空间太小，在世界政治上将降到一个次要地位。历史将由占有大陆区域的大国，如美国、欧亚的俄国、澳大利亚，南美的大国所控制。但是，在大空间中，不仅有利的大空间与区位的不利条件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人口的数量、质量以及资源条件方面的差别都影响对大空间的利用。

拉采尔的这种观点不仅影响德国的地理界，而且还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其学生森普尔(E.C.Semple)1911年在美国出版了《地理环境之影响》一书，介绍拉氏的理论。

拉采尔这种“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在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落也受到学术界的批评。由于没有区别出作为生物的人及其组成的社会，虽然其发展和变化受环境条件的一定制约，但是作为社会文化的国家有其自身发展的社会规律，并不能等同于生物规律，更不属于自然规律。结果，拉采尔成为地理学中的环境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当然，并不能以此完全抹杀其在地理学与政治地理学发展上的贡献。

关于“国家有机体”学说，本质上的比拟是错误的。虽然在形象方面反映了过去王朝的兴衰、国家的兴亡。特别是近代以前，大多数国家之间还缺乏明确的边界，而只是变动不定的一条带状的边疆时，国家的控制的范围与其实际力量的强弱有密切关系。所以，国家的领土、国家之间的接触地带是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映国家力量与领土大小、边疆变动之间关系的“国家有机体”说尚有几分道理。但是，随着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签订以后，主权国家出现，领土边界相对稳定，领土的变动不再是个个人口增长、文化扩张的自然过程，而在通过战争等手段强制方式予以实现的时代，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生存空间”，以及把政治地理学当作自然科学的论说的科学价值就受到了损害。虽然拉采尔坚持了科学的严谨，强调自己的见解仅仅基于生物学的类比，只是考虑人类和周围环境两个方面的关系，也没有完全接受自然淘汰的观念，只是一个观察者，并没有推断任何政策，可是自己的学说却为他人利用，作为进行侵略的借口。

(二) 马汉的海权论

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年) 是美国的海军军官、历史学家。他在海军服役达 40 年, 在海军学院长期讲授海军史和海军战术课, 并两度担任海军学院院长, 写了大量的海军方面著作, 其中著名的《海军战略》(1911 年) 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1902 年, 他还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在本世纪初的第 26 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职时, 马汉得到信任与重用, 对美国海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而使美国海军力量跃居当时的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英国。

马汉的海权思想来源于历史。当其于 1883 年研读《罗马史》, 特别是当他研究迦太基与罗马战争时, 名将汉尼拔入侵罗马使其突然产生一种设想, 他反问自己, 假如汉尼拔改从海上入侵意大利半岛结果又将如何呢? 经过其深思熟虑, 深感控制海洋的重要, 遂下决心对海洋战争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对海战历史, 特别是通过对英国海军的发展史及其对海上霸权的形成的历史的研究, 不仅写出大量的著作, 而且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海权理论与思想。

马汉从深入研究 17 至 18 世纪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历史中看到,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个历史阶段中, 为提供本国工业发展所需资源与市场, 大肆推行殖民政策, 疯狂掠夺殖民地, 称霸海洋的过程, 给马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 马汉首先提出了以“制海权”理论来解释历史, 以此为中心论点, 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 年) 一书, 集中了马汉的海权理论。马汉写作的时代背景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进入最后一个高潮, 美国正在向世界大国地位上升, 他的思想适合了美洲帝国主义海外开放政策的战略需要。

马汉海权战略思想的核心是: 海上力量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马汉认为, 任何一个国家或联盟, 如果充分控制公海, 就能控制世界的贸易和财富, 从而控制全世界。物质财富是国家强大、幸福的基础, 而为了积累财富, 一个国家就必须生产和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由于地球表面的大陆被海洋所包围, 并且海洋运输比陆地运输廉价便捷, 因而海洋是自然赐予的伟大公路。富有进取性的国家必须依靠海洋来获得海外的原料、市场和基地。所以, 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 必须能在海洋上自由行动, 并在必要时阻止海上自由贸易竞争。为此须有一支在国内外拥有作战基地, 并有庞大商船队辅助保障的、装备精良而训练有素的海军。

马汉分析了海运与海军历史, 尤其是英国势力在全球的扩展, 得出了制海权的结论, 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 对于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马汉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 即英帝国的兴起与其成为海军强国同时发生。大英帝国把世界的主要海路变成了它的国内交通线。英国控制了世界上除巴拿马运河以外的所有主要航道、狭窄海域或咽喉要道, 即那些可以从两岸容易控制船只进入或通过的狭窄水域: 多佛尔, 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好望角、马六甲海峡, 苏伊士运河和圣劳伦斯河的入海口。北欧的商船或穿过英国大炮把守的多佛尔海峡, 或绕苏格兰北端而行, 那里有英国海军守卫着。在地理上, 英国和美国比德国和俄国享有更大的入海自由。海上运动比陆地便利, 而且大陆块都被海洋所包围。有进入海洋之便的国家较之内陆国家有更多获得大国地位的地缘潜力。岛国比与他国接壤的大陆国家处于优势的航海地位。海洋国家结成联盟, 多半是为了进行商贸, 而不是为了军事、政治侵略。

据马汉的分析, 海上力量对于国家实力与繁荣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获得这种地位的能力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陆地形状、领土范围、人口、民族性

格和政府政策六个条件。例如，英国和日本四面环水，若想成为大国就必须保持大规模的海军。这是因为对于海岸线长的国家来说，海洋就是疆域，对外国造成什么样的态势取决于它在海外的能力，英国的地理位置偏离欧陆背靠海洋，有助于其扩充军力，既适合出击潜在的对手，也易抵御入侵之敌。在 1890 年以前，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力量尚未兴起，英国的海上力量称霸海洋。英国海上力量集中在北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从而控制了欧洲列强的世界贸易。

马汉还以英国为例，分析了一个国家要取得海洋大国地位的上述六条件。首先，是地理位置适中，靠近海上交通要道并拥有良好港口和基地。英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必担心陆上的威胁，而把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海军。相比之下，一面临海的荷兰和两面临海的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必须经常维持一支强大的常备陆军，从而消耗了国家的军备财力。另外，英国距欧洲大陆也恰到好处，既可打击大陆的敌人，或威胁北欧经英吉利海峡的航线，又可免于受它们的侵犯，当时英国控制了全球除巴拿马运河以外几乎所有的战略性岛屿、港口和海峡，获得了海上霸权。其次，是陆地结构合理，尤其是海岸线的性质和海岸地貌的状况。马汉认为，凡是疆界便于与外界接触的国家，其人民较易向外发展并与外界交往，如英国与荷兰，两国天然条件并不优厚，土壤贫瘠，气候不适宜于一般农业，但两国人民几乎完全以海为生，向海洋求发展，结果成为走向海权国家的推动力。第三，是疆域的大小。这里面存在一个人口、资源与国土面积须成比例的问题，否则国土大反而防御密度低，国家危险性增高。第四，人口较多，拥有相当多的从事海上职业的人口。第五，是民族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海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致力于发展航海事业，推行海洋战略并建立海上强权的。第六，是政府意向，即国家是否有利用上述条件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和政策。

关于海军战略，马汉总结出四要素。第一是集中和达到集中的方法；第二是中心线或中心位置；第三是由中心位置所表现出的内线运动；第四是海上交通对于军事供应与胜利的关系。马汉在《海军战略》一书中反复论述这四个要素的重要性。他认为，“集中的方法是海军战略的入门”；“威力的方程式是力量加位置”，占据中心位置就便于舰队实施内线机动，赶在敌方舰队之前展开于有利海区，海上交通线是支持海上作战舰艇的生命线，能否保持稳定的交通运输，对海战胜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海上的决战工具是战斗舰队。马汉认为，如能一战而击毁敌方战斗舰队，则制海权的获得则为自然的结果。他从英、法两国海军发展中，了解其战略思想上的差异。英国是以求战来争夺制海权的，法国则以避免会战以保存实力。结果是法国失败而丧失大量海外殖民地，英国则称霸海上，成为“日不落之国”。马汉认为，法国战略固然与其海军处于劣势有关，但其欲保存实力的策略处于被动地位亦有不当之处。

马汉提出海权理论旨在从地缘战略角度，说服美国政府发展海上力量，他认为美国在战略上居于中央的地理位置，面对两大洋，远离欧亚大陆，拥有安全的工业基础并足以威胁欧亚海岸，具备了发展海上力量的地理条件。因此，美国若想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成世界性强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当时曾任海军部副部长、后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十分赞赏马汉的海权战略理论，聘请他任总统海军顾问。马汉使美国致力于开凿巴拿马运河，开拓夏威夷等海外殖民地，建立了远洋海军，使美国开始突破“孤立主义”政策，

成为跨越新旧大陆的世界强国。

从马汉提出海权地理战略的理论至今，已经一个世纪，科技进步使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发达的铁路、公路运输使陆军机动性大大增强，海权国家陆上基地的安全受到威胁，特别是二战以来潜艇、飞机的使用，更使岛国传统的安全观念产生了动摇，海军作战也越来越需要依赖空中保障。这些变化使马汉海权战略的世界观点影响相对减弱。此外，马汉的理论忽略了旧大陆地理和陆权的重要性。尽管如此，马汉海权理论的历史贡献深远。马汉的理论后来虽然被作了某些修改，但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其基本思想仍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随着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开发和核动力水面舰只续航能力的增强，其理论的影响回升，并重新受到海洋大国的重视，对一些国家的战略决策起着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承认，自己曾是马汉的“热心学生与信奉者”。他早年曾钻研过马汉的海权理论，并曾是美国地理协会理事。他深信，了解地理学对世界事务有重要作用，竭力克制美国潜伏的孤立主义。二战伊始，他先后提出了从“租借计划”、“大西洋宪章”到“北大西洋三角”的军政方略，证明了马汉海权论对他的影响是何等重要。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8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宣布了其必须控制的16条世界海上航道的咽喉地段。这些事例从侧面体现了马汉海权论的影响。

马汉的世界观点使他的著作对地缘政治学家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世界观点集中体现在他的《亚洲问题》（1900年）一书中，它是一种欧亚中心论的观点。马汉认为，北半球的大陆是获得世界实力的关键。其南部以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为界，这里的商业和政治活动最为活跃。在北半球最重要的部分欧亚大陆内部，俄国占有统治欧亚大陆的地位，很难被外界攻破。不过，马汉指出，这种内陆封闭的地理条件利弊并存。他还提出，亚洲在北纬30度至40度纬线之间的地带，将是陆上大国俄国与海上大国英国冲突的地带。最后他预言，由于海上运动对陆上运动固有的优势，英美联盟可以从围绕欧亚大陆的关键的陆上基地保持对世界的控制权。马汉甚至曾预言，有朝一日，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将形成联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据此看来，马汉实际上早于麦金德就持有一种“世界岛”的观点，但他的海权论的地缘战略结论却与麦金德相反。

马汉的海权地缘战略思想在德国、英国与日本都有深刻的影响。

（三）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和德国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是瑞典政治学家R.基伦（1846—1922年）提出的。他是瑞典国会议员，在乌普萨拉大学任教。他完全接受拉采尔引入政治地理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国家组织与人体的器官特性相比较：决策的中心城市首都是大脑，交通是人体的动脉，武装是为防御，自然资源是为供生长所需之粮食。充分具备上述条件的国家就有能力最成功地控制它国。

在1916年，基伦发表其“国家有机体”说。他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表述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国家是国土、版图、领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领域的具体地域。”这一国家有机体从事争取生存和空间而持续斗争。唯有适者才能生存和成功。他还把国家看成是一种人格化的具有感觉和理性的生物，有出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空间被视为是成功的关键，所以，“生气勃勃而空间有限的国家遵守以殖民、兼并和征服手段来扩张其空间的绝对政治法则。”基伦还在其著作中阐述其国

家五器官构成理论：政府构成，人口构成，社会构成，经济构成和地理环境构成。

基伦还引入了人口质量，组成国家主体民族等方面内容以及道义能力、意志力，逐渐累积的国家心理力量，国家的强大是一个动态的心理的概念。基伦还认为，国家处在与它国经常竞争之下，大国扩大其势力以控制小国，世界终将只有几个巨大而强盛的国家。

从上述分析，基伦看到欧洲各国的竞争，特别是东方俄国的扩张主义倾向，使中欧处于不利地位。其祖国瑞典亦处于危险之中。解救这一危险，不仅瑞典无能为力，而且北欧斯堪的纳维亚集团亦难以扭转这一趋势，唯一办法就是德国能成为未来日耳曼——北欧组织的中心，这样就会牢固地控制欧洲中心的力量。

他认为，德国要担负其欧洲中心的力量角色，就应当采用一个扩大的中央欧洲帝国的形式，它就要包括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成立以柏林-巴格达铁路作为它内部轴心的大邦联。同时，他也看到这个欧洲中心的力量是海洋世界化身的英国传统观念——只许有一个主人而不是多个主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号召德国应反对这个观念，并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新权力中心。

当一战使德国陷入困境的 1917 年之时，基伦的著作及所提出的地缘政治一词由于译成德文在莱比锡出版而传入德国。基伦当时所用的“经济独立自主”（Autarky）一词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泛区理论产生起了作用。一战结束后，基伦的著作中的思想被德国一些政治学家、地理学家及民族学家所接受。卡尔·豪斯浩弗是其突出代表。他们使新的自然进化论的权威满足旧德国政治哲学的需要，使之成为德国恢复为世界强国地位的喻世箴言。这套东西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具有同样政治狂热与扩张野心的意大利和日本受到膜拜。

这时的地缘政治学还注意于国家的成长与海上霸权的追求。这也可能反映了当时从西班牙经荷兰到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和替代，并刺激美国对其追求。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产生的“国家有机体”论，不仅反映了原来破碎分裂的中欧终于经普鲁士的统一运动而成为中欧的新兴的国家，而且有机体的竞争与扩大，也为其追求大国及与英国争雄提供刺激。

三、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

这里讲述的包括：英国的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美国的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以及德国的以豪斯浩弗为首的地缘政治学。后者为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它以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为核心，并结合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形成德国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学，而且其发展恰好介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出现之间，故于此讲述。

（一）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J. Mackinder, 1861—1947 年）是在牛津大学首开地理课程的英国政治地理学家，曾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驻南俄高级专员、英国国会议员、英国航运委主席、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主席、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等多种职务。

麦金德是 19 世纪向 20 世纪转变时代的人。在 19 世纪末，英国开始从工

业经济顶峰下降，遇到了德国和美国的挑战，其实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遇到困难。在欧亚大陆上遇到帝俄的力量；在海外殖民地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又与德、法发生争夺；对英国来说，其长期的海洋霸主地位又受到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种形势促使麦金德思想发生变化。麦金德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党的领导成员，但是，形势的变化，促使麦金德约于1903年改变其观点，转向保守党。此时，麦金德不再确信，伦敦的单纯的商贸资本积累能应付德国重工业生产力大规模增长的挑战。他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主张“关税改革”，利用这种办法来保护英国的工业所面对德国的挑战。

另外，麦金德思想上注意全球战略，把地理因素与国际政治和战略结合起来思考欧亚形势，是受以下三件事的影响。第一是，20世纪初，德国海军元帅蒂尔皮茨（Van Tirpitz）扩建德国远洋舰队的行动。蒂氏从1898年到1900年两次提出，建立德国规模更大，更现代化的远洋舰队，对英国造成很大威胁。第二是，英国在南非对布尔人的战争（1899—1902年）。第三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这些陆地与海洋国家间的竞争与战斗使其试图从更广阔的地理背景，更长久的历史视野，以某种程度的完整性来阐明和概括其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于1904年初在地理学会上宣读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这是他的第一篇关于“心脏地带”地缘政治思想的文章。

麦金德对影响世界的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作了分析。在该陆块的中心，虽然点缀着一块块沙漠，整个来说则是个草原地带，是个内陆水系。其北面是广阔的森林与沼泽，气候寒冷不宜农业。总体来说，这里地势低平，没有山岭阻隔。这里就是麦金德在其文中所称的枢纽区域。在枢纽区的北面是冰封的北冰洋。其他三面则被一系列山岭、高原、盆地所组成的或宽或窄的地带所包围。在围绕枢纽的环形地区，即内新月形地区。其面向东面和南面的季风地带，一个是面向太平洋的佛教领域，一个是面向印度洋的婆罗门教领域。西面是受西风带影响的欧洲，是基督教领域。其西南的缺水干旱的中东地区，是绿洲、沙漠、草原相间，为欧亚水陆交通的关键地区，为

图 8-1 历史的地理枢纽

（引自：麦金德 HJ. 历史的地理枢纽. 伦敦：1994）

伊斯兰教领域。在内新月形地区以外，麦金德称为外新月形地区，它包括欧亚大陆边缘的英国、日本及其他诸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大洋洲和南、北美洲。

在历史上，从枢纽地区出发的草原游牧民族则多次严重威胁其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3世纪兴起的蒙古人。他们西进直达东欧，并在俄南草原建立金帐汗国；向西南，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建立伊勒汗国；向南入主中国中原，建立元朝。当时，欧亚大陆大片地区，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不是在蒙古王朝统治下，就是其属国。

在欧洲，东欧与枢纽地区相毗邻的是平坦的地区，有两条道路可以由东进入欧洲中部。这就是喀尔巴阡山北面的波兰平原与喀尔巴阡山南面的多瑙河谷地。通过这两条道路进入欧洲的游牧民族有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这些人从中亚经乌拉尔与里海之间隘口而来。另外，欧洲还受到从中亚来的突厥人，他们经小亚细亚进入东南欧也对欧洲造成威胁。

产生草原民族向外出征的原因在于，他们利用了马与骆驼所带来的机动性的优势。欧洲在历史上多次遭到这些骑马民族的入侵。正是在这种外来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形成了一个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才实现欧洲的文明。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出：“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亚洲和亚洲人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这是哥伦布以前时代的情况。

在哥伦布时代，西方利用海洋的机动性，突破欧洲范围，发现通过好望角达到印度及远东的中国，通过舰队不仅建立了制海权，还在欧亚大陆内新月形地区和外新月形地区建立大片殖民地。实际上，可以说是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枢纽区。在与西方向海洋发展的同时，俄罗斯组织起哥萨克人，沿北部森林边缘穿过西伯利亚直向亚洲东部，从而管辖了草原区。这两种力量的发展抵消了枢纽地区游牧民族所在中心位置的战略优势。这就是哥伦布时代欧亚两洲的战略形势的变化。

从20世纪开端的，麦金德所说的哥伦布以后时代，蒸汽机车的发明，铁路修建，特别是横贯大陆的铁路改变了陆上强国的状况。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在政治上，现在的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其所占地区是欧亚大陆上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麦金德问道：这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地区吗？它对芬兰，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压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冲击。

针对这种形势，麦金德的结论是：“在全世界，它（指枢纽国家）占领了原由德国掌握的欧洲的中心战略地位。除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出击，也能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它的现代铁路机动性的充分发展，只是一个时间而已。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的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而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国与俄国结盟，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面对这一可能出现的形势，作为海上强国的英国如何采取对策呢？麦金德在该文中提到：“这样一种事态的威胁，必将推动法国与海上强国联盟，于是法国、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鲜就会成为这么多的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来支持陆上部队，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

关于其对枢纽地区的战略分析，及其对策的地缘政治研究，麦金德说：“我是以一个地理学家的身分来讲这番话的。在任何特定时间里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当然一方面是地理条件——既有经济的又有战略的，另一方面也是对抗双方国民的相对数量，活力、装备和组织的乘积”。“在计算时，地理的数量比起人文的数量来可以更好地测定，更接近于稳定不变。”

麦金德的这篇论文反映了其对大英帝国的忧虑。早在1890年麦金德就已推断，“地理上的优势平衡很可能已经向不利于英国的位置倾斜，而她只是靠惯性力来维持自己的位置罢了。”这些是对不列颠领导大声疾呼：该是起来对抗这一即将来临的危险的时候了。为了海上国家利益，要和充当陆上桥头堡的法国联合起来，并要力促德国放弃参与枢纽地区政策的任何企图。所以，该论文是其时代的一种反映。

在学术上、麦金德这篇地缘政治学作品主要贡献在于，他是全球战略观念，将时空结合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世界形势的第一人，把地理学变成国际政策与战略的重要辅佐的开创者。他的陆权可以迂回海权，甚至战胜海权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不是什么奇特之论，但在海权全盛时期却曾使西方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不能不为之一震。他在该文中的两个主要战略观点至今仍有影响。一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另一是认为俄国的扩张与收缩对世界有极重要关系。当然，麦金德的地缘政治思想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由他维护英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科技发展的条件等原因所决定的。

一战的结局是德国的彻底失败和俄国的革命。当时，英国与法国结盟，陆地上有西线与德军激战，海上靠舰队实施封锁，并在美国参战情况下取得胜利。正当 1919 年在巴黎举行解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时，麦金德发表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该文是他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提出“枢纽地区”概念 15 年后对此地区战略意义的新认识。

根据一战的实际与俄国革命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其看到东欧的重心已从彼得堡转移到柏林。在战争中，德军已进入濒临俄国的波罗的海东岸至南面乌克兰临接的亚速海、黑海一线，因而德国有可能东进并取代俄国而为该地的强国。尽管德国处于战败国地位，但是以柏林为核心的普鲁士组织机构，已成为德意志国家的基础。普鲁士传统的力量已占上风，它将把德意志民族引向军国主义道路。从地缘政治出发，枢纽地区不管在哪个国家控制下，它也会像俄国人那样在同样地理制约下运转。在战争中，海洋大国虽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英国的衰落，德、俄肯定会恢复，他们会一起或单独对海上诸国再次构成威胁。麦金德并不被一战中，海权与陆权国家战斗中，陆权失败、海权胜利，证实马汉的海权论的乐观态度所影响，仍然坚持其陆权优势的信念。他抱着其一直存在的忧心，写出其新作，目的是使有关国家的领导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他修改了原来的枢纽地区的范围。他根据对海洋大国进入能力的重新评价，把枢纽地区的范围向西扩大。在名称上他使用“心脏地带”(heartland)代替原来“枢纽地区”(pivot-area)。同时，他将“心脏地带”与东欧的地缘政治意义归纳为三句名言：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
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其中，世界岛是指欧、亚、非三大洲。由于其连成一体，从世界整体看，只是一个大岛而已，所以称为世界岛。东欧是俄国从心脏地带进入中欧、德国进入心脏地带的通道，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东欧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处于中欧大国与俄罗斯影响之下。巴黎和会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分别成立许多新国家。如要确保这些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不为占据“心脏地带”国家用作向外扩张的通道，就需要设法阻止这种地缘政治趋势的出现。

一战后，在巴黎和会上，对世界形势的对策的两种倾向十分明显。美国代表的是极端的理想主义，而法国所持的则是极端的现实主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宣布的“十四点”纲领，并且通过国际联盟的国际组织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而法国则主张制定一个保持德国持续软弱而求得法国的永久

安全的政策。在英国，既存在理想主义，又存在现实主义，如何使二者统一起来？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德写出其题为《民主理想与现实》一文。他的想法是，首先英国必须与美国和其他海上国家结盟，来寻求保持英国的优势，其次，东欧小国通过联盟给予某种集体均势力量来阻止大国的野心。麦金德的文章及其名言的警句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胜利就在于不受这种唯宿命论的左右”。

二战的爆发，德、意法西斯结盟，横扫西欧，征战北非之后又挥师东进入侵苏联。英国与美、苏结盟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的现实，使年已 82 岁的麦金德于 1943 年发表其《周围的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他看到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首次由一支庞大精锐的驻军守卫。而且两次大战中，都是心脏地带国家与海上强国结盟的事实，他因此对其原理论作了修改。他看到“一个聚集在北极地区附近的环形地带”，是由陆中大洋（即北大西洋）与心脏地带组成。这个从美国的密苏里州到苏联的叶尼塞河的广大地域，形成地缘政治上的大地支撑点。他称此为他的“第二地理概念”。它是北半球的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联盟的结果。要维护和平就必须有持久的联盟。不过，战后的冷战局面使麦金德的设想失去其光辉。尽管战后的国际形势走向冷战，但是其对地缘政治所形成的时空现象统一的整体观，心脏地带的天然堡垒概念作为其重要遗产而保存下来。

（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

美国长期在门罗主义影响下，不大介入欧洲诸国的事务。但是，一战的现实使其不得不参与战斗。在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对参与国际事务持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仍然占上风，参议院既拒绝批准威尔逊已签了字的和约，又不批准参加美国建议所组织的国际联盟。二战的形势发展，威胁到美国在世界范围的根本利益，美国遂参加了大战。正是这种形势的需要与 30 年代欧洲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盛行，使美国出现一批地缘政治学家，开展了地缘政治研究。其中斯皮克曼所提出的“边缘地区”学说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对现实亦起着重要作用。

斯皮克曼教授是美国 40 年代初的著名地缘政治学家。当时，正值二战时期，美国亦刚刚参战，战争吸引了全体美国人的关心。斯皮克曼除了发表著作以外，还作了大量的讲演。不幸，在战争还未结束的 1943 年 6 月病故，未来得及将其形成的地缘政治思想写成专著。但是，他的同事们根据斯皮克曼教授生前的著作与讲演稿进行整理编写成《和平地理学》一书，于 1944 年出版。

由于当时地缘政治学中，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十分流行、影响很大，可是斯皮克曼却提出与心脏地带理论相反的理论，即边缘地区学说，所以引起学术界和人们的兴趣与注意。

1. 对麦金德理论的分析：《和平地理学》首先分析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不足之处。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具有陆上交通的优势与经济潜力高的地区。

在气候上，苏联虽然面积相当大，但其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很小。农业生产的中心仍在西俄罗斯，而不在西伯利亚，并不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从矿产与能源看，目前资源仍然集中在乌拉尔山以西。虽然苏联政府尽了很大力量将工矿业向东部转移，但很难对其实际与潜在重要性作全面估计。

该地的铁路、公路与航空交通均有发展，但气候、地形与距离等条件仍

是发展交通方面重大障碍。其实力与距离的反比例规律在此地仍然有效。在最近的将来，中亚无疑仍然是一个实力潜力相当低的地方。

对麦金德所指的內新月地区，即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来说，无论是从人口、工农业生产条件，一般都比心脏地带要优越。

再从欧亚大陆的形势看，麦金德认为，大陆心脏地区的游牧民族部落为俄国有组织的实力所取代时，向外压迫边缘地区国家的势态仍然存在。在 19 世纪时，其向边缘地区扩张及寻求出海通道为不列颠海上势力所阻拦。不列颠帝国建立的包围欧亚大陆的形势，是由其海军控制周围海道而实现的。

麦金德深信，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也一定循着陆海势力对抗形式。这是 19 世纪的英、俄冲突的形式。斯皮克曼认为，从 20 世纪初开始，即在麦金德 1904 年与 1919 年文章中，强调俄国陆上势力与不列颠海上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对抗的观点。但是，事实上，两国的对抗从来就不是不可避免的。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一战和二战中，不列颠帝国和俄罗斯两国都是站在一起反对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所控制的边缘地区的侵略国家的。

从历史看，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而另一些边缘国家和俄国，或者是不列颠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因此，麦金德强调东欧和心脏地带的战略重要作用的三句名言是错误的，是缺乏历史与现实事件依据的。

2. 美国的战略利益：从美国情况看，《和平地理学》一书提到，美国在 30 年内已两次卷入战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都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眼看要被一个单独国家所统治之时。1917 年，一战中的德国在结束与苏战争时，似有可能独霸欧洲。日本在远东于 1915 年借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1918 年又入侵西伯利亚。如果不遇到抵抗，德、日有可能分别占据欧亚大陆东西两个边缘地区。

日、德两国后来仍然坚持其侵略扩张行动，分别从 1931 年和 1939 年开始，并通过二战，使其扩张地域达到高峰。日本控制范围从中国东北直到新几内亚岛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德国则从挪威直到北非的西海岸。

二战的进程表明，欧洲的势力均衡对世界的重要性。麦金德亦对心脏地带概念作了修改，承认边缘地区的重要性，承认了英、美、俄为防止德国扩张而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心脏地带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能够控制欧洲及左右世界未来和平的只有英、美、俄三国形成的海陆势力的联合。

《和平地理学》一书对保卫世界安全的战略进行了分析。从二战来看，各个战线和各个战区都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构成一个整体。虽然欧洲和亚洲的远东分成两个战场，但它们是整个战场的两个部分。战争的总战略须从世界实力中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实力中心有北美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欧洲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的远东沿海地区以及印度地区。

在这些地区之间的地理关系中，西半球的实力中心能够为一种联合的欧亚潜在势力所压倒，因为欧亚联合的潜力拥有十倍于美洲的人口和两倍半的土地。即使新世界工业生产力与旧世界几乎相等，但一旦欧亚边缘地区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美洲就处于被包围之中。因此，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为了美国利益，须防止上述形势出现。

为取得战争胜利，美国须改变其百年来实行的单纯依靠海上实力的传统政策，必须参与陆战，须与陆上大国配合。而这次大战，幸而有苏联与中国

参与，并提供陆上根据地，便于从那些地方开展陆上战斗。

二战以来的实践证明，海军如无空军的支援与配合，难以单独参加战斗与发挥作用。而空军在航空母舰的配合下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仍不如陆上的基地来得重要。只有不断延伸的空军基地才能使空军活动范围不断向前推进。这样才使战斗机护航始终能配合战斗需要。反过来说，空军就是飞机加基地。基地需空军保护，亦需陆、海军保护。现代战争需海、陆、空三军配合，同时亦需后勤支援。后勤工作需要各种交通工具，没有确保物资供应的交通线，就无法取得现代战争的胜利。

二战有两个主要战区，每个主要战区又都成三角形、每个三角形又都有两个海陆两性的边与一个大陆边。苏联介于两个战场之间，有完整的陆地领域彼此相联；美国亦介于两个战场之间，但需分别跨过大洋，进入海陆两性的边参加战斗。

对德、日来说，他们既要开展陆上战斗，又要开展海上战斗，也是要进行两个方面，两种类型的战斗。虽然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对他们的最大不利之处，企图在时间上错开，即在某一时间内，只进行一个方面，或一种类型的战斗。可是，他们并未成功。德国先向东打败波兰，继而向西击溃法国，还在同英国交锋时，又转而向东进攻苏联。原来，德国想击败苏联，以整个欧洲陆地为基础再进行海上战斗。结果，进攻苏联失败，反而陷于两面受敌之境。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也是未能解决在中国的战斗，不但不能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也是不得不在两个方面进行战斗。如果没有苏联与中国在大陆战场的力量，则美国在欧洲沿海地带和太平洋的岛屿上登陆也不足以击败德国和日本的势力。

美国在这场战斗中，不仅在欧陆边缘与太平洋诸岛上同德、日展开战斗，而且还要运送相当数量军需物品以支援苏联和中国对德、日的战斗。但是，由于这两个战场的正面战斗使外来供应路线极其困难。北冰洋的冰封和西藏高原的高山给予这种供应极大的限制。

3. “边缘地区”理论与美国策略：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提到，东半球的势力冲突有四类：一是在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之间，二是在边缘地区内的各势力之间，三是海上势力与大陆沿岸之间，四是西半球的参与。历史上，草原民族对边缘地区的袭击，斯拉夫民族和条顿民族对东欧争夺，以及近代英、俄及土耳其与俄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抗，中、俄在边界地区的矛盾都属于第一类冲突。第二类冲突有西欧、德、法之间的力量平衡与矛盾。第三类冲突如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四类如两次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属之。

美国对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有可能被一个强权国家控制的情况下才参与的。如果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真的被强权国家所完全控制、则美国等于是被处在两洋以外的大陆所包围，届时，美国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每次参与发生于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战争，不仅需海上强国的配合，而且还需陆上大国的协同，使美国可以方便地使用其海、陆、空的基地，同陆上国家一起取得战争胜利。

根据两次大战都发生边缘地区，而且都是通过海权与陆权国家联合击败边缘地区国家的现实，加上边缘地区在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力量都超过心脏地带的条件下，斯皮克曼认为，麦金德对心脏地带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估计是错误的。于是，他在《和平地理学》中提出：如果归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区，谁就控制着欧亚大陆；谁支

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针对这种形势分析与估计，要防止边缘地区强权大国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威胁，对美国所应当采取的对策，《和平地理学》书中提出：尽管有一个共同承担义务而结合在一起的国际组织，美国仍将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因为一个大国不讲究实力就意味着终究要被征服和灭亡。战后，美国与英国、苏联仍应合作才能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为了美国对安全制度有执行义务的能力，三大国间形成均势，欧亚大陆边缘地区安全事务的参加者的美国，为维持地区实力平衡，需在边缘地区建立必要的军事基地。

由于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区学说是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与战争的形势发展不相符合之时，而且在美国以其巨大优势参与战争情况下形成的学说。因此，该学说符合当时战争发展的现实，其所提出的政策亦适合美国走出孤立主义，要在世界事务中建立其主导地位的步骤，故对美国战时与战后的对外政策亦有一定影响。

（三）德国的地缘政治学

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这对德国的扩张主义是一次教训与打击。自从德国于 1871 年统一以来，德国就迅速崛起于欧洲，成为欧洲大陆 20 世纪初经济和军事最强大的一员。从俾斯麦于 1862 年担任首相以后，历次对外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激起的战争狂热和国家统一及经济发展所激起的与英国争霸世界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驱使其发动一战。但是，战争的失败不仅使其海外的殖民地丧失殆尽，而其本土亦有所损失。因此，部分德国日耳曼人则成为异国他乡的少数民族。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加上 30 年代的国际性大萧条，德国受到打击最大，生产衰退、工人失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种困难面前，凡尔赛和约带给德国的屈辱地位，则反而激起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加上原来的普鲁士的黩武精神，则为法西斯势力所利用。后来，希特勒上了台，就把德国引向战争复仇主义的道路。在德国实行侵略扩张主义政策中，地缘政治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形成了当时的德国地缘政治学。

1.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德国地缘学的中心人物是卡尔·豪斯浩弗。他在帝国的军队中晋升到少将，并担任过德国驻日使馆武官。一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讲授过地缘政治学与军事地理学。他越来越被地理和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并推崇基伦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和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信奉国家的区位和领土特性是决定其命运的主要条件。他于 1924 年创办《地缘政治杂志》，并首任主编。随后又创办《时务评论》英文版传播德国地缘政治思想。在其周围也就集中了一大批德国地缘政治学的鼓吹者。

在慕尼黑发展起来的德国地缘政治学是通过运用地理空间和地域透视，把历史、经济、政治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产物。地缘政治学变为一门科学和艺术，其目的是通过对一个国家的形态学观察和它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来认识一个国家的动态运转情况。

在对国家看法上，他们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国家看作是那种具有被基伦大致刻画出了特性的有机体。在国家的生存中，生存空间的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国家有机体的生长和发展有赖于对生存空间的获取，大的生存空间又给予国家以更大的动力，民族文化的传播是征服空间的最有效的方法。国家组织必须经常通过显示它对占有空间的利用，来证明获取更多生存空间是合理的。除上述论点外，豪斯浩弗还把一个国家空间结构的关键特征，例

如，首都、国家的吸引中心、权力范围、文化动力及边远地区的成长等，称为“地缘政治的气压计”。关于德国的扩张，德国地缘政治家们的信念是：任何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是依靠了地理条件。一个有生机的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选择了”他们去执行征服的使命。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分割出去的德国的国土必须归还德国，而且经过长期发展，全部日耳曼人必须结成一个单一的国家。根据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分布，德国生存空间扩张方向被认为是东方。

凡尔赛和约在德国的东部所竖起的是一道由许多人为的小国组成的，它们被认为是阻止德国东扩的一条可恶的魔带，是必须铲掉的屏障。

关于德国的战略地位与对外扩张战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则充分利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中，东欧与心脏地带的重要战略作用，以及陆权与海权的对立来作为其理论依据。德国地缘政治学家鼓吹其欧洲战略是在海上列强与陆上列强共同支配世界的背景下所采取的战略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正是这两大势力结成暂时联盟的结果所造成的。

对其东方，占有心脏地带的俄国现已转变成苏联，现已成为“事实上的占据者”。根据拿破仑进攻俄国的失败的事实，证实用武力对待“心脏地带”是危险的，豪斯浩弗等人认为，苏联在地理上曾被肢解，它也受到西方的反对，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因而它有可能与德国组成一个“被排挤的大陆联盟来反对国联的海权统治的世界强权”。所以，对苏联不是树敌而是结盟，“控制心脏地带不是靠征服，而是靠外交和秘密手段来完成。”

对其西边的海权国家英国，德国地缘政治家早在本世纪 20 年代就已指出，“大英帝国是首先要对付的天敌”。在考察了英帝国权力的基础之后，人们越发断定，英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经走过了它的历史顶峰。这个帝国的广阔的面积，地理上的支离分散和不纯使其愈加笨拙，难以控制。豪斯浩弗认为，英国“它的空间控制并非无敌……它已变为我们当代的一个最成问题的政治结构”。这使他预见到，英国会由于“在地缘政治上饱和”的结果而被瓦解。

在空中力量发展的时代，已不利于海洋国家。英国已处于易受到大陆空袭的地位。因此，豪斯浩弗认为，海权优势现在已告结束，未来应由陆权势力支配。所以，德国将会同它发生较大范围的对峙。在这种对抗发生之前，首先需要处理与法国的“大陆问题”。

为了对抗盎格鲁-撒克逊人霸权挑战，豪斯浩弗认为，日本必定是朋友而不会是敌人，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的力量将坚不可摧，它们是“唯一能够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监护，以及保卫自己势力的集团。”关于与英国争夺海权问题，豪斯浩弗引用拉采尔的话说：“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在陆权与海权关系上，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认为，陆权建立必须先于海权，而且在寻求建立海权势力之前，需要巩固陆权势力。

在中欧的南部，地中海被意大利认为是“我国的海域”，是墨索里尼要以意大利为中心创建新罗马帝国的命定空间。对地中海在德国的战略上的意义，德国地缘政治学者是清楚的，豪斯浩弗就认为几个世纪以来，多少征服者都没能控制着欧洲，这首先要归咎于未能控制地中海。其对意大利能否实现其抱负的信心不足在于认为意大利的经济基础过于软弱。

2. 关于全球泛区的观点：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了

关于全球泛区 (pan-region) 的观点, 它反映了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及德国地缘政治学对世界政治格局的设想, 它也成为德国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

泛区思想的来源, 一是基伦的“经济独立自足”的思想。在现实中, 大英帝国在其为首的自由贸易体系崩溃以后, 世界逐渐转向关税壁垒的经济集团体系。英国的殖民体系就通过帝国特惠政策来加强其控制及维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德国在一战后失去了其所有的海外殖民地, 德国的地缘政治学家关于殖民地的重新划分和德国的生存空间扩展引起其对更大范围的思考, 对全球经济区与地缘政治的泛区的联系。

另一来源是思想意识的思考。豪斯浩弗说: “没有思想意识的内容, 帝国主义很快就会一个个地死去。”他把泛区定义为: “在空间上寻求显示其自身存在的超民族的全球性思想。”其列出的主要泛区思想有泛美、泛亚、泛俄罗斯、泛太平洋、泛伊斯兰以及泛欧思想。这些泛区思想的地域范围最初是模糊不清的。通过区域核心使泛区向外扩展, 使其空间具体化。最后, 大生存空间形态的轮廓清晰了, 这时可以预期会产生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在 1941 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 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所划分出的世界泛区有四个。(1) 泛美区: 南、北美洲联合, 以美国为主导; (2) 泛亚区: 从东北亚、东南亚至澳大利亚实现联合, 以日本为主导; (3) 泛欧区: 使欧洲与非洲统一, 以德国为主导; (4) 泛俄区: 以苏联的领土加西南亚及印度, 以苏联为主导。豪斯浩弗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设计, 实际上是以大国列强为中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这种泛区划分对于战前德、意、日轴心国的世界战略确有一定影响。德国在 1941 年前的向东进占东欧, 向西击败法国, 向南进入北非, 其行为与泛区构想是一致的。二战中, 日本在东亚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亦是这种泛区思想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 该泛区图上, 盎格鲁-撒克逊的海权国家中的大英帝国已不存在, 分别为欧、亚、俄三泛区所瓜分。而美国则以单独泛区存在。这反映德国地缘政治学家承认, 美国及门罗主义存在, 试图使美国与英国分离, 及不要插手欧洲事务的一种战略。二是, 在德国进攻苏联后, 德国地缘政治学家的泛区图发生了变化, 泛俄区已不存在, 其原来范围中的南亚与勒拿河以东地区并入泛亚区, 其余地区全部属于以德国为主导的泛欧区。这样, 泛欧区就成为三个泛区中面积最大, 而且横跨欧、亚、非三洲, 它包括了麦金德所说的东欧、心脏地带全部与世界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它

图 8-2 德国地缘政治学泛区

反映了德、苏两国在心脏地带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该泛区的划分, 不仅每个泛区都包括不同的自然地带, 而且各有其核心与边缘。随着德、意、日轴心的失败, 其设想主导的泛区亦随之消失。

3. 德国地缘政治学与纳粹的侵略决策: 由于德国地缘政治学与德国纳粹有着相当深的联系, 随着德国纳粹的侵略行为及其失败, 希特勒及其党徒遭到世人唾弃, 不仅德国地缘政治学, 而且政治地理学亦受牵连, 一时成为非议的对象, 甚至处于衰落之境。近些年来, 通过研究与重新评价得到公正的对待。

德国地缘政治学关于德国在一战后的环境下, 所形成的那种充满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潮出现在先, 而德国希特勒纳粹党的得势上台在后。纳粹党

在德国的兴起及掌权，毫无疑问是利用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思想武器与策略依据。在其上台与掌握政权之后，当然会支持这种扩张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从此以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亦失去其客观性，多与第三帝国的政策相联系。

关于德国的地缘政治学者，特别是卡尔·豪斯浩弗与纳粹领导的关系，经研究比过去传闻小得多。由于后来成为希特勒副手的鲁道夫·赫斯曾是卡尔·豪斯浩弗之子阿·豪斯浩弗的同学及选修过其地缘政治学而有较多交往，并经常讨论有关地缘政治方面问题。通过赫斯、豪斯浩弗曾与第三帝国的其他头目有过接触，但与希特勒接触极少。到1941年赫斯只身驾机去英以后，豪斯浩弗亦中断了与纳粹上层的联系。

豪斯浩弗之子阿·豪斯浩弗曾作过赫斯的对外政策顾问，及里宾特洛甫办事处助理，对第三帝国对外政策曾有一定影响。但欧战爆发后，由于政策上的分歧，阿·豪斯浩弗参加秘密反战组织。1944年反纳粹政变流产，因其参与而被捕，1945年遇害。

关于卡尔·豪斯浩弗的地缘政治思想与第三帝国的重大决策，据近来研究发现不少并非一致之处。这在东方政策上表现得明显。德国地缘政治学是用麦金德“心脏地带”来为德国扩张主义服务的。作为中欧陆上帝国的战略关键在于反对海上霸权国英国。其对东方的政策是，通过与那些从西方体系中被排挤出来的国家结盟，建立一个与之匹敌的势力。对其东部各民族，则利用其与德国的天然与互利关系建立一种共栖关系。对苏联，应吸取拿破仑教训，是结盟而不是树敌。对东方的日本，德国应使之成为实现分裂大英帝国的亚洲盟友。总起来讲，其对东方的政策就是把日本、俄国和中欧帝国联合起来。这与纳粹实际实施的、兼并位于德国东面的生存空间来巩固德国统治的中欧，把苏联作为其生存空间战略中获取最大领土目标，而施以进攻，以及早期的与日本结盟以反对苏联是不协调的。卡尔·豪斯浩弗于1945年底对盟军采访者称：希特勒一伙人根本不明白德国地缘政治学。这既是对第三帝国头目的错误政策失败的愤怒，也是对地缘政治策略未能实施的惋惜。正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产生的绝望，使卡尔·豪斯浩弗于1946年自杀身亡。

关于德国地缘政治学，正如英国学者杰·帕克在其《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所说：“在一战后……一种更加广泛的国际主义的时候，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则走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它充当了“日耳曼精神”知识赞助人角色，成了领土扩张的辩护者。……他们走得太远了，以致于他们的地理哲学也同其他许多人一道随之遭到毁灭”。

四、战后分裂的世界时期的地缘政治学

二战结束后，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出现麦金德所设想的在北极附近由陆中大洋与心脏地带组成的环形地带，实现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为持久和平组成的联盟，也没有出现斯皮克曼所预想的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合作以防止边缘地区强国的出现而建立的有效的安全制度。相反，出现了新的对立，成为冷战中的地缘政治上的两极体系。原来的战时的同盟与合作分裂了，形成了分裂的世界。这种分裂的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的特征虽然也发生变化，但基本特征并无大变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海权与陆权的对立，也反映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区学说那种相近的地区战略

格局。其次，这种格局虽然相互对立，在全世界范围内你争我夺，也在局部范围出现相当规模的热战，关键地方发生严重的核对峙，但并未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之间的热战，也未出现世界性的大战。从 40 年代中开始的，这种两极对峙的分裂的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终于随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而不复存在。

（一）冷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终于在 1945 年 5 月与 8 月以德、日法西斯的投降而结束。虽然美、苏、英、法、中 5 国是 5 大战胜国，但是，实际由美、苏、英三国掌握着局势，控制着一切。美国不但海军完全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且陆军在欧洲一直推进到易北河。在亚洲，则完全控制着日本。苏联在欧洲追击德军越出国境，进入东欧，抵达易北河与美、英联军会师，控制着柏林至亚得里亚海一线以东的地区。在亚洲为打击日军，曾进军到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

在上述形势下，苏联在欧洲不但恢复了其沙俄时代在东欧所占据的地区，而且进入了中欧，这里既不是一战前俄、德、奥三国在东欧对立的形势，也不是二战前，苏、德之间许多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小国所形成的受到牵制的形势。现在则完全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内，而又在共产党政权之下，那里与苏联形成紧密联系，使西方无隙可入。这种情况，在麦金德的三句名言中，苏联的地缘政治格局已完全占有前一句半话的条件，成为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在历史上它首次由一支庞大精锐的驻军守卫。”

另外，在东方，苏联从二战中获得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可以自由地从亚洲的东北进入太平洋。可是，最重要的是 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于 1950 年与苏联结成联盟，使欧亚大陆的东部的边缘地区加入了心脏地带，结果从太平洋西岸直到易北河成为一个整体。它占世界人口约 1/3，面积约 1/4。这样一种心脏地带加东欧与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庞大地缘政治力量是空前的。

从美国来看，自实行门罗主义以来，美国就把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插足。通过二战，美国在大西洋、太平洋，以及欧亚大陆的东、西边缘地区和北非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加上英、法及其殖民地，可以说麦金德所划的内、外新月形地区已全部受到美国“控制”。这种地缘政治格局就是罗斯福所说的“第二次天赐良机”，使美国去主宰世界。

英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战争已使其极端虚弱，国家十分困难，夹在美、苏两大势力之间，只能在欧亚大陆的南部边缘，从地中海经中东到印度一线维持其力量，成为最弱的一环。由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不足，对希腊和土耳其难以继续支持下去，只好由美国趁虚而入。

在这种格局下，苏联想巩固其势力范围，美国要扩大其边缘地区影响地域，英国要保持其原来地位。彼此相互矛盾的欲望，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英国的鼓动及在美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发回的电报（1946 年 2 月）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战略的促使下，遂形成了美国全面遏制苏联“扩张”的杜鲁门主义。这种对立的两极地缘政治结构，往往赋以陆权和海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和“自由世界”、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等等，反映彼此之间的裂痕与各全方位的对立。

作为遏制心脏地带这个强大堡垒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在堡垒的外围，通过各种条约把该地区的国家和力量组织起来，以防止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及“芬兰化”现象的出现。结果出现了，从西欧的北大西洋公约起，经中东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到日本的日美安全条约。另一条是核威慑，利用美国在战后初期对核武器的垄断，以大规模毁灭性的战术为后盾对苏联进行威胁。但是，在所定条约中，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不是因参加者退出而解散，就是以情况变化而失效，使边缘地区出现大片空白。核威慑也因苏联不久掌握其技术，从而打破其垄断变成“核竞赛”。

从 4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的 40 多年的冷战亦有变化。冷战中亦夹有热战，对立中有紧张也有缓和。根据情况变化，F. 哈里戴 (F. Halliday) 将其分为 4 个阶段。1947 年到 1953 年为第一阶段。它是从希腊和土耳其危机开始，经柏林封锁的冷战到朝鲜战争的热战。1953 年到 1969 年为第二阶段，其冷战矛盾已从东、西两个边缘地区转向越南、中东的南部边缘，及欧亚大陆以外的古巴。1969 年到 1979 年的第三阶段，由于美、中、苏三角关系，冷战趋向缓和，协商处理其矛盾，对立只在中东、南部非洲和中美洲。1979 年后的第四阶段，对立广度上，除中东、南部非洲、中美洲外，又出现阿富汗问题，深度上，美国里根总统向苏联开展了“星球大战计划”，形成新的冷战。在后两阶段，其矛盾范围已超出了传统的边缘地区。

(二) 柯恩的“分裂的世界”图式

当两极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之后，原来一般认为坚如盘石的共产主义集团会持续下去，但是，50 年代后期东欧出现的不稳，中苏的分歧的开始出现，并于 60 年代初公开对立，使苏联为首的集团发生分裂与削弱。在西方集团中，法国戴高乐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设独立核力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反对英国参加共同体。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大批亚、非国家脱离殖民主义，走上独立道路，往往为避免受大国制约而选择第三世界不结盟道路。这种情况就使两极的简单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1. 柯恩图式的形成：索尔·柯恩 (1926—) 是现在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曾任美国地理协会主席。他是从区域出发对地缘政治格局进行研究，在 1964 年发表的题目为《分裂世界的地理与政治》，他反对没有回旋余地的严密的世界体系，而倾向于将灵活性引入到世界体系中去。从其 1964 年提出的论文中，对所提出的分裂的世界的图式虽然进行了三次修改，但是其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动，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动态。

柯恩首先对地缘政治的框架区分出世界性地区和地区性地区。对这两类地区，他称前者为地缘战略区，后者为地缘政治区。地缘战略区应大到足以产生某些有世界影响的特点，因为战略只能从世界角度去看。地缘战略区则应根据区位、动态、贸易方向、文化和思想联系对世界广大地区的相互关系来确定。对陆地和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往往是确定地缘战略区的关键。

地缘政治区是地缘战略区以下的分区。它具有地理特点的统一性。它是由地理区直接转换来的。这种单元为共同的政治和经济机能提供框架。区位相联和资源互补是地缘政治区最明显的标志。地缘政治区为一个地缘战略区内多重权力中心的出现提供基础。地缘战略区起战略作用，地缘政治区只起策略作用。

严格来说，现只有两个地缘战略区：(1) 依赖贸易的海权世界，(2)

欧亚大陆世界。根据推测，在未来有可能出现一个第三地缘战略区，即印度洋南亚区。这个区很可能从英联邦和欧洲前殖民地废墟上出现，可能并不具有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资格。

依靠贸易的海洋世界的核心区是美国的沿海地区，欧亚大陆世界的核心区是俄国的工业三角地带。这两个地方可以称为中心。海洋欧洲和中国大陆是这两个地缘战略区中的第二级权力中心。

依赖贸易的海权世界可以再分成：(a) 盎格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b) 海洋欧洲和马格里布，(c) 亚洲离岸诸岛与大洋洲，(d) 南美。欧亚大陆世界有：(a) 俄国心脏地带和东欧，(b) 东亚大陆。在这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有两个破碎带——中东和东南亚。

以上未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南亚。南亚现在还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单元，将来可能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尚无迹象能成为大陆政治单元。这一地区仍在依赖贸易的海洋世界内，但并不意味该地缘战略区不重要。

每一个地缘政治区可由一个大国，亦可由一批较小的国家组成。每一个地缘政治区都有其各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特征，它可以为该地区的内部凝聚力的加强提供基础。另外，在每个地缘政治区内有其人口和

图 8-3 世界的地缘政治区与地缘战略区

(引自：科恩 SB. 分裂世界的地理与政治. 伦敦：Methuen, 1964)

经济往来的主要中心，而其周围则是其腹地。

在两个地缘战略区之间，除南亚外，还有东南亚和中东两个区，柯恩称其为“破碎带”。这两个地带由于自然条件的分割性，加上历史与经济的发展缺乏统一的地理核心，同时殖民地时期遭列强的瓜分，内部难以实现较大地理范围统一。外部由于美、苏的争夺与插足，给该地区带来政治不稳定，不同集团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发生，是破碎带的基本特征。

科恩的分裂的世界的图式目的在于，提供一个预测我们时代地理态势的理论框架。因为这种态势大多与地缘政治区域势力发展相关联。这些区域中的欧洲沿海国家，正在成为一个与两个超级大国相匹敌的世界实力中心。

2. 柯恩对图式的修改：9年以后，柯恩对其有关“分裂的世界”的各种问题再次阐述。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之所以缺乏国际目标和混乱不堪，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其遏制政策和多米诺骨牌理论仍在作怪。他还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如果世界仍将生存下去，相互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如此。其前提条件就是，“全球政治体系在各等级之间和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特征上具有一种类似生态学的动态平衡。”该体系是由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四大实力组成的多中心体系。全球的均衡在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而不是两极世界。

1982年柯恩又对其分裂的世界的图式作了进一步修改。他的修改首先反映在第二级的分区上，即将地缘政治区的地位，根据西欧、日本和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的提高，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的作用，确定为新的世界大国。其他地缘政治区经发展已出现了区内占主导的二等强国，如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等。柯恩评估了27个国家为二等强国。接着往下又确定了第三、第四和第五级的国家。另外，对南部非洲，根据美、苏矛盾，当地各种势力的冲突被确定第三个破碎地带。其原来的东南亚破碎带，由于越南战争的结束形势已发生变化。

根据其图式的修订和各等级国家的确定，这种由大量不同等级国家组成的，地缘政治区形成的多元化世界要比两极化的模式世界，更具现实性与动态性，反映了各地区各国家间的关系复杂性。原来的两个超级大国影响已经有所削弱，其部分作用与影响已由新出现的地区性力量所取代。由于技术进步、新的思想变革、人口的迁移、新的商贸格局的出现，柯恩认为，地缘政治学就要及时抓着这些影响地缘政治较大的作用，作为其研究的基本内容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在 1991 年的《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中，柯恩对其分裂的世界图式根据形势变化作了新的修改。在其 1994 年的《新世界纪元中的地缘政治：旧学科中新观点》中，对这些问题作了新的解说。其图式的变化有三方面。

第一，破碎带只剩下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的破碎带已不复存在。东南亚的东盟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并与日本、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联系日益加深。苏联在越南的军事基地的退出，柬埔寨内战的停止，新的政府组成，摆脱了外部势力与动乱，开始发展经济，与东盟的联系开始加强。因此，该地区将加入扩大的东盟成为东南亚诸岛与大洋洲的一部分。

在南部非洲，因苏联利用古巴出人，东欧提供军事和技术支持，进入埃塞俄比亚、安哥拉、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另外，苏联还以政治影响几内亚、马里、刚果和坦桑尼亚。随着苏联解体该破碎带已不存在，并回到海洋世界地缘战略区。

在中东，特别是海湾战争后，苏联因解体对该地区的支持与影响已大大下降。可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对该地区影响增加。以色列与阿拉伯的和解与和平进程加快已使中东形势大有改变。但是，如果中东北部因与高加索和中亚相邻，而产生矛盾就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应，如果美国与欧洲各国的政策不协调，如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地区矛盾加剧，中东仍不会安宁。因此，该地区仍是一个破碎带。

第二，对南部非洲和南美这个“四分之一地球的战略边缘区”（quarter-sphere of strategic marginality）。它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奥里诺科河以南的南美洲的两块大陆及其边缘相临海域，它的海陆面积恰占地球表面的 1/4。

这里处于现代经济体系之外，并未享受到对发展过程十分重要的贸易之利。这两块陆地世界贸易总额中占 3%。同时，除巴西、智利、阿根廷及南非有一些现代生活的飞地外，其广大地区与发达的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那种资金流通、技术转移、专业化生产是相对无缘的。

虽然该地区为美国和欧洲的大国所染指，但其地区在战略上是边缘地区。对海洋世界来说，海空军攻击能力、远程武器和卫星监测，已使南方大陆基地的作用大大减弱。可是，现石油管道运输和苏伊士运河承担的石油运输与经过好望角船运石油量相等。巴拿马运河的过往船只现大多是航向美国西岸。

在经济上，这地区多年承受着农矿产品生产过剩、世界其他地方竞争、代用品及消费者口味的变化之苦。后工业地区也不再把这两个南方大陆看作潜在的世界仓库。上述情况加上高额债务、低水平的国际贸易、过多的人口、低寿命、低热量消耗将继续折磨该地区。只有获得重大的发展援助，才能使其有新的转机。因此，这个四分之一地球的战略边缘区成为一特殊的地

区。柯恩对此情况很有感触地说：“尽管我说的是一个世界系统，可是我仔细思考，这个系统并未真正包括进整个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包括进整个世界。”

第三，提出通道（gateway）概念。它包括通道区和通道国家。

在世界上，国家的数目从 1939 年以来翻了两番，而且其数目仍有增长趋势。因为还有不少政治单位（如殖民地、附属地）和单位区（托管地、保护领地）会成为国家。这类地方大多在自然环境中较为孤立，或是具有有限经济基础的小岛。其独立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和平的，也有的是流血的。

通道地方的特点虽不尽相同，但亦有一致之处。这些地方往往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自己的语言、宗教，较高的教育，与外部地区有方便的海、陆通道。它在经济上往往比其母体核心区还发达，具有经商和制造方面传统。由于人口压力，移民海外侨民多，这对获取外资和专门技术十分有利。由于战略地位和缺乏武装，需要母体的保护，因资源缺乏、市场有限，经济上对母体有较大依赖，因此这些地方独立具有一定困难。

这些地方多在地缘战略区和地缘政治区之间，故通道国家最适于专业制造、贸易、旅游和金融服务，因而有利两边的交流和矛盾的缓和。这类通道国（如欧洲瑞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列支敦士登）是有利于地区发展与稳定的，但也有冲突的（如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与以色列）。

在国家内的某集团的所在地区出现通道区。特别是在种族、民族或部族地区，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历史的积怨（如中东的库尔德人，南非的祖鲁人）而产生各种矛盾，解决好国家内的这类问题往往有很大难度。

除上两类通道外，还有大范围的通道地区。在柯恩的修改的分裂的世界图式上，出现在东欧的通道地区就属于这一类。这里在经济上向两边开放，可以有利于促进欧共体与俄罗斯的经济交流，也有利于东欧本身发展。

柯恩认为，该通道地区虽然非军事化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其防卫力量不被用于反对心脏地带则需双边予以保证。柯恩还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通道地区。

3. 柯恩图式的特点：柯恩的分裂的图式的提出到现在已有 30 多年，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但是其基本框架、关系则相对稳定，这也是该图式所表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优越之处。其特点大体有三。

第一，有个灵活而又相对稳定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其图式有两个大的地缘战略区，它是一级的，即海洋的和欧亚大陆的。其下的单元是地缘政治区，这是二级的。海洋的一级区包括五个二级区，欧亚大陆的一级区包括两个二级区。另外还有三个二级区，游离于一级区之外，即南亚、中东和东欧。它们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一个是独立的地缘政治区，一个是破碎带，另一个是通道地区。其第三级是民族国家，不过国家则依其在这个世界系统中的实力地位和功能而分出等级系列。通道区是个特殊的类型，他位于国家之下，属第四级。

尽管近些年来国际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一、二级区的框架并无大变动。当然，其区之间地位与关系则有或大或小变化。例如，世界五大势力中心情况就有变化。其中美国成为唯一的一个军事和经济上的巨人；俄国和中国虽有强大军事实力，但经济上则相对较弱；日本和欧共体则相反，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却没有相应军事实力。

第二，主要核心区的连续性。目前和过去地缘政治系统的特点，是以系统的持续和变化来确定的。位于大国内的主要实力中心的持续存在表示了系

统的持续性。大西洋和大湖沿岸的美国，俄国心脏地区的工业与农业的三角，西欧与北海的工业化的弧形地带，中国东北与中部的沿河平原区，日本中部太平洋沿岸和南部内陆海边缘地区是地缘政治系统的核心。虽然，这些核心区面临着国际上经济与思想意识的巨变与地缘政治实力向其边缘区转移，但仍维持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地位。上述五大力量中的增长与相互作用，是该系统的稳定与持续的重要力量。

核心实力不变，尽管其边缘发生重大变化，仍能维持其地缘政治系统的稳定与持续。苏联的解体就是个例子。苏联解体，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也没有与俄罗斯维持一种联邦关系，可是俄罗斯核心区仍然使其保持一个世界大国地位。它仍有约 1.25 亿人口，保有工业三角，肥沃的农业地区，丰富的矿藏以及庞大的科技队伍。依靠这些财富，俄罗斯克服解体带来的打击并能从封闭的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转变。

第三，地缘政治系统的演化。面对着世界形势错综复杂，有时又有突发的与巨大的变化，柯恩认为，地缘政治系统是动态的，其出现的不平衡是反映其政治结构与其运行环境之间不相适应而产生的，不平衡的出现是导致新的更大整合过程。了解地缘政治系统的演变，采用从社会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先进理论而引伸出来的发展法则是有用的。发展的理论认为，系统是按可预测的结构方式演化的，它受外部力量的影响，等级，协调和熵是其重要特征。这样一种理论是全面的、有序的，各部分间是相互联系的过程。

系统的早期阶段是没有分异的，各地域部分缺乏相互联系，其功能是相同的。第二阶段出现分异，各部分虽有了特点，但还是孤立的。最高阶段是特化加强与等级上的整合。不同地域的各部分间专业化的和互补的产品的交换导致系统的整合。等级结构制约着这些产品的流动。

柯恩还以二战后的二极体系的发展说明其理论。在二极体系初期由美、苏控制时，其体系开始有明显分异，但美、苏体系内却分异较弱。不久两体系内部发生分异，西欧与日本经济复兴的发展使其与美国地位从小伙伴关系转变成与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在苏联体系内，中国向其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美、苏两体系内部的等级关系亦由于分异而出现。不过其等级关系，由于世界经济联系与通讯往来的通达性，对其政治关系并无严格限制。如阿尔巴尼亚先是脱离南斯拉夫影响转向苏联，继而又离开苏联转向中国。

总之，这个世界的开放系统，由于各国实力的变化，影响范围伸缩，地位的升降，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的交错、重叠，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其结构上的等级性、大国核心区的相对持续性、系统上的演变，使全球的地缘政治系统成为一个综合的有机系统。

五、冷战后的地缘政治学进展

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从 1992 年后，世界地缘政治就进入了冷战后时代。这一巨大的变化，激起前南斯拉夫与前苏联边缘地区出现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等矛盾，甚至出现流血的武装冲突。针对这种形势，不论是学者，还是有丰富经验的外交家，均对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动力与可能的格局，矛盾与冲突的焦点地区和大国关系都进行研究、分析与预测。下面介绍 S.P.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基辛格与布热津斯的见解。

(一) S.P.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是美国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所长，他于 1993 年在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亦有译为《文化冲突》的) 一文，其中心内容是说，文明冲突将控制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线。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人们对世界并未出现和平和稳定，反而对东欧和前苏联的一些边缘地区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感到迷惑不解，对世界前景存在担忧之情。这时，亨廷顿的文章发表，不仅引起学术界，而且引起多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可以说起着轰动效应。对其文所作分析与结论更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

1. “文明冲突”的基本内容：该文包括的内容有：下一个冲突模式，文明的本质，文明为何会冲突，文明的断层线，文明号召：同类国家组合，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对抗，分裂的国家，儒家与伊斯兰教的联合，西方的思考。现根据其内容重点介绍如下。

第一，下一个世界冲突的模式。从历史发展来看，在西欧，从封建进入现代社会时，即威斯特法利亚条约 (1648 年) 后的一个半世纪内，西方世界的冲突出现在王侯与王侯之间，就是专制君主与立宪君主想扩大他们的官僚机构，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商业经济实力，最重要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这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冲突的主要各方已不是王侯，而是民族。国王间的战争已经过去，人民间的战争开始了。这种形式的战争从 19 世纪一直延续到一战的结束。

此后，由于俄罗斯革命的结果和对此的反应，民族的冲突又转向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首先是在共产主义、法西斯-纳粹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而后是在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在冷战时，后一冲突是包含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而它们两个没有一个是典型的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每一个都是以其思想意识来界定其身分。

这些王侯、民族国家和思想意识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文明内的冲突。可以说，是“西方的内战”。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西方的那种内战阶段，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中心，非西方的人民和政府则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目标的历史客体，而是与西方一起作为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参加进来。

第二，关于文明的性质。亨廷顿认为，冷战时代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已不适用了。以政治和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国家集体已经无多大意义，正确作法是应按其文化和文明来作为划分标准。

我们谈到文明时，指的是什么呢？文明是指文化的总体。村落、地域，族群、民族、宗族集团，在不同文化的不同层次上，都具有其独特性。文明是按文化划分人的最高单位。属于不同文明的人都具有文化上的共同性。属于同一文明的人在文化上具有不同层次，例如一个罗马人，也可以称为意大利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基督教徒、一个欧洲人或一个西方人。文化是以客观的共同要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典章制度——以及主观的——如人民的自我认同——来界定的。西方文明有欧洲与北美两分支，伊斯兰文明有阿拉伯、突厥（即土耳其）、马来三支。各文明所属的人的数目差异很大，大的如中国，小的如说英语的加勒比人。尽管文明之间的界限大多不十分明显，但是其区别却是真正存在的。文明是动态的，有兴衰，也有分合。正如历史学家所研究，有的文明消失了，现在却埋在时代的沙层中。

西方认为，民族国家是全球事务的主要行动者。可是，这只是些近期的事。广义的人类历史就是文明史。阿诺德·汤因比所确定的主要文明有 21 个，其中只有六个存在于现今。

第三，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这是由于文明认同引起的。当前世界的文明有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世界形势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定的。未来最重大的冲突将会在各大大文明的断层线处爆发，其原因如下。

一是，文明间的分歧是根本分歧。分歧表现在历史、语言、传统和宗教方面，宗教往往最具关键。具体说，不同的文明的人对于神与人、个人与社会、人民与政府、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关系，看法各不相同。其对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权威、平等与尊卑观念的轻重差异亦都不同。这些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一时难消除。有分歧当然会产生矛盾与冲突。

二是，现时不同文明体系的人的互动日益频繁，会强化其文明意识。例如，法国，对波兰来的欧洲天主教徒移民表示好感，而对北非来的移民却不怀善意。这种潜藏于深处的意识的引发会导致矛盾。

三是，在全球的不同文明的人的交往中，原来的认同对象的民族国家已有所削弱。在很多地区，宗教却去取而代之。特别明显的是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其在各宗教中均有。在原教旨主义盛行的国家，其活跃分子多属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

四是，在西方文明发展至顶峰时，非西方文明则转向寻根。以前非西方社会中，精英阶层为受过西方教育、接受西方观念的人。而现今，其精英阶层正在日益本土化和反西方化。

五是，文明的特征与差异同其他方面的特征与差异相比是难改的。例如，属于某种文明的人，其经济情况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改变，属于政治的亦可通过改革来改变，可是属于某民族与宗教的是难改变的。

六是，经济的区域化现象在日益增加。可是，经济的区域化的成功往往需有共同的文明作基础。欧共体的成功就是以其欧洲文明与西方基督教作为共同基础有关。文明与宗教的不同会导致政策上的分歧，在人权问题、移民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都会构成纷扰。文明冲突在微观层次上是沿文明断层线使相邻而又相争的族群往往为领土及企图控制对方而发生冲突，在宏观层次上，则不同文明的国家组合会因其存在矛盾而发生争斗。

冷战结束后，一些地区发生的冲突大多出现在文明断层线上。当隶属于同一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与另一不同文明的民族发生战争时，自然会设法向自己文化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寻求支持。所以，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

第四，将来的冲突将出现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从第一点来看，亨廷顿认为，过去是“西方的内战”，所以将来的冲突将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亨廷顿认为，目前全球性的政治与安全议题是由美、英、法三国主控，而经济议题则唯美、德、日三国所定。因此，权力差距则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来源之一。由此其分析的结果是：那些为了文化和权力原因不想或不可能加入西方的国家要靠发展其自身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和西方竞争。他们通过自己的内部发展同外部与非西方国家合作来做到这点。这种合作的最重要形式是那种已出现对西方利益、价值和权力挑战的儒家-伊斯兰的联合。

亨廷顿面对这种所预见的形势，亨廷顿提出：从短期而言，西方应促其

文明体系内成员的合作与团结，要把东欧、拉美融入西方社会，要和日本及俄罗斯合作。从长期而言，西方必须维持保护自身所需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另外，因为在未来，全人类的文明还不会出现，人类仍然生活在一个不同文明共存的世界，每种文明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共存。

2. 对“文明冲突”的批评：亨廷顿的文章在我国同样引起人们的关注。学术上，有的认为，其文一反传统的国际政治从国家利益、国家权力等要素出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精神信仰统统被视为追求利益的工具和幌子，一下子把文化、宗教提到如此高度来论证。其命题是有启发意义的，只是其把问题推到极端，用“文明冲突”来涵盖它不能涵盖的现象，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另外，亨氏在研究视角上，从“大文化”或者说“大历史”的背景中，更多注意新的主体（民族、种族、各种集团等）、新的势力（宗教势力、文化势力等）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关系有新意，但是却得出荒谬性的政治结论。这是其把一个重要因素夸大成最主要因素，想树立一个假想敌，以期把整个西方团结起来。但是，其提出的有关问题值得重视。从“文明冲突”中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内部问题在国际上的反射。

（二）亨利·基辛格对世界新秩序的思考

基辛格是美国国际关系方面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外交家。在尼克松总统时代他曾担任美国国务卿与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员，是尼克松总统外交政策的重要设计者与执行人。其在最近出版的《外交》一书中，对冷战后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未来变化与美国的作用作了充分地阐述。

1. 世界新秩序框架：基辛格称，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17世纪的法国，其国际关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18世纪英国采用的是均势，这一概念主导欧洲外交长达200年。19世纪，奥地利的梅特涅重建了整体欧洲的概念，而德意志的俾斯麦则摧毁这一概念，实行强权政治。

美国在历史上并未加入过均势体系，可是，美国却在欧洲均势失衡时参与世界战争。正是大多数美国人不屑一顾的均势保障了其安全，而其破坏则将美国拖入战争。在二战后的冷战中，美国是力量最旺盛之时，有力量按自己的设想构筑国际关系。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自信地宣称，美国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义务以保证自由世界获得胜利。但是，30年后，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已不能像当时那样要求立即实现其所有目标。在一个存在着若干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世界必须将其秩序建立在均衡的概念上——这是美国从来就不喜欢的。

在冷战世界，传统力量概念，即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关联的、对等的概念失效了，出现了各力量的因素相互分离。例如苏联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在经济上却较差。反之，日本是个经济巨人，可军事力量较弱。在冷战后，上述各因素将结合更加紧密，也更加对等。这样，在美国军事与经济地位逐渐下降中，其他军事与经济相结合的大国出现，新的国际体系将趋于均衡。

在21世纪，国际体系将以表面上自相矛盾为特征：一方面是分化，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从国家关系的层次看，新秩序将比冷战时期的僵硬格局更接近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即几个强国并存。将来是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6强和其他中小国家。国际关系则成为真正全球

化，其新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全世界，特别是所有大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与美国过去实行的孤立主义、霸权主义的形势大不相同，适应这一形势及寻求相应的对策和方法，对美国将是新的难题。

对于其他国家，基辛格认为，欧洲是现代世界上运行过多国体系的唯一地区，出现了民族国家、主权和均势概念。但是今天没有一个强大得足以在国际新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国家，而是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来补偿自己的虚弱。这个政治实体过去没有过，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行事，尚待实践。

俄罗斯的历史是特殊的。它与三种文化——欧洲、亚洲和穆斯林世界——相邻，因而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虽是欧洲的均势的一部分，但在感情上却不属于它。在胜利时，它缺乏自我节制，失败时，则陷入阴郁怨恨之中。解体后，俄罗斯发现处于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周边环境。它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身份，是恢复过去的帝国？还是东向参与亚洲事务？对不安定的中东作何反应？同时，俄罗斯是世界秩序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世界秩序也是个潜在力量。

中国，在两千多年间都是在单一帝国统治下。战争不少，多属内战性质。只有在19世纪才受到西方挑战，并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羞辱。二战后才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同样面临着全新的世界秩序。

日本是亚洲逃脱西方殖民主义控制，并走上西方道路的唯一国家。它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冷战中，在苏联军事力量面前，日本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军事上依靠美国。在新的多元化的世界秩序中，日本是亚洲国家，对亚洲关系与均势十分重要、需要奉行一种更为自主和自立的对外政策。

从上述，基辛格认为，那些肩负着建设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都没有处理多国体系的经验，而这一体系正在形成。当今的新秩序还必须将历史上均势体系的属性与全世界的民主思潮及当代的技术迅速发展结合起来。在历史上最稳定的两个国际体系，即维也纳会议体系和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体系，它们都有着观念上一致的有利之处。维也纳会议上的政治家都是贵族，他们对于形而上的东西有着相同的看法，而对本质性的东西能够达成一致；决定战后世界历史进程的美国领导人来自一个特别一致的思想传统。今天的秩序将不得不由那些代表极为不同的文化的政治家建成。

2. 展望世界新秩序：基辛格对世界新秩序的展望是，从美国来看，重要的是不让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或亚洲——出现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其出现是一个对美国的战略威胁的明显标志。无论有没有冷战都是一样。因为由此而形成的集团将具备在经济上，而最终是在军事上，超过美国的能力。美国必须抗击这种危险，即使这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显得十分友善；因为其意图一旦变化，美国就会发现自己进行有效的抵抗和扭转事态的能力就将大大减弱。

为了防止上述情况出现，基辛格对欧洲与亚洲作了地缘政治的战略分析。在欧洲，苏联解体，但俄罗斯一些有影响人物无论信仰如何，都接受不了联邦的崩溃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的合法性。联邦崩溃后，邻国乘虚而入，而俄罗斯则力图恢复其在边缘地带的权威，因而成为紧张局势的策源地。美国与俄罗斯关系，只要俄罗斯不借机恢复原来传统的联邦，则在抵制原教旨主义威胁中亚方面是有共同利害关系的。

在欧洲，摆在欧盟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调整两个决定北大西洋关系格局

的机构，使北约和欧盟适应冷战后的现实。其现实是苏联的崩溃和德国的统一。北约因苏联崩溃而调整，欧盟则因德国统一而变化。为防止德、俄在大陆中心的争夺，美与英、法有共同利害关系。因为英、法对此既无政治力量又无军事力量。在德国统一而对欧洲一体化产生影响上，其解决办法是德国在欧盟内接受法国政治领导，而德国获得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在北约范围内，美国则作为战略领导把德国与西方联在一起。其结果是美国在一体化旗帜下主宰了北约。法国则以鼓吹欧洲独立来塑造欧盟。由此矛盾在于，美国过于在军事领域主宰一切，而无法促进欧洲的政治认同，法国则过于坚持欧洲政治自主，而无法促进北约的团结。

另外，东欧，特别是北部的波、捷、匈等政治上认同于西欧的传统，现成为德、俄之间的中间地带。其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生存，需加入欧盟，在安全上，则指望北大西洋公约。对此，美国原则上反对这些国家加入北约。原因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划一条线，会创造出未来的对抗。美国以和平伙伴关系邀请所有前苏联各共和国、所有东欧各国参加，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集体安全体系。因此，该方案（集体安全体系）既无法解决东欧的安全和把俄国融入国际社会，反而加深东欧的不安全感，损害北大西洋公约。另一方案是，欧盟接纳东欧各国，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把前苏联各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与北大西洋结构联系起来。

对亚洲，基辛格认为，亚洲与欧洲不同，欧洲国家是由共同文化习俗聚合在一起的，而亚洲则各有特性且互相竞争。彼此关系十分类似 19 世纪欧洲的均势体系。一个国家的力量明显增强，肯定会招致其他国家抵消这种力量的举措。

冷战时，日本将自己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依从美国换取经济自由空间。当其认为苏联是安全主要威胁时，美日利益会趋向一致。现在情况是俄远东力量未减，中、韩军事力量增强，美、日外交难以一致，日本须发展自身力量。特别是日本面临其人口老化、经济停滞，要在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俄国恢复其势力之前，全力发挥其技术和战略优势，甚至最后会利用核技术来作平衡。

密切美、日关系既可软化日本，又可减轻其他亚洲国家的疑虑。与美国相联系的日本军事力量，不像纯粹日本军事力量那样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严重不安，同时，可以使日本减少其军事力量。美国在亚洲没有军事力量的存在，美国在亚洲承担的永久性任务就会缺乏可行性。

中国正在走向超级大国的道路，到 21 世纪 20 年代在国民生产总值上将接近美国。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阴影将降临亚洲。无论中国多么克制，亚洲其他国家会像在对日本那样对日益强大的中国之间谋求平衡。在美、中关系上，与中国对抗会使美国在亚洲陷于孤立。没有一个亚洲国家愿意在任何一场认为由于美国错误政策导致的美、中政治冲突中支持美国。这就会使大多数亚洲国家与美国或多或少地离心离德。因此，几乎每个国家都指望美国创建一个包容中国和日本在内的长期框架。

在美、日、中三角关系中，中、日文化虽有很强亲缘关系，日本对中国是既羡慕又害怕，既渴望建立友谊又迫切想支配它。美、中关系紧张会使日本疏离美国，因为日本即使不想趁机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也不愿追随美国太紧以损害其在中国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亦希望从美国那里得到可以平衡它认为强大而贪婪的邻国。因此，良好的美、中关系是良好的长期美、日关系

前提，同时也是良好的日、中关系的前提。在这三角关系中，任何一方想要脱离这种关系都会冒极大的风险。

对于 21 世纪的世界新秩序中美国的作用，基辛格认为，在美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身时，在它发现自己既无所不能又十分脆弱的时代，美国不应放弃使其可称为伟大的理想。但美国也不应对自己的能力存有幻觉而危及这种伟大。美国的理想必须通过耐心地积累局部的成功而逐步实现。

以上是基辛格对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分析，并对美国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及所采取的策略提出其设想。这充分反映美国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中地位和作用下降中，基辛格从美国为中心出发所提出的战略与策略。

（三）Z. 布热津斯基关于“失控世界”的见解

Z.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曾任前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1977—1981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战略学教授兼该校共产主义事务研究所所长，长期担任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他著作甚多，1993 年发表了其新作《失去控制：21 世纪前夕的全球的混乱》。该著作发表引起各方人士的广泛注意。现对该书所反映的世界地缘政治特点与格局介绍如下：

1. 苏联解体的冲击与地缘政治上的真空：苏联的分崩离析使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变为一种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状态。原来是强大帝国向全球意识形态挑战中心，现则成为欧亚大陆两端之间的黑洞。近期虽消除对两端的安全威胁，但长远看则是新的政治危险根源。

300 多年的俄罗斯大帝国的消失，它对周围的西、东、南则投上阴影。在西面，它使中欧通过加入欧洲经济和政治统一过程并在文化上与西欧打成一片；南面与东面各自会由于解除大军压阵而带来的舒缓。但是帝国消失后的情况不大可能带来宁静。在前苏联，数百年的发展，使 2500 万俄罗斯人和 4000 万非俄罗斯人离开其传统家园，移入对方的他乡异地。这种变动已引起矛盾和流血冲突。这种生活在与其相异的民族主义环境中的 6500 万人将是“种族清洗”的政治压力受害者，带来的新的迁移影响范围可能波及原苏联范围以外。原苏联境内俄罗斯与其前各加盟共和国彼此相邻地区目前出现的各种问题多与此有关。

潜在的爆炸性重点可能出现在中亚。那里边界多由过去武断划定，缺乏历史与种族依据。这种情况已出现极不稳定情况。由于该地与南面伊斯兰国家宗教、历史、文化的联系，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都在力图填补其地缘上的真空。其事态发展则与俄国的今后发展有关。俄罗斯对其异地他乡俄罗斯人命运置于不顾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样作还会使俄罗斯本身进一步分化。打出某种新的旗帜或采取强制性不大的方式东山再起则很有吸引力。如此，则会进入一个动荡不安和暴力事件频仍的时期。

由于美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利益，苏联解体使美国在那里成为其行使独一无二优势权力所在地。但当地宗教与民族主义与美国的对立，其优势是十分脆弱的。如果美国不处理好与阿拉伯人、伊斯兰教的关系，不能解决阿、以冲突，则该地的地缘政治真空形成的危险漩涡不仅冲撞俄罗斯，也会与美国相抗争。

该漩涡是一个长椭圆形，由亚得里亚海到巴尔干各国，经中东、波斯湾、巴基斯坦、阿富汗至全部中亚，既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北面达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边界，东到中国新疆边界。这里有近 30 个国家，除民族不同外，

还有许多种族、部族，加上宗教、语言、习俗差异，在民族振兴推动下酝酿着最大限度的危险，前途难卜。

2. 美国的前景和西方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现在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是反常的。一方面，美国雄踞世界之颠，其全球综合力量（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无敌于天下。而另一方面，其社会变革的动力和美国对全世界启示的价值观念的内容，行将损害美国作为全球带头人的特殊作用。因而，人们势必要问：美国能不能保持它特别的地位。从历史经验教训看，如果这种启示不是来源于它自己的内在的道德规范，那么民族的自信心就会变成没有广泛吸引力的民族虚荣心。这说明美国国内状况和对外的国际政治是至关重要的。

布热津斯基列举出的现在美国面临十分严重的难题有 20 个，其中包括债台高筑、贸易赤字、低储蓄和投资、缺乏工业竞争力、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低质量的中等教育、贪婪的富有阶级、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毒品流行、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世风……正是由于这些国内的难题抑制了美国的对外力量与形象。

国内的难题抑制了美国的力量，使美国对外方面既成不了全球警察，也当不成全球银行家，更做不成道德家。例如，1992 年 6 月在里约热内卢国际环发会议上，美国未能组成一个富国联盟以支持自己的较保守的立场。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为了发起战争，美国不得不向欧洲联盟寻求财政和政治支援。这充分反映美国力量的局限。

美国现正从一个由自由人主宰和塑造的社会变成一个全球人拼凑的社会，这将引起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可能使社会凝聚力进一步丧失，也可能引起混乱。

如果美国衰落无法行使其有效的全球权威时，是否有对手能替代美国呢？可能考虑的只有日本和西欧。关于日本尽管其经济可以赶上美国，但是其经济力量是否可以转变成其他力量值得怀疑。如日本虽在海外捐助额超过美国，但接受者认为这是日本剥削他们的回报，只能缓和一下反日情绪。日本岛国文化的特殊性使人感到陌生疏远。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日本，将会引起亚洲的敌对情绪，而成为孤立无援的日本。所以，以上情况说明，日本是难以如愿以偿的。

欧洲由于统一，其力量将非美、日可比，其拥有比日本大得多的潜力，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困难年深日久，尽管最终可能释放出其潜力，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则难以实现其目标。由于群龙无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只能位居美国之后。此外，欧洲联盟的向东扩大上，无论其界限定在哪里，都会涉及与俄罗斯有关的地缘政治问题。

苏联的解体虽然使美国势力雄踞世界之颠，但是也提高了日本与西欧的地位并增强了其对美国的独立性，当然会使其与美国的经济等摩擦的扩大和加剧。

3. 世界格局与中国的角色：布热津斯基认为，世界的地缘政治形势变得日趋复杂，不是出现新世界秩序，而是出现为维护本身利益的国家结成多极的组群——团伙。它既是政治联盟，又是相互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可能出现的多极组群如下：

(1) 北美组群。由美国控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从

而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集团，还可能导致加拿大逐渐与美国合并。

(2) 欧洲组群。经济上可能实现一体化，但政治统一则落后于经济进程。面临的问题，对内是强大的德国，对外是东欧形势的不稳。其附属区是东欧和非洲大部分地区。

(3) 东亚组群。经济由日本控制，但缺乏相应的政治与安全体系，存在地区紧张局势可能性。它的附属区是俄远东地区，东南亚和澳、新地区。

(4) 南亚组群。可能缺乏政治和经济内聚力，但同时又不受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的严格控制，印度是区域大国，但受西部和西北部伊斯兰国家反对。

(5) 穆斯林新月区域。它横跨北非、中东、土耳其、波斯湾国家和伊拉克，往东穿过伊朗、巴基斯坦，向北到中亚各国。它们有许多相同的愿望与愤恨，但易受外国来的入侵并缺乏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的内聚力。

(6) 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这是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黑洞”，受俄罗斯所控制，该群组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明朗。其地域包括前苏联领土大部分，其地区与周围组群有重叠。在此地区易出现紧张关系。

除政治问题外，世界发展中的贫富国家差距由本世纪 60 年代的 30 倍，到 90 年代的 150 倍，是世界问题的一个焦点。这也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以其 10 多亿人口，如果能成功建设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它必然成为全球注意焦点。那些急不可待地想寻求适合本国样板的较贫穷的国家必然对中国趋之若鹜。

从总体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虽然用全球标准衡量，中国仍然是个穷国。如果这种速度保持下去，到 2010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如果是这样，中国可能不要太长的时间就会在全球事务中采取较为坚决而自信的姿态。中国面前可能摆着三种全球性战略选择：

第一，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第二，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区扩大影响，向日本的政治权势提出挑战。第三，中国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假定它被欢迎加入这一俱乐部的话。

对于这个失去控制的世界，布热津斯基认为，要实现全球和平、要促进全球福利……一是欧、美和东亚（主要是日本）三方合作，二是通过联合国并使之成为全球政治的更广泛的和更有代表性的体系。另外，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的精神危机。

布热津斯基的上述地缘政治学的见解，是从美国等所存在的内部矛盾分析着手，在出现美国力所不及的失控的现实中，为其出谋划策。

六、地缘政治格局与经济发展

以上所述的各种论说，都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地缘政治格局与某种因素或条件的关系。例如，拉采尔是从生物的规律来看待作为地缘政治中重要的单位国家的成长与变化，马汉的海权论是从海洋来对待地缘政治，可是，麦金德和斯皮克曼则分别从大地理的大空间及历史的重大事件的背景上来看待影响世界进程的地缘政治大格局，而柯恩又是从区域的各种因素的整合情况来研究地缘政治的格局。总之，这些因素和条件毫无问题是对地缘政治格局有重要作用和影响。但是，还没有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其与地缘

政治格局的关系，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些学者对这问题的理论与见解。

（一）康德拉捷夫的经济长周期理论

经济发展的周期现象早已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注意，但是所研究的周期的时间尺度多集中在中、短期，注意长周期的比较少。康德拉捷夫的周期长约半个世纪，故称为长周期理论。

康德拉捷夫是苏联经济学家，于 1925 年发表《经济生活中的长波》论文。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包括三个长波。每个波段持续约 50 年到 60 年。后经他人补充修正，从 1780 年到今天共为四个波段或四个周期。每个波段或周期又分为 A 和 B 两个阶段。其各波长与持续时间及阶段划分如下：

第 1 周期：1770/90 年—A₁ 阶段—1810/17 年—B₁ 阶段—1844/51 年

第 2 周期：1844/51 年—A₂ 阶段—1870/75 年—B₂ 阶段—1890/96 年

第 3 周期：1890/96 年—A₃ 阶段—1914/20 年—B₃ 阶段—1940/45 年

第 4 周期：1940/45 年—A₄ 阶段—1967/73 年—B₄ 阶段—

这些周期在时间秩序方面由许多国家的工农业生产的广泛经济情况所确定。根据其阶段的划分，我们现在是属于第 4 周期的 B 阶段。

对这种周期与阶段划分在学术界中大体认识较一致，但是其原因则较为分歧。康德拉捷夫夫人坚持认为，长波的存在，“不论怎样，是可能的”，但没有提供系统的理论，只不过略述了物价水平、利息率、工资、对外贸易、生产以及消费等有关因素的数据。支持此学说的人认为，此周期与技术变革有关，A 阶段与采用技术革新的主要时间有明显的联系。例如，A₁ 是棉纺机械与蒸汽机的应用时间，A₂ 是炼钢及铁路技术应用时间，A₃ 则是汽船与电力广泛运用之际，A₄ 则与石油化工与汽车工业大发展时代（其后期又出现宇航与电子工业）。在每个 A 阶段新技术采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后就接着一个停滞时期。为什么生产的发展表现这阶段的阶梯方式及技术革新采用集中出现，这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的结果，是由其历史系统内在机制所产生的。物质基础组织中的矛盾不可能出现线性的累积增长，中间出现停滞阶段则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市场经济，彼此追逐利润的企业单位是各自以其自身利益进行决策，缺乏中心的控制与宏观调控的。所有企业单位都是按短期当前利益作决策。在 A 阶段时，各投资者应用新的技术的企业获利，出现经济发展的好时期。为获得盲目大量投资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经济的停滞，A 阶段的结束。在 B 阶段，企业获利情况不佳，因而投资裹足不前，生产下降，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出现经济大萧条。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形成的经济上升与停滞的循环交替。A 阶段由于投资过分集中于某新技术部门产生许多矛盾，这就需要在 B 阶段进行调整，重新组合，为新的生产扩张和应用新的技术创造条件，这也就是康德拉捷夫的变化、演替的原因。

上面谈的康德拉捷夫波是工业化在英国开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情况，那么在此以前，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经济情况如何呢？是不是也有某些类似康德拉捷夫波的现象呢？由于资料的缺乏，尚无确切的与比较公认的结果。不过也有些学者，例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就认为存在这种波。这种波时间很长，达 300 年，也分 A 与 B 两阶段，称为逻辑斯蒂波（‘Logistic’）

wave) , 其持续时间如下 :

1050—A₁—1250—B₁—1450

1450—A₂—1600—B₂—1750

第一个逻辑斯蒂波表示, 欧洲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兴衰及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沃勒斯坦因 (Immanuel Wallerstein) 对该波作了解说。在第一个逻辑斯蒂波中, 其 B 阶段反映整个欧洲农业的收缩, 这就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危机。其最终的解是转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也就是逐渐出现的欧洲对美洲的剥削和掠夺, 新贸易格局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结果就出现一种新的系统, 即以农业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欧洲人的世界经济。该系统本身构成第二个逻辑斯蒂波中 16 世纪的扩展, 成为 A₂ 阶段, 其后就是 17 世纪的停滞的危机, 即 B₂ 阶段。B₂ 与 B₁ 不同, B₂ 是停滞, B₁ 是下降。在停滞中, 是物质生产基地重新组合, 某些集团与地区获利, 而其他集团与地区则受损。这点与康德拉捷夫 B 阶段相似。

(二) 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

1450 年以后, 欧洲的经济开始向其以外地区扩散, 到 1900 年, 它已扩展到全世界, 形成一个欧洲人的世界经济。商业活动在其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但是, 这时的商业不像古时只是些奢侈品的交易, 而是对生活、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商品交换, 它并把不同的地区联系起来, 形成紧密的关系。

由欧洲开始的世界经济最初包括的范围是西欧、东欧和伊比利亚人所控制的南美和中美的某些地方。世界的其余地方由于与欧洲经济联系少而并不重要, 所以属于外部地区。葡萄牙那时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些贸易, 但与西班牙人在拉美的活动相比则弱得多。

从这时以后, 欧洲人的世界经济迅速向外扩张, 其顺序是加勒比地区, 北美、印度、东亚、澳大利亚, 最后达到太平洋群岛。其世界经济范围扩大所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开始是赤裸裸地掠夺, 接着是殖民带来的一些生产活动。这些是出现在拉美的模式。在澳大利亚和北美则不同, 是把土著经济给予破坏, 建立完全新的经济。还有一种模式是现存的社会虽然原封不动, 可是其经济却转向服务于其所处的世界经济的广泛需要。在印度, 这种模式是通过政治而获得的, 在中国则是通过强迫开放市场而取得的。通过各种方式把这些地区纳入世界经济, 从而消除了这种外部地区。

在世界经济中, 各个地区在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按经济上的地位与作用的差异, 可以分出核心与边缘。核心是指经济发达、工资高、技术先进, 是多样化的生产组合, 在经济上剥削其他地区的地区。边缘是指经济落后、技术简陋、生产单一化, 在经济上受先进地区剥削的地区。我们在区分核心与边缘时, 需要注意的是核心过程还是边缘过程, 这对该地区向那一种地区发展十分重要。例如, 在 19 世纪末, 印度和澳大利亚都是向英国提供纺织原料, 前者是棉花, 后者是羊毛, 可是两地社会关系情况不同, 印度则变成边缘地区, 澳大利亚则发展成为核心地区。

就全世界而言, 最早核心地区在西欧, 而后扩及北美和日本。边缘地区原只在拉美, 后扩大到非洲和亚洲广大地区。只有西欧一直维持着核心地位。由于核心和边缘地区是一种动态过程, 有的地区不是一种过程, 而是核心与

边缘两种过程都存在，即该地既受核心地区剥削，又剥削其他边缘地区，所以可以称之为半边缘地区，是特殊一类。这类地区在 B 阶段的重新组合时，有的则上升为核心地区，例如，中欧、北欧与美国都是由半核心地区上升到核心地区的。

（三）全球政治的长周期

莫德爾斯基(C. Modelski)于 1978 年在其《全球政治长周期及民族国家》文中提出了关于大国变化的长周期，后来在其《世界政治长周期》专著(1987 年)中作了些修改。他确认，从 16 世纪至今，有五个周期，四个世界首席大国。他认为，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发现国际政治并不是无政府状，而是呈明显对称性。另外，他对那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利用经济因素贬低政治过程价值的观点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全球政治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所以两者是两种逻辑，而不是一种逻辑。

莫德爾斯基的全球政治系统是从 16 世纪开始的，16 世纪是葡萄牙世纪，17 世纪是荷兰世纪，18 与 19 世纪是英国世纪，20 世纪是美国世纪。在五个世纪中，各有一个世界大国。由于英国占了两个世纪，故成为五个世纪，四个大国。该大国在其世纪中的过半时间内起维持全球政治系统的秩序的作用。

每一个大国在其周期内的兴衰由几个步骤组成。周期是从一个由于严重竞争的世界战争导致全球组织结构衰落时开始。这种战争有较大的地理范围，也有全球性损益，胜利者就能安排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系统。该阶段结束是以一项合法的条约的签订来完成的，从而就以一个新的世界大国为中心而建立其正式的新的世界秩序。因为没有一个大国能长期维持其对世界的控制，所以，衰落阶段就必然会出现。起始时，世界秩序是两极结构，而后是多极的，多极竞争就给系统组织再次带来衰落，也就为新的世界大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莫德爾斯基的单纯的政治过程受到批评。因为国家系统和经济系统是属于世界经济这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没有两种逻辑，只有一种逻辑。世界经济不在具有市场竞争的政治框架内也就无法运行。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变化机制不单是政治和经济，而是二者共同作用。

在上述五个周期、四个世界首席大国中，突出的是出现三次霸权，即荷兰(17 世纪中)，英国(19 世纪中)和美国(20 世纪中)。霸权是指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都居于支配地位。其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霸权国家在生产效率方面超过其对手。第二阶段，该国使其商人建立起商业方面优势。第三阶段，该国银行家能够获得对世界经济的金融支配权。只有当该国在生产、商业和金融都超过其对手时，才能得以建立其霸权。霸权国家不是依靠威胁某些国家主权，而是靠平衡的力量阻止其对手的挑战以左右国际关系的。此外，霸权国家还到处兜售自由思想。所以，霸权国家并不单纯是一个世界的政治上的首席国家。

在霸权建立之后，跟着的就是衰落。其敌手模仿其先进技术，赶上其生产效率，因而在生产、商业、金融上取得胜利之后就可取代其地位。在英代荷、美代英的霸权转移过程中，由于其联盟关系，未出现大的波折。

（四）英、美世纪与康德拉捷夫周期

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从 1770 年开始的，到现在大约是 200 年，四个周期，恰好与英、美两个大国的世纪相符，其各占两个周期。这充分表明政治机制

是世界经济出现周期重组中的一个不可缺乏的组成部分。

在 P. 泰勒的《政治地理》书中，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其要点如下。国家政治是世界经济变化中的重要过程。因为国家政治既不是个独立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必要性的反映，而是有某种选择性。没有这种选择性就失去国家这一制度的存在的理由。国家机构为其所控制的集团的利益就有改变市场力的作用。所以，在自由贸易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没有一个“纯”的世界经济。一个国家的力量及其影响市场的能力，是由其支持者的力量与资源情况所决定的。大国可能推行一种“自由市场”经济，而弱国则通过保护主义来保护自己。这样，国家就起着介质的作用。这就增加了市场经济的极化作用。

在世界经济方面，相对位置对国家的重要性往往超过该国的绝对力量的大小。相对位置不仅指与其他国家的相对的区位，也指与世界经济中物质资源可利用性而言。物质生产的周期性就意味着，对实行不同政策的国家的机遇是随时间而不同的。在任何情况下，成功的国家总是有限的，每个成功的国家总是缩小了其他国家的机遇。即使“正确”的政策，也不可能使所有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国家成为像核心地区国家那样。

霸权国家的兴衰与康德拉捷夫周期相关，则是政治与经济相关联的很好例证。根据沃勒斯坦因研究，英国在其划分的阶段中， A_1 阶段（1790/8—1815/25 年）的对手是法国，英国通过工业革命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 B_1 阶段（1815/25—1844/51 年），英国由于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因而它在拉美和印度的商业方面战胜了对手，并且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 A_2 阶段（1844/51—1870/85 年），由于英国的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生产、商业和金融方面的优势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B_2 阶段（1870/85—1890/96 年），由于在英国以外的工业革命，德国和美国作为英国的对手出现，英国在生产效率方面不再能支配其对手。所以，在世界市场方面出现激烈竞争。英国此时则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试图维持其在市场的份额和在边缘地区的既得地位。

这个横跨两个康德拉捷夫周期的英国霸权的兴衰，其包括的四个阶段，正好说明其上升、取胜、成熟和衰落过程。在康德拉捷夫的第三、四周期中的美国霸权的兴衰也是经历了与英国相同顺序阶段。其第一阶段（1890/6—1913/20 年）是美国霸权的上升阶段，生产效率高，与德国竞争以取代英国。第二阶段（1913/20—1940/5 年）是美国霸权的胜利阶段，在商业上由于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的失败而战胜英国，在军事上击败德国而消除此对手。第三阶段（1940/5—1967/73 年）是美国霸权成熟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了美元在世界金融上的地位的自由经济制度，和纽约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表明美国霸权的垄断地位。第四阶段是从 1967/73 年开始，这时美国开始转向实施保护主义以抵制日本和欧洲的新对手。

上述的英、美霸权的兴衰与康德拉捷夫的经济周期变化有明显相关性，从世界的地缘政治的秩序过程来看，亦有明显的相关性。根据 F.H. 欣斯利（F.H. Hinsley）1982 年《现代国际系统的兴衰》一文资料，现代国际系统起始于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那时法国的大革命与拿破仑发动的战争结束以后，欧洲的政治家有意识地设法建立一种跨国的政治系统，使破坏和平的国家难以获得行动的机会，从而维持了欧洲的和平。正是以这一新的出发点，

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权力配置，这就是所说的第一个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在地理上，这个系统包括两个地区。一个是欧洲大陆，通过不定期的聚会以调整欧洲大国间的政治分歧，从而导致欧洲的合作。而在欧洲以外地区，则没有这种协调。正是这种世界秩序有利于英国霸权的兴起。这种世界秩序既可以使英国保持欧洲的平衡，不会受到大陆上的大国来的像拿破仑那样的挑战，又使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自由地发挥支配作用。这种世界地缘政治可以称之为“霸权和合作的世界秩序”。

这种秩序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 60 年代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世界发生许多重大变化，有美国的内战，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俄罗斯、奥斯曼帝国以及东方的日本的现代化的进展。这表明国际系统失去控制，上述秩序的解体。于是在 1870—1871 年，随着德国击败法国，德国帝国宣告成立，出现了第一个地缘政治的转折。这时德国在欧洲大陆居支配地位，使英国的平衡政策在大陆上失效。这样伦敦和柏林成为世界秩序的两个中心。虽然两强并立，但德国忙于巩固其在欧洲的地位，英国则设法加强其在水世界其他地方控制，所以维也纳会议以来的长期和平仍能得以继续。这就形成“对立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该世界秩序的持续时间较短，到 90 年代就失序了。法、俄于 1894 年结成联盟，使德国两面受敌。另外，欧洲在世界的地位，由于美国和日本作为潜在大国的出现而受到威胁。特别是英、德的对立使“对立与合作的世界秩序”失去合作而消失。19 世纪末，英国霸权显然已经过时，但仍然是个最大的政治大国。英国此时不得不修改其对外政策，构筑新的世界秩序。世界地缘政治的转折出现于 20 世纪初。

英国于 1901 年与日本签订海军协定，分别于 1904 年和 1907 年与法、俄缔约形成反德阵线。这都是形势所迫，英国不得不摆脱“光荣孤立”的政策，并与宿敌法、俄联合，使不可能成为可能。这种在本世纪初建立的大国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 1945 年纳粹德国的被击败。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英国在本世纪的大约前半世纪继续作为居支配地位的大国、形成地缘政治上的“英国持续的世界秩序”。二战后，该秩序就寿终正寝，美国在瓜熟蒂落之时才取代英国，成为霸权大国，在世界上居于支配地位。世界秩序在 1944—1946 年，由于战后美、苏由合作转向对立，向“冷战的世界秩序”过渡。

90 年代，苏联的解体，标志冷战的世界秩序的结束，也表明美国的衰落。现在可以说是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新的转折期，它向什么模式的世界过渡则是许多学者与专家们十分关切的。本章第四节柯恩的 1991 年的新图式以及第五节中的各种地缘政治见解，都是反映对新的地缘政治的未来进行的探索。当然，与以前的各种地缘政治学说一样，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作者所属的国家，阶级或集团观点、思想和利益。

第九章 两次世界大战与国际政治格局

在第七章中，我们介绍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它实际上是西欧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对欧洲以外的美洲、非洲和亚洲实行殖民统治，掠夺其财富。由于时间的变化，不仅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地域扩大、分割发生变化，控制和掠夺方式有所不同，而且帝国主义本身也在发生变化，它不仅涉及到参与殖民活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数量在增加，而且彼此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在不断变化。正是后者的这种变化才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它们集中于欧洲，所以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也集中于欧洲。其发展终于在欧洲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影响十分深远。因此，了解当前世界的国际关系、政治的地域空间格局必须具备这方面知识，否则难以有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本章将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两次大战之间共约半个世纪中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及政治的地域空间格局特点作简要介绍与分析。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

1. 德意志的统一和意大利的统一：在荷兰从与英、法争夺海上贸易与霸权败下阵来以后，18世纪就开始了英、法两国的争夺。两国经过一系列争夺与战争，特别是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法国在北美与印度的殖民地与特权大都让位于英国。英国此时正开始工业革命，在强大经济力量的支持下，垄断了海上贸易，成为霸主。法国虽然在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中失利，但是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1789年的大革命后，拿破仑当了皇帝，曾依靠军事力量征服欧洲大陆许多地方，最后失败于对俄国的远征。这说明法国是欧洲一个陆地强国。

由于英国工业革命向欧洲大陆扩散，使欧洲大陆国家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加上民族主义兴起、德国的统一和意大利的统一、各国实行的改革，在欧洲出现了几个强国。除岛国英国、大西洋沿岸的法国外，向东有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这六个国家不仅在世界各地争夺殖民地，而且也在欧洲展开竞争，政治格局不断变化。

在法国的东面原是个松散的德意志帝国。在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使德意志帝国形成成为300多个互不相关的公国、侯国、伯国、主教领地、自由城市国家和骑士领地。其中，南部的奥地利除以维也纳为中心的领地外，还包括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波兰的加里西亚、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意大利的蒂罗尔，在1867年，成为奥匈帝国。北部的普鲁士从18世纪开始实行工业化，并不断扩大其领土逐步强大起来。普鲁士帝国在俾斯麦担任首相时，于1866年、1870年分别在战争中战胜了奥地利和法国，排除了内、外阻力，统一了德意志，成为德意志帝国。

原来分裂为八个小邦的意大利，也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撒丁王国为核心逐步扩大。于1870年普法战争时，法军撤出罗马，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完成统一大业，成为意大利王国。

2. “三国同盟”的形成：德、意的统一使欧洲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来在法国的东面是分裂的德意志各邦，东南部是分裂的意大利，这使法国感到安全。现不仅德、意各自统一，而且自认是西欧霸主的法国却败于新出现的普鲁士不得不大为震惊，难以吞下这个苦果。东面的俄国，对原来西边领土不大的普鲁士并不感到是个威胁，在与普、奥相互关系中，认为自

己具有优势。而今，普鲁士不仅能打败奥地利和法国，而且统一了德意志，成为一个超过法、奥的大国不能不使它感觉受到严重威胁。位于中欧的奥地利原先在北面可以左右分裂的德意志，南面又可对意大利北部施加影响，东、西两面则可以协调法、俄，有很大回旋余地。现在则夹在德、意之间，深感不安。

战败了法国而又实现统一的德国清楚地认识到，介于法、俄之间必须与一方建立紧密联系，否则就会两面树敌，自己就会在两面作战中失败。德国要加强自己的力量必须与其民族、语言、文化相同的奥地利建立联盟为基础，才能在中欧站稳脚跟，应付各种局面，特别是防止法国的报复。为此，德国与俄、奥于 1873 年建立了“三皇联盟”。

奥地利与德国不同，它与匈牙利组成奥匈帝国包括着诸多民族，它深深地陷入巴尔干半岛的矛盾中。它的侵略与扩张是向着巴尔干半岛。俄国也趁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时，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因为那里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斯拉夫人要争取独立和解放，俄罗斯则可以借支援斯拉夫人之名，扩大自己势力范围并进入地中海。俄、奥的矛盾使德国居间很难调和，于是“三皇同盟”很快解体。

俄国因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与奥发生冲突，感到德国偏袒奥国而于 1878 年退出“三皇同盟”。这样“三皇同盟”就只留下德、奥两国保持同盟。这时，新统一起来的意大利，在地中海南岸掠夺殖民地中与法国发生尖锐冲突。原来，意大利以为距离其最近的突尼斯会落到自己手里，未想到被法国抢去，这使急欲在地中海建立势力范围的意大利感到自己不是法国对手，如果没有与之结盟的国家支持，就无法在地中海与法国抗衡。这样，意大利就不能不找到德国，因为只有德国才能在欧洲大陆与北非殖民地的争夺中制衡法国，有利于自己。不过意大利与奥地利在边界领土上与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也有利益上的矛盾。为了取得德国的支持，意大利不得不与奥地利在一些问题上妥协，而于 1882 年加入德、奥的盟约，形成“三国同盟”。

3. “三国协约”的出现：“三国同盟”的形成，法国感到对付东面一个德国已感吃力，又加上一个意大利，对自己安全感到威胁很大。当时的英国对大陆推行“均势政策”，不愿参与结盟，而且在非洲的东部与亚洲的中南半岛与法国还存在深刻的矛盾。所以，法国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欧洲东部的俄罗斯。俄国在“三皇同盟”结束后，在欧洲的扩张到处受阻，缺乏盟国支持，亦急需寻求同盟。法、俄由于双方共同利害关系，于 1891 年订立“政治协定”，1894 年签订“军事协定”，规定在“三国同盟”有关国家向法、俄进攻时，法、俄就应出兵共同打击入侵之敌。

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岛国，始终是以维持超级海军大国地位来制约欧洲国家的。对欧洲陆地国家，既不能容忍其海军力量发展到可以向英国挑战的地步，又不容忍欧陆出现一个霸主。其采取的主要办法就是设法使欧洲陆地国家间保持平衡和均势，并不与其他大国建立军事同盟，以保持自己有较大的自由与回旋余地。它往往采取支持、资助较弱的一方向较强的一方挑战，以分散、削弱、牵制和打击较强一方，使其无力量与可能同英国竞争，特别是同其在海上争雄。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初，英国与法、俄在亚、非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矛盾较多，而“三国同盟”的德、奥、意在与法、俄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很多是与英国利益相一致的。所以，英国当时立场明显地偏向三国

同盟。

但是，英国与三国同盟中的基础是英、德关系。英、德关系除受彼此与法、俄关系影响外，还受英、德两国本身的关系所制约。德国战败法国后得到一大笔赔款，又拿到了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区，工业发展迅速，例如，在国民生产总值上，1870年德国为英国的84.7%，而到1890年则为89.8%。在钢铁生产上，英国钢产量在1890年是 8×10^6 t，是德国的48%。正是德国在工业生产上的发展赶上与超过英国，使德国在争夺殖民地、海外投资、发展海军方面与英国发生尖锐矛盾。

在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方面，除了在西南非、东非、中国山东等地区德国与英国发生冲突外，更重要是在巴尔干与西亚地区。从19世纪末，德国积极开展修筑一条从柏林经君士坦丁堡到伊拉克的巴格达的铁路的活动。这条铁路穿过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到达波斯湾，不仅德国可以获得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德国开辟了一条到达亚洲波斯湾的快速通道。出了波斯湾就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这对英国在印度与远东的利益带来巨大威胁，英国当然是无法忍受的。

在海军方面，德国意识到，没有强大的海军不仅无法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也无法保卫自己海岸的安全。当德国的工业基础赶上英国时，德国就于1898年和1900年分别通过其第一个和第二个海军发展方案。在发展方案序言中明确宣布，德国必须保持足够的海军力量，以至在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作战时，能够威胁那个国家的优势。按照这个方案英国和德国两国在1900、1910、1914年战舰吨位比例分别如下： $1 : 0.26$ 、 $1 : 0.44$ 、 $1 : 0.48$ 。结果，德国海军发展速度加快，从1900年的世界第五位上升到1910年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由于英国在1898—1901年与德国谈判海军控制失败后，也加紧了海军的建设，到1914年大战开始时，海军战舰吨位达到 2.71×10^6 t，比1900年的 1.06×10^6 t吨增加了1.55倍。

英国感到德国的经济不仅会赶上自己，而且会超过自己。以这样的经济基础与力量，德国终将成为欧洲的第一强国，同时也将是英国海上霸主的最大竞争者。面对这种前景与形势不得不将其原来的依均势和平衡所确定的方向拨向另一个方向。在面对“三国同盟”的强大压力下，法、俄也分别调整其与英国的关系，采取妥协。于是英法、英俄分别于1904年和1907年签署协约，结成了与“三国同盟”相对立的“三国协约”。欧洲的六个强国恰好形成三对三的阵势。一个是位于中欧，南北相联；另一个是东西并列，形成夹击之势。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与过程

1. 起因：一战的爆发地是在巴尔干半岛。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原来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该半岛上居住着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希腊人，民族情况十分复杂。1830年，除希腊获得独立外，其他民族都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到了19世纪后半期，奥斯曼帝国十分虚弱时，这里就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焦点。奥匈帝国紧靠其北，而且已占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积极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展，企图控制更多的领土，于是亚得里亚海变为奥匈帝国所控制。这点得到德国的支持，但德国希望维持奥斯曼帝国统治，以利于其向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俄国则想通过支持被奥斯曼帝国所统治的当地各民族的独立，特别是塞尔维亚人的全部解放与统一而扩大其势力范围，借机进入地中海。英、

法为其近东利益阻止德国南下，俄国西进以保护苏伊士地区安全等目的，支持希腊，不希望奥斯曼帝国被分割。意大利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岸，东与巴尔干半岛相望，亦想进入该地，以获得土地与利益，并使亚得里亚海成为其内海，甚至想在地中海东部建立势力范围。由于这些原因，使该地成为欧洲一个大角逐场所和最后一块尚未明确分割的地方，所以巴尔干有“欧洲火药桶”之称。

1875年，巴尔干半岛爆发大规模民族起义。俄、奥商定，俄同意奥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同意俄向黑海东岸扩张。由于塞尔维亚被奥斯曼打败，俄遂于1877年直接出兵，进逼伊斯坦布尔。英国怕俄独霸黑海海峡，派舰从进入海峡。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承认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三国独立、奥匈获得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政管理权（名义上仍属奥斯曼帝国），俄国获得南比萨拉比亚及黑海东岸一些领土，英国取得塞浦路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仍保留有相当大的领土。

1908年，奥斯曼帝国发生革命，俄、奥又商定，俄同意奥匈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匈则支持黑海对俄开放。结果，奥匈达到了目的，俄国的要求则受多国阻止未能实现，就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奥匈合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结果奥匈在德国支持下，态度强硬，俄只好退让。在这次较量中，俄国感到奥匈有德国支持，自己无英、法的支持在巴尔干难以立足，意大利对奥匈在巴尔干的进展开始不满，为阻止奥匈而与俄秘密接触，并对“三国同盟”产生离心倾向。

1878年，俄、土战争，保加利亚参加俄方，后在保加利亚北部成立保加利亚公国。1885年与南部保加利亚合并，并于1908年脱离奥斯曼独立。巴尔干的各国虽独立，但是仍有一部分本民族的居民在奥斯曼的统治下，所以保、塞等国对领土的愿望仍未满足，因而矛盾重重。在俄国积极支持下、保、塞、门、希四国遂组成同盟，企图肢解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四国同盟”也得到英、法的支持。

1912年10月，四国先后向奥斯曼宣战，塞尔维亚人进入瓦尔达尔河上游、新帕扎尔州和阿尔巴尼亚北部，到达亚得利亚海岸，希腊占了萨洛尼卡，保加利亚逼近伊斯坦布尔外围，阿尔巴尼亚趁机宣布独立与中立。英、德出面调解，奥、意积极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以此阻止塞尔维亚的扩张及进入亚得利亚海。保加利加和希腊瓜分爱琴海北岸地区。为争夺阿尔巴尼亚，奥、塞互不相让。奥准备入侵塞，未获德支持。塞失去亚得里亚出海口，要求保让出马其顿南部领土以作补偿，但遭拒绝，遂种下保、塞不和种子。关于奥斯曼保留在欧洲的领土问题，德国给予了支持。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俄国所支持的“四国同盟”各自扩大了领土。但是，塞尔维亚人建立大塞尔维亚及获得出海口的愿望未能实现，加深了与奥地利的矛盾。另外，塞与保由于分割领土的意见不一而产生对立，使“四国同盟”失去继续存在的基础。奥斯曼在其领土被瓜分之际德国支持了奥斯曼，这增强其以后对德的倾向。俄国和奥在巴尔干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在那里的领土大部已损失，俄国支持的四国同盟控制着大片领土，就使得“同盟国”对俄战争中其右翼十分薄弱，因此，俄积极设法拆散“四国同盟”。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不仅受到塞尔维亚要求重划领土压力，也受到希腊与罗马尼亚要求领土的压力。保要求俄予以仲裁，但遭拒绝，遂转向奥匈。保在奥匈支持下，于1893

年夏向塞进攻，希、罗根据与塞的同盟条约出兵攻保。结果，保在其发动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很快以失败告终。保原来获得的领土大部失去，还赔上一部分自己的领土。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的政治结果是，各国阵线分明。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已倾向于德、奥，而塞、希、罗已与“三国协约”联成一体。其次，巴尔干几次战争中，塞尔维亚得到壮大，与奥的冲突已越来越严重。塞想从奥手中拿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组成大塞尔维亚，而奥匈如不击败塞就难以保证其继续占有波黑。第三，俄、奥几次因塞而剑拔弩张，都因法、德而退让。现在彼此阵营分明，矛盾深化，“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都已有所准备，冲突爆发已不可避免。

1914年6月28日，奥匈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组织军事演习，目的是向塞示威。结果，奥太子斐迪南去现场检阅遇刺身亡。奥在得到德国支持后于7月23日向塞发出包括十项严厉条款在内的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尽管塞答覆已基本全部满足奥要求，但奥仍于7月28日向塞宣战。俄于30日宣布总动员。德于8月1日宣布向俄宣战。8月3日德进攻比利时并向法宣战。英国于8月4日向德宣战。一场世界大战就从欧洲开始了。日本于8月23日向德宣战。原参加“三国同盟”的意大利却到1915年5月23日反而向奥匈宣战，加入“三国协约”阵营。

2. 过程：从1914年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到1918年11月11日德国签订停战协定投降，战争共经历了四年多。其经历过程大体如下：

(1) 1914年战况。在战争开始前，德国就拟订好作战计划，准备速战速决。考虑到俄国领土广阔，动员时间缓慢，战争如不短期取胜，会陷入难拔境地，所以确定先进攻法国。预定以四到六个星期时间击溃法国，然后挥师东进，预定三四个月打败俄国，结束战争。这样可以避免东、西两面作战，受夹击的危险。

在西线，德国面对的是法、英，要速战速决，就要使英军一时无法大量支援法国。这样，就可以大军压境，把单独抵抗的法军打垮，使英军无以立足。但是，法国与德国的接壤处的阿尔萨斯与洛林是山地、丘陵，德国的部队难以展开；而法国由于地形条件不但做好防御准备，同时亦布置重兵，企图攻占阿尔萨斯与洛林两地，藉以收复失地，振奋人心，压倒德国，威胁其经济中心莱茵河谷地。所以，德国采取假道比利时，直接进入法国北部。这里地形平坦，不但部队可以展开，战线长，利于德国的突击进攻，不利于法国急促应战进行防御。同时，德军由比利时入境，向西南逼近海岸阻止英军，再转向南绕过巴黎向东，迂回包围法军主力，决战于法东北，以求全胜。

当德军大举进兵比利时，却遇比意外的顽强抵抗，德军直到8月21日才由卢森堡、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一线分兵五路向法挺进。9月3日已到达巴黎东面的马恩河上，最前锋距巴黎只有15千米。9月10日至15日，德军主力与英、法联军会战于巴黎东面马恩河两侧的奥尔奎河与小莫林地区，打了一场著名的“马恩河战役”，双方投入兵力共200万，德军伤亡21万，法军伤亡14万。德军失败，退到法国北部，即凡尔登以北，西到拉昂以南，向北到索姆河上的佩罗纳以西，再到比利时海边城市奥斯坦德一线。德国的西部战线就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在长达700千米长的阵地上掘壕以守。

在西线，马恩河战役后，双方虽再次展开会战，但战线变动不大。虽然德国进攻目的未能达到，但却占领比利时全境、法国北部要地、威胁巴黎。

法军虽阻止了德军进攻，但损失军队 60 万，英国远征军亦损失严重。

在东线，是德、奥与俄国对阵。在西线德国对英、法对阵，都是二比一。不过，对德国来说，则是两面受敌。德国估计，俄国国土广阔，交通不便，动员集中准备需时较多。所以，德国希望速战速决解决法国问题以后，再调转兵力来与奥匈一起与俄国决战。德国认为俄国虽然军队数量等于德国与奥匈两国之和，但装备、训练都较差，战斗力比较弱。德国与俄国接壤界线较长，从东普鲁士向西南到华沙以西，再向南直抵喀尔巴阡山麓。与奥匈接壤是华沙以南，喀尔巴阡山麓以北之地。对德国来说，东普鲁士恰好向东北突出，易受攻击。战争开始后，奥匈军队主要向塞进攻，德军主力向法进攻，东线德、奥取守势。但俄国从同盟角度，在德主力西向之机正是进攻好时机，既拖着德国，使其分兵东西，东线压力增加迫使其从西线抽兵东援，削弱进攻势头，又可使其腹背受敌。抽兵东援确也是马恩河之役失败的原因之一。8 月 20 日正当德军由比利时向法国北部大举进攻时，俄即以数量优势兵力进入东普鲁士。其目的是占领东普鲁士以支援法军。由于俄军在马祖里湖沼泽地带的南、北两面向德军进攻。两方面的军团分头前进，配合不好，于 8 月 31 日遭到失败，损失严重。

在进攻东普鲁士的同时，俄军于德涅斯特河到维斯瓦河之间 300 千米地段向奥匈军队进攻。从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的战斗，奥匈失败，损失颇大。德军由东普鲁士调军与奥匈在华沙东南的卢布林至桑河联合进攻，从 9 月下旬到 11 月，俄军先败后胜。

奥匈军队在南部，从 8 月到 12 月，三次进攻塞尔维亚，但都未能立足而被逐出。此外，在德国拉拢下，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后者于 11 月初分别与俄、法、英开战。原来德国利用奥斯曼在南方拖着俄国，阻止英、法通过黑海海峡援助俄国，并在对苏伊士运河上威胁英国，发挥作用。但是，奥斯曼在高加索方面的进攻于 12 月败于俄军，在抵抗英军和法军方面，于 1915 年 8 月—12 月在西部苏弗拉湾（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萨罗斯湾内）登陆战争中却取得胜利。由于英、法在此登陆促使意大利于第二日（1915 年 5 月 23 日）加入协约国，向奥宣战；正是这次登陆战的失败促使保加利亚于 10 月向塞宣战，导致塞被奥占领。

日本于 1914 年 8 月 23 日向德国宣战，11 月 7 日占中国的青岛，接着相继占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诸岛。日本既宣战又不出兵欧洲战场，借机在亚洲扩大势力与影响。

（2）1915 年与 1916 年战况。德国总结 1914 年战况，认为短期内击溃英法联军较为困难，而突破俄军战线可能性较大，遂将战略改变为东线进，西线守，企图先迫使俄投降，再解决西线问题。在东线，德奥联军分别于 1915 年 2 月、5 月、8 月三次发动进攻。德奥联军由西里西亚向东占领布列斯特，迫使俄军退出华沙。结果，俄失去波兰、立陶宛，使东部战线向东移至北以拉脱维亚的里加向南，经维尔纽斯以东的纳罗奇湖、平斯克，直到切尔诺夫策形成一条南北向的战线。虽然德奥联军把战线东移了很多，战斗亦取得胜利，但未摧毁俄军，使东线也成为阵地战，并未达到打垮俄军把兵力转往西线的目的。

西线，英法与德军都曾发动进攻但都未突破对方阵地，双方共损失兵力共约 200 万人。

在 1915 年的 5 月 23 日，意大利正式加入“三国协约”并向奥匈宣战，

虽未取得胜利，却拖着部分奥军。保加利亚 10 月 1 日向塞宣战，配合德、奥军队作战，塞境全部被占，塞军转移到科孚岛。希腊则迟至 1917 年 6 月 29 日始加入协约国作战。

1915 年，俄国力量大为削弱，塞尔维亚被全部占领。在东线上，德军不愿重蹈拿破仑覆辙，所以停止前进。另一方面，德国认为，只有击败英、法才能取得胜利，而西线法军虽已疲惫，但有英军支援仍在顽强战斗，而英军有海外大片殖民地支援，人力、物力仍较充足。德国如要取胜只有打败法国，逼退英国，打击英国海上运输与力量，动摇其基础才是上策。

1916 年，德国于 2 月开始就猛攻法国东部战场重镇凡尔登，双方攻防进退到 12 月才结束。战斗规模巨大，战争特别激烈，双方伤亡都近 80 万，结果德军未能前进而失败。

为了减轻德军对凡尔登压力，英法联军在法国北部阵地的西端的索姆河地区于 1916 年 6 月 24 日发动进攻，首次使用了坦克，激烈的进攻持续到 8 月底，虽然对德军阵地没有重大变动，但对其力量有极大的削弱。另外，奥军为配合凡尔登战役于 5 月 15 日以优势兵力在意北部特伦蒂诺向意军发动进攻。意军招架不住，开始退却。如果奥军进入意大利北部就会产生严重影响。为此，俄国于 6 月 4 日开始在西南战线从平斯克到切尔诺夫策向西前进，到 9 月中旬使奥军损失兵员 150 万，阻止了奥军于 6 月下旬在意大利北部威尼斯平原的进攻。

罗马尼亚由于具有石油资源，对双方来说都十分重要。在俄军于西南战线大败奥匈军时，罗于 8 月 28 日向奥匈宣战。但为了石油，德奥联军进入罗境，接着俄军亦进入罗境，东方战线也就延伸到罗境。

总之，1916 年，双方在东西战线都有相当大的削弱，不过相比之下，德奥已感到补充力量的不足。

(3)1917 年与 1918 年战况。在双方战场上彼此都极其疲惫情况下，1917 年最大的变化是俄国的革命发生和美国的参战。

1917 年从 1 月开始，俄国由于国内经济生活极端困难，爆发全国性示威、罢工。3 月 11 日首都爆发武装起义，3 月 15 日成立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仍然执行继续战争的政策，原想通过取胜来稳定局势，但是在 6 月与 9 月分别在西南战线和里加战役的失败，不仅丧失大片土地，更加重国内矛盾。1917 年 11 月 7 日的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1 月 8 日苏提出停战谈判建议。协约国考虑东方战线停下来不利两面夹击德、奥，故拒绝此建议，而德国考虑，可以抽出兵力集中于西线有利其地位改善，接受该建议。结果，于 12 月 5 日签订暂时停战协定，3 月 3 日签订和约。和约虽使苏失去大片领土，但苏维埃政权却获得巩固。

德国为打破封锁和破坏英国海上优势，使用潜艇袭击英国船只。仅在 1916 年就击沉英国船只 270 艘，吨数达 125 万吨，但并未能突破英国封锁。到 1917 年，德国开始实行无限制潜艇政策，即凡在英吉利海峡航行的一切船只，不论国籍均可对其进行袭击。从 1 月击沉的 181 艘、29 万吨，到 4 月份则达到 423 艘、87 万吨。从 2 月 3 日到 4 月 6 日有 10 艘美国商船被击沉，许多美国人葬身海底，引起美国朝野情绪激动，遂于 4 月 6 日决定向德宣战。

原来，美国执行中立政策，在战争中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工业生产成倍增长，货物供不应求，贸易顺差巨增。另外，美国向协约国提供大量贷款。因此，美国的利益已与协约国联在一起。美国看到，俄国退出战争有利于德

国西线进攻，如德国胜，则其建立的世界霸权对美国不利，如果再不参战则失去时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利用德国潜艇对美国的损害，另一方面利用截获的德国鼓动墨西哥加入对美战争，以收回美国西南部过去墨西哥领土作报酬的电报予以公开，以德国插手美洲事务来引起公愤遂向德宣战。

在 1917 年，俄、美两国，一个退出战争，一个参加战争，使欧洲的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东方战线虽然牵制德国 1/3 兵力，但和约未订，德军尚不能大量转向西方。而在西线虽然美国已参战，但兵力尚待运输，逐渐集中，还不能马上对德军产生强大压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在 3 月 16 日转入准备好的齐格菲阵地进行防守，英、法虽发动几次战役都未能取得进展。

1918 年只剩下西部战线，德国已把东部军队西调，兵力有所加强，德国仍想凭借其力量压倒协约国军事力量，突破其防线。从 3 月到 7 月，德军发动五次进攻，分别指向亚眠、伊珀尔、苏瓦松、瓦兹河和兰斯方向，但其前进的里程越来越短，损失很大，均被协约国军队击退。在 7 月中以后，美国已有 150 万人抵达前线参战，协约国力量大增，遂于 7、8、10 三个月发动三次进攻。特别是 10 月的进攻，兴登堡防线被突破，北自伊珀尔南到兰斯全线崩溃。

由于同盟国各国内已无法控制局势，保加利亚于 9 月 30 日，奥斯曼于 10 月 31 日，奥匈于 11 月 3 日宣布投降。奥匈帝国各民族纷纷起义，宣布脱离帝国独立而土崩瓦解。德国国内，11 月 3 日基尔水兵起义开始，全国工人亦纷纷起义，11 月 9 日柏林起义成功，10 日德皇逃亡荷兰，11 日德国投降并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3. 新的政治格局的出现：一战实际是一次世界大国力量的较量，也是政治格局大改组，不仅反映战争的结果，也对以后世界形势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1) 战胜国的情况。英国在战争中虽然取得胜利，但是除了人员死伤外，军费开支大增，原来美国欠它 30 亿美元，可是战后反而欠美国 41 亿美元，经济力量大受影响，失去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海军虽仍居世界首位，但力量已有削弱，商船大量损失。在殖民地方面，英国除保留了原来的，又接受原德国的与奥斯曼的一些殖民地与领土，面积有了扩大，可是，殖民地人民觉悟在提高，已呈现出不稳定的势态。总的来说，其地位已相对下降。美国地位上升，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不过受孤立主义的影响，限制美国作用的发挥，加上传统影响与海外势力，英国仍然在政治上居于首位。

俄国革命后的苏联仍然处于巩固时期。欧洲大陆除虚弱的法国外，已无强大力量，一向操持“均势”的英国，当然不愿看到从大西洋岸到苏联边境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英国要保持其世界领导地位，维护其在欧洲的影响，必然一方面反对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反对法国肢解德国。另一方面，又设法与法国联合抵制美国，维护自身及欧洲在世界事务的领导地位与影响。

法国在战争中可以说元气大伤，其伤亡人数比英国大得多，是欧洲伤亡比例最高的国家。战争在其经济发达的北部地区进行，所受损失相当大。战争费用使其所负担的债务亦超过英国。这些情况使法国地位极其虚弱。但是，最大好处是打败了其宿敌，使 1870 年失败的屈辱得到报复，威胁它的对手垮了。1870 年由于对德赔款促使德强大起来，这次就需要利用德国的赔款还其债务，恢复其经济。原来，靠与俄联合东西夹击限制与制约德国，结果俄国

变成了苏联，无法依靠，只有极力限制与削弱德国力量，与东欧新成立的国家建立盟约，以恢复原来东西夹击德国的战略形势。另外，在世界上则极力保持与扩大其殖民地及政治地位与影响。

美国在战争中先是保持中立，在经济上大获其利，工业生产大增，对外贸易在战争期间增长近3倍，资本输出132亿美元，由战前的债务国成为最大债权国，集中世界黄金40%，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欧洲既需美国粮食又需美国资本，才能避免饥馑与衰败。美国正是凭借经济实力来向英国争夺世界政治的领导地位。

正是这种原因，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外交上“开诚布公”，公海上“航行自由”，“公平处理”殖民地，要求经贸上“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提倡“国际合作”，建立国际联盟等原则，实质上是向英国挑战，当然受到英国抵制。在孤立主义影响下，美国国会并未批准和约，可是，美国仍在多个领域争夺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意大利虽属战胜国之一，但其本身经济、军事力量不足，在战争中影响不大，在世界上的地位远在美、英、法之下。在巴黎和会中意只在分享奥匈遗产中分得较多份额，而与南斯拉夫之间有很大利益上的矛盾。

日本与美国相同，在战争中发了横财。它未出兵欧洲参战却继承了德国在东亚及太平洋上的许多遗产。在战争中，工业增加近四倍，贸易增加三倍，成为经济大国。原来在亚洲与英、俄、德、法、美的竞争中名次较后。现在俄国革命、法国衰落、德国失败，自己则与英、美成鼎足之势。加上，其地理位置临近亚洲大陆，面向太平洋，利用战争期间抢夺的许多在华权利，企图扩大其独占地位。因此，必然与美、英相矛盾，其间展开激烈竞争。

(2) 战败国情况。德国在战前是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唯一对手，战争中则一败涂地。在领土方面，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东普鲁士、波兹南等地划入波兰，西里西亚划入捷克，德国还有些领土划给比利时、丹麦。领土减少1/8，人口减少1/10。海外殖民地全部丧失。另外，萨尔由国际代管，莱茵河为不设防区。在赔款问题上，后来赔款委员会确定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66亿英镑）。法、英、意、比分别占52%、22%、10%、8%、余额为其他国家所有。

奥匈帝国原是个多民族国家，在投降前夕，各民族已起义分别成立各自民族国家，宣布脱离帝国，使原欧洲中部一个强大帝国土崩瓦解，一个历经600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结束了。原奥匈帝国分成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而其边缘地区的大片领土分别划入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意大利。

另一个战败垮台的是奥斯曼帝国。其南面所控制的阿拉伯人领土已全部成为他国委任统治地，只剩下土耳其，1920年成立共和国。剩下的领土也被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国分割、占领，国家有被瓜分的危险。经过武装斗争，才逼退占领者，避免被瓜分，保持新成立的国家的独立与领土完整。

(3) 新成立的国家。新成立的国家中，首先是苏联，原来的沙俄帝国垮了，出现了以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从成立起虽经历帝国主义的入侵、内部的暴乱、外国的封锁、国内的饥荒，但终于克服困难并成长起来。开始时，人们对其力量估计不足。后来，其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则日益强大。

其次是南斯拉夫。原来的塞尔维亚是战胜国，战争结束不但扩大了领土，

包括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现了其大塞尔维亚的愿望，而且把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也联在一起，成为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的大联合。

第三是波兰。波兰在 10 世纪时就是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18 世纪以来，遭受俄、普、奥三次瓜分，亡国 123 年之久。1918 年人民起来赶走占领者恢复波兰。巴黎和约确定其边界，并获得但泽作为其出海口。

此外，新成立的国家，在欧洲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在新成立的国家中，大都介于苏联与德国之间，成为大国之间筹码与争夺对象。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的边界划分时，虽考虑到民族的原则，但由于历史原因，民族边缘多为杂居，而划分时又受政治因素所左右，往往一方满意，另一方并不满意，矛盾仍然存在。正是这些内、外矛盾使该地区政治形势难以稳定。

(4) 对殖民地及有关利益的瓜分。根据和约德国的殖民地全部让予战胜国。在非洲，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分占；东非坦噶尼喀划归英国；西南非划给南非。在亚洲，赤道以北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莫亚群岛划归新西兰。

对于德国战前在中国山东的“胶州湾租界地及胶州铁路的一切权利”，中国政府以参战的战胜国地位要求和会“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将其全部归还中国。但和会上英、法以与日本有参战密约，袒护日本，美国为抑制日本势力膨胀开始时支持中国，但和会上却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团遂拒绝在该和约上签字。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所属的有关领土，协约国与土耳其在 1920 年签订的《色佛尔条约》规定：放弃对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亚美尼亚一切权利，帝国只剩下了土耳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一些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势力控制下地区的人民觉悟提高起到促进作用，在战后从北非的埃及，西亚的伊拉克、伊朗，中亚的阿富汗，南亚的印度以及东亚的朝鲜都掀起人民的罢工，甚至起义的浪潮，反对殖民地统治者的统治，给帝国主义以很大的冲击。埃及的强大的运动迫使英国作出让步，它不得不在 1922 年承认其部分独立。

总之，在一战中，德国、奥匈、俄国和奥斯曼四个帝国垮台，英、法两个强国有很大削弱，使欧洲为中心的“三国同盟”、“三国协约”对立，六国争雄的政治格局彻底破坏。但是，剩下的英、法，崛起的美、日，新建立的苏联，加上重新兴起德国又是六国。不过，其分布的地域已超出欧洲，对以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将起着重要作用。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战结束后不到 20 年，日本就于 1937 年在亚洲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揭开二战的序幕。两年后的 1939 年德国就以入侵波兰而开辟了二战的主战场。到 1941 年底的珍珠港事变，从而使二战全面展开。如以 1937 年计，到 1945 年的德、日投降止，前后经历了八年。

(一)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 日本的侵华战略：在一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地位迅速提

高，其侵略中国、争霸远东的野心日益高涨，但其行动往往受到美、英的制约。为此，日本急需制订自己的发展与侵略的战略。于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日本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东方会议的宣言书》。田中义一首相根据会议决议写的《田中奏折》就是日本侵略中国与世界的战略。该奏折明确表达，“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再“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同时，还说：“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

从此可以看出，这与麦金德以欧洲角度所提的陆心说的“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的名言完全相似。只是把“东欧”换成了“满蒙”，把“心脏地带”换成了“支那”。两者分析的思路亦完全相同。欧洲大陆，历史上多次受心脏地带的游牧民族之侵袭；我国元、清两朝即蒙、满二民族进入中原建立全国性的王朝。另外，在外部条件上，他看到美国是实现其意图的最大阻力，正如19世纪末叶其占领朝鲜进入中国东北时，俄国是其最大障碍一样，只是在日、俄之战中打败了俄国才得进入中国东北。这次，其进入满、蒙与征服支那，正如当时日、俄战争相类同，“必先打倒美国”。可见，这是日本既定的战略。

2. 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在3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从广东开始的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向北进行之际。而割据东北的军阀张作霖未能满足日本侵占满蒙的要求的愿望，于1929年由北京回沈阳途中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之后，其子张学良又对日本攫取满蒙进行抵制，并放弃割据服从中央，对日本实现其“征服满蒙”妄想极其不利。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不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是自顾不暇之时。对日本来说，经济危机亦很严重，正想通过向外扩张以摆脱困难。于是，日本就在1931年9月18日夜制造事端，第二日晨即大规模进占沈阳，进攻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在不到五个月时间内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

当时，英、美为自身利益及利用日本对抗苏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视而不见，采取纵容态度。国民党政府向国联申诉不了了之。由于日本在国际上既未受到英、美的反对，又未受到中国军队抵抗，所以更加有恃无恐，继续露骨地执行其征服中国的侵略政策。

在1932年1月28日驻沪日军向中国军队进攻，挑起“一·二八”事件。1933年2月，日本进兵热河，5月到达长城一线及冀东各县，1935年，日本策动蒙奸王公，使内蒙古“脱离中央而独立”，成立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借口寻找失踪士兵进攻宛平县的卢沟桥以切断北京后路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遂揭开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亦是二战的前奏。

3. 中国的抗战：“卢沟桥事变”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义愤，抗日浪潮急剧增长。29军在当地进行坚决抵抗。中共中央8日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国民党17日指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了全国军民抗日行动。

日本认为这时美、英不会干涉其侵华行动，意图在控制东北、占领内蒙

古之后，以高压快速手段攫取平津，迫使国民党退出华北，实现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与其已掌握的东北、内蒙古联成一体，形成半壁山河，是完成其征服中国的关键一步。

根据过去经验，日本对待中国只要兵临城下，造成既成事实，中国就会忍受。但是，这次却反而激起中国坚决的反抗。日本遂于 8 月 13 日突然在上海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次日，中国国民政府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自己之权以应之。”15 日，中国下令总动员，全民抗日形势出现。日军对中国经济精华之地江苏、上海及首都（南京）的近畿之地进攻，无非是迫使中国就范以达其速战之目的。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日军即以平汉、同蒲、津浦三条铁路自北而南推进；另一方面，以上海为起点沿长江一线向西进逼，形成南北、东西两个方向的进攻，并且在徐州，使两个方向相聚。经过四个月的京沪会战，三个多月的徐州会战，以及四个月的武汉会战消耗了日军的大量人力物力。到 1938 年底，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广东的部分地区。国民政府先迁武汉，后迁重庆。由于大片地区被日军占领，日军不得不分散其兵力用于占领，逐渐失去进攻的锐气。中日战争也就由开始时的日军进攻，中国抵抗节节后退转为战略相持阶段。

4. 战争的相持阶段：中日战争开始以后，美、英的政策是对日本的纵容，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支援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而是采取两面政策，即一面以中国削弱日本与拖着日本使其陷入泥沼，另一面可以阻止苏联力量和扑灭中国革命。美驻日大使给政府密电提出：“避免卷入”，“保持中立”。英驻日大使向政府报告称：对中、日交战双方维持友好关系，“拖延时间，期待双方终于完全精疲力竭”，由英国“帮助实现这个悲剧冲突的合理的解决。”尽管日本侵华损害英、美在华利益，但它们与日本贸易，由于供应战争物资增加，反而有了发展。苏联为阻止日本势力增长，对华给以贷款、军火和志愿人员的支持。

在相持阶段来临之前，日本对国民党进行诱降。1938 年初宣称“不以国民党为对手”，要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1938 年底，在占领武汉后，又宣称：“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一贯政策……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虽然汪精卫已投降日本，1940 年 3 月组成汪伪政府，但遭人民唾弃，诱降并未成功。

当日军沿铁路线前进，占领城市和沿线附近地区时，国民党军队节节往后撤退，留下广大农村地区形成真空地带。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则向敌后进军，发动人民、组织政权、建设军队，以保卫自己，向日军展开斗争。于是，一块块大大小小的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给日军以极大威胁。这种形式的对日战争是一种创造，它适合于中国国情，可以进行持久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日军的打击不论从拖着日军的数量，还是从杀伤敌人的数量来说都起着重要作用，并终于超过正面战场的作用。这就使日军在中国战场越陷越深。毛泽东早在相持阶段之前，于 1938 年 5 月写出《论持久战》，对这种敌后战场作了深入分析、精采预测。它为这场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应用原则。为中国抗日胜利打下基础。

在相持阶段，中国战场对日军打击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这种作用更加明显。正如《罗斯福见闻秘录》中，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正是中国战场拖住大量日军，只能把总共陆军 51 个师中的 11 个师调往西南太平洋协同海军作战，陆军不得不拒绝其海军东攻澳大利亚，西占锡兰的建议。这就为盟军后来反攻保存下了两个重要的基地。

（二）德国的东山再起

1. 赔款问题：德国在一战前强大的重要基础之一，在于其经济力量，有些部门赶上英国，如能源消耗，在 1913 年英国为 $1.95 \times 10^8 t$ ，德国为 $1.87 \times 10^8 t$ ，有些部门甚至超过英国，如钢的产量，1913 年英国为 $7.7 \times 10^6 t$ ，而德国为 $1.76 \times 10^7 t$ 。正是这种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持其侵略战争。在一战失败后，德国的经济能否恢复与发展取决于赔款问题。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分歧未能解决。在 1920 年，赔款委员会中仍有分歧，由法国主席裁决，定下总额为 1320 亿金马克。其中法国得 52%，英国得 22%。并规定每年偿付 20 亿马克。此外，德国还需支付输出值的 25%，用木材和煤来抵付。按当时德国经济情况，根本无力偿付如此巨额赔款，但在强大压力下只能接受。

在赔款问题上英、法存在深刻分歧。法国一来想以德国赔款以偿还用于战争而借的外债，二来靠赔款恢复其经济，并报复 1870 年因战败付给德国巨额赔款之仇。同时，赔款可以削弱德经济实力，使其难以恢复大国地位，又可以确保法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所以，法国尽量最大限度的索取赔款。英国认为欧洲的经济复兴，自身的海外贸易发展有赖于德国的经济的稳定，所以希望德国经济有某种程度的复兴。这不仅可以给英国贸易带来好处，也可以使德国某种程度牵制法国。为此，英国认为德国赔款总数应当减少，但遭法国反对。

作为赔款委员会的观察员的美国，看到德国的工业技术先进，设备完好，只是缺乏流动资金，所以美国认为德国应以付高额利息获得贷款。这是美国向外经济扩展，为多余资金寻找市场的好机会，同时又可借机插手欧洲的事务。会上提出应向德国输入资金、活跃德国经济，为其赔款提供物质基础。法国对此持否定态度。

由于经济困难，德国 1922 年未能按期支付赔款，赔款委员多数主张制裁。法国决定占领鲁尔。法国认为此举可以加强自身安全，还可从德国最大工业区获得大量利润。德国对此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责成当地官员拒绝遵守占领军一切规定。号召工人拒绝采煤、运煤。

鲁尔被占，德国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1922 年，德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 80%，而 1923 年急降到 40%。加上德国财源基地鲁尔失去，马克贬值严重。经济面临崩溃带来工人罢工、起义，出现严重政治危机。法国占领鲁尔的收入不抵占领费，招致工人抗议，国内外谴责。在美、英压力下，法、德双方结束鲁尔危机，并召开赔款委员会会议。

1923 年 11 月赔款委员会确定：美国给德国 8 亿马克贷款，德国第一年付款 10 亿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应付 25 亿马克。法、德如有争执，由美国控制的仲裁委员会解决。同时，还确认 1924 年 11 月中旬，法、比军队全部撤出鲁尔。这就是所说的《道威斯计划》。该计划使德国经

济迅速恢复，但其每年赔款额逐渐上升。此外，原在赔款委员会起主导作用的为法国，现已转到美国手中。德国经济到 1928 年，与 1923 年相比，采煤量由 $1.6 \times 10^8 \text{t}$ 增至 $2 \times 10^8 \text{t}$ ，钢产量由 $1.1 \times 10^7 \text{t}$ 增至 $1.43 \times 10^7 \text{t}$ ，电力比 1913 年增加 4 倍。

1928 年，德国借口经济困难，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以美国扬格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于 1929 年 2 月 11 日开会确定，赔款总额为 1139 亿马克（减少 15%），分 59 年付清，前 37 年每年平均付 20 亿马克。每年赔款中，必须交付的无条件赔款为 6 亿马克。其余视情况可以展缓。

1929 年发生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德国经济处于危急状态，德国提出停止支付赔款。遭英国拒绝后，德向美国总统胡佛发出呼吁。美国考虑赔款与各国偿还美债务有关，德国经济衰退危及欧洲经济、政治稳定、美国市场与投资利益，遂提出展缓一年办法。原来英、意同意，法国因自己所占份额多不同意。经协调各方同意延期。但在经济危机下，德仍无力支付赔款。

1932 年 6 月 16 日召开洛桑会议讨论赔款问题，确定最后赔款额为 30 亿马克，于 37 年内分期付清。实际上，德国对此数额也未偿付，到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索性完全取消了赔款义务。赔款问题与各国偿还美国战债相联，英国主张放弃赔款应与放弃战债相联，美国反对。英国在 1932 年偿付该年的美国债务后，声明与美国的债务协定就此结束。其他国家也就没有继续偿还美国债务。至此，赔款与债务也就不了了之。

2. 德国的边界及与邻国安全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不仅确定德国的国界，而且还确定莱茵河左岸以及莱茵河右岸 50 千米以内为不设防区，联盟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 15 年。为了法国的安全，在签订《凡尔赛和约》时，法国提出必须保障法、德边境安全。当时英、美两国答应，并由英、美两国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但是，后来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所以这项保证就落空了。法国为防范德国东山再起，就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分别签订了条约，建立小协约国联盟体系。随着德国的情况变化，面对德国的复兴，法国迫切要求签订一个保障法德边境安全和东欧盟国安全的条约。

1925 年 10 月 5 日，英、法、德、比、意、波、捷七国在瑞士的罗迦诺举行会议。在此之前，德国利用英、法、美恐苏心理，频繁与其接触，甚至达成协议，以此来迫使西方对德让步和抬高其地位。为此，西方想把德国拉入国际联盟以约束其行动，而德国亦又以此要求批准其重整军备。另外，关于边界的保证的问题，德国只同意对西部边界遵守《凡尔赛和约》，却不准备对东部边界承担同样义务。它还公开宣称，东部边界不是不可变更的。波、捷对此极为不满，虽经与其结盟的法国多次努力，但德国有英国的支持表示不可能保证这些边界的永久性。最后，德国在各方压力下，经过讨价还价签订了《罗迦诺公约》。

公约规定，德、法、比三国维持德法、德比边界领土现状，遵守和约关于莱茵河非军事区规定，彼此不得攻击侵犯、不得诉诸战争。英、意以德国与法、比之间边界保证国身份在条约上签字，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

对德国东部与波、捷之间的边界纠纷没有规定任何保证办法，只签订了仲裁条约。条约规定双方发生一切纠纷、冲突如不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时，应提交仲裁法庭或国际常设法院裁决。

另外，法国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相互保证条约，规定一方遭受德

国侵略，彼此立刻给予支持和协助。

《罗迦诺公约》德国大获其利，这摆脱了《和约》对其军事上的束缚，获得对东部边界的行动自由。德国还通过加入国际联盟，亦提高了地位。《公约》对法国则十分不利，它与德的边界安全没有得到切实可行措施的保证。而对波、捷的边界，实际上亦难以保证，这表明法国的欧洲同盟体系在欧洲的地位与法国本身地位一样，是十分虚弱的。《公约》对英国来说，起到了其在欧洲大陆国家间既利用德国来阻止法国在欧洲的称霸作用，又用来抵制苏联，使欧洲各力量之间处于平衡、保持自己的有利地位。但事实上《公约》却使英国为德国侵略势力上升开了绿灯，反而起了为虎作伥的作用。

关于莱茵河的西岸联盟国驻军因也《罗迦诺公约》于1925年12月1日签字，以法国边界有保证而撤军。其东岸50千米内不设防区的规定亦在希特勒上台后，于1936年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区而结束。英、法除向德提出抗议外，无任何其他行动。

至此，《和约》所规定的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约束已全部消除。由于德国摆脱赔款的义务，经济走向复兴，使其毫无阻拦地走上扩军侵略的道路。

（三）法、英、苏、德的矛盾与发展

在20年代，德国采取种种办法，利用各国的矛盾终于摆脱《凡尔赛和约》对其赔款的压力，使其经济能够恢复及走上发展道路。通过《罗迦诺公约》削弱法国对其东、西两面的政治军事约束，并通过加入国联改变了其战败国的地位，成为欧洲的平等的一员，获得了政治行动的自由。

在20年代末，法国的陆、空军的力量和飞机的年产量都远远超过德国，在工业生产总产量上，英、法之和亦超德、意之和。但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席卷西方的经济危机蔓延各国，不仅工业生产，经济形势遇到严重困难，也影响到社会、政治、军备，使英、法的优势由于不平衡的发展，特别是希特勒的上台，使欧洲形势发生变化。英、法的优势丧失，加上政策的失误。终于导致二战的爆发。

1. 法、英、苏、德的战略形势

（1）法国。法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但在战争中，不论是人员还是经济都受到极大的损失。战后，其主要措施是使德国在经济、军事、政权上处于无力再发动战争的地位。通过对战争的赔款，使其经济处于不利的地位；通过限制其军备数量，使军事力量与法国相比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通过与德国周边国家结盟约束与阻止德国的向外的政治与军事扩张。法国认为，这些措施的实施就可以为自身的安全与欧洲的稳定提供保证。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像其所预料的那样。在30年代初，法国拥有的陆军和空军，在欧洲都仅次于苏联。在经济上，法国克服战后严重的动荡，在1926年后，走上较快发展道路。生铁产量从1920年的 3.4×10^6 t，到1929年为 1.03×10^7 t。钢产量从 3×10^6 t增到 9.7×10^6 t。当时，法兰西银行有大量黄金储备。这使法国在经济危机开始时受到的影响较小。可是，1933年后，情况出现根本性变化，进口下降了60%，出口下降到70%，外贸瘫痪了，市场混乱了。为了解决失业，稳定经济，政府强迫执行缩短工时，紧缩通货。结果，加重了工业负担，加速了黄金外流，货币贬值。到1938年，法郎的价值是十年前（即1928年）的36%，工业生产为十年前的83%，钢产量为十年前的64%。

与经济生产的滑坡相反的是国防预算的增长。例如，法国在1930年国防开支为4.98亿美元，到1938年为9.19亿美元，增长了85%。可是，同期，

德国则由 1.62 亿美元增到 74.15 亿美元，增长约 48 倍。法国甚至比英国增长 2.64 倍也低得多。国防预算的增长缓慢，影响法国飞机产量下降，由 1932 年的低于苏联而高于英、德、意。到 1939 年，则低于苏联、德、英，仅高于意。这种情况大大影响了法国的军力。

另外，法国经济滑坡使国内广大劳动者生活陷于困境，社会发生动荡，各派斗争激烈，政府长期处于不稳状态，从 1930 年到 1940 年，政府更换了 24 次。在周边关系上，由于反对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战争而与意发生争吵，使意大利从法国反对德国的潜在盟国走向潜在的敌国。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德、意对其武装干涉，支持叛军反对共和政府，使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权。意、西两国分别从东南、西南威逼法国。甚至法国北面的比利时亦于 1936 年声明退出《罗迦诺公约》成为“绝对中立”。这使法国的边境防御不能仅限于东北边界。

综上所述，法国在战略形势上处于不利地位。可以依赖的只有英、俄两国。在历史上，法、德发生对立时，法国总是从德国的东面的俄国寻找支持来对德国施加压力，减轻自身的负担。一战前的经历就是这样。现在法国又面临德国的威胁。而位于德国东面的苏联亦感到德国的压力。因此，两国 1935 年 5 月于巴黎签订法苏互助条约。规定两国受到侵略时“立即相互进行支援和协助”。同月，苏联又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互助条约。但条约规定，只有在法国对被侵略国家提供援助时，苏、捷双方才有义务互相援助。法国的这种作法反而为一直崇尚力量平衡与对苏持偏见的英国的不满。

由于法国在 30 年代中期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的下降，外交上只能依靠唯一的盟国英国。由于英国的“绥靖”政策，助长了德国的侵略扩张的野心。原来签订的法苏互助条约也就在慕尼黑协定中被证明是一纸空文。到 30 年代后期。当英国看清德国的侵略野心，与法国建立可靠的联盟关系时，两国的工业总产量虽然与德国相当，而国防开支上，德国则等于两国之和的 2.7 倍。更何况英、法要对付的是德、意两国。与一战前相比，英、法与俄是东西两面夹击德国，这次则成为单一战场，其不平衡性就可想而知。

(2) 英国。英国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在内部，一是在与殖民地的关系上，另一是在经济方面。在与自治领的关系上，于 1931 年，根据《威斯敏斯特法》，白种人所统治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及纽芬兰（于 1949 年始加入加拿大）与联合王国组成英联邦，自治领成为独立和平等的主权国家，有权与外国进行谈判并签订条约。只是靠“共同忠于”英国国王这一信条而联结在大英帝国内。这些自治领除爱尔兰外，都远离欧洲，对欧洲的各项争端并不太关心，多不愿为欧洲问题而卷入欧洲战争。但是，英国不论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的一统形象，还是考虑到战争的胜负与获得各自治领的支持有密切关系，英国在外交决策中，都不能不考虑到各自治领的态度。这就对英国外交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从而影响到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对欧洲的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这也就是英国与其作为一战中的盟国的法国在很多问题上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其次，英国的经济状况。在 20 年代，英国的经济在稳定时期发展较为缓慢，1920 到 1929 年之间，整个工业生产只增长 15.6%，大大低于美、法、德等国。虽然其新兴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德国的竞争获得较快发展，但是传统工业部门却日趋衰落，其煤与生铁产量到 1929 年仍然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其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从 1913 年的 14.5% 降为 1929 年的 9

%。尽管德国工业在战后受很大制约，但在 1930 年产量却超过了英国。

英国这种缓慢增长的经济到经济危机时期，所遭受到的灾难由于受到各自治领及殖民地之间的帝国特惠制的支持而有所减轻，但毕竟动摇了英国的经济基础。作为依靠贸易的英国，在其贸易额的下降及贸易逆差出现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各派政治斗争的加剧。正是经济危机导致了 1931 年英国工党政府垮台，使政治家们意识到其权力的稳定与经济形势有密切关系。因此，英国的国防开支增长不能不受影响。在 30 年代初期，英国的国防开支反而有所削减，只到 1936 年才有实质性增加，但只及德国的 1/3 强。到 1938 年，尽管英国的国防开支比 1936 年增加了一倍，可是与德国相比，则下降了，仅及德国当年的 1/4。其相差的（德国为 74.15 亿美元，英国为 18.63 亿美元）的绝对数字之大（为 55.52 亿美元）是十分惊人的。这种形势对英国来说是十分严峻的。

英国与法国不同，法国基本上是欧陆国家，而英国却是一个面向世界的海洋国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欧洲受到德国与意大利的对抗，在远东则受到日本的挑战，其战略的选择十分困难。与一战前的地缘政治形势相比。在亚洲，原来的盟国日本，今天已变成敌手。在欧洲，原来与法、俄的结盟同德、奥相对抗，现在只有与法结盟对抗德、意。作为海上大国，在北海与大西洋、地中海、西太平洋则分别受到德、意、日的挑战。在空军方面，由于德国飞机的产量已超过英国，使岛国破天荒的第一次暴露在敌人军事打击之下，甚至在一战前及大战中曾支持英国的美国，仍受孤立主义政策影响，对世界事务尽量避免承担一切外交与军事义务，亦不参加其原先所倡议的国际联盟。另外，在对日、对德方面的政策并不与英国相一致，削弱了英国的作用。

所有上述形势对英国很是不利。而英国本身在对欧洲的政策却又受其传统平衡政策影响。在很长时期内，英国对法国与东欧各国及苏联结盟制约德国的政策不予支持，甚至支持德国以制约法国。当德国经济与军事势力得到恢复与发展时，则采取绥靖政策，牺牲小国以满足德国的侵略野心，并企图把德国引向东方，使其与苏联对敌以坐收渔人之利。

虽然到 30 年代后期，英国绥靖政策失败，始转而与法国结盟与德国对立，但是，这时的英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较为脆弱，可以说是力不从心。

（3）苏联。一战后，苏联则遭受内部的叛乱、外部的入侵，以及严重的灾荒带来的饥饿的折磨，经济严重衰退，在国际上又处于被孤立的地位。

经过 20 年代中期的经济恢复，从 1928 年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当时，西方工业大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折磨下，工业产量急剧下降。而苏联的经济则迅速增长，从 1928 到 1937 年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国民收入从 244 亿卢布提高到 963 亿卢布，增长了四倍。煤、钢、电力、机床分别增长 2.6 倍、3.4 倍、7 倍和 20 倍。到 30 年代末，苏联工业总产量在世界所占的份额已超过欧洲的所有国家，仅次于美国，在国防开支方面远超过英、法、意，为德国的 73%。飞机产量超过德国在欧洲居第一位。军事潜力亦超过英、法、意，与德国相当。这时苏联在欧洲成为一个可以与德国相抗的国家。

其在地缘政治上的特点是土地辽阔，跨欧亚两洲，东西相距有 7000 千米。另外，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是，其不利之处也十分明显。其东、西两边分别是日本和德国两个侵略战争源地的法西斯国家。它们公开声明反

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东、西两面存在着明确无误的强大敌人给战略上带来的困难犹如英国一样。不过，英国是海上力量被东、西方所牵制，而苏联则在陆上。前者的力量机动性大，而不相连续，在必要时，可以调整，放弃一头，集中另一头。后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英国实际上损失力量不大。然而苏联则不同，由于地域相连，而且陆路长距离运输不如海上方便，力量分散，难以集中，更重要的是英国在西方有法国作盟友，在远东则有美国作潜在盟友。而苏联则只有依靠自身力量来对付德、日法西斯。英、法尽管与德国有矛盾，但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德国有相同之处，甚至英、法与德形成潜在联盟，英可利用苏、德对抗坐收渔人之利。苏联在东、西两端都缺少可靠的或潜在的强大盟友。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在东方尽量稳住日本，在西方则利用英、法与德的矛盾以制止德国的侵略扩张，并尽可能的推迟战争的爆发。在国内，一方面加速经济发展，调整工业布局，加强武装力量，作好战备工作。另一方面，作好内部的清理工作。不过在清理工作中的肃反扩大化，反而导致军事干部短缺，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其战斗力。

（4）德国。德国在 20 年代，尽管为战败国，在各方面受到许多约束。但是在经济上，由于从国外（主要是美国，其次是英国）得到大批贷款和投资，经济的恢复速度比较快，到 1927 年已达到战前 1913 年的水平。在外贸方面，1927 年，甚至超过战前水平，占世界的比重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但是，1929 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袭击了德国，由于德国战前殖民地已丧失殆尽，无回旋余地，国内市场有限，1932 年，整个工业生产降低了 40%，受经济衰退影响的程度超过英、法。工人失业达到 800 万，占工人总数 43.8%。而德国国内，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组织程度高，对资产阶级将经济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反应强烈，遂带来严重的国内矛盾。与这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纠合在一起的还有由于战败的割地赔款，使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居于他国成为少数民族，以及受凡尔赛和约种种限制而形成的屈辱心理，正是这种现象与心理，使德国产生一种民族沙文主义思想，要把所有德意志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德意志国，屈辱心理的反应就是强烈的反西方大国，推动其向外扩张和称霸，以恢复过去荣誉与地位。

希特勒则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对社会动荡、生活困难的不满，以及上层社会对共产党及革命的敌视和恐惧，在 1933 年上台执政。他上台后，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镇压共产党，趁机宣布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为德国的唯一政党”，取消所有其他政党和议会，集大权于一身。另外，煽动迫害犹太人，鼓动“大日耳曼主义”，实行扩军备战，建立大德意志国，以实现向全球的扩张野心。

希特勒的战略方案是“先大陆，后海洋。”其实施过程分三步：首先，建立一个囊括中欧的“大德意志”作为核心，主要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波兰的但泽走廊；其次，打败法国，消灭苏联，夺取欧洲大陆的霸权，以此作为称霸世界的基础；第三，向海外发展，战胜英、美、称雄全球。

从欧洲地缘政治形势来看，是英、法和德、意与苏联势力自西向东一字摆开的格局，德国居于中间。按经济实力，英、法是老牌帝国主义，海外领土多，力量比较强，资源丰富。打起仗来可以获得海外的支援。但是，从军事力量看，法国强于陆军，英国强于海军。两国陆军加起来远不如德国，而空军处于相等地位，英、法海军占优势，可以对德实行封锁，断绝其重要战

略物资的供应。苏联国土面积大，回旋余地广阔，兵力充足，人力资源丰富。武器装备虽不如德国，但产量与德国相当，加上国家组织严密，是德国不易致胜的敌手。就德国来说，单独对任何一方都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最忌的则是两面作战，陷于被夹攻的地位。然而，从其控制全欧、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来说，面临的两种力量必须予以打败。这样，为实现其战略目的，德国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

为此，在策略上，德国必须对东、西两面对手分别予以击败。在进攻一方时，必须联合另一方，或稳住另一方，至少应使之中立。在战败一方后，再击垮另一方，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在首选的进攻方向上，应是比较容易攻取的一方。如果攻取难点，则久攻不下，形成胶着状态，就会两败俱伤，被另一方坐收渔人之利。对付东面的苏联，是个难攻之地，如果能与日本结盟，或是分散其兵力，或是实行东、西夹击，则能易于取胜，但需稳住英、法。如先向西方，陆军可战胜英法联军。但海军无法制服英国。制服英国不仅需要时日，更需要注意美国是否参与。因此，如何使用策略就成为是否可以取胜的关键。

2. 英、法和德、意以及苏联三方矛盾的发展

(1) 德国的扩军备战与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形成。《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只能有 10 万陆军、6 艘铁甲舰，禁止拥有潜水艇、军用飞机和重炮，以及莱茵河西岸非军事化。《罗迦诺公约》又规定，《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不得侵犯。如果德违反，法有权采取措施，英、意有义务支持法国。但是，希特勒上台后，就设法摆脱和约限制，以便放手扩充军备。把 1933—1934 年度的军事预算比上年增加 90%。1935 年 3 月 16 日起实施国防军法，实行义务兵役制，服役一年，建立约 50 万人的军队。次年又把服役年限改为两年，德国兵员一下子就上升到百万，远远超过英、法。

面对这种情况，英、法、意三国于 1935 年 4 月 11 日在意北部斯特莱沙开会，会上法国主张联合起来制裁德国，英、意不同意制裁。公报只是对违约行动表示遗憾。

法国为防止德国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动，于 5 月 2 日与苏联签订法苏互助条约。条约规定法、苏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无端侵略的对象时，“两国保证立即相互进行支援和协助。”5 月 16 日，苏联又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互助条约，内容和法苏条约相似，并有附带条件，即只有法国对被侵略国提供援助时，苏、捷双方才有义务互相援助。可是，英国此时却于 6 月 18 日与德国签订了《海军协定》。协定规定德国可拥有等于英国海军吨位 35% 的军舰，45% 的潜水艇。该协定表示英、法对德战略的不一致。为德国公开撕毁凡尔赛和约扩大海军开了绿灯。

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统治下，成为一个野心勃勃扩军备战、向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法西斯国家。他原来对中欧及巴尔干半岛有着自己的地缘政权利益。这点与德国的希特勒的利益发生冲突。在 1934 年 7 月，德国准备吞并奥地利时，墨索里尼则陈兵边境予以反对，加上英、法的反对，希特勒只好放弃其企图。于是意大利则成为英、法反对德国的潜在盟国。但是，意为其能称霸地中海，控制东北非，于 1934 年 12 月入侵阿比西尼亚，遭受阿顽强抵抗。到 1936 年 5 月始攻占其首都，实现其吞并阿的野心。英、法为拉拢意大利以孤立德国，对其侵阿采取纵容态度。但是，由于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以及国内反对势力影响下，英、法不得不在国联提出对意进行有名无实的制裁。意大

利占领阿以后，在东北非与中东反而加剧了与英、法的矛盾。这时，德国希特勒就利用此矛盾把意大利拉了过去。结果，英、法不仅把阿输给了意，还把意输给了德。正如丘吉尔所说：“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4个强国，从前是3个对1个，现在却变成2对2了。”

意大利在一战中虽然是一个战胜国，但对分得的利益不多十分不满。因此，意大利极力想通过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以改变其现状，在重新瓜分世界中获得更多利益。在这点上与维持现状及其既得利益的英、法存在着不可克服矛盾，而与德国却有许多共同点。在意吞并阿比西尼亚的侵略行动中遭到国联制裁，在国际上极端孤立时获得德国的支持，使意感到，要实现其侵略野心只有与德国联合才有可能。

经过德、意联合武装干涉西班牙的行动更证明两国利益的一致性。在1936年2月，西班牙以左翼党派为主组成的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而失败的右翼与法西斯分子和右翼军官佛朗哥在德、意支持下发动叛乱，反对联合政府。德、意支持叛军不仅企图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亲法西斯的政府，而且在战略上有利于意大利对地中海的控制，有利于德、意加上西班牙对法国的包围。英、法对西班牙的战争处于十分矛盾的地位。他们既不希望西班牙落入亲法西斯的势力范围，也不希望西班牙民主左倾的政府当权。结果，英、法采取所谓“不干涉政策”。虽然包括德、意在内的27国缔结《不干涉协定》，但德、意仍大规模支持西班牙叛军。结果，1939年2月27日佛朗哥叛军还未进入马德里时，英、法就承认佛朗哥政权。

在西班牙的内战中，希特勒成功的把墨索里尼拉入自己一方。于1936年10月25日，两国签订秘密协定，在欧洲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墨索里尼称，“罗马和柏林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为了实现德国的全球战略及对苏的包围，于1936年11月25日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加入了此协定。于是，德国完成了其“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建立不仅是反共、反苏，而且也是反对西方大国的。不过手法上打着“反共”旗帜，在于对英、法有一定的迷惑作用。

苏联在西班牙的内战中，看到法西斯势力在西欧的蔓延，在德、意破坏“不干涉政策，大力支持叛军时，亦声明对联合政府以援助。不过在战略上，亦防止自身与德、意冲突的扩大而深陷进去，反而会使得英、法更加后退，甚至坐山观虎斗以坐收渔人之利。所以，苏联在对远离自己领土，而距德、意较近的西班牙，只能采取小心谨慎的政策。而英、法对西班牙内战采取的“不干涉政策”，表明其看不到法西斯势力的更大危险性，宁肯采取纵容侵略政策，而不愿冒险与民主合法政府站在一边。这既是后来英、法实行绥靖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国看到英、法软弱，恐惧共产党势力，可以打着反共旗帜，迷惑西方，组织侵略的轴心集团，得以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2) 英、法绥靖政策的破产。在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德、意公开支持西班牙叛军与德、意结成轴心之时，英、法于1937年又遇到新的经济政治危机。在上次经济危机刚过仅4年，英、法又开始新的一场经济危机。英、法两国工业生产1938年分别比1937年下降8%和7.5%。而德国此时却增加了8.1%。这不仅影响到英、法两国为增强军事力量而增加国防开支的努力，而且还引发两国殖民地及国内的政治危机。在英国的伊拉克、埃及和印度，在法国的叙利亚，摩洛哥都出现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那里形势非常不稳，甚至出现武装斗争，使殖民主义者不得不分兵加强驻守。国内由于经济困难，

居民厌战情绪严重，政权权端不稳，妥协与强硬两种意见争论异常尖锐。由于英、法的政治经济实力的进一步衰退，力不从心，妥协、绥靖政策占了上风，企图以满足法西斯一些要求，把侵略势力引向东方，以确保自身的既得利益。1937年5月张伯伦提任英国首相，全面推行其绥靖政策。

1934年，德国企图吞并奥地利的阴谋在意与英、法反对下虽遭失败，但并不死心。1938年初，德国已与意结成轴心，而且事前得到英国承诺情况下，于3月11日出兵奥地利，实现了对奥的吞并。

接着希特勒又借口在捷克斯洛伐克北部苏台德地区有300多万日耳曼人，要占领该地。1938年5月19日，德国陈兵于捷边境，企图以武力迫使其屈服。由于捷克与法国及俄国签有互助条约，德国入侵捷克有可能引发一场新的大战。英国怕法国参与战争把自己拖了进去，遂极力迫使法、捷让步以满足德国的要求。希特勒一方面调动军队，加紧修筑法边境的齐格菲防线作出不惜一战的姿态，对英、法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对张伯伦说，“这是他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尽管当时捷克反对其被肢解，苏亦做好准备，实现其互助条约中的允诺，但英、法一方面以引起战争负全部责任，迫使捷克接受德国要求，一方面又以保证捷新国界不受侵犯进行引诱。在英、法与德的背后交易下，英、法、德、意四国于1938年9月30日在德国慕尼黑签订《慕尼黑协定》，把苏台德割给德国。

《慕尼黑协定》签字后，张伯伦庆幸其绥靖政策的成功，宣称“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但实际上，英、法的虚弱则充分暴露无遗，正如希特勒所说：“现在我才知道，西方是多么软弱……”英、法的出卖小国，法国毁约造成的政治声望下降的后果是严重的。

《慕尼黑协定》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加速了战争进程。德国吞并苏台德后，不到两个月，就于10月24日向波兰提出要其归还但泽的要求。在五个半月后，德国就出兵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英国的保证证明是一张废纸。接着，意大利于4月7日出兵巴尔干占领阿尔巴尼亚。为了德、意两国在欧洲发动战争的军力的协调，两国于5月22日签订了军事同盟，完成发动战争的最后准备工作。

德、意法西斯的贪得无厌的行动，使英国的绥靖政策破产，英、法深感战争已迫在眉睫。遂在3月22日在伦敦确定双方在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的措施，并以照会形式规定相互支援的义务。此后，还以受到威胁时互相提供援助的保证为义务而与希腊、罗马尼亚、波兰、荷兰、比利时、土耳其六国组成反德、意的阵线。至此，在战争前夕形成的英、法、德、意与苏联三方展开复杂的三角斗争。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苏台德、捷克和向波兰索取但泽情况下，加上1939年2月与日本谈判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该同盟因德、日意见不一，只是德、意先缔结两国军事同盟。1940年9月27日三国始签订同盟条约。）充分表明德国的东进与包围苏联的战略形势。为打破德国的阴谋，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多次提出与英、法建立互助关系，以制止德国的侵略。

1939年4月16日，苏向英提出缔结英、法、苏三边互助条约，英迟迟不作答复，英于5月27日始与苏谈判，由于苏提出双方的互助条件，不仅包括德国的直接侵略，亦包括间接侵略；在签订互助条约的同时应签订军事协定。直到7月1日谈判陷于僵局。7月9日双方重开谈判，但最后关于军事援助通过波兰领土问题未获解决，于8月20日以失败告终。

在英、法与苏联谈判时，英国一方面想联苏以制德，另一方面又想让德、苏发生冲突以减轻自身的压力，亦不愿与苏结成联盟。所以，英国对德国仍存有和解的幻想，一方面与苏谈判，采取拖的办法，另一方面于5月至8月秘密的与德谈判。英国甚至为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牺牲东欧国家利益。由于英国不敢冒第二次慕尼黑风险，德国亦不愿与英妥协而影响其世界战略，谈判未获结果。

苏联虽与英、法谈判，但是对英、法态度暧昧是否具有诚意抱有疑心，为了留有余地，不刺激德国，反而加强与德国的商务联系，与德进行贸易谈判。苏联的策略就是防止“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把苏联拖入到冲突中去”。

德国在苏在英、法谈判时，最担心三国结成同盟使其发动战争计划受挫。为了破坏三国谈判，德国与英国进行秘密谈判，造成英、德有可能结盟的假象，使苏联在谈判中产生疑虑，怕被英、法出卖。另一方面又与苏在商贸谈判中表示和解，并给苏传去密信，使英、法对苏不信任。德国的战略是先从英、法开刀，而不是从苏联开始，正如希特勒所说，“苏联是个庞然大物，吃它可能噎死。”德国的行动是先打败英、法，再进攻苏联。德国与英密谈既是破坏三国谈判，又迷惑英国。为了先攻英、法，就必须稳住苏联，所以当三国谈判8月20日刚失败，同日希特勒就给苏去电报要求谈判。德国外长8月22日去苏，23日即与苏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在欧洲三方利害来看，英、法是输家，是英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是企图把战争引向东方的失败。对德国来说，是其能顺利实现其发动战争先从西方英、法开始策略得以实现，并在战争中的开始阶段避免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对苏来说，他摆脱了德、日的包围，避免德、苏首先开战的危险，同时推迟战争给自身获得一段准备时间，这是三方面力量错综复杂相互关系的一种暂时组合。正是这种暂时组合的形成，在条约签订没过10天，英、法和德国的战争就爆发了。

（四）欧战的爆发与发展

1. 波兰、北欧和西欧战场：1939年9月1日凌晨，德军按希特勒的作战命令，越过德、波边界，向波兰发动全面进攻。在德军进攻波兰的同时，还向英、法宣称，德国“对西方没有任何要求”，“德、法边界是最后边界”，德国将同英国“友好”，企图麻痹西方。在西方，张伯伦还想同德国谈判，以便“恢复和平”，但遭到内阁与议会的反对。英、法于9月1日照会德国要求停止军事行动与撤军。德国对此不予理睬。英、法遂于9月3日对德宣战。

德军对波兰进攻采取“闪电战”，空军对交通线、城市、军事设施与阵地进行狂轰滥炸，配合机械化军队的进攻，德军很快占领波兰走廊，并从南北包抄首都华沙。由于波兰未作充分准备和来不及动员而遭到失败。战争不到一周，波政府就离开华沙，两周后就转移国外。9月28日德军占领华沙。

在波兰政府离开波兰，全国处于混乱之际，苏军于9月17日进入波兰东部，把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占居民多数地区予以占领，并分别划归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英、法虽然于9月3日向德宣战，但是，其军队却在法国的边界之内，既未越过边界向德国进攻，也未与德军开枪开炮进行过战斗，而是坐在边界水泥工事后面按兵不动，形成奇特的“静坐战。”

德军占领波兰后，看到西线这种静坐战的怪现象并未发动进攻，而是一

面发动“和平”攻势以保持所谓的“西线平静，无事可叙”的状态。一面抓紧准备进攻。1940年4月9日，德军派兵入侵挪威和丹麦，其目的在于夺取北海的制海权，保障德军的侧翼，取得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基地。同时，可以在冰冻时期，使瑞典铁矿石能通过挪威港口顺利运往德国。德军几个小时就占领丹麦。在挪威遭到军民抵抗，直到6月10日才占领挪威全境。

德国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把大批军队从波兰调往西线后，德军于1940年5月10日拂晓，在800千米战线发动突然进攻。当天占领卢森堡，15日迫降荷兰，25日迫降比利时。法军以为德军的主攻方向在此，遂调大军迎击。而原来认为法、比边境南端的阿登山脉丛林密布，不利于机械化部队通过，法国留下的军队不多，防守薄弱。而德军的主力恰好部署在此，计划实行中路突破进入法国。德军利用法军的这个薄弱环节，以出其不意通过阿登山脉，绕过法国花重金修筑的著名的马奇诺防线。13日晚突然占领重镇色当。15日突破法军最后防线，机械化兵团在法国北部平原上如入无人之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海岸推进。20日德军到达海峡岸边，在比利时境德军将英、法联军团团围住，使其无后路可退。

在这种严重关头，26日英国决定撤军。英国调集全国可以调动的船只，经8昼夜的抢运，使34万军队免遭歼灭。6月4日留下的4万法军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5日德军转向巴黎。14日进入巴黎。6月22日经谈判签订停战协定。根据协定，法国北部和中部为德“占领区”，剩下的为“自由区”，由投降派贝当政府管辖。6月10日意大利趁火打劫向法宣战，进军法国东南。在法国政府决定向德国提出停战谈判时，陆军部副部长戴高乐反对停战，主张继续战斗，遂离开巴黎去伦敦组建“自由法国”与英国共同战斗。

法国失败后，德国就制订计划，准备向英国发动进攻。

1940年7月，希特勒制订了渡海攻打英国的计划。计划集中4000艘船只，运送50万军队。在希特勒的威胁下，英国首相丘吉尔坚决拒绝德国的“和平试探”，并决心与德继续战斗下去。由于德国海军力量太弱又缺乏必要的船只，渡海登陆风险太大，加上9月以后海峡气候特别恶劣，不得不放弃原计划而改为空中打击。德国利用其空军的优势，通过轰炸破坏其经济和军事设施，轰炸城市，动摇民心，造成心理压力，以达到迫使英国退出战争的目的。从1940年8月到1941年5月，德国共出动飞机4.6万架次，投弹6万吨，炸死炸伤居民8.6万余人。炸毁建筑物100多万栋。在空战中，英军英勇作战以915架飞机，414名飞行员代价击毁德机1733架，击毙和俘获德国飞行员约6000名。德国空袭不但未达到目的，反而增强了英国军民继续作战的决心。最后，德国为了对苏联发动进攻，遂不得不停止对英国的空中袭击。

从德国对波兰及英、法的进攻来看，其实行的闪电战取得很大的成功，超出人们的预料，在极短时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情况极大地鼓励着希特勒称霸世界的信心，加速实现既定战略计划。由于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德军横扫了中欧、北欧和西欧。除东欧外，大部分地区都在其控制与影响之下，大大增加了军事与经济力量。这样，在欧洲的敌手只剩下英国和苏联。英国与大陆隔着海峡，虽然有强大的海军，相当的空军实力，可以阻止德军越海作战和保护自己的领空，但是陆军太弱，无法越海与德军战斗。为此，德军只需少量部队就可以防守西海岸，而大量地面部队则可以转向东方对付苏联。

欧洲战场的情况大大影响了日本对德关系。1939年上半年德、日曾谈判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未果。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增强了苏联在远东对抗日本的力量，使日本对德大为不满，两国军事同盟问题未再继续谈判。德国战败法国后，把重点转向苏联时，日本也想借与德国结盟以增强自身力量，增加对中国、苏联以及英、美的压力，对实行“北进”或“南进”有了良机。因此，在双方共同利益推动下，于1940年9月27日，德、日与意三国签定《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使三国的侵略战争能相互协调。

英、法的失败，首先在于，错误地吸取一战初期西线阵地战的经验，忽视后半段机动作战经验，采取依靠防御工事，坐以守卫的战术；其次，错误判断德军主攻方向，配置兵力不当，以致在德军实行中央突破之后，不可收拾；第三，作战准备与决心不够，特别是在闪电战形势下，士气不高，以为“静坐战”可以坚持，结果导致迅速失败。

法国的迅速失败，英国的虚弱，使美国看到，如果英国再失败，美国及整个美洲也将受到德国威胁，那时再起来抵抗就为时晚矣。为此，美国应立即加强战备并给英国以积极支持。原来美国孤立主义盛行，为避免卷入欧洲战争，1935年8月31日两院通过《中立法》禁止武器输出，后又增加禁止向交战国贷款。罗斯福总统为解决此问题，1940年美国向英国转让50艘军舰和大量枪炮支持其继续抗击德国侵略。后来，于1941年3月两院通过《租借法》，授权总统以租借或贷款形式向某些被认为其国防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和各种方便。

对苏联来说，德国在西欧的迅速取胜就标志着其向东进攻的时间的提前。德国与日本的军事同盟亦显示两国将会在苏联东、西两线军事行动的相互配合。因此，苏联在战争紧迫的威胁下，在西线，设法扩大边界范围，增加余地，尽量推迟战争爆发时间；在东线，坚决回击日本在边界的挑衅，使其知难而退，同时缩小范围，不扩大事态，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争取日本中立，避免对德战争中两面受敌的危险。在国际上调整与英、美关系，扩大回旋余地。英国此时亦放弃反苏政策，任命主张英、苏结盟的工党政治活动家克里为驻苏大使以密切彼此关系。

2. 苏联战场：

(1) 苏联的“东方”战线。尽管于德、波战争前夕，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苏联清楚认识到，这只是避免德国首先进攻苏联，推迟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时间而已。德国以闪电战迅速打败波兰，更使苏联积极地加紧战备与扩张西部领土，增加回旋余地，以保护其西部的核心地区。

首先，苏联趁波兰被德国击败之时，出兵占领其东部（巴黎和会上确定以民族边界作为波兰东部边界。该线由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提出，称之为“寇松线”。因该线以东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居民多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苏联困难的1921年苏波《里加条约》则把该地划入波兰。）将其20万平方千米土地分别并入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1938年春起，苏以防务需要为由向芬兰提出了关于割让或租借芬兰领土的各种方案。由于芬兰未能满足其全部要求。苏军于1939年11月30日进攻芬兰。芬兰坚决抵抗，但未能坚持住，于1940年3月签约，除将临近列宁格勒的卡累利阿地区割给苏外，还将汉科港租给苏。苏共获得约1.6万平方千米芬兰领土。

1940年夏，正当希特勒军进入巴黎时，苏寻找借口分别于6月17日至

21日迫使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政府改组，接着于7月14日通过选举，成立苏维埃政府并加入苏联成为加盟共和国。

1940年6月25日苏联照会罗马尼亚，要求将两国有争议的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同时将罗马尼亚的北布科维纳作为罗马尼亚统治比萨拉比亚22年（比萨拉比亚居民多属罗马尼亚人，1918年根据民族自决原则，由苏分出与罗马尼亚合并。）的补偿而并入苏。罗马尼亚政府被迫于6月28日接受苏要求，把约5100km²土地割给苏联，成为苏的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从1939年9月到1940年7月通过各种手段所建立的“东方”战线，目的在于保障苏西部领土安全。但后来证明，在德国机械化兵团进攻下效果不大。因为这种作法与国际法不符，既损害自身形象，也增加西方国家疑虑，不利于反法西斯阵线的建立。同时用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对待其西邻小国，损害其民族感情也带来些后遗症。

（2）“巴巴罗莎”计划与德对苏的进攻。对苏的“东方”战线，德国产生疑心与不满，为准备对苏战争，德在东面亦采取些对策。为保证石油供应，1940年10月德军进入罗马尼亚，并于10月7日分别吸收罗、匈和斯洛伐克加入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另外，德与芬兰签订关于德军在芬兰过境协定。1941年3月又吸收保加利亚加入德意日三国军事条约；4月德军一方面从保加利亚向南斯拉夫与希腊发动进攻并占领那里，另一方面又在芬兰登陆，特别是，在芬兰和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对苏联的波罗的海、巴伦支海以及黑海的港口的出海口进行封锁。这一切行动都是为进攻苏联作准备。

德国为了减少苏的怀疑及麻痹其为战争所做的准备，于1940年请莫洛托夫访问德国。为摸清德国的底细及缓和彼此矛盾，莫氏于11月去德，谈判中，德拉苏加入三国军事同盟，组建“四国联盟”共同瓜分世界，鼓动苏向印度洋和波斯湾发展。苏无意参加该联盟，要求德说明其东欧政策与意图及从芬兰撤军。谈判未达成任何协定。

1940年12月5日，希特勒亲自主持德军总参谋部会议，审定自8月1日开始制订的侵苏战争计划，即“巴巴罗莎”计划，规定三军在1941年5月15日前做好突然袭击的一切准备。当时，德国已占有欧洲的绝大部分，其掌握的钢与煤的产量分别为 3.18×10^7 t和 4.39×10^8 t，而苏联只靠自身一国，钢、煤产量分别为 1.83×10^7 t和 1.66×10^8 t，另外，在武器生产上，德国亦占有优势。特别是德国进行战争已将近两年，经济生产已走上战争轨道，军队已有了实战的经验。到1941年6月，德军武装力量总人数已有723.4万人（不包括意等国），而苏军加紧组建，当时已达500余万人。

1941年5月10日，德对苏作战前夕，派纳粹副元首赫斯驾机去英国，企图与英议和，共同对苏，但遭英拒绝，赫斯被扣压，德阴谋失败。

在战争进程的估计上，德认为，苏军的战斗力弱（从苏芬战争情况看），武器装备差，在六个月里，即严冬之前可以击败苏联，占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战败苏联后，即可以再转向英国。苏联认为，德在与英国相持时，不会很快发动对苏战争，即使发动战争，也不可能把大部分兵力投入对苏战场。对战争的主攻方向，被认为是苏的西南，而不是中路。同时，对自身战斗力估计过高，对德则估计过低，还认为会在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战斗。所以军队多部署在边境地区，缺乏纵深部署。弹药给养亦都储备在接近边界地区，这样可以便利其反攻与境外战争。

1941年6月22日拂晓，德调动190个师，550万人，在波罗的海到黑海

的 1800km 战线上向苏进攻。德军分三路：北路目标是列宁格勒、中路是莫斯科、南路是顿巴斯。

战争第二天，莫洛托夫代表苏政府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军和各族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当晚 9 时，英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支援苏对德作战。翌日，美代理国务卿桑奈尔·威尔斯代表总统声明支持苏联。

德军北路从东普鲁士出发，7 月 1 日占领里加，9 月 8 日就包围了列宁格勒。但是，在该城的军民抵抗下，一直坚持下去，在封锁中，军民忍受着粮食不足，不少人饿死，加上敌人的炮击、轰炸，顽强地抵抗侵略，经历了 17 个月。至 1943 年 1 月始突破德军对该城的包围与封锁，1944 年 2 月，才清除了附近德军。在此期间，德军损兵 30 万，折将 3 员。南路从利沃夫出发，由于是苏军的重点防御地区，德军进展受到有力阻击，进展缓慢。苏军在基辅的重兵遭围被歼，损失惨重。到年底，该路德军前锋已达罗斯托夫。中路德军，从东普鲁士的苏瓦乌基地与华沙东面的布列斯特出发东进。6 月 28 日抵达明斯克，包围并击溃大量苏军。7 月 16 日进至斯摩棱斯克，歼灭部分苏军。由于该路指向莫斯科，苏军不得不调集预备队于 7 月下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进行反击，终于顶住了中路德军的攻势。

到 9 月 30 日，德军进攻苏联已有 80 天，南路已达顿巴斯，但北路的列宁格勒是被围而未陷，中路最重要，却被阻于斯摩棱斯克。同时，严冬即将来临，希特勒遂调整计划，主攻莫斯科，列宁格勒和罗斯托夫作为辅攻。他认为莫斯科是全苏政治、经济中心，攻陷后就会湮灭苏联军民斗志，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为此，德军集中了 75 个师进攻莫斯科。

从 10 月 2 日，德军出动 35 个师向莫斯科大举进攻。到 10 月 20 日，德军已到莫斯科以西相距不到 100km 的莫札伊斯克。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开始戒严，政府各部门开始迁往古比雪夫，斯大林及作战组织仍留在莫斯科。当时，德军以为严冬到来前攻占莫斯科是毫无问题的，但是，遭到苏军顽强阻击，无法前进。

11 月 3 日，莫市第一次降霜，标志冬季已来临。德军十分焦急，遂加紧向莫斯科进攻。在此严重关头，莫斯科于 11 月 7 日照样于红场举行阅兵。苏军参加阅兵式后，立即开赴前线参加战斗。11 月 13 日德军开会认为，年底前攻下莫斯科仍有一线希望，于是作最后一拼。德军集中 51 个师（内有 13 个坦克师，7 个摩托化师），分别从南北两面，想在莫斯科以东合围，同时施以正面进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11 月 28 日，德军已进到莫斯科北面的 22km 处，克里姆林宫已在望。12 月 5 日德军已精疲力尽，停止攻击。12 月 9 日，苏军开始反攻，40 天激战，歼灭德军 50 万，苏军向西推进了 150~300km。莫斯科保卫战不仅使德军闪电战破产，也鼓舞与坚定了苏联与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法西斯的信心。

1942 年春，希特勒决定趁第二战场开辟以前，集中力量对苏联进攻。这次由于上年经验，及兵力不足，不采取全面进攻，而是集中于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这样，得手以后，既可以沿伏尔加河北上包围莫斯科；东进西伯利亚与日本会师；又可以南下波斯湾，转向印度与在缅甸的日本会合。然后回师进攻英、美，夺取轴心集团胜利。进攻高加索既可以切断苏联的石油供应，影响苏联机动兵团活动能力，又可为自身获得石油来源，增加部队活力。

于是，德军将该战线的 90 多万人的 97 个师分为两个集团，一路以斯大

林格勒为目标，一路以高加索为目标。德军6月28日在库尔斯克至罗斯托夫一线向东进攻，很快达到顿河河曲和高加索地区。7月中旬越过顿河，17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到8月18日德军进入斯城郊外，8月23日德军在斯城北进至伏尔加河边，9月13日进入市区，与苏军展开巷战，对每座楼房都反复争夺。到10月底，德军已占26个市区中的22个。至此，德军后备兵力缺乏，始终无法占据该城。

11月19日，苏军以事先在南北两翼准备好的百万兵力开始反攻。23日包围圈在斯城以西卡住封口，使20多个师，33万德军陷于重围。德军调兵遣将，企图解围未成。最后保卢斯元帅及9万多官兵于1943年1月31日不得不向苏军投降。这是苏军自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胜利，它标志希特勒的闪电战及征服欧洲、称霸世界的计划彻底失败。德军从此再也没有力量进行战略进攻，只有防守。这是欧洲战场上的一个转折点。

(3) 北非与意大利战场。北非与意大利属地地中海的南北两岸，是德国的软腹部，对其东面的德、苏战场来说是其侧翼。在英国来说，这里是英国通向远东地区的必经之地，特别是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如果被控，则欧、亚两个战场就会被分割开来，这对同盟国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苏、德战争爆发后，这里既是德国向东进攻一个分支，又是同盟国牵制德、意和进攻意大利，攻击德国本土的最近地点。

北非的西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原属法国殖民地，当时，在贝当维希政权手中。东边的利比亚和埃及分别在意、英手里。1940年，法国失败后，意军于9月13日进攻埃及，企图占领苏伊士运河。当时意军多于英军，英军退至马特鲁，意军进到西迪拜拉尼。由于补给困难，两军处于对峙状态。到1941年1月，英军增加兵力与装备后发动反攻，把意军驱赶到欧盖莱。为防止意军被歼，德军于3月进入北非，把英军逐回埃及。1942年1月英军又把德意联军赶回欧盖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德军统帅隆美尔向英军进攻，1942年6月进军到距亚历山大港仅约100km的阿莱曼，使英国大为紧张。在美支援下，英军于1942年11月23日发动阿莱曼战役，到1943年3月一直攻到突尼斯边界。彻底解除对运河的威胁。

在英军发动阿莱曼战役前，美英联军于西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并占领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接着美英联军与英军东西两面配合攻下突尼斯。

经过充分准备，美英联军又于1943年7月10日渡海，在西西里岛登陆，直接进攻意大利本土，至8月17日占领全岛。在这种形势下，意统治集团分裂，7月24日决定同联军停战，墨索里尼下台并遭监禁。9月3日，意政府向美、英无条件投降，并于10月13日退出法西斯集团，宣布对德作战。美、英军队于9月3日在意南部登陆。德军为保护其侧翼及南部领土出兵意大利，占领罗马和意北部。意大利的投降，不仅是德、意在地中海地区的彻底失败，亦是法西斯集团由分裂走向垮台的开始。

(五)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日军的攻势

1. 日本的“南进”与珍珠港事件：从日本自1936年11月25日与德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7月7日发动侵华战争来看，日本当时是把北进的“大陆政策”放在首位。接着于1938年7月29日在中、朝、苏交界处的张鼓峰地区，1939年5月11日在中国黑龙江与蒙古交界处的诺门

坎地区分别向苏军与苏蒙军发动进攻，遭到惨重失败后，被迫停止敌对行动。特别是诺门坎的冲突，时间达四个月，战线长达 50~60km，双方出动大量军队和飞机、大炮、坦克，战斗十分激烈。结果，日军被歼 5 万人，使日军吃了苦头，加上其陆军大部分陷于中国战场，抽不出更多兵力对付苏联而不敢轻举妄动。特别是 1939 年 8 月 22 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失去了与德国共同对付苏联的基础，日本十分不满，原来日、德结为军事同盟的谈判也就搁浅。日本的北进政策也碰了壁。

1939 年 9 月德在欧洲与英、法开战，法国迅速失败，就使日本转而实行南进政策。首先，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日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其目的在于利用与德、意配合，可以在西太平洋地区对英、美施加压力。为了避免受苏联牵制，也像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样，于 1941 年 4 月 13 日与苏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样，日本可以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美国。

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不大，资源短缺，特别是战争所需的铁、石油、橡胶、锡、镍等物资奇缺，加上中、日战争以来，需求大增，对外依赖性更大。实行南进，不仅可以获得这些物资，而且亦可增强其军事实力。

在东南亚，那里大部地区是分属于英、法、荷、美的殖民地。而法、荷在欧洲已被德国战败，英国已被德国牵制，无法照顾远东，有实力的只有美国，这就为日本南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与美国的矛盾亦逐步激化。由于美国重视欧洲的形势发展，把亚洲放在第二位。加上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影响及战争准备不够，对日只采取一定的政治、经济压力，避免或推迟日、美战争的爆发。

1940 年 9 月 23 日，日本出兵占领越南北部，9 月 27 日日本与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美国 9 月底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同时，给予中国 5000 万美元贷款及实施对华租界法案。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内部虽部分人主张配合德国，打击苏联，实行北进，但 7 月 2 日御前会议决定“加速南进”，但如苏、德战局一旦有利，就立即攻占西伯利亚。7 月 24 日，日军开进越南南部，8 月又侵入泰国。为此，美国一方面加强菲律宾的防务，一方面宣布对日实行除粮食和棉花外的全面禁运。这对日本的石油供应产生严重影响。在矛盾日益激化情况下，日本海军于 9 月 1 日发布全部舰队进入战争状态的命令，加紧制订作战方案。11 月 18 日就将偷袭珍珠港的舰队集中于千岛群岛基地待命。为迷惑美国起见，于 11 月 17 日派来栖特使赴美，协助野村大使与美谈判。11 月 26 日日本舰队向夏威夷出发。12 月 7 日晨（当地时间 7 时 55 分），日本飞机向珍珠港发动袭击。美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飞机损失 188 架，美军伤亡 4500 人。事件发生后一小时，日才正式向美、英宣战。该事件引起美国朝野极大愤怒，第二天除美、英对日宣战外，还有其他 20 余国向日宣战。12 月 11 日德、意向美宣战。德、意、日三国并于 12 月 11 日签定共同进行战争协定。1942 年 1 月 1 日美、苏、英、中等 26 个参加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至此，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2. 日军对亚太地区的攻势：珍珠港事件以后日军迅速向中南半岛、东南亚诸岛和西太平洋诸群岛展开攻势。特别是日本在战争开始时就消灭或重创美、英在该地区的三股强大的威慑力量。第一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日对珍珠港的袭击使美国太平洋上海军力量受到重大损失，但所幸航空母舰未受损失，对日仍有较大威胁。其次是美国在菲律宾的空军。它是美国

在远东的最大空军基地。1941年12月8日，日飞机从台湾起飞，对克拉克和尼古拉机场进行突然袭击，一举炸毁其飞机的一半，迫使其剩下飞机撤到澳大利亚。第三是英海军上将菲利普斯率领的远东舰队。其中包括 3.5×10^4 t的大型战列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它们是1941年12月2日才驶抵新加坡的，目的是向日显示力量。可是，在开战后的第三天，这两只战列舰就在马来半岛的关丹以东海域，由于没有空中掩护，被日鱼雷和轰炸机炸沉，菲利普斯也以身殉职。这三支威慑力量的损失，使美英失去海军控制权，遂使日军在该地区得以顺利的展开攻势。

在中南半岛，由于日军已占领越南、老挝与柬埔寨，而且已进入泰国。剩下的就是新、马与缅甸。其中关键是新加坡与缅甸。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重要港口，既是军港、又是商港、它扼马六甲海峡，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日军控制它就等于打开了进印度洋的入口。

12月8日，日军从泰国的克拉地峡及登陆哥打巴鲁进入马来西亚，分别沿东、西海岸向南急进，1942年1月11日占领吉隆坡。2月8日夜日军渡过柔佛海峡，登陆新加坡。15日进入市区，占领新加坡。

缅甸当时是中国唯一与西方国家联系的陆上通道，是军用物资重要来源所经之地。日军进攻该地既可以切断该通道，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其退出战斗以便全力对付英、美。并且可以进入印度，实现与德的联系。经过准备，日军于1月4日和19日从泰国进入缅甸南部，31日占领毛淡棉，3月8日进入仰光。为了支援英军，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由于两国军队未能很好配合，致使日军于4月29日和5月1日占领腊戍和曼德勒，英军和部分中国军队退入印度，另一部退回云南。

日军在印度洋上还占领安达曼和尼科巴两群岛，并于4月初派机动舰队攻击锡兰的科伦坡与亭可马里的英海、空军基地，英受较大损失。英军东方舰队乃退往东非，要不是日军已鞭长莫及，则印度将受到攻击。

菲律宾是美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有强大的海、空军基地。日军的策略是在战争开始的第三天重创其空军主力，夺取其制空权，并于12月10日与20日分别于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从南、北向中间进击。1942年1月2日马尼拉陷落，5月6日美、菲军投降，日军全部占领菲律宾。

荷属东印度群岛盛产石油、锡。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奇缺物资，当时日石油储存仅能维持3至5个月的军用。这也是日本选择南进政策，决心铤而走险，与美、英不惜一战的原因之一。为了攻占爪哇岛，日军于1941年12月16日至1942年2月20日分别登陆婆罗洲，苏拉威西、安汶岛、帝汶岛以及苏门答腊，从北、东、西三面向爪哇逼近。为了避免苏门答腊岛上石油设备受破坏，日军采用伞兵空降。2月下旬在爪哇海域日与美、英、荷、澳海军激战，重创盟国舰队，逼使剩下船舰撤向澳大利亚，以保证日军登陆安全。3月1日日军在爪哇岛东、西两面登陆，8日占领全岛。

在太平洋上，日军拟占领珊瑚海和中途岛。前者可以威胁美、澳之间联系，后者企图把美海军逐出西太平洋与扩大自身的防卫圈。在4月下旬组织好的舰队由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基地出发，5月3日在所罗门南部的图吉拉岛登陆。事前掌握其情报的美国舰队则向珊瑚海出发。在4日、7日、8日双方都用舰载机实施远距离攻击，虽然美、日双方损失大体相当，但却第一次阻挡着了日军攻势，使美、澳联系及澳大利亚安全得到保障。

1942年3月，日海军企图用突击占领中途岛的办法，诱引美太平洋舰队

前来支援，迫使与其决战，借机给以重创，以增强日在太平洋的海上制控制权。同时，亦可阻止美飞机从舰上起飞轰炸日本（4月18日美利用接近日的航空母舰上起飞飞机轰炸东京，飞到中国降落）。日遂组织包括6艘航空母舰的庞大舰队于5月底出发。美军获悉后，组织三艘航空母舰迎击。6月4日双方舰载机于中途岛北战斗，结果日本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全部被击沉，美军只损失一艘。这场海战使日丧失了战争初期夺得海、空制控制权，也失去了海上战斗的战略主动权。加上美国强大造船能力优势，遂使后来日军在各岛战斗中缺乏强大海、空军支援与补给而陷于被动。所以，中途岛一战是太平洋战场上的转折点。

在日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中，中国战场则处于一种奇特的现象。主要表现是日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发动了一连串的海、空攻势，进展十分迅速，而在中国则相对比较平静，两者形成强烈对比。这是由中国战场的特殊原因所决定的。

在中国，1937年日军大举侵略中国之初，进展较快，中国在进行坚决抵抗情况下，节节后退。直到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以后，日军占领广大中国领土，兵力分散，已难以继续大规模地前进；而国民党方面，由于力量的消耗，一时难以恢复，无力反击，所以从那以后战争处于胶着与停滞状态。

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首先，设法使中国政府妥协与议和，以便巩固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即使不成也使国民党动摇，产生幻想，消极抗战。其次，在华北组织与加强伪政权，在华中组织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企图分化中国的抗日力量，利用中国人加强其占领区的统治，达到以战养战，减轻自己压力与负担，以便可以抽出相当兵力用于其他战场。第三，配合上述两项任务，进行局部地区的战役，切断中国与美、英的联系，特别是断绝其军用物资的来源与供应。在1940年9月，日军进入法属印支北部以及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都有切断中国对外联系通道、迫使中国就范之意。

但是，中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继续抗战，在战场上保持一定压力，在日占领区的后方，共产党领导的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方针取得很大成效，拖住了日军，打击了伪军使日军难以脱身。实际上，这也是对盟国对日战争的一种重要支援。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的第三日，即12月9日，中国政府就正式向德、意、日宣战。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利用中、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四年，日已处于战争动员状态，而英把重点在欧洲，无力东顾，美则刚开始进行备战，日军事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可以在太平洋与东南亚横行。虽然其海、空力量可以大量投入这场战争，可是陆军却受到严重的牵制。例如，当时日陆军共有51个师、58个旅，共210万人，而中国的关内战场却有21个师、20个旅，牵制了近百万的日军。正是因为其受陆军的限制，人力不足，陆军无法配合海军对澳大利亚等进行攻击，使海军的部分战役难以进行。

（六）苏军的反攻、第二战场的开辟和欧战的结束

在欧洲战场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失败及意大利的投降，表明德国法西斯在走下坡路。苏军1944年进行的反攻，不仅把德军逐出境外，而且进入东欧其他国家，并向德境内挺进。另外，1944年6月，第二战场的开辟，东西夹击之势已成，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从而结束了欧战。

1. 苏军的反攻：经过1943年苏军的艰苦战斗，在北面已突破德对列宁

格勒的封锁；在中部，已把战线推到斯摩棱斯克以西；在南面，已收复基辅，越过第聂伯河。至此，苏已收复其 2/3 的沦陷国土。德军被迫转入守势。形势对苏反攻十分有利。在 1944 年，苏军共发动 10 次突击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 1 月 14 日至 3 月 1 日，主要任务是，使列宁格勒从长期被围困中解脱出来。第二次战役是 1 月 24 日至 4 月 17 日，是在乌克兰地区进行，收复了除南部的原乌克兰的绝大部分国土。第三次是 3 月 26 日至 5 月 12 日，收复了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及乌克兰南边的克里米亚。第四次是 6 月 10 日至 8 月 9 日，目的是把列宁格勒北面的德、芬军队赶出去，并迫使芬兰退出战场。

第五次战役（6 月 23 日至 8 月 29 日）与第六次战役（7 月 13 日至 8 月 29 日）是在美、英在法国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后不久而实施的。重创了波兰以东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境内的德军。其结束的时间亦恰好是西部战线的联军进入巴黎之后。这两次突击战役一方面是与第二战场相配合，吸引德国兵力，减轻其压力，也是进一步收复自己国土。

第七次战役（8 月 20 日至 9 月末）与第九次战役（9 月 28 日至翌年 2 月 15 日）主要是苏军由其国土进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罗马尼亚是德国的石油与粮食供应基地，苏军从乌克兰西南部进入罗境内后，罗人民起义成立新政府，脱离德国，并与苏军并肩战斗。接着苏军于 9 月 8 日又进入保加利亚。当天索非亚等城市武装起义，第二日成立新政府，与苏军共同打击德军。在第七次战役完成后，接着即进行第九次战役，向匈牙利进军。匈牙利是德军的重要军事工业基地。苏军一方面从保加利亚进入南斯拉夫，再北上进入匈牙利；另一方面从乌克兰西南，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匈牙利东北进行两路进攻。苏军进入南斯拉夫，与南人民共同解放贝尔格莱德。在阿尔巴尼亚与希腊的德军怕退路被切断而迅速北撤。当南北两路苏军进入匈牙利，并对布达佩斯完成合围时，匈各人民团体成立临时政府并宣布对德宣战。这两次打击既消除德军东线的侧翼，又引起罗、保、匈组织新政府，退出与德同盟。

第八次战役（9 月 14 日至 11 月 24 日）与第十次战役（10 月 7 日至 11 月 1 日）主要是分别清除波罗的海东岸的德军与苏北极圈内和挪威北部的德军。通过这十次战役不但苏军正面战场已进入波兰中部，距德国边境很近，而且在两翼亦完全得到清理，为最后击败德国创造了条件。

2. 诺曼底登陆与西欧战场：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是苏、德战争爆发后，苏为减轻其压力多次提出的。后于 1943 年底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会议上决定，于 1944 年 5 月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在英吉利海峡对面，适合登陆的地点有三处，即科唐坦半岛、诺曼底和加来。科唐坦半岛德军防守弱，但地域狭窄兵力施展不开，不利纵深发展。加来地区距英最近，但距英南部港口远，兵员物资运送不便，而且是德军防守的重点，登陆后战斗必然激烈，登陆难度大。如果登陆成功，向法、比发展，则道路不多，影响进展。相比之下，诺曼底的地势开阔，登陆方便；离英国港口近，兵员运送、物资补给较方便；道路条件好、距巴黎近。另外，德军防守差，成功可能性大。所以，盟军选择诺曼底作为登场所。而德军则认为在加来地区登陆可能性大。加上盟军制造些假象，更使德军把防守重点放在该地，忽视诺曼底。在战略上，德军也认为从准备条件看，1944 年盟军会登陆进攻西欧。德军考虑如果盟军登陆，利用此机会，集中力量给予反击，

一举予以歼灭。为此，则可以抽出兵力对付东方，暂时避免受两面夹击之苦。

经过充分准备，盟军于1944年6月6日晨开始在诺曼底登陆。当初德军认为盟军声东击西，不愿调动机动部队与海、空军力量予以阻击。到情况明了之后，形势已难扭转。到6月12日，登陆场已联成一片，宽约80km，纵深为12~18km，兵力已达32万，车辆已有5.4万。为阻止盟军，德军于诺曼底南面，从卡昂向西经科蒙、圣洛、来赛组成防线。7月25日，盟军在德军防线西翼突破，先向南再转向东对德军进行包围，歼其大部。同时，另一部则向东经勒芒，直插塞纳河，进军巴黎。8月25日，戴高乐率法军进入巴黎。

当盟军向巴黎进军时，另一支美、法部队，于8月15日在法东南登陆。该路军队迅速经里昂、第戎北上。与诺曼底登陆的部队一起于12月中逼近德国边界。德军为阻止盟军的东进，选择在法国东北、比利时境内的阿登地区，进行孤注一掷的反扑。由于盟军在登陆后进展较顺利，对德军的力量估计过低，认为阿登地区地形条件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运动，所以在从荷兰到瑞士的德国边界地区的兵力部署上是个薄弱环节。德军集中25个师于16日突破盟军阵地。到20日，突破宽度达100km，纵深达30~50km。英、美军经过正面空降兵阻击，两翼的反突击，于1945年1月16日始将德军击退。加上东边苏军的进攻，西线德军只好退到莱茵河地区，企图坚守齐格菲防线。

3. 欧洲战场的最后攻击与德国失败：在1945年，东、西战线都已推进到德国境内，由于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战斗十分激烈。特别是希特勒阴谋与美、英妥协结束战争，把大部兵力放在东线，所以东线战斗更加激烈。

东线苏军1945年的第一战役是渡过波兰境内的维斯瓦河把战线推到奥得河。为了阻止德军在西线阿登地区攻势，该战役由1月20日提到1月16日。到2月3日战役结束，战线向西推进了570km，达到奥得河边，距柏林只有60km。这次战役是苏军所有战役中进攻速度、推进深度最大的一次，冲破了七道防御地区。

在这次战役中，由于是中央突破，进展快，推进的远，不得不需要两翼的配合。在北面，于1月13日在东普鲁士展开进攻，到4月25日将其境内德军全部歼灭。在东普鲁士战役进行时，苏军又对但泽（今格但斯克）以西的东波美拉尼亚地区展开攻击。从2月10日开始，到3月30日将但泽以西，到奥得河口的什切青以东的德军清除。这样，苏军全部都进到奥得-尼斯河畔。在南面，苏军3月6日从匈中部开始进攻，3月30日进入奥地利，4月13日攻占维也纳。这就在南面对德国南部与捷克境内德军造成压力。

西线盟军在击退德军在阿登地区反扑后，于2月13日向莱茵河地区进军，3月23日开始强渡莱茵河。渡河后，除留下部队对鲁尔工业区德军予以包围外，其余继续东进。中部的美军于4月16日在维滕贝尔格和马格德堡进抵易北河。25日美军在其南面的托尔高地的易北河上与苏军会师。在北部英军进入汉堡，5月初在其东与苏军会师。

在东线，苏军经过充分准备后，集中250万军队、4.2万门火炮、7500架飞机、62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于4月16日向收集100万部队、1万门火炮、330架飞机、1500辆坦克与强击大炮的德军在柏林展开激战。到4月30日夺取了柏林市内的国会大厦。希特勒当日亦自杀身亡。德军城防司令于5月2日投降。柏林战役可以说是规模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

1945年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向苏政府代表朱可夫元帅和盟军

代表英空军上将泰德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战正式结束。

（七）日本的失败

在太平洋战场上，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始到中途岛海战，是日本的上升阶段，但中途岛海战失败标志着其转向下坡路。其上升阶段只有六个月。其下坡阶段的第一个战役是瓜岛战役，这就拉开了美军在太平洋上反攻的序幕。

1. 太平洋上的反攻：日军在西南太平洋上进攻最远的地方是所罗门群岛。为了扩大对该地作战的空中支援，日军在该岛中最大岛——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上修建机场，机场于1942年8月5日完工。这对美、澳间交通极为不利，美遂决定攻占该岛。美、日双方于1942年8月7日开始至1943年2月7日进行了六个月争夺战，双方不仅在岛上展开陆军争夺，还进行大小海战30余次，双方各损失驱逐舰以上舰只各24艘。美军参战士兵约6万，伤亡6千，日军参战3.5万，被歼2.4万。尽管日军损失略大于美军，但反映日军人力物力不足的困难，而美军不仅人力在开战后迅速增加，特别是海、空军力量由于强大工业基础而急剧增长，优势更加明显。最后，剩余日军在饥饿、急病等折磨下，于2月1日至7日偷偷撤离。

瓜岛战役后，双方又开始新乔治亚群岛的战斗，1943年6月30日美军在新乔治亚岛及附近二岛登陆，经多次陆、海、空军战斗，美军于10月9日占领该群岛，并获得5个机场。11月1日，美军又在新乔治亚群岛北的希根维尔岛登陆，11月6日占领该岛。为了巩固对所罗门群岛的占领，美军与以新不列颠岛上拉色尔为海、空军基地的日军，于11月内发生七次相互攻击的海、空军战斗。虽然双方各有损失，但日军终于无法支撑将基地撤到特鲁克群岛，拉色尔亦失去作用。

在彻底解除对澳大利亚的威胁后，美军随着即向太平洋中部日军占据的群岛发动攻击。在这里首先攻击的是吉尔伯特群岛，其次是马绍尔群岛。美军是1943年11月20日分别在吉尔伯特群岛的马京岛和塔拉瓦岛登陆，并于23日与29日分别占领两岛。对马绍尔群岛，美军于1944年1月31日登陆瓜加林岛，2月8日占领全岛。2月17日起攻占防守薄弱的西部诸岛，对设防坚固的东面四岛则弃之不顾。这两个群岛都是在美军强大舰队包围下，完全控制海、空权情况下，施以强烈轰炸后被占领的。而日军在失去海、空军支援下，完全孤立无援，被逐个击破。在马绍尔群岛，日军认为美军会先攻其外围，故着重防守东部边缘诸岛。可是，在失去海、空力量支援下，给美军选择其弱点施以攻击创造机会。而防守坚固之岛没有海、空支援，变成毫无作为的孤岛。

马里亚纳群岛地位十分重要。在马绍尔群岛失守后，日军认为美打击重点可能在菲律宾，故将舰队布置于菲南部，而把飞机分置于马里亚纳、加罗林和菲律宾，准备以舰载机与岸基飞机相配合消灭美国舰队。进攻马里亚纳的美军舰队越过防守严密的加罗林群岛，于6月12日至14日突然出现并击毁岛上各机场岸基飞机。美军舰队15日在马里亚纳群岛海域出现时，日军始判明情况，调其舰队由菲北上。19日两舰队于塞班岛以西海域交锋，由于美机在数量与质量上的优势，日军航母飞机遭毁灭性打击，航母三艘受伤，舰队撤往冲绳。在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情况下，塞班岛、提安尼岛和关岛分别于7月6日、8月1日和8月10日被美军攻下。

美军在太平洋取得胜利的同时，亦攻占了新几内亚北部日军占据地区，

并于 1944 年 9 月 15 日占领马鲁古群岛最北的莫罗泰岛。菲律宾遂暴露在南、北两路美军攻击之下。由于菲律宾是日军海上联系东南亚与中南半岛的要地，日军准备调集日本本土及新加坡舰队与美决战，挫败其进攻，扭转战局。具体作法，以日航母把美航母引开，然后以日舰队歼灭美登陆船只和部队。从 10 月 23 日至 25 日双方舰队实际战斗结果来看，这次在菲中部莱特海战是二战中最大一次，参战舰只 282 艘。日军参战 4 艘航母全部沉没，其他舰只损失较多，美军只损失轻型航母一艘与少量其他舰只。由此日航母已被全歼失去远洋作战能力。

美军从 10 月 20 日至 30 日攻占菲中部莱特岛，把菲南、北分割。在北部，美军 1 月 9 日在吕宋岛登陆，2 月 25 日进入马尼拉。在南部，2 月底开始登陆，到 5 月中旬占领全部岛屿。

美军攻占菲律宾后，还有两次登陆战，一是硫磺岛，一是冲绳岛。硫磺岛是离日本本土较近的航空与海运基地。美军从 2 月 19 日到 3 月 26 日花了 36 天才占领那里，比预定 5 天时间多得多。日军虽无海、空军支援，但靠坚固工事，使美军付出较大代价才夺取该空军基地。

冲绳是美军登陆的较大岛屿，是美军占有菲律宾后攻占的最重要基地。美军从 3 月 26 日到 6 月 30 日，花了 96 天才占领此岛。日军由于海、空力量已十分虚弱，只得利用其剩余力量，甚至采取自杀性的攻击，使美军受到很大损失，伤亡 7.5 万人，驱逐舰以下舰艇有 400 艘沉没。日军的海、空军力量在战斗中几乎损失殆尽，而美军获得的海、空军基地，则使日本本土完全暴露在盟军之下。

2. 日军在缅甸的失败：在 1942 年 5 月日军占据整个缅甸，英军与一部分中国军队退入印度，另一部分退回云南后，日军曾企图乘胜向印度东部阿萨姆地区进攻。但由于兵力不足及在中途岛与瓜岛的失利而搁置。在此期间，缅甸战场相对比较平静。退到印度的中国部队及后来空运到印的部队，经过整训，配上新式装备为反攻作准备。另一项准备就是中印公路的修建。它不仅是作为反攻缅甸，打击日军之用，同时也是解决仅靠由印度空运物资到中国的所受限制，以加强中国军队和配合美军在太平洋的反攻问题。

1943 年 9 月，中国驻印军与美军一个团由缅甸西北向缅甸北部密支那方向进攻。英军于 1944 年 1 月 9 日从印度东部向缅甸西部进攻。在云南境内，组成的中国远征军于 1944 年 5 月 10 日越过怒江，向西策应中国驻印军的进攻，于 1945 年 1 月下旬，两军会师畹町，打通中印公路。

然后，中、英、美联军南下，3 月 20 日收复曼德勒，5 月 1 日收复仰光。残余日军分别退入泰国与马来西亚。

3. 中国战场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为加强对中国控制及配合其“南进”政策，在正面战场上主要是打通浙赣、平汉、粤汉、湘桂四条铁路线。

1942 年 4 月，美军轰炸日本东京等地飞机由东京东面海域航母起飞，轰炸后飞往中国浙江机场降落。对此，日本大本营命令侵华日军进攻浙赣线、破坏浙西与赣东机场。日军于 5 月分别由杭州与南昌东、西两路出兵，于 7 月 1 日在江西横峰会合，在破坏沿线机场及暂驻浙西后，即撤回原地。

在 1943 年，日军在海上节节失利，海上交通日益困难情况下，遂想打通陆上直通印支的交通，以保持日本与东南亚之间联系与往来。这涉及到平汉、粤汉与湘桂三条铁路线。日军于 1944 年 4 月在河南，由开封向南进攻平汉线

上各城市。5月26日由湖北向湖南进犯，8月8日占领衡阳，然后又向湘桂线进军，到12月初，一直进到贵州独山。由于孤军深入，不得不后撤至河池。但是，到1944年底1945年初时，太平洋战争形势骤变，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后，又在菲律宾展开登陆战，拦腰切断了日军本土与东南的联系，而且向日本本土推进。这时，日军不得不改变策略，对日军在华南战场开始收缩。在江南经广西、湖南开始后撤，以加强华北、华中地区。

另外，在日军侵占的华北、华东及华中、华南等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40年代则经过1940、1941年两年困难后，取得较快发展，甚至使日占区及日军收缩到铁路沿线。尽管进行战斗的规模不大，但是已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人民武装也有较大发展。到1945年4月，八路军已从抗战初期4.2万人发展到65万人，新四军从1.03万发展到26万人，华南抗日武装亦从零发展到2万人，共有人民武装93万。另有民兵220万。其所抗击的地区的日军占全部在华日军的5/6，及日本所组织的几乎百分之百的伪军，创造了以劣质装备打击与拖住优质装备侵略军的重要战绩。

1945年8月8日，苏军根据其在1945年2月于雅尔塔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上商定于欧战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对日正式宣战。

苏军经过充分准备，调集了158万人的部队与大量的火炮、坦克、飞机向中国东北的97万日关东军发动进攻。其进攻方向有三：一路由蒙古东部向着沈阳、长春。其两翼是海拉尔、齐齐哈尔与张家口、承德。另一路由绥芬河向牡丹江、吉林、哈尔滨推进。第三路由东部沿松花江向哈尔滨进击。到8月14日，苏军已在不同方向给日军以严厉打击，向前推进50~500km，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与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与包围。日军全线基本上失去有组织抵抗。根据日本天皇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日本关东军于8月20日停止抵抗，举手投降。

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9月9日于南京在向中国的投降书上签字。

4. 日本的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由于硫黄群岛与冲绳岛的失守，战火已临近日本的四岛。由于海、空军力量已消耗殆尽，日本的四岛已暴露在美国飞机、兵舰毫无顾忌的攻击之下，轰炸、炮击和封锁已使日本经济陷于瘫痪，石油、粮食极端缺乏。在此情况下，原来准备集中最后力量，在本土实行决战的计划亦难以实现。1945年6月22日，日本天皇召开会议决定谋请苏联进行调停、沟通谈判，结束战争，但无结果。7月26日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认为公告对保留天皇制没有保证，态度犹豫。军部仍坚持战斗到底。

美军计划在通过轰炸，大量摧毁其各种防御设施后，于11月在日本南部登陆。8月8日苏军进入东北迅速击溃日关东军又使其失去背后的依靠，形成腹背受敌。加上8月6日和9日对广岛和长崎两市的原子弹袭击，使日本看到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将会使本土遭受毁灭性打击。8月9日晚御前会议上，首相铃木提出在继续维持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外相作了解释后，军部仍持反对意见，最后天皇决定采取外相方案，日本投降。8月10日晨通过瑞典公使把日本照会转给美、英、中、苏四国。军部一些法西斯分子拟策划政变阻挠。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美舰上举行签字

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烈维西科中将，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字。至此，各国对日战争胜利结束，二战取得最后胜利。

三、世界大战与政治格局特点

本世纪上半期内，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政治格局上与 20 世纪以前的许多次战争相比有许多特点。

（一）世界大战是对殖民地瓜分结束后矛盾发展的产物

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不再是彼此隔离与孤立，而是开始走上相互联系的时代。但是，这种相互联系是通过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通过它们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剥削、垄断；政治压迫、控制、统治；军事屠杀、征服、镇压而获得的。这一过程从 15 世纪开始，一直到 20 世纪初才完成，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亚洲广大地区被作为殖民地基本上瓜分完毕。在此期间，伴随着欧洲掌握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的更替的是，商业资本向手工业资本，最后向工业资本的转移。在地域的变化上，例如，开始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葡萄牙，后来是莱茵河口的荷兰，最后是欧洲大陆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

这一过程中，经济、政治、军事的斗争纠合在一起。斗争往往是由军事来决定结局的，也就是说依靠战争来决定的。在战争中，有帝国主义向殖民地发动战争，有各帝国主义之间为殖民地而在殖民地土地上进行的战争，还有各帝国主义之间为殖民地而在欧洲大陆上展开的战争。比较起来，后一种战争特别重要，霸主的兴衰往往是通过它来实现的。然而，这种战争由于矛盾多，情况复杂，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往往是好多国家纠合在一起，成为多国战争。因此，两次世界大战也是这一过程中，同样是为扩展自身，争夺领土，控制殖民地，以及争当霸主而进行的战争。这一点与过去相比可以说是共性。但是，也有许多与前不同的特性。

首先，因为殖民地在世界已瓜分完毕，各有其主。但在瓜分所得中，有多，有少，有肥，有瘦。另外，在工业化过程中，原来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独占鳌首，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德、法、俄、日……跟了上来，不但逐渐抢了原来英国的份额，而且有的国家，如美国、德国，在经济上不但接近英国，甚至超过英国。这种不平衡发展是客观存在。老牌的英、法、俄获得大片殖民地与领土，美国不但在向西部发展过程中获得大片领土，而且借“门罗主义”，掌握着拉丁美洲，打败西班牙又抢到些殖民地，而德、意等则感到自己所得份额太少，遂导致一战的爆发。

第二次大战，由于一战的矛盾没有解决，德国一战中失败，不但殖民地未能增加，反而已有的也全部丧失，甚至赔了老本，把在欧洲的土地也丧失一部分，丧权辱国，耿耿于怀。日本、意大利更是想在重新划分世界中抢得更多的份额。三国的利益一致，形成法西斯轴心，企图通过侵略战争达到自己目的——成为世界霸主。

其次，过去战争涉及国家不多，卷入地区不大，所用时间不长。这两次战争则不同，不仅把大多数欧洲国家卷进去，而且把欧洲以外的国家拖进去。

在战场地域上，不仅从欧洲扩大到亚洲，甚至太平洋西部各岛与澳大利亚都成了战场，遭到战火的洗礼。第一次大战花了四年多，二次大战在欧洲打了近六年，在亚洲则打了八年多。

在卷入国家方面，第一次大战主要是欧洲六国，即英、法、俄与德、奥、意。前三个为协约国，后三个为同盟国，是3：3。可是，战争后期，意大利转向协约国，其比例则成为4：2。到最后，俄国因十月革命退出，但美国加入，仍然维持着原比例。日本虽参战抢夺了德国控制的地区，但并未出兵参加欧洲的战争，却也享受到参战的好处。所以，一次世界大战，关键是八个国家，战场是在欧洲。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并不是阵容分明，而是逐步明朗的。这点与一次大战不同。在亚洲，开始是中、日对垒。在欧洲是英、法对德、意，苏联则不属于上述两集团。德、意、日原先是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而结成柏林-罗马-东京的侵略轴心，后又逐步发展成三国军事同盟，成为法西斯侵略集团。而英、法集团因法国战败、退出，只有部分力量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后来苏、美等国家参加才形成美、苏、英、中等国家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所以，二次大战中，除德、意、日外，加上美、苏、英、中、法，仍然是八国，只是苏联代替了俄国，中国取代了奥国。

关于战争爆发地，两次大战的欧洲战场都起始于东欧。第一次大战，起于塞尔维亚（即后来的南斯拉夫），第二次大战，起于波兰。亚洲战场则初现于中国。虽然原因是多样的，但共同之点都是从弱处入手。东欧是个多民族地区，一次大战前大多为他人所统治，一次大战后才建独立国家。国家面积相对小，加上彼此之间，民族地区相互镶嵌，领土纠纷多，是个矛盾汇集地区。夹在大国之间，既是大国以其作为扩张的前沿，缓冲的中间地带，又是迫使其作为自身集团的伙伴或附庸的对象。总之，这里是大国为了各自利益争夺的场所，有欧洲“火药桶之称”。

中国在刚从清政府时有被瓜分的危险的境遇中走出，由于自身的落后，便成为日帝的侵略对象。不过，中国国土大、人口多，有能力拿起武器抗击侵略，使侵略者陷入绝境，并取得最后胜利。

（二）世界大战中的政治格局

两次大战的政治格局在空间上可以说既有相同性，亦有差异性。一战的战场限于欧洲，二战则超出了欧洲，扩大到北非、亚洲与太平洋，大大扩大了范围。

在欧洲战场上，一战时，主战的国家是德、奥，应战的国家先有英、法、俄，后有意大利。日本军事行动较早，但限于亚洲，仅取得德国的租界地与岛屿，并未出兵欧洲，参与战斗，影响不大。欧洲战场，主战的德、奥位于中部，而俄与英、法分列东、西，形成相互呼应两面夹击，而德、奥则分兵东、西两面应付。意大利参战，虽然在德、奥南面开辟了新的战场，使德、奥三面受敌，但意大利力量有限，并未对德、奥造成严重威胁。对德、奥来说，东、西两个战场，相比之下西面压力稍大于东面。

就应战的英、法、俄来说，英、法位于西边，而俄则位于东边。在战场方面，虽然东、西两面分别对德、奥施加影响，但比较起来西边的压力大于东面。在西边，是英与法组成联军对抗的只是德国，奥国未参与，形势是二对一。战场在法国的北部，战线波动不大，从开始到结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东边，是俄国对抗德、奥两国的军队，也是一种二对一的形势。战场

在波兰境内，后期又转入俄的西部，战线变动较大。在战场上，俄军对奥军具有优势，而俄军对德军则又处于劣势。

由于德、奥两国介于中间，而且海军力量有限，虽然德国实行潜艇政策，对英国在大西洋上的运输造成一定的威胁，但对自身获得与海外联系，物资供应方面，则无法得益，形成被包围与被封锁状态。这对两国的后期作战增加许多困难，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德、奥两线作战方面，战争后期由于帝俄的国内革命，终于退出战场，使德、奥减去了东面战场的压力，可以调东线的兵力于西线，集中力量与英、法决战。可是，当德与苏签订和约时（1917年11月30日开始谈判，1918年3月3日签署和约），美国参战已近一年（1917年4月6日美对德宣战），而且大量军队已开赴西欧战场，使精疲力尽的英、法力量大为加强，而陷于强弩之末的德国已无回天之力，在内外交困情况下，终于失败。

一战的对立双方是从德、奥与法、俄、英开始的，意是后参与者。意大利是衡量自己的利弊，虽参加德、奥同盟，却迟迟不参加战争，在讨价还价中，争取到有利地位才从同盟一方转向英、法、俄的协约一方。而英国则从其对待欧洲大陆的传统政策出发，平衡法、俄与德、奥的力量，只是当德国的海上力量将威胁到英国海军权威时才逐步转向法、俄，与其站在一起。

日本一战前，在亚洲是与英国相联系，当战争爆发后，即参加英、法一方，对德宣战，既抢了德国在华利益以增强其对中国的控制与影响，又强占了德国在西太平洋上的诸岛，使日本在西太平洋上地位大为提高，日本从此也成为海上军事大国。这就增加其与英、美在西太平洋的矛盾。美国虽然位于美洲，与欧、亚两洲都有大洋相隔，但其文化与传统方面亦多与英国有密切联系，在多方面亦多倾向英国。当其看到英、法难以取胜，而德国实施的潜艇政策又引起美国舆论躁动之时，遂出兵参战。其在英、法取胜与结束战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二次大战情况与一次大战相比，虽然在欧洲战场上亦是德、意位于中间，取代了当时德、奥地位，而东、西战场上，东面苏联取代了帝俄，英、美取代了英、法，仍是对德、意实行夹击之势。但是，更多是其不同点。首先，二战是分成欧洲与亚洲两大战场，而不是一个战场。而欧洲战场又有东、南、西三个战场。在亚洲战场，则又有陆上战场与海上战场。因此，其情况较为复杂。其次，不论是欧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都是几种力量参与其间，不单纯只是两方。在欧洲有英、法、德、意与苏联，可以说是三种力量在进行角逐，只是到德、苏战争爆发后才形成与法西斯相对立的反法西斯阵线，由三种力量变为两种力量。在亚洲，亦是中国、苏联、英、美与日本的矛盾，前三种力量只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才形成直接联系。而欧、亚两个战场至此也才相互联系起来。第三，上述的各种力量的对立协调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一战那样阵线分明，而是随着矛盾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二战中，由于涉及的地域辽阔，而且又出现了欧、亚两个战场，德、意、日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分别在欧、亚两洲，所以两面作战情况相当突出。虽然两国作战涉及国家较多，情况也各不相同。德、意与日本，由于是处于东、西两面战线的作战，被夹击的特点相当明显。而英、美则处欧、亚两洲分兵作战形势十分突出，相比之下，美国的此特点最明显。苏联则处于法西斯轴心国两面受敌状态，虽未同时作战，但需两面应付。所以，在这场战争中，各国则往往因策略的失当而导致失败。因此，对每个国家来说，在其参战前

后及参战过程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及采取的对策成为成败的重要关键。

（三）各主要参战国地缘政治特点及所采取的策略

1. 德国：作为二战的欧洲策源地的德国，其位置居于中欧，西边有法国，东边有波兰、捷克等，而这些国家的后面是苏联。可以说，德国仍然是介于法、苏之间。从一战的经验来看，两面为敌，两面作战是德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则是德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法国从普法战争以来是德国的宿敌，两国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对付法国已非易事，而法国后面还有英国。法国与英国在欧洲大陆政策上虽有矛盾，但是，当德国力量强大，而法国显得处于劣势时，英国就站在法国一边。德国要想在欧洲称霸时，首先就要击败法国，所以，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就必需考虑如何对付英、法的联合。还有，英、法是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既得利益者。殖民地多在世界上有相当影响，所以，英、法既是德国称霸不可调和的对立力量，也是其称雄世界，重新瓜分世界所必须战胜的力量。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德国采取的策略有二：第一，在欧洲大陆寻找盟国，既可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又可以分散英、法的力量。一战时，德的盟国是奥匈。而此时，奥匈已分裂为许多小国。说德语的日耳曼人的奥地利已成为一个小国，作用与地位已非昔比。虽然后来为德国吞并，但对德国力量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意大利由于法西斯势力崛起，与英、法矛盾加剧，遂使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利害一致而结盟。由于意大利位于地中海的中部，对英、法的侧翼产生严重威胁，影响英国与远东联系的交通线及英、法在北非的利益。

第二，如何避免苏与英、法联合，迫使德国应付两面作战的局面。苏联经过革命，特别是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国内的工农业的发展使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军事装备，武装力量已相当强大，特别是国土面积大，环境特殊，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力量，已不是一战时的经济落后国沙俄。一战后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行的是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公有制。特别是在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严重困难，工人大量失业，生产急剧下降，而苏联却情况相反，生产飞速发展。这就更增加资本主义的大国对苏的偏见、歧视与嫉恨，于是世界上出现反共的逆流。

德、意法西斯对国内民主与工人阶级的镇压，对外的反共叫嚣既是其内、外政策的反映，又是其转移西方国家视线，实现其侵略野心的借口。德、意不但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而且还把日本拉了进来。尽管法国想与苏联联合抑制德国，但在英国绥靖政策影响下，法国只好倾向英国，背离与苏联的联合，妄图以绥靖政策把法西斯侵略势力东引。德国的反共政策既达到了离间英、法与苏联结盟，避免被夹击的危险，同时把日本拉在一起，又造成了对苏联夹击的形势，使其对付东面的苏联增加了牵制的力量。

虽然德国联合了意日、离间了法苏、影响了英国、牵制了苏联，但其在发动战争的序列上则颇费心机。英法与苏联都是其打倒对象。从军事方面考虑，如先进攻苏联，则难以取胜，在相持中不仅消耗双方力量，而且会使英、法坐收渔人之利，正中英、法之计。如果先进攻英、法则有可能促进英、法与苏联联合，反而使自己落入东西两面被夹击的局面。为此，德国采取声东击西策略避免上述两难境地，即造成东进之势，使苏感到形势危急。在此局势下，德与苏达到妥协，稳住苏联，不使其参战，使其枪口向西，以击溃英、

法。

执行这一策略德国首先袭击英、法，击败法国，但限于海军力量不足，只好与英国隔海相望。当德国以其占领大片欧洲领土之势又转向苏联。在进攻苏联前夕，又派其核心成员赫斯只身去英国，谋求与英国妥协，以利在进攻苏联时，仍只在一个方向作战。但是，这次希特勒德国的美梦破灭了，即未能与英妥协，反而使英与苏站在一起，并且后来又有美国等参加，仍然逃不脱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及蹈两面作战旧辙。另外，对苏联的估计过低，以为6月下旬发动进攻，到入冬前结束战争，不管届时情况如何，苏联军事已被击溃，无力再战；不管英国是否能与德国妥协，则德国称霸之势已定，英国只是海上孤岛危在旦夕，德国称雄世界之时在望。然而，主观估计大错特错，先被阻于莫斯科城下，继又败于斯大林格勒，大部分兵力损失于东线。意大利的投降，第二战场的开辟，使法西斯德国在这种地缘政治形势下，非失败莫属。

2. 英国：英国是世界殖民地最多的帝国，长期是世界第一海上强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居于首位。虽然在一战中力量有所衰落，但是仍然在世界上居于重要地位。在欧洲，位于大陆之外的岛上，对欧洲事务向来是采取平衡政策，既反对任何一个国家充当霸主，又要保持自己的居于左右形势的有利地位，不容任何力量向其挑战。

一战后，由于德、奥的战败，帝俄的革命，英、法是战胜国，所以在欧洲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在战时，英、法是联合作战的盟友，但战后，对于法国势力的增长，采取对德扶持的政策，以削弱法国的影响。当德国的势力上升，又采取绥靖政策，牺牲小国利益，满足德国要求，把祸水东引。

当德国吞并奥地利，攫取苏台德，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向波兰进攻，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战争已迫在眉睫之时，作为与波兰订有盟约的英国，对苏提出的互助条约仍然三心二意，虽然表面上谈判，实则进行拖延。另一方面，英国又在背后与德国秘密谈判，搞两面政策。当德发动对波战争后，英、法被迫向德宣战，可是却眼看着德国侵占波兰，则在西线按兵不动。

这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仍然对和平存有幻想，另一方面也是在绥靖政策的影响下，英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军力未充分动员起来，百姓思想也无准备，甚至存在恐惧心理。虽然那时，英国利用其海外势力对德国实行经济封锁，但收效不大。当德国作好准备，于1940年5月10日向西线展开进攻时，张伯伦因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而下台，丘吉尔上台才下定英国坚决抗击德国之决心。

丘吉尔上台，正是德迅速在西线取得胜利之时，英、法陆军的失败，敦刻尔克的撤退，德军占领法国，使英军退回本土。德国动用空军对英国轰炸，海上潜艇袭击来打击英国，虽然英国利用自己的空军和海军顶住了德军攻势，但孤军奋战，困难重重。随着形势的发展，英国既须在本土抵抗德军攻势，又面临有北非战场及远东的战场，使原来兵力不足的英国更感困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争取美国的支持，二是改善与苏联关系，以图增强自己的力量与牵制德国的力量。

美国当时由于孤立主义的“中立法”的影响，对英国的支持受到限制。1941年3月“租借法”的通过才使英国获得大批援助。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进攻，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才使英国与苏、美等国组成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

由于英国的力量的不足，在远东海上对日本侵略的抵抗已全部由美国承担。在北非及后来在西欧开辟的第二战场，都是英、美联合对付意大利与德国，而美军在数量上则超过英国，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英、苏、美共同打击德、意的战争中，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彼此矛盾的焦点。在德国发动对苏的进攻后。虽然三国联合反对德国，但在当时，绝大部分的德军力量则放在苏联一方，基辅失守，列宁格勒被围，莫斯科已兵临城下，形势相当危急。虽然苏联顶住了德国的进攻，但压力则十分巨大。为减轻自身压力，苏联要求美、英于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在 1942 年上半年，英、美曾考虑下半年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丘吉尔的消极态度并未实现。到 1943 年 8 月只是在意大利登陆。直到 1944 年 6 月，当苏军已把德军逐出自己国土，并进入东欧其他国家，法西斯德国力量已大为削弱，败势已难扭转之际，始在法国西部登陆。这其中，虽然有英军与美军分别被北非与太平洋战场所牵制及物质条件的不足有关，但也反映了丘吉尔考虑如何减少自己力量的损失，保住自己在北非、中东与巴尔干的利益，以及担心战后一个强大的苏联出现，将给英国带来的威胁。

3. 苏联：苏联是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地跨欧亚两洲，东西相距 8000 千米。在战略上，其优势是由于地广，回旋余地大，气候寒冷，其他国家军队实难适应。这点在拿破仑征俄失败中表现十分明显。但是，其不足在于东、西相距过远，难以互动及时支援，往往顾此失彼，这点在日、俄战争中已有明证。

在沙俄时代，俄国有一定实力，它人口多，军队多；同时，它又是个弱国，军队装备差，训练不足。苏联经过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在社会组织方面都有很大变化，不能不使西方对它重新予以评价。

苏联在战胜西方国家经济封锁、政治孤立重新进入国际舞台之后，又处在德、意、日反共浪潮和战争威胁日益明显情况下，苏联则面临着被东、西夹击与被首先进攻的危险。苏联采取的对策是对内加紧战备，对外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避免两面作战的威胁。

对内，首先是加速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发展，以增强军事装备。其次是将工业基地向乌拉尔和其以东比较安全、难以受到攻击的地区转移。第三是进行肃反、清理内部，避免遭受颠覆之害。这些工作虽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肃反扩大化伤害了自身的力量，军事干部的损失影响了战争初期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对外，苏联尽量设法与法、英等签订互助条约，求得以集团力量制止德、意的侵略，防止战争的爆发，特别是防止自身作为西方绥靖政策的牺牲品。但是由于法国欣赏英国的绥靖政策，排斥苏联，牺牲小国，满足德国扩张的“慕尼黑”活动，从而使法苏、捷苏互助条约作废。在 1939 年，当战争一触即发之时，苏仍提出与英、法缔结三国同盟。当时形势对苏联相当紧张。在东边，日本再度试探苏联的虚实，于 1938 年七八月挑起张鼓峰事件之后，又在 1939 年 5 月—8 月挑起诺门坎事件。在西边，德国正在准备入侵波兰。在东、西两面吃紧之时，与英、法谈判结盟事又告失败，遂接受德国提出的，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可以避免德国的进攻，不受英法绥靖政策之害；同时，在东方，亦制止日本扩大边境事件的阴谋。这样，既达到苏联推迟自身被迫作战的时间，又解除被东、西夹击的危险。结果，使战争首先从英、法开始。

在德、苏战争爆发前，苏除继续加强其战备工作外，还采取把边界向西推移的“东方战线”政策。尽管苏联边界向西有较大推进，但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所起作用不大，既有损于苏联的形象，又影响一些邻国后来加入法西斯轴心，反而与苏为敌。

在 1941 年 4 月 13 日，即在德、苏战争爆发前两个多月，苏联又和日本签订两国中立条约。这样，对苏来说，可以稳住东部防线，加强西部防线；对日本来说，在其南进对英、美作战时，减轻了来自苏联压力。但是，双方亦都明白，这只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与妥协，情况很容易变化，所以，彼此仍然均部署重兵防变。不过，这种脆弱的平衡局面的维持，对苏后来的对德战争的胜利起着重要作用。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苏战争爆发，苏虽作了不少准备工作，但对战争的突发性则准备不足，比较注意进攻，忽视防御，使自己遭到重大损失，给德国迅速推进提供了条件。虽然 1941 年下半年在战争中，兵员、物资、国土都受到重大损失，但终于击溃德军于莫斯科城下，粉碎德军半年击败苏联的企图，使二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过 1942 年 7 月到 1943 年 2 月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德国的侵略势力开始走下坡路。从此，德军在苏军打击下，节节败退。1944 年 6 月，第二战场的开辟，东西夹击德军之势遂成。约一年后，德国法西斯彻底失败，希特勒自杀，以无条件投降告终。

在东线，日本经过两次边境挑衅事件并未获得好处。另一方面随着日、美矛盾的发展，日本估计苏、德战争德会很快取胜情况下，确定了“南进”为主的策略，为避免苏联的牵制，遂达成苏日中立的协议。在 1945 年 2 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上，为加速日本投降及减少美军损失，确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出兵对日作战。为此，苏于 8 月 8 日向日宣战。日本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

4. 日本：日本是亚洲一个岛国，也是一个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由于日本在 1927 年的田中奏折中就明确提出，要称霸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要从满蒙开始的战略。为此，日本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公开出兵侵占我国的东北。接着，又侵占我国的热河、察哈尔、内蒙古以及河北省的长城以南地区。1937 年 7 月 7 日发动卢沟桥事件，终于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日本原以为，给中国以打击，击溃其主力以后中国就像过去那样屈服、妥协。但是，这次却决心抵抗，结果使日本陆军的相当部分兵力陷于中国战场。

这时，在中国的抗战的背后还有苏联及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因此，日本要解决对中国的战争也需要与世界形势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与德、意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后，又与德、意组成三国军事同盟以增强其对华战争的影响，对支援中国的国家施加压力。

德、意法西斯国家在欧洲准备发动侵略战争之时，日本于 1938 年与 1939 年两次挑起对苏边境事件，特别是后一次（1939 年 5 月 11 日—8 月 31 日）在苏蒙边界的诺门坎事件，日军集结了好几万人的部队（最后伤亡共 5 万人）并配有大量火炮、坦克和飞机，可以说是相当规模的战斗。这既是测试苏军的力量，也是与欧洲形势相配合。正当战斗激烈之时，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虽然，这次冲突于 8 月 31 日结束，但日本以停止与德国关于缔结军事同盟谈判表示不满与抗议。

后来，当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后，日本即站在德、意一边，与英、美相对峙，特别是在亚洲，日本则担起与美国冲突的担子。同时，也表

示在“北进”与“南进”的战略选择上倾向于“南进”。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内部南进与北进两派意见又争论起来。其结果认为，苏、德战争解除了北方的牵制，是南进的好机会，应加速南进，但如果苏、德战局发展有利于日本时，则日本应马上向西伯利亚进军。

在选择南进的考虑上，日本认为，在维持与扩大战争上，已受到战略物资（如石油）的严重制约，这只有南进才能予以解决。在兵力上，虽陆军在华受到牵制，感到有所不足外，但海、空军力量仍有相当实力。不过，美国工业生产能力和日本大得多，一旦动员起来，就会使日本处于劣势。为此，日本采取虚假谈判以应付美国，实则抓紧准备以突然袭击方式击溃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力量，趁机占领东南亚，再以其资源击败美国。

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虽然偷袭珍珠港成功，并迅速占领东南亚，然而却激起美国击败日本决心，加上美国武器生产迅速增加，而日本在海、空军武器大量消耗难以补充情况下无法与美国对抗，陆军也因陷于中国战场而感到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失去了制空权与制海权的情况下，驻守各岛工事中的日军则一筹莫展。美国则采取跳岛战术，不是一个岛屿，一个岛屿的争夺。从而缩短了时间，减少了损失，加速向日本本土的逼进。

到1945年8月8日苏对日宣战，进军中国东北，加上8月6日和9日受两颗美国原子弹的轰炸，日本终于面临山穷水尽地步，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从1937年卢沟桥事件开始的亚洲战场，经过8年战争就此结束。

5. 美国：美国位于北美洲，与欧洲、亚洲之间相隔有大西洋与太平洋。其传统的外交政策，大体针对不同情况而采取三种不同的政策。对美洲，为防止欧洲国家的干预、维持其势力范围，采取“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政策。对亚洲的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以便在各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对欧洲，则实行孤立主义，目的在于避免欧洲事务的各种矛盾的干扰以免影响其自身的发展。

在一战中，美国于1914年8月3日就发表“中立声明”，称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都保持中立。只是到1917年2月才参加战争。虽然后来美国威尔逊总统参加了凡尔赛和会并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可是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该和约，也拒绝批准参加威尔逊总统首创的国际联盟。

二战开始后，美国却受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影响，于9月5日宣布中立。但是，希特勒德国的闪电战的实施，波兰与法国的迅速垮台，英国的形势危急迫使美国难以继续实行中立，遂于1941年3月11日经参、众两院通过“租借法”。根据租借法，美国可以向反对法西斯侵略而进行战争的国家提供战略物资。正是依据租借法，英国、苏联和中国都得到美国的战略物资的援助，对战胜法西斯的侵略起着重要作用。这也标志了美国在放弃中立的孤立主义方面向前跨了一大步。

1941年12月美国分别向日、德、意宣战。面对欧、亚的两个战场，美国采取的是先欧后亚的战略。因为日与德相比，德国的重要性要大于日本。而且传统上，美国与英国关系密切，而英国当时的形势相当虚弱，所以对英国的支持变得十分迫切。这就使美国把重点放在欧洲。但是，在亚洲，主要是在东南亚与西太平洋，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后，进展十分迅速，甚至澳大利亚亦出现危机。特别是美国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行为的气愤，要求美国尽快对日本实行反击，美国不得不从1942年只用15%兵力对付日本，提高

到 1943 年的 30%。

在欧洲，支援苏联战略物资及开辟第二战场减轻德军对苏的压力是重要任务。对英国则是在北非支持英军向德军反击。由于力量的限制及丘吉尔的阻止，美国原拟于 1942 年开辟的第二战场不得不推迟，而于年底则在北非西部登陆，与英军配合歼灭德、意在北非的军队。

1943 年春，苏联在斯大林格勒获胜，使形势开始对德不利，到 5 月，美、英已把德、意军完全赶出非洲，即将在意大利本土登陆，表明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下半年虽然美、英军登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逼降意大利，但并未把德军赶出意大利。由于第二战场的迟迟未能开辟，加上意大利战场对减轻苏联战场的压力作用不大，德军绝大部分力量仍施加于苏联。但是，苏联经过两年多的战斗，靠自己力量已把相当多的失地收复。

在 1944 年，对美国来说，最大的进展就是实现了第二战场的开辟，真正在东、西两个战场上对德国进行夹击。这导致德国的加速垮台，于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德国就宣布投降。

在亚洲战场上，随着美国参战后的军事动员，兵力增强，武器生产迅速增加，不仅在舰艇和飞机数量上平衡了日军原有的优势，而且还转为上风。在战场上，于 1942 年经过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和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不仅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势头，保证了美、澳之间的交通，消灭了日军的大量的海、空军力量，使其开始走下坡路。在 1943 年，先是日军被迫从瓜岛撤退，以后是美军对新乔治亚群岛、布根维尔岛及吉尔伯特群岛等地的登陆，标志美军的战略已由阻止转入反攻，日军海、空力量逐渐削弱，而美军的海空势力逐步上升。但 1943 年美国的反攻战打得比较艰苦，为了分散日军兵力及利用中国基地对日本的轰炸以增加对日本的压力，遂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

1944 年在西太平洋对日本的打击是美军在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对菲律宾的登陆。由于马里亚纳群岛与菲律宾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十分重要，迫使日本不得不在关岛以西、菲律宾东南海域进行两次大海战，使日所剩不多的海上力量耗尽，完全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另外，由于美军海、空力量的优势，在攻击各岛时，可以随意各个击破，而其余岛屿虽有坚固防御工事与驻军，亦难相互支援，甚至美军对一些失去海、空军支援又无大影响的岛屿，弃之不顾。这种情况，不仅在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中有意不夺取一些岛屿，甚至整个加罗林群岛也不夺取。美军实行这种越岛战术大大加快了在西太平洋作战的进程。马里亚纳群岛的攻占，使美国海、空军力量直接进攻日本本土有了可能性。

虽然美军在太平洋上进展较原设想快，但在争夺岛屿中仍付出了相当大代价，特别是人员的伤亡，这在冲绳岛的登陆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此次登陆中，美军伤亡 7.5 万多人。而在开辟世界著名的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战中，规模比冲绳大得多，只伤亡 12.2 万人。因此，为了在日本本土的登陆战中能减少损失，遂在雅尔达会议中提出要苏军在欧洲战场战争结束后二个至三个月内对日作战。

在 1945 年 7 月 16 日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遂使美考虑使用原子弹。因为原子弹爆炸威力大，可以迫使日本早日投降，并减少美军损失与降低苏军参战的影响。8 月 6 日与 9 日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这时日本已感到走投无路，本土受到严重打击情况下，于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

对美国来说，首先是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大洋之隔，战争不在本土上进行，避免过早卷入。其次是国土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工业生产强大，技术水平高。这对美国在二战中成为盟国军用物资与装备的供应基地及战胜德、意、日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在协调英、苏之间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

（四）各国策略的比较

德、意、日和美、英、苏、法、中共八个国家，其分属于法西斯轴心国和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在轴心国的地理分布来说，德、意位于欧洲中部，介于英、法与苏联之间，而日本在远东的边缘，西边是苏联与中国，东面的海上是美国；美国与欧、亚两洲之间则隔着大西洋和太平洋。因此，从地理空间来说，苏联与中国是处于德、意与日本法西斯之间。不过，中国西部疆界远离欧洲，并未受德、意包围。而苏联由于地跨欧、亚两洲，被包围的形势十分明显。从更大范围说，由于德、意的西边是英、法，而大陆的西边是大西洋与美国，南是地中海，德、意则是处于苏联与英、法、美的包围之中，尽管德国打败了法国，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其被包围的形势。日本西受苏联与中国在陆上的牵制，在海上受到美、英的包围。所以说这又是同盟对轴心国的包围。相比来说，英、法、美没有被包围的危险。但各国情况又有不同。法国是欧陆国家，在陆军失败以后即无回旋余地。英国虽是岛国，面积不大，但有海峡相隔，海军强大足以阻挡德军渡海，又有大片海外自治领相帮，足以长时维持而不败。而美国则国土大，有大洋保护可以免受攻击，而且经济基础好，足以迅速装备自己，又能支援盟国，只是两个战场作战，力量受到牵制。

从被包围来说，形势严峻的是德国与苏联，其次是日本。德国位于两个陆上强国法、苏之间，国家空间小，集中兵力于一边较为容易。所以，德国为避免遭受一战那种东、西两面夹击，采取策略是在一个时段内，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在集中一个方向作战取得胜利后，再调转方向，向另一个方向进攻。由于这种战略运用得当，才使其取得早期的胜利。其后期的失败，正是未处理好东、西关系，未能避免两面作战而失败。德国在一战时，是败于西部战线，而二战则败于东部战线的苏联之手。在进攻苏联前其未能在策略上解决好英国问题，固然有其策略上的原因，但是地缘条件也是原因之一。因为英国有强大海军，德国没有，所以英国有继续对抗的可能，而且又有美国存在，更难以使英国屈服或妥协。德国是陆上强国其被击败也需陆上的强国，这就落在苏联肩上。在德、苏开战后，苏联抗击的德军始终在70%左右。

苏联地跨欧亚，东西距离长，西边有德国，东面有日本。苏联的经济、人口、政治中心都在西边，故西边战争的成败对苏联来说是关键。但是，东边如果同时出现战争一方面要分散苏联兵力，影响西边战斗力；如果侵略势力进入中西伯利亚，就会危及苏联后方。特别是东、西两边同时向苏联发动进攻的话，就会造成相当危急情况。苏联考虑西边战争难以避免情况下，要使东边的日本不敢轻易下手。所以，苏联在1938、1939年日本两次挑起边境事件时，狠狠予以还击，让日本吃到苦头。不在日本感到对自己确有胜利把握时，不敢轻易进攻苏联。因此，当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本认为，只有当苏联失败成为定局时才出兵，故未能配合德军进攻苏联，反而利用苏联受牵制时机去实现南进。正是苏联当时对战争作了准备，加上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使德军未敢首先向苏联开刀，又使日军未能与德军一起实行夹击，因而使苏联与德暂时妥协，与日本保持中立得以成功。

日本是个岛国，虽有强大的军力，但国土小，人力物力都很有限。其西边陆上有中国与苏联，当时中国是个弱国，而苏联强大，所以日本首先侵略中国。企图能迅速取胜，以中国的人力物力作为其下一步侵略战争的基地。但是，中国的坚决抗战及采取全民战争，却使日本深陷泥沼而不能自拔。加上远东苏军牵制的日本关东军，使日本剩下可调动与利用的陆军不多，但是，日本还有全部的海军与大部分空军可以利用。在东边与南边的海域，日本受到美国与英国压力。当英国由于欧洲战争，留在东方的力量已微不足道时，对手只剩下美国。日本虽然受到中、苏与美国海陆方面的包围，但中国力量弱只能拖住日本，而无法给日本以致命打击。苏联又因德、苏战争与日本保持中立，所以日本回旋余地优于德国和苏联。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日本与美国矛盾日趋尖锐，日本也深感物资不足，于是采取南进政策。企图利用美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日本还有相当强的海、空军实力，对美国进行突然进攻，以便击败美国。

在德、日更外面的美、英，特别是美国一方面利用苏联抗击着德军，中国拖住日军，一方面在外围对德、日进行包围，依靠其在外围比较自由，既不受物质等条件限制，又可充分利用强大的、不受空袭干扰的工业生产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组织强大的陆、海、空军，逐步缩小包围圈。加强对德、日的打击。最后，不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是在两面作战不利情况下遭到失败，而苏联虽在包围之中，但并未受到两面来的进攻，反而成为击败德军的主力。中国虽然弱，但利用国土面积大，人口多，回旋余地大，兵源充分，顶住了日本的进攻，坚持了比其他国家时间更长的战争，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这些都与所处的地缘政治条件有关。二战结束了，德、意、日失败了，英、法衰落了，中国在发展，在击败德、日中起着主导作用的苏、美强大了起来。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了。美国已彻底摆脱孤立主义，组织与领导西方世界。这种地缘政治现象也是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主要特点。

第十章 当代世界的政治格局与前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经 50 年，50 年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恰恰代表其时代标志的政治格局的完整变化过程，即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或两大集团、两个体系的形成、发展、分化与瓦解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而发展的长期存在的殖民体系彻底垮台，在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地人民获得解放，建立自己的国家，走向世界政治舞台。在经济方面，工业化已从西方发达国家向广大亚、非、拉地区转移，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很大进展。联合国的建立，世界性、地区性与跨国组织建立，经济与文化的交往，旅游事业的发展，都使世界各国及人民彼此交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达到空前规模。还有五年就要走完 20 世纪的历程，进入 21 世纪，其前景如何呢？这是很多人，特别是政治地理学家十分关心的问题。本章作为本书的最后一章，将阐述 50 年来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与特点，并探索未来的前景。

一、两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一）美、苏由合作走向对峙

二战前，居于西方国家首位的英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对苏是思想上对立，政治上实际也是对立的，只是策略上设法使鹬蚌相争，以坐收渔人之利。在战争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军队首先进攻的是英、法，法国的迅速战败，英国的形势危急，才转变其对苏态度。到德、苏战争爆发，英国才与苏联结盟。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与苏、英组成反法西斯的同盟。这是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利害关系而结成的联盟。其实在战争还未结束，苏军打击德军超出自己的国境进入东欧其他国家时就已开始出现分歧。如波兰，既有战时退到英国伦敦的流亡政府，它是反共的，得到英国支持，又有在苏军占领下曾与德军斗争过的地下组织组成的临时政府，得到苏联的支持。双方对此分歧一时难以解决。实际这也是整个战后东欧问题的一个反映。

战后与战前相比，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在欧洲，德、意失败了，法国也极端衰落，英国形势上仍保持一个大国地位，是个战胜国，但是本土经历了战争经济严重困难，其所依靠的自治领与殖民地，不是离心倾向加重，就是独立要求增强，大英帝国有分崩离析之危。苏军占领了境外的东欧与部分德国，控制了欧洲半壁天下。另外，大部分欧洲经济困难、失业、饥饿现象严重。因此，英国在欧洲地位急剧下降，美国遂取而代之，与苏抗衡。在亚洲，日本失败，英、法、荷受殖民地独立运动影响，地位已今非昔比。中国则内部矛盾重重，苏联虽进军中国东北、北部朝鲜，但受美军限制，影响有限。美国有独享战争胜利之势。

从总的看，苏联虽在欧、亚都取得胜利，但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损失都相当大，国内困难亦相当大。因此，苏联战后所考虑的，一是如何使德、日法西斯势力彻底消灭，不再死灰复燃。在自己的周围，特别是在其西部边界之外形成自己势力范围的安全地带。在国内则急待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所以要求获得德、日的战争赔款以及美国的支援与帮助。在其他地区则采取妥协，避免较大冲突，采取稳中守势。对美国来说，不仅取得战争胜利，又取得世界领先的地位，在经济方面不但未受影响反而飞速发展，在世界上取得绝对优势，加上手中的原子弹，其一方面利用联合国来制止与削弱苏联影响，另一方面又采取壮大经济与军事势力，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特别是利用苏联在东欧情况大做文章，制造反苏气氛，其中突出的是凯南的

报告与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

凯南是美国驻苏的代办，1946年2月22日向美国国务院发出长长的电报。其内容称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对此的对策，凯南提出：“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逻辑十分敏感”，所以，美国应“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这就是美国后来所采取的对苏的“遏制”政策的依据。

在形势转变之时，1946年3月5日，丘吉尔经过策划在杜鲁门陪同下，在美国的富尔敦（密苏里州）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他说苏联已“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纵穿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要及早考虑“永久制止战争”，英、美两国应“建立特殊关系”共同对付苏联。

上述一个报告，一个演说，对美国1946年9月24日提出的“美国与苏联关系”报告起着重要作用。该报告提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对苏联之危及美国安全生命攸关的地区的一切活动，应作好准备，以便进行有力和有效的抵御”。其目的在于借机扩大其势力范围，制造舆论以便对苏采取包围。由此，便开始形成两个集团的对峙。

（二）美国集团

1. 在西欧：西欧是美国集团的重点。那里除少数地区外，都受到战火的直接洗礼。战争结束后是一片创伤，加上1946年气候严寒、暴风雪、洪水泛滥、农业欠收，燃料缺乏。英国1947年煤配额削减一半，法国居民口粮每天只有六两，真是饥寒交迫，十分困难，引发社会极度动荡。如不解决经济问题，则会引发一场资产阶级感到可怕的革命。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提出欧洲“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的恶化”，“目的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并称：“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这个“复兴欧洲”计划被称之为“马歇尔计划”。

原来英、法、苏三国外长讨论马歇尔计划时，苏联准备参加此计划。当苏联了解该计划将导致某些国家实行干涉另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时，遂退出该计划。后来，欧洲除苏联、东欧各国与芬兰未参加外，其他国家均参加该计划。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美国共拨款131.5亿美元，对欧洲的复兴起了关键作用。到1950年，欧洲各国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水平。

在西欧实现“马歇尔计划”的同时，英、美等国亦考虑西欧在组织上的联合问题。首先，英国在美国授意下，于1947年3月与法国签订同盟互助条约。接着英国又出面活动，联合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准备成立西欧联盟。经过谈判，并在美国敦促下，于1948年3月17日五国在布鲁塞尔签订了为期50年的多边军事政治条约，名为防止“德国侵略政策复活”，实为对付“苏联的威胁”。

虽然五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但认为，只有美国参加才能有效解决西欧国家抵御侵略问题。另一方面，美国亦想借机扩大该组织以便控制西欧。这样，于1949年4月4日建立有美、加、英、法、荷、比、卢、丹、挪、冰、葡、意12国参加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战略概念就是美国出原子弹和战略

空军作为“剑”，西欧出地面部队作为“盾”以抵御进攻。由于德国的地理位置与实力不可忽视，同时亦需利用其来加强西欧防务。英、美遂于 1954 年 10 月 23 日把西德拉入布鲁塞尔条约，并取得北大西洋组织成员资格。同日改组布鲁塞尔条约约为西欧联盟。在联盟中，英、法、意与西德结成军事同盟，使西德得以重新武装，结果终于形成一个以美国为盟主，以西德为支柱的西方政治军事集团。

2. 在日本：日本投降后，美国单独对日本实行占领，不容其他盟国插手。其把对日本占领基本目的说成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并把日本政府当成“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而负责的政府”。虽然在美国占领下，对日本的战争罪犯及法西斯势力进行了审判与整肃，但是很不彻底，致使不少罪犯逃脱法律制裁，许多势力未受到应有整肃。

美国为其单独占领日本及控制日本局面的合法化与长期化，于 1947 年 7 月 11 日向中、苏、法等 10 国发出照会，建议召开准备对日和约会议。为了能控制准备会议，美国提出和约由对日参战国共同起草，不应由中、苏、美、英四国负责，表决亦取消四国一致原则，改为 2/3 多数票通过。由于苏联反对美国破坏早已达成的协议，主张四国外长会议准备和约草案及实行四国一致表决原则，因未达成协议，和约工作搁浅。

但此后不久，中国的解放战争形势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政权垮台之势已十分明显。美国考虑到即将出现的东亚形势，决定改变对日政策，企图扶植日本作为其争霸亚洲的工具与基地。接着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遂加快对日和约的工作。1951 年 9 月 4 日至 8 日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会议把对日抗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并把对日作战作出极大贡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斥在外遭到我国政府强烈反对。会上，苏联反对美国一国起草的和约，提出另一方案遭拒绝，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签订单独对日和约的同一天，美、日两国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军无限期、无限制地驻扎日本，允许美国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这样就把日本拉入美国的集团，成为反对苏联、反对中国的基地。

3. 在亚太其他地区：美国在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美日安全条约的同时，又积极在亚太其他地区建立各种条约与组织。1950 年 10 月，美国与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 年 8 月，同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同年 9 月，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美澳新安全条约》。在 1953 年 10 月和 1954 年 12 月先后同南朝鲜的李承晚，我国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分别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加上美国的《美日安全条约》已实际形成“东北亚的防御联盟”。

1954 年 9 月 8 日，美、英、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 8 国在马尼拉开开会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该条约的议定书还把柬埔寨、老挝、南越划入其“保护范围之内”。

在西亚，在美国策划下，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 1955 年 11 月组成巴格达条约组织。这样，美国就从西欧、北美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始，有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实际上的东北亚的防御联盟组织一个弧形圈把苏联集团包围起来，实现其“遏制”政策。这实际上亦反映了斯皮克曼的“陆缘学说”的现实。

（三）苏联集团

1. 在东欧：东欧位于德、苏之间，这里民族复杂，相互杂居，加上宗教问题，矛盾比较多，往往成为大国角逐与利用场所。苏联在战争后期，追击德军进入了该地区。由于苏联认为该地区对其安全十分重要，应属于其势力范围，积极支持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建立亲苏政权。不过，东欧情况不同政权建立途径亦有差异。第一类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建立的。第二类是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它们既靠本国革命力量，又得到苏军支持建立政权。第三类是东德，它是在苏军管制下，组织革命力量建立政权的。

在各国建立政权初期，往往是联合各方力量组成联合政府。随着美、苏矛盾的发展，一些政府内部也出现对立的派别，矛盾也逐渐尖锐，特别是在肃清法西斯势力和民主改革方面（如工业、交通、金融方面的国有化和土地上的改革）表现十分明显。在苏联支持下，各国把敌对势力与西方的影响清除出去，加强了各国的民主政权与共产党的影响。

美国在西欧实行“马歇尔计划”与鼓动英、法签订同盟互助条约及准备成立西欧联盟之时，苏联也设法稳定东欧并将其组织起来，以对抗美国在西欧组织反苏的集团的活动。1947年夏，苏共要求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出面，召开欧洲一些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讨论加强彼此之间联系问题。同年9月22日至27日在波兰召开了会议。会上对成立情报局的性质和作用的问题产生争论。波、南、捷代表反对建立国际中心，苏联对此作了让步，最后确定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经验交流，必要时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配合各国党的活动。

在苏联及东欧各国退出马歇尔计划后，为解决各国的经济困难，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苏联与东欧各国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经济贸易协定。这样，原来与西方的贸易东欧国家转向东欧与苏联各国之间进行，形成与马歇尔计划相对抗的所谓“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1月，苏、保、匈、波、捷、罗六国为加强彼此间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后来，阿尔巴尼亚、东德、蒙古、古巴、越南相继加入该委员会。该会宗旨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经济经验，互相进行技术援助，在原料、粮食、机器、装备等方面彼此协助，实行广泛的经济合作。

另外，在针对西方成立北大西洋公约及英、法、意与西德结成军事同盟，公开武装西德，威胁苏联集团安全情况下，苏联与东欧七国于1954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会议。会议宣布，如果批准英、法、意与西德结成军事同盟的伦敦-巴黎协定，苏联和东欧国家将用“联合起来的力量来对抗”，将“在组织武装力量和司令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1955年5月5日，伦敦-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苏联与东欧七国于5月14日在华沙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并成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欧洲，美国集团与苏联集团各自成立自己的组织，形成自己的同盟，彼此泾渭分明，相互对立。

2. 在东亚：在东亚，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有蒙古、朝鲜、越南与中国。

蒙古在历史上称“外蒙古”，属中国一部分。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成立的蒙古人民党领导革命，于1921年3月宣布蒙古独立。1945年10月根据雅尔塔协定及国民党与苏联所订条约，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的1月5日承认外蒙古独立。蒙古于1946年2月27日同

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并于1962年6月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

越南在二战前为法国殖民地，二战时被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后，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八月革命，于1945年9月2日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来，又与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八年抗战，打败了法国，于1954年7月22日签订日内瓦协议，承认越南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共和国于1975年4月解放了南方的西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朝鲜于1910年8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二战末苏联向日本宣战后，进兵朝鲜，解放北纬38度以北的地区。苏军于1948年底撤离朝鲜。朝鲜北部于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由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担任首相。

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牵制了大量的日本陆军，对远东与西太平洋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盟国战争起着重要作用。可是，国民党政府统率的军队，除在抗战初期对日军作了英勇抗击外，后期为保存实力，采取消极态度。这时，在敌后的广大地区，则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组织人民与日本军队和伪军展开艰难的浴血奋战，抗击着大部分日军与几乎全部伪军。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以取得其一统天下，美国亦从其战略利益出发，表面上派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两党纠纷，企图以此让共产党交出武装，换取参加政府的席位的办法帮助国民党维护其统治。这样，使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支柱，以利美国抗击苏联，称霸世界。

但是，马歇尔的调解失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原以为可以很快打败共产党。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很快扭转了局势，蒋介石遭到失败，退出大陆，逃至孤岛台湾。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各民主党派，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由于中国正式加入苏联集团，就与美国处在对立地位。原来，美国把远东的中国看作其势力范围，可是现在却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中国是个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联同上述三国组成苏联集团的东翼，而且扩大到亚洲的东岸，太平洋边，使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成为薄弱的一环。因此，从5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一直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地区。

（四）美、苏集团的冲突

战后，美、苏的矛盾发展有个过程。开始，苏联基本上是按雅尔塔协定所划定的范围行事。斯大林曾明确表示，苏联不干涉美、英势力范围的事务，美、英也不要干涉苏联在东欧的事务。例如在欧洲，苏联一般不主张处于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以免引起美、英怀疑苏联插手，搞世界革命，甚至把苏联卷进与美、英的冲突中。在苏联这种态度的影响下，希腊、法国、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相继放下武器，参加了政府。

在东方，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和对西欧的态度相似。苏联是同意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支持马歇尔调停国、共争端。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力量估计过低，不相信其有能力完成中国统一，甚至表示中国共产党应当同蒋介石相妥协，解散军队，参加政府。这就是毛泽东于1946年4月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所说：“美苏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实际上表达了与苏联的不同意见。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

说得更加明确。他指出：“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在西欧，到 1947 年以后，随着形势发展，美、苏矛盾开始全面展开，其经济、政治、军事方面斗争加剧，双方组织活动日益明显。在中国，由于中共领导解放战争在 1947 年已开始战略反攻，苏联对华政策亦发生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就承认中国。1951 年 2 月 14 日苏联又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样，美、苏两大集团就东西两条战线上发生了正面的冲突。

1. 柏林危机：柏林是原德国的首都，位于中欧的心脏地区。在二战中，为苏军攻克，在迫使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根据波茨坦会议确定，柏林分为四块，由美、苏、英、法四国军队分别予以占领。但是，在柏林以外却属于苏军占领，美、英、法三国占领区与其柏林占区只有通过商定的铁路、公路、水道与航线进行联系。

德国战败后，四国对德国的四占区，是实行各自管理的。在对德和约上，彼此存在迟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而搁浅。在实施马歇尔计划，把美、英、法三国的占区拉入西方经济势力范围，西方三占区于 1948 年 6 月 18 日起实行单方的货币改革，即规定在西方占区实行一种新马克。当然这使原来使用统一货币的苏占区，特别是四国占领的柏林中的苏占区受到影响。对于西方这种背着苏联的币制改革，正式分裂德国的重大步骤，而且影响苏占区经济的行动，苏联亦采取强烈措施予以反击。6 月 22 日，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另一种新马克。接着于 6 月 24 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美、英、法三国占领的柏林西区对外的水陆交通联系和货运，只有空中交通联系仍然保留。“柏林危机”的出现，顿使东、西方关系紧张起来，出现了第一次冷战高潮。

苏联企图通过封锁使西柏林的 250 万居民的粮食、燃料以及工业生产的原料、生活消费品顿时出现困难的办法使西方退让或妥协。但是，西方则动员了大批飞机，实行空运办法并对东柏林实行反封锁，禁止其所需物资（如电力、焦煤等）进入苏占区。从 1948 年 6 月 29 日到 1949 年 5 月 12 日，为时约一年的封锁，飞机空运物资达 211 万吨，飞行达 27 万多架次。这一次在柏林出现的冲突由于双方都未下决心扩大，所以未发展成武装冲突。经过秘密谈判，于 1949 年 5 月 5 日达成协议，双方取消交通封锁，重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有关问题。

由于柏林的危机，在 1948 年 11 月，柏林的苏占区与美、英、法占区各自成立自己的市政机构，从此统一的大柏林市就彻底分为两个城市。而德国也分裂为两个正式的国家。美、英、法三国占区于 1949 年 8 月 14 日举行联邦议院选举，9 月 20 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即西德）。苏占区于 1949 年 5 月 30 日通过宪法，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即东德）。

2. 朝鲜战争：二战末期，苏军解放了 38 线以北的朝鲜半岛，其南部则为美军占领。1948 年 8 月 15 日，南部朝鲜成立大韩民国。同年 9 月 9 日北部朝鲜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特别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美、苏两大集团在远东的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此，美国认为：“这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对中国的策略，提出可供选择的是：一是“动

员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力量，通过威胁或施加直接的压力，公开和中共政权作斗争”；二是“通过允许恢复同中国的正常经济关系”，“使美国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从以后的实际情况看，美国采取的是第一个选择。

朝鲜当时的形势，一方面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遭到重大挫折时期，另一方面，朝鲜半岛是当时美国在东北亚的亚洲大陆上唯一留下的一块前沿阵地，靠近中国的东北与苏联的远东。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除直接派兵参战外，还组织参加联合国的15国出兵。另外，派其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

朝鲜战争在开始阶段，北朝鲜军队长驱直入，把南朝鲜与美国军队压缩在半岛东南部釜山一隅。但9月15日美军等在仁川登陆，接着于10月4日越过三八线，不顾中国的屡次警告，把战火一直烧到中朝边境。中国应朝鲜请求，为支援朝鲜人民和抗击美国侵略，派志愿军于10月25日进入朝鲜北部。

从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5月21日经五次战役，朝中军队把战线推到三八线附近。经过较量，双方同意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停战谈判。经过两年之久的谈判与战斗，战场形势无大变化，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朝鲜战争虽然苏联未参加，但它是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实战与较量。在此期间，美国动员了其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整个战争期间中、朝共歼敌约百万，其中美军约40万。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是劣势装备，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

3. 越南战争：1954年5月8日到7月21日，于日内瓦召开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及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保大政权，会议达成协议。其内容主要是：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划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越南在1956年7月内举行全国自由选举，以实现其统一；不容许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干涉其内政。美国未在该协议上签字。

1955年7月20日美国支持南越保大政权总理吴庭艳破坏日内瓦协议。10月26日指使吴庭艳废黜保大，宣布成立“共和国”，自任总理，制造越南分裂。在美国经济、军事援助下，南越的反动统治激起人民武装斗争。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统一武装力量进行反美斗争。

为了消灭越南南方人民抗美力量，美国于60年代初采用所谓“特种战争”来对付当地的游击战。在1964年8月5日，美国借口北越鱼雷艇在北部湾袭击美舰，对支援南方人民斗争的北越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用的是“南打北炸”办法，“逐步升级”的战略。到1969年初，侵越美军总数已达54.4万人，但局势并无大变化，反而越陷越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加了于1968年5月13日开始进行的巴黎会谈。1969年1月又扩大为包括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政府、西贡政权在内的四方会谈。

美国的侵越战争不仅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也受到美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尼克松总统上台后，为缓和国内的不满，一面加紧和谈，一面积极推行“战争越南化”使美军部分撤出越南。直到1973年1月27日美国与越南正式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协定》规定越南全境立即就地停火，美军全部撤出越南南方，越南南方政治解决留待越南双方以后去谈判。

尽管在此以后，美国对南方西贡政权继续给以支持和援助，但无美军直接支持已难以维持。1975年3月越南军队进入南越，到4月30日解放西贡。1976年7月越南国会宣布越南实现了全国统一。从1945年开始的印支战争，历经30年才告结束。

越南战争，特别是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的包围。在越南的抗美战争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给予越南很多物资援助，甚至派出防空部队到北方参战。越南的统一是美国在亚洲战略的重大挫折。

4. 古巴导弹危机：古巴是加勒比海上一个不大的岛国。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于1959年1月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建立古巴共和国。加上其革命后采取的土地改革政策及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损害了美国大公司的利益，使得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极为紧张。为此，美国决定除医药用品和粮食外，对古巴实行严厉的禁运，禁止一切货物运往古巴，亦停止购买原来合同规定的古巴食糖。糖是古巴出口的重要商品，通过出口糖可以换取其他进口原料和日用品。禁运和停止购买食糖实际上是企图从经济上扼杀古巴。为了解决古巴所遇到的困难，苏联与古巴建立外交关系，购买古巴的糖，并提供一亿美元贷款。

美、古关系恶化，美国于1961年1月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为了制止古巴革命的影响在拉美的蔓延，美国纠集在美国的古巴流亡分子进行训练，于1961年4月17日，由1000多名古巴流亡分子组成的雇佣军，在美国支持下，在古巴南部的猪湾登陆，妄图一举推翻古巴政府。结果，登陆的古巴流亡分子却在72小时内被全歼。美国仍然继续对古巴进行军事威胁，决心要消灭古巴这个在拉丁美洲的“受共产主义控制”的政权。

随着美、古关系破裂，苏联涉足古巴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苏联的意图是在拉丁美洲，美国的旁边建立一个立足点，以便与美国角逐。于是，苏联就把装置核弹头的导弹运进古巴，以遏制美国对古巴的干涉。其意图是秘密把核导弹运进古巴，抢在美国发现及采取行动之前安装好，形成威胁力量，使美国面对既成事实，从而改变美、苏力量的对比，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并乘机迫使美国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

美国高空侦察机于1962年8月29日在古巴上空飞行，发现萨姆导弹发射场。9月4日美国发表声明，证实苏在古设置导弹。9月11日苏联政府声称：“向古巴运去的武器和装备完全为了进行防御”。10月3日苏驻美大使仍表示苏联没有把进攻性导弹放在古巴。但美国高空侦察机于10月14日拍摄的照片证实，苏联正在古巴修建进攻性导弹基地，放置核武器，并在一处发现中程导弹基地，发现至少有16枚射程超过1000海里的导弹。

经过秘密会议商讨，美国决定采取对古巴实行封锁，如不奏效，则采取空中打击。10月22日晚，美国总统肯尼迪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披露苏联正在修建的是进攻性导弹体系，而不是防御设施。针对此情况，美国采取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实行严格的海上检查。呼吁苏联在联合国监督下撤走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为了对付此紧急形势，肯尼迪命令在世界各地美军进入最高戒备状态，50%的战略轰炸机满载着核武器在空中盘旋，核潜艇进入作战状态。在加勒比海部署了强大的海、空军，形势顿然紧张，美、苏处于战争边缘。

在美国以武力作后盾的迫使下，10月26日苏联答应撤出进攻性核武器，但以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为条件。古巴政府对苏联政府未与其商量，就在美

国压力下作出撤出进攻性武器的决定表示不满。

古巴危机表明，由于苏核武器与美相比处于劣势，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企图增强自己地位，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在冲突中退了下來。这使苏联决心全速发展核武器，到 60 年代末，取得与美均势的地位。以后，苏联在核武器上还取得一定优势，使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更加激烈。

美、苏两个集团的上述多次冲突，看来，各有不同及其特殊性。柏林危机是在美、苏的主战场的前沿阵地，在地理条件上对苏有利，因为那里是在苏占区的包围圈内，对西方来说，施展的空间有限。但是，柏林是中欧的心脏，地位重要，西方在那里必须坚持下来，否则对西欧影响很大，而且背后双方都有强大的兵力支持，搞不好就会不可收拾。双方在这里实行的是封锁反封锁，更重要是意志与形象的表现，所以在冲突方面双方都有克制与限制。

第一次危机过后，在 1958 年 10 月和 1961 年 3 月柏林又出现第二次和第三次危机。危机都是苏联提出让西柏林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企图取消西方三国的占领，把其赶出西柏林。为此，赫鲁晓夫在这两次都提出了期限，并剑拔弩张作好战斗架势。但是，西方亦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最后，问题只有拖下去。由于柏林东、西部分是一个整体，西方利用这一前哨基地来制造困难，特别鼓励和引诱东柏林人逃往西柏林。为了阻止这种活动及消除西方影响，东柏林当局，遂于 1961 年 8 月 11 日夜开始沿东、西柏林边界线修筑了一道墙，对双方往来作了若干限制。柏林墙在 1989 年，由于苏联集团内部严重不稳，东德政局出现巨大动荡，东德政府遂于 11 月 9 日宣布，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接着于 1990 年 8 月 30 日两德政府签订“统一条约”，确定民主德国于 10 月 3 日与联邦德国统一。

在亚洲，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是东、西方冲突中的热战，而不是柏林式的冷战，战争有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这证明，尽管西方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与技术，但是求解放的人民是难以征服的。战争是针对中、朝、越而来的，更重要是对付以中国为主的苏联集团的东翼。两次战争虽然都以停战形式结束，但是都反映了美国无法通过战争而达到其目的，不得不妥协，以免越陷越深，人员大量损失，遭到国内的反对。这也说明，在亚洲这个人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用战争解决问题是有限度的。

古巴危机，是在远离苏联集团的地域范围之外，既缺乏海、空力量的支援，又受地理条件限制，无回旋余地，单纯依靠导弹核武器以达到威胁效果是不大可能的。当双方都采用核讹诈时，苏联则反映其缺乏相配合的策略与手段，在对方紧逼之下，只能让步妥协。这反映了战略核武器的重要性，即没有它就无法与之相对抗，有了它才能制止核讹诈。但是，另一方面看，核武器是不能轻率使用的，不但会引起报复，伤害自身，而且也会受道义的谴责，如无其他武器与相应力量的配合，也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正是这种情况，在朝鲜战争中，当美国叫嚣要使用原子弹时，并未影响中、朝反击决心，美国反而遭到世界舆论反对及内部的指责。

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看，当地缘政治上两个敌对的集团一但组织上形成同盟，军事上有了相当准备，矛盾的发展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冲突与战争。但是，二战后的美、苏两大集团已经形成，而军事力量和军事武器都在全力发展，都为战争作了不同程度的准备。虽然引起热战与集团冲突，如冷战矛盾焦点（如柏林危机），热战的相当规模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核武器的相互讹诈（如古巴危机）都只限于局部而未出现更大范围

和更大规模的冲突与战争。这也可以说是二战后的地缘政治上的一个特点。矛盾与冲突都发生在两翼的边缘。由于驱使人民去进行侵略战争并不容易，而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又使战争发动者难冒风险。所以，两个集团只在冷战与局部热战中对峙。

二、两极体系的分化与瓦解

苏联与美国两大集团形成以后，在彼此对立中求得发展。但是，不仅集团间有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各集团的内部由于各种利益也同样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出现冲突，并导致公开的分裂。最后，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解决，集团瓦解，从而战后形成的两极集团体系亦随之终结。

（一）苏联集团的分化

苏联集团的分化分别出现在东、西两翼，即东欧与远东。

1. 在东欧：这里所说的东欧指的是南、波、匈、捷、罗与阿诸国。

（1）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恶化与分裂在东欧国家中出现得最早。1941年4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南共由铁托领导，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游击战争，曾多次向苏求援，苏碍于英、美反而援助与南共对立的南流亡政府武装。只到后来才与英、美一起给南共援助。并且迟迟不承认南共组成的人民政权。在战后关于领土划分上，对南与意有争议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上，苏未与南商量反而支持意方。在国内政策方面则要南接受苏联模式，在经济合作上不能互利，使南受损失。特别是南与保于1947年底前后曾设想建立巴尔干联邦。对联邦的设想不仅包括全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还包括希腊。这一联邦的出现，当然与苏要为其安全建立的势力范围相矛盾。苏《真理报》的编辑部发表声明，强烈反对此意见，认为是臆想出来的“联邦或邦联”。这不但把矛盾公开化，而且莫斯科对南、保代表团进行严厉的批评。

苏、南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苏为迫使南屈服，1948年2月，苏中断了对南的贸易。接着又撤走苏联的军事和文职方面专家。1948年6月28日，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会议。虽然会上各国共产党对南共看法不一，但在苏的压力下，通过决议，严厉抨击南共领袖铁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南已“蜕化成为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宣布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

苏、南关系破坏后，苏还迫使东欧各国同它一起对南施加各种压力。在此情况下，南共顶住了苏的压力，寻求西方国家的经济与军事援助。在国内建设方面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独立道路。

苏对南的作法树立了一个极坏先例。在南共遭到这种错误对待之后，东欧各国亦在清洗所谓的“铁托分子”，使一些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遭到迫害。这不仅影响这些国家以后的党内关系，也影响它们以后与苏共的关系。苏共与南共的关系在斯大林逝世后，到1955年关系才开始恢复正常。

（2）波兰。在1956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奥哈布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就任后，即公开承认波统一工人党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并开始予以纠正，宣布给1948年被批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被撤职、被逮捕的前党中央书记哥穆尔卡平反，恢复名誉。

在波兰，由于经济方面照搬苏联模式，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苏、波贸易关系中的不合理的价格亦使波受到损失。党的工作中亦存在严重官僚主义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意见不一，群众深为不满。

1956年6月中旬，波西部城市波兹南的机车车辆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派代表到当地市政府及华沙的中央机械工业部请愿，但未获满意答复。28日该厂工人约万余人罢工游行向斯大林广场进发，沿途不少群众参加。到广场后，群情激愤，工人代表团要当局接见解决问题，遭拒绝。当听到谣传去华沙代表团被捕后，遂出现骚乱，一部分人冲击政府部门，甚至打开监狱，释放犯人，抢走枪支，向保安人员开枪。政府出动保安部队与坦克平息了骚乱。骚乱中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围绕此事件，苏、波之间及波党内都产生不同看法。在7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奥哈布认为，极大部分责任在于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明确指出，从帝国主义那里找发生原因是错误的，它证明在党同各阶层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错误，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七中全会决定改善人民生活，推行经济合理化，政治民主化。政治局8月决定由哥穆尔卡任党的第一书记，建议在波任职的罗科索夫斯基离职返苏（罗氏为在波兰出生的苏军将领，被派往波任国防部长）。

苏联对此认为是“反苏势力进行策动的结果”。赫鲁晓夫突然率代表团去波，一面动用武力，一面对波申斥，企图压服波改变政策。波首先以苏撤兵为条件才进行谈判，在军民支持下，迫使苏军撤回基地；继则坚持原则拒绝苏联不合理要求。在苏联作了让步、调整了政策的基础上，使双方矛盾得以解决。同时，使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尊重国家独立与主权，发展友好关系。

（3）匈牙利。匈牙利的情况与波兰有些类似。原来匈共第一书记拉科西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紧跟苏联政策，大搞个人崇拜，排斥异己，引起党内严重不满。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错误出现后，匈的局势出现不稳。被开除出党的原部长会议主席纳吉著文认为，自己过去是正确的，被开除是错误的，要求恢复党籍。1956年3月，纳吉支持者成立裴多菲俱乐部，支持纳吉重新主政，在国内影响甚大。7月，拉科西进行弹压失败，被迫去职，由格罗继任书记。

形势的发展，匈共于10月14日决定恢复纳吉党籍。10月21日波八中全会决议及哥穆尔卡当选第一书记消息促使群众要求匈党效法波兰。第二日裴多菲俱乐部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工人自治，开除拉科西，纳吉进入中央等。10月23日学生和市民举行和平示威，要格罗下台，纳吉组织政府。晚上格罗发表严厉讲话后，首都出现流血事件与骚乱。24日晨，苏军坦克出现街头。匈共中央经激烈争论，决定纳吉任部长会议主席，卡达尔提任第一书记。但局势继续恶化，流血冲突扩大，首都警察与部分士兵转变立场，布达佩斯一片混乱与枪声不断。

在30日，纳吉改组政府，取消一党制，退出华沙条约，要求苏撤军和美、英、法、苏四国维护匈中立。匈的武装骚乱和向外蔓延，纳吉亦无法控制。

11月1日晚，苏联支持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卡达尔担任第一书记，并组成工农革命政府。苏军重新进入首都制止骚乱。纳吉先逃到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后被捕，于1958年6月被处决。卡达尔称，“这个事件是一

场全国性悲剧……我们当时迷失方向，从而造成了悲剧”。

波兰与匈牙利的事件暴露了苏联集团内在处理各党与各国之间关系上的不正常与错误，此后虽做了些调整与改善，使东欧国家走上改革之路，但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

(4) 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不同，从 1945 年 11 月与苏建交后，紧跟苏联的政策，反而与南斯拉夫处于对立状态，谴责南斯拉夫，并在国内整肃“铁托分子”。分别于 1949 年和 1955 年加入经互会与华沙条约组织。

对苏、南关系改善，苏共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阿并不同意。对苏压阿改善与南关系，阿反而不停地谴责南“反马克思主义”。为此，阿与苏的关系十分紧张。

当中、苏关系恶化，从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在 1960 年 6 月的 12 国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年 11 月的 81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上，中、苏矛盾尖锐对立时，阿并未支持苏的意见。会后，苏停止对阿经援，撤回技术人员，甚至撤回外交人员，两国关系完全破裂，矛盾公开化。

苏、阿关系破裂后，阿与亲苏的国家与党亦中断了彼此的关系，与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与党仍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5) 罗马尼亚。在战后罗马尼亚虽然紧跟苏联，但在斯大林逝世后适时地调整了国内外的一些政策。因此，在苏共二十大后，国内局势未出现波、匈那样的震荡，但波、匈事件中苏联的干涉却引起罗忧虑。在波、匈事件后，苏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时，罗乘机设法使苏军于 1958 年 10 月撤出罗境。

在 60 年代，中、苏的分歧加剧与公开化时，罗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强调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之间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在中、苏论战未公开之前，则斡旋于中、苏之间；在论战公开之后，则抵制苏联加剧分裂的错误作法。另外，在经互会中，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在华沙条约组织上，主张取消所有军事集团，赞成在华约与北约之间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另外，拒绝出兵干涉捷的内政。

在对外方面，不仅搞好与南的关系而且亦与一些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这样，罗就在东欧国家中与苏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特殊关系。

当时，罗马尼亚由于国内有石油、粮食，这两点无求于莫斯科，使其比东欧其他国家在经济上有较大自由度。但是，到 70 年代中期以后，罗油田老化，石油产量下降，经济依赖苏联较多，不得不更多接近苏联。但此时，苏联对东欧控制较弱，罗仍能坚持其较大的自由倾向。

(6) 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情况从 60 年代开始，农业方面虽实现了合作化，但产量长期徘徊不前；工业方面由于指标冒进，造成比例失调，增长速度减慢。到 1967 年，经济出现严重困难，通货膨胀，供应不足，引起群众不满。在 1968 年 1 月捷共中央全会选举改革派原斯洛伐克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捷第一书记。4 月中央全会通过改革的《行动纲领》。纲领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保证言论和新闻自由；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在经济改革上，逐步改革工业结构和布局，扩大企业自主权。

对捷改革，苏深感不满，认为是反苏的，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范围，对捷共横加指责，要他们立即停止改革进程。但杜布切克等不甘屈服。苏认为和平手段已无法改变捷共改革进程，遂决定武装干涉。1968 年 8 月 20 日，

苏共决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8月20日深夜，捷共主席团正在开会，获悉苏军入侵，全场为之震惊。8月22日，提前召开的捷共十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重申支持杜布切克。布拉格全市23日大罢工。由于苏军当时无法组成一个亲苏政权代替改革派，只好通过与杜等谈判。在谈判中，捷坚持杜布切克仍继续担任第一书记，在苏军入侵上不得不出让让步，使苏军的占领合法化。到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撤掉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捷克开始的改革也就夭折。

上述情况说明，在东欧，由于苏联不能平等地处理与东欧各国党和政府的关系，坚持苏联的政治与经济模式，阻碍东欧各国的改革，使这些国家的党不能独立自主处理自身问题，既失去群众支持，又无法搞好经济。尽管通过强制手段维持表面上的关系，但实际裂痕在扩大，一旦控制力量削弱，集团也就分化。

2. 在远东：在苏联集团的东翼，即远东地区，共有中国、蒙古、朝鲜和越南四国。与苏公开分裂的只有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苏联仍存一些对中国的疑虑，如中国是否会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对苏联闹独立性，但是很快承认中国及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2月14日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助中国新建和扩建了156个工业企业，并派了大批专家来华帮助建设。在外交上亦相互配合与支持。但从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中、苏分歧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当时只是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后来，双方分歧扩大到关于国际形势、关于国际共运的路线和策略方面。苏共当时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企图控制中国，遂导致中、苏关系不和的公开化。

1958年，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中国，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其企图显然是对中国的海军及港口借机加以控制。这当然遭到中国的拒绝。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片面撕毁了两国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赫访美后来到北京，要中国不要与美对抗，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深怕中国炮击金门妨碍其与美国的合作，在中国国庆十周年招待会上教训中国，“不应当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当然遭到中国驳斥与拒绝。加上在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会上，中共对来自苏共的突然袭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政府于7月片面决定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各项协议，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专家。从此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公开破裂，出现两党关系中的空前的大论战。

由中、苏的公开对立，在边界亦不断发生冲突，甚至出现严重事件。为此，1964年举行边界谈判，由于苏联不顾沙俄侵略的历史及采取扩张主义立场，拒绝中国准备以历史上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谈判无法继续下去。苏联遂在中、苏与中、蒙边界驻兵百万，对我国造成严重威胁。正是边境这种紧张状态，于1969年3月2日，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上游的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两国关系的破裂。直到8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变化，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驻军减少，苏军撤出阿富汗及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才开始逐步转向正常化。

（二）美国集团的分化

美国集团也如苏联集团一样，出现分化，亦同样出现在东、西两面，即西面的西欧、东面的日本。

1. 在西欧：在西欧，与美国关系重要的是英、法、德三国。英国在二战时与美国是共同对抗法西斯的同盟国。战后，英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都处于衰落中，虽然在领导世界的作用上及对世界重要战略要地的控制上逐渐被美国所取代，在某些问题上也与美国发生尖锐矛盾（如英、法于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武装侵略埃及，与美国发生严重矛盾）外，但国际大部分问题上，由于英国在对抗苏联集团对西欧施加影响，以及维护对殖民地控制上都需美国支持，所以美国可以说是英国的良好伙伴。

法国传统上是欧陆国家，虽然在一战中与英国，二战中与英、美都结成盟国，但是在战争以前，对欧洲大陆，特别是对德国的政策上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分歧。这说明，法国的传统的欧陆政策与英、美有一定的矛盾。法国在战后，经济极度困难，政治不稳，需要美国的援助与支持，特别是面对苏联集团所产生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必须有美、英力量的支持以保证安全。

可是，到50年代的末期，法国的经济不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戴高乐在法国的重新执政，为了确立法国的大国地位和西欧的盟主地位，这就必须向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霸主地位与一统天下挑战，强调自己在国际舞台的特殊地位与形象。

德国是一个战败国，又被四国占领，处于分裂状态，介于东西两大集团之间，与战前的形势完全不同。但是，西德的地理位置处在西欧的前沿阵地，与东欧对峙，在美、苏两集团对立情况下，居于重要战略地位。所以被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重要成员。由于其战败国身分，加上周围国家的恐惧心理，政治地位低，难以发挥较大作用，与法国的联合就可以提高其地位与作用。可是，亦要注意平衡与英、美关系使其不致招到其反对。另一面，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亦要注意自己的东方政策，不要使两部分德国人陷于永远分离与对立状态。正是其地理区位，政治现实所形成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西德的政治选择的必然性。

(1) 法国的独立政策。在战后，担任法国临时政府领导人的戴高乐认为，德国的崩溃，欧洲的分裂、苏、美的对立，都给法国提供意外的机会。这就是建立法国领导的“斯拉夫、日耳曼、高卢和拉丁各族之间的协作”，就是“从政治、经济和战略观点出发，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联合起来，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当时，法国在强大的美国、逼人的苏联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戴高乐的想法只能落空。戴高乐也于1946年1月20日决然辞职。

到50年代末期，世界形势已有较大变化，法国的经济已走出困境有了新的发展，可是1958年由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将领的公开叛变而带来全国性的混乱，法国总统呼吁戴高乐前来共商大计。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组织政府，并授予戴以六个月的全权处理新宪法的制定及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

1958年9月25日到10月14日，以多数票通过新宪法，使法国从第四共和国进入第五共和国，国家由多党议会制共和国变成实际上的总统共和国，大大扩大了总统和行政的权力，调整了总统和议会关系。总统是国家元首，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有权任命总理和组织政府、任

命文武官员、主持内阁会议、签署法令、发布法律及解散议会。

戴高乐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和发挥法国在西欧的核心作用，采取的措施与对策如下：

首先，实现法、德合作。从历史看，从普法战争以来，两国战争互有胜负，成为欧洲对立的主要方面。正是因为双方的发展都是以战胜与制服对手，实现其政治战略。结果两次大战法国都是战胜国，可是在世界上的地位却一落再落。因此，使法国认识到，实现西欧的统一，法国的核心作用必须是以法、德合作为前提。

在戴高乐重新任职时，于1958年至1962年法、德两国首脑多次互访、会谈，共同认识到，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势下，西欧不能成为美国的工具，不能永远指望美国，建立一个联合的欧洲是必要的，两国要从过去的世仇变为坚定的朋友，因此，必须加强法、德合作。两国遂于1963年1月22日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

《法德合作条约》虽然实现了法国走向独立自主，走向西欧联合的重要一步。但是，德国亦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不能单纯跟着戴高乐走，要在英、法、美之间找平衡点，所以在联邦议院通过该条约时，加上一个序言，阐明该条约不影响德国的多边条约的义务和促进欧洲与美国的密切合作，以及北大西洋防务的一体化，英国在内的欧洲联合。

其次，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认为，北约组织应是个彼此完全平等的主权独立国家的联盟，不能是个含有主从关系的组织。1958年9月戴高乐于致英、美的备忘录称，在北约组织中应建立一个美、英、法三大国组成的理事会，掌握世界政治和战略问题的决策权。英、美拒绝了法国的意见。

为此，法国为维护法国的独立，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其不再受北约组织的限制。从1959年到1964年，法国先后宣布撤回北约组织中的舰队，收回原定在战时归北约组织指挥的几个空军部队的指挥权，迫使驻法国的美国战斗轰炸机离开法国，以及撤回在北约组织中任职的法国军官。最后，法国于1966年3月正式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迫使北约理事会于10月从巴黎撤到布鲁塞尔。1967年3月，迫使北约司令部连同驻法的美军撤走，并取消美在法的9个空军基地，40个军事设施。

另外，戴高乐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核力量。1960年2月，法国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此后，为坚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法国拒绝了美国所建议的多边核力量计划。1963年7月29日，戴高乐谈到在莫斯科由苏、美、英三国草签的部分禁核试验条约时指出，他们双方都拥有可以毁灭全世界的武器，谈不上他们放弃这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还要继续发展独立核力量。法国无意签订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第三，法国调整了与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战后，法国的对外政策大都受美国的影响。在法国对德和北约采取新策略后，也必然需要调整对某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其中主要是对中、苏两国的关系。

戴高乐看到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一个大国，而且与美国处在对立地位，与其搞好关系既是提高自身的地位，使自己的独立力量摆脱美国的影响，又是与苏打交道的一个制约力量。1963年10月，法国前总理访华进行半官方试探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富尔在中国会见了毛泽东与周恩来。

经过建交谈判，两国很快达到协议，法国不顾美国多次反对，于1964

年1月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法建交对中国来说，是突破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一个重要成果。

另外，戴高乐考虑到在美、苏冷战对峙状态下，改善对苏关系既对缓和紧张局势有好处，同时也可利用美、苏矛盾以发挥法国在其间的“仲裁者”的作用。因此，于1960年与1966年，两国领导人进行互访，会谈中强调相互谅解与合作。双方不但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还接通了联系爱丽舍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绿色电话。但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受到法国的严厉谴责，使法、苏关系的改善受到影响。

(2)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在战后，联邦德国原来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即完全倒向美国一边。到了60年代，西德的经济已有很大发展。而美国此时，由于进行越南战争处于内外交困中，在与苏争霸中，力量有些下降，特别是在核武器方面，苏联有了较大的发展。在1962年，美国拥有洲际导弹294枚，苏联只有75枚，到1969年，美、苏分别达到1054枚和1050枚。到1970年，苏已有1300枚，开始超过美国。使西德感到原来采取倒向美国的政策已行不通。社会民主党执政后，正式宣布推行“新东方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加强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与东方达成相互谅解；承认欧洲现状，改善与苏联、东欧各国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发展相互联系。

联邦德国看到自己的地理区位是介于东、西方之间，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甚至在思想文化上都属于西方。而东、西方的冷战对峙的形势看来会持续下去，原来想依靠西方实现国家统一已不太现实。自己处在东、西方对立的前沿，如继续采取原来政策不但彼此的对立与隔阂加深，而建立相互联系，加强经济交流，承认现状，可以相互了解，增加信任，缓和局势，发展经济。这样，对联邦德国来说，搞好两面关系总比只倒向一边要好。当然这一切必须立足于西方阵营基础上，否则就会失去其推行新东方政策的前提与条件。这点联邦德国是清楚的。

虽然早在1955年，联邦德国就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彼此仍处于对立状态。另外，联邦德国坚持不同与民主德国建交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战后欧洲边界，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这种情况当然无法与苏搞好关系，更无法与东欧国家及民主德国建立正常联系。

所以要搞好与这些国家关系，首先要承认东、西方分裂现实，边界的现实，两个德国并存的现实。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联邦德国于1970年到1972年与苏联、波兰签订《莫斯科条约》与《华沙条约》，宣布“严格尊重欧洲各国的领土完整和目前的边界”，与民主德国的《基础条约》规定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睦邻关系”，“哪一方都不在国际上代表对方”。通过这些条约，实现彼此关系正常化。1973年9月，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在欧洲的中部出现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2. 在日本：日本与联邦德国有类似之处，是战败国，被美军占领。在对外关系上，完全是对美国的一边倒。长期以来，日本是美国集团的重要亚洲成员，与苏、中处于对抗状态。

对日本最大的冲击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与中国建立起新的战略关系，使远东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在这种情况下，需对自己的对外政策作重大调整。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亦于1972年访华，两国开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样，日本原来倒向美国，与苏、中对抗的战略格局发

生根本性变化。经过调整，日本的对外关系大体是，同美国、西欧是同盟关系，同东盟、中国是友好协商关系，同苏联是对话关系。

在对美国关系中，原来在军事上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经济上依靠美国的支持与市场，政治上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到 70 年代，日本的经济经过 20 年的高速发展，已有很大提高，经济实力已追上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的第二大生产国。加上美国在远东战略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日本与美国的关系。

当时，苏联的核武器已大大加强，并取得对美优势，在亚洲则加速发展海军，不但舰只数量，而且总吨数亦超过日、美两国的总和。同时，苏联还利用越南的金兰湾为基地把海上势力向南扩展。所以，在日、美的军事战略上，主要是对付苏联。在力量的安排上，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日本则加强常规防御力量的建设与提高。日、美关系上是从原来的“伙伴关系”转为“同盟关系”。

在政治上，日本仍然在加强彼此关系的基础上，实行全方位的多边关系。在经济上，由于其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生产水平提高得比较快。在过去的日、美贸易中，日本是逆差，美国是顺差，到 80 年代情况发生相反变化，日本为顺差，美国是逆差。于是，日、美贸易上的摩擦日益严重，对两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对美国依赖减少，对贸易摩擦日本态度逐渐强硬，但总的形势下，还不致于改变日、美两国在军事与政治上的相互依赖与同盟关系。

对苏联关系，日本是加强对话，缓和局势。苏联对日本是想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利用其资金和技术加速远东与西伯利亚的开发，同时通过这方面关系的加强以影响日本对中国的关系。日本则利用苏联这方面有求于己迫苏归还北方四岛。由于苏在这方面难以满足日本要求，加上苏联在远东军事实力膨胀、侵占阿富汗等原因，彼此关系难以有较大变化与改善。

从以上情况看，在美国集团内，随着军事、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发展，美国的地位在下降，其控制能力亦有所减弱。因此，在西翼的法、德，东翼的日本，其地位的不断加强，独立自主的处理对外战略关系形势已成，联系到苏联与中国，也就是在 70 年代开始在两极世界体系的变化下出现五极的倾向。也就是说，多极的世界开始显露。不过，两个超级大国仍十分强大，其他极的力量与其还不成比例，作用与影响还不大。

（三）美、苏矛盾的发展与苏联集团的解体

1. 美、苏矛盾的发展：从 60 年代初，古巴危机中苏联深感战略核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上美国的优势，及自己在策略上的失误而形成的困境，以后苏联就在这方面拼命追赶。到 1972 年的十年中，苏联战略核武器增加了 7 倍，而美国只增加了一倍。虽然美国在核弹头数量和准确度仍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已失去优势。加上苏在常规武器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又大力发展远洋海军。因此，到 70 年代，苏在以战略核武器为中心的综合战斗力上已与美国保持均势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争夺。苏在此情况下，实行的战略是西线缓和，东线对峙，南线扩张。

在西线，苏通过缓和可以得到贷款，发展贸易，获得尖端技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工业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在东线，苏受到中、美、日的压力处于对峙状态。在南线则采取突破扩张。例如，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

利用古巴介入安哥拉，向埃塞俄比亚和也门进行渗透，特别是出兵阿富汗都是苏扩张战略的反映。

此时的美国，由于核武器方面已失去优势，在越南战争中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不但在战场上越陷越深，而且国内也发生经济困难，社会公众强烈不满。所以，美国在战略上采取的措施，首先，在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利用中国牵制苏联以减轻自身负担，加强其战略地位。其次，设法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以加强其他战线的力量。第三，采取均势外交以保持其霸权地位。在 70 年代，美、苏经过谈判在防止核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对核战略力量在数量上大体保持均衡，在禁止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上亦取得些进展并签署些协议。

进入 80 年代，形势发生变化，彼此的战略对策有明显变化。在苏联方面，由于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投入了经费，动用了大量的工业设备，对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能不带来严重影响。例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在 60 年代后期为 7.1%，70 年代为 3.9%~5.1%，到 80 年代上半期降到 3.1%。这使苏不仅赶不上美国，甚至落后于日本，成为居第三位国家的危险。这种情况迫使苏与美减少对抗，增加对话，在国内实行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恢复活力，加快经济建设步伐。

对美国来说，经过 70 年代，经济在 1982 年开始好转，渡过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军费大幅度增加。特别是苏军出兵阿富汗在西方引起强烈反映，使原来的缓和发生变化，美国开始执行强硬政策。美国遂改变均势政策，大力加强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研制和更新换代，要在军备竞赛中取得优势。另外，又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谋求在太空方面获得对苏的优势。其总的战略是迫使苏联参与军备竞赛，加上经济措施来拖垮、压垮苏联。另外，则采用经济、政治等措施促使苏联、东欧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发生演变来分化其势力范围。

在 80 年代前半期，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苏联的原来的战略武器的地位，尽管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军费增长势头减弱，为不让美国取得对苏的军事优势，除保持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优势外，着重在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和导弹命中精度方面追赶美国。另在外交上采取不妥协态度，拒绝同美国往来与对话，限制东欧国家同西方往来。

到了 80 年代的后半期，情况发生些变化。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国内的形势与东欧的情况，使其从 80 年代前半期的美、苏关系单纯对抗的战略，改为又对抗又对话的灵活态度，与美国进行一系列谈判。在美国，虽然自己的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但是，军费开支大增（1985 年达到 3900 亿美元），造成财政赤字亦大增，影响国家的经济，所以，也愿意从实力地位出发，逼苏让步。

在这种形势下，在 80 年代，美国则对苏联的扩张政策进行对抗。由于在中东与西亚美国所依赖力量只有伊朗和以色列，而伊朗的巴列维垮台后，只剩下以色列。所以，美国对以色列给以大量援助，支持以色列打击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力量，另外，则与北非的利比亚发生冲突，其目的都是削弱这地区的苏联势力和影响。

在南部非洲，美国则支持南非，援助安盟把代表苏联力量的古巴军队赶出安哥拉。在东北非，美国则援助索马里、肯尼亚以及苏丹以对付受苏联支持的埃塞俄比亚。里根入主白宫后，为维护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竭力阻

止苏联、古巴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扩张。对该地区出现的亲苏、古的政权和政治力量如萨尔瓦多游击队、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和格林纳达政府，美国则是支持萨尔瓦多政府消灭反政府武装，利用邻国挑起事端以打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直接派兵入侵格林纳达来迫使苏、古势力退出这个地区。

在阿富汗则支持游击队与侵阿的苏军进行直接斗争，使其不得脱身。

另外，则通过对话来解决部分军备竞赛问题。关于限制战略武器方面，由于双方的数量都已达到饱和，而且需要在质量提高情况下，于 70 年代初达成协议规定冻结在实有和正在建造的水平。由于冻结的是导弹数，但每个导弹所携带的弹头数量和每个弹头的爆炸力并没有限制，这就既为导弹数稍少的美国发展多弹头导弹开了方便之门，又为导弹数稍多，而弹头数量少，弹头总当量高于美国的苏联，研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提供条件。所以，限制的只是表面数量，而不是质量，实际是为质量竞赛开道。到 80 年代，只对改进战略武器质量作了限制。虽然美国并未批准该条约，但双方表示遵守条约规定，达到新协议限制为止。至于削减战略武器方面，只在限制中程导弹方面取得进展。

在中程导弹问题方面，美国根据苏联在欧洲已部署中程导弹，为使西欧与其达到战略力量平衡，要在 80 年代于西欧部署潘兴 式导弹和地面巡航导弹。为此，双方开始谈判。美国想以取消部署潘兴 式导弹和地面巡航导弹的计划来换取苏联拆除已部署的中程导弹，即“零点方案”。苏联企图把美国的“前沿基地与美、英、法三国核力量作为一体，实行分阶段减少每一方中程核武器数量。从 1981 年谈到 1987 年，最后双方同意完全消除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射程 1000 ~ 5000km），但允许苏在亚洲，美在本土部署相同数量的中程弹导导弹。为消除西欧对苏联短程导弹绝对优势的顾虑，苏提出消除其在欧洲的短程导弹，要求美亦不在欧洲部署此类导弹。美同意此意见。此即实现“欧洲双零点方案”。不过，中程导弹问题虽有突破，但只占其核武库总量的 3% ~ 4%，对双方实力与均势影响不大。

虽然中程导弹问题在 80 年代取得突破，但在欧洲双方常规武装力量的裁减上进展不大。大战略防御计划方面双方正在开展竞赛。由于核武器与运载系统都已得到高度发展，不但射程覆盖全球，而且命中精度大有提高，其对敌手的威胁是极大的。为此，防御系统的研制、发展就成为重要战略问题。这不仅需要依靠多种高新技术的发展，更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美国发展战略防御系统既可带动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又可在战略武器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现在一切战略武器都相形失色，使自己在竞赛中稳操胜券。当时技术水平与财力美国都胜过苏联，美国进行这项工作可以逼苏联参与竞争，进而可以使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不仅加重苏联的困难，还可把其拖垮，是一箭双雕的策略。当然，此任务之艰巨，花费惊人，对美国也是沉重负担。因此，战略防御系统的研究是美、苏 80 年代新的竞赛重点，虽然双方对话、谈判，但难以解决问题，然而限于财力又不得不放慢研究速度。

2. 苏联集团的困境与解体：苏联集团的困境，这次的事态发展不单是东欧的个别国家，而且也不限于东欧国家，而是包括苏联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家。其解体既包括东欧各国脱离苏联集团，也包括苏联本身由 15 个加盟共和国所组成的联邦的分裂。

（1）波兰。波兹南事件后，哥穆尔卡提出“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组

织工人委员会，其职权包括制订生产计划、劳动定额、工资等级、奖惩办法、监督企业行政等。企业实行自主、自治和自负盈亏。对农业减少产品销售定额，提高收购价格，实行农村自治。加强与其他党派及教会、进步组织合作，实行差额选举。这使波兰形势大有改善。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国际共运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使波改革停止，甚至后退。重工业优先发展带来轻工业、农业发展缓慢，市场供应紧张。1969 年和 1970 年农业歉收造成严重困难，食品涨价。由格但斯克造船厂开始的罢工扩展到沿海城市，导致 1970 年 12 月 20 日盖莱克取代哥穆尔卡。

盖莱克提出“高速发展战略”。正是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及东、西方缓和时期，实行借助外资和西方技术，提高速度、高积累、高福利政策。当时国际经济不景气，借贷条件优惠，能源便宜。国内实行冻结物价，提高工资，加上农业丰收，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可是 70 年代后期情况大变，能源价格猛涨，贷款利率激增，西方关税保护又使波出口困难，国际收支情况恶化。农业又碰上连年歉收，商品短缺，食品黑市问题严重。1980 年 7 月提高肉类价格触发工潮，出现独立自主的“团结工会”，成为公开的政治反对派。盖莱克由此下台。团结工会迅速发展，取代原工会。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提出“政治多元化”的“自治共和国”纲领，决定 12 月全国总罢工，建立“工人卫队”，并准备公民投票及接管政权。12 月 13 日波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实行军管，雅鲁泽尔斯基接任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

在此社会动荡以后，经济先是衰退，后是增长缓慢，加上外债激增，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国内局势不稳，团结工会力量重新抬头。波统一工人党于 1989 年 1 月 18 日中央全会决定实行“政治多元化”，经圆桌会议确定，团结工会合法化，改行总统制，实行议会民主。当年 6 月举行议会大选。选举结果团结工会获胜，9 月组成团结工会的政府。接着 1990 年 12 月 22 日，经选举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任总统，取代了雅鲁泽尔斯基。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在野党，于 1990 年 1 月开会通过停止活动决议。而后多数代表建立社会民主党，少数代表成立社会民主联盟。

(2) 匈牙利。卡达尔在组成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后，认真吸取过去教训，注意改善党的领导，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在稳定局势后，就开始对过去个人迷信时期的冤假错案进行全面复查和平反。在政治上作好团结工作，提出“谁不反对我们，谁就是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各级政府和组织担任领导。给企业中工会对生产经营、工资福利、领导任免拥有建议、监督和否决权。在农业上，对合作化坚持自愿、稳定自留地，取消产品义务交售制，改用合同收购制，提高收购价格，开放农贸市场。工业调整结构，发展适合国情工业与产品。这些措施带来很好效果，特别是农产品除自给外，还有大量出口。

在此基础上，于 1968 年实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只确定各部门发展比例，取消指令性指标，改投资拨款为贷款。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与自由价格，实行浮动工资。允许雇工五人以下私人小企业（到 1979 年放宽为 30 人）。这些改革成绩显著，1968—1973 年是匈牙利的黄金时代，被称为稳健改革的“匈牙利模式”。但在 1973 年后，国际上能源与原料价格上涨，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下跌使匈牙利经济出现停滞。

到 1979 年虽对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放宽限制，但内受经互会体制所限，有外债的沉重负担，使改革陷于困境，经济停滞不前，加上东欧与苏联的外部影响，1988 年 5 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对党实行大改组。卡达尔等退出政治局，“彻底改革派”掌握政治局实行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多元化。1989 年 2 月实行多党制。社会主义工人党随后于 10 月改名为社会党，12 月一部分党员重建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 1990 年 3 月的多党选举中，民主论坛为首的反对党联盟获胜组阁。社会党与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成为在野党。

(3) 东德。东德建国后，长期处于两个集团、两个德国对立的环境中，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和对外交往都处于极其敏感与极其困难的境地。一方面，它受苏联集团的诸多限制，回旋余地不大，在推行改革上遇到很多困难；另一方面，属于同一语言、文化、民族，又原属一个国家的另一部分的西德和西柏林就近在咫尺。在苏联集团中，东德是经济条件最好，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可是与西德相比反差较大，难以与之抗衡。所以，从分裂伊始就存在居民不断流往西德问题，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柏林墙的修建亦与此有关。

在 1972 年 12 月两个德国缔结了双边的“基本条约”相互承认为主权国家，互不干涉内政，友好相处，但联邦德国却并未放弃谋求统一考虑。

到 80 年代后半期，东欧与苏联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动荡，纷纷进行较大改革，对东德亦产生较大影响。1989 年 9 月，匈牙利西部边界开放，两天之内就有上万东德居民利用去匈度假之机，取道奥地利去西德。10 月初，又有近万东德居民涌进西德驻捷使馆。国内又出现要求放宽出国旅游的游行。这些触发东德的政治危机。担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18 年的昂纳克 10 月 18 日辞职，12 月 3 日又被开除出党。由此，党政机关大量易人。

1989 年 11 月 9 日，东德开放柏林墙，允许自由过境。两天中，数十万人过境，遂把分裂象征的柏林墙推倒，统一问题提上日程。1990 年 3 月 18 日，东德进行人民议院选举，结果，以尽快实现统一作为竞选纲领的德国联盟获胜，而由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在选举中失败成为在野党。1990 年 10 月 3 日，东德按西德基本法加入联邦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

(4) 捷、罗、保、阿。捷克在 1968 年的改革失败后，人民思想受到压抑，国内建设受到影响。捷共领导则坚持将 1968 年改革（亦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看作是一场“反革命”。1977 年，社会上要求为 1968 年事件平反的各种力量发起“七七宪章”运动，形成捷的政治反对派。到 1989 年，从 1 月 11 日起，捷国内发生多起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在此活动中，“七七宪章”等十几个组织联合成“公民论坛”。11 月 26 日的捷共中央非常全会改选了领导，接着宣布 1968 年苏联等华约 5 国出兵捷克是错误的，为布拉格之春平了反。

1989 年 11 月 29 日，联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关于捷共在社会和国家中的领导作用等条款。12 月，联邦议会选杜布切克为议会主席，选原“七七宪章”发起人剧作家哈维尔为共和国总统。1990 年 6 月议会选举，公民论坛获多数议席，捷共获少数，失去执政党地位。由于捷克与斯洛伐克两民族在诸多问题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经联邦议会通过，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于 1993 年 1 月 1 日正式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罗马尼亚，与苏联保持若即若离的齐奥塞斯库，在 80 年代亦遇到经济

发展中的困难，加上其排除异己，任用亲信，大权独揽，控制严密，矛盾蕴藏下来。1989年12月16日，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几百市民，反对地方当局强制一名持不同政见的匈族新教牧师迁居。次日参加抗议地方当局的示威游行达数万人，并与军警发生冲突。21日，首都布加勒斯特亦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22日，齐奥塞斯库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但国防部领导拒绝执行命令，支持齐的安全部队与支持示威群众的国防部军队交火。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齐奥塞斯库夫妇乘直升机外逃，当日下午在外地被捕，于25日经军事法庭秘密审判后处决。

混乱的罗马尼亚，于22日夜，由前罗共书记伊利埃斯库为首的“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政府一切权力，罗共停止活动。1990年5月罗首次自由大选，救国阵线获胜，伊利埃斯库当选为总统。

保加利亚也是在内部长期孕育，外部形势促使下发生变革的。1989年10月，欧洲环保会议在索非亚召开。一个人数不多的“生态公开性”组织乘机发起签名、请愿、集会，指责政府“缺乏民主”，“没有人权保障”，“无新闻公开性”。11月3日，发动更多人游行示威。其后，十多个组织成立“民主力量联盟”，发动大规模反政府集会。保共11月10日的中央全会上，当政35年的日夫科夫下台。1990年4月，保共易名为社会党。6月举行议会选举，社会党获胜，该党领导当选为总统。但后来，总统改由“民主力量联盟”主席担任。由无党派人士出面组成联合政府。

阿尔巴尼亚在东欧形势影响下，于1991年3月举行多党制的议会选举。阿劳动党获胜，阿利雅当选为总统，并组织联合政府。6月，阿劳动党改名为社会党。由于形势恶化，1992年3月提前大选，反对党民主党获胜，阿利雅退休，阿社会党转为在野党。

(5) 苏联。作为集团之首的苏联，进入80年代，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面临着严重的困难。首先，经济方面。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从70年代初年增5.1%，降到1984年的2%。在生产中，农业的情况极其严重，80年代，每年进口粮食在3000万吨以上。工业中生产长期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因而，重工业产品在国外无市场，轻工产品国内积压难销。在对外贸易上，出口主要是靠石油与矿产品，而销售所得大多用于进口粮食。同时生产中必要的原材料与机械，在1983年，由于世界市场石油降价，为进口必需的粮食等物品不得不出售多年储备的黄金作为补偿。

其次，科技竞争形势逼人。原来苏联人造卫星首先升空，技术先进。由于与美国军事竞赛，科技力量主要用于军事，很少顾及民用产品。到80年代，不但民用产品质量差，军事技术方面亦出现落后局面，特别是面临着世界新的科技革命，要使苏联继续保持原来地位，就必须在科技上狠下功夫。

第三，面临美国的挑战。里根上台，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对苏采取咄咄逼人姿态。面对挑战，苏一怕美成功，苏则在战略武器方面无回击之力，二怕参与竞争，影响自己振兴经济计划，三怕力量不足，技术差距越拉越大。这些使苏处于进退两难之境。

第四，急于改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行改革，有的亦取得明显效果，而作为该集团之首的苏联，不但失去吸引力，而且还将失去影响力。在这种内外压力下，苏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改革之路。

苏联的改革从经济开始，要求改进经营管理体制，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颁布《个体劳动法》及《合资企业法》，目的是发展个体经营与合资企业，

打破单一的公有制。企业管理从行政方法转向经济方法，实行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但是，几十年来形成的计划经济，行政管理体制要求迅速改革，立即见效，当然会遇到很大阻力与困难，国民收入增长率反而低于改革前，财政赤字上升。

面对这种情况，未能深入研究分析，事实求是地前进，反而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改革，以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书中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1988年6月，苏共第十次代表会议，把“社会主义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三大革命倡议”。这次代表会议，争论激烈，形成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激进派”，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1990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统。在“政治多元化”、“公开性”、“民主化”的原则指导下，苏国内政治组织纷纷成立，各种思想、政治观点争论激烈，集会游行不断，罢工浪潮纷起，社会动荡，政局失控，党的组织无力，政府机构陷于半瘫痪状态。

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各种思潮与政治观点泛滥中，必然把潜在的民族矛盾暴露出来，民族主义情绪发展到严重程度，甚至出现武装冲突。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就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武装斗争。在民族主义思潮蔓延下，有的共和国的党与政府组织则代表本民族利益提出“脱离苏联”。1990年3月，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随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议会也要求退出苏联。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发表主权宣言，称本共和国法律“至高无上”，遂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共和国为自己的“主权”彼此之间产生一系列问题和矛盾。1991年3月就联盟保留问题举行公决，76.4%的人赞成保留，但不能阻挡分裂趋势。在8月20日签署将苏联改变为“自由的、松散的联邦”前夕，出现了“八·一九事件”。

由副总统亚纳耶夫组成的8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不可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管理国家，并称戈的改革“已进入死胡同”，国家“面临致命的危险”，“决心采取重大措施，使国家和社会尽快摆脱危机”。19日中午，叶利钦在俄议会大厦宣称这是一次“反宪法的反动政变”，号召“反击”和“无限期罢工”。加上一些共和国领导人拒绝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群众集会支持叶利钦，部分戒严部队的倒戈，“八·一九事件”于21日流产，戈尔巴乔夫当晚回到莫斯科声明“他已完全控制局势”，“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有的自杀，多数被捕。

8月23日，叶利钦下令“中止”俄共活动。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苏联于9月6日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时，戈氏想保持联盟，与一些共和国领导磋商出一个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但因乌克兰于12月1日举行全民投票，赞成独立。12月7日—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决定组建“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宣布苏联不复存在。12月21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11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书，苏联即完全解体。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原苏联集团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也因东欧的巨变，分别于1991年4月和6月宣布解散。

三、殖民体系的瓦解与第三世界的兴起

（一）殖民体系的瓦解

与第一次大战后情况相比，二战后，不仅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很大削弱而且其所统治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使几百年来形成的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但是，由于地区的不同，情况的差异，各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时间与方式各不相同。

1. 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在二战前是英、法、荷、美的殖民地，在二战中都被日本侵占。日本为了顺利的统治这些地区，打着“支持”当地人民，“反对”原殖民主义者旗号，搞“大东亚共荣圈”。但是，其残酷压迫与统治面目很快暴露，不少地区人民组织武装与其进行游击战。日本投降时给当地的武装力量留下不少武器。

（1）越南。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印度支那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组织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动全国起义，迫使阮氏王朝末代皇帝保大退位，于9月2日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是，法军于9月23日登陆，占领西贡，开始恢复殖民政权。

法、越双方于1946年3月6日签订《越法初步协定》，法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属于法兰西联邦和印度支那联邦。然而，法国于1946年12月19日撕毁协定，向越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直到1954年3月13日—5月7日，越南人民军攻下号称“坚不可摧”的奠边府，全歼法军精锐部队16000多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才迫使法国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法国撤出越南，承认越南独立。但是，后来，美国插足南越，从而激起了越南的抗美援朝，直到1976年才取得越南的南北统一。

（2）印尼。当日本投降消息传到印尼，那里的共产党和反法西斯青年组织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苏加诺、哈达商定，于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8月18日政界领袖召开的“独立筹备委员会”，选举苏加诺和哈达为正副总统。

1945年9月—10月，英军为受降在印尼登陆。其后英、荷军企图恢复殖民统治与当地军民发生战斗。由于力量不足，11月15日达成协议，荷兰承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爪哇、苏门答腊和马都拉主权，与荷军占领下的婆罗州等地组成联邦，尊荷兰女王为元首。荷军调集力量后，于1947年7月20日撕毁协议，重开战端，在武装镇压，内部挑拨均告失败后，于1949年11月2日达成的“圆桌会议协定”确定，印尼共和国与15个伪邦组成印尼联邦共和国，并由印尼联邦共和国与荷兰组成“荷兰-印度尼西亚联盟”。

到1950年8月14日，印尼宣布解散联邦，15日成立印尼共和国。1954年8月，印尼政府与荷兰达成取消“荷兰-印度尼西亚联盟”协议。1963年5月1日又收回西伊里安。至此，印尼完成国家的独立与统一。

（3）菲律宾。美国政府于1934年即宣布在菲建立自治政府，10年后完全独立。在日本占领时，菲人民组织武装打击日本占领军。日军为缓和与当地人民矛盾及削弱美国影响，于1943年宣布菲“独立”。美国为争取菲律宾人民，打击日军，于1944年10月在菲登陆前，于6月由国会通过法令，同意菲提前“独立”。

在菲人民抗日武装配合下，美军于10月登陆。之后，既对菲以独立地位相待，反而解除菲人民武装，遂于1945年9月23日在马尼拉爆发群众反美

大示威。

1946年4月，菲举行大选，7月4日在马尼拉举行独立仪式，罗哈斯就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4)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原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中被日军占领，当地人民抗击日军，建立了人民武装与一些城镇的人民委员会。1945年9月英军重返马来西亚，接受日军投降。12月解散当地武装与人民委员会。1948年2月，成立马来西亚联合邦，新加坡则划出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1955年7月，马来西亚联合邦立法议会大选，马来人、华人与马来印度人组成马华印联盟获胜，联盟主席拉赫曼任联合邦政府首席部长。为摆脱英国殖民者在政府中的实权与取得独立，拉赫曼于1956年1月与英谈判，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在英、美支持下，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作为英国保护国的文莱拒绝参加，于1984年1月1日独立，并改名为文莱达鲁萨兰国。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

(5) 缅甸。日军在进攻缅甸前，曾于1941年在泰国帮助缅甸民族主义领袖昂山组织“缅甸独立军”。1941年底，日军进攻缅甸，缅共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日军为有利于自己对缅甸控制，于1943年宣布缅“独立”，将独立军改为“国防军”，建立民族政府。昂山等认清日本意图后，1944年8月与缅共等组成“缅甸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并担任主席。自由同盟配合盟军于1945年3月27日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仰光，并收复大片国土。

英军回到缅甸后，于1945年10月成立“行政委员会”，将自由同盟代表排除该委员会。1946年9月缅甸人民全国性大罢工迫使英国解散“行政委员会”，组织有昂山参加的新的行政委员会。经与英谈判，行政委员会成为临时政府。由于昂山争取国家独立的坚决意志、不妥协态度，于1947年7月19日被英国指使的反动分子杀害。在激起人民新的反英斗争高潮中，经过谈判，独立的缅甸联邦共和国于1948年1月4日宣告成立。

2. 南亚：印度是英国的一个人口最多、面积广阔的殖民地。在二战中，不论其战略地位，还是人力物力资源，对英国战胜法西斯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国大党领袖甘地和尼赫鲁提出，以支持英国战争换取印度独立被拒绝后，再次发动不合作运动，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甘地与尼赫鲁曾因此被捕入狱。国大党的“前进集团”战时在缅甸、新加坡组织印侨及印俘成立印度国民军，企图借日军之力，赶走英国殖民者。战后，印殖民当局军事法庭审判该军军官，触发了印度广大群众的反英运动，以致审判无法进行。

印度除国大党外，还有一个穆斯林联盟，虽然共同开展反英斗争，争取独立，但两党在宗教、民族及伦理方面的差异与矛盾甚多。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印约有7000多万人（占全印人口1/5），穆斯林联盟要求在其聚居区成立“清真国”（即巴基斯坦，“巴基”是清真、神圣之意，“斯坦”是国家之意）。

1946年2月18日，孟买港的印度水兵为改善待遇及反对种族歧视发动起义。起义不但在其他港口印度水兵中蔓延，而且还得到印度广大群众的支持。第二天，英国就派使团去印与各方代表团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印度独立。1947年6月3日公布《蒙巴顿方案》，8月15日起在印度境内成立两个独立的自治领：印度和巴基斯坦。

分治方案将穆斯林聚居地区划入巴基斯坦（由于穆斯林聚居区分别在印度的东、西两边，形成巴基斯坦的东巴与西巴），其余的，印度教徒聚居的中间地区是为印度。另外，占印度面积约 2/5 的 500 多个土邦享有独立地位，可分别谈判决定加入哪一个自治领。

由于伊斯兰教徒与印度教徒多为混居，分治中有 50 万人在斗殴、残杀中丧生，有 1600 多万人背井离乡，移居他处。甘地亦为平息这场纠纷而于 1948 年 1 月 30 日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

在土邦归属中，引起印、巴冲突最突出的是克什米尔。该地约 77% 居民信伊斯兰教，约 20% 是印度教徒。但印度教徒控制该地议会，宣布加入印度。于是 1947 年 10 月印、巴双方在该地发生武装冲突。在联合国干预下，1949 年元旦停火。现印占区面积约为 3/5，人口约为 3/4，巴占区面积为 2/5，人口为 1/4。印、巴双方原同意由公民投票解决归属问题，但印后又提出异议。至今争端未获解决。

南亚的原英国殖民地锡兰于 1948 年 2 月 4 日获独立。1972 年 5 月 22 日改名为斯里兰卡。

居住于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由于在 1970 年 12 月的议会选举中的人民联盟主张，与西巴基斯坦组成联邦。但是，东、西巴基斯坦存在矛盾，不断发生冲突，1971 年 3 月终于发展成内战。结果是，西巴基斯坦失败；东巴基斯坦于 1971 年 12 月正式建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3. 西亚：叙利亚和黎巴嫩原属奥斯曼帝国，一战后为法国委任统治地。二战中，法国失败，它们效忠于维希政府，并同轴心国合作。后来，英、法（戴高乐）军进驻。1941 年 9 月戴宣布其为独立国，1943 年 12 月法放弃委任统治。但战后英、法既不撤军，又不实现其诺言，法反而乘机提出其在军事、外交、经济方面特权，甚至镇压群众示威，与当地民兵发生武装冲突。英国企图实现自己控制，乘机排挤法国，迫使法撤军并接管了叙利亚。经过当地人民斗争与国际声援，安理会作出英、法撤军决议。英、法遂于 1946 年 4 月 17 日完成撤军。

作为英国委任统治地的约旦，1946 年 3 月 25 日独立。

在本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独立的西亚的国家有：科威特（1961 年 6 月 19 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62 年 9 月 26 日），也门民主共和国（1967 年 11 月 30 日）（两国于 1990 年 5 月 22 日合并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阿曼（1970 年 8 月 9 日），巴林（1991 年 8 月 14 日），卡塔尔（1971 年 9 月 1 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71 年 12 月 2 日）。

巴勒斯坦原为犹太人居住地。公元前 1 世纪，罗马人占领该地，因犹太人的不断反抗，遂被驱赶出巴勒斯坦。7 世纪后，阿拉伯人完全占据该地。20 世纪初，英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在该地建立“犹太民族之家”计划。据统计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从 1918 年的 5.6 万（占当地居民约 7%），到 1948 年的 50.8 万（约占 31%，阿拉伯人为 113.2 万，约占 69%）。

该地自 1922 年为英国委任地。在未充分听取阿拉伯人意见下，联合国 1947 年 11 月 29 日决议：1948 年 8 月 1 日前结束英委任统治，建两个国家：犹太国，面积约 $1.5 \times 10^4 \text{km}^2$ ，其中犹太人 49.8 万，阿拉伯人 40.7 万；阿拉伯国，面积约 $1.1 \times 10^4 \text{km}^2$ ，其中阿拉伯人 72.5 万，犹太人 1 万。犹太人于 1948 年 5 月 15 日建以色列国。由于阿拉伯各国反对分治，第二天即爆发了有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及沙特、也门和巴勒斯坦人参加

的反以色列的“圣战”即第一次中东战争，到1949年2月4日签订停战协定。但问题并未解决。经战争，以色列占据了属阿的5700km²土地，使70多万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沦为难民。属巴勒斯坦的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则分别由埃及和约旦控制。

4. 北非：北非有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苏丹。埃及虽然于1922年成为独立国家，但英国仍保留许多殖民特权。战后，埃及人民反英运动不断高涨，要英军退出埃及，取消特权。1952年7月23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发动“七月革命”，迫使软弱的国王退位，成立共和国，纳赛尔任总统。

在“七月革命”影响下，1955年12月苏丹议会通过了宣布苏丹拥有主权的共和国决议。1956年元旦宣布独立，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利比亚的殖民主义者意大利虽在战争中失败，但英、意、法三国却想加以分割托管，10年后方允许其独立。但遭到利比亚人民坚决反对，根据联合国决议，利比亚于1951年12月24日宣布独立。

突、阿、摩皆为法国殖民地，它们都于1954年爆发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法国被迫于1956年3月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但是，由于阿尔及利亚境内约有百万法国移民，它们不愿离开这里，因此使战争延续8年。在这期间，尽管法国派遣了50万大军，但并未能使当地人民屈服，在人力物力都无法继续支撑这场侵略战争情况下，法国遂于1962年7月3日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

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受亚洲与北非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影响，过去认为比较稳定的殖民地却爆发出了独立浪潮，其声势与速度都是空前的。这里的殖民地分属于法、英、比、葡。法属黑非洲在非洲西南部并联成一片，那里由于受到北非突尼斯、摩洛哥，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影响，在法国陷入北非地区而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正是那里殖民地取得独立的好机会。

在法属黑非洲独立运动中，带头的是几内亚的塞古·杜尔。杜尔在1946年组织工会，1947年成立几内亚民主党，1953年领导城市大罢工，农村的反对“酋长制”，影响大增，1957年在领地议会选举中获胜，担任半自治政府副主席。1958年10月2日正式独立。

1958年，法国为挽救其濒于崩溃的殖民制度，提出建立“法兰西共同体”，并规定凡参加共同体的海外领地以自治共和国地位相待，参加共同体或独立，由公民投票决定。在杜尔领导下，几内亚于1958年9月公民投票，不参加共同体，10月2日宣布独立。受此影响，于1960年获得独立的有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现名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现名科特迪瓦）、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乍得、中非、刚果（布）、加蓬、喀麦隆、多哥，此外还有马达加斯加。

在英属殖民地中，带头的是加纳（原称黄金海岸）。克瓦米·恩克鲁玛1947年建统一大会党，任总书记。1949年与温和派分裂，成立人民大会党。恩氏领导1950年1月大罢工，被认为危及殖民统治入狱。1951年2月立法议会大选中恩氏占绝对优势，获释出狱，任内阁总理。1957年获英联邦内的独立。1960年4月通过新宪法，7月1日宣布独立。

由此开始，英属非洲的殖民地，1960年独立的还有索马里（与意属索马里合并独立）、尼日利亚；1961年独立的有塞拉利昂、坦噶尼喀（后与桑给巴尔合并，1964年改为坦桑尼亚）；1962年有乌干达；1963年有肯尼亚、

桑给巴尔；1964年有赞比亚，尼亚萨兰（后改马拉维）；1965年有冈比亚；1966年有博茨瓦纳、巴苏陀兰（后改莱索托）、毛里求斯、斯威士兰。这些国家除有的经武装斗争外，独立道路基本上是“加纳模式”。剩下的津巴布韦于1980年独立，纳米比亚于1990年独立。实行种族歧视的南非，亦于1994年成为各民族平等的新南非。

比利时在非洲的殖民地有刚果（利）、布隆迪和卢旺达。布隆迪与卢旺达均于1962年7月1日独立。刚果（利）却历经挫折。在民族独立高潮中，比利时被迫交权。刚果（利）于1960年6月30日独立，卢蒙巴任总理。由于殖民主义者插手，国内出现分裂与战乱，卢蒙巴政府被推翻，本人亦被杀害。直到1965年才实现国内的和平与稳定。

葡萄牙是个老殖民主义者，对其在非洲的殖民地一直保留着强迫劳动制和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在非洲独立运动高潮中仍坚持其殖民统治，遂在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发生长期的武装解放战争。直到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1968年下台，1974年葡发生军事政变，斯皮诺拉政府始放弃殖民政策。经谈判，承认几内亚比绍（1974年9月10日）、莫桑比克（1975年6月25日）、佛得角（1975年7月5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5年7月12日）、安哥拉（1975年11月11日）的独立。

（二）第三世界的兴起

从上述可见，在亚洲和非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广大地区和人民摆脱殖民地地位，很快世界上出现了约60个国家，略超过联合国刚成立时的会员国的总数。

亚、非两洲新独立的国家加上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按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来看，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与经济大国，他们推行霸权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争夺，是第一世界。那些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建立盟国关系的发达国家，称为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就是第一、二世界之外，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独立时间较早，但其在世界上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与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的历史类似，所以与亚、非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

代表第三世界的兴起与发展的标志的是亚非会议与不结盟运动。

1. 亚非会议的召开：亚非会议于1955年4月28日在印尼的万隆召开，又称为万隆会议。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共29个，亚洲有23个，非洲有6个。当时，恰好是二战结束后已十年，虽然世界的经济情况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还有新的发展，可是，政治形势却正是两个阵营形成，彼此对立，在欧洲是冷战加剧；在亚洲却是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此起彼伏。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从东南亚开始，经南亚、向西亚、北非传开，正在影响着整个非洲。作为殖民地的宗主国，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其特权与经济利益，不仅采用各种政治的拖延战术，而且有的还使用武力进行镇压，以求维持其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在美、苏争霸的形势下，新、老殖民主义者则设法组织对苏联集团的包围圈，把独立的国家和未独立的地区纳入自己战略体系。

从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如何共同对待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在此情况下，1954年经印尼政府倡议，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五国讨论，决定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会议经过广泛讨论、深入协商取得很大成效。最后发表的公报充分反映了参加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及广大亚非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公报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主义制度，“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还提出了“十项原则”。我国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会议。会上我国代表认为，尽管亚非国家间存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但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即“求同存异”。另外，公报提到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也是我国在处理与印度和缅甸关系中所提的“五项原则”的发展和延伸。这是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在独立后召开的一次会议，在国际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这次会议对其后的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例如，非洲参加的五十个代表团中的黄金海岸（即加纳）代表团是代表当时还未取得完全独立的黄金海岸。会后不久，加纳终于在1960年取得独立。在非洲英属的殖民地中，为其解放和独立起着重要的榜样作用。

亚非会议，由于后来苏联的插手，使内部出现了分歧，所以只召开了一次，没能继续下去。但会议的影响很大，特别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大批从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国家出现，就为一个新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不结盟国家会议创造了条件。

2. 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不结盟运动的产生与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有密切关系。铁托在1947年对成立情报局就持反对意见，但勉强参加后又由于1948年与苏的分歧而被开除出情报局。这一进一出使南斯拉夫不能不在东、西方之间找一条自己所能走的道路。尽管在赫鲁晓夫上台，苏、南关系有了改善以后，南斯拉夫仍然坚持不参加集团。亚非会议召开及其作用，特别是在两大集团问题上不偏不倚的，实际不结盟的政策受到铁托赞赏，并从中得到启发。1956年7月，他与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赛尔在南非的会晤所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除确认和平共处，民族独立外，还提出反对参加对立的军事集团，即“不依附于集团”的原则。1960年上述三人又与加纳的恩克鲁玛、印尼的苏加诺会晤，讨论发起不结盟运动，他们一起成为该运动的发起人与领导核心。

在1961年6月，筹备会议上，确定参加不结盟会议的五项标准：（1）它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政策基础上的独立政策；（2）它应当支持民族解放事业；（3）它不应当是任何会使它卷入大国冲突的集体军事联盟的成员；（4）它不应当是同某个大国缔结双边联盟的参加国；（5）它的国家领土上不应当有它同意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

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1961年9月1日在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召开，有25个国家出席，其中有15个国家曾参加亚非会议。通过的《会议宣言》称支持为自己的独立和平等而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废除殖民主义，制止各种新殖民主义，强调和平共处。不结盟运动设立四个机构：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协调局和协调委员会。其参加成员分三个等级：正式成员、观察员和来宾。吸收成员和观察员需经外长会议同意，首脑会议批准，来宾由东道国自行邀请。观察员可参加各级别、各种层次会议，但无发言权与表决权。

不结盟运动1961年第一次会议有25国参加，到1992年的第十次会议，经历了32年，参加会议的成员达到108个，连同观察员国10个，达到了118个，等于联合国的会员国的2/3，成为联合国以外的最大的一个国际组织。不结盟运动随着形势的发展，会员国的增加，在国际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政治上从和平中立到反帝反殖，到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不结盟运动开始之时，正是非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向南发展方兴未艾之时，所以主要的矛头对着英、葡、比、法等老帝国主义。随着老帝国主义退出殖民地之机，新殖民主义代表的美国就插手进来，培植自己势力，实行各种控制，不是设法阻挠独立运动，就是通过一切手段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另外，苏联也在通过支援殖民地的独立和解放来建立自己据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侵略越南，苏联出兵捷克，以及双方插足中东的阿、以冲突和爆发的“六·五战争”与“十月战争”，双方在安哥拉、非洲之角和阿富汗的争夺，加剧了地区矛盾，危及那里的安全和发展。这就使不结盟运动不得不在70年代把反对“大国集团之间的争夺”、“霸权势力”列为重要内容。这对维护不结盟的地位和原则，维持地区安全，反对战争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亦是联合国的会员国，特别是在联合国大会上有关国际重大问题的投票上，不结盟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恢复问题，从1960年起，美国以其作为“重要问题”需要2/3多数才能通过。在1971年10月25日的投票中，正是在不结盟国家支持下，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力。另一个例子就是77国集团的建立。1963年，第十八届联大讨论了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问题。会上75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联合宣言》。联大根据这些国家的要求，决定于1964年3月至6月召开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会上原75个国家又发展成77国，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因此形成《七十七国集团》。该集团在每四年一次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行之前，都要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研究对策，协调立场，为贸发会议进行准备。该集团的作用实际已超出联合国的贸发会议。虽然该集团的成员国在不断增加，但《七十七国集团》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下来。

正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发挥道义上的重要作用，使超级大国在其为所欲为的行动上有所顾及。

第三，越来越重视经济领域的斗争。不结盟运动原是一个政治运动，其最初目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维护已取得的独立。但随着运动的向前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结盟国家开始认识到，政治上的独立离不开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在注意政治问题的同时，亦把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从1970年第三次首脑会议开始，经济就成为重要问题，在《宣言》中经济部分的章节超过了政治部分。把“争取实现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独立”作为基本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策略有两个方面。

一是外在环境方面，即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在1973年第四次首脑会议上，肯定了七十七国集团提出的这一口号。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同时又是投资场所，倾销商品的市场。在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价格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发达国家为转嫁危机，拼命压低原料价格，使发展中国家受到更大损失，处于严重不利地位，因此，迫切要求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新的更加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新的国际货币关系”。

二是推动自力更生和“南南合作”。在1976年第五次首脑会议上讨论了

集体自力更生的思想，并号召把发展中国家双边的、区域的经济合作扩展到整个第三世界范围。1982年在新德里还专门召开了“南南会议”。因为发展中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而且大多数国家面积不大，要发展经济，除依靠自身的力量以外，还要依靠相互间的合作。这也可似说是发展经济的内在条件。

不结盟运动是在两大对立集团的激烈竞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在苏联集团瓦解以后，当年不结盟赖以存在的环境条件已不存在，因而，西方一些舆论认为，“不结盟运动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方向”。但是，1992年于印尼的雅加达召开了第十次首脑会议。这是冷战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该会的成员国由第九次的101个增至108个，另有观察员国10个。我国作为观察员国参加了会议。不结盟运动所以能存在，是因为苏联集团虽已消失，但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与鸿沟仍然存在。因此，这方面的矛盾与鸿沟在政治与经济问题上反映仍然十分突出。这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正如苏哈托所说，南、北矛盾仍然是我们时代尚未解决的“中心问题”。

四、国际组织与地缘问题

（一）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既是国际各种关系发展程度的反映，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国际组织是指若干国家为某种目的，根据所定条约或商定的协议而建立起来的，并按一定规章制度运行的团体。广义而言，国家间的非政府组织亦包括在内。一般说来，国际组织的参加者是具有主权的国家，所以国家是国际组织的主体。虽然国际组织是以某种条约、协议建立并以一定的规章制度运行，但并非驾临于主权国家之上的组织。所以国际组织不能违反国家主权原则，干涉那些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物，而作为主权国家的成员国，在国际组织内应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不受歧视。

由于国际组织名目繁多、宗旨不一，大体上可以按性能分为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两类，根据成员国的地理范围，又可分为全球的和区域的两类。如此就分四类。全球性的综合组织，如联合国就属这类，它的成员国具有普遍性，兼有政治、安全、社会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合作，以及人权保护等各种职能；全球的专门性组织，如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区域的综合性组织，如美洲国家组织，欧洲共同体组织等；区域的专门性组织，包括区域性的军事同盟、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组织。

1. 联合国：联合国的出现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但在这之前，即一战之后，则有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国联）。国联和联合国都是美国提出的。可是，国联成立后美国并没有参加。联合国可以说是国联的新发展。

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按规定，该组织的目的是“为提倡国际协助及达到不恃武力而保护国际和平与稳定”，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促进国际合作。但是，国联实际上是在英、法把持之下，成为实现其利益的工具。

参加国联的成员国为三类：第一类是巴黎和约的签字国，共32个；第二类是被邀请的13国；第三类是申请国，要大会2/3多数票通过才能加入。成员国可自由退出，也可因违反盟约而被开除。先后参加的有63国，最多时

(1934年)有58国。苏联最早被排斥在外,1934年始被邀参加。国联机构有四:理事会、大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理事会,1920年有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美国(该位置一直空着),后又增加德国(1926年)、苏联(1934年)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原为4个,到1939年增为11个。

实践证明,国联对调停武装冲突、制止战争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还偏袒强者,牺牲弱者。例如,德、意、日三国都是因侵略行为受到偏袒性限制而退出国联。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国联已名存实亡。到1940年4月,开了最后一次大会后正式解散。

虽然国联失败了,但是,它是历史上的国际的国家联盟,其实践是有意义的,对以后的联合国建立具有借鉴作用。从此,也可以说,国际形势的发展是需要这样一种性质的国际组织,为国家之间的政治活动提供场所并促进其正常的向着和平、安全、稳定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前进。

早在1941年8月,美、英二国首脑讨论了对德的对策问题,并公布了《美英两国的民族政策的某些共同原则》。这个文件亦被称为《大西洋宪章》,其阐述的某些原则后来成为联合国宪章的基础。1941年12月22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会晤,美国起草了《联合国宣言》。1942年1月1日,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宣言》上签了字,同意建立战后和平与安全体系。这里的“联合国”是指反法西斯国家的总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苏、美、英、中四国外长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主张尽速“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可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944年8月—10月四国在华盛顿对该普遍性组织提出应该有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国际法院等部分。1945年2月,雅尔塔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解决了安理会“大国一致”与“否决权”问题。

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建议,联合国成立大会于1945年4月25日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举行。参加成立大会有50个国家。6月25日通过《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开始生效。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波兰成为会员国问题、中小国家对大国否决权问题、安理会从属大会问题,以及关于托管最终目的问题,引起许多矛盾与争论。在宪章上签字的51个国家为创始国。新加入的国家需提交申请书,声明接受宪章义务,经安理会推荐并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

联合国下设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六个机构。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由全体会员国参加,每年召开一次例会,是主要的审议机构。一般问题以过半数票决定,有关重大问题则以大会参加投票的2/3会员国决定。安理会是维持和平和安全的主要机构。它由中、法、苏、美、英5个常任理事国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前为6个)组成。非常任理事国由大会选举,任期两年。安理会若干程序性的决议,以任何9个理事国赞成票决定;其他一些事项,则以全体常任理事国在内的9个理事国赞成票决定。国际法院设在海牙,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任期五年,是联合国组织的首长。现任秘书长为安南(加纳人,任期从1997年1月开始)。到1995年,联大被接受的会员国已增加到185个。

联合国从成立到现在已50余年。联合国组织和机构反映了二战的情况。在战争结束以后,很快进入冷战时代,苏、美的对立当然也反映到联合国来。在刚成立时,联合国的50个会员国中,苏联、东欧只拥有六席。因此,在两

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中，苏联则利用在安理会中拥有的否决权来维护自己利益。到 1963 年底，在安理会中，5 个常任理事国共行使否决权 108 次，而苏联就占 100 次。在大会上，美国影响则占优势。如 1950 年，美国对侵朝战争组织所谓联合国军的问题上，在参加大会的 60 个国家代表中就得到 53 票支持。从 6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殖民地新独立的国家大量进入联合国，美国的影响逐渐下降。在 70 年代的美国侵越战争中，不但不能利用联合国，反而遭到不少会员国的反对与谴责。在 1964—1976 年中，常任理事国使用的 37 次否决权中，美国却占第一位，为 17 次。1980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3 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都分别遭到大会绝大多数票（104 票与 102 票）的反对。这说明两个超级大国在联合国的影响下降，不能为所欲为。80 年代开始，两个超级大国已从对立转向妥协，从妥协到部分合作，特别是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引发出许多地区性的冲突与矛盾。联合国不论在解决过去遗留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上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目前一般认为，联合国应在以下方面发挥其作用。第一是在日益向政治、经济和军事多极化方向发展的世界上，使国际局势在日趋缓和的同时，防止局部战争，维护地区安全，避免和控制国家间的冲突和对立，使世界获得和平与稳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是在解决人口爆炸、生态环境破坏、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毒品泛滥、自然灾害频繁等世界性重大社会与生存问题的解决上加强合作与支持。第三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要更多注意第三世界的困难与问题。

要实现上述任务，毫无问题，当然在加强联合国的工作的同时，它也需要实行必要的改革。在改革中较突出的安理会的扩大问题。1992 年联大已通过《安理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决议案。美国已表示支持日、德为常任理事国，俄罗斯表示支持印度为常任理事国。对德国，其他地区国家认为西欧已有英、法，再加德国则太多。对日本作为常任理事国，亚洲不少国家，特别是过去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由于日本对侵略战争所持态度而感到疑虑。另有主张以欧共体和日本取代英、法席位的；也有的国家提出增加亚洲的日本、印度，非洲的尼日利亚，南美的巴西。总之，安理会的席位变动和分配是涉及已担任常任理事国与各地区、各国等利益分配的大问题，一时尚难以求得一致。

2. 其他国际组织：现择要介绍如下：

(1) 非洲统一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或非统，成立于 1963 年 5 月 22 日—26 日，是全非洲性质的政治组织，现成员国已超过 50 个。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

非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首脑会议每年召开一次，讨论其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决定总的方针。首脑会议的一切决议均由 2/3 多数通过，其执行机构是部长理事会。常设中央机构是秘书处。该组织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加强非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合作；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保卫非洲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根除非洲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

首脑会议的议题，在六七十年代多集中在非殖民化，反对外来势力干涉非洲国家事务上。1980 年 4 月的特别首脑会议提出，逐步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的长远目标。1987 年 11 月的特别首脑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帮助解决非洲

债务问题。总之，非洲统一组织自成立以来，对非洲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各国合作、发展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是美洲独立国家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成立于1890年4月14日。1910年改称为“美洲共和国联盟”和“泛美联盟”。至1989年有33个成员国。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外长级代表参加的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执行机构为常设理事会，由大使级代表组成。常设机构为秘书处。总部设在华盛顿。

美洲国家组织长期是美国排挤欧洲强国及其他大国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机构。随着第三世界的觉醒，力量的增强，美国的作用与影响已有很大削弱。1975年7月，泛美外长特别会议上以12票对1票，不顾美国反对，通过“集体经济安全”新条款。1979年第九届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强调“坚持政治多元化原则”、主张“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并要求美国与拉美国家间建立“新型关系”。

(3)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8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五国外长在曼谷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盟成立。1984年1月文莱加入，1995年1月越南加入，至今，东盟已由五国变为七国。

部长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常设委员会是执行机构。秘书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总部设在印尼的雅加达。东盟成立后，强调用和平手段解决地区内部争端，除解决内部争端外，还在解决越南和柬埔寨的和平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内部的经济方面强调建立联合企业，实行特惠贸易，加强金融、农业、航运、通信和旅游等领域合作，因而使该地区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充满活力的地区之一。东盟不但在贸易方面加强了与日、美、澳、新的往来，而且与欧共体签有合作协定，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

另外，东盟于1994年还组织召开第一次东盟地区论坛会议，除东盟各国外，还有中、俄、日、美、加、澳、新、韩等国参加，讨论本地区安全和预防性外交问题，成为联合国外规模最大的，地区性国家集体讨论共同关心问题的一次集会。

(4)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拉伯联盟或阿盟，是为加强阿拉伯国家合作和联合而建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1945年3月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七国代表在开罗举行会议而建立的。到1990年共有22个成员国。埃及因与以色列单独谈判签订和约而于1979年中止会员国资格，1989年重返阿盟。

首脑会议是阿盟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由各国代表组成，一致作出的决定对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多数通过的决定只对投赞成票的国家有约束力。总部原在开罗，后迁突尼斯，现返开罗，但突尼斯为总部第二所在地。

阿盟在为阿拉伯国家合作、团结及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是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建立的军事集团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49年4月4日，参加国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12国。后来，土耳其、希腊、联邦德国、西班牙亦参加。

北约组织有：部长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各国外交部长组成。

防务计划委员会，由各国国防部长组成，负责审议政策和制订计划。常任代表理事会，由各国大使级代表组成，负责日常事务。国际秘书处，负责会议和联络。军事委员会，由各国总参谋长组成，是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北约是苏、美两个集团在欧洲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苏联集团于 1955 年 5 月 4 日成立有苏、阿、保、德、波、匈、罗、捷八国的华沙条约组织军事集团与之对抗。由于东欧巨变，该组织于 1991 年 4 月 1 日解散。

目前，北约企图通过将波兰、捷克、匈牙利作为“和平伙伴关系”拉入北约，以向东扩大。这些国家亦想以此获得安全，避免重新落入俄罗斯集团。但这种作法遭到俄罗斯人的反对。

(6) 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包括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它是西欧国家推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并具有一定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它以 1951 年法、意、比、荷、卢及联邦德国建立的煤钢共同体为起点，于 1967 年将其他组织合并而成的。后来加入的有爱尔兰、丹麦、英国（1973）、希腊（1981）；西班牙、葡萄牙（1986）；奥地利、芬兰、瑞典（1995）。现共有 15 个成员国。

欧共体的组织机构有：部长理事会，是决策机构，由各国部长组成。欧洲理事会，即成员国首脑会议，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委员会，是常设执行机构。欧洲议会，是监督、咨询机构，有部分决定权。议员由普选产生。欧洲法院，是仲裁机构。

欧共体的主要活动有：实现关税同盟和共同外贸政策。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讨论国际局势及重大问题，协调外交政策。实施共同体内部的统一大市场，从 1993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人员、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根据 1991 年 12 月 9 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不迟于 1999 年 1 月 1 日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实现欧洲统一货币。

为加速政治一体化进程，1983 年又成立欧洲联盟。

(7) 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又称欧佩克（OPEC）。它是亚、非、拉一些产油国为抵制国际石油垄断资本控制、保卫石油资源、维护国家利益而组成的国际专业性组织。其成员有伊拉克、伊朗、沙特、科威特、委内瑞拉、卡塔尔、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加蓬、印尼、利比亚、尼日利亚、阿联酋 13 国。该组织于 1960 年 9 月成立，主要机构有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总部设在维也纳。

原来这些国家的石油产权、开采、提炼和经营长期为国外垄断资本所控制。在 70 年代，该组织采取集体行动，单方面作出提高石油标价决定，从而取得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支配权，影响极大。80 年代，石油需求量急剧下降，成为买方市场，该组织的价格支配权逐渐丧失。

在上述国际组织中，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共同体。它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也正是这一点才形成它的独特性、生命力与创造性。两次世界大战都出现在欧洲，而且都是法、德两国的传统的对立与矛盾所引起的。经过二战，虽然一个胜利，一个失败，但是，从两个超级大国出现，两个对立集团的出现，法、德在其中不论是从政治地位，还是从经济地位来说，都处于同样的依从地位。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的思想和设计与制订“舒曼计划”的罗贝尔·舒曼的一套行动策略在改变这种形势，统一欧洲，建设欧共体中起了关键作用。

莫内认为法国的发展离不开欧洲的发展，只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才能发

挥欧洲的作用和法国的发展。怎样实现欧洲统一呢？办法是只有寻求共同的根本利益，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法、德在煤炭与钢铁工业上两国既存在资源上互补，又存在发展上的矛盾。两国的煤钢实现联营则有利于煤钢工业发展。由于煤钢是基础工业，不仅可以促进其他工业发展，而且也会因这个又是军备工业基础的联营而使两国战争成为不可能。为使联营既自由竞争，又防止卡特尔出现就需某种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及共同市场。同时，他还想到，这种共同市场不可能永远限于两种基础产品，将会扩大到工业、商业和农业。这就必然导致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的统一进程不断发展下去。

舒曼对此计划非常积极，利用其外交部长身份，避开国内企业与政府里的反对力量，在政府里获得支持与通过；在国外取得联邦德国的支持与美国赞同，适当避开英国的消极态度，最终取得成功，遂被称之为“舒曼计划”。

正如莫内所预计的那样，它并没有停留在煤钢共同联营上，而是向其他经济领域发展，进入经济共同体，再向统一大市场前进。由于经济的共同市场的发展，欧共体的政治联盟则向着“更为紧密的国家联盟”发展，实质上是向着“欧洲合众国联邦”或“主权国家邦联”的趋势发展。因此，欧共体不仅创造了一个经济上的共同体，而且也试验了一个政治上的共同体。它对未来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影响是深远的。目前世界各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大量出现都与此有关。

（二）地缘问题

地缘问题主要有海洋、南极、环境和南北四个问题。

1. 海洋：海洋在地球表面 $5.1 \times 10^8 \text{km}^2$ 中占 77.4%。海洋在地理上的重要意义，首先是交通价值。在目前，海洋上的船舶运输不但便宜，而且运量相当大，超过其他交通工具。正是由于这种价值，世界上的大城市、工业、人口都是趋向于沿海地带。其次是资源价值。海洋中，不仅有大量的生物资源（如大量的鱼类），海水化学资源（如各种盐类），矿产资源（据估计有 $2 \times 10^{12} \sim 3 \times 10^{12} \text{t}$ 锰结核），能源资源（如近千亿吨石油、大量天然气），动力资源（如潮汐能）。所以，海洋是一个大宝库。第三是国防价值。由于海洋也是海军舰艇活动的场所，如无强大海军防守其近海与海岸，就会成为敌对国海军侵扰与进攻的地方。所以，凡是具有海岸线的国家，无不注意海军的建设，以保卫自己国家的海疆。

海洋与陆地不同，陆地可说已全部被各个国家所分割，根据政治有关概念，海洋可以分出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公海。

（1）领海。领海在地理上是指与海岸平行并具有一定距离宽度的带状海洋水域。按海洋法，领海定义为：“国家主权扩展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的一带海域，称为领海。”关于主权不仅是指水域，而扩展于领海之上的空间及海底和底土。

关于领海中的“一带海域”的确定涉及到领海的基线、领海的宽度和领海的外沿线的确定。

领海的基线是指“沿海国官方承认的大比例尺海图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但是，“在海岸极为曲折的地方，或者如果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的划定可采用连接各适当点的直线基线法”。直线基线法就是在岸上向外突出的地方和一些接近海岸的岛屿上选一系列的基点，各基点依次相连，各点间的直线就连成沿海岸的折线。

关于基线向外的宽度有个发展过程。在 18 世纪，以海岸边大炮所能打到

的距离为限。那时大炮射程约为 5.6km，故被当时的海洋大国所接受。而后，由于炮的射程增大，各国遂把领海向外扩大到 7、11、22km 或更多，不过采用 22km 的占多数。到 1972 年，南美秘鲁等国家带头，为保护其沿海渔业资源，把领海扩大到约 370km。1973 年召开了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一期会议。经过九年的艰苦谈判，新的海洋法公约（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 1982 年 4 月 30 日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十一期会议上通过。经磋商，根据大多数国家意见通过的《公约》规定为，“每一个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直至从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 22km 的界限为止。”但有些拉美国家仍坚持 370km，未签署此公约。

关于领海的外部界限是“一条其每一点同基线最近点的距离等于领海宽度的线”。

（2）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专属经济区是从测算领海基线量起约 370km，在领海之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沿海国家对这海域自然资源享有主权利和其他管辖权。而其他国家则享有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专属经济区制度已为绝大多数参加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国家所接受。专属经济区虽定为约 370km，但有的涉及对岸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时，则以中线分割。所以，有的沿海国家专属经济区不到 370km。

大陆架亦称大陆棚，它是从沿岸低潮线起逐渐以极其平缓的坡度向海洋方向倾斜延伸部分，直到海底坡度发生显著增大的转折处为止，其平均深度为 130m 左右。当大陆架的宽度不超过 370km 时，则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适用于 370km 以内的大陆架。而 370km 以外的大陆架，其权益最大可扩展至领海外约 650km，其上覆水域属于公海，对定属种生物的捕获仍是沿海国的专属权利，对非生物资源沿海国虽有专属权利，但应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缴付费用或实物。

（3）公海。海洋公约草案规定：公海是指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专属经济区虽在沿海国领海之外，但其他国家仍享有航行、飞越等自由，所以它既非领海又非公海，而是自成一类的海域。

公海自由被看作是公海制度的法律基础，对于有海岸国和无海岸国都有航行自由，捕鱼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公海上飞行自由。

在过去，领海以外的海域即为公海。对于经济、技术发达的国家来说，可以利用公海自由任意捕捞和开采海洋资源为其利益服务。第三世界国家大量出现以后，在第三次海洋会议的 167 个与会国中，第三世界国家占多数。经过他们的斗争，对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资源专属权，以及有偿使用公海资源方面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权利，限制了一些大国的以往的“自由”。

2. 南极：南极实指南极洲。它位于地球的最南端。由围绕南极的大陆、陆缘冰和岛屿组成，三者总面积约 $1.4 \times 10^7 \text{km}^2$ ，占世界陆地总面积 9.4%。

1772—1775 年，英国人库克到达南设得兰群岛，1820—1821 年，美国帕尔默、沙俄的别林斯高晋、英国的布兰斯菲尔德先后到达南极大陆。1838—1842 年，英国的罗斯、法国的迪尔维尔、美国的威尔克斯先后考察了南极大陆。1911 年 12 月阿蒙森等四个挪威人首次抵达南极极点。至此，人们才对南极有较全面了解。

南极是一个古老的地盾和准平原，平均海拔 2350m。上面几乎全被冰雪所覆盖，冰层厚度平均 1880m。这里气候特点是酷寒、风大、干燥。全洲平

均温度为-25℃。全洲平均风速为17~18m/s。绝大部分地区降雨不足250mm，环境严酷，无人定居。

南极资源十分丰富。陆地下埋藏有大量煤和金、铜、锰、镍……金属矿。沿海有储量可观的石油与天然气。生物资源除鲸、海豹外，最特殊的是周围海域中有大量磷虾，估计年捕获量可达 5×10^7 — 7×10^7 t。不过这类资源，除磷虾已有少量被捕捞外，由于环境严酷尚无商业开采价值，仍弃置未用。

从1908年到1946年，对南极提出领土要求的国家有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挪威、智利、阿根廷等。这些要求既未被国际所承认，提出要求的国家自身也难以进行有效占领。同时，这些国家所宣布的领土不少是相互重叠的。幸好只是宣布而无法实际占领，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争夺。

二战后，各国对南极的科学考察兴趣日增。特别是1957—1958年第三次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对南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考察。此后，于1959年10月，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智利、法国、日本、新西兰、挪威、南非、英国、美国和苏联在华盛顿开会，专门讨论南极的归属和用途，并签订《南极条约》。其内容主要是：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允许科学考察和协作的自由；科学考察的计划、人员、资料 and 结果可自由交流；在条约有效期内（自1961年起开始生效，期限为30年）不承认、不争论、不公认早先任何领土要求，也不能提出新的要求。后来，又有些国家参加该条约并成为协商国。我国于1983年5月9日加入该条约，1985年10月7日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30年期限已过，南极的归属问题引起各方关注。不过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将其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由联合国对之进行有效管理。

3. 环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环境，但是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的发展，化石燃料的应用，城市化的进展，又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三废污染，出现了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酸雨，臭氧空洞……环境问题。它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危及居民的身体健康，甚至人类本身赖以生存的环境。为此，联合国于1972年6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92年6月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行动议程》和《里约热内卢宣言》。接着，在该地又举行了环境与发展的首脑会议。

环境问题大多是全球性的或跨地区性的。例如，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使地球增温，就会使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由此会产生干旱、洪水、热浪、暴风雪等灾害，对生产、城市和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破坏；其温室效应使海平面上升，不仅使世界人口集中和经济、城市发达的沿海地带受到沉沦之灾，而且会使一些岛国从地球上消失。臭氧空洞出现，造成紫外线辐射增加将给人类生存本身带来威胁。这类环境问题关系到地球上的每个国家和每个人。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则又涉及到责任、规划、资金、技术……问题。为此就需通过国际的、国家间的政治等活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西欧各国出现的绿色运动和绿党十分活跃，不仅获得相当数量选票，而且进入了议会。在1989年欧洲的议会选举中，有30名绿党成员当选，并组成了“绿色议会党团”。

另外，环境问题可能成为地区性国家之间的严重矛盾，甚至冲突。因此，环境问题是无国界的，一个地方产生问题，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地方，例如，西欧在法、德、荷、比、卢交界地带由于工业集中所产生的SO₂的排放，虽

然用高烟囱解除了当地的污染，可是随着西风扩散到北欧，给该地造成酸雨，使森林和河湖中的生物遭受严重灾害。这种情况不仅在西欧发生，北美大湖南岸的 SO_2 的排放也造成大湖北岸的酸雨。这是环境污染方面突出例子。环境资源方面的矛盾就更加明显。例如，在一些干旱地区，水资源短缺成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制约着经济发展，还影响当地人民的生存，像尼罗河水对埃及和苏丹；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对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约旦河对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总之，环境问题已经进入国际政治领域，它本身又是一种地理空间问题，当然在政治的空间格局中又增加一项重要的地理因素。政治地理学家不能不予以极大的注意。

4. 南北问题：在世界分成两大集团对立，第三世界兴起时，世界上主要问题是东、西问题与南、北问题。东、西是指两大集团，问题是世界的和平和战争问题。南、北主要是指位于南面的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与位于北面的发达国家，问题是其间的经济差距与发展问题，也有称其为贫富问题的。

位于南面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原来大多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处于被剥削、受压迫地位，经济落后，与北面的宗主国、帝国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上有很大差距。从南方的国家独立到现在，总体来说，它们都已获得快速发展和重大经济变革成效。在近 30 年中，南方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北方。以南、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1960 年为 20 : 80，到 1980 年为 25.4 : 74.6。南、北经济人均增长率，1965—1973 年分别为 3.9% 和 3.6%；1973—1980 年为 3.1% 和 2.1%。双方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1960—1980 年，南方从 29.7% 升为 34%，北方从 70.3% 降至 66%。

到了 80 年代，形势出现逆转。南、北国内生产比重，80 年代又退到 1960 年的 20 : 80 水平。出口贸易比重，1987 年为 25.5 : 74.5。1980 年至 1984 年，南、北经济年均增长分别为 0.7% 和 1.3%。要知道，整个 80 年代，拉美和非洲都是负增长，拉美倒退 10 年，非洲倒退了 20 年。过去所说的差距拉大是指这段时间，是指拉美与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因为，这段时间（1980—1989 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4.3%，发达国家为 3%，仍是前者高于后者。而 80 年代的东亚发展中国家则是飞速发展阶段。

进入 90 年代，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发展中国家，亚洲经济仍快速增长，非洲多数国家经济虽仍在恶化，但拉美、西亚已有好转。1993 年，世界经济增长 2.2%，发展中国家为 6.1%，发达国家为 1.1%。

上述情况的变化反映北方对南方影响，南方对北方的依赖都在下降。而一些亚洲国家经济与金融实力在加强，反而在向发达国家投资。在制造业中，不但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发展，发达国家也在快速向外转移。亚洲（特别是东亚）已成为世界上发展较快地区，其次是拉美，第三可能是南部非洲。总之，南北的形势在变化。

当然，南方仍然存在着自身的问题。首先是基础严重滞后。例如，美国 199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6 万亿美元，非洲的 40 个发展中国家则不过是 2000 亿美元。美国年增长 3% 就等于非洲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产值美国为 2 万美元，非洲只有 500 美元，即使以同等速度增长，其绝对值差距当然越来越大。其次是人口因素。以 80 年代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2.1%（非洲为 3.2%），发达国家为 0.6%。这当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三是地区差异。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文化因素加上发展阶段不同，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情况的差异超过了其与发达国家的相比。如 1980—1989 年的人

均产值增长率，东亚 6.7%，南亚 3.2%，拉美-0.6%，非洲为-2.2%。

另外，还应当看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经济仍占绝对优势，经济的运行秩序和规律仍取决于它们，贸易中剪刀差、保护主义以及第三世界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与科技方面的差距，使其处于不利地位。在国内，则有教育水平低，两极分化，法制不健全，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严重不适应等，都对经济发展起不同的制约作用。总之，第三世界经济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客观存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将会克服上述障碍，加速前进，对世界的格局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五、当前国际格局变化与发展前景

（一）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特点

东欧的巨变、苏联的解体是本世纪 90 年代的一场大变动。其变动的速度之快，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不亚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巨大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形势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 两极格局消失，多极趋势出现：二战后左右世界的是美、苏两超级大国为主所组成的集团的对抗，即两极格局持续了 40 年。现在，苏联集团的突然垮台，与之相并存的两极格局当然亦随之消失，相应而起的则是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多极即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与中国。不过这五极的力量还很不平衡，只能说是趋势的出现，还不是相互制约，力量相对均衡的五极。

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力量，仍然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西欧的经济总体上虽与美国相当，但毕竟不是单一国家、多方制约、力量发挥不出来。日本虽然经济实力较强，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 60%，但战败国的地位，对自身侵略战争认识，政治上的作用与形象受到影响，军事仍有所依附，所以作为一极来说，力量不充足。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领土、人口、政治、军事、经济力量都有所减少和下降，作用与影响已今非昔比。中国这几年经济增长较快，但总体实力还很弱。所以，目前的现实还是“一超多强”。

2. 单一主要矛盾转化为多重矛盾：原来两极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的东、西矛盾是主要矛盾，它主宰着其他矛盾。现在则出现西方国家间的矛盾，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第一类的矛盾是美国、西欧、日本之间矛盾，三者之间由原来以美国为首，政治上和军事上影响和控制西欧和日本，现在情况是，西欧与日本则与美国争取相应的平等关系而出现的经济、政治矛盾以调整彼此关系。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特别是与地区大国，其中主要是美与俄、中关系。俄、中虽然一个有所减弱，一个仍力量不强，但仍然是重要大国，虽然现在还不是名副其实的两个极。因此，西方，特别是美国，要设法阻挠这种趋势的发展，并通过限制和干涉内政等办法来实现其意图。第三类是地区性的各国之间，由于各种矛盾引起的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冲突不仅会扩大，而且有意、无意卷进些大国，使矛盾复杂化。

3. 全球经济关系国际化、集团化、区域化：由于两极体系的消失，政治、军事矛盾的减弱，各国都将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作为重要任务。但是，在经济上，首先是打破了过去政治上的障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加强，在资金、技术、商品方面的流通与交换呈加快趋势，使世界经济向一体化道路发展。

在经济发展上，自从出现了西欧共同体以来，其经济效益与优点日益明显，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与加深。其作用一方面，吸引与促进其他地区的集团化经济出现；另一方面，也迫使一些地区组成集团，否则就无法与之竞争及抗衡。例如，北美出现了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以，世界上经济的区域集团化发展近来特别突出。目前，大约有各种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 24 个，涉及的国家欧洲有 31 个，亚洲有 34 个，非洲 49 个，拉美有 28 个，北美与大洋洲各 2 个，共 146 个，占联合国 185 个会员国的 79%。可以说把绝大多数国家卷了进去。

4. 全球军事对抗和大战危险减少，地区性冲突和不安全因素增多：由于冷战结束，两个超级的大量的核武器与运载工具的竞争局面亦随之消失，面临的是消减核武器与运载工具，以及防止战略武器的扩散就成为迫切的任务。从近年来的形势看，在消减和销毁核武器方面取得较大进展。1995 年 5 月，联合国会议确定，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些情况表明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在减少。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原华沙条约二个军事集团的成员国都在较大幅度地裁减军备。所以，欧洲情况比较安全。不过东欧（如波黑）及原苏联则出现些冲突。除波黑外，多已趋于和缓。其他地区（如阿富汗）存在的冲突亦只限于局部或国内。不过，在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由于原来存在的矛盾与可能出现的潜在矛盾，则出现不同程度的加强国防与军备现象。因此，在全球性对抗与危险减弱的同时，地区性的冲突有可能出现与增多。

（二）多极化趋势中的各极势态

1. 美国：美国是原美、苏争霸两极体系中的美国集团之首，是一个军事、政治、经济力量都十分强大的超级大国。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过去受两极体系的制约条件与因素已不复存在，似乎不可一世。但是，形势的变化并不尽如其意。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原来西欧与日本都是军事上仰从美国以对抗苏联集团，政治上以美国马首是瞻，苏联集团瓦解后，对西欧与日本来说，对立面的军事压力已不存在，因而对美国的军事依从程度必然有所下降。在经济方面，过去日本与西欧已有较大发展，美国与西欧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旗鼓相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日本已超过美国。随着今后经济的发展，美国、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更加接近，对美国来说经济实力相对下降。所以，经济方面的摩擦与矛盾则日益增多。军事依从性减弱，经济摩擦增多，而且经济实力接近情况下，政治上就削弱了原来美国与西欧、日本的聚合力，彼此间也由依从关系转向既协同又摩擦的伙伴关系。

美国对苏联原来是对立的敌手，在苏联解体后，美、俄原来企望建立伙伴关系，但是由于两国本国利益与对外的安全，俄美两国的矛盾增加，反而拉开两国的距离。使美国对与俄国长期战略合作产生疑虑。对中国，由于中国近年经济迅速增长，政治影响扩大，使其对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与战略关系方面的选择处于摇摆中。这也就是美国对于俄、中这两个目前非敌、非友的大国如何对待的问题。

总之，美国面临着如何维持自己在世界的主导地位问题则受到西欧、日本与俄、中的制约，同时，既受自身力不从心的限制，又受国内孤立主义的影响。在此形势下，美国力图在政治上、军事上保持自己的地位与作用，亦想在经济上提高自己的地位与作用。美国已与加、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组织向南延伸则可形成美洲自由贸易区。在亚洲，美国想加速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向贸易自由化组织过渡；在欧洲，美国与一些国家也在倡导“泛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这样，美国想在西半球与其东、西两大洋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以发挥其经济主导作用。

2. 西欧：西欧，从欧共体发展到欧洲联盟，实现其走向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道路。另外，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其军事合作。因此，西欧可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在逐步实现一体化。这样，西欧就在世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西欧的一体化组织毕竟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内部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原来欧共体内部以法、德为核心，但在德国实现统一后，不论人口与经济实力都居首位，法为制约德国在欧共体内实力的增长而接近英国。另外，在一体化的进程上，德国比较积极，而英国则比较消极。在欧共体内部，由于各方力量的牵制，其政治与军事方面作用则远不如经济力量大。

西欧原是靠近美国，以在军事与政治上与苏联集团对抗，各国在经济上，联合起来发展自己避免受美国制约。在苏联集团解体后，由于来自苏联的压力已不存在，各国独立倾向有所加强。为了扩大自身力量与防止俄国势力再起，欧共体在吸收北欧以后准备逐步向东发展。但是，在向东扩展中则遇到俄国的阻挡。

因此，欧共体在面临日本与北美的经济竞争情况下，需要加快一体化的进程，对内需要平衡内部关系。对外既想减轻对美的政治与军事的依赖，发挥其独立作用，又要在防止俄罗斯力量再起方面借助美国实力求得平衡。

3. 日本：日本国土面积不大（37.8万平方千米，约为美国的4%），人口亦不多（为1.24亿，约为美国的49%），但国民生产总值约等于美国的2/3，按人均产值计，则超过美国。尽管其中有日元升值因素在内，但不可否认，日本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经济特点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远大于进口，近些年来，每年都有几百亿甚至近千亿美元的出超。所以，日本不仅是出口大国，也是金融大国和资本输出大国。正是这种情况，日本在对外关系上，特别是与美国关系上，经贸摩擦比较多，而且越来越严重。这种外贸上的差距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日本是一个战败国，政治上，在战后一直是依靠美国。军事上，与美签有安全条约更是依赖美国。在战后是依靠美国的力量以求得同苏联与中国的力量的平衡。

苏联解体后，它受的军事压力已不复存在，日本则朝政治大国方向发展。在对美国关系上，尽管经贸上存在着矛盾，但双方相互依赖仍然是主要的。在军事上，在面对东亚的中、俄、日、美新形势下，日本仍需美国。不过在东亚经济方面，日本的“雁行结构”与美国的“扇形结构”，实际上，都想由自己来主导该地区的发展。因此，两国存在着矛盾。日本的未来趋向是争取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树立政治大国形象。在东亚的俄、中、日、美关系上，日本是想依靠美国，借助中国，牵制俄国，促俄归还北方领土；依靠美国，借助东盟、影响与限制中国的强大；利用东亚各方力量来平衡与减弱美国的影响，使政治与经济朝着有利于日本方向发展。

4. 俄国：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国，不论在国土、人口、经济势力方面都有很大削减，而且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原苏联范围内其他关系方面都发生严重的动荡与问题。在至今的四年中，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在国内政治方面，

原来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分歧，由于权限不清，发展得十分严重。最后于 1993 年 10 月以武装冲突而结束。后来，通过新宪法选举出的新议会，确立了新的三权分立和总统制政体，使政治活动正常运转。对原来的“八·一九”事件的组织者及原议会领导人实行大赦也缓和了国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车臣的地方分离现象亦获得初步解决。同时，通过提高国内民族实体的地位，理顺关系建立真正的联邦制，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在经济上，1995 年上半年已从过去连续年下降 12%~18% 幅度；减到 4%，并且有些部门开始回升，外贸顺差增加。总之，俄国国内形势开始好转。

在对外方面，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大幅度下降，西方大国亦乘机向东扩展势力，甚至把其融合于西方主宰的欧洲。但是，近来俄国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联系与聚合力并抵制西方向东欧扩张。总之，俄国在军事实力上仍然有强大的基础，加上广大空间、富饶资源及对周边的影响，是具有潜力的一个极。一旦渡过困难进入发展之途，当可重振雄风，它对西方来说是敌，是友，尚难预测。

5. 中国：中国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但经济上过去则是一个弱国。由于它的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又是安理会的常任理国，掌握了战略核武器，所以在两极体系的年代，其政治动向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在国际上，由于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活动上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所以在第三世界有较大影响。

由于中国从 80 年代开始对国内的经济政策实行较大的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发展上，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来连续几年工业生产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国民经济原订从 1980 年到 2000 年翻两番的任务可以提前五年完成。特别是对外贸易上，从 1992 年到 1994 年，三年进出口总额由 1360 亿美元增到 2380 亿美元，增长了 75%，平均每年增长 300 多亿美元。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步入一个经济上的重要国家。

正是中国近年来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特别与其他地区的对比显得十分引人注目。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对西方大国在经济发展缓慢时，为其产品、资金提供市场起着重要作用，经济上是互利的。所以，引起各国竞相进入中国这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市场。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力量的强大，特别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的出现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它们希望中国按它们的模式来发展，否则某些外来力量就会阻挠和延缓其经济发展速度，诱使其改变政治方向，甚至利用分裂势力阻止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就成为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实现国家富强、统一与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当然要反对与克服这种力量与阻力。

总之，这五极的势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美国。它在其控制和影响世界局势的力量有所下降情况下，一方面力图稳住阵脚以维护其原来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另一方面，则组织自己的地域经济集团以面对欧、亚的竞争，同时，又设法在欧、亚的地域经济集团中施展自己的影响。

第二类是西欧和日本。它们都想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能和美国成为平等的伙伴。在经济上，则都想在欧、亚实现自己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自身军事力量不足以及面对内、外政治形势，又需依靠美国力量的存在与支持。

第三类是中、俄。中国在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以后，近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希望在实现其各项改革中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结合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在对经济和政治实行改革与重组中能维持其在核心地区的力量与影响。

（三）其他地区的势态

1. 亚洲：

（1）东盟与“四小龙”。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于1967年。东盟成立初期，因内部在宗教、语言、文化、民族等方面差异，所以分歧较多，彼此关系多注重政治方面。在70年代初开始探索经济方面合作途径。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结束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速度加快。70年代末开始扩大特惠贸易的同时，还加强彼此在金融、财政方面合作，兴建合资企业，推行工业互补计划。恰好迎来80年代外资的大量涌入，使东盟各国大多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继亚洲“四小龙”以后出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到1992年，东盟不包括文莱在内，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739亿美元，并准备从1993年开始的15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有人称该地区将成为下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东盟所处的东南亚地区，是联结澳、新与印度洋以及远东及欧洲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盟计划逐步扩大，除现已吸收越南外，还将吸收柬埔寨、老挝以及缅甸。在对外方面，与大国都建立良好关系，同时又都保持适当距离。美国在东盟的外来投资中占2/3。东盟还利用美国实力的存在以求与中、日取得平衡，同时又对美国推行人权、民主的歧视性做法，干涉其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对日，由于是进行外贸，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对象，联系较多，但二战时日本占领过该地区，所以对其军国主义倾向十分敏感。对中国，由于经贸联系逐渐增加，而且潜力甚大，所以近来东盟特别注意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但是，由于东南亚地区华人和华裔较多，加上对中国领土南沙群岛主权上与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特别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条件，亦使其感到放心不下。所以，东盟与大国则在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注意彼此矛盾，保持平衡。另外，东盟亦注意与地域外的西欧、印度、俄国……加强联系、维持平衡。

“四小龙”是指韩国、新加坡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60年代开始，经七八十年代至今，经济都维持较快速度增长，其成绩之显著，令人瞩目，所以，合起来称之为亚洲“四小龙”。由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特别是香港与新加坡已达两万美元左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故被列入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行列。根据中英两国政府协定，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韩国由于目前与朝鲜处于分裂状态。由于朝鲜的核设施和可能拥有核武器问题，这个关系到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的大问题。于1994年10月，美、朝经过谈判虽已签署解决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实施协议仍需克服困难。

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但与大陆仍处于分裂状态，两岸的统一纯属我国的内部问题，但两岸关系的发展往往涉及中美、中日之间的关系。

（2）南亚。南亚次大陆各国在独立后，由于该地区种族、宗教、语言、社会等问题比较复杂；加上人口增长过快，原来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问题突出。另外，加上克什米尔问题和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的争夺，所以，该地区是内、外矛盾比较复杂的热点地区之一。

冷战结束后，这里形势有所变化。在外交上，印度改变了过去“先俄后美”的政策，在保持与俄关系的同时开始向美靠近，另外又改善与中国关系，增强与东盟联系。巴基斯坦在弥合与美关系，维护与中国联系的同时，通过宗教联系大力发展与中亚、西亚穆斯林国家关系。在经济方面，各国国内局势相对稳定，积极进行经济改革，特别是印度，利用劳动力优势，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资，活跃经济，近年来取得显著成绩。

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区域集团化影响下，印度主动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利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树立自己形象，发挥领导作用。由于该地区地近东亚，劳动力资源丰富，已开始成为一个投资热点地区和新的经济增长地区。一旦经济发展起来，作为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将成为政治、经济大国，对世界格局亦将产生重要影响。

不过该地区印、巴间的克什米尔问题，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问题，印、孟间恒河用水问题以及核武器与导弹扩散仍是该地区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3) 中东。中东地区在柯恩的“世界地缘战略区与地缘政治区”图上，总是称该地区为“破碎带”，即世界矛盾聚集和焦点地区。在这里，发生过四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总之，这里是战后发生战争最多的地区。

在冷战结束后，这里亦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在美国的影响下，中东矛盾的关键巴、以双方已正式谈判，在 1994 年签署协议，巴首先在加沙与杰里科实现自治。1995 年 10 月，巴、以又签署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巴自治区范围协议。另外，约、以已于 1994 年签署和约。剩下的叙、以，黎、以和平可能随着巴、以问题逐步解决而解决，这将对中东和平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在战乱消失之后，中东亦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方面，中东地区，除海湾产油国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来发展合作关系，也可能在以色列周围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地域。

不过中东地区情况复杂，多年积累下来潜在难题较多。除叙、以和黎、以间问题外，伊拉克问题（经济制裁还未取消）、两伊问题（战争虽停，但边界等问题并未解决）、库尔德人问题、中东核扩散问题以及哈马斯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问题解决起来均需时日。

2. 非洲：非洲的国家很多，但取得解放和独立较晚。在各国取得独立以后，正值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开始激烈之时，所以，非洲国家为避免卷入两大集团，采取不结盟政策，维护自己的独立，并成为第三世界中一支重要力量。

非洲由于过去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甚至国家间的界线不能不受其影响，留下深深的烙印。在经济上，独立后往往把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形成国有经济为主体，大多数国家私有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由于人才缺乏，管理不善，不但原有经济难以发展，还使整个经济停滞不前。另外，由于原来经济多依附于宗主国，出口以农产品和矿产品为主。独立后，这种情况变化不大，单一产品生产影响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原料产品价格下跌，则国家外贸收入减少，加上人口增加过快，农业未得到重视，灾荒较多，使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甚至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出现动荡。

在政治上，非洲国家独立初期，大多数曾仿效前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实行过两党制与多党制。但后来由于非洲国家内部种族、部族、宗教、语言等问题较为复杂，绝大多数国家都转向一党制或军政权。

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外来援助大量减少，同时又在内、外压力下，实行准备不足的改革，即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结果，非洲整个经济发展滞缓，局势动荡。经过几年来的艰苦变革与适应，目前，“多党民主”浪潮已过，多数国家政局趋于稳定，经济的区域合作亦迈出重要步伐，南非的白人政权的结束，标志整个非洲民族解放的完成，也是南部非洲和平与发展的开始。

但是，由于非洲情况各地差异大，各地仍然有其特殊问题。在北非，从埃及到毛里塔尼亚七国，当前除苏丹南北遇到的种族、宗教引起的矛盾，阿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问题外，相对都较稳定。从进一步的发展来看，北非地带，东西各有不同趋向。东边埃及可能向东与巴、以、约、叙、黎相互加强联系以求更大发展。但在用水问题上有矛盾，可能促使其加强与苏丹，甚至与埃塞俄比亚的合作。西部马格里布亦将加强联系。另外，从整个来说，对内的原教旨主义的趋向，对外是与欧共体的关系。在 1991 年，欧洲委员会关于同地中海沿岸地区非共同体成员国的新关系《意见书》中提到，地中海地区的稳定和繁荣是欧共体自身稳定和繁荣的因素，是欧共体最大利益的所在地。

在东非，中非和西非国家中，除尼日利亚、冈比亚为军政府，扎伊尔、乍得、塞拉利昂、索马里和利比里亚有待解决其内乱外，多已出现局势和缓，注意经济发展。不过局势还可能出现反复，经济上，洲内大国本身矛盾较多，缺乏核心带动。不过，西非、中非、东非都已建立了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正在发挥不同作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南部非洲，除南非以外，10 个国家组成南部非洲经济联盟，目的在于减少对南非的依赖。现在南非白人政权已经结束，民族团结的新南非已建立，它消除了与周边国家的政治障碍，可望参加地区经济合作组织，这对南非与非洲南部地区都有利，由于南非的条件，可能发展成有生气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3. 拉美：拉美各国最早由殖民地获得独立。由于继承了原殖民地的大地产制，阻止了工业的发展，直到本世纪 30 年代以后才陆续开始工业化进程。到 70 年代以前拉美国家大多实行进口替代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该进程虽然使工业有了发展，但出口不多，缺乏外汇，实施保护关税政策使产品缺乏竞争力，忽视农业，造成市场供应不足，遂不得不改变政策，实行增加进出口的高增长政策。此时，石油危机使西方国经济衰退，石油美元带来大量游资，为拉美提供了大量低息贷款。当开始还债时期，拉美产品在国际市场遇到竞争，而且借款利率大增，遂使拉美在 80 年代遇到严重的债务问题。从而使拉美不得不牺牲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在 80 年代经济紧缩，市场困厄，实行改革时期，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与贫困现象，特别是社会下层收入大幅度下降，城乡贫困人口大增。加上贩毒吸毒、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社会暴力等问题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严重问题。尽管，进入 90 年代后经济情况已开始好转，有了较快发展，但社会问题则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墨西哥于 1994 年初与美国和加拿大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由于该协定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组成的自由贸易区，所以引人注目。一年的实践对墨西哥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快速流入的外资多投向证券，进口大增带来外汇储备枯竭，比索贬值引发外资出逃，造成严重金融危机。它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贸发展上存在着互补，但也有弊害，如能处理得当稳

步前进，才可避免经济力量与水平的悬殊可能产生的冲击。

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了美洲一体化的进程。拉美的其他国家多积极向北美自由贸易区靠拢。在 1994 年 12 月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制订了要在 2005 年实现美洲一体化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毫无问题，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拉美都是一件大事。因此，对拉美来说，实现美洲一体化与克服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其面对的两项重要课题。

目前，美洲除北美自由贸易区外，还有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安第斯条约组织，南锥体共同市场等地域性经济组织。

